布哈林与
布尔什维克革命

〔美〕斯蒂芬·F·科恩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政治传记（1888—1938）

〔美〕斯蒂芬·F·科恩著

徐葵、倪孝铨、徐湘霞、潘世强合译

徐　葵校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ALFRED·A·KNOPF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阿尔弗列德·诺夫公司1973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政治传记(1888—1938)

〔美〕斯蒂芬·F·科恩著

徐 葵、倪孝铨、徐湘霞、潘世强合译

徐 葵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455,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

书号 3001·1790 定价 1.90元

(只限国内发行)

我们很快就发现为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和利用的人们具有多么不同的经历和能力；有多少流派汇集到革命洪流里来了；要把这个革命的一切方面或一切思想概括进一个警句或一个定义是多么不可能。

——J·M·汤普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

党的历史就是我们生命的历史。

——一个幸存的老布尔什维克，1965年。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这一革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书。

首先这本书是一本政治性的传记。此外，由于布哈林是一个理想家、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思想传记。对布哈林进行全面的研究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二十多年，布哈林的事业曾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极为重要。但是，因为他的奠基者的作用一直为苏联的官方编史者所抹杀，因此，有时人们仅仅记得他是几本一度著名的共产主义手册的作者和1938年的莫斯科清洗审判的主要被告和牺牲者。直到1929年，布哈林一直是列宁创始的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是执政的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他是《真理报》的编辑，他做苏联共产主义官方理论家将近十年之久，在1926—1929年间，他还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但人们经常不提他的这些显要的地位。在列宁逝世后，他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在1925—1928年间，他和斯大林一起，是联共(布)的共同领导人；他是联共(布)的温和的国内政策的主要制定人，该政策对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采取渐进政策；在1928—1929年间的决定生死存亡的事件中，他是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的领导人；即使在他失败后，他仍然是三十年代布尔什维克抵制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布哈林和布哈林主义在当今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也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布哈林主张的一个更受

到人们赞同的社会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斯大林逝世后，令人注目地又重新回来了。

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研究布哈林作为一种重新考察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历史的形成年代的方法。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即集中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能使整体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除了第四章以外（在这一章里我离开了编年史而去讨论布哈林的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著名著作：《历史唯物主义》），我始终试图把布哈林的政治和思想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和苏联的更广阔的背景里去叙述和解释。我希望这种写法对本书（作为一本正式的传记）可能造成的欠缺之处，将为这种写法可能提供的新见解所弥补。

的确，根据苏联的材料① 去对布哈林进行充分的研究，就须对历史资料重作分析，不论对具体问题，还是对总的情况都要如此。除了布哈林自己所起的中心作用以外，他还是一个对于他的时代的事件的多产的（而且往往是官方的）评论家。就象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事实上不参考布哈林的意见就无法考察苏联头

---

① 除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以外，对布哈林的研究著作有两本专著和两篇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彼得·克尼尔施：《尼古拉·伊·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柏林，1959年）；A·G·勒维：《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共产主义的幻想》（维也纳，1969年）；约翰·E·弗莱厄蒂：《尼古拉·布哈林在1929年前的政治生涯》（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54年）；西德尼·海特曼：《布哈林关于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概念：对他1923—1928年基本观点的分析》（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海特曼出版了一本有价值的著作目录，《尼古拉·伊·布哈林：著作目录》。这个时期中一些更为一般的研究作品也相当详细地研究了布哈林，包括亚历山大·厄尔里希的《1924—1928年的苏联工业化辩论》（坎布里奇，麻省，1960年）；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剑桥，1960年。此书以后简称《良心》）；N·瓦连廷诺夫：《右倾共产主义学说》（慕尼黑，1960年）；M·莱文：《俄国农民和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化的研究》（埃文斯顿，伊利诺斯，1968年。此书以后简称《俄国农民》）；E·H·卡尔的多卷集《苏维埃俄国史》。

二十年历史的任何方面。”① 因此，通过布哈林这一个分光棱镜去重新检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就可能扩大我们的知识，有时还能修正我们对某些重大事件的理解，从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激进派的形成、党的政治的性质以及在关键性的二十年代的政策争论、直到苏联的阴沉的三十年代的政治历史（这一时期以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毁灭而告结束）。

我希望不要被误解，也不希望把应该强调的东西搞得模糊不清。这本书大量依靠了一些学者的先驱作品，的确如果没有这些先驱作品，此书是无法写成的。这些先驱作品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情况，本书的注经常加以引证。我只希望说，在叙述布哈林的事迹时，我同时试图阐明一些我们还不很了解的更大的事件及其演变。

各种各样的学者正在努力修改下列习惯看法：即把列宁逝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解释为主要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我认为，在广阔的意义上，本书是对这方面的努力的一个贡献。本书所写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在二十年代中期，布哈林，他所代表的力量以及他的同盟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思想中，都比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更为重要。总之，本书将表明，认为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以前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的先驱者”的看法是极大的错误。② 以上观点又与下列流行看法有关，即：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合乎逻辑的不可抗拒的结果。这种看法现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苏联和西方学者（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的反驳。

① 沃伦·勒纳的话，《俄国评论》（1969年4月）第202页。

② 伊萨克·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伦敦和纽约，1959年）第9页。鲁道夫·施莱辛格早些时候曾正确地指出，E·H·卡尔的著作代表着同《托洛茨基—斯大林长期不和的传统》的决裂。见《苏联研究》1960年4月，第393页。

所有的传记作家都应该避免过份强调他所写的人物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也许没有做到。但如果我没有做到，我也希望此书提供的证据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歧要比通常想象的多得多；而革命的成果则在相当程度上不是预先设想好的。说服一般的读者相信这一点，并促进其他学者重新考虑那些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这就是不小的贡献了。

作了如上说明后，读者应该明白此书的陈述和判断，在某些地方一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初步的。布哈林的事业和思想，直到1928—1929年，大部分都有公开记录，可从西方图书馆得到。但他的一生的最后几年（就象当时的带有创伤的政治历史一样，布哈林的最后几年就是这一历史的一部分）却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布哈林1929年在政治上失败以后，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很少有可以相信的关于他的作品。而在布哈林于1937年被捕后的二十年中，他就只能被称为"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后，苏联关于历史著作的审查虽有所放松，而且出现了许多有关斯大林以前时期的很有价值的材料，但布哈林本人仍然是官方禁止的和加以歪曲的主题。甚至把二十多年来斯大林的恶骂所堆积起来的"诽谤和遗忘的沉重负担"（借用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的话）都搬掉，布哈林的生活和布哈林时代的一些重要方面仍然是不清楚的。要把它们修复再现，如一些作家所说的，有时就象研究古生物学一样。我们对布哈林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和思想知道得特别少，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共同的缄默，部分也由于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共同命运。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足够了，所有的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中（包括列宁在内），只有托洛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正的自传和未经审查的私人文件。

因此，即使是一本把目前能收集到的关于布哈林的材料都集

中起来的书（我相信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也不能自称是“最后的权威性”的著作。当苏联学者最后终于能对他们的革命的创始人和苏联的形成年代的历史进行自由的研究和写作时，本书的内容将会得到补充，本书的一些判断也会得到修正。

S·F·科恩

1972年12月写于纽约城。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形成

一个寻求拯救灵魂、拯救他自己和别人的人，不应从政治道路去寻求，因为一些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务都只能用暴力解决。

——马克斯·维贝尔

我坚决认为一个不断思索的、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

——布哈林

伟大的事件产生历久不衰的神话。布尔什维克（即后来的共产党人）在1917年准备发动革命，由于他们的对手的无能，行动犹豫或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他们出乎意料地非常容易就掌握了俄国革命。当其他政客们还在犹豫不决时，由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这一果敢的行动，从此神话就产生了，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不象其他政党的领导，是由一群团结一致的、同一类型的、忠诚的男女组成的。这个神话虽然并不真实，却在革命后辈中流传了许多年。①

除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反复坚持说（特别是在内部争吵十分激烈时），布尔什维克党曾一度以只有"一种心理和一种思想"

---

① 关于对这一神话的另一种批判意见，见丹尼尔斯：《良心》第4—8页。但丹尼尔斯提出了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二元论看法，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为特征① 以外，这个神话能广为流传的原因不清楚。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运动内部的派别活动的产物。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以前的历史是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无休止的争论，特别是同列宁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相联系的。甚至夺取政权这一决定，也是党内不和的一个绝好的例子。这一决定曾遭到列宁的许多最老的战友，包括列宁的主要副手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和列甫·加米涅夫的激烈反对。他们简单明了地对此表示不赞成。1917年以后的事件同样表明，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根本一致。从1918年年初出现反对列宁的国内外政策的强大的反对派开始，直到苏联二十年代的广泛的纲领性的论战，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争论连续不断，而且日益加剧，其间仅仅有过几次短暂的间歇，那是生存的愿望迫使他们不得不休战。就如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后来说的，1917—1930年间的党的领导的政治是"十三年的派别斗争"。②

在持续二十年的党内斗争和三十年代斯大林对自己人的血腥清洗以后，关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神话，终于让位给另一个仅仅部分比较准确的神话。新的神话说，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根本不同的两大派——党内同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流派。一派是布尔什维克的"西方派"，即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17年前住在国外，吸收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他们代表着布尔什维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联系，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动力。另一派是党的"本地人"，即在革命前一直留在俄国国内从事地下组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精于组织方面的政治工

---

① 布哈林的话，《俄共(布)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第230页。

② M·盖辛斯基：《同脱离党的总路线的偏向的斗争：十月革命后的党内斗争史纲要》(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1年)第4页。

作，而不精于思想意识工作。他们注重实用而很少关心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人们认为，这些“本地人”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倾向，是1917年以后党的官僚机构、党机关干部的胚芽。

新的神话还说，1917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可以按照党内有两大派这一情况来进行观察。[①]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最初年代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中占压倒优势，但在二十年代末期被“本地人”击败并被撵出党的领导机构。斯大林领导了党的官僚并成为他们的化身。运动分为两派这一看法，表明了以后党内不团结的一个根源，即国际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之间的冲突。新的神话比原来的神话比较接近真实。但是，由于新的神话认为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新的神话也破产了。

相反的论点倒是真实的。在革命前夕，党内“受西方影响的人”，包括多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多种理解。确实，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分歧产生了革命后头十年里的重大的政治论战。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和知识背景。他们是一群不同类型的人。除了其他许多特点外，他们反映了革命前沙俄帝国的多民族的特性以及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裂缝，这种裂缝在“老布尔什维克”运动内部早已存在了。这些以及其他的分裂因素在1917年以后的党内争论中起着明显作用。

最重要的是，原先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知识分子——并不象通常认为的那样，因为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团结一致。[②]部分原因是由于马克思的思想过于丰富，因此，他的信徒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很少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布尔什维

---

① 见乔治·凯南：《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和西方》(波士顿，1960年)第17章。

② 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维克托·谢尔格说的。他一度是个布尔什维克，应该更了解：“革命的智囊们……讲的是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一个革命者的回忆：1901—1941》(伦敦，1963年)第135页。同样，见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12页。

克也不例外。虽然在1917年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只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小的流派，但它包含有各种敌对的学派和各种政治倾向。有的布尔什维克曾接受欧洲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的曾接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的曾接受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然，布尔什维克后来的政治分歧的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学说原来是和成熟的工业社会相联系的，现在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俄国取得了意外的胜利。但是甚至那些被广泛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计划经济的功效——很快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① 总之，在1917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里，在被称作"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的表面下，并不存在着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哲学或政治思想意识。相反，"党员们表现了明显不同的观点。分歧从着重点的不同直到观点的严重冲突都有"。②

因此，和传奇所说不同，布尔什维主义掌握了政权后，有好些年，仍然是一个由从不同的道路参加十月革命的、不同的男男女女领导的分歧的运动。党并不是一个思想意识的统一体，甚至也不是一个组织上的统一体，而只不过是"一个各种集团、派别和'倾向'通过协商形成的联盟"，③ 这一情况，虽然为这个党的领袖们坚决否认，一般说来，政党都是这样的一种联盟，而且很可能所有重大的革命的领导也都是这样一种联盟。因此，我们就象法国革命的一个历史家一样，开始注意到"为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和利用的人们具有多么不同的经历和能力；有多少思想流派汇集到革命洪流里来

---

① 确实，对于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后的苏维埃俄国曾经是有争论的。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2册（1925）第292—346页上的辩论。

② S·V·乌特钦：《布尔什维克和1917年后他们的盟友：意识形态的式样》，《苏联研究》（1958年10月）第113页。

③ 布哈林：《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11页。

了，要把这个革命的一切方面或一切思想概括进一个警句或一个定义是多么不可能”。①

*　　*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1888年9月27日（公历10月9日）生于莫斯科，是伊凡·加夫里洛维奇·布哈林和柳鲍夫·伊凡诺娃·布哈林的第二个儿子。我们对布哈林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和彼得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俄国的革命史中弗拉基米尔和彼得只在警察局的关于布哈林的档案中被提到过一次。关于布哈林的母亲，出嫁前叫做柳鲍夫·伊斯麦洛娃，也只稍许多知道一些。布哈林的母亲象布哈林的父亲，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莫斯科一个初级学校的老师。布哈林在1925年写了一份简短的自传，在此文中布哈林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妇女，具有罕见的诚实和勤劳的品德，十分宠爱她的孩子”。她有时对第二个儿子的希奇古怪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但她容忍了。年青的布哈林发现自己不再和他的全家一起信仰东正教，他感到纳闷：“难道我不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吗？”而因为“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的母亲一定是个妓女，我就去问我的母亲”。母亲“感到很窘，而且无法理解我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②

---

① J·M·汤普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纽约，1967年）第9页。或者象约翰·亚当斯讲到美国的例子时说的：“英国革命的原则可以说象参加革命的十三个州一样多样化，在某些意义上说，象参加革命行动各个个人一样多样化”。引杰克·格林：《英国革命的模棱两可性》（纽约，1968年）第2页。

② 除非另有说明，这里关于1905年以前布哈林的生活的叙述都根据他的《自传》，此文刊登于《苏联和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三卷集，莫斯科，1925—1928年）第I卷，第52—56页。苏联人写的布哈林传略有马列茨基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8卷第271—284页；尼·梅谢里亚科夫写的传略，《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9年）第912—915页；S·沃尔夫申写的传略，《文学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9年）第631—634页；V·札列日斯基写的传略，《苏联小百科全书》第2卷（第2版，莫斯科，1934年）第173—176页。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有关布哈林的家庭的有价值的情况被收集于沙皇警察的秘密报告中。这些情况重印于《布尔什维克们：莫斯科最高保安局关于1903至1906年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文件》（莫斯科，1918年）第186—187页。

伊凡·加夫里洛维奇是一个典型的俄国革命者的父亲。他倾向于传统，信仰东正教，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当自由之风时行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自由派。伊凡·加夫里洛维奇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被培养成一个数学家，他一直在莫斯科当教员。1893年，他得到了一个税务督察员的职位，把全家迁到了遥远的比萨拉比亚。布哈林除了在1918年曾在彼得格勒（当时革命的中心地）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外，他在比萨拉比亚所住的四年时间，是他在俄国的生活中，唯一自愿住在莫斯科以外地方的时间。布哈林是一个莫斯科人，这一事实后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此之后，布哈林的家庭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伊凡·加夫里洛维奇可能辞职不干了，也可能失去了他的工作。布哈林一家在1897年回到莫斯科。伊凡·加夫里洛维奇又失业了两年。在此期间，布哈林一家"特别困难"。在布哈林的自传里，他没有提到更多的关于他父亲的情况。但是人们从别的地方得知，到1911年，伊凡·加夫里洛维奇的境况好多了，他当上了省议员。① 这个职位在沙皇政府文职官员的十四个等级的制度中占第七级，而且任此职的人享有贵族身份（但不能世袭）。布哈林并不因他父亲后来的成功而不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很少是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布哈林则更没有理由要感到不安。布哈林的父亲的事业和列宁的父亲的事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这可不是一项普通的成就），都是数学家。两人开始都是教员，然后通过文官制度的阶梯上升。在这方面，列宁的父亲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达到了第四级，从而是世袭的贵族。②

虽然布哈林与他的父亲的政见不同，但布哈林一直热爱并且

---

① 见本书第5页注②。

②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生平》（纽约，1964年）第6页。

敬佩他的父亲[1]（他父亲一直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伊凡·加夫里洛维奇是一个真正的有很高文化的人，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教育他的儿子。布哈林之所以能够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领袖中受过最广泛教育、才智最超群的人，部分要归功于他父亲对他的教育。布哈林写道：他的父母"以知识分子常有的精神"教育他，"我在四岁半的时候，就能够读书写字了"。此外，布哈林有三种持续终生的兴趣来源于他父亲的影响。第一是对博物学的兴趣，"这是我儿童时代的热烈爱好"。[2]后来访问苏联的人报道说，布哈林最喜欢的礼物，莫过于给他收藏的鸟和蝴蝶增添一个稀有品种了。布哈林的关于鳞翅目昆虫的知识，足以使伊凡·巴甫洛夫（另一位业余爱好者）惊叹不止。传说在二十年代，布哈林私人动物的收藏，在一所夏季别墅里装不下，因此又分了一部分到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来，这些传说成了传奇式的故事。[3]布哈林的父亲还培养了他对世界文学的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布哈林成为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文艺评论家的基础。这第二种兴趣发展成了另一种"热烈爱好"。布哈林在没有发现"一个生命不可能分成两半，去同时奉献给两个苛求的神——艺术和革命"以前，他曾经想当一个画家。1917年以后，他的这一雄心壮志，在画政治漫画中得到了较小的满足。布哈林的政治漫画是外国共产主义者的珍藏品。[4]

---

① 布哈林的父亲虽然不加鼓励，但看来容忍他儿子的革命活动，有时甚至允许利用他家的住房举行党的会议。见迈克尔·富特列尔：《北方的地下》（纽约，1963年）第137页。

② 《自传》第52—53页；布哈林的话，引用于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纽约，1965年）第15页。

③ 伊普西隆：《世界革命的模式》（芝加哥，1947年）第62页；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纽约，1967年）第31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4—15页。

④ 玛丽霞·费希尔：《我在俄国的生活》（纽约，1944年）第198页。另见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二卷集，纽约）第2卷第112页。尤勒斯·洪贝特—德罗茨《在巴黎的"莫斯科的眼睛"》第144—145页上重印的布哈林的政治漫画；这位作者

布哈林早年的这些“没有系统的”学习和“什么都看”的习惯，形成了他所受的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但很少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人是思想世界里的探索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年青的时候，仅仅受了有限的正规教育，就参加了革命的政治活动，即使那些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也很快被卷进了学生运动，常常使他们的学业受到损害（布哈林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是，他们在政治上是清晰的、在思想意识方面是老练的，但他们的视野和兴趣往往超不过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当布哈林在十七岁入党时，他已经有了追求知识的欲望和能力，包括外语能力。这就使他不会把布尔什维主义，甚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更为广阔的思想，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后来他成年后，成了具有最多方面才能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最熟悉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受这些思想影响最深的政治领导人。

布哈林的在思想方面的异端，在他的早年就产生了。他说他在五周岁前就“对宗教持讽刺态度”，我们对此可能将信将疑。但布哈林一家回到莫斯科后的困难时期，显然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他开始对现代城市生活“不是没有看不惯的地方”。他在初级学校学习时，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一个初出茅庐的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标准事件——而“断然和宗教决裂”。如果这使布哈林的信仰东正教的父母感到烦恼，那末他们可能为布哈林在学业上的成就感到欣慰。在1900年或1901年，他以最高分数的成绩从初级学校毕业，进入了莫斯科最好的大学预科学校之一学习。该校的课程包括古典文学的各种内容，是专门设计来为中学生上大学作准备的，

的另一本书《从列宁到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十年，1921—1931年》（纳沙特尔，1971年）的扉页和第129、184页；贡希尔德·霍格伦：《往返莫斯科的路线：一个戏剧性时期和策特·霍格伦的生平》（斯德哥尔摩，1960年）第39、197、199页。

质量很高，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布哈林再一次“毫不费力地”①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布哈林象他这一代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大学预科学校里，第一次接触政治方面的激进主义。俄国的大学预科学校着重于古典作品，力求向学生灌输对传统社会的尊敬。但是这样的学校却常常成为通向革命政治活动的中途站。学校的严格的纪律，显然在学生中引起了对学校当局的广泛对抗。低年级学生，采取了一些不关重要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如偷偷摸摸地抽烟、赌博、作弊以及毁坏厕所的墙壁等。但当布哈林进入高年级时(在1905年革命的前夜)，学生采取了更为高级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布哈林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这个团体常常组织讨论会，并散发非法印刷品。布哈林的最初的政治倾向是“相当无害的”。他受到十九世纪思想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 的影响。当时皮萨列夫同虚无主义的联系以及对有“批判思想”的革命杰出人物的颂扬，使皮萨列夫在俄国青年中具有长远的魅力。可是，到1904年秋，布哈林和他的同学度过了皮萨列夫思想的阶段，接受了更加适合时代的思想。②

1904—1905年，俄国和日本交战遭到惨败，生动地暴露了沙俄社会的极端落后、无能和不公正。1900年以来就不断增长的社

---

① 《自传》第52—54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5页。

* 皮萨列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1840—1868年)是十九世纪俄国优秀的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1862年由于写了为赫尔岑辩护和号召推翻专制制度的文章，被沙皇政府监禁了四年多。他在哲学著作中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唯物主义传统。但他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对革命斗争和俄国解放的道路看得不清，把自然科学的知识估计过高。——译者注

② 《自传》第54页。关于那所大学预科学校，见布哈林：《培育新的一代》一文，收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旧道德和新道德：论文集》，第23页，该书由A·鲍里索夫编(第2版，莫斯科，1925年)；爱伦堡：《人和生活：1891—1921》(纽约，1962年)第30—34页。

会动乱和公开抗议更加深化并蔓延开来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对半封建制度的重压极为忿恨，他们渴望得到土地。农民日益转向采取零星的暴力行动反对地主及地主们的大庄园。当时数量还少，但正在不断壮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连续的罢工浪潮中检验了自己的力量。在城市里，知识分子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越来越敢于说话了、越来越大胆了。在布哈林所在的大学预科学校里，人们可以感到向革命前进的力量。在那里十九世纪俄国的反对派的思想意识，让位给新的社会革命党的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已经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以列宁为首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比较温和的孟什维克。立宪自由主义虽然在更大范围的政治舞台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布哈林所在的大学预科学校里却没有多少同情者，这表明了学生的情绪。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邀请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米哈伊·波克罗夫斯基到他们的小组里来讲话。波克罗夫斯基的热烈的反自由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思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1905年，十六岁的布哈林已经是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非法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成员了。② 很有特点的是，布哈林最初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运动里来，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异乎寻常的逻辑上的和谐"，其次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政治态度。而另一方面，社会党的革命理论，"使我感到没有实质性的内容"。③ 布哈林的政治活动在1905年的汹涌澎湃的事件中很快开展起来了。

---

① 《自传》第54页；布哈林：《带矛的教授》，载于《真理报》1928年10月25日第3版。

②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1页；B·A·杜那也夫：《青年时代》一文，收于《第五个年头——文集之二》，M·米柳金娜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19—32页。

③ 《自传》第54页。

从 1905 年 1 月的"流血星期日"(即沙皇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仅仅拿着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的群众开枪的那一天)到 1905 年 12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被镇压，俄国到处是政治骚动和反抗。在整整一年里，不停地听到已被压制了数十年之久的、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声音。而且这一呼声一月比一月更加激烈。到夏季时，反对沙皇的自由主义派的影响逐渐消失，而各种革命政党，特别是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益明显起来。[①] 布哈林在三十年后写道："工人们和学生们真正沸腾起来了"，"集会、示威和罢工行动急剧增加，群众在街上游行，到处响彻了'工人阶级的马赛曲'的歌声：'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②] 沙皇制度渡过了这一革命序幕而幸存下来，一直维持到 1917 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虽然暂时失败了，但获得了新的象征并重新肯定了它的信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苏维埃、莫斯科的大罢工和十二月的街垒看来最后都证明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武装起义形式，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俄国都是适用的。

那一年的狂热和混乱把布哈林和一代具有相似思想的学生吸引出大学预科学校，进入了严肃的革命政治活动的舞台。他们的活动中心是莫斯科大学，即 1905 年的革命"大会堂"，也是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的发生地。由于学生举行罢课，莫斯科大学的教室都空了。中学生就和大学生、工人和职业革命家一起，日以继夜地坐在那些教室里，看着"人们发表演说、通过决议、作出决定"。布哈林中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志、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道："我们高唱着'马赛曲'……，上面写着'你的捐献就是我们的武器'几个字的大帽子，不断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他们

---

① J·L·H·基普：《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兴起》(伦敦，1963 年)第 5—7 章。

② 布哈林：《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诞辰六十周年》(莫斯科，1936 年)第 10 页。

不仅仅是旁观者。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活动大部分都是由青年学生进行的。[1]

虽然布哈林到1906年才正式入党，但1905年的事件使布哈林最后成长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2]布哈林一旦和社会民主运动相接触，他就被直接吸引到它的战斗的布尔什维克派中来了。莫斯科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大于其敌手孟什维克的力量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大多数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吸引了大批群众，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是了不起的。布尔什维克对一个中学生的影响可能就象爱伦堡所说的那样简单："我明白孟什维克是温和派，很象我的父亲。"[3]不管是什么理由，总之布尔什维克在布哈林的同代人中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布哈林只不过是在1905年前后的革命事件中参加革命、以后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一个罢了。在1917年7、8月间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散发过一张调查表。从一百七十一名填了表的代表看，其中在1904—1906年间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有五十八人，1905年参加的有二十三人(即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年)。代表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九岁，就是说在1905年时，他们都是十七岁的学生。[4]在布哈林及其同代人中，产生了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他们(特别是那些莫斯科人)以同代人之间的联系和忠诚而著称；他们在1917—1918年间显示出具有强烈的政

---

① 伊娃·布罗伊多：《一个革命家的回忆》(伦敦，1967年)第122页；爱伦堡：《人和生活》第36页；N·波波夫：《苏联共产党历史大纲》(二卷集，纽约，1934年)，第1卷，第212页。布哈林和爱伦堡是孩子时代的好朋友，《自传》第54页。在爱伦堡的经过检查的回忆录，布哈林仅以"尼古拉"的名字出现。

②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5页。

③ 《人和生活》第37页。

④ 《俄共(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8月：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295页。

治上的一致感和自信心。

革命失败了，最后的激动在1906年消逝了。俄国停息下来检验沙皇勉强作出的让步，就是那个短命的、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的让步。对布哈林和他们的朋友们说来，这意味着政治转变和下决心的一年，就如爱伦堡所说的："不再在大学里举行集会，也不再有示威和街垒。就在那一年，我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我很快就向我的学生时代告别了。"① 布哈林比爱伦堡年龄大一些，并已从大学预科学校毕业。他也在1906年下半年参加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② 就这样，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列宁称之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在这以后的四年中，党掩护他的非法活动。他的主要任务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布哈林出现在地下布尔什维克党委委员们和组织工作者（即"本地人"）中间，说明当时"本地人"和党的知识分子（布哈林是知识分子中的领导人物）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别，"本地人"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和缺乏幽默感。爱伦堡后来写道："我们讨论党的工作，但我们也常常开玩笑并放声大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经常开的玩笑是多妙呀！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多么勇敢、多么生气勃勃呀！"③

党最初分配布哈林在莫斯科的外莫斯科河区任宣传员。他的大部分活动都和学生运动有关，他本人就是学生运动的产物。他的这些活动那时已相当突出，足以引起沙皇保安局的注意。在1906年秋，布哈林和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也是年青的莫斯科人，后来是苏联的重要领导人）把莫斯科的青年小组联合成一个全市性的组织。1907年他们召开了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的全

① 《人和生活》第37页。

② 巧列茨基：《布哈林》第271页；《自传》第54页。

③ 《人和生活》第46页。B·A·杜那也夫：《青年时代》，《第五个年头，文集之二》，第20—21页。

国代表大会。该代表大会采取了和布尔什维克一致的纲领和策略，并建立了一个原来打算成为永久性的全国性组织。但由于警察的袭击，此外还由于它的领导人被调去作党的其他工作，该组织于次年解散。(1917 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把它的历史追溯到 1907 年的莫斯科代表大会；1917 年后布哈林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共青团工作的专家，他个人就是把共青团同它十月革命前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桥梁。)① 到 1907 年，布哈林又参与了工业方面的政治活动。他和爱伦堡领导了(或仅仅是参加了，有关记录不清楚)一次在一个大型糊墙纸工厂举行的罢工。②

一个职业革命家还可以为他的工作增加些内容。布哈林除了从事非法活动以外，还进行了大学入学考试准备。他在 1907 年秋季进入莫斯科大学。虽然直到 1910 年他被流放为止，他一直是法律系经济专业的正式学生，但他显然很少到教室去上课，他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就更少了。③ 从事党的专职工作并偶然到大学里去露露面，当一个学生，两者是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的。沙皇专制独裁政府在重新考虑它在宪法上作出的让步后，再次采取了公开镇压的政策。莫斯科大学又一次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布哈林在入学后不久，他和恩·奥新斯基(瓦列里安·奥波连斯基的化名，也是一个年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了 1906 年以后莫斯科大学的第一次学生群众大会。④ 布哈林想在莫斯科大学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他所说的“理论上的突击”。布哈林有时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学生一起出现

---

① 关于这些活动，见马列茨基：《布哈林》第 271 页；爱伦堡：《人和生活》第 39 页；杜那也夫(上一个注中所引的书)，第 47—55 页；L·沙茨金：《全苏列宁共青团》，《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1 卷第 636 页；索柯里尼柯夫的自传，《活动家》，第 3 卷，第 74 页。

②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 271 页；布哈林：《自传》第 54 页；爱伦堡：《人和生活》第 43 页。

③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 272 页；《自传》第 54 页。

④ 奥新斯基的自传，《活动家》第 2 卷，第 92 页；伊万·赫拉斯柯夫：《回忆莫斯科的学生运动》，《俄国评论》(1952 年 10 月)，第 223—232 页。

在学习讨论会上并发表讲话，对“一些年高德劭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①

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组织中的灿烂夺目的升起，证实了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政治活动上，而不是花在学习上这一事实。1908年，布哈林在入党后两年，就被吸收进莫斯科市的执行机构，即该市的党委会并成为该市一个很重要的大区外莫斯科河区的主要组织员。1909年初进行的选举，批准了布哈林在莫斯科市党委的职务。这样布哈林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成了俄国的最大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了。② 同时，这也使沙皇的警察机构肯定不会让他继续享受自由。1909年5月，沙皇警察突然搜查莫斯科市党委时，布哈林第一次被捕，虽然在几个月以后就被释放了。布哈林的被拘留标志着他的不受约束的革命活动的终结。同年秋天他又被捕了并被再次释放。布哈林这次是由于安全预防审讯被捕的。③

布哈林的被捕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在整个俄国走下坡路的一个小插曲。1907年，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党员可能多达十万人，在两年内迅速减少到不到一万人。还在俄国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不超过五、六个。在1909年末，莫斯科的党组织只剩下了一百五十名党员。④ 实际上已无法进行非法活动。有些社会民主党人（人们叫他们为“取消派”）主张彻底解散地下党组织。布

---

① 布哈林：《自传》第54页；奥新斯基的自传，《活动家》第2卷，第93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6页。

② 《自传》第54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601页关于布哈林的注。

③ 《自传》第55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

④ 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纽约，1960年）第101页；伯特伦·D·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波士顿，1959年）第478页。另见《反动年代（1908—1910）》第1卷，V·I·奥尔洛夫编（莫斯科，1925年）。

哈林激烈反对“取消派”，但是，他在第二次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后，也认为必须转向合法活动。他在马克思主义学校、政治俱乐部并在一个工会办的报社里工作，直到1910年秋，他又藏起来了，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即将举行的对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的审判时再次被捕。他躲避警察，直到该年末，沙皇保安局在党内告密者的帮助下，把莫斯科余下的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布哈林）全部围捕捉拿起来，实际上把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剩余部分全破坏了。①

导致布哈林被捕的情况，后来影响到他和列宁的关系。在若干年里党一直受到双重间谍的危害。在莫斯科组织里，这种情况达到荒唐的程度。在1910年，莫斯科市党组织的领导人中至少有四人是沙皇保安局的特务。布哈林的最后一次被捕（在这之前曾发生一系列事件），使布哈林相信罗曼·马林诺夫斯基（一个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高级干部，他知道布哈林所在的地方）是保安局的特务。②列宁坚决拒绝认真考虑布哈林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怀疑。从1912年布哈林和列宁初次相会，直到1917年马林诺夫斯基的罪行最后为保安局的档案所证实，在此期间，列宁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态度成了布哈林与列宁之间的长期不和的原因。布哈林对列宁不相信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控告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结束了布哈林在1917年前在俄国的事业。布哈林被监禁在莫斯科的布蒂尔卡监狱和苏舍夫卡监狱六个多月后，在1911年6月被流放到遥远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奥涅加地方。布哈林相信，不久他将被转移到苦役队去，在1911年8月30日他从奥涅加失踪了。不久他出现在德国的汉诺威，直到1917年

---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传记》（莫斯科，1928年）。

② 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540页；大卫·舒布：《列宁》（纽约，花园城，1949年），第114—115页。

才回到俄国。①

布哈林在1911年离开俄国过流亡生活，他时年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个具有五年地下党的工作经验的老战士了，他还是莫斯科市正在迅速被提拔的布尔什维克，他的革命行动已在工厂、街道和监狱受过考验。后来布哈林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外表和个性，当时在他的随便的服装和生活方式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长得不高（只五英尺多一点）、身材瘦小、有一张孩子似的脸容、蓝灰色的眼睛、惹人注意的突出的前额、红色的头发和稀疏的胡子。一位在1913年曾经在维也纳的流亡者的圈子里见过布哈林的妇女回忆道："布哈林以他特有的品质……而引人注目。他的外貌不象一个叛逆者或思想家，却有一种圣哲的气氛……。他的开朗的脸容、巨大的前额和清彻明亮的眼睛，使人感到安详和真诚，有时简直象是永恒的。"妇女们喜欢布哈林，他对儿童很随和，不论和工人还是和知识分子相处，他都感到很轻松。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甚至对政敌也不例外。他的青春的热情、乐天派的性格、调皮的幽默，这些后来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少数巨头中的"本杰明"*、"全党所喜爱的人"的品质，那时已给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谈到布哈林时，都认为他亲切、文雅、开朗而有风趣。②

---

① 这些事件仍有些模糊不清。这段叙述根据的是《自传》第55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布尔什维克们》第187页。

* 指美国政治家及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译者注

② 关于对1917年前的布哈林的回忆，见本书第13页注③；罗莎·迈耶—莱文的叙述，引用于编者给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一书所写的导言，由肯尼思·J·塔布克出版（伦敦，1972年），第8页；勒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第27、147、149、279页；霍格伦：《往返莫斯科的路线》第49页；费希尔：《我在俄国的生活》第198—199页；舒布：《往事》，《新杂志》第101期（1971年）第203—204页。关于另一个妇女的意见，见克莱尔·谢里登：《俄国画像》（伦敦，1921年）第88页。关于警察的描述，见《布尔什维克》第186—187页。

在关于布哈林的早年事业的零星记载中，很少迹象表明他将来会是列宁的亲密战友中闹政治独立性的人(因此就是反对派)，也很少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家”(根据列宁的说法)。关于他流亡国外前的党派政见，布哈林后来写道“我一直是一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既不是‘召回派’也不是‘调和派’……”① 这些年里，在布尔什维克党* 内同两个主要派别的斗争中——即列宁同左翼“召回派”的斗争和列宁同右翼“调和派”的斗争(“召回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参加沙皇议会，即国家杜马；“调和派”主张同孟什维克和解并重新联合)——布哈林站在列宁一边，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布哈林不同情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的主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召回派”在激进的莫斯科党组织里力量很大。不说别的，布哈林的“正统”态度和人们的下列印象不符：即布哈林是以一个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左派成员开始他在党内的事业的。

此时布哈林将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布哈林开始研究(虽然不是系统地研究)他熟悉的理论工作的主要课程——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在1906到1910年间，人们知道他至少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一个孟什维克经济学家所著的一本书的评论，此外还起草过一篇论修正主义经济家米哈伊·图甘一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后来在1913年发表于德国。那时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的专长是理论经济学。② 但是布哈林今后发展方

---

① 《自传》第55页。

* 1918年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形式上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翼。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52年再次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原作者注

② 关于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见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5—276页；关于第二篇，见布哈林：《进攻：理论文集》(第2版，莫斯科，1924年)第25—50页。他经常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我最熟悉的科学领域”。见他的《论艺术中的形式方法》，《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3期，第253页。

向的最可靠的先兆，是他早年就有的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如果一个钦佩布哈林的信徒德米特里·马列茨基提供的证据是可信的话）。就如马列茨基所说的："老一代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忽视马克思以后的欧洲思潮。① 布哈林终生都关心这方面的思潮，使他成为一个思想家，而有别于包括列宁在内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

布哈林对知识界的新思潮所持的欣赏态度，可能就是他在被流放前的单独的一次"偏离"（即"某种向着经验批判主义的偏离正统的倾向"，经验批判主义在俄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基础。② 波格丹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他曾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尝试，即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上综合起来，并加以系统阐述。他的成果就是一部有三册厚的论文《经验一元论》，此书在1904到1908年之间出版。波格丹诺夫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立刻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但列宁却置身于论战之外达五年之久，显然是为了希望不危害他和这位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合作。但是，到1908年波格丹诺夫成了布尔什维克左派（包括"召回派"）的政治领导人。这一新情况激怒了列宁，并使他参与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论战。次年，波格丹诺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左派正式从列宁的政治领导下分裂出来。列宁出版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波格丹诺夫的"反动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③

---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6页。

② 《自传》第54页。

③ 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波格丹诺夫和这场哲学论战，见S·V·乌捷金：《哲学和科学：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收于《修正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论文》，利奥波德·拉贝兹编（纽约，1962年）第117—125页；沃尔夫：《创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29章。

布哈林在莫斯科密切注意着这一激烈的哲学论战(列宁和波格丹诺夫都流亡在欧洲)。布哈林倾向于波格丹诺夫是毫不奇怪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虽然自夸在苏联的哲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却是列宁的著作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浅的一本书,而波格丹诺夫的著作,不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是多么有问题,却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令人兴奋的重新研究和修改。布哈林后来写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1921年出版),显示了波格丹诺夫对布哈林的思想发展的长远影响。虽然布哈林在党内的敌手们后来说布哈林是波格丹诺夫的信徒,但这不是事实。布哈林并没有接受波格丹诺夫这位年长的理论家的哲学观点,但他相当钦佩波格丹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内的创造性的革新能力,并深受其影响。他们两人有相似的知识分子气质。波格丹诺夫象成熟了的布哈林,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业已成为定论的、不可改变的体系,不仅经常注意它的不足之处;而且还经常注意同它敌对的思想的成就。列宁不仅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上的创新感到怀疑,并对他在政治上的反对态度感到恼怒,坚持这两者是互相有联系的,并谴责波格丹诺夫在所有方面都是卑鄙的。而布哈林却相反,虽然他和波格丹诺夫的政见没有共同之处,但仍然尊敬波格丹诺夫是个思想家。当波格丹诺夫这位哲学家,在离开党几乎二十年之后,在1928年逝世时,布哈林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悼词,颂扬波格丹诺夫"对我党的发展和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从列宁和布哈林对波格丹诺夫的相反的估价中,也出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和的另一根源。

---

① 《亚·亚·波格丹诺夫》,《真理报》1928年4月8日第3版。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关系将在第四章中加以讨论。

但是，不论布哈林早年的哲学思想倾向或是他的政治派别对他后来的事业的影响都不如下列事实大，即他是一个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而且是在1905年革命高潮中入党的。因为引人注意的、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布哈林和一些莫斯科青年(其中有奥新斯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格里哥里·洛莫夫、瓦·尼·雅柯夫列娃和她的弟弟尼古拉、格里哥里·乌西也维奇和德米特里·博哥列波夫)① 一起开创他的事业，加上布哈林和莫斯科市党组织总的持久的联系，这些都在他的个人政治经历(从1917年他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1918年他领导共产党左派一直到二十年代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右派)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在1905年涌现出来的一代莫斯科人中的布哈林的私人朋友，在1917—1918年的党内斗争中，成了布哈林政治上的同盟者。在党内把他们联系成一个特殊集团的纽带，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上的纽带。例如尼古拉·卢金是一个青年布尔什维克时事评论家和未来的苏联历史学家。在1906到1910年间卢金是布哈林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物。在1911—1913年间的某个时候，布哈林和卢金的姐姐(或妹妹，原文不清——译注)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卢金娜结了婚。②

---

① 对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在下面加以讨论，对其他青年莫斯科人则在第二章中加以讨论。有关他们的早期生涯的材料很少。在波琳娜·维诺格拉德斯卡娅、他们的朋友们和同代人的经过很大编辑加工的回忆录中可看到一些：《事件和难忘的会见》(莫斯科，1968年)；维诺格拉德斯卡娅的《莫斯科的十月》，《新世界》1966年第4期第143—186页。她在这本书(第163页)里说，他们这一批人从1905年起就开始接近。

② 卢金娜生于1887年，1906年入党，在她流亡国外(也许是在1911年)之前一直在莫斯科组织中工作。她同布哈林显然是在二十年代分离的。她在1937年被捕，1940年大概是在一个苏联的集中营中去世。见《会议记录：俄共(布)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3年)第912—913页；《俄共(布)党第八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61年)第296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卷第129页；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录》第2卷第118页。关于她的兄弟尼古拉，见《N·M·卢金选集》第1卷(莫斯科，1960年)第5—12页。

布哈林在流亡前和两个莫斯科青年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的友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布哈林一样，他们也出身于中产阶级，曾经在莫斯科的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上学，在1905年被吸引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结果在1907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随后进入了莫斯科大学。他们在1909年认识了布哈林，当时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团体的组织者（在开始时，布哈林是这个三人小组中在政治上资格最老的一个）。最初，他们被认为是大学里的三人小组、是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是在理论上进行“突击”的头头。把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以及其他莫斯科青年）吸引在一起的是：他们都年青、他们的共同的经历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同的热情（他们三人都是学经济的）。他们在莫斯科党组织内一起被提升、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起跟敌对的政党斗争，保卫自己的思想。布哈林和奥新斯基又在1910年一起被投入监狱。①但主要的还是他们感到在党内他们是同代人、和三十多岁的“老”布尔什维克比起来，他们起初认为自己是“小伙子”。②

他们这种尊重长者的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布哈林的流亡，暂时把他们这个三人小组解散了。但到1917年，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都又回到了莫斯科，又重新联合起来向那些不同意列宁的激进路线的年长的党的领导人挑战，然后在1918年他们又向列宁本人挑战。

---

① 见奥新斯基的自传，《活动家》第2卷第90—98页；《走向十月之路：论文、回忆和文献集》（五卷集，莫斯科，1923—1926）第3卷，第205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651页关于斯米尔诺夫的注；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关于“三人小组”，见《走向十月之路》第1卷第241页。

② 爱伦堡：《人和生活》第50页；布哈林的言论，《真理报》1922年12月12日第3版。有一个老党员说，布哈林的一代是“玩革命游戏的孩子们”。引用了拉尔夫·卡特·埃尔伍德：《托洛茨基问答》，《斯拉夫评论》（1970年6月）第299页。

布哈林是在流亡过程中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重要人物的。当他在1911年离开俄国时，虽然列宁以及在国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已知道布哈林，但他们都主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专门负责学生运动的委员。[①]当布哈林在六年后回到俄国时，他已是一个众所公认的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他对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立的、具有明显特征的思想流派的发展，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此外他还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如到此时这个称号还有任何意义的话）。此外，流亡生活也使布哈林成为那些无论从经历或从观点看来都是国际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布哈林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和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生活和工作了六年。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都熟悉他。他除了曾在俄国被捕外，他在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逗留期间又被短期监禁过（瑞典的警察控告他阴谋炸毁桥梁，看来这是假的）。[②]

与此同时，布哈林认真地开始了他的写作事业。在摆脱了俄国国内日常的、艰苦的地下工作后，布哈林立刻开始学习，以便完成他的学业。他学习了多种西方语言（到1917年他已能看德文、法文和英文著作，而且德文和法文他说得也很好）。他还攻读了近年来的各种理论文章。欧洲的图书馆，后来又加上美国的图书馆为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提供了"固定资本"（按他自己的说法）。[③]虽然他后来认为他在国外的这些年中，在思想上是有缺陷的，在政治上是天真的，但事实上，这些年在他的毕生事业中，是一个形成时期，而且是一个相当丰富多产的时期。那时，他经常向马克思主义

---

① 《反动年代(1908—1910)》第1卷，V·I·奥尔洛夫编（莫斯科，1925年）第270页。

②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

③ 《自传》第55页。

杂志投稿，发表了好几篇有长远价值的经济理论著作，写完了两本书的手稿：《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和《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提出了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组成部分的一些论据，清楚地表达了他后来一生的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关心所在。[1] 到1917年，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的名声已仅仅次于列宁，甚至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布哈林已经是无可匹敌的了。

流亡给了他第一次与列宁亲自接触的机会，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一段变动最剧烈的、有时也是最感人的个人关系。在1912—1917年间，布哈林不常见到列宁，而且不论在地理上或在政治上，他都很少接近列宁周围的布尔什维克流亡者的小圈子。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关系几乎一直是紧张的，部分是由于列宁对新思想的怀疑和不妥协，部分是由于布哈林的独立精神。布哈林的这一性格，甚至在他选择的离开俄国后所去的第一个目的地上，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没有按照惯例去朝拜列宁（当时住在克拉科夫），而是直接到德国的汉诺威去。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所在地。当时德国对布哈林这一代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2] 他在德国住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他和布尔什维克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在1912年9月，他代表党出席了在克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后，布哈林在决定要移居到维也纳去后，他用奥尔洛夫的

---

① 他在流亡时期写的四篇文章收于《进攻》第1—88页。两本书在革命后才第一次全文出版：《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莫斯科，1919年），英文译为《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纽约，1927年）；《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彼得格勒，1918年），英文译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纽约，1929年）。第二本书的简缩本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人》合订本（日内瓦，1919年），第4—44页。

② 见布哈林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一文中的论述。《真理报》1922年11月7日，第7版，和在《列宁和科学在社会建设中的任务》一文中的论述，《真理报》1929年1月20日，第3版。

化名到克拉科夫去会见了列宁。①

他们两人的会见并不是一个具有良好预兆的开端。他们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在谈话中马林诺夫斯基无疑是主要的话题。马林诺夫斯基这个保安局的密探，当时已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里的代表团团长并是在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领导人。别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不断就马林诺夫斯基向列宁提出警告。但是越来越多的报告却只引起了列宁对控告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的愤怒。列宁对每次警告（包括布哈林提供的证据在内）都不加注意。列宁的这种固执态度，当时必定动摇了布哈林对列宁的判断力的信仰，而且后来当布哈林和列宁之间出现了纲领性和思想上的分歧时，也使布哈林更坚持他的反对意见。② 同时列宁也没有很快就原谅布哈林居然愿意相信对列宁所信任的人的最恶毒的攻击。1916年列宁在批判布哈林的理论观点时，除了批评布哈林具有“半无政府主义思想”外，还批评他“轻信流言蜚语”，这很明显，指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事件。③

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会见也并不是一次灾难。布哈林来看列宁时是作为一个敬佩列宁的追随者而来的，他走时（就象布哈林在十三年后回忆时所说的）觉得“扩大了视野，发现了新世界”。尽管列宁被马林诺夫斯基“迷住了”，此外列宁和布哈林在流亡期间还有一些其他分歧，但布哈林对领袖列宁的个人爱慕延续

---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布哈林：《奥尔利察》，《真理报》1927年7月5日第1版；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12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12页；费希尔：《列宁》第82页；舒布：《列宁》第119—120页；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31章；弗拉赫蒂：《尼古拉·布哈林……》第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

未断。[1] 反过来，列宁也准备暂时宽容布哈林对"谣言"的轻信。沙皇的反动和波格丹诺夫及其追随者的背叛，使得支持列宁的人减少了。一个年青的有发展前途的信徒是值得欢迎的。列宁邀请布哈林向党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撰稿、帮助为《真理报》募集款项和物资、参与为参加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写演讲稿的工作并参加为这些代表制定战略的会议。布哈林接受了列宁的要求，留在克拉科夫有数星期，然后在1912年末赴维也纳定居在那里。在随后的两年间，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关系中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分歧。列宁对布哈林干劲十足地为党工作并对他写的文章感到满意，曾在1913年6月到维也纳去访问过布哈林。[2]

事后回顾起来很清楚，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政治关系中这罕见的和谐的两年，主要是由于布哈林正从事于他的理论工作中最不会引起争论的项目。他已经迁居到维也纳，开始"对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批判"。新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指的是过去三十年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向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挑战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但也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写的。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的正确性已为事实所证明，但在正式的学者中，接受马克思思想的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 因此布哈林特别渴望同批评马克思的学术界人士对阵，从而保卫正统的马克思理论。

---

① 见布哈林的《纪念伊里奇》一文，《真理报》1925年1月21日第1版；布哈林的话，引用于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2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546页和第23卷第601页上关于布哈林的注；马列文献：《布哈林》第272页；《列宁文集》(共33卷，俄文版，1924—1940年莫斯科出版)，第13卷，第212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9页。布哈林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启蒙》1912年第8—9期上。关于列宁的访问，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18页。

③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7、17页。

布哈林选择的第一个对手是最有影响的批评马克思的学派——以柏姆·巴维克·欧根、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利希·维色为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学派攻击马克思理论的最薄弱之点，即劳动价值论，并鼓吹他们的边际效用论(根据边际效用论，价值不是由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对各个买主的效用的大小决定的)。奥地利学派攻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利润和积累的认识的基础，而且首先还是马克思下列主张的基础，即马克思本人，和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从科学上而不是从道义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在二十世纪初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柏姆·巴维克著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一书(1896 年出版)使布哈林象一个神圣的复仇者一般，被吸引到维也纳大学去听柏姆·巴维克和维色的课。① 布哈林在 1912—1914 年的理论著作(一系列的文章和一本书)都是专为保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他西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批判家而写的。②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写成于 1914 年秋，是布哈林的第一本著作，内容是抨击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的。该书大量吸收了以前的批判边际效用论的著作的内容。布哈林的贡献在于把现存的"方法学的批判"和"社会学的批判"结合起来。已经有人，主要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在这方面进行过初步的

---

* 这三个人都是奥地利人，所以该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译者注

①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 7 页；《自传》第 55 页。关于边际效用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见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纽约，1962 年)，第 174—184 页。

② 见布哈林关于彼·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柏姆·巴维克和弗朗茨·奥本海默的文章，收于《进攻》。

论述。布哈林只不过把马克思对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研究社会总体的基本主张重新陈述一遍而已，除此以外，布哈林做出的贡献并不多。布哈林认为："卡尔·马克思和柏姆·巴维克在方法学上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如下：即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历史的观点——非历史的观点、生产的观点——消费的观点之间的不同。"对此，布哈林还加了一些社会分析，他说，边际效用论是"已为生产的发展所消灭的资产阶级，即食利者的思想"。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突出起来的食利者构成了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寄生的和多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甚至常常连自己的息票都不剪"——，这些人在经济上最关心的是"消费问题"，但这是一种社会偏见。边际效用思想强调个人的、消费者的爱好，就是这种社会偏见的反映。[①]

布哈林在维也纳写的作品，是完全符合正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和他后来写的许多著作不一样。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或其他人，只要他希望维护劳动价值论，就会同意以下观点：即《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一书"很有价值地扩大和加深了老马克思主义者对柏姆·巴维克的批判"。[②] 因为该书成功地把两种批判方法结合起来，证明了边际效用论是"边际资产阶级的边际理论"，因此该书在1919年出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作品中一本十分受欢迎的书，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该书是布尔什维克的少有的几本成功的、能够和西方的保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相提并论的评论性作品之一。该书在苏联当然成为对奥地利学派的明确的反

---

①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8、23—32页。另见希法亭：《柏姆·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保罗·斯威齐编（纽约，1949年）。

② 见赫尔曼·邓克的评论，《国际报刊通讯》第10卷（1930年）第33期，第607页。另见鲁道夫·施莱辛格：《布哈林思想札记》，《苏联研究》（1960年4月），第419—420页。

驳、成为各种学校和学习组织的基本教科书，在那里人们都说任何人在讨论边际效用论这个题目时，都不能“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论点”。[①]

除了把布哈林确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外，《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一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是布哈林的一项终生计划的第一步。布哈林后来设想的这个计划就是写许多卷著作来阐明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思想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政治活动使他不能经常从事这项工作。这一计划（计划中的部分著作出版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使他必然继续密切注视西方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那些向作为社会科学或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挑战的西方思想。[②] 十九世纪末以来，许多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家都曾以某种方式对马克思的惊人的知识遗产作出反应。布哈林相信对这些敌对的理论应该用“合乎逻辑的批评”而不是用痛骂来回答。由于布哈林从事于思想工作，因此很自然，不论多么间接，他会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布哈林一方面赞同马克思的主张，即一切理论都是阶级倾向的反映，同时他也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可能做，而且事实上也做了对社会有用的工作”，而且“如果一个人具有足够的批判态度的话，就可能从这些理论所做的工作里获得丰富的材料来得出自己的结论”。[③] 马克思的批评者对布哈林的影响

---

①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0期第87—89页。另见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9页；梅谢里亚柯夫：《布哈林》第914页。

② 见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体系》（纽约，1925年）；《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收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1883—1933）纪念论文集》，第9—99页。后一个题目显然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作的一部更大的著作的一个部分。据说，在他一生的最后一年，他在监狱中仍在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写作。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纽约，1959年）第24页。

③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8—9、160页；《进攻》第51、77页。关于现代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见H·斯图尔特·休斯：《意识和社会：欧洲社会思想的重建，1890—1930》（纽约，1961年）第3章；布哈林：《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第16—17页。

（不象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是相当大的。例如在1917年以后，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帕累托*和米凯耳斯**的优秀理论以及马克斯·维贝尔***的关于官僚主义的理论对正在形成的苏维埃制度的重要意义。布哈林认为维贝尔是一个杰出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

布哈林在维也纳居住期间，还接触了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最先进的理论学派——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维也纳是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的故乡。他们两人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作品。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两本书，对布哈林有深远的影响。很快，布哈林在维也纳遇上了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讨论，这使他在1915年决定把他的研究工作，从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研究（他已计划写一本关于英国和美国的边际效用论的书）转向对新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的研究上来。甚至在1917年以后，当布尔什维克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斥为“改良主义者”时，布哈林对他们的理论成就仍保留着某些敬慕之意。布哈林的这种学术上的同情感是许多布尔什

---

* 帕累托（1848—1923年）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在社会学上属“机械学派”，认为阶级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译者注

** 米凯耳斯，罗伯特（1876—1936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原籍德国。他在他的代表作《政党》（1911年）中指出了政治组织中的寡头倾向。——译者注

*** 维贝尔，马克斯（1864—1920年）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强调社会原因的多样性和互相依存关系。——译者注

①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在第四章中加以讨论）主要是向现代社会学家进行斗争的一个尝试。关于他对维贝尔的赞扬，见《历史唯物主义》第178页；《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第54页。《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几个问题》，收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讨论》（第2版，莫斯科，1930年）第174页；尼古拉·I·布哈林：《近代文化的基本问题》（巴黎，1936年）第22页。

② 见乔治·利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研究》（纽约，1962年）第7章。

维克（包括列宁在内）所没有的。[1]

到1914年夏，布哈林就不再在维也纳住了。此时布哈林和列宁之间还不存在分歧（除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以外，此事在五月份又闹了一次）。列宁继续对布哈林的文章表示赞许并将其出版。[2]甚至很快就使他们发生严重分歧的民族问题，此时也还没有使他们产生磨擦。自1912年以来，列宁越来越注意民族问题，到1914年，列宁决定把支持民族自决权作为党的一个口号，这一立场看起来似乎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说布哈林在维也纳就有疑虑的话，那时他的疑虑至少还不明显。在1913年1月，一个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约瑟夫·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到维也纳来，起草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章。布哈林协助斯大林（他不懂西方语言）。他们这次合作没有在布哈林同斯大林或列宁之间造成任何有文字记载的不和。列宁批准了他们两人写的最后文稿。的确，一直到1914年4月，布哈林还在为国家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这可能是列宁交给他的任务。[3]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布哈

---

① 布哈林以后的态度是把他们看作一帮坏家伙中的佼佼者。见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共产国际》1926年10月15日第2—6页。他们显然也同样对待布哈林。见鲁思·费希尔：《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坎布里奇，麻省，1948年）第279页。列宁和布哈林对待希法亭的不同态度在后面加以讨论。其他布尔什维克，例如托洛茨基，都对奥地利人评价很低。见他的《我的生活》（纽约，1960年）第206—2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57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85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03页注272。列宁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最后允许一个调查小组去调查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指控。布哈林提供了证明。但是列宁又一次"披上了他钢铁意志的盔甲"，拒绝相信这些指责。见布哈林的叙述，《真理报》1925年1月21日第1版；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31—132页；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500—501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458页。有几个作家认为布哈林在起草斯大林的文章中起了很大作用。如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纽约，1941年），第157—158页和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581—582页。我没有发现能证实这种观点的证据。也没有证据支持那种认为布哈林和列宁早已在民族问题上有分歧的习惯看法。

林就离开了维也纳。1914年8月，在一次对外国人的搜捕中，布哈林被捕。数天后，经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布哈林被驱逐出境，前往瑞士，住在洛桑。①

战争大大改变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当然，战争最终使沙皇专制制度垮了台，并为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更为直接的是，战争使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同叫做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松散联盟的关系可能是不可改变地恶化了。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会员在即将来临的大战问题上，都投票赞成各自的政府。思想感情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曾给予社会主义者以一种团结感。当这种团结感在各种支持战争的民族主义面前消失时，就产生了要创建第三国际的思想，虽然第三国际的真正成立还是四年以后的事。象布哈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自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先进的德国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对他们说来，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悲剧"。② 这一发展使得这些人中即使是象布哈林那样受西方思想影响最深的人在思想上也变得更关门主义，更不想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之外去寻求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指导。

战争也为布哈林有选择地反对列宁的长期历史提供了背景。流亡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聚集在瑞士，要为党对战争的立场和策略作出决定(战争爆发之后，国外各个党支部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列宁在1914年9月间抵达伯尔尼，并计划要在1915年初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此时，布哈林还在洛桑研究英—美经济学并开始研究帝国主义。③ 在1914年末，布哈林和住在附近的鲍日村的三个布

① 梅谢里亚柯夫：《布哈林》第913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2页；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7页。

② 《真理报》1927年7月7日第3版。另见《真理报》1925年1月21日第1版。

③ 奥尔加·赫斯·甘金和H·H·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斯坦福，1940年)第136—137页；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7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0—151页。

尔什维克青年尼古拉·克雷连柯、叶列娜·罗兹米罗维奇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特罗雅诺夫斯基相处得很友好。布哈林在维也纳时就很熟悉特罗雅诺夫斯基。但布哈林发现他自己在各种政治问题上同情克雷连柯及罗兹米罗维奇的看法。他们三个人决定编辑并出版一个新的党报——《星》报。1915 年 1 月，列宁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感到很恼火。[①]

列宁生气的原因不很清楚。他公开讲的反对理由是党的少量经费不应分散用来出版新报刊，但列宁也谴责鲍日小组(在 1915 年初，人们这样叫布哈林、克雷连柯、罗兹米罗维奇三人)发起出版一张反对派的报纸。[②] 列宁的这一谴责是没有根据的，至少布哈林直到 1915 年 1 月还表示和列宁的“充分的有原则的团结”。布哈林解释说，他并没有想把“《星》报办成一张反对派的报纸……只想把它办成一份增刊性的报纸”。布哈林问列宁：“您对另一份党报(它的第一篇社论就表明它和中央机关报采取同样的立场)有什么可反对的呢？”[③] 如果鲍日的三个人对领袖有一点共同的不满的话，这就是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问题(罗兹米罗维奇也相信马林诺夫斯基是有罪的，但遭到列宁的粗暴的拒绝)。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说明布哈林等三人有任何反对派的动机。而列宁的反应却典型地反映了他与布哈林的关系，并进一步加深了随后两年中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真正的分歧。列宁反对青年布尔什维克，特别是

---

① 见甘金和费希尔的《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一书第180—181页中叶夫盖尼娅·博什的回忆；《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135页；I·I·明茨：《伟大十月史》第1卷(莫斯科，1967 年)第241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1 卷，第135页；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56页；布哈林的信，引用于D·巴也夫斯基：《列宁反对布哈林的“思想摇摆”的斗争》(莫斯科，1967年)第241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56页；巴也夫斯基的书第23页上引用的布哈林的话。

布哈林，不论在组织方面、理论方面的或是政治方面的任何独立活动。[①] 在1915年2、3月间，在伯尔尼举行的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分歧，虽然还不是不可愈合的分歧。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布哈林强烈反对列宁的关于战争和党的纲领的四点建议。首先，布哈林反对列宁向欧洲小资产阶级呼吁。布哈林争论说，在革命形势下，小业主不可避免地会拥护资本主义秩序，反对无产阶级秩序。布哈林认为小资产阶级、农民或其他类似的人不可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或潜在的同盟者的主张，一直保持到1917年以后，此后他却把同这些人的联盟放在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地位上。第二，布哈林在送交代表会议的一批论文中，批评列宁不仅不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反而强调要尽量少提民主要求。第三，布哈林、克雷连柯和罗兹米罗维奇拥护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号召，但不同意列宁反对提和平口号向更广泛的反战情绪求助，而且还不同意列宁把俄国的失败叫做"较小的害处"——他们认为应对交战各方进行同样的谴责。最后，鲍日三人小组同意列宁关于成立新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号召，但他们主张新的社会主义国际应包括所有的反战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受列宁斥责的列甫·托洛茨基以及在托洛茨基周围的左翼孟什维克。简而言之，布哈林及其朋友们希望这个新的组织要尽可能广泛。[②]

和后来的苏联及西方的说法不同，布哈林在伯尔尼并没有完

---

① 根据列宁的指示，中央局曾向布哈林解释，这样一些活动需要"集体"决定，而"不是只由几个同志"决定。引用于明茨的《伟大十月史》第241页。关于罗兹米罗维奇和马林诺夫斯基问题，见沃尔夫：《制造一场革命的三个人》第548—550页。

② 由于布哈林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から未发表过，所以他的论点大多是从后来的被删曲了的苏联报道材料中知道的，见《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5期第86—88页；D·巴也夫斯基：《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11期（1929年）第38页。他的提纲和鲍日小组的决议重印于甘金和费希尔的《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187—191页。

全反对列宁，也不是极端左翼分子。[①]关于和平口号(这在1917年列宁自己也需要加以巧妙地运用的)的问题以及关于拟议中的第三国际的组成问题，布哈林、克雷连柯和罗兹米罗维奇的立场，事实上还没有列宁那样极端，但没有人支持布哈林的论点，为此布哈林感到很失望。布哈林的论点没有对党的最低纲领作全面的否定。他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提出了一些条件。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多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决不应拒绝为部分的改革进行斗争……"。而且后来，在代表会议期间，当列宁不得不为党的最低纲领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辩护，反驳其他一些持异议的人时，布哈林支持了列宁。代表会议的结果表明，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着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个由列宁、列宁以前的副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组成的委员会，被指定来统一不同观点。虽然一个参加者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化了两天时间"同布哈林同志……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决议是一致通过的。[②]

这并不意味着伯尔尼代表会议以前和伯尔尼会议期间的争论是没有连续性的。布哈林在《星》报事件上(此事在鲍日小组勉强同意放弃后解决了)[③]和在伯尔尼会议上所持的独立态度以及马

① 后来苏联的叙述(西方学者一般都追随这种叙述)的原始依据是列宁自己在一年以后对布哈林在伯尔尼采取的立场所作的歪曲。见列宁的信件，引用于甘金和费希尔的《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241—242、245页。在1929年以前，苏联历史学家并没有特别强调他们两人在伯尔尼的分歧。例如可见D·巴也夫斯基：《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的党》，收于《十月革命历史大纲》，M·N·波克罗夫斯基编(2卷集，莫斯科，1927年)，第1卷，第366、444页。但是布哈林在1929年垮台后，他在伯尔尼的立场就被描绘成极左的，反列宁的派别立场。例如可见巴也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所作的新的解释，《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第12—48页；《列宁反对布哈林的"思想的摇摆"的斗争》第18—46页。

② 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174、179、181—183页。

③ 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181页；明茨：《伟大十月史》第241页。

林诺夫斯基事件被搅到其他政治问题中去，这些都预示着很快即将爆发激烈的论战。此外，布哈林就是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和尤里·皮达可夫开始结成联盟的。皮达可夫也是一个青年布尔什维克，他刚从俄国来，并成为布哈林在流亡中的最亲密的朋友。[①] 皮达可夫是罗莎·卢森堡的民族问题思想的公开追随者。罗莎·卢森堡认为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当世界正在向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过渡时，民族界限以及向民族主义呼吁都已经过时了——这一主张和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新思想是直接相反的。虽然这个问题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似乎没有暴露出来，但布哈林自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帝国主义。布哈林进行的研究把他引向采取和皮达可夫相似的立场。到 1915 年末，布哈林、皮达可夫及其妻子叶甫盖尼娅·博什在民族问题上，猛烈反对列宁。

但当代表会议在 3 月间结束时，布哈林和列宁友好地分手了。直到 1917 年中他们两人没有再见面。布哈林回到瑞士的图书馆，继续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研究。列宁和布哈林之间的通信又恢复了，在通信中既没有流露出感情上的创伤，也没有流露出观点上的冲突。列宁处在一种修好的情绪中，在某一时候，他甚至要求布哈林迁居到伯尔尼来帮助编辑党的中央机关报。[②] 1915 年春，皮达可夫和博什得到了一些资金，他们建议创办一个新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列宁对此事的反应和对《星》报的反应不一样，他同意了。为此成立了一个编辑部，由列宁、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博什和布哈林组成。[③] 和谐的关系似乎恢复了。（在列宁的同意或催促下）布哈林决定迁居到瑞典。当时瑞典是布尔什维克

---

① 《自传》第55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79页。日期不清楚。只能看到列宁的信。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187—190、206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66页；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215页。

在俄国同欧洲之间的地下交通线上的要冲，也是激进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关于战争的观点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很接近)的一个堡垒。1915年7月，布哈林用莫伊塞·多尔哥列夫斯基的化名(这个化名可能不确实)，在皮达可夫和博什的陪同下，取道法国和英国(布哈林在英国被捕并被短期拘留在纽卡斯尔)到达斯德哥尔摩，① 并在那里定居下来。1915年秋，布哈林在斯德哥尔摩写完他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但直到1918年才全文发表)，并开始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进行重新解释。布哈林的这两部著作是对新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贡献，并且也代表了他在流亡期间的主要成就。

在那完全可以称之为"布哈林主义"的由互相联系的思想构成的体系中，《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而不是布哈林早期的批判边际效用论的著作)是开篇宣言，它是布哈林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布哈林在这本书里第一次陈述了他的观点和主张，在此后二十年里，这些观点和主张常以某种形式在布哈林的关于国际事务和苏联事务的思想中出现。这本小册子包括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这些认识后来对他作为左派布尔什维克领袖和右派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政治活动都有影响。《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还是另一种里程碑。该书是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性阐述。该书完成于列宁的更加有名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几个月。列宁的著作大量采用了《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的内容。②

---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1929年共产党员日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690页；福特雷尔：《北方地下》第91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206页。

② 布哈林的研究的一个简缩本于1915年9月出版。列宁在1915年晚些时候收到了全书的手稿。他于1915年12月写了一个表示赞扬的导言，同手稿一起寄到俄国出版。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的创造性成就并不在于它的独立的思想，而在于布哈林使用的方法，他用这种方法运用和扩大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事实已经研究和辩论了十多年：即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巨大增长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大多数人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上述发展，马克思至多只作了一些提示，而后来的资本主义却令人苦恼地是同《资本论》所分析的古典的自由企业制度大不一样的。在1915年时，已有相当多的使马克思的理论和预测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的著作。布哈林很乐意承认，他从这些著作中吸取了许多思想。但对布哈林的主要的启示，来自希法亭著的《金融资本》一书，布哈林的著作就是从这本书的基础上开始的。《金融资本》在1910年出版后，立刻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思想中一部创新的著作。③

希法亭在此书中的成就是论述帝国主义的形成直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变化，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希法亭把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过程的分析加以扩展，他描写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各种联合形式，特别是托拉

两者都在警察搜查时遗失。布哈林的书最后是在1918年出版的，但是列宁的导言只在更后的时候才被找到。它第一次刊登于《真理报》1927年1月21日第1版，并被收入英译本《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9—14页。列宁在1915年年底开始研究他自己的帝国主义论，在1916年6月完成他的著作。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75页；费希尔：《列宁》第95页。出版的版本上曾提到布哈林的手稿。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15页。关于列宁在准备他自己的研究时曾利用过布哈林的手稿的其他证据，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62、188、198页。

③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最新阶段》(第3版，彼得堡，1918年)。这本书于1912年在俄国首次出版，到1923年共出了四版。虽然希法亭在1917年以后采取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但他对苏联研究帝国主义的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斯和卡特尔的迅速增多。这些托拉斯和卡特尔以空前的速度吞噬并取代较小的单位。希法亭特别注意银行在垄断过程中的新作用，指出伴随着并促进着资本的集中的是银行业的集中。他写道，现代化的银行已成了大部分工业资本的所有者。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希法亭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析概念——金融资本："以这种方式转化为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叫它为金融资本。"① 对希法亭说来，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主义，他接着就详细说明，金融资本是一种独特的制度，这种制度由于金融资本的强有力的组织倾向，是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由于金融资本渗透进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大规模的联合企业越来越占优势，因此有计划的调节逐步代替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以前是从小单位的不受约束的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一种有调节的经济制度，或者用同希法亭有密切联系的名词来说，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换言之，《金融资本》一书主要写的是新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无非就是他这个中心分析的略加发挥的副产品。② 在垄断了国内市场并筑起了防御外国竞争的高关税保护壁垒之后，垄断资本在追逐高额利润时，就被引上了扩张主义政策的道路。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殖民地获得原料，而且最重要的是为资本输出获得新市场。按照希法亭的分析，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根据逻辑发展必然会采取的对外政策。他简要地指出资本主义列强争取殖民地市场的动机与以前私人企业争取国内市场的动机是何等相似。这一发展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日益军事化，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好战的原因（希法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32页。

② E·M·温斯洛：《帝国主义的模式：权力理论研究》（纽约，1948年），第159页。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只在《金融资本》的结束部分展开，即第438—553页。

很久就写了上述论点)。

布哈林把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接了过来，但想修改它，使它适应最新的情况，而且使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更加激进化。[1] 布哈林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政策"。但是布哈林和希法亭不同的地方在于，布哈林坚持"金融资本除了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外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政策……"，因此"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与现代资本主义联系最密切的制度，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布哈林比希法亭更教条主义，他阐述说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即最后阶段)是一定要出现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原料并为剩余产品和资本提供市场，因此对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能生存下去这件事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支撑着金融资本的结构"。他的这一主张否定了流行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政策是令人痛恨的，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现象。[2]

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机体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定义向布哈林(就象向希法亭一样)提出了战争问题。但就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希法亭不同，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认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流传的一种假设，即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可能看到世界经济的和平组织(象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完全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列强在开拓殖民地的早期，曾以最少的冲突来向外扩张，即用"夺取无主土地"的办法来向外扩张。但是现在还没有殖民地化的地区已不复存在，"彻底重分"世

---

① 他完全承认他借鉴于希法亭。见《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36、64、71、107、123、135、136、142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界的必要性已经来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达到了最尖锐的形式，即武装争夺的阶段。为了拚命争夺新的市场，帝国主义国家用“火与剑”来互相斗争，弱者变为强者的殖民地。

当然，布哈林的论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既不是历史的不幸，也不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战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第一场战争。布哈林在结束时说，但是帝国主义时代既然带来了战争的恐怖，那末它也暴露了资本主义致命矛盾的最终激化，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① 布哈林的整个论点和希法亭的论点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布哈林把希法亭的深刻认识转变成一个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方程式后来重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 一书中（有一些重大的修改），因此人们对这一方程式很熟悉，而且成为布尔什维克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正统的解释。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只是布哈林的著作中的一部分（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所占的部分就更小了）。这是由于布哈林象希法亭那样，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象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础结构——国家资本家主义深感兴趣。② 布哈林正是在把希法亭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扩展并用新材料进行修订

---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95、103、121、133、139、142页。希法亭与此不同，一方面他认为军国主义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似乎又认为存在着通过激进的政治行为阻止战争的可能性。《金融资本》第25章。

* 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下同。——译者注

②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在讨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前，先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但他只作了简要的分析，没有对希法亭的论述作值得注意的补充。他主要对国际发展感到兴趣。列宁着重依靠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年）一书（该书所讨论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反映了布哈林和列宁的不同兴趣。布哈林完全没有提到霍布森；他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希法亭的著作。

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布哈林和列宁后来争论了许多年。

布哈林认为自从希法亭的著作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化和托拉斯化显著地向前发展了。弱小的竞争者和所有权的各种中间形式的被消灭或被迫变成附庸，再加上金融资本的无情的组织能力，事实上已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变成一个所有生产部门都有组织联系的大联合企业”。布哈林有时提示说这还仅仅是一种趋势，但他更经常地断定这已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他说“每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都已经变成了某种‘全国性’的托拉斯。”这一论点是希法亭的分析里所没有的。由于托拉斯化已经把工业和银行的利益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布哈林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并把这种制度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注意到，战争动员是造成国家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的主要原因，他坚持说：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发展。他说：“将来是属于一种和国家资本主义很接近的经济形式的。”①

布哈林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国家的新的干预作用。就象“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所要指出的那样，国家已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单数或复数）的政治工具、也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自由经济竞争的没有利害关系的评判员。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的直接组织者和所有者，而且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里的一个非常大的股东”。国家已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的和包括一切的组织上的顶峰”。新

---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73—74、108、118—120页，和第8章。虽然这个名词早已使用了，主要是同德国的战时经济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布尔什维克著作家经常把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件事归功于布哈林。见奥新斯基的评论，《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年第2期第24页；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19页。布哈林自认为他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一名词的创造者。见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莫斯科，1920年），第10页。

资产阶级国家的“庞大的、几乎象妖魔一样的力量”,[1] 给布哈林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因此他在写完《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后,就立刻开始写一篇名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的长文。此文完成于 1916 年 7 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续篇。[2] 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进行了激进的重新解释。

他的文章以“挽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最初的理解开始。布哈林解释说,有必要重申这些“古老的真理”,因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与资产阶级国家合作,并对它进行改良,已经把这些“古老的真理忘却或故意把它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删去。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加强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和改良主义者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而只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范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根据定义,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应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同时,布哈林还说,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反映了阶级社会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基础。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国家形式:自由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自由的、不干预的国家;金融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帝国主义国家”。[3]

“庞大的”经济力量把现代国家和以前的国家区别开来。布哈林在重复他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已诞生的理论时,以战时德国为主要例子,用大量文件说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每个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29、124—129、148—149、151、155页。

② 虽然这篇文章的论点的摘要和概述曾于1916和1917年发表,但整篇文章(缺少已遗失的结论部分)在1925年以前没有发表过,《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收于《法国革命:文集之一》(莫斯科,1925年)第5—32页。

③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6—14页。

领域和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并使其军事化的方法。其结果是，不干涉时代的多元资本主义让位于“集体资本主义”，它的居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寡头”直接通过国家进行掠夺。“国家政权就这样几乎吸进了所有的生产部门，国家不仅维持进行剥削的总的条件，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直接剥削者，作为一个集体资本家，组织并指导生产。”新的制度和老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同，特别是消灭了“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的无政府状态。当“国家化”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后形式……”达到顶点时，“组织化的进程继续消灭‘国家经济’机器中各个独立部分的无政府状态，把全部经济生活都置于军国主义国家的铁蹄之下。①

当布哈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化”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独特的“熔合”时，他强调国家似乎受一种不能遏制的贪欲所驱使，把它的组织触角伸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状态被有系统地破坏了。“甚至可以有一定道理地说，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把它组织起来的。”一切其他社会组织都变成仅仅是“巨大的国家机器的分支部门”，直到只有国家单独存在，一切都被它吞食干净，国家成了一个万能的机器。布哈林所描绘的图画象梦魔一样可怕。他说：

“这样就诞生了最后一种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是一种铁的组织，它把生动的社会紧紧地握在它的铁拳里。它是一个新的利维坦*，在它的面前托马斯·霍布斯的幻想简直象个儿戏。更有甚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能够与它匹敌”。②

---

①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第15—18、21—22、25、27页。

* 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英哲学家霍布斯曾用这个词来象征君主专制国家，这里用来指集权国家。——译者注

②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18、28、30页。

总之，这个关于民族的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维坦，在各自追求帝国主义的巨额利润时，发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陷进了血腥的斗争之中。按照布哈林的理解，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表现”，是“在世界‘各国’的竞赛中，具有巨大厮杀能力的、庞大的、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①] 全球范围的、空前残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就是由此产生的。

从整体来看，布哈林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模式，具有相当的理论力量和内部的一致性。对那些在马克思逝世后三十年，生活在一个和马克思研究的社会明显不同的社会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说来，布哈林的上述模式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因其固有的矛盾而崩溃，反而还在摇摇晃晃地继续在国内外扩张。同时，布哈林还通过找出帝国主义模式崩溃的原因，忠贞地维护了帝国主义必然会崩溃的革命假设——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世界资本主义现在处处是致命的矛盾：它注定要被革命所摧毁，战争是毁灭的催化剂和先导。但按字面看来，布哈林的理论会引起不少令人不安的问题，其中有些当时就很明显，还有一些则是只有当事件展开时才能看清楚。

布哈林的辩护人后来说，对布哈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应把它们作为抽象的分析（就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所做的一样）、作为“化学的纯粹”模式来理解。设计这种模式不是为了适应现实情况的每一个方面，而是为了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趋势。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明，布哈林有时也采用这个说明。[②]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20、135页。

② 见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6—277页；布哈林：《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译载于甘金和费希尔的《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238—239页；布哈林：《国家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纽约）1916年12月2日第4、6页。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布哈林总是充分表明，他是想使他的理论(至少是它的主要提纲)能够按照字面去理解的。布哈林在他的著名的、引起争论的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1920年出版)中，又一次详细阐述了他的这一理论，然后在1920年末再重述了一次，并作了一些修改。两次重述都保留了布哈林的最初的理论的基本要素。①

布哈林认为他的理论是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精确写照。他的这一认识的最明显的证明是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在他心中引起的真正的恐怖感。他通常总是激动地提到"今天的怪物，现代的利维坦"，这并不是抽象分析的公式，而是激情的表露。②最引人注意的是布哈林反复使用"军国主义国家的铁蹄"这个形象。他的这句话是从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中借用来的。这本小说是对第一个残酷的法西斯制度的来临所作的梦魇般的描述。这个制度的寡头独裁政府无情地粉碎了一切抵抗并宣称："我们要把你们革命者碾碎在我们的铁蹄下，我们要踩在你们的脸上前进。世界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们的……"用铁蹄来比喻专制国家政权对公民和社会的压迫，贯穿在一切反乌托邦的作品之中，从杰克·伦敦的小说直到乔治·奥韦尔**的警句："铁蹄踩在人的脸上——永远如此。"③从布哈林的激动的语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也在展望未来，而他所看到的前景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他发现如果没有社会主

---

① 见《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3章，又见重刊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68—199页上的1929年5、6月间写的两篇文章。

② 《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第238页；《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29页。

* 美国小说家(1876—1916年)。——译者注

** 英国作家，以写小说著名(1903—1950年)。——译者注

③ 杰克·伦敦的小说出版于1908年，在社会主义者中是大家都熟悉的。布哈林在以后几年中多次提到这本小说。他第一次把"铁蹄"这个词用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62页，后来使用得更经常。关于伦敦和奥韦尔，见马克斯·勒纳所写的导言，《铁蹄》(纽约，1957年)第9页。

义革命，就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变成兵营的集中，在上层权贵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加强最凶恶的军国主义，就如同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一样。"①

布哈林在描写一个万能的"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时"，他预见到(虽然是用成语表达的) 会出现后来被叫做"极权主义" 的国家。② 他也预测到这一发展将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痛苦的问题。国家化渗透到一切领域——社会的经济基础完全从属于并受上层建筑政治的控制——以致各种自发的经济力量、危机、以至革命的前景都将被消灭，这一切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吗？简言之，能不能想出第三种，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呢？布哈林不想回避不愉快的理论问题，在1915到1918年间，他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分别提到了这个问题。每次他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虽然布哈林强调说，这种社会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有两个例子指出了他的思想方向。1915年，布哈林首先考虑过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没有市场的经济的可能性。他说：

"我们将会有一个全新的经济形式。它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商品生产将消失；它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力量仍将存在(甚至更强大了)。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将最象一个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占有制经济。"

在1928年他又说：

---

①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31页。

② 他写道，其他的社会机构"具有一种互相熔合，变成一个统治者的组织的倾向……所以就出现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个万能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它有数不胜数的职能，拥有巨大的权力，具有精神的……以及物质的手段……"《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第238页。

> 这里存在着计划经济。有组织的分配不仅同生产的各部门的各个环节和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相联系，而且和消费相联系。这个社会的奴隶收到给他的一份食品，一份组成总劳动产品的物品。他收到的可能很少，但不管是多是少，这里将没有危机。①

即使在理论上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它表明历史的目的地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可能会带来另一个更残酷的剥削制度。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末出现一个公正制度的必然性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学说也随之而消失了。布哈林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样一种结果是真正可能的。但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想着这个问题。1917 年以后，必须根据正在形成的苏维埃制度来衡量这种危险性。利维坦国家的幽灵是使他在 1918 年初主张左派共产主义的一个因素，也是在二十年代使他主张渐进政策的一个因素。虽然这种危险使他作了一些最不诚实的、最煞费苦心的努力把苏联的发展进程合理化，但在许多年里，它也是使布哈林的布尔什维主义自由化的因素。虽然布哈林在公开场合经常是个乐观主义者，上述因素是使他在私下感到恐惧的部分原因。这进一步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按着同一个鼓点前进的。

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了另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虽然在 1915—1916 年间，布哈林夸大了“国家化”和托拉斯化的范围及其长期性，但他准确地指出了二十世纪的基本发展方向。以后的几十年的确证实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消失，证实了一

---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57页注2；《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第一部分中的几个问题》，《共产国际》1928年第31—32、35页。关于另有两次提到这个问题，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26页；《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第4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82页。

种新型的、经济上很活跃的国家的出现。按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类型和程度来说，从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到高度动员的苏联经济和战时纳粹德国的经济都属于这种国家。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直觉是合乎时宜的和准确的。布哈林在1915—1916年间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写的关于由国家调节的经济著作的先导，其中许多著作谈的也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① 但布哈林在研究这种发展时，被迫对马克思关于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到来的认识作了重大修改。布哈林为了强调"集体资本主义"的组织能力，他事实上抹杀了这个制度内部的、会产生危机的矛盾。布哈林的模式对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前的市场经济没有多大作用(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前的经济了)，同样对说明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毁灭根源的疯狂竞争也没有什么重要作用。

"个别的资本家消失了，变成了资本家联合会的成员，即一个组织的成员。他不再和他的'同胞'竞争，他和他们合作，因为竞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世界市场上去了，国内的竞争熄灭了。"②

就象党内的批评家后来对他指责的那样，布哈林的上述认识非常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对布尔什维克讲来，这种认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

布哈林为维护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要到来的理论，他把资本主义灭亡的国内机制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或帝国

---

① 对这个问题，人们在讨论时常常联系到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例如，见弗雷德里克·波拉克：《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1941年第2期第200—225页；弗朗茨·纽曼：《巨兽》(纽约，1966年)第221—234页。希法亭是后来提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定义的人，他反对把这个概念应用于德国和苏联。见他所写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国家经济?》，收于《三个十年的裁决》(纽约，1950年)，朱里安·斯坦伯格编，第445—453页。

②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17、25页；《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53、119—120、124、164页。

主义的舞台上去了。布哈林坚持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已经创造了一个真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布哈林把马克思的关于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描述应用到国际范围内。“世界经济……的特点是它的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结构”，它“可以和本世纪初以前的典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结构相比较……”资本主义的危机现在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内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充分的表现。①

由于布哈林把战争解释为经济竞争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这样他就把革命的最终的催化剂放到国家制度以外去了。以前，坚不可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曾用殖民地的“超额利润”来阻止国内的阶级斗争，“用牺牲被剥削的殖民地的未开化的人和被征服的人的办法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因为帝国主义的“恐怖和耻辱”被限制在遥远的地方，因此在西方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团结的关系”。“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世界大战通过把帝国主义的“真面貌向欧洲的工人阶级”揭露无遗的办法，使人们感到有希望“割断把工人和……帝国主义国家捆在一起的最后一条链条”并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进行革命的“战争，反对资本的统治”。“欧洲的工人们所拿到的额外的几个便士……比起千百万被屠杀的工人、比起亿万被战争吞噬的人们，比起无耻的军国主义的可怕压力、比起对被掠夺的生产力的故意破坏、比起高昂的生活费用和饥饿来，又算得了什么呢？”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如提出在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要依靠战争的论点，这不会

①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53—54页，和87、106—107、119、120、123—124页。

*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6页。——译者注

②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64—167页；《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第239页。

引起令人为难的问题。布哈林的主要目的是重振人们对革命的希望，并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恢复马克思的反对国家主义的思想。运动要“坚决强调自己同国家政权在原则上的敌对性”。* 无产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从内部把它炸毁”。[1] 但是后来，战争结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仍然是孤立的，这时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尴尬的假定，即认为如果不再发生一场世界大战，欧洲革命要再往前发展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到二十年代中期，这种认识同布哈林主张渐进的国内政策处于痛苦的冲突之中。因为他的国内政策是以长期的和平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国际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最后用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战争计算进来的办法，使上述左右为难的问题得到了缓和，但在 1915 — 1916 年间他没有强调民族主义战争这个因素。但是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没有一次大战，是否可能爆发革命，这个基本问题使他终生都感到苦恼。在 1928—1929 年间，这个问题是布哈林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政策上的争论问题之一。

和他早年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开辟了新的理论领域（至少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看来是如此），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因此引起了他同列宁的激烈的争论。从表面看，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数月后列宁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没有多大差别。两者都对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作出了同样全面的解释，最后的结论也是相似的，即战

---

* 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18 页。——译者注

①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30—32页。

争和革命是不可能避免的。列宁看了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的手稿，在准备自己的文章时使用了它。列宁对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没有重大的反对意见。列宁在1915年12月在该书出版时写了一篇高度颂扬的序言。① 布哈林(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也没有对列宁的上述著作表示过任何保留意见。直到1929年布哈林在政治上被打倒后，当时几乎他的所有理论著作都受到攻击，但他的这本书，和列宁的著作一样，在苏联仍被尊为布尔什维克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表述。② 但是在他们两人处理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重大的不同之处，其中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列宁的帝国主义模式是建筑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显而易见的不同理解之上的。虽然列宁也强调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并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要东西是……自由竞争的被排斥。"但列宁比较倾向于认为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从国民经济中消失。反之，他认为经济的部分垄断化"加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列宁看到的是一个杂色的图画——"一些过渡现象，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体"——并得出结论说："从自由竞争中产生的垄断，并没有把自由竞争消灭，而是比自由竞争存在的时间更长，和自由竞争并肩存在，因此产生了若干非常尖锐的、激烈的对抗……"列宁认为，托拉斯化能够排除内部的危机这种想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散布的神话"。因此他远比布哈林强调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衰老。列宁的这种认识和布哈林的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有重大的区别，而布哈林

① 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一书的注91。

② 就是说在党的教育机构中要求两本书都学。另见I·I·斯克伏尔卓夫和斯捷潘诺夫给希法亭的著作写的序言，《金融资本》(第3版，莫斯科，1923年)第5页。

则认为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是同义语。①布哈林最后认为列宁没有理解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现象，此事成为列宁和布哈林两人之间的从1917年继续到二十年代的一系列分歧的主题。

第二个重要的分歧，是关于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作用问题。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中的论点，并不和后来发生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不相容。布哈林后来能对民族解放战争予以重视这一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在1915—1916年间，布哈林相信，帝国主义已使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成为过时的事物（因而形成了他在写"民族的"字样时总是加上引号的习惯）。按照定义，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是一个用暴力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使得"许多独立的小国瓦解"。在这方面，布哈林的观点和罗莎·卢森堡的激进国际主义是相似的，虽然他们两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不同的。②

布哈林看不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支革命的力量，这是他最初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最明显的缺点。他没有预见到战后时期的历史发展——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反之，列宁则部分地由于他深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问题，而不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结构，因此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殖民地的民族主

---

① 必须指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见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分歧的程度要到1920年当布哈林发表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才清楚。他在那儿写道："金融资本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列宁纠正他说："不是'消除'"。从1929年开始，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解的差别成了斯大林对布哈林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进行攻击的实质。例如，可见M·约耶里森：《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第26—43页。

② 《帝国主义和世界战争》第120、144—145页；另见他的《弱小民族的生路在那里？》，《新世界》（纽约），1916年12月20日第4页。例如，他认为，比利时能否继续独立存在是可疑的。

义起义的可能性上。在广泛的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列宁发现了一个为帝国主义的崩溃开创道路的因素——即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这一模式不仅可以解释激烈争夺殖民地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殖民地人民进行日益高涨的抵抗的原因。① 列宁在写完《帝国主义》一书几个月后，又深有远见地写道：

“殖民地战争”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②

列宁在1914年后热烈主张民族自决的口号，反映了他很早就对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潜在革命作用抱热情的态度。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他同布哈林和其他青年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他们和大多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拒绝向民族主义呼吁，认为这是不适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争论开始于1915年末，表面的理由是争夺对新杂志《共产党人》的控制权。《共产党人》杂志的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中刊登了一篇卡尔·拉狄克的著作。拉狄克是一个和布尔什维克流亡者关系密切的东欧社会民主党人。拉狄克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很接近罗莎·卢森堡和皮达可夫，而且到这个时候，也很接近布哈林。列宁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拒绝继续参加《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而且还要该杂志停刊。理论上的分歧立刻发展为派别分裂。11月，列宁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剥夺了斯德哥尔摩小组——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博什——同俄国单独通信的权利。斯德哥尔摩的三个人的反应是，把他们这个

---

① 见《列宁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705、788、812页。布哈林考虑到了不平衡发展，但更倾向于强调“拉平经济差别”，《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07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72页。

布尔什维克小组解散了。①

后来在11月，这三个人送交给中央委员会一组文件，概述了他们在自决问题上的立场并攻击列宁的立场。他们直率地说：列宁的口号"首先是乌托邦式的(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因为这个口号散布幻想，因此是有害的"。帝国主义已经使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个当前的历史可能性。用一种民族的、"'赞成国家的态度'"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将损害革命事业。唯一正确的策略是"不断把无产阶级投入世界斗争，经常向他们提出世界政策问题"，从而"使无产阶级意识革命化"。虽然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特意把"非资本主义国家或仅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例如殖民地)"排除在他们的论据之外，他们在把自决作为一个纲领性口号这整个原则上，跟列宁有不可调和的矛盾。②

在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继续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尖刻。这几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看到列宁对他们的批评作出的猛烈反应，感到激怒。他们提醒列宁说："所有具有经过认真思考的理论的极左派"都反对自决口号，"难道他们都是'叛徒'吗?"另一方面，列宁则认为他们在这一个问题上所持的反对立场，不仅是理论上的胡说八道，而且是政治上的不忠。列宁指责说，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或是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要求公开讨论反映了他们"反党的"态度。③列宁显然认为皮达可夫在这一场关于自决的争论中是首恶分子，④但他对布哈林的攻击同样严厉和不妥协。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断了，这只能

---

① 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第215—216页。

② 这些文件重印于上述著作第219—22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页。

④ 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88页；列宁认为尽管有争论，但同布哈林一起工作还是可能的。《列宁文稿》第6卷第286页。

使鸿沟加深。其他布尔什维克试图使他们和解的努力，只是使列宁更加生气。① 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列宁变得相信，不仅从伯尔尼代表会议以来布哈林发表的种种异端邪说，而且从 1912 年以来发生的所有的一些较小的分歧（包括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分歧）都是一个整体。因此列宁说："尼古·伊万*是个勤奋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向是支持他的。但是他（1）轻信流言蜚语，（2）政治上极不坚定。战争使他沾染上了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②

考虑到列宁和布哈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列宁会让他和布哈林的关系恶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非政治性的因素肯定在起作用。列宁的出名的爱争吵的脾气在 1916 年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正处于"不能和解的情绪"之中。没有直接卷进这场争论的布尔什维克们责备列宁的"不善忍让的脾气"以及在处理这件事上不够策略；而当布哈林表示希望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要象他们对待俄国人那么粗暴地对待西方的同志们时，可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③ 此外，列宁看来对他的年青的门徒同各种非布尔什维克集团进行广泛联系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例如布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反战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由年青的激进社会民主党人组成），是个很受欢迎、很积极的人物。当布哈林离开以列宁为核心的圈子越远时，他就越

---

① 亚历山大·斯连普尼科夫和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调解此次冲突，至少在一种场合。见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第249页。

* 指布哈林。——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274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3—211页。布哈林就自决问题写给列宁的一些信未曾发表过。它们的内容可从列宁的书信和一篇文章的草稿中加以判断，《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30卷第250—256页。

③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2卷第197页；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革命》第239页；布哈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发表于《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6页。

和年青的欧洲左派，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党一致（至少在列宁的心目中是如此）。① 四十六岁的列宁和二十八岁的布哈林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从来是不大隐蔽的。列宁曾用他的最好的家长式的语气说过："布哈林及其同伴" 的"不能容忍" 的错误是"由于年幼无知……，过五年"，他们自己"也许会有所转变"的。* 布哈林从他这方面，则指责列宁太守旧了。他说："这算什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东西能对二十世纪有'教益'吗？……关于自决的口号，您采取了'上一个世纪'的观点。"②

同时，列宁的态度使人对下列印象更加深信不疑，即"列宁同别人争吵得越厉害，这些人对他越亲密。"③ 因为即使在列宁和布哈林关系最坏的时候，他们仍不时流露出他们之间的潜在的相互爱慕之情。布哈林有时试图求助于这一感情。他请求列宁不要"发表反对我的、那种使我不能以亲切的态度答复的文章……我以前不希望，现在也不希望……分裂"。④ 列宁也不是对这种请求完全置之不理。在 1916 年 4 月，布哈林在斯德哥尔摩因参加一次反战的社会党大会而被捕。当列宁得知布哈林遇到了困难，他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援助。后来在 4 月间，当布哈林被放逐到奥斯陆

---

① 关于布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见福特雷尔：《北方的地下》。列宁批评布哈林赞同地提到德国左派的纲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30卷第251—256页。

*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00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另见列宁的父亲般的号召，他要求倔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容忍——这个劝告他本人很少予以注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卷第294—297页。关于布哈林的意见，见他的未发表的一封信，引用于巴也夫斯基：《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第37页。

③ B·D 沃尔夫：《列宁主义》，收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一书，米洛拉德·德拉赫柯维奇编（斯坦福，1965年）第51页。

④ 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卷第261页上引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同样见他后来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刊登于《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88页。

（当时叫做克里斯蒂安尼亚）时，列宁写信给另一个在挪威的布尔什维克，请他向布哈林转致问候，并说："我衷心希望他赶快休息，并祝他健康。他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信是简短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是热情的，甚至是慈父一般的。但这种慈祥历时并不久。到7月，列宁对季诺维也夫说："我现在对布哈林恼火得无法写信。"①

不论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原因何在，列宁和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是真正的、而且是长远的分歧。此事一直到1919年还时有发作。但这不是当前真正最能导致分裂的问题。1916年初，列宁决定亲自编辑出版一部纲领性的文集。他希望布哈林为此文集写一篇"经济题材"的文章。②但是布哈林却给列宁送来了一篇题名《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章，文中描绘了"新利维坦"。其中使列宁生气的章节是：布哈林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阐述、布哈林要求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革命性摧毁"的号召、他得出的一个引起争论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分歧是牵涉到经济集中化问题上的分歧，"并不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家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国家主义"。③恢复马克思主义原来反对国家主义的面貌，对布哈林有两个用处：首先，这和他对"新利维坦"的毛骨悚然的想象是一致的，而且还满足了他的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其次，这是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再一次激进化的要点。伯恩施坦派的改良主义分子和考茨基的正统学派早就清除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这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01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285、315页；他提到布哈林时又一次表示激怒。见《列宁文稿》第6卷第3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02—403页。

③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13页。

种战斗原则。有几个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有安东·潘涅库克和一个名叫策特·霍格伦的瑞典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比这更早就已回到了反对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① 但布哈林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布尔什维克，这件事就足以使列宁不高兴了。

列宁最初倾向于把这篇文章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发表。但是，列宁还在为他们之间的其他分歧感到恼怒，他很快改变了主意，认为这篇文章“无疑是不合适的”。列宁拖了两个月，才通知布哈林不用他的文章的理由。最后，在1916年9月，列宁写信给布哈林，(“很抱歉”地)拒绝了这篇文章。列宁解释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那一部，“很好，有用，但十分之九可以公开发表”，“稍加”修改后应刊登在别处。可是列宁认为，布哈林对马克思和国家问题的理论上的处理却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不同意布哈林对国家所作的“社会学的”(阶级的）分析。列宁指责布哈林援引恩格斯的话，是断章取义的。而且列宁认为，首先，布哈林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并无分歧；“社会民主党应该坚决强调自己在原则上反对国家政权”——“是极不确切的，或者可以说是错误的”。列宁表示布哈林的思想“没有经过周密考虑”，* 甚至是“幼稚的”。他劝告布哈林“要让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②

---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变得非激进化，又怎样重新变得激进化这一问题的讨论，见罗伯特·塔克：《马克思的革命思想》(纽约，1969年）第6章。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是赞赏霍格伦和潘涅库克的。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30页；他于1916年10月给列宁的信，见《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页。他是霍格伦的朋友，并为霍格伦办的杂志《警钟》写稿。见福特雷尔：《北方的地下》第91—92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

* 以上关于列宁拒用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一文的引文均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7－218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7—218页；《列宁文稿》第6卷第328—329、349页。

布哈林到这时还没有觉察到列宁的最新的不悦，列宁的退稿刺伤了他，使他感到很生气。在论战进行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布哈林根本不想让他的关于国家的思想(现在已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成熟起来”。布哈林给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写了一连串的信，为他自己的思想辩护。这场通信论战经过9月一个月，一直持续到十月。和以前一样，每次书信来往都使论战更加激烈，并使论战范围更加扩大。① 列宁(受到季诺维也夫的支持)指责布哈林犯了“很大的错误”，* 即“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忽视在革命后成立一个国家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错误，还有把“炸毁”旧国家的目标“错误地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 * ② 新的反对布哈林的运动使布哈林相信列宁的不满，已经不仅限于理论方面，而是更全面的不满。布哈林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很清楚，你们就是不要我和你们合作罢了。不用担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为了表示反抗，布哈林开始发表他的关于国家的观点。③ 布哈林同列宁及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分裂看来是迫在眉睫了。

同时，在1916年8月，布哈林从奥斯陆迁居到哥本哈根，在那

---

① 同这场论战有关的有些信件，包括列宁的一些信件，未曾发表过，这从《列宁文稿》第6卷第358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78页和541页注378，和《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8页注1和注4中可看得很清楚。然而，这些遗失的信件的内容，可从这一期《布尔什维克》(第86—93页)上发表的那些信件和列宁10月14日的一封信中(《列宁文稿》第6卷第367—371页)加以判断。

*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页。——译者注

* * 同上书，第166页。——译者注

② 《列宁文稿》第6卷第367—371页；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语的指责，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5—296页。

③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6—87页。九年以后，他在他那篇文章的一个脚注中，说明了他同列宁对抗和发表他的观点的决定。《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5页。

儿他再次调查一个可疑的双重间谍。他一直留在哥本哈根，直到9月末，调查完了之时，那时他决定到美国去。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不完全清楚。其他考虑（如他的对旅行的爱好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堡垒里进行党的工作的可能性）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他和列宁的关系的恶化，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此时，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争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活动，在那里，"普遍存在着失望和忧伤的情绪"。[①] 在10月初，布哈林回到奥斯陆等候到美国去的轮船。

此时，列宁开始担心他和布哈林之间的关系已恶化到不能挽回的程度。列宁着急地指示斯堪的纳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组织者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请来信坦率地告诉我，布哈林动身时情绪如何？他是否会给我们来信？是否会履行对他的委托？……"[②] 列宁处在突然产生的不安之中，此时他正好又收到布哈林的一封长信。布哈林用此信向列宁告别。再一次坚决拒绝了列宁的指责，并谴责列宁编造和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为他自己的关于国家的观点辩护，说他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然后他写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说明有些社会党人是如何看待列宁反对布哈林的运动的：他们说"总之，我被踢出来，是因为'你们的列宁不能容忍任何有头脑的人'"。布哈林说这种猜测是胡说八道，但是他一语道破了至今未曾说出来的他和列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根源，以及他自己对列宁周围的拍马屁的小圈子里的人物的看法。但布哈林还是用动人的请求结束了他的信：

"我向你请求一件事：假如你一定要进行论战以及其他等等的

---

① 见施略普尼科夫的回忆。甘金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250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3页。

话，请你保持一种不致引起分裂的语气。如果我们不再能合作，甚至在将来也不能合作，会使我非常痛苦，痛苦得难以忍受。我极其敬重你。我把你看作是我的革命导师，而且热爱你。”①

这是一份动人的呼吁，列宁回答表示欢迎，虽然是用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他立刻写了一封“温和”的信给布哈林，此信一方面坚持他对布哈林的指责仍然有效，说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是布哈林的过错，但同时又赞扬布哈林并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你评价很高。”列宁在信的结尾说：“我衷心希望，论战从一开始就是和彼·基辅斯基（皮达可夫）之间的论战，并希望和你的分歧业已解决。”从列宁这方面说来（至少在私人关系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布哈林对列宁的答复是如此感激，因此在出发前，又最后寄给列宁一个条子，表示和解，重申他和皮达可夫的“绝对的团结”，但对他跟皮达可夫的友谊导致了同列宁的冲突，深表遗憾。最后布哈林说：“祝您们好，请多想一些我的好的地方……我拥抱您们所有的人。”②

最后的破裂避免了，但是他和列宁之间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所产生的令人吃惊的结局还在后头。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有两重意思，即：首先批评布哈林用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办法来歪曲他们的观点；其次批评布哈林忽视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第二项指责是特别奇怪的，因为布哈林曾小心地强调说，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相联系的，而不是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相联系的。布哈林曾在好几个场合强调，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组

---

① 《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87—88页。

② 《列宁文稿》第6卷第365、367—371页；《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22期第93页。

织，利用它的物质机构，建立自己的暂时的国家政权组织……”①布哈林对列宁的指责感到莫名其妙是可以理解的。布哈林指出：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中，“我被认为是反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头，但您却批评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② 列宁对布哈林的歪曲，看来是列宁最初对布哈林的革新尝试（即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方法来提出一个和社会民主思想相对照的激进的观点）的不满的（有意或无意的）副产品。在布哈林提出他的革新尝试前，列宁没有想过这个问题。1916 年 12 月列宁说：“我们希望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③ 结果是列宁在思想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917 年 2 月 17 日，列宁突然告诉另一个布尔什维克说：“我正在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跟布哈林的见解固然不同……跟考茨基的见解更是针锋相对。……布哈林比考茨基好得多……” 但列宁仍有保留之处：“可是布哈林的错误在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也可能使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但两天后，列宁再次宣称：布哈林虽然犯有“小错误”，但“比考茨基较接近真理”。列宁还说，他现在想出版布哈林的文章。④ 列宁心中还留下的疑虑很快就消失了。当布哈林在 1917 年 5 月回到莫斯科时，列宁的夫人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向布哈林转达了列宁的口信——“她一开始就讲：‘弗拉基米尔·

---

① 《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32页和13、30页。同样，见《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66页；《新世界》（纽约），1916年12月2日，第4、6页。

② 《布尔什维克》1932 年第 22期第 88 页。西德尼·海特曼的《布哈林的无政府主义之谜》（载于《洛基山社会科学杂志》（1963年4月）第39—53页）讨论了布哈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的误解。

③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6页。

④ 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77 页和 280 页。

伊里奇让我告诉你，在国家问题上，他不再和你有任何分歧。’”①

列宁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充分证明，到后来才出现。1917年列宁写完了他著名的论文《国家与革命》，该文的论点和结论都是布哈林的。列宁的结论是：“马克思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是“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暂时需要一个新的、革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应“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因此，“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在最后，列宁毫不窘迫地说道：“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②

虽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1917年后还是一个不能付诸实施的预言，但此文却使反对国家主义成为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布哈林很少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则谈得很多。他们两人都没有预见到那种国家将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布哈林设想的革命国家，其职能只不过比“管制被推翻的阶级”稍多一些而已；列宁则把它设想成一个已经在“消亡”过程中的没有官僚的“公社国家”。布哈林和列宁两人对国家的概念都只不

---

① 布哈林于1925年发表他的文章时，把这条消息附在那个版本上，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5页注1。他关于克鲁普斯卡娅的口信的叙述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甚至在1929年，斯大林认为，“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很可能给布哈林说过他在这里所写的东西”。但斯大林解释说，这只意味着列宁相信布哈林已改变了他的观点。《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布哈林在克鲁普斯卡娅告诉他以前可能已知道列宁已改变了他的想法，他也许是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片断的著作中，或者是从也在纽约的柯伦泰那儿知道的。列宁可能在1917年2月17日的一封信中把这一点告诉了布哈林，这封信未曾发表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79页。

*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190、222、216页。列宁写的《国家和革命》就是他在1916年12月决定就这个题材写一篇文章的产物。

过是幻想，和1917年以后的认识——苏维埃国家是现代化的工具、“是重建社会的基本杠杆”[1]——相去甚远。然而，反对国家主义在1917年仍起了重大作用。反对国家主义促使党激进化，并创造了一种反对临时政府（它取代了沙皇专制制度），要求武装起义的公众舆论。列宁的权威使反对国家主义成为正统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真正的创始人是布哈林。[2] 布哈林用这个思想，并用他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对俄国革命前夕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多的贡献。

布哈林流亡国外的最后一个月是在美国渡过的。他在1916年11月初到达纽约，就象在别处一样，他的时间是在激进的政治活动和当地的图书馆中渡过的。[3] 他的政治活动的中心是《新世界》报，这是一份流亡在纽约的社会党人办的俄文日报。1917年1月，布哈林成了《新世界》报的事实上的编辑，为他在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辑十年打下了基础。就象他后来当《真理报》编辑一

① 对比布哈林的意见，《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166页；《进攻》第268页。

② 1929年以前，在苏联一般都承认，布哈林是第一个修正马克思的反国家主义的人，布哈林的这个创举促使列宁提出后来的提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284页注7。马列茨基在1926年写的关于布哈林的传略（《布哈林》第276—277页）就是这样说的，在布哈林垮台之前没有人对此说法提出过质疑。后来就把功劳归于列宁，有时也归于潘涅柯克。见巴也夫斯基：《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第42页。即使在1929年以后，人们有时还承认，虽然是勉强和含糊地，列宁从布哈林那里有所借鉴（这有文件足以证明）。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479页，注155。（注中说列宁于二月革命前开始写一篇关于国家问题文章。此文同布哈林的文章一起原打算收入《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利用了这些材料。——译者）在二十年代中，布哈林在回忆这场争论并指出列宁最初所持的“不正确”立场时，把制订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功劳归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第5页注1；《进攻》第267—270页。关于这个问题，另见罗伯特·丹尼尔斯：《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国家消亡”》，收于《苏联社会：读本》，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肯特·盖格编（波士顿，1961年）第113—126页。

③ 《自传》第55页；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第273页。

样，他利用《新世界》报宣传他喜爱的思想。他的关于新资本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以及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开始经常在《新世界》报上出现，而且可以预料到的，引起了争论。① 他从事党的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美国左派人士支持布尔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派* 的反战态度。这一工作使他有时进行横穿美国的演讲旅行。布哈林一直是个受欢迎的人物，他很容易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人士相处。他成功地使一些美国社会党人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特别是加强了《新世界》报的反战立场。②

虽然，有很长时间布哈林对美国的技术和科学进步感到钦佩，但他在美国的短期停留，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微。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它只不过加强了他的下列信念：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制度。衡量这种制度的弱点的最现实的尺度是战争这个外来压力。③ 布哈林在纽约和一个人的交往却具有长远的意义。1917年1月，托洛茨基抵达纽约，并成为《新世界》报编辑部成员之一。这两个人（在二十年代一个领导布尔什维克左派，另一个领导布尔什维克右派）之间的关系的可悲历史，是后来老布尔什维克们所经历的集体悲剧的中心。他们是苏联最早的领导人中两个最有才华

---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西奥多·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纽约，1957年）第76—77页；D·舒布：《往年》，《新杂志》第102期（1971年）第202页。见他和S·诺伏米尔斯基之间的讨论，《新世界》1916年11月23日、12月2日和12日。关于他在《新世界》发表的文章的目录，见西德尼·海特曼和彼得·尼尔什：《尼·伊·布哈林》（柏林，1959年）第19—23页。

* 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前译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详见《〈列宁全集〉注释选编》第257页。该书系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1975年编。——译者注

② 《新世界》1917年2月28日第5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6页。

③ 这将成为他在二十年代认为美国有可能发生革命的立场。

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个人感情未能超过他们后来的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把他们分开了，最后把他们毁了。

布哈林在维也纳就略微认识托洛茨基，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在纽约开始的。① 他们两人在当代主要政治问题上立刻就产生了分歧。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7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他坚持美国社会党人的左翼应该留在美国社会党内，努力在内部促使社会党激进化。布哈林（还有列宁——他在欧洲注视着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则极力主张组织上的分裂，并在美国成立一个新党。这一争论，使年青的美国共产党受到俄国人的长期存在的分歧的影响。分歧是如此尖锐，以致使纽约的流亡者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分别以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为首。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1月和2月，同时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骤然爆发出来，但是可能没有象后来的党史所描写的那样激烈、那样富有磨损性。② 布哈林的特点是：他认为政见的不同，不一定要影响个人的关系——作为人，这是他的具有吸引力的特点之一，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他的一个相当大的盲目点。布哈林虽然和托洛茨基争吵，但他们两人之间仍然建立了热烈的友谊，而且在《新世界》报里保持政治上的合作。

由于在2月间得到消息说，圣彼得堡的因面包问题引起的骚乱已经发展成为政治革命，上述争吵的重要性就迅速明显地缩小了。沙皇退位了，一个共和的临时政府成立了。长年的流亡生活结束了。其他许多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注意力集中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上。但布哈林不象他们，他自1915—1916年以来，一直在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第273页。一般地说，托洛茨基对他们的关系的回忆（这将在第5和第8章中加以讨论）是不可靠的。

② 见德雷帕：《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第80—85页；路德维格·洛尔的回忆，《革命一年》（纽约，1918年）第7—8页；片山哲的回忆，《革命时代》1919年7月26日第6页。

争论说："俄国必然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俄国的新政治制度，只不过是一个连续的革命过程的第一个过渡阶段。布哈林在1917年3月断言，政权将很快从弱小的俄国资产阶级手里传到日益兴起的无产阶级手里。此事本身将只是"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第一步。"①

在战时要安排一次海上旅行是很困难的。拖延一定使人感到沮丧。托洛茨基在3月间，布哈林则在四月初起程回国。布哈林的流亡生活以和开始时同样的方式结束。他在日本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星期，当进入俄国东部时，又被控制着该地区的孟什维克逮捕（理由是"在士兵中进行国际煽动"）。在五月初，布哈林终于到达莫斯科，更大得多的论战在那里等待着他。②

---

① 《革命的前景》，《新世界》1917年3月27日第4版；另见他的《俄国革命及其意义》，载于《阶级斗争》（1917年5—6月），第14—21页。关于他更早的思想，见《自传》第55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6—277页。

② 见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第85页；《自传》第55页；《新闻工作者手册》（莫斯科，1924年）第289页。他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有时说是在四月末。

第 二 章

1917年激进主义的胜利

当旧秩序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许多长期祈求这一天到来的大喊大叫的人却会惊惶失措。

——埃里克·霍法尔：
《真正的信仰者》

从1917年2月沙皇的下台到布尔什维克10月占领彼得格勒首都止，俄国经历了一场现代历史上空前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由于世世代代遭受官僚特权的剥削与压迫而仇恨满腔的工农兵群众，经过三年战争的激进化，又受到沙皇统治的突然垮台的激励，纷纷起来占领全国的工厂、要塞和大庄园。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得到土地，富有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联合起来自发进行一种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的平民反对极权的暴动。到了1917年夏天，传统形式的统治权力与特权，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在日益猛烈的进攻下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人民的、分散的机构，这就是：全国各地向上级苏维埃选派代表的地方苏维埃；工厂中的工人委员会；军队的士兵委员会；在农村瓜分地主土地的农民委员会。

一方面，群众情绪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激烈更狂暴，另一方面，在彼得格勒的新的临时政府则组成为一个温和和合法的政权。这

个政府开始是保守派与自由派政客组成的联合政府，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社会主义的但是忠诚的反对派——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左翼同它相对抗。同年春，在国内事态发展的压力下，政府改组为苏维埃内部的自由民主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克伦斯基本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政府虽然改换了新面目，但仍继续宣传秩序与节制，不同意革命骚动，坚持俄国在取得胜利或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以前要继续进行对德战争，并把重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拖延下去，要等到年内晚些时候能选出并召开全国立宪会议时再予解决。

在自下而上的革命中，一个温和的政权，不管是自由派，社会主义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没有站住脚的可能。临时政府被导致贵族政权垮台的同样的社会、军事问题所困挠，在八个月中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最后终于被压垮。到了1917年秋，它既无人民群众的支持，又没有足够的军队来维持城市治安，制止夺地，进行战争，甚至抵抗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微弱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在官方温和派和激进的群众之间发生的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也毁灭了政府的社会主义拥护者，使他们成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从而在他们自己的目无法纪的选民中孤立起来。到了9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主要苏维埃中的力量已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所代替。

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的惊人历史，不能详述一个在2月间还只有24000名党员的党竟然在10月份就成了拥有20万人的群众性组织并成立了俄国政府的具体经过。但是，那种认为该党是1917年的没有代表性的篡权者的看法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帮助布尔什维克获胜的是对手的犹豫不决和缺乏理解力，是列宁动员党支持他的战斗立场的决心和能力，还有纯粹的

好运气。但该党是一贯表达并支持1917年的激进的群众意见的唯一重要政治力量，这也是事实。布尔什维克一直是一个少数党（在11月初立宪会议上所得选票约占25%），他们既未鼓动，也未领导自下而上的革命；但只有他们看到了革命的趋向，并在革命中生存了下来①。

由于两个原因，布哈林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对党的成功的贡献——值得特别重视。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为什么能超过老一代的地位更高的人一跃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同时，这也为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左派在党夺取统治权后仅仅三个月就进行反对列宁的政策的活动准备了条件。这两个情况都源于一个事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左派——布哈林是这个左派的最杰出代表——在1917年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使当时不满29岁的布哈林就进入了列宁的领导委员会，这就是后来成为苏俄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机构。1918年2月，列宁放弃了他1917年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布哈林和左派又回到反对派地位上去。

曾经使布哈林与移居国外的列宁严重分裂的那些问题在1917年获得了解决或未导致严重后果，主要是因为列宁这位领袖改变了主意。他们哪怕是解决很小的分歧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1917年争取布尔什维克群众性支持的运动中，列宁就巧妙地把国际失败主义同反战和平口号结合起来，这些口号同布哈林、鲍日集团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口号是类似的。而且，他还推翻了他原

---

① 虽然在苏联和西方有关的专著不断增多，但仍然没有一本关于1917年革命的社会历史的合适的书。一本过时的，但仍有价值的著作是威廉·亨利·钱伯林的《俄国革命：1917—1921》（2卷集，纽约，1960年）。另见《革命的俄国》，理查特·派普斯编（坎布里奇，麻省，1968年）。关于党的，则有罗伯特·V·丹尼尔斯的《红十月：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67年）。

来的意见，通过一系列和解姿态，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争取到布尔什维克党里来。1915年布哈林号召战斗的反战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个号召至少在这个情况下是占上风的。刚巧，也合适地由他在1917年7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欢迎托洛茨基派。他向大会保证说："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有必要团结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有生力量。"① 但他们新建立的团结的主要因素，是列宁接受了布哈林关于用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号召中所包含的最高纲领精神。列宁1917年回到俄国后，提出了一个使党的领袖们感到惊异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他在这个提纲中把反国家主义主题变成了一个政治纲领。

在列宁回国以前，在俄国国内的以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袖们一直认为沙皇以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长期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所起的作用是忠诚反对派的作用。他们据此规划了党的政策。列宁的四月提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列宁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已在从资产阶级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第二阶段必须把权力置于无产阶级和最贫苦的农民阶层手中"，他要求"不支持临时政府"，既不支持它的战争努力也不支持它的国内政策，不管它采取什么政策。列宁号召摧毁现有国家——"消灭警察、军队与官僚机构"，号召建立苏维埃"革命政府"、"公社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的建议是放纵的无政府主义或"狂人的疯话"，列宁就劝他们（就象早些时候布哈林劝告列宁那样）去阅读"关于无产阶级需要哪种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什么"。四月提纲写得简明扼要，观点鲜明，预示了列宁之后在八、九月间写的《国家与革命》，提出了1917年的政治纲领：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

① 《第六次代表大会》第72页。

埃！①

列宁的论点虽然在时间问题上未作硬性规定，但它意味着起义与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鼓动使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处于惶惑不解的状态之中”。正如布哈林七年后回忆的那样，“我们自己党的一部分，而且决不是很小的一部分，认为这几乎是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②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袖，由于胆怯，由于多年反对贵族统治后受到议会民主潜移默化的影响，还由于按字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俄国的社会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尚未成熟，因而对列宁的起义号召要么是不热情，要么是公开反对。他们的抵制表现为列宁的几个高级助手(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历克塞·李可夫和维克托·诺根)的公开反对，也表现为“我们党的最高层”中许多人不断的“动摇不定”，“对夺取政权的斗争感到‘害怕’”。为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首先要使他自己顽固的党接受激进主义思想，这个艰苦斗争使他从四月一直忙到十月的最后时刻。③

他运用他的巨大说服力，并且用推动和依靠原来处在党的高级领导以外的党员的办法，终于获得了成功。有两个派别在这方面是关键的：一个是托洛茨基派，他们一入党就身居高位，在彼得格勒起重要作用；一是年轻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他们在莫斯科尤为重要，其中布哈林是卓越的人物。象多数青年布尔什维克那样，布

① 关于四月提纲(这个提纲概括了列宁回国时所做的一篇没有发表的讲演，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应，见N·N·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目击记》(2卷集，纽约，1962年)第1卷，第286—287页。

② 苏哈诺夫：《俄国革命》第1卷第7章；布哈林：《进攻》第269页。

③ 列宁的话，引用于丹尼尔斯的《红十月》第65页。这本书提供了列宁在1917年为使他的党激进化和团结一致而进行斗争的详细情况。关于党内存在的不同看法，另见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革命的前奏：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1917年7月起义》(印第安纳，布卢明顿，1968年)。

哈林不同情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主张温和与自由的劝告，一开始就盼望第二次革命。这使他和列宁联合得十分紧密，即使他同列宁在夏天就党的纲领的理论部分进行的一场简短的文字论战，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特别是列宁的四月提纲——他通过克鲁普斯卡娅转达的个人口信确认了这个提纲——使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合法化，而这是"革命阶级整个实践中的基本和主要的问题"。在这种前景的武装下，两人在1917年"一直"站在党的"左翼"。① 结果，布哈林不再是半被遗弃分子，而在7月，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成为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的总参谋部——二十一人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他和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这个任务标志着布哈林已进入最高领导。②

布哈林对党的激进化作出贡献的舞台是莫斯科，他在1917年作为一位全国性的党的领袖而出现的地点也是莫斯科。莫斯科这个俄国最大的城市，在倾向彼得格勒的革命历史学家眼里经常不被重视，但它曾给党带来了它最早期的一些最重要的成就。但在一开始，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象全党一样，严重地分裂成温和与激进两派。布尔什维克右派在沉着的老首都的影响尤其大，由于处在农民俄国的中心，他们的观点更为保守。"处在资产阶级莫斯科的中心，"有一个人曾这样想，"我们简直象一群矮人想移动一座大山。"③ 右派的力量集中在市党组织——莫斯科委员会中，它的

---

① 见布哈林对《国家与革命》的评论，《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年第1期第19页，布哈林的《自传》第55页。

② 《自传》第55页；《第六次代表大会》第99—105页。布哈林关于《战争和国际形势》的讲话是在开头做的，看来就是大会上的主要报告。

③ 李可夫的话，引用于列昂·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3卷集，纽约，1937年）第3卷第151页。

领导人中包括许多温和派，其中有诺根和李可夫。[①]

但莫斯科党组织的另一翼，则是安置在莫斯科地区局的年轻的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强大而大叫大喊的派别。这个局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堡垒，[②]它正式负责莫斯科周围的13个中心省份的所有党组织，这个地区占有全国人口的37％，全国党员的20％（截至10月）。布哈林5月初回到莫斯科后，就立即恢复了他在莫斯科市委员会的席位。同样重要的是，他也成了莫斯科地区局的核心领导成员，并同他在侨居国外以前的朋友重新团聚；这个局在1917一1918年成了他的权力与影响的基地。[③]

1917年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就是围绕两大党组织的角逐进行的，一个是谨慎从事的莫斯科委员会，一个是激进、主张起义的地区局。[④]有两个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这场争夺。首先，地区局对莫斯科委员会具有正式的管辖权，莫斯科委员会只被看作是“该地区的许多组织之一”，对此，人员更老、威望更高的市委员会感到十分恼怒并表示反对。[⑤]其次，两者的关系经常因隔代的冲突而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650页注136。

② G·A·特鲁干：《俄国中部的十月革命》（莫斯科，1967年）第1章；《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10期第15页。

③ 布哈林在自传中和马列茨基在他写的布哈林传记中，以后都没有讲到布哈林是地区局的成员，大概是因为这个组织后来在左派共产党人反对派中所起的作用。关于他是该局成员而且是该局“核心”领导人的证据，见G·洛莫夫：《在风暴和紧张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第10期第166—167页；斯土柯夫的回忆，《莫斯科的十月起义》，N·奥夫西安尼柯夫编（莫斯科，1922年）第40页；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麻省，坎布里奇，1956年）第108页。

④ 丹尼尔斯：《良心》第41页。没有一本关于1917年莫斯科党的令人满意的政治历史。除了本章引用的文章、回忆录和专著以外，可见《苏共莫斯科组织历史大纲：1883—1965年》（莫斯科，1966年）第6章；《莫斯科的十月革命》（莫斯科，1958年）。

⑤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473—474页。争论起因于三个莫斯科党组织（市、区、地区）的重选的管辖权。见《两次革命中的莫斯科》（莫斯科，1958年）第394页。

恶化。到了初夏，地区局已处于1905年的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而且地区局的总部就设在莫斯科市，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布哈林、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洛莫夫、雅柯夫列娃、伊凡·基捷尔施泰因和伊凡·斯土柯夫。除了雅柯夫列娃是33岁以外，其余都不到30岁，比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年轻10—20岁（虽然后来莫斯科委员会也包括了一些年轻领导人）。①

虽然莫斯科委员会中多数人最终支持起义，但它对列宁与左派提出的激进论点始终是不积极的，三心两意的。多数老资格的成员认为，有一个还坚持认为，“不存在这样做的力量和客观条件。”②地区局的领袖们则经常刺激他们的长者，直到10月还在担心莫斯科委员会中的“和平情绪”与“重大动摇”会在“决定性时刻”成为致命伤。③结果，尽管莫斯科有些老布尔什维克给于激进的支持，但年轻的莫斯科人总认为莫斯科的最后胜利是他们个人的成就，是他们一代的绝招。正如奥新斯基后来指出的那样，他们把夺取政权的斗争引向“反对莫斯科很大一部分老一代党干部所表

---

① 在1917年的不同时候地区局中还包括其他的杰出领导人，其中有安德列·布勃诺夫（1883年）和索柯里尼柯夫（1888年）。但这七个人构成了它的核心领导。见洛莫夫的自传，《活动家》第1卷第339页；他的回忆录，《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第10期第166—168页；斯土柯夫的回忆录，《莫斯科的十月起义》第40—45页；雅柯夫列娃的回忆录，《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02—306页。在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中（不全是温和派）有：（括号内是出生年）诺根（1878）、米哈伊·奥里明斯基（1863）、伊万·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870）、彼得·斯米多维奇（1874）、伊万·泰奥多罗维奇（1875）、尼·列·莫舍利亚科夫（1866）、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1874）和波克罗夫斯基（1868）。关于其中一些人的传略，见《十月的英雄：莫斯科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莫斯科，1967年）。

② 斯米多维奇的话，引用于《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12期第49页。

③ 雅柯夫列娃的话，《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04页；还引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35年第5—6期第16页。同样，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471—476页和1927年第10期第166—168页。

现的重要抵制。"①

这种同代人的一致感和自尊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06至1910年他们共有的经历和友谊。这种意识使年轻的莫斯科人成为1917年及以后党内一个突出的政治派别。布哈林象以前那样，是他们的高级人物，同其他人有政治上与个人关系上的联系。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洛莫夫、雅柯夫列娃及其同样著名的兄弟尼古拉都是他侨居国外以前的亲密朋友和伙伴。例如洛莫夫就是更有才华的布哈林的"热情追随者"，他对布哈林"怀有爱戴和尊敬的感情"。②关于基捷尔施泰因和斯土柯夫的情况人们知道的不多，他们1917年才来到莫斯科，但在后来的党内争论中成了当地地区局领袖们的忠诚而热情的拥护者。③

莫斯科年长的党的领袖们的权力因为犹豫不决，过分谨慎而减弱，而年轻的莫斯科人的权力和影响则在增长。这个格局在五月初就形成，当时，布哈林、洛莫夫、索柯里尼柯夫（这是1906—1910年的另一年轻朋友）补进了参加莫斯科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从而抵消了这个代表团中的右派的成员。④但是，要对莫斯科党组织的舆论施加影响，就必须控制它的正式刊物。初夏，原来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的1909—1910年的三人团又重新出现，以取得（或夺取）机关报的领导权。他们以布哈林为首，在党的日报《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编辑部里成立了"工作性质的

---

① 《活动家》第2卷第96页。同样，见洛莫夫的评论，《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第10期第167—168页。

② 西蒙·利伯曼：《建设列宁俄国》（芝加哥，1945年）第172页。关于雅柯夫列娃和她的兄弟，见《活动家》第3卷第274—280页。布哈林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俄文版献给在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尼古拉。

③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592页上关于斯土柯夫的注；《第六次代表大会》第451页；《第六次代表大会》（1934年版）第331—332页。

④ 《莫斯科的十月》第143页；《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8期第63页。

三人团”。他们的任命看来无异是推翻了原有四个编辑的领导，这四人自该报在3月份创办以来一直经办这份报纸，而现在则被剥夺了主要的发言权。① 在党的理论刊物《斯巴达克》，也发生类似情况。布哈林成了主编，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成了他的副手；老的编辑则再次沦为“投稿人”的次要地位。②

这些情况的发展置莫斯科党的出版物于年轻的左派手中，使三套车有可能在克伦斯基政府的危机月份中形成布尔什维克的舆论和政策。他们在旧首都日益增长的政治重要性，反映在他们在7月间被选进全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人数上。除布哈林外，还有两名年轻的莫斯科人，安德列·布勃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被选为正式中央委员，而雅柯夫列娃和洛莫夫则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他们对盘据在莫斯科的温和的领导人所赢得的均势得到了正式的承认：一个由布哈林、洛莫夫、李可夫、诺根组成的四人小组被任命主管莫斯科地区的党务。③

同时，年轻的左派的崛起，也反映在布哈林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中日益显赫的个人地位上。党内没有任何一个领袖象托洛茨基掌握彼得格勒的革命政治那样掌握莫斯科的革命政治，但以个人的杰出而言，则布哈林不比任何人逊色。他是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是莫斯科杜马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命运不佳的国家会议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声音成了旧首都激进布尔什维克的主

① 《走向十月之路》第1卷第241页；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历史》第4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223页。另见《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4期第137页；布哈林：《自传》第55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他们的接管成为整个一年中党内磨擦的原因。

② 布哈林：《自传》第55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页；《莫斯科的1917年》（莫斯科，1934年）第66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至1918年2月》（莫斯科，1958年）第6页。

要声音。他在1917年的政治运动中是一名不知疲倦、无所不在的人物，他揭露临时政府的虚伪性，宣传在莫斯科及各省的苏维埃、工厂、工会、学校、街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① 他个子矮小，外表还带稚气，这与他的雄辩的口才颇不相称。那些年中一些观察者曾这样评论他：

“他行动迅速、身材瘦小……双腿站得很稳……。但他语出惊人，妙语如珠，使你惊叹不已……。他踱来踱去，手中拿着什么材料，外衣也不结领扣……他的整个身躯简直都在说话。”

一些敬慕他的目击者，有的倾听他“用恶意尖刻的语言”讽刺挖苦自由派，有的则倾听他在工人集会上谩骂右翼布尔什维克。他们看到“布哈林站了起来，态度粗鲁，讲话逻辑强，语调尖刻挖苦、尖刻挖苦……。人们倾听着，听得两眼闪光。”②

但是如同后来的情况一样，他1917年的名望主要是通过撰写大量文章、社论、文告、宣言（包括党的若干最著名的文件）而得到传播的。他的著作经常在《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巴达克》③ 上发表。他的理论创作也不比过去减少。他解释道：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也不停止他们的理论工作”。④ （人们还会记得：列宁当时也在撰写《国家与革命》）根据这一精神，在夏秋整个动乱过程中，布哈林一直在发表文章，向俄国读者阐述他对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看法。他还从事撰写他一生中唯一的

---

① 关于布哈林1917年的讲演集，见布哈林：《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1917年5至12月的文章和讲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他在1917年的许多活动在各种回忆录、文件和历史材料中有记载。另见维拉·弗拉基米罗娃等著《1917年的革命（大事记）》（6卷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1929年）。

② 马克斯·伊斯门：《爱情和革命》（纽约，1964年）第353页；《莫斯科的十月起义》第56—57页；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纽约，1935年）第253页。

③ 《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巴达克》都找不到。他有些文章收于《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一书中。他在1917年常用K·特维尔多夫斯基的名字写文章。

④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9—10页。

一本历史著作，这就是一本题为《俄国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有关政治时事的通俗生动的书。这本小册子于1917年7月发表，写法仿效马克思有关法国政治的一些著名文章，后来读者很多，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赞扬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革命的最好概括”。①

在以后的年月，人们把1917年看成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生涯的试金石，是决定他在党内地位上升还是下降的关键时刻。在这方面，1917年则确立了布哈林作为党的一个领袖的资格。到了10月，不论哪一代布尔什维克，不管是1905年的老战士，还是地下委员会委员、国际工作者、理论家、编辑、小册子撰写专家、革命官员，只有极少数人才享有他在党内的那种地位。

然而，人们不应因为布哈林的个人地位而看轻了其他年轻莫斯科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胜利中所起的重大、甚至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莫斯科地区局的领袖们，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他们的激进主义激发了党在莫斯科和杜马选举中受到群众欢迎的大胜利，而且对于列宁争取固执的布尔什维克支持10月25日举行彼得格勒起义也起了积极作用。②随后就发生莫斯科起义，这是以地区局领袖们及其同代人为主体的重大事件。

莫斯科起义比彼得格勒政变延续时间更长、流血更多，它受到强烈抵抗，一直延续到11月2日为止。③布哈林为莫斯科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草革命法令，为之写序言和辩护，起义是以莫斯

---

① 布哈林：《俄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莫斯科，1917年）。1918年初出了一本续集。两本集子后来放在一起出版，书名《从沙皇制度的崩溃到资产阶级的垮台》（哈尔科夫，1923年）。关于这个评论者，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496页。

② 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9期第93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第3卷第145—146页；丹尼尔斯：《红十月》第56、65、90页。

③ 除了上面引用的有关莫斯科的材料外，见《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1917年10—11月》（莫斯科，1968年）；S·梅里古诺夫：《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巴黎，1953年）第277—373页。

科苏维埃的名义进行的，而布哈林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新闻公报的编辑。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指挥军事行动的斯米尔诺夫，有洛莫夫和其他两名年轻莫斯科人——尼古拉·穆拉洛夫和乌西也维奇。（奥新斯基当时不在莫斯科。①）在反抗被摧毁、胜利有保证的情况下，莫斯科党组织挑选两名代表正式向彼得格勒新革命政府报告。被选中的两人就是布哈林和斯土柯夫，这象征着地区局和1905年一代人的胜利。②

布哈林及其朋友在布尔什维克激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10月以后仍在产生政治后果。他们正义的战斗性、对谨慎呼声的鄙视以及偶然的宗派性，自然得罪了年长的党的领袖们，这些年长者更因被年轻人推到一旁而感到恼怒。③这种怨恨情绪虽因胜利而暂时得到克制，但后来当年轻的左派不再代表列宁的观点时，它就表现出来了。④同时，年轻的莫斯科人在1917年取得的成功，加强了他们对自己政治判断力的信心，加强了对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有效性的信心。他们不愿意象列宁那样（列宁本人属"老一代"的人），放弃或缓和1917年的最高纲领精神，虽然列宁这样做看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1918年初，他们就成为苏俄的第一个党内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作为反对派领袖，他们坚持认为导致取得政权的激进主义同样适用于党对政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3—274页；《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165、313页；布哈林的文章，《真理报》1928年10月25日第5版；弗拉基米罗娃：《1917年的革命》第5卷第173页；《莫斯科的十月起义》第23、39、237页；梅尔古诺夫：《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第170—173页。

② 弗拉基米罗娃：《1917年革命》第6卷第89页；《莫斯科的十月起义》第44—45页；布哈林：《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第170—173页。

③ 年轻的莫斯科人显然形成了在正常的党的渠道以外非正式地集会的习惯，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04—305、320页和1927年第10期第168页。

④ 虽然布哈林看来较少生气，但他后来也感觉到这种强烈的反应。例如，见奥里明斯基对他的攻击，《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47—251页。第3章中将讨论这一点。

权的运用，而这些问题在1917年实际上却被忽视了。

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团结和思想一致的党的神话的核心，是认为布尔什维克上台掌权时有一个事先考虑好的、明确的改造俄国社会的纲领。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党内在后来十二年中所以发生激烈争论，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一事实。实际上，他们上任时并没有一个有关在落后的农民俄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有意义的（更没有一致同意的）纲领，他们最终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希望改造社会，希望“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这些都是愿望与许诺，并不是可以有效地实行的计划或经济政策。

在2月至10月间，党在议论未来的纲领的时候，讨论内容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列宁在这方面带了头。在国内政策方面，他答应成立一个由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拥护的，并为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做事的“公社国家”、苏维埃共和国和社会主义政府。（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后来才把这一点解释为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在对外政策方面，他答应俄国不再参加欧洲战争，在外交上对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敌对态度，主张对它们进行革命战争，并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与此同时，列宁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是简陋的、不经常的、偶然的，总共提出了三项一般性建议：实行银行与辛迪加国有化、实行土地国有化，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管理。① 这三项建议提得很笼统，连布尔什维克也都解释各异，② 而且涉及的不是改造与扩大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是经济监督与调节。的确，

---

① 见列宁的四月提纲和《论修改党纲》，这篇文章是在政变之前不到三个星期写的。1917年的党纲实际上比列宁的四月提纲多不了什么内容。见布哈林：《十月革命的纲领》，《真理报》1929年3月23日第2版。

② 见奥新斯基认为工人监督可作两种解释的话，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3卷集，纽约，1951—1953年）第2卷第60页。

布尔什维克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很敷衍了事"，这使一位孟什维克观察家感到惊讶。他说："连经济纲领也没有提及……。这种落后现象，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构，这种极端疲惫、混乱的局面如何能与社会主义的改革相协调……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简直几乎完全把这点忘了。"有一个刚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抱怨说，十月革命没有经济纲领，这方面"几乎是空白"①。

布尔什维主义(它公开宣称是一个忠于教条的运动)上台时为什么没有一个连贯的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纲领？这有几个原因。1917年以前，党几乎完全致力于进行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而没有考虑看来似乎是遥远的社会主义的政权问题。二月起义使它的领袖们感到惊奇，他们把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用来争论夺取政权的前景而不是如何使用这个政权。其次，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来指导他们对待起义后出现的问题的思想。马克思本人就曾认为经济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他既未谈到社会主义者在搞现代化方面的作用，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未予承认。而且，他一般都不肯具体地猜测资本主义以后的时期的情况，这种传统被他的门徒认为是合适和应受尊重的。其三，列宁对讨论未来的问题采取了吹毛求疵的态度。他喜欢拿破仑的忠告："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后来，他确认1917年布尔什维克就是按此行动的②。有几个布尔什维克偶尔想事先思考未来的问题，但列宁不愿这样做，所以也就妨碍他们去思考。比如说，1916年初，布哈林曾赞扬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最新纲领，纲领提出了把银行与大工业收归国有、实行累进税制、福

① 苏哈诺夫：《俄国革命》第1卷第284页和第2卷第420—421、554—5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5页。另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他在政变之前只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在那里警告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上战场别吹牛"。

利立法、八小时工作日等一系列温和的要求。列宁愤怒地指责布哈林说："既然目前……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开始，提出荷兰人的纲领是荒谬的。"①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充分说明为什么象布哈林这样独立思考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认真考虑经济纲领，布哈林实际上同列宁一样，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国内政策危机没有思想准备。这里有更深刻的问题，涉及到胜利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很快就要面临的重大难题。布哈林虽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知道俄国是个极端落后的社会。②这两者如何协调呢？对于他和布尔什维克的一般领导来说，当时（以至后来若干年内）的答案是设想俄国革命与先进欧洲国家革命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布尔什维克没有去面对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对国内会有什么含义的问题，却回到一种假设（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应受尊重的真理）上，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资产阶级革命，将是一种国际现象。他们争辩说，俄国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成熟性会因来自西方的同志式的援助和支持而得到抵销和克服。这种纲领上的逃避主义，比别的任何因素都更模糊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日后的经济现代化及其他国内问题的思想。

这种逃避主义在1917年布哈林的思想中表现得特别（虽然不是独有地）清楚。他在沙皇下台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问道：俄国的弱小的无产阶级如果取得胜利，将如何对付一个落后的农民社会的经济与组织问题。他回答说："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将扩展到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迟早要导致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换句话

① 甘金和费希尔，《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第230、231、398页。

② 见他的一些评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第69、137页；《新世界》（纽约）1917年3月27日第4版；《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第144—147页。他后来回忆说，同西方城市相比，"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象一个破旧的村庄"，《真理报》1927年1月15日第3版。

说，经济问题在内容上属于国际范畴，因为国际革命会导致单一的"兄弟经济"。[1] 布哈林这种推理在1917年的事态过程中依然未变。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后的两天，他再次重申这个论点，而且比以前更明确。他说："国际革命不仅意味着单纯从政治上加强俄国革命，而且意味着从经济上加强它。"他一方面谨慎地谈到俄国革命的"巩固的"、"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他对处于孤立状态中的社会主义俄国的前途的估计也是不含糊的："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的持久胜利……是不可思议的。"[2]

由于把俄国未来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成功的起义上，国际革命的理论就分散了布尔什维克对国内现实的注意力，使他们看不清提出工农业纲领的必要性，而使他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西方事变上。其结果是产生了党在1917年的基本信条之一：相信革命战争，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革命的俄国可以通过革命战争打破它的孤立，获得通向欧洲先进工业国的生命线。正如布哈林在夏天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许诺的那样：

"在胜利的工农革命前面，有一个宣布革命战争的问题，即武装支援尚未胜利的无产者。这个战争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成功地整顿好被破坏的经济肌体，我们可以转向进攻。但如果我们不能集中力量进行进攻性的革命战争，那我们将进行防御性的革命战争……，这是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进行的神圣战争，这将响起要兄弟们拿起武器的号召。通过这样的革命战争，我们将点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3]

革命战争成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的正式的有机组成

---

① 《新世界》（纽约）1917年3月27日第4版。

② 《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第146页；《阶级斗争》（纽约）1917年第1期第21页；他的《从沙皇制度的崩溃到资产阶级的垮台》第7页。

③ 《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04—105页。

部分，主要原因是它取代了缺少的改变社会、发展经济的纲领。①

看来没有那一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比布哈林对欧洲革命的前景感到更加困惑的了。仅举一例，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提出的关于旧秩序的理论模式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的社会形态。② 布哈林在 1917 年曾强调指出，这种模式离开俄国现实还很遥远，当时他偶尔地、很不恰当地提及革命性越来越强的俄国农民。7月间，他争辩说，战争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集中与集中化，使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很快就不再起多大的作用了。③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正在改造俄国农村，正在分田地，并把小农树立为农村的主要人物，正在深化俄国农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毫不奇怪，布哈林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很少考虑到俄国的起义农民和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他认为农民是一个“有财产的集团”，只愿为“保卫他们的土地”而战斗，因此，他和多数布尔什维克一样，把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看成是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有奋起争地的农民的参加；第二阶段——农民因已得到满足而背弃革命，只有无产者和西欧无产阶级支持俄国无产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意味着1917年的两次起义——农村的与城市的——必然会分家，而由于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原

---

① 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所号召的革命战争在七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写进了党的决议。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即斯大林，对革命战争的可行性和对俄国的含义提出了疑问。《第六次代表大会》第250页。

② 从他1917年5至9月间在《斯巴达克》上发表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可看得清楚。虽然无法找到《斯巴达克》，但他的文章是广为讨论和引用的。见《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第27—29、37页。

③ 《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03页。同样，见布哈林的话，引用于N·列叠和S·波克罗夫斯基：《右的偏向的思想根源：关于布哈林的错误和偏向》（第2版，列宁格勒，1930 年）第 12 页。

则分歧”，必然会发生冲突。[1]这里，欧洲无产阶级又被认为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后来布哈林修正了这种不高明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发现两个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单独的偶然起义的（两个）组成部分，这种修正构成他二十年代思想中相当大的部分。但他在1917年的思想，只有助于使布尔什维克面临的难题更加复杂化。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布哈林未能在取得政权前考虑到经济纲领，这成为后来发生的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提供了党在十二年内寻找与革命雄心和社会主义信仰相适应的可行经济政策的一个舞台。它也预示着这种探索必然会发生严重分裂，表现为在基本原则上缺乏一致意见。特别是，它为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生涯中探索他的中心主题提供了舞台，也就是不断努力去制订一个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理论。他作为党的主要理论家对这项任务是没有多少准备的，这可以很快从他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这件事看出来。这件事表明：他除了革命战争以外，对一个突然在俄国执政的党提不出长期的政策。

布哈林的著名的左派共产主义因素在 1917 年已经存在，但有一种说法应予纠正，这种说法把他描绘成积极支持 1921 年以前的极端政策的教条主义代表。很明显，无论是布尔什维克的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不是从容易应用于国内政策方面的教条开始的；临时对付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正如我们以前所曾看到的那样，布哈林在性格上也不是不能接受温和与妥协的做法的。所以会产生即使在 1917 年他也“比列宁更左”的谣传，很明显是因为误会了他们在如何修改党的 1903 年纲领问题上进行的简短的书面论战。[2]布哈林要用反映他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新的说法，取代原

---

① 《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02—103、138页。

② 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248页；另见梅尔古诺夫：《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第316页。

来党纲中对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说明。列宁则认为原来的说明仍然是恰当的。虽然这个争论突然暴露出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而且也在较小程度上恢复了对自决问题的争论，但这并未涉及党的实际政策或策略，对此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①

再说，即使在1917年，也不断有证据证实，布哈林的激进主义并不排除采取现实的温和态度与妥协。比如说，1917年7月发生流产的示威游行时，地区局有些领导人要求举行起义，其中就没有他。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对促使温和派与激进派发生分歧的若干策略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贯左倾的。在有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中间立场，拒绝支持“这种或那种倾向”；在别的问题上，他不顾左派的反对意见，认为俄国的革命高潮已经暂时减退。他甚至愿意修改他关于革命战争的提案，以便迎合那种怀疑俄国是否有能力发动革命战争的思想。② 在9月间的一个重要场合下，他明明白白地不如列宁激进：他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投票拒绝（并烧毁）列宁要求立即起义的信件。③ 最后，他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后两天发表的一篇措词谨慎的文章中，并没有因为胜利而趾高气扬，却冷静地看到了前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他警告说：明确的解决办法不是唾手可得的；党总会犯错误。④

---

① 当最后草拟了一个新的纲领并在1919年通过的时候，他们的分歧就解决了。布哈林的建议是在《斯巴达克》1917年第4期上提出来的，这本杂志无法得到。关于列宁的观点和对于对立意见的讨论，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46—57页。关于1917—1919年的纲领讨论，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第35—40页。

② 《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03、137、202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19页。

④ 《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时期》第144—147页。也应指出布哈林就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问题提出的妥协建议。在11月29日（12月12日），他建议与其阻止会议的召开，不如把立宪民主党人开除出去，由左派党开一个“革命会议”。他希望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会取得多数，这将满足群众中对立宪会议的广泛支持。《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9—150页。

在布尔什维克实行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布哈林采取这种务实的温和态度的可能性，被对外政策方面的激烈争论所缩小并减弱了。后来，当布哈林了解到党面临的国内问题，了解到长期的社会动乱所带来的创伤时，这种温和态度就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石。而在当时，除了没有重视成立布尔什维克政府后可能出现的国内问题以外，他还没有计算过他后来所说的“革命代价”。特别是他没有预见到三年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更加剧了四年欧洲战争与革命对俄国造成的破坏和痛苦。他尤其没有预计到付出人的生命的代价。反映在他十月革命前的著作中的尚未定形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只考虑到“剥夺剥夺者”，指望财产的易手和财富的再分配，而未考虑到进行破坏掠夺的军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莫斯科的流血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单是布尔什维克就死去五百人，而在彼得格勒总共才死去六人）①，可能已使布哈林警觉到将要付出的“革命代价”。当斯土柯夫和布哈林抵达彼得格勒报捷时，斯土柯夫是这样回忆他们的情绪的：“当我开始谈到牺牲人数时，我觉得哽咽难言，说不下去。我看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扑到一个带胡子的工人的胸口，两人抽噎起来。人们开始号哭。”②真正的革命开始了。

---

① 丹尼尔斯：《红十月》第207页；《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6期第21页。

② 《莫斯科的十月起义》第45页。

第 三 章

国内战争的政治

当希望与梦想的魔怪在大街上游荡的时候，胆怯的人就一定会把门锁上，把窗户关上，并且埋伏起来，直到怒潮过去为止。因为希望，不管如何高尚和温柔，它与随之而来的行动总是十分不协调的。这好象身上披满长春藤的少女同身戴花环的小伙子就是预示着《启示录》* 中四个马夫的来临。

——埃里克·霍弗：

《真正的信仰者》

从 1918 年到 1921 年国内战争结束，布尔什维克同俄国和外国的反对革命的军队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使苏俄政府生存下来。这种激烈的经验对于这个专制的党和新出现的政治制度所发生的影响，无论如何也难以过高估计的。因为这不仅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而且造成苏维埃政治生活的普遍军事化，制造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称之为“军事苏维埃文化”① 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内战结束后仍然继续存在。同样重要的是，到了 1918 年中，政治生

* 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最后一章。——译者注

① 奥新斯基的话，见《俄共(布)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 年 3—4 月，会议记录》(莫斯科，1960年)，第115 页。

存这个目标已同另一略少消耗精力的目标交织着，这就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而相当强制性地改造苏维埃社会。虽然这种实验也已经结束，但它也影响以后多年的政治事件。

党在一开始既没有军队，又没有纲领，它对这两项挑战都没有准备。三年来，它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不时提出方针和解决办法，革命的意义与"保卫革命"几乎密不可分，党的领袖人物的言行既受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的影响，也受他们尚未完全形成的关于应该做那些事情的概念的影响。布哈林也一样。军事上的权宜考虑与思想信念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从1918年到1921年的政治与思想，这就是他在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1920年他在理论上对党的战争政策的颂扬，以及他在1920至1921年随着这些政策的失败而产生的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党内激进主义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布哈林和年轻的莫斯科人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最初几个月中享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他们几乎毫不迟疑地给列宁提供了他所最需要的支持。这时，右派布尔什维克同不曾反对起义的若干党的领导人一起，要求成立一个代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在布尔什维克中，反对列宁坚持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主张的情绪很激烈，包括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和近半数的人民委员会委员都持这种反对意见。①

列宁最后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又是部分地依靠莫斯科左派。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被提名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新选出的立宪会议，取代了反对解散这个会议的党内温和派。② 布哈林在

---

① 丹尼尔斯：《良心》第63—69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0—161页。另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476、485页。

1918年1月初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党讲了话。他回答了占代表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挑战，表达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决心单独行动的情绪。他指责其他社会党参加了声名狼藉的临时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分界线："同志们，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把本届整个代表大会分成两个互不相容的阵营，原则上不同的阵营——支持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阵营"。①

他们对列宁的最高纲领的支持使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获得了关键性的职位，特别是布尔什维克认为是最重要领域的经济机构中的职位。1917年11月，布哈林被委派起草国有化的法规和关于建立一个指导国家经济生活的机构的法规，这些法规均在12月获得批准。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②原先同斯米尔诺夫一起领导新的国家银行的奥新斯基，成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后来布哈林和斯米尔诺夫也和他一起参加了该委员会的执行局。与此同时，担任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司法委员的洛莫夫主持监督莫斯科各银行、企业的国有化，以及"莫斯科及莫斯科地区整个政权机构的改组"。1918年1月他也参加了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团，不久就成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当委员会出版正式的期刊时，担任编辑的是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和洛莫夫。③看来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一定认为，苏俄的经济领导权已置于年轻的莫斯科人手中。

---

① 《全俄立宪会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0年)第25、29页。

② 《十月革命法令》(2卷集，莫斯科，1933年)第1卷第226页；E·N·戈罗杰茨基：《苏维埃国家的诞生：1917—1918》(莫斯科，1965年)第242—243页。该书是同米哈伊·萨维列夫合著的。另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73—74页。

③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74—75、86页；《活动家》第1卷第339页和第2卷第96页；M·P·伊罗什尼科夫：《苏维埃中央国家机关的建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66年)第49页。

他们集体的显赫地位反映了布哈林在党内日益增长着的权威。证明这一点的是他在立宪会议上作为布尔什维克发言人的角色和他在草拟执政党最初一些政策声明中发挥的作用。①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的财经政策方面"依靠布哈林，这清楚地证明这个后来意见如此分歧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使他们分开。的确，1917年11月27日(公历12月10日)，列宁建议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皮达可夫组成一个负责"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的小组委员会。这一提名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其突出理由是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迫切需要布哈林。列宁坚持认为，经济政策这个极端重要问题需要象布哈林这样"内行、能干的人"的充分注意，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因此布哈林就当了《真理报》编辑，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了十二年，中间只有过一次短促的中断。②

当时一开始，布哈林就和年轻的莫斯科人在组织和领导新的党-国家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③但1918年初，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官方政策的集体影响，突然变成对列宁及其党内新盟友的集体反对。争论的问题在于列宁决定同德国签订单独的、苛刻的和约，以结束俄国对欧战的卷入。

要了解布哈林在人们称之为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中的作用，就必须了解这个运动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18年1月至3月初，它主要反对列宁的和平建议，而另外主张对进犯的德军进行

---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96页注80。(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一文的题注。注中讲到除列宁外，布哈林和斯大林也参加了宣言的起草工作。——译者注)又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莫斯科，1959年)第435页。

②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74页；《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52—153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88页注49。(注中讲到当时列宁提议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三人为《真理报》编委，其他人都不同意。最后多数决定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布哈林为编委。——译者注)又见《真理报》1922年5月5日第7版。

③ 伊罗什尼科夫：《苏维埃中央国家机关的建立》第207页。

革命战争。当时，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站在左派共产党人与列宁之间，他们既反对条约，又怀疑军事抵抗的前途，于是就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含糊公式。这一阶段的左派共产主义以失败告终，因为二月下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三月初在第七次党代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得到批准。运动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左派把火力转向列宁的经过修改的经济政策。布哈林在这两个阶段的作用是不一样的。①

他是反对和约、主张革命战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他代表这个派别在三月党代会上的最后辩论中发了言。② 这样，有两个月的时间，二十九岁的布哈林当上了苏俄历史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首领。在争论期间，反对和约派好几次博得多数省市苏维埃、几个最大的党组织、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支持（只要托洛茨基派和左派一起投票或弃权），还可能得到过半数的一般党员的支持。就是在决定性的投票中，列宁也未能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弃权，才使他有可能取得比左派多的票数。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表决——30 票赞成和约，11 票反对，4 票弃权——并不反映反对派在党内所获得的真正支持。③

有几个因素使布哈林成为反对派的自然领袖。用保证要对欧洲资产阶级进行"圣战"的允诺加以表达的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无比仇恨，是党的起义计划中的激动人心、受到群众支持的一个部分。

---

①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的历史，见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 6、8 章；丹尼尔斯：《良心》第 3 章。

② 《俄共（布）党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1918 年 3 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 年）第 24—40 页。布哈林，他的同时代人及苏联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关于他所起的主导作用，看法是一致的。

③ 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 100—101、130 页；丹尼尔斯：《良心》第 75—77 页；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历史》第4卷第 299 页；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 383 页；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列宁》（伦敦，1966 年）第 44 页。

列宁抛弃了这个诺言，也就离开了布尔什维克的左派，而靠拢了1917年反对和抵制过他的路线的布尔什维克。[①]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派就处于群龙无首的地位，需要有一个高级人物保卫他们被背叛了的理想[②]。这方面，布哈林比谁都更合适，因为他早在争论之前，就已经同革命战争思想密切地联系着，在无条件反对和约的七个中央委员——他本人、布勃诺夫、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莫伊塞·乌里茨基、洛莫夫和雅柯夫列娃——中，只有他在党内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个领导人。

如果说布哈林对于接过革命战争的旗帜还有什么保留的话——有旁证表明他在二月中以前没有完全支持这种思想——，[③]那么，他一代的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他的莫斯科朋友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态度，也许打消了他的保留。早在12月28日（公历1月10日），莫斯科地区局要求"停止同帝国主义德国的和谈，同一切国家的一切外交强盗断绝外交关系"。由于1917年冒险行动的成功，年轻的莫斯科人骄傲起来，根本不愿妥协让步。他们向列宁挑战的决心，自然刺激了布哈林。当时布哈林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取得胜利的经验（"当时我们是在没有有组织的部队的情况下前进的"），对今天的形势仍然是适用的。[④]左派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让怀疑者回顾"十月教训"的习惯，在下一个十年中将成为党内争论的一个通常特征。

---

① 列昂·托洛茨基：《列宁》（纽约，1959年）第108页。

② L·斯图波钦科：《在布列斯特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4期第97页。

③ 见他在《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一书第247—248页上的模棱两可的讲话。在一月初和二月中之间他的立场有所改变。列宁曾于2月18日说，"布哈林没有注意到他已转到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去了"。列宁这段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列宁的话引用于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1页。

④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34、299页。

在整个过程中，长期以来个人的、世代的和政治的关系，对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布哈林的领导发生着明显的影响。虽然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全国党组织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但莫斯科，特别是莫斯科地区局，却成了“左派共产主义的堡垒”。① 1917 年该局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布哈林、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洛莫夫、雅柯夫列娃、斯土柯夫和基捷尔施泰因）总是处在第一线。布哈林—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三套车（此时加上卡尔·拉狄克）的又一次出现，说明了这个运动的悠久历史根源。这个三套车最早是在 1909 年作为反对派的刊物《共产党人》（由地区局出版）的编辑部而出现的。② 当左派共产主义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时，莫斯科地区局就作为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组织中心”而发挥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尽管它在全国有它的力量，但它是一个发源于莫斯科的运动，布哈林是它的土生土长的领袖，他周围则有一批政治上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布哈林在 1906 — 1910 年担任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时期以来认识的。这样就很可以理解，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意见后来就被称为“莫斯科观点”。③

人们再次感觉到了新的一代人的思想基调。在左派共产主义者中也有几位党的老一代人物——其中包括波克罗夫斯基和伊凡·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这两名比较德高望重的人物——

---

① 安德烈·布勃诺夫，《联共（布）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1年）第651页。

② 《共产党人》开始是在彼得堡出版的，在那里由布哈林、乌里茨基和拉狄克担任编辑，从3月5日至19日共出了十一期。它在莫斯科是作为“莫斯科地区局的机关刊物”重新出版的，从4月20日到六月初共出了四期。

③ 《反苏的“右派和托洛茨基派集团”案：法庭审讯报告》（莫斯科，1938年），第482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版，第22卷，第609页，注128（系对列宁于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写的《奇怪和荒谬的》一文的题注。注中指出莫斯科地区局起了“左派共产党人”的组织中心的作用。——译者注）；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135页；《列宁文集》第11卷，第46页（俄文版）。

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但反对派的领导则是异常年轻的；以 1917 年莫斯科分成左右两派的局面为特征的分裂此时正在全党蔓延。当血气方刚的年轻的左派向列宁和他所依靠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的时候，列宁这个领袖采取头脑清醒的老政治家的立场，利用反对派领袖们的年轻来反对他们。他讽刺“年轻的莫斯科人”说：“这一派人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年轻。”莫斯科人也同样了解这是两代人的争议问题。布哈林在七年后回顾这次争论时是这样描绘他自己和他的盟友的：“我们‘年轻人’、‘左派’……”[①]，当时在一些重要方面，左派共产主义也就是以布哈林为首的 1905 年这一代人（布哈林号称为它的领袖）的反叛。

的确，争论中那种父与子的因素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反对派最后遭受失败。在反对和约的政治力量达到最高峰时，左派共产主义者代表了一个热情的群众运动，也许代表了党内的多数。虽然德军的威胁不断削弱了他们的立场，但他们的失败确实是领导上的无能，而不是缺乏群众支持。比如说，参加布尔什维克以使原来的政府具有联合政府形式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反对和约，并且支持组成一个新政府来取代列宁的政府。左派共产主义领袖拒绝这样做，这部分地是由于对党的忠诚，同时也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可供选择的领袖。[②]布哈林尖锐地指出：列宁的政策“对革命是个致命的”，多数人是反对他的。但当他的一个熟人问他为什么没有采取反对列宁的决定性行动时，据说他大声地说：“难道我这样的人物有成为一个党的

① 《列宁文集》第11卷第47、48页（俄文版）；布哈林的话，见《真理报》1925 年 1 月 21日第 1 版。当列宁称左派共产党人是“早熟的左派社会党革命家”时，布哈林回答说：“那末列宁是我们的爸爸”。《列宁文集》第11卷第85页（俄文版）。

② 关于这段不太明朗的插曲，见1924年1月 3 日《真理报》上的一些报道；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117、142—144页。

领袖和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宣战的资格吗？不，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①

尽管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是团结的，但它的领袖们的政治倾向并不统一。特别是在争论发展过程中，布哈林同更极端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奥新斯基和斯土柯夫之间的重大意见分歧就开始暴露出来。② 由于和约问题的尖锐争论，这些分歧一度被掩盖了起来，但后来在反对派的第二阶段中，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列宁也不总是同意他的支持者的意见。比如说，他明显地不象那些主张签订和约但看不到西方有什么革命的前景，而且已经在歌颂俄国的革命领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那么悲观。虽然列宁和布哈林互相进行指责，但他们都同意同一个总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不能渡过难关。”③ 使他们真正发生分裂的，是别的问题。

历史学家通常把布哈林主张革命战争，说成是他的愚蠢，这是由于感情冲动和思想信仰而产生的“自杀性”、“莽撞的”建议而不是冷静的判断。但布哈林多次坚持说，他的结论与列宁的结论不同，是经过“冷静而仔细的分析”以后才提出来的。④ 事实上，布哈林的论点是两种要素的结合，既有皈依于他信奉的理想的感情，又有基于俄国条件的推理。他反对和约的激情的、唐吉诃德式的特点来源于他这样一个信念：欧洲革命迫在眉睫，没有欧洲革命，布

---

① 引用于沃林：《1917：被出卖了的俄国革命》（纽约，1954年）第 97—98 页。

② 见奥新斯基对布哈林的反对意见，《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07—108 页。此外，布哈林明显地不同意洛莫夫想把列宁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意见，也不同意乌里茨基把论战同过去的争论联系起来的愿望。见他们的讲话，《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243、249、267 页。最后，见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讲话，《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44—45、248 页。

③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第3卷第392—393页。另见布哈林的讲话，《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31 页。

④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32—33 页和 25—26、104 页。

尔什维克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同意这个观点，但布哈林赋予了这种观点以极大的迫切性："俄国革命要末就由国际无产阶级所挽救，要末就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看不到别的可能："一切都要看国际革命是否取得胜利……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才是我们的生路。"①

根据后来的争论，很有意义的是布哈林解释这个极端的命题时不是讲俄国的经济落后，而是讲外国的军事威胁。他对外部的威胁比列宁描绘得还要触目惊心，他干脆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反感，必然会使西方交战各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变俄国为它们的殖民地"。他认为"许多事实说明两大敌对联盟已经取得协议。"列宁强调的是正在进犯的德军的直接威胁，布哈林担心的却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这种联合会使单方面和约变得毫无意义。他坚持认为只有一个国际革命战线才能抵挡必然会形成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俄的统一战线。②

对于布尔什维克能否继续生存的失望心情——它在1918年初在党内十分流行③——以及对于即将爆发的欧洲革命的信念，促使布哈林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只是国际运动的"一支支队"而已。而且，多数布尔什维克都承认有这种观念。但布哈林还暗示应把更广泛的运动放在优先于俄国"支队"的地位。他受到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罢工和群众骚乱的鼓舞，要求苏俄用英勇的对抗行动，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去支持欧洲革命。而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德国进行谈判，就意味着"拿国际运动做赌

---

①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24、31页。

② 同上书，第27—29、258—259、261、263页。

③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第3卷第392页；李伯曼：《建设列宁的俄国》第24、69页；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25页。

博"来"保存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争论的问题不在于俄国的微不足道的军力，而在于俄国革命的象征。玷污俄国革命的旗帜就是破坏国外的革命，按照德国提出的条件停止对外国的革命宣传，就是窒息"正在全世界鸣响的钟声"，就是要"割断我们的舌头。"①

布哈林相信苏俄影响欧洲事态的力量来源于它的理想，而不是它的军队，由此产生了他那种最唐吉诃德式的姿态。二月，出现了协约国愿意向俄国提供供应以继续抗击德国的微小机会。当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时，列宁与托洛茨基都促请中央接受，但布哈林反对，认为这"不能接受"。他要求进行革命战争，但不能要"帝国主义的支持"。当动议通过（6票对5票）时，据说他大喊大叫："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把党变成粪堆。"② 列宁愿意个别地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是想同它们暂时共处。而布哈林则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和平共处……"既不可能，也不合适。最后的清算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我们一贯说……俄国革命迟早要同国际资本发生冲突。这个时刻现在已经到来。"③

有两个没有讲出来的考虑可能也影响了布哈林，使他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西方革命上。其一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认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外部战争的紧张局势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这种紧张局势现在出现了，布哈林可能担心，如果敌对行动缓和下来，就会使"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得以稳定下来。其二，象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在欧洲战争的不断的大屠杀中看到了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

---

①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26、31—32、35、100、243、292、321页。

② 同上书，第263—264页；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第389—390页。

③ 同上书，第24、29页。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因而它是“拯救人类文化”的希望。① 对于布哈林来说，使革命国际化，不仅能使苏俄得救，而且使整个人类得救。如果提议用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听起来有矛盾的话，那么它就象诗人肯尼思·帕琴* 所表达的感情：“让我们公开地发疯吧，我的同代的人们！让我们跟随这个该死的年代的足迹前进吧……”

当布哈林提出的问题是在号召进行世界革命的时候，他使用大量革命词藻。但是，他的论点的中心是一种强有力的逻辑，这种逻辑来源于俄国条件和俄国革命性质。这涉及他对革命战争性质的认识，这是同“喘息时机”的概念相对立的，这种喘息概念到了二月就已经成为列宁提出和平建议的实际理由。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的残余部队不能与德国的战争机器作战；俄国首先需要组织意志整饰力量。他希望和约能提供必要的时间：“我要让出空间……以争取时间。”②

但列宁和布哈林说的不是同一种战争。列宁想的是常规军事行动，是传统战斗中组织严密的部队互相对抗的情况。布哈林设想的却是很不相同的东西，实际上是游击战争：

“列宁同志认定革命战争只能是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规则决定胜负的大军队之间的战争。我们则认为，我们一方的战争——至少在初期——将必然具有游动支队的游击战争的性质。”③

---

① 《国际经济和国家的斗争》，载于《新世界》（纽约）1917年8月17日第4版。这过去是，以后仍然是布哈林著作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例如见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载于《真理报》1922年11月7日第7版。

* 肯尼思·帕琴（1911—1972）美国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早期的诗作，使他属于三十年代的社会抗议作家的行列。——译者注

②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09页；另见列宁向代表大会的讲话，该书第7—24页。

③ 引用于V·佐林的《党和反对派：反对派（左倾共产主义者派）潮流的历史》（莫斯科，1925年）第72页。

列宁寻求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的休战。布哈林则认为这样短的时间，俄国既不可能修复它的运输系统，建立供应线，也不可能重建军队，因此"喘息机会"在军事上的好处只不过是"幻想"。①

布哈林争辩说，如果说苏俄没有可能建立一支常规军队的话，它却有可能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那将是游击队，这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群众将逐渐被吸引到我们一边，而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则相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进一步瓦解的因素。"开始，严重的失败是可能的，但是，他继续说，即使大城市的陷落也不会使革命失败。苏维埃权力不仅在于人民委员会，而且在于无数的工农地方组织："如果我们的权力真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话，那末，帝国主义者就必须到每一个大工厂和小工厂、每一个大村子和小村庄去挖它的根子。如果我们苏维埃政权是这样的政权的话，它就不会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沦陷而消亡……"布哈林对列宁关于俄国农民这个占人口多数的阶级不愿打仗的论点没有展开争论，但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当农民看到他新得到的土地受到威胁时他会战斗的："当这些农民听到、看到并了解到他们的土地、皮靴、粮食被夺走——这是唯一的现实前景——时，他们就会卷入斗争中去。"有人说农民的和平情绪，排斥了革命战争。布哈林回答道："但正是这些农民将拯救我们……"②

布哈林关于非正规的游击部队能包围并击败正规的入侵武装部队的概念，反映他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群众基础的信念。这种概念也预期苏联会在二十年后再次抗击另一支德国军队，也预期在其他农民社会中成为家常便饭的那种游击战争。甚至到 1918 年，当布哈林的事业走向失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判断仍是有价值的。

---

①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26、29—31、34—35、104—105、266 页。

② 同上书，第 26、33—35、105、107—109、261 页。

那时候，乌克兰农民以类似的方式抵抗着德国军队。布列斯特和约也并没有带来列宁所希望的那种缓冲；结果不得不在战斗过程中临时建立一支苏联军队。[1] 最后，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终于证明了布哈林所强调的设想：只要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就会保卫革命政府。

主张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主要由农民参加的游击战争，这反映出布哈林思想中的一个新要素。过去，他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把农民看作在社会阶级上是落后的阶级，认为当革命深入发展到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支持革命。现在他好象考虑到了 1917 年的主要（而且是违反传统观念的）事实——即一场即使没有超过也相当于城市革命的土地革命。布哈林在 1918 年指望农民"拯救我们"的时候，暗示他既没有忘记也不会鄙视农民的阶级作用，虽然他把农民的这种作用作为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的修正了的认识的一部分重新加以解释，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三月初布列斯特和约得到通过，左派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就此结束。在后来的整整两个月期间，争论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激怒了的反对派转过来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放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初期经济政策的建议。这些政策本身就是比较温和的。除了有限的国有化外，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消灭住房与食物分配上的不平等，规定了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结束了土地私有制，当然也肯定了农民占有新土地和在新土地上劳动的权利。开始，布尔什维克的政

---

① 这两点都是约翰·埃里克森提出来的，见《苏联的最高指挥部》（纽约，1962年）第 27 页和第676页注11。另见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88页。也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布哈林后来曾说，列宁指出"喘息时间"的好处是对的。见《真理报》1918年10月 11日第3版。

治激进主义并没有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党在这个领域仍然是慎重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改良主义的。①

开始，这些最早政策中有两项——工人管理工业企业和有选择的国有化——从党的观点来看，是把权宜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很协调地结合了起来。这些政策既从法律上批准了1917年的工厂夺权，也完成了党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许诺，同时又打击了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治、经济反抗。但到了1918年3月，它们把经济混乱同四年的战争与革命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地搅和在一起，使俄国的工业生产进一步瘫痪。

列宁以他特有的果敢对这种日益恶化的局势作出了反应，他在1918年4月初宣布他决心改变方针。他的计划要求结束国有化和财产剥夺，而同大的私人资本实行妥协。新的经济秩序依靠有限的国家所有制，而同时保留大多数企业的私人占有和经营（或公私合营）。苏维埃国家通过财政、政治手段调节私营成分。列宁申辩说，他的政府要继续存在就需要同大资产阶级进行技术合作，结束革命的破坏阶段，重建经理的权威。要对地方苏维埃实行集中的控制；要用劳动纪律取代工人监督。列宁恢复经济的决心是坚决的；要恢复工资奖励。总而言之，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需要"中止对资本的进攻。"②

列宁为他的建议寻找了一个概念上的定义，把他设计的混合经济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楷模就是德国战时的经济。他争辩说，国家资本主义对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国来说，是一个大进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

---

①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35、55—88页；莫里斯·多布：《革命以来的俄国经济发展》（伦敦，1928年）第2章。

②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19—253页。这篇文章是根据原先于四月四日提出的建议加以发挥的，关于对他的批评的回答，见第256—259、299—329页。

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是我们的生路；我们俄国有了它，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容易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要求集权、要求精确、要求有领导、要求社会化，而我们正缺少这些东西。我们受到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威胁，而俄国的历史和经济却充斥着这种习气，它妨碍我们采取赖以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步骤。

对列宁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现代有效而集中的工业；如果苏俄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它就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①

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列宁的建议愤怒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论点，从原则到具体对这些建议进行谴责。在这种新政策后面，他们看到了"党的右翼"的怯懦或"求和心理"。他们谴责列宁的一切建议——他的劳动与工资政策、冻结国有化政策、同"工业头目"达成协议的政策，以及他所强调的同私人资本和旧的行政秩序妥协的思想——认为这些建议为"金融资本取得全面优势"大开方便之门。他们预言道，列宁的计划会造成"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使各人民委员拥有最高权力，使地方苏维埃丧失独立性……以及抛弃自下而上的政府，抛弃'公社国家'"等现象。左派嘲弄妥协的论点，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方针：对资产阶级实行无情打击；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动进攻；对工业实行国有化和"社会化"；对地方经济苏维埃实行工人监督并保持其权威；支持贫农反对富农；发展大规模的集体耕种。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提出批评和政策性意见过程中，预计其他左派反对派会提出政纲。他们警告不要走"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毁灭道路"，这样的警告在以后会在党内多次听到。②

列宁 1918 年 4 、5 月间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时间不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 269—272 页。

② 左派的提纲是在四月四日草拟出来的，以《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的题名，刊登在《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 年第 1 期上。

长，但有追溯借鉴的意义，因为它很象1921年以后官方的新经济政策。两种政策都是混合经济的政策，它们把有限的公有成分与大的私有成分结合起来。尽管1918年和1921年的国家情况和经济情况都大不相同，但后来企图在党的思想中把新经济政策合法化的布尔什维克，可以满有理由地指出新经济政策同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① 布哈林后来是最主张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因此他在第二阶段的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采取的立场特别引人注目。

在整个经济争论的过程中，布哈林的政治作用和观点都是含糊的，这说明他已失去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那种狂热的明确态度。在延续了几乎达三个月之久的经济争论中，他仅发表了一篇与争论直接有关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对列宁的政策提出了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反对意见。② 鉴于当时的对抗只是打笔墨官司，并不具有组织上对抗的性质，他的相对沉默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在争论过程中，他写完了一本题为《共产主义纲领》的小册子，显然是要把它作为第一本通俗地说明执政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这本小册子虽然提出了战斗的共产主义的激进愿望，但它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提法却引人注目地温和。这本小册子很成功，它作为官方文件广泛发行，并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出版，这说明它的观点反映了党的思想，包括列宁思想的主流。③

这样，布哈林就不再是左派共产主义的发言人和主要鼓舞者

---

① 见布哈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第133—134页；布哈林的讲话，《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988页。

② 《现代经济的几个基本概念》，《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年第3期。这一期无法找到，但布哈林的这篇文章曾被广为引用，对这篇文章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③ 《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彼得格勒，1918年）；西德尼·海特曼：《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修正主义》第80页。

了。随着和约的被批准，这个运动失去了全国许多地方对它的拥护，而更成为莫斯科的行动。同时，布哈林就退到一边去了，对列宁的建议仅仅偶而发表一些反对意见，而奥新斯基则在经济争论中接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奥新斯基在国内问题上一贯比布哈林更激进，他成为列宁的最不能调和的极端反对者。① 很明显，这个关键时刻，布哈林—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联盟开始宣告结束；奥新斯基与斯米尔诺夫将在下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成为党内反对派的主要支柱。

奥新斯基从1917年12月开始就一直抨击妥协性的经济措施，他现在已成为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他撰写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性提纲，撰写了他们反对列宁的建议的最详尽、最不妥协的檄文。这个文件体现了他的观点，他在4、5月间，甚至在争论结束后很久还不断重复这些观点。他在左派的指责和要求声中调门最高，他激动地咒骂对旧秩序的妥协，反对一切集中权力、劳动纪律，反对雇用资产阶级专家，要求对生产实行最大限度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按他自己的说法，奥新斯基"占据了最'左'的地位"。②

这个时候，布哈林认为有必要"同拥抱我的人脱离关系"。他深切了解经济混乱所造成的困难，他拒绝鼓励其他左派共产主义者

---

① 这一看法同大多数苏联和西方历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他们把布哈林说成是经济反对派的领袖。但是这一看法为苏联的基本材料所证实。见A·西多罗夫：《十月的经济纲领和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讨论》，《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6期（总第89期）第26—75页和1929年第11期（总第94期）第26—64页。

② 见《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6期（总第89期）第57—58页；奥新斯基的自传，载于《活动家》第2卷第96页；《反苏集团案》第465—466页。另见奥新斯基：《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18年）；他的发言，《第一次国民经济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18年）第56—64页；他的《直接的答复》，《共产党人》（莫斯科）1918年第2期第16—18页。

的极端主义。比如说在使用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上，他认为这并不涉及原则问题，声称他“比列宁还右得多”。有些反对派关于工人监督的主张接近于工团主义，他们不为布哈林讲话；他在一月份就严厉警告过这种倾向。他也不同情对强大苏维埃国家进行半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他却争辩说：“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要忍受一场对它的内外敌人的激烈斗争。为了这一斗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广泛的、组织严密的组织……无产阶级国家……”① 至于农业，布哈林象多数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在内）一样，赞同1917年实行革命性的土地重新分配，但同时断言为了将来的进步，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种；他没有提出如何把这两种立场协调起来。毫不奇怪，列宁在经济争论进行一半的时候，告诉布哈林：他“十分之九同意他的意见”。②

尽管如此，布哈林继续同左派站在一起，虽然很有节制，但也代表他们讲话，继续充当《共产党人》的编辑，并允许他们用他的名义发表提纲。③ 从一方面来说，这可能反映了他同年轻的莫斯科党人的友谊，也反映了由于布列斯特和约争论所引起的怨恨。但这也说明他很担心决定签订和约的那种政治观点会危及“十月的经济纲领”，很担心那些自称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但“不举起‘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旗帜却举起了‘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旗帜”的布尔什维克会取得优势。④ 虽然布哈林的词藻和情绪仍比列宁的激烈，但

---

① 见布哈林：《共产主义纲领》（纽约，1920年）第20—21、50—51页；《无政府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共产党人》1918年第2期第11页；《在过渡阶段》第145页；《工联主义和共产主义》，《真理报》1918年1月25日第1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3—284、317页上摘引的布哈林的话。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1页。

③ 这个提纲是用《共产党人》编辑部的，也就是布哈林、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和拉狄克的署名发表的。

④ 《列宁文集》第11卷第54页（俄文版）；《第一次国民经济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第7页。

争论和约时那种敌对情绪已不复存在，因而在次要问题上的妥协成为可能。①

布哈林对列宁的经济建议也有实际反对意见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源于他对俄国的落后性和如何对付这种落后性的认识：

俄国的落后不在于大企业数量太少——相反，我们的大企业不少——它的落后性在于：我们整个工业对广大农村所占比例太小，但……我们决不要小看我们工业的重要性……

因此，他争辩说，如果党要组织什么的话，就必须立即把大的经济企业，特别是工业和金融业的企业联合组织收归国有，这些"资本的主要经济堡垒"会成为新苏维埃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神经中枢"、"基本支柱"。它们将是俄国经济的唯一现代化和中心组成部分，它们必须被改造为国家成份或社会主义成份。②

布哈林虽然批评列宁调节大的私人资本的计划，但他并不主张什么都实行国有化。他建议"从容易接收、容易组织的着手……从最好安排的着手"。同列宁的建议相比，布哈林的论点听起来可能是激进的，特别是这样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即剥夺资本的革命"，或"通过生产社会化达到社会主义"。③总之，他设想的很明显是与未来的新经济政策相类似的东西，认为国家控制只应包括主要的部门，即后来所谓的"命脉"。他主张不对小企业和附属工业

---

① 例如，他们在新党纲问题上的争论又一次炽烈起来，后来通过相互的妥协得到解决。见《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48—153、160—161、163页。

② 《共产主义纲领》第36—37、40—45页；《在过渡阶段》第145—146页；《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0年)第233页；《第一次国民经济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第7页。

③ 《共产主义纲领》第43页；《共产党人》1918年第1期第20页；奥新斯基的《社会主义建设》第25页上引用的布哈林的话。

实行国有化，指出只要"经济堡垒"就够了，因为即使在国有化以前，"次要工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工业"，① 认为国营工业的小岛可以对整个经济施加影响，这个思想将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布哈林1918年的建议比列宁的建议更加预见到二十年代党的经济政策。

他对工人监督、劳动纪律和管理权力的态度更加不明确。这些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由于两个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其一是原来取消工人监督并授予有关的人民委员以"绝对权力"的法令，语调十分极端，就连对中央权力最温和的批评者也感到恼怒。② 其二是"工人监督"这个词本身含义不清：它是指工厂委员会呢，还是指地方苏维埃，工会、最高经济委员会，还是仅仅指"工人国家"？对于这些可能性，布尔什维克意见可以争得不可开交，而布哈林本人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意见。比如说他早在1917年10月就把最后的国家主义的解决办法有意无意地勾画了出来，当时，他给工人监督下了定义，说这就是"国家权力掌握在另一阶级手中"，即无产阶级手中。同样，他不同意左派明确拒绝劳动纪律的意见，1918年5月间他甚至要求实行某种"强制性劳动服务"③ 的形式。

可是，即使在这一点上，布哈林也是抵制列宁的新方针的。他否认经济混乱的责任完全在于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相反，他指出是由于运输与供应的总瘫痪造成的。他既反对原来的法令，又提不出新的解决办法，只好求助于"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在进退维谷中止步不前："必须要有音乐指挥的指挥棒，但这指挥棒必须

---

① 《共产主义纲领》第43页。

②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396页。

③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59—60页；《在过渡阶段》第145—146页；《共产主义纲领》第49—56页。

由工人自己来挥舞。"[1]很明显，在背后促使他继续提出反对意见的，并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别的什么。

在签订和约以后，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与其说是出于对实际政策的支持，不如说是出于对一种作为旧秩序的对立物的新秩序的看法。尤其是，革命的目的是要摧毁凶恶的利维坦国家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所代表的一切。不管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如何，布哈林十分重视革命的"公社国家"的思想，这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描绘的（布哈林所热情赞许的）"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官吏的国家"。"公社国家"的明确特点是摈弃政治和经济上的官僚权力机构。它是一个没有官僚的国家，所谓官僚，就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特权者的国家，群众自己将成为社会的行政人员，"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2]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将是"公社国家"的政治结构，而工人监督，通过创造出一种基层的工业民主，将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类似的作用。[3]在官僚机构被消灭以后，工人阶级就将在最基层，即劳动岗位上获得自由和自治权。这样，在列宁采取行动减少工厂委员会权力、自上而下地重新加强官僚行政机构的权力的时候，布哈林则搬出《国家与革命》的中心形象——人人都是行政人员的格言来。他说："教会厨师去管理国家是很好的；但如果把一个人民委员放在厨师之上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样厨师永远也学不会管理国

---

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33—234页；《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3—284页。

② 见布哈林对《国家与革命》的评论，《共产党人》1918年第1期第19页；列宁：《国家与革命》第98、103页。关于列宁对这个看法的再次肯定，见《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43—144页。

③ 布哈林：《共产主义纲领》第26页；丹尼尔斯：《良心》第86页。

家。"①这里有一个进退维谷的问题：要末就是人人参加的机构，要末就是官僚特权人物的机构。这里有两个使理想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长期担心的问题：一个是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个是苏维埃制度会发生"官僚主义化的蜕变"。

"公社国家"的目标反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目标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有人可能不同意——因为它以为现代工业社会（这是布尔什维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要实现的社会）的行政秩序很简单，很不复杂，不是专家就能轻而易举地掌握。但苏联和别的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由于促进了专业化和经理阶层的形成，加速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发展。1918年，这种矛盾对许多布尔什维克人，包括布哈林，还不明显。建立"公社国家"的梦想仍然迷住了很多向往者，人们可以用歌德形容另外一种十字军参加者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拿破仑本意要找美德之神，但因找不到她，却找到了权力之神。"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使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处于列宁与极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中间。但归根结蒂，促使他大声疾呼地反对列宁的，并不是实际政策，而是一个理论问题。争论集中在列宁把苏维埃经济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这种语义学的冲突再次表明，两人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列宁把这个名词应用于他的政策时，是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调节私人资本与现代经济管理的同义词。这样他就赋予"国家资本主义"一种缺乏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的中立概念，他看不到无产阶级国家可以掌握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命题中有什么矛盾。

列宁的概念不管有多大好处，却破坏了对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理论理解。对布哈林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它使他确定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特别是1915

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34页。

年以后关于现代利维坦国家及其"惩罚式资本主义"① 的思想。因此，在他看来，列宁把这个名词用于苏俄是蛮横无理的。他在和约争论以后写的唯一的一篇争论文章——题为《现代经济的几个基本概念》——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攻击列宁这位领袖。他解释道，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技术，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和纯粹是历史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类型的一种……是一定形式的资本权力"。列宁的用词是词不达意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专政为前提，它把生产交给以专制手段组织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正是同样的废话。'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是荒谬到了极点……"②

布哈林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从1915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后来也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他对现代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对此他不可能妥协："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托拉斯溶合在一起，很明显，不能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原则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③ 这看来就是在和约被批准以后布哈林同列宁真正的争执所在，也是他长期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论问题使人们把他们的实际政策分歧看得很大，而看不清布哈

① 见布哈林的评论，《全俄立宪会议》第26页。

② 引用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06页；《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1期（总第94期）第46--47页。

③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07页。正如布哈林后来承认的，他和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从未取得一致意见。见《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5页。

林对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想法。因为他虽然不同意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应用于苏维埃俄国，但他显然并不根本反对列宁在此题目下所提出的一系列温和政策。

在定义上的争吵还涉及到后来不断找布尔什维克麻烦的一个问题。布哈林和许多其他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立物”。[①] 那么，新的苏维埃秩序应该如何描绘呢？即使最善于幻想的人也不会认为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列宁建议的提法——国家资本主义，广泛地不被接受。其他可能的提法有“过渡社会”，或者干脆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前者太不准确，后者是用词不当（不仅因为它无视先锋党的日益增长着的作用）。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在名词后面确实存在着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秩序的性质不能作出明确说明的状况，这是一个尴尬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问题，也是布尔什维克在以后多年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在1918年，正如在以后一样，这个语义学的争论问题却把事情搅得更乱了。就布哈林的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使得他在国内政策上的一些看法看起来比实际更激进，使他被指责为“无视俄国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②] 这种指控虽然总的说来是不公正的，但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真理：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对在落后的农民国度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多少发言权。

的确，他的反对意见以至整个左派共产主义的反对意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些意见对党面临的许多国内问题关系不大。布哈林的真正目标是搞革命战争，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所争论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府能不能同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谈判。他后来回忆道，这个原则“从我们的灵魂深处动摇了我们的国际良

---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1期（总第94期）第49页；另见列曼和波克罗夫斯基：《右的偏向的思想根源》第62—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0—311页。

心……”[①] 但当争论转入党原先就考虑得很少的经济政策时，纲领中缺乏明确规定的状况就显得更为严重了。这时，多数布尔什维克才开始考虑可行的经济政策。[②] 列宁想用“国家资本主义”去填补这个真空，但他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制止经济瓦解的一些临时措施。这些建议很少涉及党的长远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更少谈及“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布哈林除对国有化提出过一些简略的评论以外，他对寻找可行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作过贡献。他曾模糊地谈到过要结束市场关系，开始搞经济计划，而对农业实际上完全忽略。他的左派共产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狂热地主张革命战争和半心半意地反对列宁的经济建议——反映了他自己在党的国内目标和问题上不明确性和挫折。他在十多年后曾说过：“当时在我们看来，外部的压力和国内的巨大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要用革命战争之剑来铲除。”[③]

1918 年初夏，对经济政策的争论——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突然结束了。列宁的温和政策被抛弃了，并改而采取了后来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不同的激进方针。1918 年初的妥协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半遗忘的“和平喘息时机”。[④]

党的新的经济激进主义并不象人们有时想象那样，是对左派的妥协，它是为适应岌岌可危的紧迫形势而采取的。6 月下旬，苏联政府担心被占领土地的大企业会转到德国手中，决定把“各种重要的工业”收归国有。同样，它在 5 、 6 月采取的基于开展阶级斗

① 《进攻》第259—260页。

② 见列宁的评论，《列宁全集》第27 卷第 384—385 页。

③ 《真理报》1928 年 10 月 25 日第 3 版。

④ 《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 1 期第 60页。

争和强迫征收粮食的新的农业政策，也是因为各大城市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饥荒。[①] 最重要的是，六、七月爆发了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在以后的两年半中，布尔什维克受到白军和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军队的包围，受到了封锁，只掌握着一个被宰割了的俄国，他们极力扩大党-国家对一切现有的资源的控制，为继续生存而奋斗。

结果就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是全面战争经济的极端典型。为了把一切资源用于夺取军事胜利，党-国家废除了中间自治机构，或降低其作用：这样，工会被运用来加速生产，广大的供销合作社网被利用来管理分配。配给、征收、原始的买卖代替了正常贸易；市场（黑市除外）不复存在。在官方的推动下，发生了螺旋形的通货膨胀，使苏俄成了"拥有百万巨资的穷人的国度"；钞票已经丧失了价值和作用。根据一个前布尔什维克的描绘，战时共产主义首先是在军事包围下争取政治生存的经济学："第一，在农村实行征收，第二，对分成不同类别的城市人口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第三，实行完全的生产社会化和劳动社会化，第四，实行极端复杂的凭票供应的分配制度……"[②]

1918—1921年这段时期的最显著特征是经济生活的广泛"国家化"，这是准确刻画当时情景的一个流行用语。国家简直把每一个能抓到的经济杠杆都掌握起来了，于是一个庞大而烦琐的官僚机构便应运而生。合作社、工会、地方经济苏维埃网被改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式的附属品。最高经济委员会实际上负责管理一切工业生产，设立了一层又一层的机构。到了1920年，官僚机构

---

①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51、53、98—99页；多布：《俄国的经济发展》第58、59页；夏皮罗：《苏联的共产党》（纽约，1960年）第188页。

② 谢尔盖：《回忆录》第117页。另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47—268页。

的人员与生产工人人数的比率比1913年增加了一倍。[①]“公社国家”的梦想在内战的战火中化为灰烬，苏维埃共和国与巴黎公社之间唯一延续着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处于被围困之中。

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党和新出现的政治制度。党在1917年实行的民主准则，以及它在1918年初具有的几乎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面貌，让位给一种无情的狂热行动、严酷的极权主义和全面的生活“军事化”。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党内民主，而且是1917年在全国创立的人民管理的分散化形式——从地方苏维埃到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承认只好如此，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正如布哈林所说，“整个共和国是一个兵营。”[②]作为这个过程一部分，党对其政治对手的态度也改变了。开始，它采取一种勉强的容忍态度；后来，到了1918年6月，就把其他社会主义党开除出苏维埃；最后，在几个布尔什维克被暗杀，特别是1918年8月30日对列宁的刺杀发生以后，爆发了一次恐怖行动。公安警察——契卡的镇压行动，给苏联政治生活增加了又一方面的新内容。后来布哈林引用圣茹斯特*的话，提出了一个颇为适当的比喻：“法治行不通就必然用武器进行统治。”[③]

这些满目疮痍的岁月也为以后的政策辩论提供了新的衡量标准。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即使是后来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布

---

① 夏皮罗：《共产党》第191页。

②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伦敦，1922年)第196—197页。另见布哈林的讲话，《第八次俄共(布)党代表会议：会议记录》(莫斯科，1961年)第165页；《第九次代表大会》第137—138页。

* 圣茹斯特(Saint-Just，1767—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领袖之一。雅各宾专政时期任公安委员会委员。1794年热月政变时被捕并被杀害。——译者注

③ 《国际资产阶级及其门徒卡尔·考茨基》，《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921页。

尔什维克，也都为这个年代而感到骄傲，因为当时失败好象已成定局，但却转败为胜。布哈林写道："无产阶级屹立在光荣的孤立中；人人都举起手来反对它。"他的这句话抓住了当时的人心。从此，1918至1921年将成为"英雄的时期"，它建立了一种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传统，一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奋发和革命热情高涨的传统"。① 再过十年，斯大林又将运用这个传统去攻克其他堡垒。

国内战争的到来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解体，标志着布哈林的党内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他同年轻的莫斯科左派的长期政治联盟。1918至1920年的反对派运动，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形势时起时伏。（人们普遍接受富兰克林对美国革命者的忠告："我们必须结合在一起，否则我们肯定将分别被绞死。"）当军事环境略为缓和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反对派别。1919年9月，一个名叫"军事反对派"的派别出来攻击在红军内部重新提倡传统的军事纪律、特权和军衔。1919年初，民主集中派起来抗议重又实行一长制和在党和国家事务之中出现的普遍的官僚主义化和中央集权化。两个派别都是由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所领导的，它们的组织基地都在莫斯科。② 但是布哈林却引人注目地没有参加这两个反对派，而且在1920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言反对奥新斯基。③

1918年2月，布哈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已辞去党和国家职

---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第261页；《真理报》1929年3月23日第3版。不久之后出版的研究这些年代的苏联的最好的著作是克里茨曼的《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

② 见丹尼尔斯：《良心》第93、104—115页；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8章，《列宁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史》（莫斯科，1966年）第388—420页。

③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135—139页。

务、公开反对布列斯特条约。[1] 5月或6月间，布哈林恢复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并在7月初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一次流产的起义之后担任《真理报》的编辑。他后来声称，他是第一个"承认错误"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但到10月才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公开声明。[2] 那时候，在德国，可能还在维也纳，革命似乎即将爆发，布列斯特条约显得不那么苛刻了。布哈林想着这些，因此说话的语调既带有期望，又十分慎重，这种格调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

"我必须坦率而公开承认我们……错了，列宁是对的，因为喘息时机给了我们集中力量，组织强大的红军的机会。现在每一个优秀的战略家都应懂得，我们不应该分散我们的力量，而必须把力量集中起来反对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已经不再是危险的敌人。现在危险来自……过去的盟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

我们要用"最宝贵的鲜血和面包"支持德国无产阶级。但是不能用苏俄来冒险；主要战场现在仍是俄国的内战。[3]

从1918年夏到1920年晚些时候，布哈林和列宁在重大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过去的两个次要争论一度短暂地再现。一个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上的描述，另一个是列宁提出的自决口号。第一个问题决定不了，干脆被放下了；第二个问题终于达成妥协，得到了解决，虽然是有利于列宁的妥协。但这些一度曾引起激

---

① 关于布哈林的辞职，见《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265、269页。

② 《真理报》1918年10月11日第5版。另见《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594—595页。

③ 《真理报》1918年10月11日第5版。

烈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激烈情绪，因为两人在党面临的要作出决定的重大问题上态度又重新一致起来。[①]

在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之后能够治愈伤痕，这反映了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布哈林比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经常对列宁的意见提出挑战；但他却成为列宁特别喜欢的人物。他们之间连结着一种简直是互尊互爱的关系。[②]左派共产主义的后果也未成为例外，虽然列宁对布哈林的政治智慧的充分信任并不是立即恢复起来的。1918年6月2日，布哈林动身前往德国同激进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的前夕，列宁警告苏联驻柏林代表说："布哈林是忠诚的，但他曾经'左得愚蠢'，走过叫人生厌的极端……你得留神！"[③]尽管如此，他对这个最年轻的巨头的估计还是十分高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国内战争初期对托洛茨基说过的一句话中得到证实。他说："如果自卫军杀死了你和我，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不能顶得起来？"列宁可能是感到担心的，但他显然想到过由布哈林当他的接班人，想到过由当时党的组织者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当托洛茨基的接班人。[④]

布哈林在短暂的时间中充当反对派并没有降低他在党的领导

---

① 这些问题曾在1919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辩论。见《第八次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9年)，特别见第45—48、107—110页。关于在起草党纲方面达成的妥协，见《列宁文集》第3卷第458—459、481—487页和第13卷第56—58页（俄文版）。

② 见亚当·乌兰：《布尔什维克们》(纽约，1965年)第360页；费希尔：《列宁》第222页。有一些证据表明，这时候布哈林是同列宁一家最亲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见玛·伊·乌里扬诺娃：《论列宁》(莫斯科，1964年)第86页。他同列宁的妹妹玛丽亚特别亲近。关于他们的关系将在第七章中加以讨论。

③ 《列宁文稿》第7卷第115—116页。

④ 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莫斯科，1924年)第106页。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他的引语后来在列宁之后的领导集团中引起了一阵风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听了感到十分生气……但是事实仍然是，列宁只提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我的生活》第338页。

集团中的地位。那时浪子还可以回头，这是与后来的情况不同的。在191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他名列第十；而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在这次大会上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讲话反对和约）他名列第五，这证明他甚至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威信仍是高的。一年后，在1919年3月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的选举名单上只出现了六个人的名字：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至少反映了当时党的上层人物对谁应组成党的高级领导的看法。第八次代表大会还建立了第一个起作用的政治局，从而使党的寡头统治制度化起来。政治局由五个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和三个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米哈伊·加里宁——组成。① 这八个人才是苏俄政府的真正掌权人物。

不象作为负责战争工作的人民委员经常处于舞台中心的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那几年里，要准确地描绘布哈林的正式活动是困难的，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同时兼有几个职务。他的主要责任是充任《真理报》的编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真理报》不仅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正式喉舌，而且是党内通讯的正式机构，是一份刊登官方观点和不同观点的日报（除星期一以外）。布哈林撰写大部分社论，为该报定下基调。随着《真理报》的办公大楼中逐渐接纳了党与非党的各种出版物，他实际上负起了主管苏联整个报刊工作以至整个布尔什维克宣传工作的责任。②

到了1918年较晚的时候，布哈林也深深地卷入国际共产主义的事务之中。当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陆续慕名来到革命成功的

① 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367页；《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41页；《第八次代表会议》第221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604页，注(63)。

② 见《真理报》1927年5月5日第2版；列宁的书信，《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291页，《列宁文稿》第8卷第133、166、197、228页，和《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

圣地进行朝拜的时候，布哈林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资格使他成为俄国党的一位主要代表。1918年10月，在德国起义流产前夕，他再次赴柏林同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他德国共产主义者商谈（他这次使命的性质至今仍不清楚）①。但德国未能爆发革命，这并没有阻挡得了列宁1915年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第三国际的愿望。根据他的指示，布哈林准备了一份文件，概括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策略”，这个文件就成为1919年3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的章程宣言。② 从此以后，布哈林的许多时间就用在共产国际的事务上。他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是管理该组织的“小政治局”的副主席，他同第一主席季诺维也夫一起共同负责日常工作。③

他把这些工作同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表明布哈林在政治局内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据说，列宁说过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有人问到为什么布哈林不担任正式的国家职务时，据传列宁是这样解释的：党至少需要一个“具有不受官僚主义畸变的头脑的人”。④ 在当时权力不受限制，有时恐怖泛滥的日子里，布哈林那种诚实、公正、不受腐蚀的声誉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很明显地担负着或者被委任担负着政治局内专门解决麻烦问题和纠正错误的人的角色。他经常以领导集团的

---

① 《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沙·卢森堡：论文集》（彼得格勒，1919年）第26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5版第50卷第229页；另见布哈林关于这个文件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莫斯科，1933年）第75—85页。

③ 《“托马斯同志”的故事》，《社会主义通讯：文集之一》（1964年4月）第132页，141页注16；《共产国际：简明史纲》（莫斯科，1969年）第98页；弗兰兹·博克诺：《世界共产主义》（密执根州安阿伯，1962年）第163—165页。

④ 尤里·邓尼克：《访问记》之十七（未发表的手稿，孟什维克计划，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10月25日）。

代表的身分出现在有麻烦的场合，如到某一个委员会去同反犹太人的情绪作斗争，到契卡去调查可能错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到工会中去解决党同劳工关系紧张问题。①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布哈林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抱怨他在工会事务中解决问题少，制造混乱多。不管情况如何，他热情地工作着，无所不在地“出现”在莫斯科各处：“有一句话这样描绘他：‘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到哪里去’。”②

但是布哈林的这些职能中，哪一项也比不上他的最有影响的作用，即作为布尔什维克主要的官方的理论家的作用。当时，以及后来若干年，提出理论以及整个思想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党的成分迅速地发生着变化，但党的领袖们仍然自认为是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论点，部分地要根据它们理论上的连贯性和说理性来加以评定，布尔什维克以有著作为荣。这样列宁仍把“写作”作为他的职业，而布哈林则把他自己和列宁都说成是“共产主义思想家”。③ 当时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尚未变成唯我独尊的情况。布尔什维克尊重理论与思想，其热烈程度有如尊重真理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二者是同义词，并且认为他们作领导的能力也就在这里。象马克思一样，他们相信，所谓“激进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④

布哈林由于他的理论著作赢得了列宁把他称为党内“最大理

---

① 见《苏维埃俄国》第2卷（1920年），第46页；《列宁文稿》第7卷第541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385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8页；《第九次代表大会》第70、223、247、558—561页。

② 《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93—294页；邓尼克：《访问记》之十七；伊萨克·麦克布瑞得：《野蛮的苏俄》（纽约，1920年）第108页。

③ 《列宁文集》第13卷第31页（俄文版）；《进攻》第203页。

④ 布哈林的讲话，《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1920年10月2—10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126页。

论家"的赞扬，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1920年以前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1921年出版的。)他在侨居国外时期撰写的两本书，《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和《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是最后在1918年和1919年全文发表的，这就向更广大的读者展现了他学识的渊博。这两本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使他赫然成为党的研究新资本主义的重要学者，1919年列宁承认了他这个突出的地位。当时，列宁正在哀叹没有人能够勾画出描绘"资本主义崩溃的有机的画图"，叹息之余他补充说，"我完全相信，如果有谁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那首先就是布哈林同志……"①1920年，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把他的理论视野扩大到现代的苏俄；虽然对这本书有很大争论，但它却确立了布哈林是资本主义后的时代的最突出(也是最大胆)的理论家的地位。

布哈林一贯把他的"理论"著作与"通俗"著作区别开来，正是他的一本通俗著作使他最负盛名。1919年3月新党纲通过以后，布哈林和另一名年轻理论家、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叶甫谥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俄国共产党纲领简释》一书。这本书完成于10月份，被称作《共产主义ABC》。它是斯大林主义前所有阐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中最有名、发行最广的一本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参加合写一事一半被人遗忘，这本ABC很快就同布哈林的名字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了，使他扬名于世并（在共产主义人士中)获得了"革命的金娃"的美名②。

《ABC》这本书的出名，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理论上的独创性，而是由于它的内容广博，文字通顺，极受欢迎。它的作者们注意到"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都不适用于当前需要"，因而力图提供

① 《第八次代表大会》第49页。

② 《社会主义通讯》1925年第9期第10页；《斗士》1929年10月15日第6页。

一本为党校所需的，为"普通工人农民自学用"的"共产主义知识基本教科书"。他们根据党纲编写课文，把当代国内外问题毫不遗漏地逐点加以说明。除了说明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部分以外，它不是一本专门的布哈林主义的文献。① 它反映了全党的观点，它的新颖就在于它按时间顺序地列出了1919年布尔什维克对几乎每一件大事的看法。

因此，这本书具有而且至今仍保留着巨大的魅力。贯穿全书的精神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精神，一种战时的乐观的精神，这种精神为这样一种信念所加强："马克思的预言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得到实现。"② 这本书阐述的是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和乌托邦式的希望，它是党的天真而不是苏联现实的写照。由于《共产主义ABC》是以"英雄时代"的语气写的，它的许多内容到了1921年就已过时，但它仍风靡一时，流传久远，十分成功，成了"党的经典"。到三十年代初，它的俄文版本至少翻印了18次，另外还有20种外文译本。对于俄国和外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说，《ABC》与《历史唯物主义》两本书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范本"，它们把布哈林的名字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传到有男男女女卷入革命运动的任何地方。③《ABC》发行以后，布哈林的名誉几乎已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誉并驾齐驱。

同时，这种显赫地位也开始给布哈林带来一种不幸。象《ABC》这样"超通俗"著作，使他被称誉为"我们时代最卓越的小册子作

---

① 《ABC》第13页和第14章。

② 同上，第23页。

③ 见布哈林的《关于党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一文，《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版；西德尼·海特曼所写的重印《共产主义ABC》的导言(密执根，1966年)；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版，纽约，1967年)第299页；勒维：《世界历史》第115页。

家之一……”。[1]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时间越长，党内分歧越频繁，一些领袖人物就越感觉有必要系统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并加以制度化。二十年代，当党内政治要求确立一种明确的教义的时候，布哈林的理论声誉以及他《ABC》等著作中的传道口吻，使他身不由主地成为“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高级牧师。[2]

这种格局甚至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出现。他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学院的创始成员，他在制定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内容和党内知识分子的训练内容方面所负责任越来越大，所起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著作成了党校必读的教科书。从1919年起，他亲自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主持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习明纳尔。这些教学工作虽然是布哈林的自然爱好，但也越来越成为他的正式职能。[3]还在三十岁刚过头的时候，他就受到越来越多的门徒的包围，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提高，并把他奉为正统教派的护神，这件袈裟是布哈林既未追求，也是穿之不易的。

布哈林意识到他要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完整性负责，这种认识可能促使他在（十月）革命后两年决定从事当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分析工作。过去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部分地是因为当时整个党内对战时共产主义权宜措施迷惑不解，部分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仍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简直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欧洲革命的进一步爆发。[4] 布哈林本人对欧洲革

① 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82页；F·A·马肯齐：《黎明前的俄国》（伦敦，1923年）第35页。

② 见奥新斯基关于《ABC》的“必读性质”的评语，《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47页；证明这本书具有圣经般地位的一幅漫画，《探照灯》1923年第8期第26页。

③ 邓尼克：《访问记》之十七；布哈林为I·波德沃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大纲》（莫斯科，1923年）所写的前言。另见他关于训练党的新干部的报告，《第八次代表会议》第156—168页。

④ 见B·尼古拉也夫斯基：《莫斯科的对外政策》，《新杂志》1942年第1期第238—239页；布哈林的评论，《真理报》1929年3月23日第3页。

命前景的强烈乐观主义，只是到了1919年才开始减弱，那时，他开始提醒人们：应该把国际革命看成是分成许多阶段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亚洲反殖民主义的反抗；共产主义者不应企图“强迫历史发展”。①虽然他后来特别是1920年冬，一度又产生过希望，但他原来那种肯定西方革命即将到来的欣喜情绪已经过去。于是，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开始更认真地思考一个孤立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问题。

在1918年4、5月的经济辩论中，布哈林要比列宁来得左，但他们两人谁都未曾预见或主张过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的政策。而且的确，有些政策是与布哈林所要求的相反——比如说，只把大的、容易经营的企业收归国有。但没有出这一年，他就开始认为这些极端措施是正当的，不只是一种军事上的需要。他在对经济实行意义深远的“国家化”过程中，在让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机构消亡的过程中，已看出俄国正在迅速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1919年3月，他把社会主义放到“议事日程”上，他曾担心迅速的发展步伐可能不久就会使新党纲的某些章节过时。②

这种期待心情给布哈林关于新的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他开始明确：新国家的“基本意义正是在于，它是经济革命的杠杆”。③对于一个要实现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承认国家是改造落后社会的工具，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接受这个看法就会使人对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现象（包括国家在内）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名言提出疑问。布哈林的答案来自他对国家资

---

① 见斯坦利·佩奇：《列宁和世界革命》（纽约，1959年）第128页；《进攻》第99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84页；布哈林的讲话，重印于《苏俄官方报纸报道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华盛顿，1920年）第133—134页。

② 《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6、40页。

③ 《进攻》第95、111页；《ABC》第81页。

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他的答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修正：

“如果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经济革命的杠杆，那末很清楚，‘经济’与政治在这里必然合为一体。这种熔合……在金融资本的专政下是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而存在的。但无产阶级专政颠倒了旧世界的一切关系——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必然是它的经济专政。”①

在1919、1920年间，这个命题使战时共产主义合理化了；后来，它使布哈林形成了一个十分不同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概念。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意味着推迟国家的“消亡”而主张“加强苏维埃国家”，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忍受的前景，只要这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话。对此，布哈林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②

布哈林把“国家化”和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诞生，他的这种热情很明显是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成功地扩大了对工业生产（虽然还十分薄弱）和工业产品的分配的控制。③很明显，从布哈林本人关于小农经济的较少幻想的评论来看，上述观点是对一个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的片面观点。他经常强调说，不能剥夺小农民、也不能强迫他们集体化；“农业生产上需要有许多中间形式与中间层次”。他承认“在长时间内，小农耕种将是主要形式”，他对布尔什维克“侮辱农民”的倾向提出警告，虽然侮辱农民（强迫征收）实际上正是战时共产主义的要害。当时，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应强迫国内数百万小农加入新的有组织的经济，而应该通过“缓慢的过程，用和平的方式”“吸引”他们参加……“至于这将如何实现，他对此暂时未予答复，他只要

① 《进攻》第111页；《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17、418页。

②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15—216、260—261页；《进攻》第89—114页。

③ 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一文，《真理报》1918年12月19日第1版；《进攻》第112页；《国营农场代表大会》，《真理报》1920年1月22日第1版。

求耐心和教育”。①

如果说，布哈林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之路这个思想背后的经济理由还含糊不清的话，那末影响他的思想的历史条件看来是很清楚的。布哈林以及一般的布尔什维克上任时并没有预先考虑好的经济纲领，他们就欣然抓住了看来是从实际事态中产生的并与之相符合的第一个经济纲领。在瞬息万变的发展中，在采取对付这种发展的措施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种内在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法则和“规律”。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外国干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与政治垄断——每一件都可以其本身的方式同党在1917年以前的预想相协调一致。而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临时提出的权宜之计的话，那末它只不过意味着现实证实了“灰色的理论”。②

在这一点上，布哈林并不是孤立的。那种认为当时只有少数梦想家和狂热分子才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长期政策，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道路的看法(这是布尔什维克们自己在1921年后提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是当时多数党员的情绪；只有少数人才抵制这种普遍的欣喜病。最明显的是连列宁也不例外，虽然他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实用主义，后来并贬斥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愚蠢行为。1919年，他说：“现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和共产党的整个政策，都已经有了完备的确定的形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是正确的道路……”③使布哈林区别于其他人的，使他更

① 《第八次代表大会》第44、114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82页；《是农业公社，还是粮食工厂？》，《真理报》1918年12月20日第1版；《ABC》第323页；《农业部、公社和评论委员会的代表大会》，《真理报》1918年12月22日第1版；《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15页。

② 见多布：《俄国经济发展》第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2页。后来他曾承认当时整个领导都认为那些政策是可行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39页。关于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观点，见《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1919年)。

显得对此最深信不疑的，是他为这种集体的愚蠢行为树立的一座著作上的纪念碑，即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这篇论文是以这个时期的最严重错误为依据的，是以“国内战争暴露出社会真面貌的信念为依据的……”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是在1920年5月问世的，那时正是战时共产主义快要达到顶点的时候。布哈林原想把它当作研究“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过程”的两卷本中的第一卷。但准备具体描绘现代俄国经济的第二卷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开始，他计划同皮达可夫合写这本书；但“实际工作任务”（皮达可夫在内战大部分时期都在前线）使这点成为不可能，皮达可夫只对书中的一章直接作出了贡献。这本书写得极快，是用极抽象的语言写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正如布哈林所表示抱歉的那样，“简直是象代数公式”——往往没有得到充分阐述，有时甚至写得不连贯。② 但作为走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存体系的第一次大胆尝试，这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得到那时的和持久的好评的佳作。虽然它对国内政策的含义到了1921年3月已大部被遗忘，但它仍然是影响很大（争论性也很大）的一本著作。1928年，苏联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把这本书列为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三大成就之一。③

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斥之为给战时共产主义辩护的理论著作。它确是这样一种著作，虽然布哈林认

---

① 《进攻》第104页。

② 见《过渡时期的经济》第5—6页和第123页注1；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对一些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的答复：《骑兵突袭和重炮》，《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56—274页。

③ 《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26期（1928年）第12—14页。另两大成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克里茨曼的《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影响，见亚当·考夫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关于苏联经济思想的论文》，《苏联研究》1953年第3期，第244—245、248页。

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分析现代现实这一点肯定是使他变得冷静的一个因素。然而这本书所以能长期受到尊重，而且有几个论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还站得住，还有别的原因。布哈林很一般地论述了三个广泛的题目或主题：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革命突破过程中的社会或革命的"不平衡的"社会；在混乱中建立新的社会平衡的过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他极少提到俄国，但从他对第二、第三个题目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是他最优先考虑的。正如马克思推断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现是普遍规律那样，布哈林也认为他是在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对新资本主义的论述，大部是他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观点的重述。这占这本书的大部，大体是根据他 1915 至 1917 年的著作写的。[①] 他象以前那样，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生产上、技术上、组织上洋洋大观的成就。但这却对革命是否可取，提出了严肃的问题，由于革命，结果把俄国的经济生产实际上降到 1913 年生产水平的很小一部分。除了内战直接的伤亡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最原始的原因，饿死冻死。因此，布尔什维克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卡尔·考茨基攻击为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社会极端公正的报春者，遭到这种攻击，感到伤害很大。布尔什维克对此进行了多次论战，[②] 但答复这种指控需要有更实质性的内容，需要更大的说理性。《过渡时期的经济》为了提供这种答复，提出了一个革命规律，即"革命代价"论。

布哈林以前曾说过，这种指控使人想起吉伦特派对雅各宾派

① 见本书第1—3、7、9章。

② 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卡尔·考茨基的答复》（密执根，1961年）。

的攻击。这种攻击当时曾驱使夏洛特·科黛谋杀马拉*。他的论点是：伟大革命总是伴随着破坏性的内战，他最喜欢用的例证就是，要是人们把火车车皮或电报柱子用来制造路障，其结果就必然是经济破坏。①但他更着意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比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生产上更大的暂时下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布哈林本人在1917年以前的著作）都确立了一种理论，认为革命过程中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现在，布哈林争辩道：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作用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要求改造"生产关系"的愿望，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进攻必须变成对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进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集团关系"被打破，造成了"整个机器的解体"。②

布哈林列出了几种"真正的革命代价"，包括生产中物质与人力因素的具体破坏或恶化、这些因素与经济各部门的破坏，非生产性消耗的需要（内战物资等）。这些代价是相互关联、接踵而来的。集中起来，这些就造成"再生产过程的削减"（和"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得出布哈林的主要结论："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工业上的革命性瓦解'，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无论如何叹息也无济于事。"③

这一点可能看起来是很明显的，但提出这一点来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显然是一种启示。这和社会民主党人中流行着的假设是直接相反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

---

* 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792年选入巴黎公社，1793年5月参与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同年7月被反革命分子夏洛特·科黛杀害。——译者注

① 《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1919年第4期第487—488页；《历史唯物主义》第266页。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3、4章以及第63—64页。

③ 同上书，第48、97—98页。

比较没有痛苦的。考茨基和希法亭曾经确定了这种信念，特别是希法亭，他的论点是：如果无产阶级占领了六家最大的银行，它就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整个经济。①甚至一些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也只在联系到俄国情况时，才接受布哈林的法则，他们争辩说，比如说，在英国，就不会发生生产上的严重下降。②布哈林则不同意，他坚持认为这是普遍适用的法则。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以后，他声称这是《过渡时期的经济》的基本点："全书的中心思想是，过渡时期内，社会的劳动机器会不可避免地瓦解，重新组合是以解散为前提的，因此，生产力的暂时崩溃是革命中固有的规律。"他概括说，他已证明："要得到一盘炒蛋，就必须打碎鸡蛋。"不管说得深刻与否，布尔什维克一般都接受了这种"法则"，还认为这是布哈林的重大发现。③

布哈林的法则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认为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胎内"成熟"，革命只有条件相当成熟后才会发生，成熟程度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整个'机器'"中"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水平"而定；看来新社会会象"机

---

① 关于希法亭，见《过渡时期的经济》第47页；《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26期(1928年)第13页。布哈林是这样描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的："无产阶级……撤掉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头头'(这些人他们多少是温和地加以撤掉的)，然后取得对社会生产机器的控制，这种机器在资本主义亚伯拉罕（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译者注)内部已发展到极好的、未受伤害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委派它自己的'头头'，于是大功告成。"《历史唯物主义》第259—260页。

② 见在一个"不是修正主义者"的文章《谈布哈林同志的一本书(对M·奥里明斯基同志的答复)》中提到的一个不指名的人。《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54—255页。

③ 见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57、272页上的评论；波克罗夫斯基关于这一点代表着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转折点的评论，《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26期(1928年)第13—14页；克里茨曼，《英雄时期》第19页注2，第167页注144；《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54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80、282页。

器制造的神"(deus ex machina)一样到来。布哈林辩说：争这个机器在革命过程中必受破坏，因为"它根本不能作为新社会的基础"，这样他就巧妙地逃过俄国比较落后(即条件不成熟)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他强调成熟的主要标准不是这个机器的"物质"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一定程度的"劳动社会化"(无产阶级的存在)和这一革命阶级完成"社会组织"任务的能力。①

这种论点把布哈林引入一个落后社会中布尔什维克进退维谷的旋涡，引入过去从未明确阐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命题中去，后来在二十年代这个命题就成为党内争论的中心。他拒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社会主义在旧秩序的母胎之中达到几乎完全成熟。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落后的俄国来。他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他们(资产阶级)并没有建设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则将建设社会主义，把它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制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体事业。创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自发的，而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即有组织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建设时代必然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工作的时代；无产阶级将把它的任务作为建设新社会的社会经济任务来完成……"②

至此，布哈林一直在描绘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对于社会组织的四分五裂现象提出了一种高深的，而且往往是带有独创性的说明。现在，他又必须论述新平衡的出现。平衡的概念贯串着布

---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52—56页。

② 同上书，第58、60页。

哈林的多数理论著作——从《过渡时期的经济》到《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他用平衡的建立与破坏来解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社会变革),一直到1928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对斯大林五年计划的众所周知的攻击。这里重要的是要看到他所指的是一种"动态"平衡,或"运动"中的平衡,而不是静止体制;认为社会(至少是经济体制)处在平衡状态中的看法是有传统的,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是一种潜在的传统。①

布哈林依靠的是这个先例,他所理解的平衡是一种"进化与发展"的状态,这些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说得很清楚:

马克思在理论上掌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时,是从它的*存在*这个事实出发的。一旦这种体系存在,这就意味着……社会需求正得到满足,至少人们不至死亡,而是在活着、行动着、繁殖着。在一个有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里,……这就意味着整个体系必定有某种*平衡*。社会生产着必要数量的煤、铁、机器、棉花、麻、面包、糖、靴子等等。人们根据所有这一切付出对生产所必需的数量的活劳动,同时使用着必要的生产手段。各种各样的偏向和波动都可以发生,整个体系可能扩大、复杂化和发展;它处于永恒的运动和波动中,但总的说,它在整体上处于平衡状态。

找出这种平衡的法则,这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②

然而,分析现存的平衡(或不平衡),与解释如何从旧的平衡中建立新的平衡并不是一码事。

布哈林的答案是赞成战时共产主义的强迫措施,并给以理论上的表述。用生产因素之间的新环节来取代被破坏了的环节,"把

---

① 《资本论》第2卷中包含着平衡的概念,马克思在那里使用了静态和动态模式来说明资本的积累。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第16章中明确讲了平衡的概念。克尼尔什在《布哈林》一书中讨论了这一概念在布哈林那些年的经济思想中的重要性。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27—128页和第129—130页,注1。

拆散了的社会阶层重新组合在一个新的结合体中……”这样就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国家来进行，无产阶级国家使社会生产力“国家化”，军事化，把社会生产力动员起来。“实现一切形式的社会化”，这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①布哈林谨慎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财产逐渐被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集体‘财产’”，无产阶级制度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它们“本质上是根本相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剥削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创造的再也不是“剩余利润”，而是“剩余产品”。比如说，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征集是“奴役劳动群众”，而现在则“完全是劳动群众的自我组织”②。

在这个复杂的构思下，是布哈林的论点的核心：强力与强制是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的手段。他不回避严酷的结论；书中关于“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这一整章都为这个命题辩护：

“在一种生产结构取代另一种生产结构的过渡时期，革命暴力是接生婆。这种革命力量必须摧毁社会发展的枷锁，即一方面要摧毁已成为反革命因素的旧形式的‘集中力量’——旧国家和旧式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力量必须积极帮助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它是新形式的‘集中力量’，新阶级的国家，它作为经济革命的杠杆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机构。这样，强力一方面起着破坏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凝聚力量、组织力量、建设力量。这种‘超经济’力越大，过渡时期的‘代价’就越小（当然是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过渡时期就越短，新基础上的社会平衡就建立得越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56、113页；关于“国家化”和军事化的过程，特别可见第6—8章。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08—109页。全书中都有这一论点。见第63—64、71—72、83—84页。

快，生产回升也就越快。”

这里，革命强制是与“杜林式的‘单纯暴力’”不同的，因为它导致“总的经济发展”①。

布哈林的推理是：“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强制，从开枪到劳动征集，全都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造就成共产主义新人的一种方法……”，②要丑化他这种推理是容易的。比如说，种种滥用权力的现象都可以在这个论点下变成合理化，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可能剥削工人阶级。说一个工人国家决不可能剥削工人，就等于说一些罪恶因为它们有“进步性”就可予以宽恕。他关于强制在奠定新社会秩序的基础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法，其说服力和历史有效性也许更不明显。历史上很少有例证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经过革命动乱而不需要用相当大的暴力来平息事态和恢复秩序的。不幸的是，布哈林的论点由于有附带的理论上的离题以及有疏漏而显得模糊不清，不够有力。

离题的是他这样一种信念，即：政治经济学及传统的范畴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这种假设使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论述带有极端激进的色彩。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使用了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方法论：马克思所说的范畴和经济法则只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关。布哈林解释道：

“只要一走上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的轨道，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基本‘问题’就都消失：包括价值、价格、利润等等。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并不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所调节，而是自觉地由……计划所调节。因此，这里一方面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84、138—139页。

② 同上书，第84、138—139页。

可以有一套说明，另一方面又有一套规范。但既然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研究'市场盲目法则'的科学的地位了。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终结，也就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①

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都是这样认识的，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多数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也这样认识。这种认识多少仍然是一种"教条"，但它也是热烈争论的一个题目，直到三十年代，为了寻找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对这种认识开展正式批判为止。②尽管这种认识很流行，但布哈林想把这个命题运用到1920年的尝试，也引起很多人摇头不赞成。在他同皮达可夫合写的一章中，布哈林指出：在分析过渡时期的时候，"要使用理论经济学的旧观点就会立即碰壁"；甚至会"乱开炮"。他对每个范畴（商品、价值、价格、工资）逐个进行研究，发现各个范畴理论上均已过时，因此就提出了新的概念（如用"社会劳动配给"代替工资；用"产品"代替商品，等等）。③

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的调子听起来显得比它本身更激进。因为虽然布哈林小心翼翼地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商品生产——在过渡时期仍然存在，因此旧范畴仍具有实际价值，但他对未来的理论探索却使一部分读者感到严重不安。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布哈林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就好象是说，人再也不受客观经济规律约束了。虽然他没有这样明说，但他未能提出新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7—8页。

② 见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第1卷（纽约，1963年）第84页，注46；考夫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第248页。关于这个观点是多数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证明，见《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2期第178页。另见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1期（1925年）第257—346页。

③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24—125、134—135页。

的客观调节因素，这就使他不能免于“唯意志论”的罪名。其次而与此有关的是，他喜欢用不协调的现在时态来讨论将来的事情。① 从这两方面来看，他的表述都反映了与战时共产主义有关联的“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但就《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纲领含义而言，最严重的弊病还在于布哈林未能分清不平衡时期与建立平衡以后的时期的界线。他谈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又是向新的社会平衡的过渡，从这一平衡中社会将进入社会主义。不清楚的是：平衡确立以后，是否仍然理所当然也继续采取在建立新平衡时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他有时暗示应该如此。② 但他对过渡过程的分析，就分清了两个不同时期，一个是旧秩序崩溃后收拾残局的开初时期，他称之为“经济革命”或“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这是从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借用来的术语，而后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另一个意义上使之成为一句名言）；另一个是“技术革命”的后续时期，这段时期中生产将得到渐进的、协调的繁荣发展。③

换句话说，布哈林对平衡的认识似乎与他对过渡时期的分析有矛盾。如果平衡状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别的平衡，都意味着生产因素与范围要均衡，那末，在过渡时期的某一阶段上就应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布哈林的解释想两全其美，这种解释表明了认识上的混乱：

“*平衡的基本原理是无效的*……既没有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

---

① 这两条指责都是奥里明斯基提出来的，见《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47—251页；部分地也是由列宁的姐姐安·伊·叶利札罗娃提出来的。见对于她的1921年的评论的档案材料的讨论，《苏共历史问题》1972年第1期，第118—122页。

② 见《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38—139页和第146页上他关于强制在造就共产主义新人方面的作用的论述。

③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62—63、101—103、110、132—133页和该书第8章各处。

各部门之间……也没有体系的人的因素之间的均衡。因此，把适应一种平衡状态的范畴、观念和法则转到过渡时期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只要社会没有衰亡，就继续存在平衡。如果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是很长的话，这样的推理会是正确的。一个社会不可能在平衡以外生存很久，它会衰亡。但在一定时期里这种社会制度可以处于'反常'状态，即处于平衡状态以外。"

这种说法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比较短的；另一种是：布哈林的意思只是指过渡到一种稳定状态，社会主义将由此逐渐发展。有理由认为他在1920年相信第一种解释，但在1921年以后他就提出了第二种解释。①

布哈林推理中包含的二难推理，在他关于农业的讲话中又是明显的。农业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对他来说是清楚的。他解释说：重建城乡平衡的必要性，"对于人类命运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是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可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却与他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很不适应。这里，他又提出了强制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强制征粮方面。然而，这在革命初期却是至关重要的，这时候整个社会处于过渡时期，其特征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倾向与农民的商品无政府倾向之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争"。他没有明确指出这种斗争的形式或场所。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确实认为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不可能是"组织"农民的主要手段，相反，他争辩说，对于多数小生产者来说，只有主要通过交换领域才能把他们吸引到有组织的机构中来……"②

这句话十分有趣地预示了布哈林后来提出的通过市场——但

---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32—133页。后来当布哈林的思想改变后，批评他的人将引用这段话来证明他曾一度认为平衡并不适用于过渡时期。见A·列昂节夫：《右倾的经济理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41页。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82—85、146页和第5章各处。

是没有市场的基本机制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既然排除了主要的集体化，他也就排除了市场与城乡之间的“货币——信贷”联系。在1920年，他仍接受国家“分配与收购机构”是工业城市与小农经济的农村之间的基本桥梁。① 问题应该是清楚的；没有商品市场，又怎么来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剩余产品呢？布哈林谈到过一般农民的“两个灵魂”——一个倾向资本主义，另一个倾向社会主义，他大体还希望好的灵魂会自愿出售余粮。对于这种没有把握的可能性，另一种选择就是实行长期的征集制度。书中的一个少见的悲观观点暗示：布哈林已看到这种窘境：“（俄国）革命轻易取胜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向共产主义目标奋斗时受到反对地主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但同样是这个农民阶级，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时期的最大阻力。”② 这当然是布哈林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战时共产主义没有防备的一面。

《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对这样一本书的最后评价应考虑到当时对它的反应。这本书的声誉之所以超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因为布哈林对新资本主义的结构、“革命的代价”、“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创新的论述，这些问题同1921年以后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种看法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令人遗憾的但又是必要的插曲。虽然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争论的”，但没有人怀疑它具有相当的影响。③

---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85—87页。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51页。

③ 列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文集》第12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413页，注19。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对非布尔什维克也有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证据，见A·V·查雅诺夫：《农民经济的理论》（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1966年）第43—44页；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引用的查雅诺夫的话，《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72—273页。

的确，在党内部分人中，它受到了公开的敌视，因为它确实可能发生巨大影响。1917年被年轻的左派挤掉的一个老一代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米哈伊尔·奥里明斯基，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不久就发起了猛烈攻击。奥里明斯基攻击布哈林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代之以“布哈林主义的奴役、枪杀政策”，攻击布哈林“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人们要给予这本书以《共产主义ABC》一书的同等地位。在奥里明斯基看来，这就是“党内那一部分人”的进一步阴谋活动，这些人“热衷于掌权”，认为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对此，布哈林用轻快的语调进行了回击，指责奥里明斯基提出“修正主义”的指控。①

当时战时共产主义正处于瓦解和受到批判的过程，因此，奥里明斯基轻易地赢得了几分。但他把这本书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主张同布哈林的一代人混同起来，这是错误的，也是极不明智的。列宁在他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私人笔记中，在他1920年5月31日为发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共产主义科学院撰写的“书评”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列宁对这本书总的评价是好的，后来由于发表列宁的笔记时的环境，结果把列宁的评价给歪曲了。在1929年斯大林取得对布哈林的胜利以前，列宁的笔记一直放在档案库里。1929年这些笔记被挖掘出来，作为摧毁布哈林的理论功绩的运动的一个部分。② 斯大林主义评论家们自然大谈特谈列宁的消极评论——这种评论固然很多，但这些评论说的是布哈林与列宁作为知识分子的不同，而不是谈这本书本身。

---

① 关于奥里明斯基的攻击和布哈林与一个匿名的作者的辩护，见《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47—251，252—274页。奥里明斯基开始打算给中央委员会写封信表示他的反对意见，但是后来决定公开发表他的评论。这篇评论的发表日期是1921年4月，正好是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写的。他对这本书在青年人中的影响特别担忧。他受到了列宁的姐姐的支持。见《历史问题》1964年第5期第23—24页，和本书第139页注①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347—403页。

列宁大部分的反对意见集中在布哈林的用词上。他特别不喜欢布哈林不使用“人的语言”而使用他所谓的“波格丹诺夫式的废话”。在列宁的头脑中，与此密切有关的是布哈林喜欢用的“社会学”、“社会学的”这样的字眼。他一再报之以“呸！”“哈哈”、“折衷主义”的指责，有一次还说：“好，‘社会学家’布哈林最终把‘社会学者’这个词打在讽刺式的引号里去！好极了！”① 列宁的责难反映了两个人的思想发展方向很不相同。布哈林对现代社会学思想甚感兴趣（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显示的那样），并认为波格丹诺夫关于“组织科学”的新作是饶有趣味的；列宁则本能地厌恶现代各种流派的社会理论，并始终如一地不喜欢与波格丹诺夫有联系的任何东西。② 当布哈林说有什么东西“在理论上有兴趣”时，列宁就给予讽刺的驳斥。列宁的其他反对意见更带有实质性的内容。有的是属于以前分歧的领域，如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有的则正确地集中在布哈林论点中的太抽象和需要澄清或由经验证明的部分。这些意见是一个友好而带同情心的批评者的中肯意见。

但列宁的所有保留意见，比起他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最“战时共产主义”式的章节的热烈赞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关于新国家作用、一般的“国家化”、军事化、动员群众等的几乎每一个段落，列宁都常常用三种语言批道：“很好”，还有布哈林的“不平

---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355、356、359、360、371、372、385、387、400—401页。

② 列宁在长期也曾用过“社会学的”语言。例如，可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181页。但是1909年和1909年以后他同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激烈辩论，看来使他不相信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潮，特别是企图用它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努力。他们的不同的思想方向是列宁同布哈林在波格丹诺夫的著作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基础。例如，1920年9月，布哈林曾对弗·涅夫斯基写的一篇对波格丹诺夫大发雷霆的文章表示抗议，而列宁则喜欢和支持这篇文章。布哈林抱怨说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对不对，而在于如何去理解它们，而“涅夫斯基最缺乏这一点”。《列宁文集》第12卷第384—385页（俄文版）。

衡”、“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受到同样的赞扬。很突出的一点是，列宁把最大的热情倾注在有关强制作用的章节上，他在这些章节的边上都写满了溢美之词，最后并写道：“这一章写得精彩！”这种判断在他整个评价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在结束他的简要评论时表示希望：一些“小”缺点“将从以后的版本中消失，新的版本对广大读者十分必要，而且会使科学院获得更大的荣誉，我们祝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有如此精彩的作品。”① 奥里明斯基害怕这本书的影响；列宁则热烈期望将来再出版。后来，苏联再也没有出新版了，列宁的评论也一直未得到发表。

布哈林有一次谈到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著作时指出，“人不犯错误，就一事无成。”② 这个格言也适用于《过渡时期的经济》。这本书的关键缺点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缺点。布哈林的分析未涉及苏俄后来长期的经济问题，如投资与积累、工农业关系、数量上与质量上扩大整个经济等。用奥里明斯基的话来说，它根本没有撰写“经济发展的下文”。赞美“自觉调节器”的到来，并不是经济纲领。《过渡时期的经济》实际上是谈不平衡和革命代价的问题；布哈林的错误，如同他后来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就是把这种经验普遍化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指责也适用于他自己；因为他虽然在转变过程中加了一个破坏阶段，但他也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好象社会主义将象“机器制造的神”那样到来。这是“好象身上披满长春藤的少女同身带花环的小伙子就是预示着《启示录》中四个马伕的来临。”③

谁要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象传统政客那样，必要时会采取政治狡猾手段，以集体的果敢来行动，他就应考虑到战时共产主义的

① 《列宁文集》第11卷第396、402页（俄文版）。

② 《真理报》1928年10月25日第3版。

③ 埃里克·霍弗：《真正的信仰者》（纽约，1960年）第20页。

死亡。从这些政策的明显破产后起码过了六个月，直到1921年3月才最后抛弃这些政策。[①]战时共产主义是由于危机，并且是在党内激烈争论中开始的，最后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的，只是这时争论的问题是苏联工会的作用罢了。

人们实际上从1920年初开始关注“经济建设”问题，当时内战胜利似乎已成定局，这种关心只在夏秋之间由于发生了同波兰的短暂而意外的战争和进行对白军的最后战役而有所中断。1920年1月官方正式承认苏联所受到的经济破坏是极其严重的[②]。到了秋天，工农业的严重短缺已发展成全国性的社会危机。各大城市由于饥荒蔓延，处于半荒废状态；农村的动荡不安已演变为反对政府的公开敌对行动，农民用暴力反对征粮以及其他官员的行动越来越频繁，农民在广大农村中结帮行劫。一种新的内战在党的面前隐约出现，党在它一度的支持者——劳动者中越来越感到孤立。[③]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此采取了千变万化的反应，时而采取果敢行动，时而处于半瘫痪状态。想象不到的人提出了想象不到的建议。1920年2月，托洛茨基建议用实物税代替硬性的粮食征集制这个战时共产主义的关键措施。（他的建议虽未提出恢复市场交换，但提出的时间比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步骤还早一年。）他受到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拒绝，于是就立即“重新投入大家接受的愚蠢行动之中”，主张把劳动“军事化”当作走出死胡同的出路。[④] 奥新斯基此时已成了党政机关不民主现象的激烈批评者，

---

① 以后有些官方的报道中至少是默认这一点的。例如，可见A·爱恒瓦里德：《苏联经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31页；A·斯列普柯夫：《喀琅施塔得叛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第15页。

② 布哈林：《国营农场代表大会》，《真理报》1920年1月22日第1页。

③ 关于这段时期，见保罗·阿夫里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普林斯顿，1970年）第1章。

④ 见列昂·托洛茨基：《新方针》（伦敦，1956年）第60—61页；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96—498页。

他主张在农村加强强制措施，要求国家对一些耕种地区实行强制性的管理。列宁从各省官员收到的报告，表明农村形势日趋恶化，官僚主义的经营不当的影响日益严重，只好有限度地同意奥新斯基的计划。后来，他曾指定政治局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来考虑“农民中的危机”，但除此之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放弃余粮征集制，代之以实物税，使农民可以贮存他的余粮，这个问题似乎直到1921年2月初才在政治局进行讨论。① 当时的领袖们仍把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胜利了的无产者所采取的普遍的、一般的、……‘正常的’……经济政策”。② 1920年11月较晚时候，他们把剩下的私人企业全都收归国有，只有极小的企业除外，好象是要用增加战时共产主义的谬论的办法来重申他们的信仰似的。

布尔什维克也和多数统治者一样，与其于没有把握的事，不如维持现状。怀疑情绪可能上升，但他们仍坚信现存制度，因为这制度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们现在希望现存制度为“和平建设”也取得重大胜利。不管情况如何，乐观主义情绪仍普遍流行，而且看来，最醉心于这种乐观主义的莫过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就是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颂歌，这本书正是在危机深化的情况下写的，使他呈现为信念不衰的最大的乐观主义者。但如果仔细观察，则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虽然布哈林在整个官方生涯中习惯地显示一种乐观的信心但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私下怀疑和政治上忧虑的证据。他常常是公开乐观、私下忧虑的人。象诗人海涅——海涅本人被当年发人深思的激进主义所吸引，受到布哈林的仰慕——那样，布哈林是“艺

---

① 关于奥新斯基的建议，见他的《对农业的国家调节》（莫斯科，1920年）；《活动家》第2卷第93页。关于政治局的讨论到列宁，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80—281页；《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莫斯科，1970年），第1册，第47、49页。

② 布哈林：《谈今日的取消主义》，《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4页。

术家和学者常有的心灵深处的恐惧的牺牲品”。[①] 1919 年他同一位英国朋友狂热地大谈世界革命的必然性，随后他突然讲出心里话：“有时我担心这个斗争十分激烈、十分旷日持久，甚至会把整个欧洲文化破坏无遗。”[②] 不看布哈林的私人文件，就很难判断他对苏联发展的个人想法。但有一点很明确：他长期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感到头痛。

在那几年里，布哈林提出了一些使布尔什维克暴力合法化的最可憎的论点。其中有：“革命中谁打破对方的头颅，谁就是胜利者”；对于不分资本主义行动与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的人，他指责说：“驼背的病要治好，只有一死。”[③] 然而从个人来看，他对打破别人的头并无多少兴趣，有一次，他具有特色地拒绝授权处决一个军队的叛逃者。更重要的是他对苏联警察恐怖的规模感到惊恐，1919 年他曾要求限制契卡处决人的权力。其结果是列宁指派他带着“否决权”参加契卡委员会。布哈林对重复出现的对非布尔什维克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作出错误处理的情况感到担心，经常为他们采取行动，后来以布尔什维克中的“自由派”和“调解人”而知名。[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于 1919 年 9 月 25 日，在一个莫斯科的集会上讲这个总的题目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具有不同政见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竟爆炸了一颗炸弹，炸死在场的十二人，炸伤五十五人，包括布哈林本人。[⑤]

---

① 见布哈林有关海涅的评论，《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158页。

② 阿瑟·兰瑟姆：《1919年的俄国》第82—83页。

③ B·德文诺夫：《1917—1922年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忆录》（纽约，1961年）第181页；布哈林的言论，《共产主义评论》1921年第6期第73页。

④ 关于这些事件，见邓尼克的《采访记之十七》；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8页；利伯曼：《建设列宁的俄国》第70页。关于布哈林参加契卡的情况，见《列宁全集》第五版第51卷第47页。

⑤ 《1919年9月25日的爆炸》（莫斯科，1920年）第19—20页。

尽管布哈林把革命强制与暴力合理化，但他极少提“阶级斗争”，后来苏联的大多数镇压与恐怖行动就是在这个法律标题下采取的。布哈林除了在讲到红军对白军、无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以外，在讨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很少使用阶级斗争的概念。他估计到了已开始的“各阶级的变形”，但他未预期在内部会有长期敌对的阶级敌人或发生长期内部争斗。① 他的政治对手后来指责说这一“错误”来源于他的阶级的概念，他强调“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作用”，而不强调它们内在的相互间的敌对。② 不管是何种理由，布哈林从来没有同意过后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到来时“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

他对新出现的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也同样地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虽然是“国家化”的热心提倡者，但他很了解在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落后的社会里，官僚主义化泛滥的危险。就在他极端乐观主义的《共产主义ABC》一书中，他也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一种严重危险。工人摧毁官多为患的旧国家，目的并不是为了换汤不换药。”③ 的确，他已开始担心，并且后来长期担心着：划分了劳动群众与有特权的“工人贵族”，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上层，一个“社会等级”。他警惕米凯耳斯和帕累托的上层分子论，迅速对一些促使工人阶级内部分成阶层的措施提出抗议。他严厉地指责这样的措施不会导致社会主义，而只会导致杰克·伦敦的“铁蹄”④。

---

①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47页；例如可见他在第四章中对技术知识分子将如何被吸引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42页。

③ 《共产主义ABC》第195页。

④ 《工人贵族还是工人群众的团结?》，《真理报》1919年9月14日第2版。关于他对苏维埃官僚机构的评论的其他例子，见《真理报》1918年12月19日第1版和1919年11月21日第1版。

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乐观主义淹没了一切怀疑，因为时代的危险不允许有失望情绪，因为布哈林赋予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以理想化的政治觉悟和创造力。1918年3月他自己提出的无产阶级正在“解体”的警告很快就被人遗忘。① 他的“转变过程”概念的中心是：其他社会集团解体，而无产阶级则保持着它的内部“联系”，而且越来越团结，因而成为“组织力量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布哈林相信群众，而不相信上层分子，这种设想（或希望）使他认为“先锋”（即政党）与阶级之间“不存在隔阂。”② 与此同时，俄国工人阶级人数减少了一半，因为产业工人为了生存回到农村去过“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这方面的失望情绪到了1921年3月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当时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气质不仅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小资产阶级气质简直贯穿在无产阶级之中。”工人阶级已经“农民化”了。③

到了1920年初，布哈林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信念开始衰退。此时他以过去不曾有的方式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他好象对内战感到厌倦和憎恶。提出“革命代价”论是一回事，经受这种代价又是另一回事。波兰战争是出乎布尔什维克意外的，虽然布哈林希望有资源把战役打到华沙以外，“一直推进到伦敦和巴黎”，但他为战争的结束感到高兴，为使政府有余力“对付内部形势，对付饥寒交迫的问题”。他第一次提出从那儿去取得今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的问题，指出建设时期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时期”，是“最伟大的时代”。④ 他的不满情绪加深了。形势不断恶化，官员们却写出一

---

①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25页。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52、58、64、142—143页；另见《第八次代表大会》第43页。

③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21、224、225页。

④ 《真理报》1920年1月22日第1版；《真理报》1920年2月18日第1版；《工会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1年）第5—6页；《真理报》1920年5月30日第2版；《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第38—44、50—52、57页。

份份乐观的报告，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他对于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计划的前景是悲观的。特别是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他震惊。他说，一层控制一层，结果不能不给整个“苏维埃肌体”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建议一个新的口号：“与其控制坏的机关，不如改进它，使之变好”，这个口号是列宁著名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口号有趣的先驱。①

但正如布哈林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强调的那样，基本危机涉及农业。农民问题的两个方面首次在他多数讲话中突出起来，一个是如何建立巩固的城乡经济关系；另一个是如何扭转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局面。他们没有答案。他一面劝告党的干部不要再向农民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而要启发他们的“理性”，一面继续同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反对“自由贸易”。② 但到了1921年1月，他对形势看得和别人一样清楚，几乎任何一种解决方案，他都可能准备接受。他说：“我们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的农民在搞暴动，要用武力镇压，这种暴动今后还会激化……我认为共和国正在经历着苏维埃政权从未遇到过的最危险的局面。”③

可是在这危机时刻，党的注意力却在别的地方。1920年冬，正当一场灾难威胁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在内战后工会的作用问题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分裂成对立的两派。这种争论是使人困惑不解的典型，它同国内真正危机仅仅有表面上的关系，而主要地却暴露了党在采取新经济政策前夕的混乱、犹豫不决和意见分歧。这场争论的前前后后，我们无需涉及，只是它的根源是在于对官僚主义的、权力主义程序的广泛不满情绪。论点中包含

① 《生产宣传》（莫斯科，1920年）第7、11—12页；迈克尔·法布曼：《退却中的布尔什维主义》（伦敦，1923年）第266页。

② 《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第52页；《生产宣传》第7、11—12页。

③ 引用于《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2期第16页。

各种因素，其中有对将来的经济政策的关注，有某些工会领导人想实现1919年党纲中所许诺的让工会在经济管理中取得权力的欲望，还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在幕后的个人争斗和个人恩怨。①

这场公开争论是由托洛茨基挑起来的，他的计划是要使劳力军事化，把工会改造为国家驯服的生产工具，他的计划在1920年秋以前一直得到列宁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工会活动家从一开始就对军事化表示反感，而在11月间，当从来不是外交家的托洛茨基号召改组执拗的工会领导时就爆发出来，变成公开的反对。这时候列宁抛弃了托洛茨基，采取了较温和的立场，承认工会是国家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共产主义学校"），承认工人需要工会保护不受苏维埃国家的侵犯。在这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已经四分五裂，竟提出了八个不同的纲领。当气氛澄清以后，就看清主要的对手是：列宁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一群以工人反对派知名的人，他们发出强烈的工联主义的呼声，反对党和国家控制工会，要求工会独立管理工业。②

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反映他在新经济政策前夕的踌躇不决。他重复一些老概念，但也在摸索新思想。这也是他第一次作为党内斗争的政治单干户出场表演，因为他已同他当年的莫斯科盟友从政治上脱离了关系。以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都仍然盘踞在莫斯科组织中，他们对党的官僚主义的批评与工人反对派的批评是类似的。1920年11月，布哈林公开号召莫斯科以外的"新生力量"使莫斯科组织"健康"发

---

① 见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第14—17章；丹尼尔斯：《良心》第5章。

② 主要纲领重印于《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540—578页，即所附的《俄共（布）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提出的草案》、《"工人反对派"提纲》、《"缓冲派"提纲》、《民主集中派提纲》。

展，并建立一个“在当前困难条件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务实的”委员会，这样他就同莫斯科组织彻底决裂。[1] 他这时是作为党的高级领导的代表讲话的。同时，他既不是对左派关于党内民主的呼吁毫无反应，也不是完全同意列宁或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意见。因此，他就作为一个妥协者或“和事佬”[2] 出现（“和事佬”是他在1923年试图扮演遭到同样悲惨结果的妥协角色时人们对他的称呼）。

1920年秋以前，布哈林一直主张劳力军事化，工会“国家化”，后者意即国家与工会合管经济。他看到工会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工会独立于国家的作用。这一直是党的官方态度，并同列宁一样，他曾支持过托洛茨基最初的建议。当争论爆发时，他不再谈论军事化，而采取了介乎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立场，把他们纲领中的一些内容结合起来。他把他的“国家化”概念解释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区别于托洛茨基的靠命令进行“整刷”。此外，他认真对待党在1919年9月提出的鼓励民主程序的保证。这样，当列宁抗议向广大群众公开工会争论时，布哈林回答道：“我们已宣布一个新的神圣口号：工人民主这就在于一切问题不在小的委员会上讨论，不在小会议上讨论，不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讨论，而拿到大的会议上去讨论。”他坚持认为，公开的讨论是“前进了一步”。[3]

在中央委员会的争论中，布哈林开始想通过提出一个妥协性的提案进行调停。这一手失败以后，他就提出自己的工会观点，也就是所谓“缓冲性”纲领。他解释道：“当火车发生倾斜，快要翻车的

---

① 《准备莫斯科代表会议的选举》，《真理报》1920年11月15日第1版。

② 《联共（布）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398页。

③ 《关于工会的讨论：材料和文献（1920—1921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78—80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79页。

时候，缓冲并不是件坏事。”他说，列宁的纲领（受到季诺维也夫支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是一致的，应该结合起来。工会既可为生产也可为民主服务；工会应是“技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也是“共产主义学校”。同时，他的纲领是对“工人民主”的热烈支持，并呼吁把工会和国家机关逐渐“熔合”起来，但在“熔合”时不要贬低工会：

“如果总的渐进路线是使工会熔合的路线的话，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使国家‘工会化’的过程。它的逻辑与历史结局将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吸收工会，而是国家与工会两个范畴的共同消亡，是第三者——按共产主义组织的社会的建立。”

为了保证工会官员的平等地位，布哈林建议工会给经济岗位的提名，国家必须接受，但一旦上任，这些官员必须接受国家的指示。①

妥协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可贵之处，但布哈林在错误的时候提出了错误的纲领。列宁愤怒而迅速地把他挑出来，指责他是主要的恶汉：“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他指责布哈林犯了“工团主义”，指责他主张牺牲“革命的适宜性”来实行工人民主，“陷入了折衷主义”。最后这个罪名给列宁的印象特别深，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写了一段话，来教训布哈林什么叫辩证法。他写了一大篇，还引用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布哈林从各种纲领中到处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用“折衷主义”代替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57页；《“工人反对”派提纲——工会的任务》，《关于工会的任务和结构》（“缓冲派”提纲）；《关于工会的讨论》第78—81页；布哈林的言论，引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历史》第4卷第438页和《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2期第14页。

"辩证法"。[1] 布哈林听到妥协"不符合辩证法"可能很惊讶，这个贬义词通常只限于哲学讨论或至少是理论讨论的。但列宁是认真的。三年以后，在他的"遗嘱"中，他指出：布哈林"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这很可能是隐晦地指工会问题上的争论。[2]

列宁如此严厉对待布哈林，是绝无仅有的。1920年 11 月以前，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包括工会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这时列宁明显认为布哈林没有当好一个忠诚的、不动摇的支持者（这个角色此时由季诺维也夫来出色地担任），更糟的是：他是偏向托洛茨基。列宁在解释布哈林"与共产主义的决裂"时说：

"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使人非常喜欢而且不能不喜欢的特点。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软蜡'。就是说，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恶意煽动者'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3]

布哈林企图防止党的领导的分裂，而列宁认为这是不忠诚的行为。妥协已经不再可能，布哈林于是伤心地发表了反驳文章，不久就同托洛茨基联合提出一个联合纲领，提交即将召开并就此事作决定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4] 到了 1921 年 1 月，托洛茨基已放弃军事化，降低了其他要求，他经过修改后的立场与布哈林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5、33—34、56—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页。

④ 布哈林：《工联主义和共产主义》，《真理报》1921年1月25日第1版。关于他们的联合纲领，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提出的（决议）草案：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收于《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551—562页所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提出的决议草案：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在上面签名的有许多人，包括八名中央委员。

的立场相类似。他们的联合纲领赞成“工人民主”，赞成工会管理工业，主张“国家化”，但明确指出这是“长过程”，并同意工会应是“共产主义学校”和“生产单位”。从布哈林方面，他放弃了工会提名具有约束力的思想，重申党对工会人员的管辖权。有人认为这是对托洛茨基的投降，但布哈林却很满意，他说“我们没有参加托洛茨基的队伍，是托洛茨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①

应该指出 1921 年 2 月这件事同全国的实际形势毫无关系。从真正的危机来看，以列宁为一方和以布哈林、托洛茨基为一方之间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列宁关于工会要保护会员不受国家侵犯的论点，是更符合结束战时共产主义 、恢复私人企业时的急迫情况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则不同意这个命题的提法。但双方都仍根据现有制度考虑问题；在此范围内，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至少企图通过改组行政机构来对付经济危机。但到了 2 月 15 日，布哈林对于讨论无关的问题感到十分恼怒，于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党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实际问题上来，转移到“农业危机”和“我们的经济的命运”上来。②

但是，这些领导人物，由于“巨大惯性的影响”，继续进行拖延，好象要招致外来压力才肯行动似的。③ 二月晚些时候，工人的自发罢工横扫了彼得格勒，那里象在莫斯科新首都那样，人们开始愿意接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宣传鼓动。由于农村里农民起义开始在城市里得到响应，一个反对党的工农联盟的幽灵开始缠绕着布尔什维克。结果，在 3 月 2 日，终于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一度是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公开爆发了反政府

① 见上述决议草案；布哈林的话，引用于《无产阶级革命》1924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② 《临渴掘井》，《真理报》1921年2月15日第1版。

③ 斯列普柯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5页。

的叛乱。叛逆者们为俄国的“劳动者”请命，引用着1917年人民反对“共产党贵族统治者警察当局”的流行格言，指责党已经背叛了革命。①

在喀琅施塔得起义遭到政府军队镇压的时候，党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第八天，列宁宣布用公平的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把全部剩余产品留给农民。② 对于这个重大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样，通过废除征集制、实行某种正常的城乡贸易，就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在政治局争论了一个月，③ 但是谁也没有明显地领会到：这个决定会迅速导致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导致恢复私人资本、市场和货币交换、许多企业的非国有化，从而缩小社会主义或国营成份。

以新经济政策而知名的制度已悄悄地建立起来，而在党代表大会上却很少人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列宁的工会纲领轻易地获胜，也未经多大的争论。（下届党代表大会上需要起草一个新决议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代表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痛苦的喀琅施塔得事件上。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内战胜利者的凯旋大会，可是它的领袖之一布哈林却告诫大会：“现在，共和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之中。”④

---

① 关于这些事件和这次叛乱，见阿夫里奇：《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

②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403—415页。

③ 伊丽莎白·德拉布金娜：《严冬山隘》，《新世界》1968年第10期第39页。

④ 《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28页。

第 四 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停滞不前的话，那才是奇怪的。

——布哈林

1921年初的事件标志着苏俄历史和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布哈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看法的转折点。在他后来称之为“幻想破灭”[①]的事件以后，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开始了重新思考他们对革命的基本设想的痛苦过程。新的社会条件很快引起了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在后来的八年中同1917至1920年的思想遗产掺和在一起并进行竞争。由于内战而出现的党内表面上的一致，迅速化为一阵一阵的深刻分歧和长期的不团结。直到1929年(这时保持不同政见就有危险，人们被要求实行更严格的团结)以前，党内真正一致的事例是少见的和转瞬即逝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原来潜在的异样性在过去三年中被部分地压下去了，现在又重新冒头。布哈林曾一度哀叹(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的神话

---

①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3—4页。

已扎下根来)只有"一个单一的党，它的心理和思想都是清一色的"；而现在，党已分裂成为"具有不同心理和不同倾向的不同的派别"。①

部分地由于党内思想与纲领上的巨大分歧，苏联的二十年代，即从采取新经济政策到1929年斯大林推行"自上而下革命"的年代，是思想活跃，丰富多采的十年。无论在哲学、法律、文学、经济学，还是在其他领域，都发生了范围广泛的理论争论，有的争论与当时党的领导的政治辩论有关，有的则无关。这些理论上的争论，使二十年代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史上一个最生动活泼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饶有趣味的时期之一。

当时的学生自然是在多样性中探索各种模式，但他们的方法往往是在理性争论中的各种对立观点和党内各种政治派别之间推断出含糊不清的关系来。这种方法很没有说服力，不管讨论的题目多么非政治性，在每次讨论中都要把双方分为左派和右派。他们还用同样方式，企图在某一个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阐述(即他的社会或哲学理论)和他的政治之间建立死板的联系。这种做法从来是很难行得通的，而在布哈林问题上尤其容易把人引入歧途。

人们广泛认为，布哈林二十年代所主张的谨慎的进化政策——这种政策使他先后同布尔什维克左派和斯大林对立起来——主要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机械理解以及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平衡论。有人争辩说，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严格的决定论的，他强调客观条件对于人类的干预能力具有压倒优势。这种观点同二十年代的左派纲领以及1929—1933年斯大林的"大转变"中所埋藏着的唯意志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认为政

---

①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30页。

治上和经济上的唯意志论是同苏联哲学界以阿布拉姆·德波林*为中心的反机械论派密切有关。机械论派不喜欢德波林关于命题及其超验的含义的提法，反机械论派则和他们不同，认为辩证法包含物质的自我运动和由量到质的飞跃。在涉及到布哈林的哲学观点问题上这种反机械论的观点代表着西方学者和苏联著作家之间少有的共同之处。1929年布哈林下台后，苏联发动了一场官方的清算运动，把被斯大林击败了的对手同不受欢迎的哲学流派联在一起。从那时起，苏联的著作家们还坚持认为，布哈林的"右派"纲领是他的机械论的逻辑结果。事实上，西方的解释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和启示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对布哈林的批判。①

在这种论点难以说明的几个难题中，最麻烦的也是最明显的布哈林系统地阐述他的社会理论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是在1921年秋问世的，那时他所热情支持的极端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才结束几个月②。而且，他写这本书的时间刚好是同写《过渡时期的经济》的时间相同的，而后一本书是从理论上为唯意志论和社会飞跃作辩护的。人们也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过渡时期的经济》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包含着布哈林的著名的机械论和

---

* 阿布拉姆·德波林(1881—1963)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03年起为布尔什维克。1907—1917年是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与孟什维克决裂，成为党外人士，从事教研和教学工作。1928年加入联共(布)党。1926—1930年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责任编辑，192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1935—1945年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译者注

① 西方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有雷蒙特·鲍尔：《苏联心理学中的新人》(麻省，坎布里奇，1952年)第2章。同样，见古斯塔夫·韦特：《辩证唯物主义》(纽约，1958年)第143—149页。关于苏联的论点，见Ⅰ·鲁波尔：《关于右的偏向的理论根源问题》，《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第11—15页；B·格森和Ⅰ·波德沃洛斯基：《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9年第9期第1—29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莫斯科，1921年)。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引文都引自《历史唯物主义》英译本。

平衡论，虽然前一本著作散发着剧变的因素，而后一本则散发着渐进的因素。

由此可见，上述论点所依据的，与其说是布哈林的社会理论的实质，不如说是两个虚假的假设。一个认为在机械论哲学家与党内的右翼之间存在着“自觉形成的联系”。这种“神话”后来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时进行了“广泛而自觉的努力，力图把哲学上的讨论与党内的派别争论区分开来”，具体地说就是“让布哈林置身于哲学争论之外”。① 第二个假设以为布尔什维克（或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然同意一种理论立场，那么他大概也会在其他问题上表示赞成。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它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样性，也否认了斯大林主义以前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错综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也否认了布哈林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异性和争论性。这本书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几乎可以使每一个人觉得高兴或不高兴。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本书的反应都是毁誉参半的，但对布哈林最不友好的布尔什维克批评家却也是一个和他同路的机械论者，此人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许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非辩证的”。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布哈林和反对他的那个批评家互相又都攻击对方是“决定论”者。②

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把思想一致性强加给人们以前，布尔什维克们在某一个理论问题上取得的一致意见，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亲近融洽，无论是在理论问题上还是政治问题上。

---

① 戴维·约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1917—1932》（纽约，1961年）第48、54、56页和第3章。

② 见S·萨拉皮扬诺夫的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第3期第62—76页；布哈林：《在无聊的道路上（对我的批评者的回答）》，《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1期第275—289页。

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这里只需指出：党内左派的化身托洛茨基就很少在哲学问题上发表意见，如果发表也是作为机械论者发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来成为左派最突出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经济时采用的是平衡模式。① 简而言之，最好还是听一下1909年一位党的领导人的哀叹，他说没有那两个布尔什维克哲学家会有一致意见。②

上述情况决不是说布哈林的社会理论同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政策毫无关系。这只是为了说明，关于布哈林的社会理论与他的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提法，除了会歪曲他后来的渐进主义的根源与性质外，还模糊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真正有趣的内容。这本书教育了一代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它的译本还在苏联境外被广泛阅读。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是作为一本教科书写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基础的基础'缺乏系统的阐述"——，但它的目的也在于开辟新的理论阵地。布哈林知道，用半官方的教学法的形式提出新的思想，会再次引起他的党内批评家的"保守主义"，因此他在书的开头就保证说：他虽然要"离开对这个题目的一般阐述方法"，但他仍忠实于"对马克思学说作最正统、最唯物主义、最革命的理解的传统"。他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基本教义系统化，使之更准确，而且要提出一些"新观点"。③ 他的大部分新提法和新观点，都是对同时代批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家的答复。

---

① 关于托洛茨基，见约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第97—100页；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见他的《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中的经济平衡问题》，《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7卷(1926年)第35—76页和第18卷(1926年)第63—84页。

② 李可夫的话，引用于约拉夫斯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第40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1923年)第5—6页；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的提出(随笔)》，《进攻》第115—116页。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范围广泛的思想理论上的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布哈林对反对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作回击的终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篇章。按照他的习惯，他回击挑战者时往往借用他们的武器。

奇怪的是，有人竟会把死板的经济决定论归咎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因为正是布哈林详尽地批驳了这种说法，并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除了一元论的因果观。一位敏锐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正确地指出：布哈林极力向一元论前进，但结果却接近了多元论。①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虽然摈弃了非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难以解释的偶然性，但也举出了历史上一些"假定"的例子，举出了一些依据各种因素也可能引起不同历史发展的事例，举出了一般变化的多种因果关系的事例。"社会决定论"并不是宿命论；它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有条件的，都有促使它们必然发展的原因……"比如说，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人的意志或上层建筑；"它是说明它们的。"②

在关于上层建筑的章节里，布哈林的多元论观点最为明显，他把上层建筑看作"最广泛"的范畴——意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复杂的、有各种差别的概念，除了"具有各种物质内容的社会政治秩序"外，还包括社会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经济基础规定并解释这些现象；但布哈林指出（就象恩格斯先前指出过那样）：这些现象也有自己的生命和能动性，而在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长期过渡中，这时存在着"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过程……"。③ 鉴于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验，很难提出与

---

① 见皮蒂利姆·索洛金的评论，《经济学家》1922年第3期第148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1—2、6章和第76—79、226、268页。

③ 同上，第207—208、264页；另见《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1期第287—288页。

此相反的论点。

但布哈林同样也知道，上层建筑在现存社会中，在造成社会变革方面所起的功能上的作用。他要回答经济学与社会学方向的心理学流派提出的挑战，说明马克思主义考虑到了一些不太明确的因素。他一方面拒绝西方当时流行的鲁滨逊思想，另一方面也承认心理学、意识形态、道德和风俗的极大重要性。它们使社会聚合在一起："协调人们的行动，把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使社会不致瓦解。"正如它们一度是一种凝聚力量那样，取代现行的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精神革命"）就标志着旧的社会秩序崩溃的第一阶段。总之，布哈林提出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因果观："在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进行着互为因果的不断过程。因果互易位置。"①

布哈林对上层建筑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剖析被证明是他所作出的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他提高了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这个命题自然是受到许多布尔什维克欢迎的。此外，他对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的"积累"与"物质化"的提法也被认为是十分成功的。由于明显的原因，他关于阶级、政党、领袖们的阐述也是令人满意的，受到欢迎的，他的阐述对于后二者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的理论上的发挥。②《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比任何其他单独的著作，都更把布哈林确立为党的主要理论家，并且可能是苏联二十年代最杰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人。③ 但是他的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不在这里，而在别的方面。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169、227、228、256页；《过渡时期的经济》第62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8章。布哈林列举了他认为是成功的新发挥，《进攻》第115—127页。

③ 关于把布哈林看作理论家的例子，是V·波伦斯基：《革命时代的文学运动概要》（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8章。

自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正在兴起的现代社会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最强烈的思想挑战。那时候的社会学，不象后来那样变得更狭隘、更经验主义，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理论为方向的。它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是研究的面很大的而且往往是历史规模的理论，同时它也自认为是科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人物——诸如杜尔克姆，* 帕累托，克罗齐，** 维贝尔，米凯耳斯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意见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抗这一庞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的中心问题，并发展了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人们可以象摈弃他思想中的德国哲学残余那样摈弃他的结论，但不能无视他。帕累托说："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个社会学的部分，这个部分胜过其他部分，并且往往是符合现实的。"① 马克思对社会学的贡献现在已经得到承认，在某些地方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声誉大大超过了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作为预言家的声誉。② 然而，应该强调指出他对早期理论家的影响。正如H·斯图瓦特·休斯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论证场所……"马克思的著作是"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的助产婆。"③

这种新的社会学对布哈林有深刻的影响，布哈林与许多布尔

---

* 杜尔克姆（1853—1917）法国社会学家，是孔德的继承者，专门研究道德社会学。——译者注

** 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哲学观点把新黑格尔主义、康德哲学、马赫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译者注

① 引用于休斯：《意识和社会》第79页。除了休斯的著作（第3、8章）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早期社会学思想的影响，见T·B·博特莫尔和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著作选集》（纽约，1964年）第29—48页。

② 同上书。另见博特莫尔：《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和社会》第30期（1966年），第11—24页；拉尔夫·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加里福尼亚，斯坦福，1966年）第1册；雷蒙·阿隆：《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第1册（纽约，花园城，1968年）第145—236页。

③ 《意识和社会》第74页。

什维克领袖不同，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在他1917年以前流亡国外时的著作中以及后来的许多论著中都表现得很明显。他确认，现代的一些科学的社会理论——其中许多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提出来的——都威胁着要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科学，而且总想否认它是一种世界观。但是，布哈林也赞赏这些理论的成就。同苏联后来的作法相反，他不是简单地排斥社会学思想；相反，他力图在社会学本身的阵地上同它交战。对于他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学。在他的书中（该书俄文版所加的副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1]，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有两个重要分支，它们研究的不是某一个单独方面的社会生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科学之一就是历史；另一种就是社会学……历史研究并描述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社会生活潮流流动的情况……社会学则答复一些一般性问题，如各种社会现象（经济的、法律的、科学的等等）的相互关系如何，如何解释它们的进化过程，社会的历史形式是什么……等等。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概括（即最抽象）的一种……历史为得出社会学的结论和作出社会学的概括提供材料……而社会学则反过来制定一种历史方法。"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社会的一般理论，是社会进化的法则，即社会学。"[2]

布哈林认为（或者说，他说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有阶级性"，因而"无产阶级社会学"更能说明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受到

① 英译本题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

②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第12—15页。

他们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虽能看到社会的相互关系，但不能指出社会的矛盾。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整个学派“十分有趣”。《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对他的影响，这本书还表明了布哈林同这种社会学提出的批评所作的不懈战斗，他力图用社会学的术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理。①

当然，布哈林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倡社会学这个组成部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朝这个方向发展和脱离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明显的运动，在欧洲已持续二十多年了，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发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几个学派。这种传统在维也纳尤其强烈，代表这个传统的是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的著作。他们在著作中，“发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且还是现代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②除此以外，以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也夸耀它有一段很长和很丰富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虽然同政治运动有联系的社会学曾统治着舞台，但到了1917年，学术性的社会学在沙俄各主要大学也已确立起来。③

现代社会学虽有这些凭证，但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它的遭遇并不好。说来也有趣，列宁早期的研究著作《资本主义在俄国

---

①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第10—12页；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可见他对米凯耳斯和帕累托的上层人物论的回答，第309—311页。

② 博特莫尔和鲁贝尔：《卡尔·马克思》第39—45页；乔治·利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评论》（纽约，1962年）第305页。

③ 俄国和苏联社会学思想史还有待于写作。现在有一些大部分是片断性的研究材料，如皮蒂利姆·索洛金：《二十世纪的俄国社会学》，收于《美国社会学协会：报告和讨论》第21卷（1926年）第57—69页；《苏联社会学：历史前身和当前评价》，亚列克赛·西米连柯编（芝加哥，1966年）。

的发展》不是没有社会学价值的，他本人在1894年就曾争辩说：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1] 但1908—1909年他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尖锐的哲学论战。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场论战使列宁从此就对西方一切社会学理论抱有偏见。从那时候起，社会学(此后一直被打上引号)只是他嘲弄的对象。在拒绝布哈林1916年关于国家的文章时，他单独把“‘社会学’???”理论的看法挑出来批判[2]，并且正象他对布哈林《经济学》一书的评论所说明的那样，到了1920年，他对社会学的术语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虽然在列宁发表过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但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列宁的反对意见是从这本书的副题开始的。

并不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都象列宁那样鄙视社会学的，虽然他们也不总是同意布哈林对社会学的作用的理解的。许多人宁愿要社会学，而不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是哲学的论点，这是德波林派所主张的，而为机械论者所反对的一个观点，机械论者认为实证科学实际上取消了哲学的必要性。虽然1922年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已从苏联的大学中排除出去，但一直到1930年代初为止，布尔什维克社会学者没有停止发表严肃的理论著作和经验论著作，到1930年代初在斯大林统治下，社会学才遭到了多数社会科学所遭受的命运。[3] 然而，即使在二十年代，对现代社会学的怀疑(如果不说是直截了当的敌对态度的话)已在党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社会学，这本身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7—218页。

③ 《苏联社会学》第19页；另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2期(1929年)第189—213页上的讨论。

就足以触怒早期对他进行批评的布尔什维克批评家，[①] 这些批评家中有许多人无疑是同意1930年在反布哈林运动中所作出的判决的。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一种特别的‘社会学方法’……马克思的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说成是‘社会学方法’的辩护人只能把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学说调和起来，而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②]

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思想中，社会学就成了一个长期的禁区，只是在独裁者去世以后，苏联的学者才能够重新提出社会学。在这个背景下，布哈林要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就需要一种特别的理论勇气和探索勇气。在二十年代，有一个苏联著作家把他称作“无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家”。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生活在俄国的皮蒂利姆·索洛金*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相当友好的评论，他写道：这本书比起其他布尔什维克著作来，“更有文采，更有趣，更加科学”。[③] 一个美国社会学家在更近的时候肯定了索洛金的评价：“它代表了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精心努力，他试图同正在出现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体系达成妥协。”[④]

*　　　*　　　*

---

① 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第3期第62—63页和1922年第11—12期第172—173页。布哈林对那些人是有意见的，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第14—15页。

② 《共产主义革命》1930年第2期第20页。

* 皮蒂利姆·索洛金(1889—1968)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前为彼得格勒大学讲师。1919—1922年在彼得格勒高等院校讲授社会学，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一度在布拉格大学讲课；1923年起移居美国。——译者注

③ 波伦斯基：《文学运动概要》第178页。关于索洛金，见《经济学家》1922年第3期第148页。

④ 见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为罗伯特·米凯耳斯写的序言，《政党》(纽约，1962年)第27页注22。

在现代社会学就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提出的各种方式的挑战中，对马克思主义者最麻烦的挑战是涉及辩证法问题的。辩证法概念，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作为现实中假设的存在，都深深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化的性质与方向的学说之中。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摆脱的黑格尔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有懈可击。而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含义仍不明确。马克思深信他已使辩证法具有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性质，因而很少就这个题目撰写文章，只局限于把它应用于历史。只是在马克思晚年和死后，由恩格斯来把辩证法在历史、自然与人类思维方面的理解加以发挥和系统化。他这样做了，也就为辩证唯物主义这门正统而普遍的学说奠定了基础。有些学者争辩说，恩格斯完成的体系是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尖锐决裂，但一般人都一致认为恩格斯的著作归根结蒂是用一种修正过的形式恢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用一种模糊的形而上学观点来说明运动——在历史与自然方面半神秘地发挥了辩证法，因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出现的黑格尔主义对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一点在1933年出版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表现得很清楚），并且成为德波林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内容。①

布哈林抛弃了这种倾向，坦率地表示他的反对意见。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从它的在行动中的神秘外壳中解放了出来……，"但辩证法仍保留了"与黑格尔的提法不可避免地相联系的目的论的味道，而黑格尔的提法是建立在'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基础上的"。布哈林对科学的（"激进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的探

---

①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见Z·A·约旦：《辩证唯物主义的进化》（纽约，1967年）；关于列宁，见他的《哲学笔记》（莫斯科，1933年）；关于德波林，见留耐·阿尔伯格：《被遗忘了的哲学家：阿布拉姆·德波林》，《修正主义》第9章。

求，他想驳斥那种指责马克思主义最终体现了唯心主义的说法的愿望，反而把他引向机械论。他解释说，先前，马克思主义者曾反对社会科学中的机械论解释；但这来源于所谓原子是“一个孤立的粒子”的被批倒了的旧观念。对物质结构和运动都有新发现的电子理论已否定了这一点，并证明机械论的语言是表达有机联系的一种手段。布哈林是否充分理解现代物理学，这并不象他的下述信念那么重要，即他相信“各个领域的科学思想的最先进倾向都是接受这一观点的。”①

在他看来，机械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而机械唯物主义驳斥了那些坚持把社会概念“精神化”和“心理化”的思想家。布哈林在给每一个社会类别下定义时都着眼于保持这种意象：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工作机器，里面有许多细微的社会劳动分工”；生产关系就是“人们（作为活的机器）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劳动关系”；等等。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用机械论的语言对辩证法进行“理论的、系统的说明”。“这一点，”布哈林认为，“已由平衡论加以论证。”②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中心内容就是布哈林的下述论点，即辩证法以及社会变革都可用平衡论加以说明。③ 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广泛的概念，而不是他在这方面提出的大量细小的论点。按照布哈林的观点，辩证法（力本论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不论是物质的或社会的，都处于运动状态，而运动又是一定体系中的冲突或内部矛盾引起的。同样，任何体系，又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都倾向于平衡状态（与生物学上的适应相类似）：

“换句话说，世界上存在着以各种方式起着作用的，互相排斥

① 《进攻》第116、118页；《历史唯物主义》第75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217、276页；《进攻》第118、121页。

③ 在几章中都有这个总的论点，特别是第3、5、6、7章。

的力量。它们只是在某些例外的场合下才在某一时刻互相平衡。这时我们就看到一种'静止'状态，也就是说它们的实际'冲突'隐蔽起来了。但是我们只要改变这些力量中的一个，'内在的矛盾'就会立刻暴露，平衡会遭到破坏，如果立即确定新的平衡，那末这种平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各种力量的另一种结合下确立的。由此可以得结论说：体系的运动是受朝着不同方向行动的力量的'斗争'、'矛盾'也就是对抗所制约的。"

布哈林把运动的根源归因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而不归因于"自我发展"。这样，他就认为他已从黑格尔的著名的三项式（正题、反题与合题）中清除了唯心主义成分。他的相应公式是最初的平衡、平衡的破坏和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平衡。①

每一体系——他继续写道——都处在内部与外部两种平衡状态中。内部平衡是指体系内部各种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外部平衡是指整个体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平衡"；它总是处在"流动中"，处在一种动态平衡或运动的平衡中。布哈林理论的关键在于内部与外部平衡的关系：

"体系的内部结构……必须随着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一起变化。后一种关系是决定因素……内部（结构的）平衡是依赖于外部平衡的量（是这种外部平衡的'职能'）。"②

把布哈林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它就意味着：一个存在着的社会必然会有它的三大社会要素——物、人与思想——之间的一定的平衡。这是内部平衡。但是"没有环境（即自然界），社会是不可思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64、72—75页；《进攻》第117—118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74、78—79、239—241页。

议的"。社会要适应于自然，并通过社会生产的过程从自然界取得能量，努力与自然达到平衡。在适应过程中，社会发展了一种"人造的器官系统"(布哈林称之为技术)，这种系统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的物质指示器"。布哈林之所以能够——尽管他对社会发展进行了多元化的分析——保持经济决定论中的一元论因果关系，就是靠把社会技术同生产力结合起来("各种劳动工具的结合")，使内部结构成为外部平衡的一种职能。或者如他所承认那样：

"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社会发展，是因为它表示了社会……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与体系的相互关系就是最终决定任何体系的运动的量。*"①

这种理论模式表达了布哈林的把社会发展系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平衡不断受到破坏。它能以两种方式趋向恢复：一种是"通过整个社会各种部分逐渐适应(进化)"；一种是通过"暴力起义(革命)"。只要社会平衡的外壳(主要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各阶级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和持久力，就会产生进化。这样，比如说，资本主义就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向前发展。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与"这些生产力的基本结构"即"资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发生革命。"外壳也就炸开了。"一种新的社会平衡确立了，"这就是能作为生产力的进化形式而存在的新的、持久的生产关系外壳……"②

如果这种抽象理论孕育着逻辑的纲领含义——如象布哈林的政治上的对手1929年突然发现的那样，那也不是很快就明显的。对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5—6章；《进攻》第119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242—249、261—262页。

机械论的标准攻击是，它对运动的理解排除了从量到质的变化和总的“飞跃”。据说这就是政治上的渐进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布哈林提出的论点恰恰是相反的：“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它可以在自然界与社会的几乎每一步发展中找到根据。”他甚至得出了同批评他的人一样的政治结论：“认为自然界不允许这种剧烈变化的看法，只不过反映了对社会变动的恐惧心理……”① 还有一种说法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这种说法认为布哈林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因布哈林强调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得此名——只能导致在客观条件面前消极投降。这种“自然主义”也存在于《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他在该书中争辩说：内部与外部平衡应由意志力来恢复。②

当逻辑不通的时候，斯大林主义批评家们就用联想的办法来论证偏向的存在，以支持他们的论断。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波格丹诺夫——当时官方已把他当成臭名昭著的政治偏向的典型——早先也曾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而赞成机械平衡的模式。然而，他们却否认布哈林理论与波格丹诺夫理论之间明确的不同之处，也否认了1917年前后布哈林长期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历史。③ 这两人之间在思想上有趣的密切关系，那是一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79—83页。

②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36、44、87—89页和第10章。

③ 见M·Z·塞列克托：《辩证唯物主义和平衡理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4年）。在1917年以后，布哈林经常攻击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和政策，他认为这两者是一码事。在一次涉及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的著名的理论争论中，他同意波格丹诺夫，而不同意列宁。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要波格丹诺夫的不顺从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从属于党。而在1921年由于受到波格丹诺夫的思想鼓舞而出现少数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时，列宁让布哈林去负责进行思想上的反击。见布哈林：《走向“无产阶级文化”代表大会》，《真理报》1921年11月22日第1—2页；《列宁文稿》第4卷第170页。布哈林虽然敬慕波格丹诺夫，但他把波格丹诺夫看作一个“半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对波格丹诺夫来说……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他个人的悲剧”，《真理报》1928年4月8日第3版。

个单独的问题，但对人们普遍认为布哈林是波格丹诺夫的门徒这种看法不应该不提出异议。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很难找到这位年长的思想家的影响，而且这本书长篇大论地反对"心理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明显背离了马克思所曾亲切地强调过的社会学中的唯物主义，这一论点就是专门针对波格丹诺夫的。①

更有效的是回顾一下，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机械平衡模式（特别是动态平衡模式）已从物理、生物学发展到社会科学，这种模式在社会科学中已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平衡论在科学中好象已成了最后拍板的话；然后，象今天那样，它就成了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索洛金指出 1922 年的一个有关例子：布哈林对社会平衡的阐述在好几个方面与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第二卷的阐述相类似。②"波格丹诺夫派的用语"——这十分激怒了对布哈林的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理论的语言，这个事实说明了布哈林与波格丹诺夫之间的确存在着亲密关系。他们两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容易遭到新思潮的抨击、也容易接受新思潮。他们两人都认为可让批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去看看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波格丹诺夫 1908 年曾宣称："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对我们的重要性不在文字上而在于精神上，"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序言中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永久停滞不前，那才是奇怪的。"③

尽管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能多少说明布哈林后来对苏

---

① 《进攻》第120 页。

② 《经济学家》1922年第3期第146 页。

③ 波格丹诺夫的话，引用于肯德尔·贝尔斯：《哲学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1908—1909年布尔什维主义的危机》（未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论文，1966年），第86页；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23 年）第6页。

联社会的看法。他的社会学——他对社会进化力学和现存社会如何起作用的兴趣，——表达了他的思想中的一个不同的面，这种思想直到1921年一直好象主要还是同革命动乱和社会大变动合拍的。换一种说法，《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的不同格调（比较起来后者几乎是一本最心平气和的小册子）部分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着重谈的是社会生活的不同时期：前者描绘的是革命不平衡的过渡状态，后者描绘的则是平衡社会的更经常的情况。恰恰在后一本书中，在他讨论平衡社会时，布哈林认识到任何一个稳定的成长中的社会，必须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它的各种组成部分至少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和谐。

许多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性预见，往往把乌托邦前的社会看成只是各种不可调和的势力与互相斗争的阶级的战场。他们总在寻找危机和崩溃的先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机能失调的畸形现象。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他们通常都“回避甚至嘲弄”资产阶级关于社会互相作用和合作的概念。①虽然这种形象保持了革命的热情，但它并没有提出关于社会建设的意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自然强调社会冲突处于突出地位的例子，但他也认识到：和谐的因素和“合作的时刻”一般都占上风。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他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严重混淆”感到惊异。社会是各种冲突力量的总和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他显示了各种凝聚因素、“社会联系”以及维系公众社会的“铆钉”的重要性。他关于社会向大自然作集体斗争的描述对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类花了几百年时间进行艰巨的斗争，才把他的一个铁嚼子放进大自然的嘴里。”②

---

① 索洛金的话，《经济学家》1922年第3期第146页。

② 见《历史唯物主义》第86—87、99、104、151、209、219、255页。

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布哈林关于国内政策的思想都说明他十分了解一个社会要起正常作用所必需具备的前提。他确信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在于重建被革命与内战破坏和分裂了的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一体化就意味着使苏维埃权力"正常化"，并使之能为尽可能广大的人民所接受。在党——国家与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本身的原子化成分之间，要用志愿机构的形式，建立各种"桥梁"和"纽带"。他强调社会一体化的思想所根据的，就是他后来在纲领争论中提出的基本设想：真正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要以国内和平、合作与和谐为依据；一个自身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是不可能具有很大生产力或繁荣的。由此就产生了他于二十年代坚持主张的政策思想，即认为苏联社会的一切阶级和阶层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作出贡献。由此就促使他无情地反对那些主张实行足以引起新的不和与内部争斗的纲领的布尔什维克。

至于平衡论本身如何影响布哈林对真正的社会问题的看法，这就更难估计了。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平衡论的宏观社会学上的使用同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后期在计划争论中主张的动态经济平衡分开。这种范围较窄的（虽然是有关的）论点只涉及他对平衡的或按比例的经济发展的信念，说明他反对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包含的那种有选择的"飞跃"和不合比例。[①] 以经济平衡条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在资本论第二卷也可以找到，这种观点并不是独特的观点，即使是布哈林的反对者，有时也含糊地承认这一点。[②] 比较容易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布哈林把这种有限的概念推断成宏观社会学的模式，并宣称"马克思早已

① 见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② 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6章；塞列克托：《辩证唯物主义》第9章，特别是第169—170页。

暗示过这种提法(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理论，基于这种平衡理论的劳动价值论等等)。"①

这就从许多方面使他受到正统派的怀疑。比如说，他给社会下的普遍定义，把平衡模式运用到一切社会形态中去，这就使他遭到指责，认为他抛弃了马克思所珍视的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是强调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独特特点与具体规律的。尽管布哈林坚持"按照社会本身的具体条件去研究每一种社会形式"，但他已具有社会学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不是个别的社会形式，而是一般的社会"。② 而且，如果这种平衡模式能够普遍化的话，这不就意味着在一切社会中都有一种普遍的调节器或规律在起作用吗？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谈到"劳动支出"是社会同自然关系的规律时，只不过是暗示一下答案而已；后来，他就提出"劳动支出规律"是"在任何一种社会一历史形态中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③

人们批判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政治含义时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平衡论是以社会和谐为条件的，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却证明社会充满着冲突。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模式以对抗社会的平衡模式方面，苏联的著作家并不是孤立的。在最近对社会学的现代结构—机能学派的批判中，就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持不同观点的西方社会学家们争辩说：机能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及其自动平衡概念不能容纳从内部开始的真正社会变革，因此它更重视和谐的稳定。他们进一步提出平衡意味着规范的(保守的)方针，这种方针不注重社会冲突，认为不平衡因素是反常的、病态的。有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75页；另见《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29—130页和注1。

② 《历史唯物主义》第69、70页；但他在233页上坚持说，"根本没有什么'一般的社会'"。

③ 同上，第115页；《真理报》1926年7月3日第2版。



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说，“选择平衡模式就必然排斥革命道德……”① 因此，把政治保守主义同平衡论联系起来（平衡论至今仍是苏联思想界持续研究的一个课题），② 并不只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布哈林从未认真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看来他是清楚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的。他曾有意识地否认“完全和谐”的概念，在他对他的潜在的批评家的反驳中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说：“观察一个社会制度，一个不合理的、盲目的社会制度，从平衡的观点来看，当然与完全的和谐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平衡是从这样的事实中产生的：即这种制度存在着，并且在发展着。”“发展意味着这是一种动的平衡，而不是静止的平衡”。③ 把平衡看成是一个动的概念，这看来完全符合社会总有冲突与变革的假设。的确，布哈林相信，把机械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可有力地批驳社会是生物学的机体模式的论调，这种论调把不平衡因素说成是一种病态。④ 最后，他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在某些历史时期社会和谐将占上风的观点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平衡的恢复总是暂时的，越来越不稳定的。在革命发生以前，将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的事例。换句话说，这里和谐和社会的自动平衡是受历史局限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为持久的社会平衡提供条件。

但布哈林的抽象理论是否真能说明发自内部的深刻社会变

---

① 见拉尔夫·达伦多夫：《脱离乌托邦：重新确定社会学分析的方向》，《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4期（1958年）第115—127页；博特莫尔：《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莱维斯·科瑟尔：《社会冲突的作用》（格伦科，1956年）第1章。结论是辛西娅·伊格尔·拉西特：《美国社会思想中的平衡概念》（纽黑文，1966年）第53页。

② 见V·S·布留科夫：《马克思主义和平衡理论》（莫斯科，1965年）。

③ 《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30页；《历史唯物主义》第240页。

④ 《历史唯物主义》第87—88页；《进攻》第150页。

化，是令人怀疑的。说到底，正如他对技术的论述所反映的那样，他把内部平衡依附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深入变化的动力来自社会制度以外。虽然社会学家对于机械平衡模式的有效性一直是有分歧意见的，但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这一个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经常是前后不连贯，有时甚至是原始粗糙的。

所有这些很少直接涉及布哈林的政治。他坚信，如果没有和谐，“社会不会发展，只会衰退”。[①] 他的这种信念贯穿着《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正如同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会最终创造出和谐的、有成效、持久的平衡的信念一样。1921年以前，他认为这种前景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出现。但随后不久，他的信念完全变成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真正阐述的内容是：布哈林，如同苏联二十年代“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党——国家的思想，而且看成是十分注意西方的现代思想成就，并与之相竞争的活的思想体系。后来这些“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年代后期离开了政治舞台，而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清洗中被从肉体上消灭。这样，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状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的特征——在俄国得到了有利于思想意识形态的解决，而在未来的许多岁月里，探索精神就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消失了。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第219页。

第　五　章

重新思考布尔什维主义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象孩子，心思象孩子，意念象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13:11)》

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代表着我们的幻想的破灭。

——布哈林

在1921年，布尔什维克品尝了胜利的苦果。有人说，国内战争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①经济崩溃。国家遭受严重破坏，它的国民收入只及1913年的三分之一，工业生产只及五分之一（有些部门的产量实际上等于零），它的交通运输系统破损不堪，农业生产如此低下，以致大多数居民只能勉强糊口，另有几百万人甚至连这也做不到。避免最后灾难的预防性措施采取得太迟了。春天，饥荒降临到原先富饶的产粮区，带来了更多的死亡和疾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战神尚未离开这块土地。战争还在继续，现在是对起来反对政府的大批农民进行战争。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与之相比相形失色。只是依靠新经济政策的让步和红军的军

① 克里茨曼的话，引用于阿夫利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第8页。

事力量，农村的暴动才在1922年被最后制服下去。

党在这种不幸的形势下开始抛弃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以后二年半中不得不发展新的方针。这些新的经济政策（统称新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社会秩序（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共持续了七年，一直到1928—1929年开始斯大林的“大转变”为止。虽然新经济政策的年代，看来不过是大变动之间的一段和平的、对大多数居民好处愈来愈大的插曲，却是由几个时期构成的，这几个时期明显地具有不同的官方目标、成就和发展状况。首先，新经济政策在党的历史上是为决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针、苏维埃社会的方向和各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命运而进行大讨论的时期。

新经济政策是党的政策的大转折，但正如战时共产主义一样，它并不是按照一个事先拟好的蓝图发展的。它根据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自发地取得的发展，使一些布尔什维克感到后怕。他们以为一只潘朵拉盒子* 被无意中打开了。1921年3月开始设立固定实物税，以代替余粮征集制。这被认为是鼓励农民进行生产和交售剩余产品的有限步骤，而工业和城市的复苏都有赖于这些剩余产品。列宁本来的意图是限于在那些直接同国家交换商品或以物易物的“地方”实行正常的市场关系。但这很快就遭失败；到秋天，“普通的买卖”席卷了全国。结果，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不久就取消了，严格地说，这时候新经济政策才真正诞生。[1] 当自由贸易和市场关系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标志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在1923年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新政策。

---

* 据希腊神话，宙斯命潘朵拉带一个盒子下凡，潘朵拉私自打开盒子，结果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祸害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译者注

① 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3—14章；《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4—5页上布哈林的论述。

实物税逐渐地减少了，后来完全被货币税取代。虽然土地所有权在原则上仍然是国家的，但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对他们使用土地的权利给予了保证。在某些限制下，雇工和出租土地得到允许。但是，农民是否愿意出售剩余农产品，取决于能否换到工业品及工业品的相应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业生产，特别是消费品生产的复苏和稳定的币值。于是，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就渗入到整个经济。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把它们归还给（或在某些情况下出租给）私有主。剩下的国营企业则经历了一个非集中化、托拉斯化和商业化的过程；采用了成本会计以便使它们能够在竞争基础上进入市场。正统的金融活动，在1921年11月随着国家银行（在1920年取消）的重建而得到恢复，并通过传统的财政、信贷、储蓄机关和开展它们的活动而继续下去。硬通货政策变成为正规政策，尤其是在1923年稳定卢布之后。新经济政策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对立物。

这样，到1923年底，苏维埃俄国把第一个现代混合经济制度发展起来了。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国营成分控制着“命脉”，即最大的企业，包括整个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中央银行系统，掌握着对外贸易垄断权，因为这时国家已同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在工业生产中国营成分占着优势：虽然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8.5%，但它们很小，只雇佣了工业劳动力的12.4%，而国营工业则雇佣了84.1%。[①] 私人资本以所谓耐普曼或私商的形式存在于零售和批发贸易中，可是随着二十年代的进展，国营和合作社机构在这个领域中也占了上风。保留自由企业、私人资本和反社会主义倾向最多的是在农村。那里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革命的果实，在此基

---

① 1923年的情况，可见亚历山大·贝科夫所著《苏联经济制度的发展》（纽约，1947年），第107页。

础上出现了2500万个小农户。[1]党经常提到，国营或社会主义成分好象是小资本主义海洋中的一个岛屿，这个譬喻就是从这种形势中得出来的，它反映了人们担心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会导致社会主义成分的全部泯没。当工农业生产稳步地向战前水平攀登的时候，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和方面随着官方政策的改变而有某些变动，从1924到1926年的更多容许变为到1926年底和1927年的更多限制；但是1923年建立起来的总的经济结构一直保留到二十年代末。

与此同时，党—国家开始放松它对国家大部分经济生活的控制，转而去巩固它的政治垄断。经济让步中包含的危险，要用政治上的保护措施来加以抵销。契卡和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终止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零散活动；他们中有些人流亡出国，有些作为专家为政府工作，少数被囚禁起来。因国内战争而建立起来并取得了更大权威的一党专政，对它的合法性人们不再提出什么疑问了。但是当时只要不是对直接的反革命活动（反布尔什维主义）以外，相当程度的非政治的自由还是存在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成了一个比较多元化的社会。确实，除去对暴乱和其他社会党的镇压外，已把在1921年开始实行的严厉措施指向持有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包括今天的和明天的。

1921年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内政治中的一个深远转变的开始。在列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自己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是尖锐和公开地分裂的）的倡议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实际上禁止下面提出不同政见的决议：一个谴责工人反对派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客观上”是一个反革命派别；另

---

① 关于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农民社会，M·莱文在《俄国农民和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化的研究》（1968年）一书有一定的研究。

一个以党的统一的名义命令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否则就要采取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出党。[①]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中，对派别活动的禁止将受到称赞，但是党的领导重新加强党的控制的企图，使越来越膨胀的党中央机构（斯大林在1922年成了它的头头）取得了惩处个别党员的广泛权力。新经济政策在国内培育起来的松弛气氛，在党内引起的却是一个相反的方针。

这两个发展，即一种不确定的经济政策和一种由少数寡头决定一切的越来越极权化和官僚化的格局的出现，构成了二十年代党内大争论的舞台场景。两者在1923年都引起了反对。在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病倒和于1924年1月去世之后，它们成为接班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成为变动中的官方多数派和由列宁的继承人领导的具有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之间连续进行对抗的一出四幕剧：1923至1924年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驾马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1926至1927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最后在1928至1929年是斯大林的多数派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米哈伊·托姆斯基的斗争。每个反对派都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批评同对党机关的工作的指责结合起来；每个反对派都成为党机关的牺牲品。但是为继承列宁的衣钵和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持久的党内斗争的历史，不应遮住根本的问题。托洛茨基等人问道，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往何处去？新经济政策将引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②] 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维埃俄国建立？如果能的话，又如何建立？这些就是引起大争论的根本问题的几个组成部分。这些争论经常被说成是

---

① 见《第十次代表大会》，第571—576页。

② 列昂·托洛茨基：《俄国往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纽约，1926年）。

为了追求"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

布尔什维克的特色是信奉"不以这一次或那一次政治征服为终点"，而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唯一界限"的革命。[1] 经过四年的动乱和内战之后，他们现在可以从这个信念出发去思考和行动了。自从1917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巨大的，但大部分不是计划中的改变。在城市中，老的统治权贵和大资产阶级被打垮了或者被赶到国外去了。地主已被扫出农村，土地被分了，农民明显地拉平了——富农(在官员的眼睛里，富农是最富裕的农民和农村剥削者)大大减少，贫农增强，中农(既不富，也不穷；既不受剥削，也不是剥削者)成了主要人物。许多变化是在党的指挥下发生的，但是党并没有控制住这些变化。有些变化只能看作是祸福参半：怎么能把革命的分田同马克思主义对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信念协调起来呢；个体小农户的海洋是否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的循环呢？所有这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财产关系，但是它们没有从基本上影响经济的性质。即使达到战前的水平(一般说1926年恢复到了这个水平)，苏联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因此，党要想搞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工业化和现代化。

经过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这场革命起因于社会落后状况并以反对这种落后状况为方向)之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不发达世界中仍在继续进行的一个过程的开头一章，这已是平常的事了。在某些方面，沙皇俄国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前现代社会，它具有欧洲的文化历史和外交历史，它过去是个帝国，它有颇为重要的工业水平。但是它也并不是完全非典型的，它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和充斥着文盲的半亚细亚国家，那里外国资本起着重大作用。现在它被一个党统治着，它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看到工业化的

---

① 列昂·托洛茨基：《新方针》，第53页。

西方有一种敌视和忌妒的混杂心情。[①] 以后的形势已为世人所周知：革命党渴求现代化，它要求"赶上去"；国家受到"可咒的贫困"的折磨。布哈林听到国家电气化计划时，他象未来的现代派那样梦想着：

"贫穷、饥饿和衣衫褴褛的旧俄国，使用原始方法取亮和以几块黑面包为餐的俄国，将被一个发电站网所覆盖。……它将使俄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使一个分裂的国家变成人类中有智慧和有组织的一部分。地平线是无涯和美好的。"[②]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个造反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转变为一个社会改造运动并不是很快的。布尔什维克懂得俄国的落后在他们取得的政治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立刻把握住这种落后对未来会有什么含义。国内战争和欧洲革命的希望在一段时间里曾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再说，要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化任务，这个前景是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感情格格不入的；许多布尔什维克象布哈林一样最初把胜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所面临的出乎意外的情况只看成是"悲剧"。[③] 但是1921年德国革命的失败（1923年再次失败）使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1921年后，当"经济发展的常事"开始主宰党内争论的时候，现代化问题就铭刻在布尔什维克的头脑里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采用，这个问题成了列宁言论中压倒一切的主调。他对党说：我们实现了一场政治革命，现在我们必须实现一场经济和文化革命，把俄国从"宗法制度、奥勃洛莫夫主义和半野蛮状态"引向现代

---

① E·H·卡尔：《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三卷集，纽约，1958—64年），第1卷，第9页。

② 布哈林：《论工农通讯员：文章和讲演》（莫斯科，1926年），第77页；他的文章《伟大任务的时代》，刊于《苏维埃俄国》第4期（1927年），第190页。

③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324页。

化。①

不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完全甘心于接受这个民族任务的。有些人觉得这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终结。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一个孤立的国家能够克服这样的落后状态。但是也有许多人是能够把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熔合起来的，正如1924年的一篇社论（也许是布哈林写的）所说的那样：

“历史好象向共产党员们说：这是一个落后、愚昧、贫穷、满目疮痍、非无产阶级成分占着巨大优势的国家，你们将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将在这里证明，即使是在这种没有先例的困难条件下，你们也能坚实地打下一个新世界的基础。如果未来是属于你们的，那就排除万难，朝着你们的目标前进。”②

一旦任务被确认，那末问题就在于如何去实现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条件使得二十年代的争论变得复杂起来，使人们把纲领的性质看得同它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同样重要。纲领必须是“正统的”，也就是必须同党的历史精神相符合。据说斯大林曾宣布过，布尔什维克不需要“背弃列宁主义的实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主义”。③

但是当开始探索国内纲领时，党很快就发现，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党的思想在这里是极其混乱的。之所以会缺乏共同的基本看法，原因在于党的成分本来就不是纯一的，在于党员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在于（正如布哈林痛心地看到的）在一个统治党内部实行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造就了许多

---

① 《列宁选集》俄文版第3卷，第653页。

② 《我们的任务》，见《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第3页。

③ 尼·瓦连廷诺夫在《从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集体化》一文中的引文，见《新杂志》1963年第72期第242页。

各自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的职业集团和倾向。①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关于党的团结的严格决议，既是对存在这种分歧的承认，也是想用唐吉诃德的方式去压制这种分歧的尝试。但是这个理论危机的主要源头却可追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内纲领的时候。之后，临时匆忙地提出了两样东西，但这两件事都失败了：一件是在1918年初诞生了一半而后又被遗忘了一半的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件是信誉扫地（虽然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原因）的战时共产主义。即使是1919年党的正式纲领也已过时，已无济于事。布哈林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就曾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忠诚的党员。② 在布尔什维主义出现之前的经典著作也帮不了什么忙，现在人们认为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过渡时期问题上并没有提出过多少指示。③

布尔什维主义在1921年以后是被两个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和感情的）传统分成两支的一个运动，两者都植根于"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个可以叫做"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它从党在1917年10月举行的大胆革命和从国内战争期间对革命的英勇捍卫中取得了它的合法性和鼓舞力量。这些胜利似乎证明了，进行"勇猛进攻"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行动方式。这股始终不懈地革命的和毫不妥协地激进的英雄主义思潮，沁散着一位现代评论家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④ 另一个传统则更为谨慎和温和，它在1921

---

①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30—231页；另见布哈林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第3版上的评论。

② 《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版。

③ 见《列宁选集》俄文版第3卷，第703—704页；布哈林：《进攻》，第254、263页。

④ 头两个名词是列宁用过的，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62、144页；其他的提法见N·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第2版，哈尔滨，1927年）第107页。

年以前只不过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虽然它从列宁于1918年初提出的有限的经济政策中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战略让步中找出了历史合法性和可以援引的先例。随着新经济政策（它的明智的实用主义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对立物)的实行，这个传统发展壮大了，它明显地变成了进化的和改良主义的传统。在一定的范围内，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成两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两重性，即在马克思主义中意志论和决定论是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① 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这两个传统反映在党的左翼和右翼这两翼上。

英雄主义传统的调子是左翼反对派经常唱的。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胜利的设计师托洛茨基，是它的活的象征；他的高傲的举止和对采用行政措施解决问题的爱好，反映了革命的征服精神。尽管在国内政策上他也是有些改良主义的，他在文章里表现的十月革命的神秘气氛有甚于任何人。他在1924年写的论文《十月的教训》和其他文章中，把1917年上升为布尔什维主义真理的契机，坚持认为当时受到肯定的革命勇敢精神仍然是适用的。他从官方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中，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蜕化"的最早征兆。他意识到，而且是确实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学说正在变得非激进化。他提出警告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激进化产生了可咒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虽然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关于单一经济计划和"工业专政"的建议，同他后来的一些建议相比，还是温和的，但是他同时号召工人阶级在国内贡献出"血液和神经"，并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不可分解地同国际革命联系起来，想用这种办法使英雄主义的传统永恒化。他的"不断革命"概念，尽管遭到他的敌手的蛊惑性歪曲，最能够说明他的政治人格。他在1923年写道，"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役中的战士。我们是在进行短暂的

① 鲍尔：《苏联心理学中的新人》第14—15页。

野营”。英勇的战斗还在前面。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托洛茨基意识到“他开始从命运的顶峰跌落”，在这一点上他是看对了。[1]

党的其他左派分子在经济政策中更清楚地传播了十月的遗产。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那样的经济学家，很快就表示了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抗议给战时共产主义完全抹黑，警告说同小资产阶级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并号召进行新的革命进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就是要求作出极大努力去对付“两个战役之间的(危险的)喘息时间”的嘹亮号角声，尽管它的经济分析具有独到之处，而且它被认为同新经济政策的政治信念是相同的。他鄙视改良主义政策，他认为“正当无产阶级需要继续进行十月的英勇斗争（只不过现在的斗争是要反对整个世界经济，是在经济战线上，在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下进行的）”[2]时，这些政策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在皮达可夫看来，当“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已经显露出来的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规定的让步差不多就是对十月的背叛。他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不承认有限制性的客观条件的，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对他们是不可能的东西，对我们是可能的”。[3]英雄主义传统倾向于造成一种战斗的外观——直接的进攻

① 关于把托洛茨基描写为革命英雄，可见伊萨克·多伊彻的三卷传记和卡尔在《社会主义》第1卷第139—152页上的论述。这里的引语，可见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第24、44页；和列昂·托洛茨基的《文学和革命》(纽约，1970年)，第190—191页，另见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载于《为了列宁主义：论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433—486页，以及《新方针》。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俄共在当前农村中的政策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40—446页(俄文第三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伦敦，1965年)，第39页；亚历山大·厄尔里奇：《苏联的工业化辩论，1924—1928》(麻省，坎布里奇，1960年)第37页。

③ 尼·瓦连廷诺夫：《皮达可夫想象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载于《新杂志》第52期(1958年)，第140—161页。这句话我引自沃尔斯基(瓦连廷诺夫)的回忆录(未出版的手稿，俄国和东欧的档案，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

和大的战役，因为许多左翼反对派在国内战争时期都曾在前线服过役。但是十月的遗产是没有政治界线的，它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纲领都起鼓舞作用。主张制订目标明确的计划的人，用十月革命已使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失去效用，从而确立了目的论的优先地位的论据，在二十年代后期解除了他们的较为谨慎的同事们的武装。而在1929年，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将被正式称为"在农村中实行十月纲领的计划"。①

同英雄主义的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二十年代萦回在党的思想周围的两个观念：对"第三次革命"* 的梦想和对热月的忧惧。革命运动往往体现在一群人身上，他们在取得明显胜利之后要求进行"一次最后的革命"，以解决尚未完成的遗留任务。巴贝夫是法国"二次革命"的喉舌，德国法西斯主义有恩斯特·勒姆及其突击队② 作为它的"二次革命者"。十月革命以后，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者和工人真理派（一个地下共产党反对派）举起了"第三次革命"的旗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如何取得新的资金问题变得尖锐的时候，党内才能听到关于第三次革命（即彻底剥夺农村资产阶级和耐普曼，最后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谈论。直到斯大林在1929年把它付诸实施之前，第三次革命一直处在党的思想主流之外，还是那些被认为是党的狂人们的幻想。③ 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避开了这个问题，

---

① A·尤哥夫：《为战争和和平的俄国经济战线》（纽约，1942年）第5—6页；《共产党决议》第10—11期，1929年第96页。

* 1917年2月革命是第一次，十月革命是第二次。有时从十月革命起算，所以"第三次革命"也被称做"第二次革命"。——译者注

② 戴维·汤姆森：《法国的民主》（伦敦，1960年），第19页；艾伦·布洛克：《希特勒》（纽约，1964年），第28—30页。

③ 这主要是指拉林。见布哈林在《进攻》第276页上的评论；《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7、13页；《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25年），第185—186页。

虽然他们对斯大林的革命所抱的模棱两可态度表明，第三次革命对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常常用热月的蜕化（第三次革命者用来吓人的东西）的预言来纠缠党。

差不多每一个研究俄国革命经验的人，都对它同法国革命的雷同具有深刻印象。布尔什维克们宣扬他们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社会革命党人诧异地想："我们不是俄国的吉伦特派又是谁呢？"；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艾伯特·马西兹也用他的广博的知识研究了1920年发生的历史类似情况。① 显而易见，法国的历史曾紧紧抓住了布尔什维克的头脑：托洛茨基于1925年辞去军事委员的职务，以反击有人说他怀有波拿巴野心的指责。② 所以，一些观察家把实行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个伪装的热月，那是很自然的。一个英国记者赞同地看待新经济政策，路标转换派（一批亲苏维埃的非布尔什维克专家）怀有希望地，而孟什维克则是幸灾乐祸地看待新经济政策。③ 可是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热月的前景是一个可怕的幻影，是走向革命终结的第一步。1925年第一个提出热月的幽灵来反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的，似乎是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是把它提高到指导性原则的却是托洛茨基。在1926年以后，这个问题处于他对苏维埃社会的理解和他的反对意见的中心。他用热月的尺子去量每一个非激进化的征兆和每一项政策，不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他在1926年惊呼说，"人们已

---

① 布哈林：《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纪念捷尔任斯基》（莫斯科，1926年）；皮蒂利姆·索洛金：《俄国日记选辑》（纽约，1924年），第93页；马西兹1920年的文章，译载于《异议》杂志（1955年冬），第77—86页。

② 夏皮罗：《共产党》，第290页。

③ 迈克尔·法布曼：《列宁之后》（伦敦，1924年），第3页；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第41—46页；布哈林对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评论。见《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速记记录》（2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1927年）第一卷第80—81页，第二卷第118页。

嗅到了‘第二章’的气味。”[①] 这种类比缠住了托洛茨基，并在最后把他引向错误，使他看不清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不断革命论反映了英雄主义传统的乐观主义的话，那末热月就象征着这一传统在改良主义看来感染了党的时候所表现的失望。

在1921年，革命英雄主义的观点统治着党的思想。十月和内战的精神，以及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最高准则的老观念还是很强的。再说，为改良主义的进化立场提供实质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它的出世并不体面。它起始于不合法的气氛中，党不得不接受它，是由于国内发生的暴乱和外国革命的失败，党的领导一直把它描写为“退却”。尽管列宁坚持说，新政策公布之后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分歧，但这些政策仍然引起了“失望”、“士气沮丧”和“愤怒”，并在党和共青团的队伍中引起了反对。[②] 一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痛苦地抱怨说，在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③] 开始时，人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它不足以鼓起热情或启发人们去制订长期纲领。但是不久就有两件事情使改良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更易接受。第一是普通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和平情绪，在多年的动乱之后他们要求国内和平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列宁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用他的巨大的威望来支持改良主义的倾向；后来党的主要理论家布哈林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纲领并使之成为他的创造。

---

① 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纽约，1962年），第146页；另见《我的生活》，第513页。季诺维也夫分子是彼得·扎鲁茨基。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358页；和《新反对派：关于1925年讨论的资料集》（列宁格勒，1926年），第45页。

② 见《列宁选集》（纽约，1937年），第9卷第149、212—214、221、286页；布哈林：《新的经济政策方针》，载于《共产主义ABC》（哈尔科夫，1925年），第309页；布哈林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109—110、112—114页；利伯曼：《建设列宁的俄国》，第94—95页。

③ 系贝索·洛明纳泽。见《新反对派》，第163页。

列宁坦率地向他的追随者提出新经济政策，是把它作为因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而需要实行的一种退却提出来的。但是他力图使这些政策合法化，他声明这些政策的制订是“认真的并且是为一个长时期的”，他说实行它们就是回到他在1918年初提出的正确的、未能实现的政策上去，而且好象是为了使党相信它已不再处于溃退状态，他很快就宣布退却已经结束（虽然作出这一宣布后政策并未随之有什么改变）。同时，他开始批评同战时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工作方法："猛烈进攻"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认为“一切任务……都可用共产党的命令加以解决”的想法，那是“共产党的自大狂”。① 在革命四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在非激进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之父爱德华·伯恩斯坦促使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改良主义革出教门之后二十五年的时候，列宁给改良主义的概念恢复了名誉。他谴责“扩大了的革命性”是国内政策中最大的危险，他写道："目前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新的东西就是需要在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上采取‘改良的’、渐进的和小心地进行迂回的活动方式。”他把新的方法和老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相并列："同以前的革命方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的方法（革命是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旧事物的转变，它不是去小心地、缓慢地、逐渐地重建它，因而力图破坏得越小越好）。”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阐述，直到他去世为止。1922年，他用表示希望的形式给《真理报》寄去了一封简短的贺信："我希望，在下一个五年中，我们用和平方式攻克的东西，将不少于我们过去用武器攻克的东西。”②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82—284、319—357、421—422页，和第33卷第59、70、377—381页；《俄共（布）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4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1年），第23—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6、87页。关于列宁的改良主义遗产，见瓦连廷诺夫：《学说》第14—15页。

无论是列宁，或者是很快就追随他并超越了他的首倡权的布哈林，都没有把他们的渐进主义解释为同革命准则或十月理想相背离的东西。譬如说，两个人也都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一点具有长期意义的教益：必须积极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历史性联盟，这一联盟在1917年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合"而取得胜利的。① 目标仍然是彻底的社会变革。布哈林允诺说："我们的革命并没有结束"。渐进主义意味着不是靠"革命之剑的一击"，而是靠沿着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有机地逐渐前进去实现经济革命。② 列宁和布哈林在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一起承担了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主要责任；他们关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赋予布尔什维主义以一种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的意识形态，他们两人中谁也没有公开抛弃过激进的传统。但是如果说在理论上阐明改良主义同激进主义可以相容的主要工作落到布哈林身上的话，那末只有列宁才最早提出那些势必会被认为是进行深刻修正的东西。因为，除了热月党人外，布尔什维克们都记得爱德华・伯恩斯坦。

布哈林在1929年失败后，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开始把他称做苏联的伯恩斯坦③，这是一个有趣的比拟，但是它是会给它的支持者带来某些不安的。马克思主义的幸存的创始人和伯恩斯坦的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3页；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版，莫斯科，1929年），第7—8页。这个概念最初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集，莫斯科，1955年)，英文版，第2卷第454页。

② 《为了列宁主义》第373页上布哈林的言论；他的《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25年)第48页。

③ 例如，1929年8月24日《真理报》就这样称呼他，《列宁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史实》一书第512页曾予引用。确实，斯大林主义批评家后来就把布哈林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等同起来。可见D・彼得罗夫斯基的《党同改良主义的斗争》（莫斯科，1925年）第48页。

良师恩格斯，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写了一篇引言性质的论文，这篇论文似乎对正统的教义进行了修正，提出在某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不经过革命取得政权。伯恩斯坦利用这个“最后遗言”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修正和非激进化进行辩护。[①] 列宁在1922年12月底第二次患病后，在1923年1月2日到2月9日之间，口述了五篇在题材上互相连贯的短文：《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是他的最后几篇文章。布哈林很快就认为，这些文章构成一篇“政治遗嘱”，一整套“指示”，它们标志着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伊里奇……看到了无法避免的结局……他开始口述他的政治遗嘱，在临死之时提出了在以后几十年中将决定我们党的政策的东西”。[②] 布哈林说，他自己的纲领是以这个“遗嘱”为依据的。关于这五篇文章的意义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有争论，有些布尔什维克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另一些则不承认列宁改变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主张，他们着重引证列宁早期的言论。也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列宁的改良主义是由于疾病折磨所致，不应认真对待。[③] 布尔什维主义之分成两支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列宁遗产的模棱两可。

列宁在1921年5月写的《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原始解释。他说明这个新方针就是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他

---

① 克里斯琴·格纽斯：《先驱者：爱德华·伯恩斯坦》，见《修正主义》一书第33—36页。

② 1925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版。布哈林经常把这些文章称做列宁的遗嘱，包括他的一篇题名《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有名讲演。

③ 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第230—231、234页；列昂·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57年）第31—32页；瓦连廷诺夫在《新杂志》第52期（1958年）第149页上的证言；布哈林：《农村中的经济前景》，载于1927年11月5日《真理报》第5版。

从他于1918年为维护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左派共产党人而写的一本小册子中作了很长的摘引以指出新方针的渊源。大资本，国家的和私人的，应再次结合在一起去反对落后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在一个农民国家中，这是唯一可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办法。他列举了1921年经济中存在的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外国租让制企业（列宁乐观地认为西方资本家会慷慨地到苏维埃俄国投资）；合作社；私人销售国家产品；出租国家财产。他虽然略而未讲，但暗示，国有的和国家经营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后来又说它们“一直属于社会主义类型”。①

列宁当他看到新的苏维埃国家同私人工业企业之间恢复亲善关系的时候，把1921年比之于 1918 年。这种比较是表面的和不可靠的。与1918年不同，现在国家已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设施，而大的私人资本已不存在。另外，列宁在1918年没有想到自由贸易，所以他最初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明中没有讲到市场关系问题。② 当他写《论粮食税》的时候，贸易仍然受到限制；但是在 1922 年，当贸易已成为全国性现象时，他不得不把普通贸易叫做资本主义，并把它归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中。这样做除了使他的理论概念变得前后不一贯和难于理解外，还给革命四年之后的俄国描绘了一幅悲惨的图画。正如布哈林后来指出的，按照列宁的看法，似乎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小岛，而所有其他地方都是国家资本主义……”③

这仍然是列宁在以后一年半时间中对新经济政策的总的看法。布哈林（也有别人）立即提出了他过去提过的反对意见，指出国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9—357页，第33卷第4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67页。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1期第61—62页。

③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139—141页；《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5页。

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他再一次或是公开地，或是私下告诉列宁，“你用错了‘资本主义’一词”。但是由于他们在有关的政策上是一致的，又由于每个人都不能说服对方，所以两人把名词上的分歧当作抽象和不重要的分歧而置诸脑后了。① 列宁是极其讲究实用的，他在1921和1922年对理论定义并不太关心，而更关心于使党认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和目标：调动农民的个人积极性以便使大小工业转动起来；通过贸易的媒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在工农业之间建立持久的经济和政治联盟；使国营经济机构变得有效率并能同私营企业竞争。列宁对那些担心所有这一切会引向何处的布尔什维克们含糊地解释说，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去建立……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用非共产党员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② 他并没有说明这将如何发生，在1922 年底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之前，他对此是否清楚是可以怀疑的。

1921年5月以后的三点发展，迫使列宁去重新思考他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战争和饥荒的创伤明显地变好了，经济，包括国营成分，呈现出稳步的进展，虽然重工业仍严重地拉在后边。政府的地位改善了很多。第二，列宁把他的希望寄托于从外国贷款和租让中取得新的资金；这是他的恢复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公式。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几乎是彻底的失败。他在1922年9月承认将不可能取得足够的外国资金，并得出结论：国家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通过节约措施和增加税收取得发展。这一发展除了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外，还把他原先分析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重要因素取消了。第三，随着普通的市场关系的发展，在

---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第384—385页和第3卷第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6、397、400、402、403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40、50—54、90—91页；《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13—21、32页。

十月革命前为数甚多并起着很大作用的合作社，它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变成了国家的分配机关，逐渐又恢复了自治地位，并开始在零售和批发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量。布尔什维克们习惯于鄙视这些生产与消费合作社，把它们说成是半资本主义的、农民的、改良主义的机构，早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统治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把它们当作“一种国家资本主义”。①

这样，到1922年，合作社好象成了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首要成分，而完全不是列宁原先预见的大工业资本。由于自由贸易得到了官方的鼓励，销售合作社自然会进一步发展。列宁大概正好是在1922年12月底第二次患病之前改变他的想法的。11月20日，他作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他对国家形势作了实际分析后，得出了极其乐观的结论：“社会主义已不再是遥远将来的问题……”，他相信“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内……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就开始准备他的最后五篇文章，这些文章（许多人会有不同看法）把这一希望变成一个纲领。②

整个看来，这些文章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基本社会政治设想之上的——“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社会秩序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列宁作出结论说，这两个阶级的“分裂”，“对苏维埃共和国将是致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这一事实造成了这种非正统的阶级结盟。但是，列宁坚持认为，离开预先设想的历史模式（“德国模式”）不会象孟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339页和第33卷第332—333、384—386页；关于合作社，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20—1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9—401页；L·A·福齐也娃：《回忆列宁》（莫斯科，1964年）第18页。

什维克以为的那样妨碍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首先"创造文明的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他雄辩地问道，究竟在那些书上写过"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文盲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统计数字，要求党从"文化革命"着手，以消除"半亚细亚式的愚昧"，使农村居民接受城市的教育影响，但是不要"按照预先设想的目标硬把共产主义灌输到农村中去"。这也将"对共产主义是致命的"。① 必须谨慎地、耐心地，根据农民自己关心的水平去接近农民。这一告诫促使列宁去研究合作社的主题。

《论合作社》这篇文章包含了一段自我批评："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列宁现在对之加强了注意，断定这些合作社代表着私人利益和国家调节的理想的结合，他作出结论说，合作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建筑材料，是可以使"每一个小农……参加建设"的机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小农和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难道这不是……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他预见到，为了使全体居民参加合作社，为了使农民文明地转变为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一二十年"。但是在苏维埃条件下，那将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在他自己的思想中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实行了一次明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431—432、435、439—440页。

② 同上书，第423—426页。

显的大转变。他所讲的完全是交换社会或市场社会，而不是（象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所说的那样）生产合作社。他所凭借的是一个旧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传统。他承认有变更，他说革命改变了合作社的性质。罗伯特·欧文等人的合作社社会主义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懂得政治革命的根本任务；在苏维埃俄国，这种幻想“已经变成毫无粉饰的现实”。这同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所持的立场当然是直接相反的。他在那里写道：“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愚蠢或犯罪”。现在他争辩说，“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是社会主义的发展”。[①]（租让制是一个“小小的例外”）他已把社会主义的小岛变成了大海，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说还存在的话，已所剩无几了。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最后几篇文章所代表的深刻变化，没有必要把它们解释为“遗嘱”。无疑，同正面的主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列宁对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他的最后两篇文章主要是对“令人讨厌的官僚化的现实”，提出忧心忡忡的警告。但是他对新经济政策的估价是乐观的，认为这是向正在变得明显的社会主义前进。他再次表示相信，通过厉行节约，俄国的国内资源可以提供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列宁提出了（不管多么粗略）一种土生土长的合作制社会主义，而且他是同国际革命问题分开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是可能的。他给予他的党的最后指示，看来既不是国际主义的，也不是激进的，他明确地承认了新的改良主义，从而摒弃了英雄主义的传统：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339页和第33卷第422、428—429页。关于把列宁的两个观点协调起来的有趣的尝试，见《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12期第44—45页。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①

布哈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中，也重新思考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在1921和1922年他出版的东西明显地少了(这本身就是他进行沉默思考的迹象)；而且他的调子大部分是思考性的和探索性的。他公开地对一个执政的革命党所面临的一大堆复杂问题进行仔细的探讨，他有意识地把这些问题同早期所作的那些简单明了的决定相比较。② 不久就出现了他进行重新思考的证明，到1923年他已明确提出了同他在以后七、八年中制定的国内政策相联系的大多数重大问题。一年以后，他通过集体承认党有错误和缺点的形式，解释了新的智慧是如何诞生的。他回忆起马克思曾说过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不断的自我批评去发现正确的政策这句话，他继续写道：

“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孩提时代的幻想被烧尽，并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正的关系以其朴素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无产阶级政策有时取得在现象上看来不那么感情冲动的，但因而更确实的性质——一种紧密地接近于现实，从而更能真正改变这种现实的扎扎实实的性质。

从这点来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代表着我们的幻想的破灭。”③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8—430、450—451、454—455页。关于列宁一生的最后几个月，见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纽约，1968年)。

② 见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第3版。另见西德尼·海特曼对布哈林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一书的介绍(纽约，1967年)第36—37页。

③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3页。

布哈林自己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在1920年开始破灭，到1921年2月他已觉得必须实行彻底的改变。他显然完全赞成取消余粮收集制，在政治局最初讨论新方针时，他提出的唯一反对意见是涉及到列宁坚持用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在这方面，布哈林也许比列宁更易于把发展自由贸易问题纳入他的思想。他争辩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不仅仅是市场关系。① 他看来对外国租让制不那么热情(不知道是由于他不喜欢这主张或者认为它行不通)，因之他更强调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但是他完全支持新政策这一点是明显的；党内分发的宣传新政策的正式材料中包括了他的一篇文章：《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②

尽管布哈林没有说，但新兴的经济制度同布哈林在1918年初主张的制度是相似的。最初，他并不是由于意识到这种新经济政策具有持久的合理性或正确性而对它表示欢迎的。他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为它辩护了几个月。他强调实现这种转变的战略上的需要，指出虽然新经济政策包含着冒险性的让步，但它是为了对付更大的威胁。喀琅施塔得和农村中的暴动就是"农民怀有不满"的征兆；作出经济上的让步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让步，是为了恢复有利的社会平衡和重振经济。他希望他的听众把这个措施当作"对农民的布列斯特"来考虑。③ 尽管布哈林回避了新经济政策的合法性和长期性问题，但他明确地排除了回到余粮收集制和战时共产主

①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第380—385页；《俄共(布)党全俄代表会议：公报》第2期(1921年12月20日)第50页。

② 《俄共(布)党第九次全俄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33年)第100页。这篇文章刊载于1921年8月6日《真理报》，重印于1925年版《共产主义ABC》第301－309页。

③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24—225页；《苏维埃俄国的新政策》(芝加哥，1921年)第43—61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第264—268、379—382页；《共产主义ABC》(1925年版)第301—309页。

义去的可能性。现在他在间接评论他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对暴力的维护时，指出"超经济的强制"只限于革命的破坏时期；一旦旧制度被推翻，它就失去了"它十分之九的意义"。建设时期应该是和平的。①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热情，随着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批评的扩大而开始呈现出来。他在1921年8月承认，旧的政策在军事上是必要的，但它们同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② 到12月，他把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不合理性同官僚主义的过度集中连结起来。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关"已经建立起来去控制一个农民国家的整个经济，但结果证明它在经济上是"比无政府主义的商品结构更不合理的。"布哈林现在相信，对无产阶级究竟能够和必须组织什么这个问题是存在着严格的限制的：

"它管的事太多了，因此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为了完成小生产者、小农等等的经济职能，它需要大量的雇员和行政人员。企图用国家官员（你叫他们什么都可以，事实上他们是国家官员）来取替所有这些小人物，造成了这样庞大的机关，维持这个机关所需的费用比起由于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非生产性费用要无可比拟地大得多；结果，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管理形式，整个经济机关，不是有利于，而只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它同我们的愿望直接相反，因之铁的需要迫使我们要把它打破……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做这件事，那末别的力量将把它推翻。"

这就是布哈林在整个二十年代的立场，这就是他认为市场在某些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比国家更有效这一信念和他对"成吉思汗

---

① 《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第269页；《共产主义ABC》（1925年版）第306--307页。

② 《共产主义ABC》（1925年版）第301、307页。

计划"①的鼓吹者采取反对态度的根源。

这个论点同《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的论点是直接相反的，他在那本书中颂扬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国家的控制，其效率所以有限，这部分地可以联系到俄国的小农经济来加以解释，但是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它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是否成熟的问题，从而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俄国在事实上是否已"成熟"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采取的行动是否可能是早熟的，这场社会革命有没有可能失败，这些问题常常萦回在布尔什维克们的头脑里。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从波格丹诺夫到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讲话和行动的权利，提出了挑战。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否认俄国的相对落后性，认为由于旧的经济结构已在革命过程中被摧毁，发展了的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对社会进行组织的"阶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决定革命"成熟性"的主要因素。这个论据已不再有用了。因为每个人都承认，无产阶级已变得"农民化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观点上而且常常在职业上已重新同农民结合起来。所以，布哈林就得重新考虑整个"成熟性"问题。其结果就是一篇长的文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这篇文章在1921年底写成，在1922年夏天发表，它又一次修正了这个关键性的马克思主义教条。②

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期望，是以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产生的历史榜样为模式的。正如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成熟的一样，他们也期待社会主义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1922年11月5日至12月3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3年）第192页；《俄共（布）党全俄代表会议：公报》第二期（1921年12月20日）第49、51页。

② 《进攻》第216—241页；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83页。

成熟起来。布哈林宣称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论据的核心很简单。在封建社会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新的城市中有一个自治基础。它在那里可以不依赖于封建地主阶级而且同后者相对立而得到发展，可以创造它自己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发展它自己的行政管理人才。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被剥削或被剥夺的阶级，所以它在进行政治革命之前已在各个方面变成一个合格的统治和组织阶级。布哈林继续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是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尽管它代表着一个潜在的更高的文化原则。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生产手段，而且垄断了教育(布哈林认为对这一点过去是忽视的)。无产阶级在它的革命前的历史上必然是发达社会中的一个落后阶级。因此，它同资产阶级不同，它不可能“使自己作为组织整个社会的准备”。它在使自己准备好去“摧毁旧世界”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是“它只是在专政时期才能成长为社会的组织者”。[1] 因此，阶级的不成熟性不是俄国无产阶级特有的现象，而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征。

布哈林一笔就把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各种思想上的困惑勾销了。这个论点同布哈林先前对经济落后问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作出了回答，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俄国革命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没有经验的无产阶级犯了“大量的错误”)，指出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法任务。它认为在无产阶级培养出自己的专家之前，作为过渡措施，雇用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是应该的。总之，它在更高的水平上为布尔什维克们不再考虑予以放弃的一种看法，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

① 《进攻》第219—232页。另见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彼得堡，1923年)第17—22页；《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载于1922年10月15日《消息报》第3版。

“党的专政”，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锻炼好的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它的最先进的部队——党来进行统治，党对阶级来说正如头脑对身体一样。但是先锋队也是参差不齐的，因此需要领袖们，“党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布哈林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已相当远了，但是他并没有从最后的一个论点上缩回来：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培养自己的有知识的人才，最初它必须“从敌对阶级……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取第一流的领导人。①

如果不是由于两件事情的话，可以把布哈林的论据作为一种巧妙的思想诡辩而加以抛弃。第一，他对“成熟”问题和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类比的问题的处理，比正统的学说更有说服力，这个正统学说只不过是一个未经深入研究的假设。第二，他对待他的发现是严肃的，而且并不忽视它所揭示的危险。如果在过渡时期，逐渐成熟的但大部分还是不发展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和行政上仍然从属于一个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人，那末使社会主义理想败坏的危险就很大。许多布尔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都讲到蜕化的危险，他们通常想到的是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富农和耐普曼起来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成了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所爱讲的预言。托洛茨基把这预言同他对热月和“官僚主义蜕化”的警告混杂在一起了，虽然这样做有些前后不连贯。布哈林是最早(如果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② 尽管他有时也提到“小资产阶级的危险”，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更直接针对问题之所在和更少受正统观念的束缚的。

---

① 《进攻》第222、227、232—236页；《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33页；《历史唯物主义》第305页；《真理报》1921年8月28日第3版。

② 见他的《三篇讲演(关于我们的分歧问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35页。

他担心的是，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可能使一个新的阶级得到发展。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它的领导干部)变得“脱离群众”，同占优势的行政上层“同化”，他们可以结合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垄断阶层”，共同“变成一个新统治阶级的胚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不能使布哈林得到宽慰，他说：“求助于工人阶级出身和无产阶级道德，这不能作为否认有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论据。”他指望靠两种发展来防止这种“堕落的倾向”；即发展生产力和取消教育垄断。从工人阶级中“大量培养组织者”将“使统治集团的固定化化为乌有”，将破坏“这种可能的新的阶级联盟”。①

布哈林的分析所以值得注意，除了它的直言不讳以外，还在于它明显地离开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阶级统治同合法的财产所有制的紧密结合，将会在以后几十年中堵住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批评。甚至托洛茨基在他极其悲观的一本书《被出卖了的革命》中，也否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但是在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修正这个范畴并把它应用于苏维埃社会之前三十年，布哈林就对出现一个不以私有财产而以“垄断”权威和特权为基础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危险提出了警告。这个问题(后来西方理论称之为“经理阶级”和“没有财产的权力”)，布哈林在1915至1916年研究近代资本主义时没有给予注意，现在他看到了：一个有组织的剥削阶级有可能在国有化财产的基础上出现。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是由波格丹诺夫和罗伯特·米凯耳斯的不同的权贵理论引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布哈林对这个“巨大的危险”是感到非常忧虑不安的。

波格丹诺夫早就认为，任何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都是组织经济

① 《进攻》第237—240页；《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46—47页；《历史唯物主义》第310—311页。

的那个集团，不管它实际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在他看来，剥削的主要根源存在于组织者和被组织者的关系之中。①布哈林关于"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失的论点，是针对波格丹诺夫的结论而发的。这个结论认为，在无产阶级成长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阶级之前，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不成熟的。②但是布哈林并没有对这位老思想家重新给阶级下的定义提出挑战。他也没有对米凯耳斯的那本"十分有趣的书"(《关于现代民主制中的党务社会学》)中的发现进行争论。米凯耳斯的发现表明"对于数不胜数的资金的管理……赋予管理者的权力，至少会同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所赋予的权力一样大。"米凯耳斯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得到胜利，但不是社会主义"。的确，布哈林力图反对这个结论，他争辩说，"在未来的社会里，在米凯耳斯的描述中构成为永恒的范畴的东西，也就是'群众的无能'，将消失……。"这就是他的希望，但是他对最后结局并不是满怀信心的。他觉得没有私有财产的阶级剥削是可能的，因此他警告党："一般说来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允许发生这种回到剥削关系的'逐渐的'倒退。"③

如果把布哈林关于新阶级的折衷主义的评论描绘成一种理论，那就会夸大这些评论的实质。他好象害怕把他的逻辑进一步推下去，只是对革命的这个潜在的"悲剧性结局"作了暗示。但是这也许成了他内心在不同的形式下的最大的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他关于在"工人国家"中不可能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公开

① 见他所著《经济学简明教程》(伦敦，1927年)第35—41、70、179、452、463—466页。另见N·卡雷夫著《论"工人真理"派》，刊于《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7—8期第32—34页。

② 《进攻》第227页；《无产阶级和文化》第23页；《真理报》1921年11月23日第2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第309—310页；《进攻》第239—240页。另见《消息报》1922年10月15日第3版。

说教。一个革命政权向一种新的剥削性官僚国家的演变，这是他个人在二十年代感到害怕的事情，正如布尔什维克左派对“小资产阶级的堕落”感到害怕一样。[①] 他承认，他在左派的经济纲领中，看到左派把官方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独断专行”制度化了，看到一个对群众的需要漠不关心、享受免受撤换的“绝对豁免权”和“拥有特权的共产党集团”——一个“新的官吏国家”的兴起。他对重新出现剥削这个问题比对城市群众的命运本身更为关心。他预言“剥夺”农村的纲领将不会引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会引向“无产阶级的永恒的统治”，导致它在对农民的关系上“堕落成一个真正的剥削阶级”。当别人在地平线上仔细瞭望着法国革命的阴影，倾听着“历史的脚步声”时，布哈林担心的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堕落。[②]

他选择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来思考这个阴暗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偶然的。喀琅施塔得和农村的暴动使他深深觉得党的孤立，看到布尔什维克现在是作为很小的少数派进行统治的，以武装力量为依靠，甚至得不到他们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全力支持。[③] 党曾经是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领导力量和喉舌，现在“脱离

---

① 见他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一书中的评论，第2卷第117—118页。

② 见《论工农通讯员》第75—77页；《为了列宁主义》第29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71页。关于他对热月的比拟的怀疑，见《在第九个年头到来的时候》，刊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版。

③ 布哈林对他认为卷入了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政治力量进行了谴责，但他就这次叛乱发表的少量公开评论更多地反映了他的忧伤，而不是仇恨。见《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24—225页；《真理报》1921年3月22日第1版和3月25日第1版上的不署名社论（《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661、671页上的注释中提到这些社论是布哈林写的）。他对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代表们的讲话被引用如下：“谁说喀琅施塔得叛乱是白色的呢？不。我们为了理想，为了我们的任务，被迫把我们犯了错误的兄弟的叛乱镇压下去。我们不能把喀琅施塔得的水手看作我们的敌人。我们象对我们的亲兄弟、我们的骨肉……那样热爱他们。”拉法埃尔·阿勃拉莫维奇：《1917—1939年的苏维埃革命》（纽约，1962年）第203页。

了群众"。布哈林告诉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人民说"现在没有面包和煤，为此共产党应该受到责备"。在1921年7月，他表示不能确信这个政权能生存下去，认为当时的形势完全不同于1917年，那时"所有士兵和所有工人都在我们一边"，"那时生活是兴高采烈的……。"[①] 虽然他继续颂扬党的专政，有时候还相当泰然自若，但是他对权贵统治(élitism)并不感到舒服；此后，他的思想强调必须克服作为国内战争后遗症的孤立状态，重新赢得群众的支持，并为党的纲领争取最大多数的同盟者。

从1921年起，布哈林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非党群众"身上，他过去曾对革命强制表示热情赞扬，现在转而强调说服和教育。[②] 他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制中看到党的孤立的一切症候，这种孤立状况随着布尔什维克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真空"的扩大而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使布哈林形成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要解除官僚制的毒素，就必须用那些能充当"联系群众的纽带"的"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迅速发展的自愿组织、团体和协会"来填补这个真空。它们将会促进"非集中化的首倡精神"，将共同构成一座"传动机"，党将能通过这架传动机去影响公众舆论，同时也接受公众舆论的影响。这些组织和团体的扩展会反映出布哈林所说的"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发展"，会使解体了的"社会结构"得到恢复。[③] 布哈林对群众自愿组织和同"国家化"相对立的"下层群众的首倡精神"所怀有的这种信念，是他的再思考中的一个独特的部分。

---

① 《第九次代表大会》第322—323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第382页；《布哈林同志在1921年纪念晚会上的讲话》，刊登于《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21—322页。

② 较早的例子，可见《真理报》1921年8月28日第3版。

③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期（莫斯科，1924年）第255—259页；《论工农通讯员》第36—37页。

"群众"当然意味着农民。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从来不是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极端分子。布哈林现在接受了以下事实，即党的稳定有赖于同农村居民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他在1921到1923年中所关注的其他一些问题，如俄国的落后、官僚主义的过度集中和布尔什维克的孤立等，每一个都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他很快就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历史联盟（党同农民的关系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的思想看作"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口号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1921年以后，这是他的政策思想中的基本因素；到1923年4月，他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坚信和始终一贯地维护工农联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①

认为必须同农民实现和解，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初，许多布尔什维克至少在口头上都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的言论的独特之处，是他越来越倾向于把农民说成是一个整体，一个没有分化的阶级，他避开了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民阶层之间，在农村的敌友之间划的界线。他1923年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的一次讲演中承认党很少了解当代的农村生活，他要求进行新的研究，避免"陈词滥调"。他认为，宣扬农村拉平和"农民分化为阶层"问题，就是这样一种陈词滥调，而对这个问题却没有作出"任何回答"。② 当时他的思想究竟向前发展了多远，人们并不清楚。但是他那时已习惯于把无产阶级和农民说成是

---

①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工人运动中的"偏向"》，载于1923年3月25日《真理报》第3版；《共产国际》1923年第25期第13页；《最近历史时期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载于1923年9月28日《真理报》第1版。这一判断是以布哈林 1923年4月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依据的。他在讲话中讨论了当时的一些重大问题——工业政策、民族政策和国际共运。他在每个问题上的立场都反映了众所周知的"亲农民方针"。见《俄共(布)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3年)第169—176、561—565页；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共产主义运动》(莫斯科，1923年)。

② 《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期，第254—255页。

“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是他激烈地维护苏维埃俄国是“两个阶级的社会”的理论的开端，也是他提出“工农联盟”取代了旧的占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开端。① 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国内纲领中都是重要的。

那时，布哈林象列宁一样，已在新经济政策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经济政策的合适的框架和实行社会平衡的条件。整个国家可在这种社会平衡中迈向社会主义。他在1922年11月向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了他的观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的策略考虑。布哈林则认为还需要看到另一个前景。他说，新经济政策，

“不仅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且是解决一个大的社会组织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我们需要使之合理化的生产领域和我们不能使之合理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要坦率地说：我们曾经试图承担起把一切事物都组织起来的任务——甚至把农民和千百万小生产者都组织起来……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这是愚蠢。”②

几星期之后，他就暗自用他的新思想去反对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绪，他要求制定一个新的党纲，因为他认为“已成为党的教规”的1919年党纲以及他的共产主义ABC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已经过时了。过后不久，他宣布：“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不是象早先我们想象的那样，而是走一条更加坚实和可靠的道路。”③

布哈林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还宣告了新的改良主义布尔什

---

① 《真理报》1923年9月28日第1版；《进攻》第279页。另见《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版和1923年3月25日第2版。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第192—193页；《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载于《真理报》1922年12月3日第3版。

③ 《真理报》1922年1月25日第3版；《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期，第264页。

维主义的其他三个原则。首要的原则就是，“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内和平”取代国内的紧张关系，这应该成为党的政策。他由此得出了一个论点：现在在俄国，阶级斗争不应采取剧烈的方式进行，而应通过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进行和平的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应在思想和文化战线上进行。最后，在1922年，出现了布哈林的渐进主义的典型的表达方式，也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最初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理论的，他同时说明这个理论同“修正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解”毫不相干：

“我们不能够靠简单地发布命令的办法，靠简单的强制措施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有机的过程……一个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在确定长入从何时开始。不要任何革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的怀抱里就已开始。我们则认为，它只能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并依靠这个杠杆去改变经济关系。这里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将越来越扩展，这样就将逐渐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残余都排挤掉……。”①

到1923年，他已“通过流通过程”专门把农民经济包括到这个发展中去，并有力地论证“进化道路”是苏维埃生活的现实。“在许多个十年的时间中我们将慢慢长入社会主义：通过发展我们的国营工业，通过合作化，通过增强我们银行体系的影响，通过无数的中间形式。”②

---

① 见《真理报》1923年9月28日第1版；《进攻》第279页。另见《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版和1923年3月25日第2版。

② 《批评加批评》，载于《真理报》1923年6月30日第1版；《真理报》1923年9月28日第1版。

这个理论早在1922年11月就已出现，所以那种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因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德国的失败最终破灭了布尔什维克对欧洲早日发生革命的希望，在孤立状态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由斯大林在1924年12月第一次正式表达的，① 这样说固然是对的，但是布哈林提出的"长入"命题却表明，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的时间还要更早些。虽然这时尚未面临工业化的艰巨问题（那是在1924年开始的），他的理论提出了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而且这个理论在任何方面都不有赖于革命的国际化。（列宁的《论合作制》也是这样，他在合作制中找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布哈林也许已经意识到他的论点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他急于告诉他的共产国际的听众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相比，将是亚细亚式的"，俄国经济上的落后"将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落后形式中反映出来。"②

他并不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国际革命对立起来；但是，他也不再认为前者取决于后者。他象列宁一样，探索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农民的俄国的未来。不管欧洲革命是否发生，党已取得了政权，它可能达到两个结局中的一个：或者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在1926年就说，如果说我们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那末我们就白白参加了十月的街垒战。"③ 在这意义上说，斯大林后来提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远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具有那么多的创造性。在1924年4月，即在斯大林发表他的声明之前八个月，布哈林就把他的"和平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8—119页。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191页。

③ 《在联共（布）党列宁格勒州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37页。

的、经济的、有机的"阶级斗争理论说明如下："在这种阶级斗争（我们在这里把它从外部秩序问题中分离出来）中取得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① 二十年代的许多争论是围绕着究竟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分离而发生的。

布哈林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1921至1923年也有改变，但变得不象在国内问题上那样突然。他不想作出对欧洲资本主义进行直接进攻的时刻已经过去的结论，他在1921年6月同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一起，在一些预备会议上对列宁要求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策略的建议简单地表示反对。尽管后来他不再反对，但他到12月仍然坚持欧洲资本主义已度过了它的危机的主张。他在1922年和1923年年初承认，欧洲革命的"减速度"意味着这场革命还要"许多年"，但是他继续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处于"经济混乱，社会混乱，思想混乱"状态。② 这种看法不是产生于先天的左倾主义（布哈林曾告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苏联已经成熟，足以去"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以便利用它的帮助去摧毁另一个资产阶级国家"③），毋宁说，这也许同他所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含义有关，他认为只有世界大

---

①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6页。确实，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问题上的争论在某些方面是容易使人迷糊的。布哈林和党的领导曾经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可以导致社会主义，而同欧洲革命的前景无关。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早在1924年6月，在斯大林之前，就提到列宁曾反对过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中开始的主张。《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5—6期，第99—100页。最后，反对这一思想的左派经济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他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在一个孤立的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

② Ju·L·莫尔昌诺夫：《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统一阵线政策的源泉》（莫斯科，1969年）第115—119页；布哈林在《第五次共产国际世界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速记记录二卷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1卷，第257页；《真理报》1922年11月7日第7版；《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3页。

③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第196页。

战才能使更强大的欧洲资本主义受到打击。

"世界农民"是他思想中的新因素。布哈林放弃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愚蠢"立场，接受了苏维埃俄国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保卫者的主张，他发现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比例反映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① 1923年4月，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表现为对东方的民族运动最感兴趣的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更早地指出了这个方向，布哈林热情地追随他。他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际革命的报告，一国一国地详细分析了"处在极其深刻的革命动荡中的整个东方世界"，把正在觉醒的殖民地农民看作"革命步兵团的巨大后备部队"，它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向世界资本主义进军。俄国的联盟经验是有国际意义的，正如他的比譬性的描述所提出的："如果把事物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考察，那就可以说，大的工业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城市，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是它的农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建立一条"世界'城市'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世界'农村'的农民之间的统一战线。"历史已无可逆转地走上了这条道路。②之后不久，当他接受了欧洲的稳定这个现实时，这个思想成了他的修正了的国际革命理论的核心。

布哈林在1923年指出，他现在的思想比"襁褓"时期不同了，意思是说他的重新思考已接近完成，他的幻想已经消除。③（有些人会立刻争辩说，他是把一套幻想换了另一套。）布哈林的话也提醒我们，当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他才三十

---

①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69页；《真理报》1923年5月13日第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全体会议，记录》（莫斯科，1923年）第246页；《资本主义的危机》第24页。

② 《资本主义危机》第25、81—82页；另见《共产国际》1923年第25期第16页；《真理报》1923年9月28日第1版。

③ 《共产国际》1923年第25期第16页。

二岁，虽然在一个革命家辈出的时代已不算特别年轻，但还不足以使他的思想意见十分坚定，并变得不可动摇。不论是在国内问题上，还是国际问题上，布哈林并没有充分发展被他的党内对手指责为新民粹主义的新理论和新纲领。但是到1923年，当这些问题同争夺权力的斗争搅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针。他将相应地选择同盟者。

* * *

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局属于联合政府的形式，同大多数这类机构一样，它在危机时期能起作用，但当危险过后就变得不稳定。列宁的无与伦比的权威使政治局的各派成员在外表上显得团结一致，直到他在1922年5月第一次发病为止，这时候争取在政治局中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和随之而来的争取同辈中的长者地位的斗争暗中开始了。

在1922年较晚的时候形成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反对更著名的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最初引起这场冲突的是个人之间的憎恶和“对个人历史的审查”，而不是政策。[1] 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既看不起又害怕托洛茨基，煽起了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运动”，让党内知道托洛茨基过去的孟什维主义和潜在的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本人纠缠在个人历史问题上，他延误时机，作出妥协，在维护自己的政治命运上显得难以置信地无能。到1923年，他已同有效的权力源泉相隔绝。那年较晚的时候，他最后发动了进攻，成为党内民主的捍卫者，成为书记处委任制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官僚机关的主要批评者。（党原来主张“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党内的集中权力应同上下机构的选举制相结

---

① 见彼得罗夫斯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书第168页上的评论；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第51页。

合。后来主要由于国内战争的结果，这个原则已变成一种僵硬的极权主义制度。）他在1923年12月和1924年1月遭受巨大的失败，他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尽管他后来又曾作为反对派东山再起，但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政治机会已一去不复返了。①

布哈林在开始一轮接班斗争中不是一个竞争者。直到1923年12月当他有条件地支持三驾马车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抱有希望的"调和者"，没有同任何一派结盟。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的立场是异乎寻常的。年长的成员把他看作年青的一辈和可以长期任职的人。季诺维也夫叫他"我们的本杰明"；列宁在评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时说他们是"最出类拔萃的力量（在年青力量中）"。②但是，虽然布哈林在1919年到1924年间在形式上只是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但是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把他同列宁、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的三个人一起看作党的六巨头之一。有一个外国的共产党访问者在1922年报道说，人们谈论他是"列宁的最终接班人"。③ 这个报道是错误的，但却证明了布哈林的地位。列宁发病后，布哈林起了政治局正式成员的作用，后来又继承了列宁的位子，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威信更多地是以他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喉舌的声誉，他在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享有的巨大

---

① 关于三驾马车的历史可见丹尼尔斯的《良心》一书第8—9章；和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一书第2章。

② G·季诺维也夫：《文集》第11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390页；《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617页。

③ 安德烈·莫里赛：《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起：莫斯科，1921年》（巴黎，1922年），第63页。另见《社会主义通讯》，1922年9月8日第4页。直到列宁去世之前，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最后两人是次要人物。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只提到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皮达可夫经常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5—616页。

个人名望以及他在党内青年中的"崇高权威"① 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有权力的职位（虽然《真理报》主编是重要的）为基础的。因此，他对任何一个竞争的寡头都不构成直接的威胁，而是一个宝贵的潜在同盟者。

列宁在进行工会辩论的一个愤怒时刻，曾把布哈林描绘成一块"软蜡"，在它上面"任何一个'蛊惑人心的人'都可写他想写的东西"。列宁谈到的那个"蛊惑人心的人" 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多年之后又重复了列宁的这个评论来解释布哈林后来同斯大林的联盟。虽然这个评价是不恰当的，但是从这以后它却成了大家所熟悉的对布哈林的性格的描绘。布哈林在 1923 年以前的政治生涯中独自具有强烈的主见，他在国外流亡时期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1917 年是青年左派的领袖，1918 年是左派共产党人的头头，1920 年到 1921 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白费心血的"缓冲者"。没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象他那样经常对列宁表示异议。他在多次派别争论中，只有一次同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在工会争论的第二阶段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每一次他都是对事不对人地决定他的立场。因此，布哈林在 1922 年到 1923 年企图采取一条既独立于三驾马车，也独立于托洛茨基的路线，这反映了他的特性。他又一次成了一个孤独者，但这一次他没有得到高级支持者。他个人的好友和过去的政治同盟者，其中包括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不同的情况下已变为新政策的批评者，成了反对派。莫斯科再次为反对派提供了组织上的力量。②

---

① 马克斯·伊斯门：《在列宁逝世以后》（纽约，1925年）第30页；《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617页；萨拉皮扬诺夫的评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2年第3期第63页；阿斯特罗夫：《峭壁》（莫斯科，1969年）第55页；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纽约，1971年）第64页。

② A·Ia·维亚特金：《共产党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毁灭性打击》第1卷（列宁格勒，1966年），第115页。

如果说这时候布哈林在个人关系上接近于那一个年长的布尔什维克的话，那就是病倒了的列宁。说明他们之间在1922年存在着不寻常的热诚友谊的证据，是零碎不全的，但又是意义深长的。自然，他们在次要问题上继续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和无产阶级文化的看法，还有对两件更重要的事情的看法。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22年4月。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率领了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团去参加三个社会党国际的柏林会议，以探求在欧洲采取统一的劳工行动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人在会上坚持一个条件，要布尔什维克政府答应不处决社会革命党犯人，这些犯人将因"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于六月间受到公开审判。布哈林和拉狄克表示同意。列宁立即对这种让步表示抗议，说这是屈服于"讹诈"，尽管他承认必须尊重这个诺言。尖锐地分裂的政治局达成了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如果地下的社会革命党人停止"恐怖"活动，死刑可不执行。[①] 1922年10月，在布哈林和列宁之间达成了第二个有更多磨擦的协议。当时布哈林、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一个放松国家的外贸垄断的建议。列宁忿怒地进行了干预，严厉批评了布哈林，并阻止了这个建议。[②]

然而，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恰恰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损伤他们的友谊。布哈林在他的自传中写过他同列宁在1918年后的关系："我很荣幸……通常能作为一个同志和一个人接近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正式礼仪中，这种个人的札记是不寻常的，而这也出现在写于1922年12月24日的列宁"遗嘱"中。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297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维埃权贵》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2—415页；《关于改善历史学科研教育干部培训工作的措施的全苏会议：1926年12月18—21日》（莫斯科，1964年）第290页。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而且被正确地认为是全党所喜爱的人；但是只有带着很大的怀疑，才能把他的理论观点看作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些观点有些学究气（他从未研究过，而且我想，从未充分懂得辩证法）。"①

领袖对布哈林所作的看来是矛盾的评价，即说他是党的最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得辩证法，对此是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的。这也许同列宁在1920到1921年的工会辩论中认为布哈林的政治作用不可靠这一点有关。或者这也许只是反映了列宁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他对之曾进行认真的研究）的偏爱，而布哈林却为了"社会学"而轻蔑这门学科。但是最重要的是列宁对布哈林作为一个人所作的不寻常的评价，这样好的评价在他的"遗嘱"中是独一无二的。与其说这表明了布哈林在党内的总的声望，不如说这表明了他作为列宁的"宠爱者"的地位。

这可以使人进一步相信一个非正式的报道是可靠的。这个报道说列宁曾在1922年初写过一封讲到他们的关系的信。布哈林在1921年生了病，在这一年中列宁为了他曾口述了几张写给不同人的条子。有一张说："派最好的大夫去检查N.I.布哈林的身体……并把结果告我。"医生建议布哈林去德国治疗，但他无法得到签证。据说这时列宁给苏联驻德国大使克列斯金斯基写了一封信，要他去找维尔特首相转交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老人，而且没有孩子。布哈林就象是我的儿子。我要求作为个人的善意……给布哈林发签证，使他有机会到德国接受治疗。"②后来发了签证。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617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353页和第23卷第33页；引语取自邓尼克：《采访记之十七》。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也曾对我讲过这个故事。他说他是从克列斯金斯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

这封信无法证实，虽然在官方材料中可以找出一些说明它的存在的偶然的证据。[①]但是，有关近乎父子之情的东西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清楚的。这在列宁晚年尤为明显。在1922年下半年，当为疾病所苦的领袖退隐到高尔克休养的时候，布哈林是唯一经常去看望他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后来回忆说，“列宁曾要我去看他……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花园中去”以便讨论医生禁止谈论的政治问题。他们谈到“领导科学”，说到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布哈林不久就把这些文章解释为列宁的遗嘱。此时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是相同的。这些“在死亡边缘上”的知心之言显然使布哈林更加相信，他在1924年后是代表列宁说话的。[②]这些会见没有很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是个人之间的动人情节，这些情节也许促使布哈林带着沮丧的心情去看待年长的政治寡头中为取代还活着的一个领袖而进行的不体面的斗争。

三驾马车假装虔诚地穿着列宁主义和“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外衣。1923年4月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戏剧性地表明布哈林同他们是保持距离的。从1922年秋开始，在斯大林和格鲁吉亚

---

① 《列宁文稿》第4卷第353—354页；《列宁文稿》第10卷第49—50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24页(《没有找到的列宁书信的目录》中所讲的1921年12月5日列宁给尼·亚·谢马什柯和季·彼·索洛维约夫的信)。

② 尼古拉也夫斯基所著《权力和苏联权贵》一书第12—13页上讲到布哈林关于这些会见的描述。说明布哈林在列宁晚年经常去看列宁的证据可在以下书报中找到：邓尼克：《采访记之十七》；谢尔盖：《回忆录》第176页；布哈林：《伊里奇》，载于1922年9月24日《真理报》第4版；福齐也娃：《回忆列宁》第42页；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682、686、693、716页(列宁生活和活动年表)。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列宁这时候对布哈林怀有“很大的爱抚”之情，见他的《让历史来审判》第153页。另见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498页，麦说列宁把布哈林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布哈林无疑相信，列宁认为他是“最能够传达他的思想的。他同他谈话，以便布哈林将写出他自己没有讲完的思想”。见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3页。另一方面，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也支持了托洛茨基要求更多地实行工业计划的主张。

的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进行着一场尖锐的斗争，后者抗议为使格鲁吉亚共和国加入新的苏维埃联盟而采取的手法。一直到1922年12月底，列宁还是支持斯大林的计划的。那年年底，列宁发现总书记的代表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很粗暴。于是列宁突然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3年1月4日为他的“遗嘱”所写的跋中，宣布斯大林“太粗暴”，不能委之以很大的权力，要求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他通知格鲁吉亚人，“我是全心全意地……同你们在一起的”，同时拟好了一组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通知。他把这些通知寄给托洛茨基，要求托洛茨基起来维护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托洛茨基突然得到了一件对三驾马车进行反击的武器，可用它来消灭三驾马车在攫取组织权力时所依靠的那个人。可是托洛茨基却采取了调和态度。斯大林等作了些表示悔改的空洞姿态。作为对这些姿态的回报，托洛茨基同意同他们一起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件事保持缄默。①

只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拒绝保持沉默。那就是布哈林，他在代表大会上起来保护遭受厄运的格鲁吉亚人。这些人发现他们成了一场精心策划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牺牲品。早在1922年10月人们就知道布哈林对他们的事业的同情和为他们进行的干预，② 现在是他，而不是托洛茨基，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站出来讲话。他指名批评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间接地提到了被压下来的那封列宁的信。他揭露反对“地方异端分子”运动是个骗局。他问

---

① 关于格鲁吉亚事件，可见莱文的《列宁的最后斗争》；S·V·哈尔曼达良：《列宁和外高加索联盟的形成：1921—1923》（埃里温，1969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628—634页，和《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3—314页。关于托洛茨基，另见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第91—93页。

② 见哈尔曼达良：《列宁和外高加索联盟的形成》第348、351—356、369页。他在代表大会上被开玩笑似地称做“光荣的格鲁吉亚人”。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64页。

道，为什么列宁只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敲起了警钟"。因为那是"主要危险……如果列宁同志在这里的话，他会狠批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使他们十年也忘不了。"布哈林向充耳不闻的大会代表发出呼吁，是出于两个考虑：首先，苏联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在农民地区，来自中央的压诈威胁着工农联盟；其次，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如果苏联要成功地吸引殖民地人民的注意，它就需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① 在代表大会对格鲁吉亚人进行嘲弄之后的几天，他惊呼道：

"只有确实缺乏远见的人，才看不到民族问题的全部严重性……俄国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取得民族地区主要是农民地区的充分信任呢？

……首要的是向任何复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现象进行不倦的斗争。"

在整个二十年代，非俄罗斯民族没有比布哈林更伟大的保护者了，布哈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座"通向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桥梁……"②

他的独立政治态度在1923年再次表现出来。这年秋天，托洛茨基为时太晚地举起了党内民主的旗帜，以反对斯大林对党的机器的操纵。在这问题上，看来布哈林也并不同情三驾马车。他在1920年到1921年把工人民主当作一个"神圣口号"，也许因为他被认为是"自由派"，所以领导上选他去安抚第十次党代会上的反对派。正是他在1921年不敬地挖苦说："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③ 因此，布哈林1923年在向莫斯科的一

①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61—565页；《资本主义的危机》第33、63页。

② 《共产国际》1923年第25期第16页，幕后一点的例子，可见1927年2月2日《真理报》。

③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学派》一书第14页上的引语。另见布哈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17—233页，和他的论文集第644—651页上关于党内生活问题的评论。

个党的会议发表的一篇讲演中，深刻地批评了正在广泛蔓延的党内生活的官僚化，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了解下层党组织中的“不满”，认为这是由于实行了由上面任命书记的制度。他解释说，把党组织的成员集合起来，问他们：“‘谁反对？’，由于他们多少都不敢说反对，于是就任命被指定的人为书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的选举变为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谁要是表示反对上面的意见，那是会倒霉的……”对政策问题的“所谓讨论”也是这样：“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那就是我们党内关系中习以为常的形式。”①

从表面上看，布哈林似乎最有可能成为托洛茨基的盟友。除了涉及的问题以外，他们是党的最有才智和放眼世界的领导人，而且在斗争开始时，他们的个人关系也是不错的。② 布哈林同其他的老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他并不忌妒托洛茨基的迅速上升；他曾于1915年催促列宁同托洛茨基合作，1917年欢迎托洛茨基进到党内来，以后一直维护他，反对对他的诋毁。还有，布哈林看来并不喜欢三驾马车中的长者季诺维也夫，这个人的野心之大仅次于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高自大。然而，在开始时，布哈林拒绝站到任何一个派别方面去，相反，他试图使它们和解。他显然相信，使所有继承者团结一致是可能的，并且天真地以为个人的敌意和野心都可抛在一边。③ 因此，在1923年的夏天或初秋，当季诺维也夫开始对斯大林的不断增长的权力感到忌妒的时候，布哈林在一次在高加索休假的布尔什维克们在一个山洞中举行的非常别致的会

---

① 《俄共（布）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第147—148页上托洛茨基引用的话。

② 托洛茨基说布哈林是以他为靠山的，这显然不足信。《我的生活》第470—472页。另见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第82—83页。

③ 邓尼克：《访问记》之十七。

上"演了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在那里拟定了一个使书记处"政治化"的方案，把它改为由三个高级领导人组成——托洛茨基、斯大林、再加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中的一个。这个方案同布哈林的其他"缓冲"努力一样没有成功；但是这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日益恶化的冲突中所采取的审慎的中立态度。①

那末当十二月出现公开对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参加反对托派的运动呢？作为《真理报》主编，他显然难于继续保持中立；不管布哈林多么努力想把这张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办得不偏不倚，但是来自三驾马车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有选择地刊登有利于他们的东西。② 但是他作出的站到三驾马车一边去的决定，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解释。首先，托洛茨基本人的动机和野心不是没有可疑之处的；他过去也是属于最爱专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列的，所以他突然提倡民主程序的做法也易引起怀疑。再者，列宁在1922年曾反复要求托洛茨基做他的副总理之一，但托洛茨基一再拒绝。(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事件中的态度也不能使布哈林认为他是一个信守原则或忠诚不渝的人。)在许多人看来，这都证明了这位高傲的军事委员对集体领导的鄙视，证明他所觊觎的只是最高地位——"要么占有一切，要么什么都不要。"③

1923年10月托洛茨基的形象在布哈林的眼中进一步受到了损害。那时有四十六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其中许多人是过去的左派共产党人和民主集中派，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粗暴地批评官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398—399、455—456页。

② 见《在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莫斯科党组织，1921—1929年》(莫斯科，1969年)第367—373页。

③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35—37页；V·M·伊凡诺夫和A·N·什梅列夫在《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的毁灭》(列宁格勒，1970年)第349页上引用的斯大林的话。

方政策的秘密备忘录。签名人中包括了托洛茨基的几个朋友和支持者，不管他是否希望这样做，围绕这个文件(它要求建立新的领导)发生的各种情况使它具有“托派”的色彩。[①] 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左翼反对派的诞生和党的又一次严重分裂。这时候，布哈林坚决抛弃了他自己早期曾有的派性，强烈反对新的派别活动，把有组织的党内意见分歧看作是对党在国内的稳定性的威胁。当三驾马车的对手们心照不宣地把当前的状况比作布列斯特和约争论中的自由讨论时，布哈林力图使人不要念念不忘过去那个时期，他揭露左派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1918年曾讨论要逮捕列宁，他强调指出，那个时期“党处在分裂的边缘，整个国家处在毁灭的边缘。”[②] 他说，派别活动本身就是坏事。

采取这种新的不容忍派别活动的态度，是同导致布哈林作出支持三驾马车的决定的主要原因密切有关的：影响深远的政策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领导层内部个人之间的敌对。尽管国家的情况有了全面的改善，但从 1923 年起经济危机越来越加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昂贵的工业品价格（部分地是由国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引起的）和低贱的农产品价格(所谓的剪刀差)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下降了，工业品积压起来了，失业人数增加，那年夏秋之际在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系列罢工事件。正在联合起来的左派，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对此情况作出的反应是，指责领导缺乏长期的工业政策，要求有力地、有计划地发展工业，使之多少不依赖当前的农村市场。虽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尚未充分明确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已经一致认

---

① 这个文件以“四十六人的纲领”著称，重印于E·H·卡尔的《政权空白时期，1923—1924》一书(纽约，1954年)，第367—373页。

② 《真理报》1924年1月3日第5版。

为，投资资金只能通过集中计划，靠采取垄断手段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来积累。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同托洛茨基是相似的。后者从三月开始一直要求制定一个单一的计划并发动一场工业的“攻势”。①

左派在经济问题上提出的建议，促使布哈林参加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因为三驾马车虽然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赞成托洛茨基强调计划和工业化问题，但是他们采取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从而再次肯定对农民作出经济上的让步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的部分。这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他们反复无常的生涯中正好处在“亲农民”的阶段（一年以后就终止了），所以多数派采取的正式立场是，繁荣的农民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农村市场是发展工业的前提。这同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和工农联盟的理解是完全相符的。② 他在他的一篇反对托派的重要文章中，指出经济政策是决定性的问题，驳斥了反对派的其他指责，说这些都是避开主要问题的策略手段。反对派确实想制定他们的经济纲领，一个建立在“纸上谈兵”的计划和“工业专政”基础上的纲领。布哈林争辩说，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偏向”来源于他们不能消化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新”教导：“我们在一个长时期中……还必须骑一匹骨瘦嶙嶙的农民的马，只有那条路可拯救我们的工业，并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坚实的基础。这是当前分歧的根子。”③

---

① 见卡尔：《政权空白时期》第3—4章；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99—104页。

② 他几个月来竭力反对新经济政策引起的“心理瘫痪”和“悲观主义”，左派针对这些情绪作出了他们的反应，提出了他们的呼吁。见《俄国共青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第112页；《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卷第263页；《真理报》1923年3月25日第2版和1921年6月30日第1版。

③ 见他的《关于托洛茨基主义》一书中的《打倒派别活动！》一文，见该书第10—11、20、31、43页。

布哈林认定"在这场人的斗争背后存在着一场政治倾向的斗争",他在他认为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上采取了行动，而实际上对反对派由于看到党内生活的官僚化而表示的合理忧虑视而不见。按照他对新经济政策和对左派的经济建议的理解，也许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五年以后，当斯大林操纵的机关转过来反对他的时候,他象在他之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就会重复托洛茨基在 1923 年提出的指责。老布尔什维克们的部分悲剧就在这里：他们相互之间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了七年之久，而在这时候一个阴谋家却逐渐取得了把他们全都消灭的权力。

但是，布哈林对三驾马车的支持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他对反对派进行的仅有的一次重要论战,就是在 1923 年 12 月 28 日开始发表并在五期《真理报》上连载的一篇大文章。意味深长的是,这篇文章不是用他的名义发表的,而是作为"机关报编辑部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回答"。虽然人们很容易认出他是作者，但是这篇文章反映出他希望不以个人的身份介入这场斗争。① 那时候，正如他在1924年12月第二次反托派运动和以后反对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斗争中所做的那样,布哈林不承认"任何个人的评价，任何个人的同情或反感"。这篇文章本身，虽然不是没有蛮横的煽动性段落(布哈林详细叙述了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罪行史，可是他也曾犯过这些罪行),但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布哈林称之为"散发着恶臭味"的攻击相比，却是鲜明的对照。② 更重要的是,他多次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的把托洛茨基从领导中开除出去，甚至把他逮

---

①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7—43页。此文最初刊登在 1923 年12月28日到30日和1924年1月1日和4日的《真理报》上。

② 《为了列宁主义》第333页;《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9页；李可夫和布哈林：《党和反对派集团》(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85页。

捕的要求。[①] 这种克制态度使他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没有完全破裂，在1926年年初他们重又建立了一段短暂的、友好的"私人联系"。[②] 但是，正如同在1923年一样，它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部分地是由于布哈林的政治学现在受到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作用"的新看法的影响。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了，对他个人和他的言论的官方崇拜炽烈地开始了。苏联政治的性质永远改变了。"列宁主义"不仅变为学校中讲授的一门课，而且基本上变成了一部基本上没有确切说明的圣典，每一项政治建议都得表示忠实于并引用这个圣典。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正在兴起的这种崇拜，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反对这种崇拜的偶像化和祭司式的表现形式。（布哈林热心地传播"正统的列宁主义"，但是反对永远保存列宁遗体供人瞻仰的计划，他也曾对要求把马克思的遗骨挖出来安葬到俄国的类似建议作过评论："在党内……从某些地方发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③] 作为政治仪式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每个后继者都利用机会庄重而详细地表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记念，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和树立自己的声望。布哈林于二月十七日向共产主义学院作了他的回忆列宁的讲演，这同他作为党的理论家的地位是相称的。这篇题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讲演，是他第一次明确地把他的进化理论同列宁

---

① 布哈林：《联共（布）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莫斯科，1926年）第4—5页；他在《列宁格勒组织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文件集》中的发言，见该书第86—88页（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托洛茨基1926年1月26日给布哈林的信；阿斯特罗夫的《峭壁》第294—295页。斯大林好象也反对他们的要求。

② 多伊彻在《没有武装的先知》第257—258页上有一段有点令人迷惑的叙述。这一点将在第7章中加以讨论。

③ 尼·瓦连廷诺夫（伏尔斯基）：《新经济政策和列宁逝世后党的危机：回忆》（斯坦福，1971年）第91页。

的最后几篇文章联系起来的尝试。①

他的表面动机是要纠正“对列宁同志作为理论家的作用估计不足的状况”。他为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作三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进主义；《后继者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他们“保存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阉割了革命灵魂”；最后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它由于解决了马克思不可能预见的问题而丰富了原来的学说，但就其基本“方法论”来说，它又“彻底返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布哈林（部分地由于他自己的谦逊）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国家和工农联盟的理论列举为列宁的重大理论贡献。对此没有人可以表示异议，虽然他把列宁著作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说成是“最好篇章”的看法曾使人瞠目吃惊。②

但是在他的讲演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敌人后来找到了列宁主义的终点和布哈林主义的起点，这部分内容是“关于列宁提出的和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夹在无可反对的评论中间的，是布哈林重新思考的两个新的主要理论观点：苏维埃俄国是“两个阶级的社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讲这个思想，是向他的学习班的学生们讲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通过“一个有机的发展时期”和“经济形式的进化斗争”，“长入社会主义”。这两点列宁都没有“确切的提法”，但是布哈林坚持认为，这两点在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是清楚的。布哈林在这里回到了他在1922年表达的一个思想：可以期望出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是用它存在于其中的材料建成的”，这是他在

① 《进攻》第242—284页。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这原是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的讲演。

② 可把上面讲的那本书的第271页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第115页作一比较。

几个月后提出的一个论点的前奏，这个论点说列宁留下了"'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理论"。[①]

所以，在纲领大辩论的前夕，布哈林已经有了这样的假设，即国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沿着一条进化的道路"，而"不能沿着别的道路"。现在他毫不含糊地接受新经济政策，反对革命的("灾难性的")纲领，他说，"这里不可能有什么第三次革命。"[②] 他的改良的渐进主义还依然只是轮廓性的理论，但是在以后两年中，他把它发展成布尔什维主义的详细学说，发展成在苏维埃俄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

---

① 《进攻》第274—275、278—279页；《为了列宁主义》第287页。

② 《进攻》第275—276页。

第六章

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积累啊！积累啊！那是摩西和预言家们的教训！……节约啊！节约啊！把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尽可能大的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啊！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就是用这个公式来表示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对于财富难产的情况从来不存幻想。但在历史必然性的面前，悲伤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1923 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了党在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在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未来道路的看法上，重又陷于严重分裂。最初，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为争夺权力而进行公开斗争这个新问题，把相互冲突的意见和倾向掩盖着。但是，1924 年秋发生的一些事件，把存在于谨慎小心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左倾反对派之间的这种分裂再次加以肯定并扩大了：领导人中间的政策分歧以及革命内部（包括国际和国内革命、城市和乡村革命）的矛盾的冲击公开化了。二十年代的大辩论，首先是工业化的大辩论，全面地开始了。

---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 1 卷第652页。——译者注

左派的主要思想和纲领，不论是真正左派的或是称为左派的，形成在先。托洛茨基关于“十月的教训”的说教，引起了多数派对他已讲了二十年的不断革命论的愤慨。他的说教这时被正式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分歧。托洛茨基被指责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俄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潜力缺乏信心。1925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①已成为官方公认的信念。托洛茨基的理论被指责为反对这种信念的悲观主义。就在这个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他的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质上就是认为必须靠牺牲农业来迅速发展国家工业资本。虽然可能并不合适，但他的论点很快就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基础”。②很少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在孤立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论点同托洛茨基强调欧洲革命的关键作用的观点之间的矛盾感到惊奇。他们两人中谁也没有认真地反对把他们的观点联在一起。从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就在左派经济纲领中占有中心地位。

在1924和1925年间，当新的经济政策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的时候，左派所谓的超级工业化和多数派领导人的立场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更加剧了。令人失望的年成和严重的农民骚动促使领导“面向农村”（用当时的口号来说）。1925年春天通过的法令规定对农民，首先对中上层农民，作出四点经济上的让步：放松国家定死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减低农业税；延长准许出租土地的期限；准许雇佣工资劳动力，主要限于收割季节；撤销限制自由贸易的各种行

① 见《为了列宁主义》；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163—172页。

② 《为了列宁主义》第255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第一次出现在他所著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中，《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8集（1924年）第47—116页，后来成为他《新经济学》一书的第二章。

政障碍。[1]这些措施的用意同样也是为了安抚农民和进一步刺激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复苏。在它们的倡导者看来，这些措施无非是把新经济政策所容许的一些原则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左派看来，这些措施正好是“农民主义”，甚至“富农倾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明证。

工业政策和农民政策上这一根本分歧，不久之后又因对外政策上的争论而加剧起来。这一根本分歧造成了二十年代的党内大辩论。个人的忿懑，争夺权力的斗争，在革命性质和方向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现在彻底交织在一起了。1926至1927年，双方的立场变得较为温和，直到这时，要使左派反对派和官方领导人相互取得和解，也许仍然是可能的，可是谁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尝试。而随着争论的扩大，双方都使论战升级，而且摒弃各种妥协的途径，每方都把这一冲突看成是在对革命的不同理解之间进行的一场历史性抉择。因之，每方都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越来越肯定对方的变节。

布哈林同样采取了这种不相容的态度。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作用已被1924、1925年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在反托洛茨基运动中所起的是一种支持作用。当三驾马车突然解体的时候，他移到了舞台的中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原先极力主张同农民调和，在开始时也是赞成新的农业政策的。但是，他们由于在重新考虑这些政策的含义之后产生了困惑和对斯大林不断增长的权力感到忌妒，所以在1925年转向了反对派。次年，他们就同托洛茨基左派相结合。他们象托洛茨基左派一样，对斯大林管理党的机构的情况，对多数派的经济政策，对新经济政策的官方解释，包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展开了攻击。[2]

---

① 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116—126页；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49—275页。

② 丹尼尔斯：《良心》第2章。

三驾马车的终结把布哈林推向了同斯大林一起成为多数派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这种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布哈林是对立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到1925年春天;这些政策已同他自己作了修正的对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构成一个整体。他的经济纲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更广泛的纲领性理论，都成了党的官方学说。由于他上升到众目所视的政治地位，被看作多数派政策的设计师，而且以当时流行的正统观念的官方解释者的身份出现而加倍令人注目，因之他成了左派进攻的主要目标。从1925年以后，他经常进行论战，是派别冲突的主要参加者。在这些冲突中，布哈林主义——人们称之谓“布哈林学派”——是一个中心问题。①

布哈林对讨论中的重大问题的想法，在其形式和实质上显然都受到这种紧张政治局面的影响。在1924到1926年中这段时间里，他思考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业化纲领，并对这个纲领将如何导致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套理论上的解释。他在争论者中独自努力创造一套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总的理论。可是，他的思想很少得到系统的或心平气和的阐述，而是散见于几十篇激烈的论战讲演和文章中。② 因此，正如布哈林在1926到1927年间对他的思想进行明显修正的时候所默认的那样，他最早提出的经济纲领，也就是1924到1926年提出的那个纲领，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有缺陷的。有些是由于计算上的错误，另一些则是由于溺于论战的缘故。他当时相信他提出的是一些基本真理，他决心要维护这

---

①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政策将在第7章中讨论。

② 他的思想的最完整的叙述出现在他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1924年)。但它是通俗的叙述，缺少他的主要著作所有的理论深度。后来，他开始了，但永远没有完成理论上的阐述。见1926年7月1日、3日和7日《真理报》。

些真理，所以他过份强调了自己的论据，而对反面的论据则注意不够。他同其他人一样，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和正义，他常常针对他的对手的挑战作出反应，而不是针对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则是来自对手的最重要的挑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雄心勃勃地把有远见的分析、宏伟的历史类比、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混为一体。有远见这一点使他的理论对有关工业化的论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21年以后，官方的愿望集中在把凋敝的经济，特别是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上，也就是要使遭受破坏的和闲置不用的生产工具重新开动起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得比这个近期目标更远，他展望到将来已有的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时的情况。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他提出了从哪里取得集中投资的资源问题，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投资。需要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不仅是为了补偿非生产性的消费和1913年以后的固定资金的正常折旧，而且是为了扩展和在技术上改装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工业基础。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要关心的是苏维埃俄国的落后，而不是它的暂时破坏，是进一步的工业化，而不是简单的恢复。为了这个缘故，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提出了工业化的远景问题，并使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逐步改变了方向。他把当时官方的经济思想说成是一种空想。这种思想认为靠国营工业部门内部的盈余就足以进行广泛的工业化。这种思想是在恢复时期经济状况得到了相对的缓和和所花费用不大的情况下产生的。他的论点刚好相反。

---

① 《新经济学》第77—146页。厄尔里希的《苏维埃工业化》最充分地研究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我大量依靠这本书。

他认为在工业内部可以取得支撑自己的积累之前，需要有一个把大量资本，主要是取“自国营经济之外的资金”，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初期阶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一个孤立的苏维埃俄国可以作出的选择是很少的，他的结论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他提出的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办法，就是从农民那里把大量剩余价值向国营工业部门转移。①

为了加强他的论据并使它具有理论上的连贯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这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同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相类比。他忠实地回想起马克思关于新生的资本主义怎样通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系统的掠夺”（殖民掠夺、剥夺、极重的税收），靠使用“所有强迫和掠夺的手段”去取得剩余资本为自己取得寄生养料的叙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主张为社会主义积累采取同样的方法，认为有些方法“在原则上”是不行的。②但他仍采用了“剥削”和“剥夺”这些词，以说明从农民那里抽取剩余价值的特征，他认为一个部门，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或私人的，必然要“吞食”另一个部门。他的论点甚至不太机智地而又强烈地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国营工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可比作帝国主义宗主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他的论敌指责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想象的，就是把农民当作工人国家的国内殖民地。他后来不提这些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的名词和比喻了，但是这些名词和比喻并没有被宽恕或遗忘。

事实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真实计划，并不象他所作的类比那么残忍。他反对暴力和没收，认为那些方法是不可接受的。他建议在两个部门的市场关系中通过“不等价交换”来积累新的资金。

---

① 《新经济学》第84、88—89、124页。

② 同上书，第85—88页。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部分。

他认为这种办法比直接征税更为有效，并且可以少触犯人。国营工业应利用它的独特的超垄断地位，以实行一种“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对各种形式的私人经济进行剥削的价格”。[①]国家实行贵卖贱买，人为地抬高工业品价格，而相对压低农产品价格。这个建议实际上就是1923年后左派的纲领，它是直接针对官方政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党的领导为缩小工农产品之间差价所做的努力表示蔑视。相反，他把1923年导致“剪刀差危机”的价格结构肯定为社会积累的关键手段。

不管他的建议和他所作的名声不好的类比如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有必要和从哪里取得新的固定资本的分析，在工业化问题上是很有见地的。这个问题，在他于1924年底提出来以前，是完全被忽视的。1925年以后，党的领导慢慢地觉察到，苏联经济的痼疾不是1923年呈现的那种低消费，而是经常发生的“商品荒”，也就是国营工业不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判断就显得更有洞察力了。从这一点上看，他所作的类比，对他所强调的论点来说，并不是主要的东西。虽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许是以为这个类比可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坚决态度，可是它确实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雄心，就是要提出一套作为社会主义部门的“基本规律”或调节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以与统治私营部门的价值法则相对立。[②]这是一个单独的理论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它同布哈林在1920年发动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是有联系的。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决定使他的模特儿成为一幅杰作，而作为一幅杰作，它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使左派得到了强有力的思想和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发言人。自然，布哈林

① 《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7卷（1924年）第79页；《新经济学》第110—111页。

② 《新经济学》第136—146页及第1、3章。

作为一个政策制定人，就得在他的余生中坚持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进行斗争，即使在1928至1929年间当他认为斯大林已接受这一"规律"的时候他还是要进行斗争。

布哈林相信的是另一种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方式。虽然他的信念在1924年以前已经有所流露，但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开提出他的论点后，布哈林就被迫把自己的主张明确说出来。需要捍卫多数派当时实行的政策并使之具有目的性和连贯性。这个任务落到了领导人中唯一有学识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的身上。布哈林在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整个左派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纲领。[①] 由于布哈林的纲领主要是作为一种批评意见提出来的，所以他倾向于用批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的方式加以表述。总的看来，他提出了互有联系的三方面的反对意见：经济、政治以及可以理解为道德或伦理方面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经济方面的论据自然是主要的，但是后两方面的意见对布哈林在经济方面的推论也有强烈的影响。下面先讨论后两方面的意见。

他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可用他的一句名言表达："同农民处于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强大的"。[②] 他坚持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纲领会使农民疏远，会破坏工农联盟并危害政权的生存。到1924年，每个人都同意：没有适当的刺激，农民不会自愿生产或交售余粮。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明确承认苏维埃生活中的这一事实。可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不等价交

---

① 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1月之间，布哈林发表了三篇论经济政策的主要文章：《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4期，重印于他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苏维埃经济中的新发现，或怎样会导致工农联盟的毁灭》，见《真理报》1924年12月12日，重印于《为了列宁主义》；《对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的批判（1923年10月的教训）》，见《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1期，也重印于他的《几个问题》。这些文章都是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虽然最初没有指名。

②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2页。

换"将取消市场刺激，他没有回答当农民面对显然不利的价格结构而拒绝出售剩余产品时将会发生什么。布哈林认为那时将不得不重新采用征集办法，使党和农村居民再次发生冲突。他强调指出，那就是左派的"可怕逻辑"——"孤注一掷的心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压力和一意孤行的盲动"——将导致的结果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作的历史类比只能进一步使布哈林相信，左派的纲领会引起国内紧张和灾难。

任何政策如有导致同农民发生冲突的危险，不管在经济上多么有理，都是布哈林所不能接受的。他确信在这样一场对抗中党将是输者。他现在把取得农民支持的必要性——工农联盟的不可侵犯性——看作俄国革命史的主要教训："1905 年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没有城市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联合"。那是"对我们大家的最大教训"，说明了"工农联盟的全部重要性"。1917 年的事件证实了这个历史真理，胜利是从"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中得来的。这一"相当独特的、新颖的情况是我们的革命的全部发展的基础"。新经济政策已经把原初是毁灭性的联盟，变成了建设性的联盟。如果没有这一联盟，党的专政是没有希望的："如果失掉了阶级力量的这种特别有利的结合，那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发展基础就完了。"②

布哈林把 1917 年革命看作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解释是从列宁的一段话中发展出来的，是为三个并行的目的服务的。首先，它把那一年的"伟大农民革命"看作"我们革命"的有

---

① 《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593 页；《几个问题》第 53 页；《报告》第 18 页；《为了列宁主义》第 311—312 页。

② 《不断革命论》，载于《为了列宁主义》第 347—348、359 页；《1905 年的革命》，见《劳动通讯》1925 年第 12 期；《列宁的政治遗嘱》第 7—8 页；《农民问题的意义》，载于《布尔什维克》1925 年第 3—4 期第 5、16 页。

益的组成部分，而不象布尔什维克过去所习惯的那样把它看作异己的运动。第二，它这样也就同那种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联系的对 1917 年革命的解释对立起来。最后，它使布哈林可以争辩说，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类似早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合作联盟关系，而不是类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的那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① 但是，这一解释的中心意思就是谨慎和和解，这两个词也就是布哈林主义的箴言。这一解释告诉人们，采取反对农民的政策无异是自取灭亡。布哈林根据这一思想反复警告说，党必须象"在刀刃上行走"② 那样小心谨慎。

布哈林在 1915—1916 年间曾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拥有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国家，而现在却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不稳定地依赖于农民的不断容忍的国家，这或许是奇怪的。布哈林对个体农民在 1920 到 1921 年的农村骚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要求独立的愿望具有深刻的印象，可是他没有清楚地看到农民的共同弱点是他们的分散性和个人自主性。在 1929 和 1933 年间，苏维埃国家将对农民群众发动并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内战，从而证明农民的隔阂对苏维埃制度并不是致命的。然而布哈林只是部分地看错罢了。他理解到，或者至少是感觉到，被迫同农民进行对抗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前景使他感到恐惧，成为他的又一个长期害怕的东西。即使是一个并不同情他的著作家也说，"他强烈地预感到，怨灵将降临大地"，③ 如果"一意孤行的盲动"占了上风的话。

---

① 见《三篇讲演》第 26 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 47 页；《为了列宁主义》第 298—299、341—349 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18—19 页。

② 见《为了列宁主义》第 298 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28 页；《红色处女地》1925 年第 4 期第 263、267 页。

③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 234 页。

然而，布哈林关于党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仅仅是他对反农民政策所持的反对意见的一部分，他从来不单靠这些意见。在1924至1929年间，他也对任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虐待农民的做法表示道义上的反对，虽然并不始终一贯或经常鲜明地这样做。研究布哈林思想中的这个因素要很小心，因为可以设想他也许会否认它的重要性，也因为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一种反对把道德价值引入社会评价的强烈传统。

这个传统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传下来的。尽管马克思的许多作品明白无误地渗透着道德主义，但是一般地说，马克思对研究社会和历史是坚持采取严格的非伦理学的态度的。他有一句名言说："权利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此为条件的文化发展。"这句话表明他是坚决拒绝用一定时代的法则以外的东西去进行论证的。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幻想的地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马克思对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严厉批评。他把纲领要求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斥责为"陈词滥调"和"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① 这种反对作伦理评价的偏执之见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强烈影响的。伯恩施坦后来企图把清除了"科学"确实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康德的伦理学结合起来，他的修正主义的努力表明了原始马克思主义中反伦理学的假定和科学假定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朝着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更加令人怀疑。

在这方面，布哈林十月革命前的立场完全是正统的。他在1914年提醒他的读者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一

---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见罗伯特·塔克《马克思著作中的哲学和神话》(英国剑桥，1961年)特别是第11—27页。

种'伦理学'理论更加荒谬了……。马克思的理论除了因果法则外不知道有其他的自然法则，不能承认其他的法则"。他补充说："伦理的辞藻"是"我们不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① 1917年以后，反伦理学的传统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制定牵扯在一起了，常常表现为在"客观条件"面前鄙视道德上的约束。在国内战争期间，这样的推理方法是司空见惯的，那时党的过火行为被看作是历史的必需或者是被社会主义目的证明为正当的手段而心安理得地加以合理化（在不小的程度上布哈林的《经济学》促进了这种合理化的方式）。这种观点并没有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而结束。1922年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法庭上，布哈林在作辩护时拒绝把他的辩词置于"道德"基础上，而是以唯一可以容许的标准——"政治上的需要"——为依据。1924年，在回答伊凡·巴甫洛夫的反布尔什维克声明时，他宣告他的忠诚"不是对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基督的道德命令，而是对革命的需要"的忠诚。一年以后他抱怨说，有些人常常用同政治毫不相干的道德推理来代替严肃的论证②。

在二十年代，对布哈林本人也可提出同样的埋怨。因为同老的传统和他自己的声明相反，他在国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立场中开始明显地显露出一种道德的标准。从1924年他第一次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斥责为"荒诞的类比"和"可怕的梦"那个时候起，一直到1929年他把斯大林的纲领指责为"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为止，"伦理学的辞藻"成了他反对反农民的政策的意见的一个部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批评布哈林"爆发了一场道义上的激愤"③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次讲到工人阶级时

---

①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第158、168页；另见《进攻》第69页。

② 《社会革命党人案件：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讲话》（莫斯科，1922年）第139、144页；《进攻》第215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92页。

③ 《为了列宁主义》第292、297页；布哈林的话，见《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8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228—229页。

说，“他们没有什么理想可实现……”。对布哈林来说，理想却成了实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任务的一个重要问题。

显然在1923年他就已经意识到，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处于少数的状况并不是一国的独特现象。他思想中的新因素是同这种认识有关的。在1924和1925年间，他象一个较晚地发现了久被忽视的真理而又掌握了有力的统计材料的人一样，热情地抓住一切机会向他的听众宣传，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构成不大的少数”，而农民，主要在东方的农业国家中，“是我们星球上的大多数”。在延伸俄国经验的基础上，他修正了他对世界革命的理解；据此，他多次提出了“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同殖民地农民之间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① 等设想。他在1925年曾预言，只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将成为，或者说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解放力量”。但是，正如在苏联，“决定性问题”仍然是：世界上胜利的无产阶级还将是少数，“他们在胜利后*无论如何*仍须同农民好好相处，因为农民是居民中的大多数，他们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份量”。②

在某种程度上，布哈林的看法代表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一原理传统地把农民看作封建主义的反动残余）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努力。这些看法也是针对党内重新抬头的反农民情绪的。他对下述信念（他自己在1917年抱有的信念，和当时被公认为属于托洛茨基的信念）表示异议，这种信念认为农民对革命的用处“只是在同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斗争中作

---

① 《为了列宁主义》第351、352页；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第4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121、131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3—4期第6—8、16—17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体会议》（1925年）第305—306、528页。

②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3—4期第17页；《为了列宁主义》第351、353页；《建设社会主义》（伦敦，1926年）第64—65页。

为炮灰”。相反，无产阶级在整个过渡时期都需要农民的支持：“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势必要带引农民一起前进”。[1] 布哈林的立场不是歌颂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民粹派的“亲农民”立场，而是对阶级力量所作的实用主义的估量，他要城市布尔什维克同情地对待他们的同盟者，要看到他们在社会上处于落后状态，“这不是农民的‘罪恶’，而是他们的不幸”。他要求用“热诚的爱”，而不是用“厌恶和鄙薄”对待农民。反农民的态度是同“无产阶级的责任”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的心”[2] 的年代里。

把苏维埃俄国看作世界上阶级的缩影，促使布哈林朝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去考虑问题。他关于“世界农村”的想法，是同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主张搞现代化的人相符的。到1924—1925年，“资本主义趋于稳定”，这驱散了布尔什维克对于早日发生欧洲革命的希望，而经济方面的对立意见的产生，反映出党已认识到，至少在目前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靠自己来搞工业化。布哈林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发现了一层更大的含义：经济上的落后是一个国际现象，世界上大部地区象苏维埃俄国一样主要处于工业化前的状态。于是，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取得了另一层意义。这不仅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走上了实行工业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俄国农民群众和他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能不能“绕过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同所有落后国家都是有关联的。这个试验是在“摆脱了几百年来发号司令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布哈林从这里，从

---

① 《为了列宁主义》第287、351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3—4期第8页。

②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13—14页；《论工农通讯员》第60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体会议》(1925年)第312页；《国际形势和共青团的任务》，《真理报》1925年3月26日第3版。

这个“前所未闻和前所未见的”事实中看到了“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者的最大意义”。①

他对反农民政策提出的伦理上的反对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动摇了那种认为工业化主要是资本主义独有任务的老的马克思主义看法。布哈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和过去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之间进行历史对比的思想。前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他关于残酷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概念是取自马克思的。这个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表现为对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无情的掠夺，那时候“征服、奴役、抢劫、残杀，简单地说暴力，起着主要作用。”这种资本主义的“原罪”，就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是“把封建主义剥削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因而，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布哈林认为，以后的资本主义积累史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它的“动机”是“越来越高的利润——剥削，破坏和毁灭，这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真正机制”；建立在殖民剥削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只是把这种现象扩展到世界规模罢了。”②

在布哈林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征就是它对农业和农民的“寄生性”冲击。城市靠“吞食”农村，使农村贫穷化而使自己富起来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这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寄生，宗主国对殖民

① 《为了列宁主义》第29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45页；《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1270—1271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版第1卷第829页；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第106页；布哈林：《时评》，1928年5月27日《真理报》。另见他在1926年7月7日《真理报》上的评论。

地的寄生，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业的过度膨胀，而另一方面则是农业经济极端落后，特别是农民的农业经济。”

由此就产生了这个“吸血过程”的“可恶的后果”——“贫困、无知、文化落后、不平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生活的愚昧”。① 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业化的型式”要有根本的区别。布哈林在1924到1925年间曾反复坚持：

“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们的工业化必须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它是由无产阶级实行的，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它对农民经济的影响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对农业的‘态度’一般地说也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使农业下降。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对农村的一个寄生过程……而是使农村得到最大改变和提高的手段。”②

布哈林经常提到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任务”，他想传达的就是这种设想。苏维埃工业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发展农业部门，必须“开辟城乡关系的一个新时代，使农村经常发展缓慢的状况得以结束，使工业面向农村，把农村从历史的后台引向经济历史的前台”。这一尝试是历史性的，因为它是没有先例的。布哈林在1925年1月在一次共青团的集会上曾满怀热情地讲到这个题目：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周期——不论在东方专制主义时代，或是在所谓的阶级世界时期，或是在中世纪，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先例：即统治阶级把克服和消除掠夺性的城市和它所吞食的农村之间的差别、享有文化上一切好处的城市和被牺牲于

---

① 《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第2版；《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12、89页；《教师和共青团》，载1925年2月4日《真理报》第5页。

②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9月30日《真理报》第2版。另见《为了列宁主义》第288—292页；《几个问题》第8—9页。

愚昧的农村之间的差别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①

布哈林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伦理观，探索一个必要的标准去区别什么是可以容许的和什么是不能容许的。他相信人们将用资本主义历史的反光镜来看苏联的经验，他希望镜子中反映出来的映像更富有人性、更完善、更有生产效率，他看到关于这一试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价正在形成。苏维埃俄国能不能不仿效残酷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实现工业化呢，他似乎是在暗示，如果不能不仿效的话，那末其结局将不是社会主义。手段将影响到目的。他在1926年1月解释说，"我们不要用铁扫帚把中农赶入共产主义，不要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拳打脚踢推着他们走。"这"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不合适的"。布尔什维克是"先驱者，但是我们不是在做实验，我们不是拿了一把刀子对活的机体进行手术的解剖者，我们懂得我们的历史责任。"②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作用的独特理解，意味深长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哈林强烈反对反农民的政策（我们将看到，这也是促使他开始提出经济上的得意见解的原因）。他激动地把"第三次革命论者"斥责为宣扬"大迫害"的人——"想建议给农民资产阶级宣布'圣巴托罗缪之夜'* 的怪人"。③这也说明了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作出愤怒反应的原因，他认为这种思想乞灵于以往的劫掠和剥夺，不会导致暂时的"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而会造成一种永

---

①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真理报》1928年2月4日第5版。

② 《报告》第23页；《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载于《报纸和革命》1925年第3期第8页。另见《三篇讲演》第26页。

* 圣巴托罗缪之夜，亦称圣巴托罗缪惨案，为1572年法国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内战中发生的大屠杀事件。——译者注

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47页；《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8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6页。

久的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布哈林争论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公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适用的，那就是：

"假如讨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而是向永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向维护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的方向，*向无产阶级蜕化*为一个真正的剥削阶级的方向前进的话。那时就可正确地毫无保留地把剥削的概念适用于这种秩序。同样，把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叫做'无产阶级'的殖民地也会是正确的。"

但是，他反问道："人们能……把无产阶级称做剥削阶级吗？不！一千个不！而且绝不是因为这听起来'难听'，……而是因为这个'名词'不符合客观现实和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看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个过程的特征"；"它意味着不去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实质"。①

除了它的伦理基础之外，布哈林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累加以并列的做法包含着明显的前后矛盾。尽管他把资本主义模式描绘得那末凄凉暗淡，他知道至少在一个国家中，即在美国，农业的繁荣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② 看来俄国农民的不幸历史是促使他对过去剥削农村的情况加以一般概括的真正原因。在前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激进思想中，对贪得无厌的专制制度掠夺农民的情况的描述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布哈林采纳了这个主题。布哈林回想起二月革命以前"半赤贫的农民"遭受着"中世纪形式的剥削"，在地主和贵族的"铁蹄"下忍受苦难的状况。这些地主和贵族"只不过是国家机体上的一个巨大的寄生物"。看来布哈林的"寄生物"标本的真正来源，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沙皇专制

① 《为了列宁主义》第290—292、315—317页；另见《几个问题》第8—9页。

②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页；《几个问题》第6页。

主义。他在激怒的、有启示意义的论战中警告说，超工业化计划将以旧俄国的“落后的半农奴式农业，贫穷的农民……和对农民的无情的剥削……”，“把苏联放到旧俄国的……历史行列里”。①

由于明显的原因，他从来不把他的经济思想同他的其他论点孤立起来，或者给它起一个特定的名称②，但是这种伦理上的考虑在整个二十年代的争论中一直影响着布哈林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有益于农民群众，他的这个信念反映在他的主要经济主张中：“群众的消费”——“群众的需要”——是“发展的真正杠杆，它会产生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正如他做为纲领那样表达的：“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应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③ 这个命题把伦理学的和经济学的观点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布哈林需得使党相信，这个主张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而不是由于在伦理学上更为可取的。

经济学自然构成了辩论的主要实质。这里我们需要在开头说明，布哈林在两个重要方面是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左派的。首先，他象所有主要布尔什维克一样，把工业化作为党的最重要的目标。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包括国家的骄傲和安全，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存在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永远不会安全这样一种担忧。他同左派

---

① 《劳动通讯》1925 年第 12 期第 5—6 页；《国际报刊通讯》第 7 卷(1927 年)第 423、431 页；《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3 版。

② 虽然他间接地提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几个问题》第 8 页。

③ 《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 184、197 页。《国际报刊通讯》第 7 卷(1927 年)，第 199 页。他在《几个问题》第 3—13、45—85 页上详细发展了这个论点。

一样，特别要求一个会形成巨大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业化过程："金属工业……这是我们工业的基础和骨干"。①

其次，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同意，苏维埃工业化主要要依靠国内资源。②另外，布哈林也赞成，工业化要求把资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国营工业部门，或者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说，从农民经济那里"抽过去"。布哈林认为，真正的分歧是在方法和限度上。

"如果争辩说工业应该只靠工业范围内生产的东西来发展，那将是错误的。但是牵涉到的整个问题是我们从农民那里能够取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抽取，用*什么方法*，这种抽取的*限度*在那里，*如何*……才能得到最有利的结果……我们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反对派的同志主张过度的抽取，主张对农民施加巨大的压力。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的立场并不是否定这种抽取，但是我们的计算要清醒得多……。"③

布哈林在经济上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关键和他自己的经济纲领的基础，就是他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他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提出这个论点是在1924年春天，是在他写的一系列从表面上看来同正在出现的党内辩论没有关系的理论文章中。他批评的对象中有经济学家米哈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此人早期提出的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同党内讨论有关的。他坚持用他的"比例失调论"来解释危机，

---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925年)第17页。

② 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布哈林是欢迎外国贷款的，同时他怀疑将能借到的是否会多于"沧海一粟"。见《论党对工农通讯员的领导》，1926年5月28日《真理报》，《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4页。

③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1—62页。另见《为了列宁主义》第280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

他否认生产同群众消费之间有必然的依赖关系。他认为只要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计划好，那末就可以不管社会消费水平而使资本积累得到增长。他实际上是说，工业可为它自己的产品提供有效的需求。布哈林断然拒绝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为生产可孤立于消费的那种“荒诞幻想”。他坚持，生产的“链条”必须总是“以生产……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为终结……”。①

初看起来，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论点所持的执拗态度好象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布哈林自己也曾经常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能力，后来他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说在“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自由市场的)下，在消费落后的情况下，生产仍可免于危机。② 他坚持生产最终应该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也许可以看出在这句话中存在着一个有希望的“应该”。不管情况怎么样，几个月后就清楚了，布哈林提出他的主要经济原理时，他更多地是针对新的争论，而不是针对老的争论的。他的原理就是：“如果在已有的经济关系体制中，工业早已为农民市场进行生产，它不能脱离这个市场而生存，那末工业的形势、积累的速度等，就不能不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当然，他所指的是俄国，他进而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就是一个建立在“应用杜冈主义”基础上的纲领。他在整个二十年代曾反复提出这一指责。③

---

① 《帝国主义和资本的积累》第66、78页和第3章各处。这本书中的文章最初出现在1924年底和1925年初。它们主要是针对罗沙·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可见保尔M·斯维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则》(纽约，1942年)第158—172页。

② 《共产国际》1928年第31—32期第35页。关于对布哈林对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态度的批判性探讨，可见厄尔里希的《苏联的工业化》，第18—21页。

③ 《几个问题》第5—6、60页。另见《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布哈林认为，左派要求建立"工业专政"的号召忽略了农民的需求这个关键问题。（他补充说，这个问题对沙皇制度的垮台曾起了作用。）[①] 由此产生了他在1924和1926年间不倦地加以阐述的主要经济论点："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没有农民经济的积累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国内市场的容量……是我们经济的中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恰当地得到解决，前景是有希望的："农民的购买力越大，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或者正如布哈林简单明了地预言的："农民经济积累一个戈比，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一个卢布的基础。"[②]

在布哈林看来，左派的"超工业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城市和农村部门是"一个单一的机体"。如果阻碍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你将得到静寂的工厂……你将得到衰退的农业经济；你将得到总的萧条"。因此，他坚持认为，表明增长的真正指示器不单是工业投资，而是"国民收入总额，一切东西，从生产到军队和学校，都是在国民收入总额的基础上增长的。"[③] 新经济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千百万农民的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盟"，从而解决了联结两个部门的关键问题。贸易就是这种经济联结，通过它"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④]

两个部门的相互作用在布哈林看来表现为相互的供求关系。农村的需求是两方面的：农民首先需要各种消费品和简单的农具；但是随着农业经济中积累的增加，他也将需要象拖拉机之类的复

---

①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1页；《几个问题》第5页。

② 《几个问题》第52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3页；《为了列宁主义》第303、371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41页。

③ 《几个问题》第6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05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7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页。

④ 《几个问题》第51—54、76页。

杂的生产资料。所以，农民的需求有助于刺激轻重工业的各个行业。同时，农业的技术进步有赖于工业产品，特别是肥料和农机。[1] 布哈林接着说，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国营工业反过来可取得它所必需的东西：粮食和技术作物，粮食可用来养活城市工人并供出口以换取所需的设备，技术作物可用来满足进一步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2] 这样，通过两个部门的相互依存就可解决粮食收集和国内市场容量不大的问题。布哈林认为这些是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就是布哈林为1925年那次引起争论的农业改革所提出的基本论据。这次改革废除了还残存着的妨碍农民经营的大多数法律上的障碍，从而把新经济政策扩大到了农村。[3] 布哈林的纲领的核心就是鼓励个体农民增加积累，扩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农民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剩余产品。他希望把农民经济“从自然消费经济转为商品生产经济”。这意味着鼓励农村各阶层，特别是中农和境况较好的农民，都富裕起来。左派只对贫农表示同情。他们认为这种前景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意识形态上是令人反感的。布哈林对这些改革的维护，也反映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历史任务”的伦理上的理解。他认为党的目标并不是要实行“贫穷的平等”，并不是要“减少较富裕的上层，而是……把下层提高到富裕水平上去”。他针对着左派又补充说：“贫穷的农民社会主义是糟糕的社会主义……只有白痴才会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穷人。”[4]

---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3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1、41—42页；《列宁格勒组织》第99页。

② 《列宁格勒组织》第98页；《三篇讲演》第16—18、20页。

③ 见他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载于《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3—14页和1925年第9—10期第3—15页。

④ 《几个问题》第4、6、12、76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0—22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5、14页。

不过，他的基本论据是实用主义的。要使农村的需求和出售的产品有较大的增长，至少在开始时必须依靠有能力积累钱财和扩大生产的经济上较强的农民。但是，那些农户的经济发展特别受到战时共产主义留下的种种法律限制和变化多端的行政手段的束缚。布哈林解释说：

“富裕的上层农民以及也想富起来的中农现在怕积累。有这样的情况，农民由于害怕被宣布为富农而不敢安铁皮屋顶；如果他购买一台机器，他要设法避开共产党员的注意。高级一点的技术设备成了走私品一样。”

改革是为了补救这种情况。布哈林认为，这些改革要适用于各部分农村居民。他1925年在引起政治风波的一个声明中明确说：“我们应该向全体农民，向所有农民阶层说：发财吧，进行积累，发展你们的经济吧。”① 政治迫使他撤回了“发财吧”的口号，但是并未撤回它的意思。他说，这是“对一个完全正确的立场的错误提法”。这个立场就是：“我们不阻碍富农积累，我们不想组织贫农对富农搞第二次剥夺。”②

这些改革的更大目的是“开放商品交易”，布哈林把这个目标称做“我们的经济政策总方针”。他相信贸易的繁荣将使经济得到最迅速和可靠的发展。扩大市场的容纳量，提高商品总量，加速工农业之间和工农业内部的流转，“是加快我们经济生活速度的主要方法”。它“将提供使生产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余地”。③ 由于这个原因，对在国营部门之外生产的商品应予欢迎。改革不仅对农民

---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4—5页。

② 布哈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第147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5页。同样1925年在另外两个场合下他被迫撤回这个口号。见《新反对派：1925年讨论材料汇编》（列宁格勒，1926年）第47页；《布哈林同志的声明》，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第3版。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16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5页。

的经营，而且对广大的小手工业都适用。很多种类商品是小手工业生产的，它的发展将对整个国民收入作出贡献。同样，布哈林主张，如需要满足国内需求，可进口工业产品，因为，用他所举的例子来说，进口的拖拉机会增加国内市场的能量，最终也会造成对苏维埃工业产品的更多的需求。①

布哈林如实地看到，他的纲领同主要强调生产的左派的不同点就在于他主张"从流通（货币、价格、贸易）到生产"。这就是他热烈为之辩护的"通过交换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实质。他在1925年解释说："加速流通，扩大市场，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从这里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扩大市场，等等。这是我们生产的道路。"② 这样一个纲领要求党遵循三条基本政策：宣传和实施农业改革；在进行贸易的地方，从中央到地方市场，恢复正常条件，减少国家干预；经常降低工业品价格。

1924到1926年间，一些大的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常常集中在官方价格政策中当前的实际问题上。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不仅关系到农村骚动的前景，而且关系到那个阶级将承担工业化的负担，以及从农民方面可以"抽取"多少的问题。因而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左派要求制定比较高的工业品价格的时候，布哈林却提出了两点理由，主张采用相反的政策。

第一，他认为（显然不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有很大伸缩性的。低价将会带来更大规模的销售和更多的利润总额。另外，低价可使资金流转得更快，可通过增产使生产合理化而降低多种成本。反之，布哈林警告说，人为的高价政策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会使1923年的"销售危机"重演，并导致"工业停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4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3页；《几个问题》第9—10页。另见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13—14页。

② 《几个问题》第54、66页。

滞”（因工业失去了市场和原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意味着“把生金蛋的鹅杀掉”。① 布哈林过去虽曾说过“放弃利用我们的垄断地位是愚蠢的”，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极力主张“在每一个生产循环中实行较低的价格”，他认为最快的工业增长速度不是来自“垄断超额利润”，而是来自“每一个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②

在这个反对高工业价格的论点之外，他补充了另一个论点：“垄断本身隐藏着腐朽的危险，容易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竞争促使资本主义公司进行更廉价、更合理的生产。他认为苏维埃工业缺乏这种内在的动力：

“我们实质上拥有国家的超垄断，如果不去推动、迫使和鞭策我们的干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质量，那末我们就有产生垄断性腐朽的一切必要前提。在我们这里，应该由从群众需要中产生的经常压力来起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所起的作用。”③

布哈林有时把这种危险称为“垄断的寄生性”和“官僚主义的蜕化”。促使他指出这种危险的，不仅是因“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而付出的经济代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这些言论反映出他总是担心出现一个新的阶级。他曾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我们的经理是无产阶级战士，可是他们也有人的弱点。”垄断价格政策是“虚伪的哲学”，部分地是因为这种政策提倡另一种标准，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人民为官吏，而不是官吏为人民”。④

这样，在回答从那里去取得苏联工业化资金这个关键问题的

---

① 《几个问题》第63—71、77—85页；《为了列宁主义》第299—305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4—45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7页。

② 《为了列宁主义》第308—309页；《几个问题》第77页。

③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7—58页；另见《为了列宁主义》第306—310页。

④ 《为了列宁主义》第307页；《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99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91页；《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版。

时候，布哈林指出了三个来源。首先是国营工业本身因增加销售和降低成本而增长的利润。第二是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分子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得到的新的税收。这种收入证明对这部分居民采取容许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三是在苏维埃银行和信用机关中的自愿储蓄，先是富农资本家的存款，然后象布哈林所希望的，是小农的存款。他把前两个来源看作"基本来源"，对自愿储蓄只是在1924和1925年间附带提到的。① 但是到1926年初他也同样强调第三个来源："我主张采用把农民的小额积累集中到我们的信用社、合作社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政策，这是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吸取补充资金的主要方法之一。"鉴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是使用小存款户的储金的，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也这样干呢？"②

他对自愿储蓄的关心，反映了布哈林的纲领同左派纲领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分歧。左派正在寻找一种实行强迫储蓄的方法。当左派强调迫切需要对工业化过程进行有力的国家干预时，布哈林特别在二十年代中期所注意的却是国营部门以外的经济所能作出的自发的、自动的和自愿的贡献。这种办法除了在经济上行得通以外，他的好处还在于大家对它都比较熟悉，它所采用的是些常用的经济思想和办法。（布哈林的论敌给他的思想戴上了"我们苏维埃的曼彻斯特思想学派"的帽子）③ 因此它是简明易懂的，而当辩论扩展到地方上去的时候，它是有不少有利之处的。1926年2月，布哈林向一个地方党组织简明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当时已成为官

---

① 见《为了列宁主义》第305页；《几个问题》第77—84页；《报告》第32—33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2—64页。

② 《全苏列宁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1926年3月11—12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第255页。

③ 多伊彻在《没有武装的先知》一书第415页上引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

方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先，假如农村中的商品流通得到增长的话，这意味着生产得更多了，购销更旺了，积累更大了；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也就是我们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如果总的商品流通……加快了，那末血液将会更活跃地流经我们的经济机体，这意味着我们工业的流通也加快了。如果我过去一个月卖一次，而现在卖四次，这就意味着我收到口袋中的不是一份利润而是四份；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工业中积累更多了，我们将加快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其次，从生长在这块土壤上的资产阶级分子那里，我们通过收到越来越多的税收的形式取得额外的收入……我们额外拿到手的这两个基本财源给予我们额外的手段，我们可用这些手段从物质上帮助各种社会主义形式，包括贫农，去反对资本主义形式。”①

这就是布哈林在 1924 年到 1926 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中的经济纲领。它明确地把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作为适当的过渡机构，社会主义可以由此得到发展。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经济是由公有部分（国营、社会主义或社会化的——他交替使用这些词）和私有部分两种成分组成的体制。公有成分包括那些通常被称为“经济命脉”的部分——大工业、银行、交通运输和外贸，布哈林有时还把合作社和国内贸易包括进去。② 他决定把合作社包括到社会主义成分中去，这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把国内贸易也包括进去，这是由于他对国营和合作社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取得的成就抱乐观态度。私营成分包括农民从事的农业、家庭工业、私营商业和其他私人资本。这些都表明，说布哈林倾向于把两种成分等同于国营工

① 《列宁格勒组织》第 103 页。

② 《列宁格勒组织》第 102 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 15 页。

业和农民的农业，这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有一次曾说过，经济更多地是象“一大盘社会经济冷菜”。① 但是，这种等同确实反映了这种体制的两个基本分支。

布哈林谨慎地指出，这种双重体制，只是在1924至1925年放松对私营成分的限制的时候，才开始充分发生作用。他解释说，在1921到1923年受到战争破坏的国营成分在竞争上还是软弱无力的，如果让私营成分自由发展，就会在经济上把前者淹没。但是，到1924和1925年，国营成分已不再是易受摧残的“绿洲”，而变成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布哈林争论说，这是一年一年变得更为确实、更为明确的事实。虽然他把混合经济看作一种过渡性的安排，但他坚持认为这种安排是长期的，是可适用“几十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私营和公营成分之间的关系将保持下去，并通过半自由的市场作用加以管理。这种市场的功能将随着实行国家调节的情况而变化。

市场在把两种成分联系起来，在分配商品和帮助分配资金以外，还可使苏维埃国家从“经济生活方面的半友半敌的人和公开敌人”② 的私人追求中得到好处。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解决了“小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利益的正确结合”问题。通过对农民、手工艺者、工人，甚至资产阶级的个人积极性的刺激，“我们让他们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布哈林对待富农的态度（“我们帮助他，只要他帮助我们”），总的反映了他对待私人资本的态度的特征。私人资本的发展有意无意地——“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利益。③ 而且归根到底，国营成分得益最多；通过它的比较大

① 《列宁格勒组织》第91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6页。

③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4、66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8—9、14页。

的市场竞争能力、效率和资金，它将逐步把私人资本从贸易和生产中排挤出去。布哈林如何设想"以市场制服市场"，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这里重要的是要说明，他接受混合经济和市场的思想就决定了他对正在争论的三个关键性问题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就是计划、工业部门之间的增长比例和经济增长率本身。

计划的思想，由于它提供了"经济合理化"的希望，所以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各种想象。大家对计划的好处和可取性都是一致的，但对如何认识它的意义和如何贯彻计划就不太一致了。① 实行单一的工业计划，是左派的伟大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是那样迷人，所以能把反对派内部的几种不同倾向联合起来。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部分地由于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计划工作中发生的过分集中的现象，布哈林在1924和1926年间，对这个计划问题的评论经常是消极的。他嘲笑那种由上面布置一个紧迫的总计划的想法是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残余，他认为"当无产阶级军队取下了彼列科普"* 以后，这种幻想应该结束了。更为中肯的是他对那种不考虑市场力量，不考虑农民的求和供而计算出来的工业计划所作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不堪设想的"："国营工业内部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它同农民市场的相互关系。不考虑这种相互关系的'计划'称不上是计划，因为这种相互关系是整个计划的基础。"②

另一方面，他对计划的积极的评论是吸收了新经济政策的新

---

① 见布哈林在《几个问题》一书第57页上的评论；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0章和《社会主义》第2卷第10章。

* 指彼列科普战役。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南方战线的苏联军队在伏龙芝指挥下，于1920年11月7—17日为解放克里米亚而进行的一次对弗兰格尔的白卫军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后，1918—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译者注

②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4—5页；《几个问题》第60—62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0页；《为了列宁主义》第337—338页；《执委会全体会议扩大会议(1925年)》第372—374页。

的智慧的。一个"真正的"、"确切的"计划，只能随着国营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排挤私人经济，随着大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增长逐步制定。通向计划经济的道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布哈林也从国家操纵经济"命脉"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按计划制定批发和零售价格中看到了"计划的开端"。尽管他对"经济未来主义"所抱的敌视态度使他在思想上对计划问题有消极的看法，但是，他还是勾划出了指导他在1926年后提出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工作的建议的哲学思想。在1925年4月，他就说明了真正的计划工作的方向："一方面要建立工业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不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一定的比例，各部门生产的比例就完全是抽象的东西，不过是空谈而已。"他认为，计划工作应从保持比例开始，而不是象左派主张的那样，"从打破社会所必需的比例开始"。①

左派把计划工作看作是促进对重工业进行即时的巨额投资的途径。布哈林的纲领所设想的却是一种不同的工业增长模式。它把群众的消费看作推动力，把国内市场的容量当作决定工业内部比例的因素，它认为必须"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② 它意味着从发展生产个人消费品（如纺织品）的工业开始，而让重工业在连锁的过程中得到增长。布哈林争辩说，这种模式（他也把它同战时共产主义的蠢事对比）已被1921年以来工业的恢复证明为可行的："我们从提高最轻的工业部门开始，从那些能同农民经济取得商品联系的部门开始，通过它开始把轻工业，然后把中型工业抓起来，在

---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2期第5页和1925年第8期第9页；N·布哈林和A·泰尔哈伊默：《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莫斯科，1924年）第24页；《几个问题》第3页；《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374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7页；《真理报》1926年7月3日第2—3版。

② 《为了列宁主义》第310页；《真理报》1926年7月6日第3版。

这个过程的终点就可达到基本的生产环节，即基本生产资料也就是钢铁的生产。”他考虑将来也要采取这种平衡的增长模式，他预见到需要稳定发展轻工业，并使重工业继续依靠“同农民经济的充分联系”。①

最后，是速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的重要性，是随着党对苏维埃俄国在国际上是否安全的理解而波动的，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常常是用思辨哲学的辞汇进行的。当然，每个人都想取得可能得到的最快的工业增长率。左派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急迫感，但他们的见解同多数派领导人的见解一样是不精确的。布哈林的一些公开声明增加了这种混乱。在 1924 和 1925 那两年中，他把苏联的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作对比，认为他的纲领能“取得很快的发展速度”，而左派的纲领则不能。所以，他早在 1924 年就宣布：“在五、六年内，苏联将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②然而，欧洲资本主义到 1925 年中所取得的“稳定”，促使他作了第二次较为冷静的思考：“我们在增长，他们也在增长，这是新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比我们的一些邻国增长得更快，明显地更快。”“开放商品贸易”将能保证做到这一点。③

可是在同一时期，布哈林反复使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这些比喻所指的似乎是较慢的增长率。为了强调必须使工业同农业部门协同前进，他曾经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点，如说“拉着在我们后面的笨重的农民大车……慢慢前进”，或说“拉着全体农民这条巨大而沉重的驳船”。④如何把他在另一些地方用的“小步”这一比喻

---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 4、17—18 页。另见《真理报》1924 年 10月 24 日第 51 版。

② 《布尔什维克》1925 年第 8 期第 14 页；《进攻》第 205 页。

③ 《布尔什维克》1925 年第 8 期第 3—4 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 12—13 页。

④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 20 页；《为了列宁主义》第 287 页；《三篇讲演》第27 页。

同他同时讲的“高速度”协调起来呢？部分地是由于这个比喻是用来指从经济上和心理上使农民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持久过程（“几十年”），而“高速度”只是用来指经济增长的。但是这样区分既不明确，也不令人满意。左派的攻击集中在“小步”的含义是什么这一点上，特别是在1925年12月（在他说了“我们将很快增长”这句话之后两星期），当布哈林说了下面一句话以后，即“我们甚至可以在极差的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用蜗牛的速度爬着前进……”① 如果这意味着工业化将用“蜗牛的速度”前进，它不会使任何人，包括布哈林，感到满意。

当他象他经常所做的那样，决意把速度问题和“汲取”* 问题结合起来，并且看到更长期的前景时，他是站在更为坚实的立足点上。布哈林争辩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无限制汲取”计划，最初会使投资高涨，但是随后会“急剧”下降。可是，“我们计算我们的政策时不应该放在一年的基础上，而应放在好多年的基础上”，以便“保证整个经济每年都有较大的发展”。他在1926年7月总结这个更加站得住脚的论点说：

“工业发展的最快速度决不能靠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那里取得资金的办法来加以保证。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拿得少些，我们就可使农业有更多的积累，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保证使自己得到对我们工业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使农业取得了更大的收入，我们下一年度将可从这笔更大的收入中比去年拿到更多的东西，可保证使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更大的增长，更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页。布哈林在许多地方争辩说，在1923年列宁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可找到引用“缓慢的蛇行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22页。厄尔里希的《苏联的工业化》第78—79页上对他所用的比喻作了不同的解释。

* 指从农民那里汲取资金。——译者注

大的收入。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以后将会提高得更快。"①

关于速度的争论，使得总的经济辩论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变得更加明显。这些辩论是同一些非经济的考虑，包括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受到后者的影响。对喜欢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布哈林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尽管他提出政治上、伦理上和经济上的论据来反对左派，他自己的纲领只是在苏联实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理论的一部分。

公开宣传的那套布尔什维克思想曾经在1917至1920年起了很好作用，可是到1924年变得混乱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突然废除，使"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混乱"的新经济政策的出现，由于欧洲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沮丧心理"；列宁的去世，他的继承者宣称效忠于不同的列宁主义的情景——所有这些动摇了或严重地损伤了原先的信念和信心。②"我们的幻想的破灭"，就是过去所珍视的那些假设的破灭，就是老的理论的破灭，随之而来的是消沉和悲观。有许多征兆，有些是微小的，有些是令人震惊的：工人看到耐普曼的老婆的打扮感到忿怒；农村共产党员被宽大的农业政策弄得晕头转向；最严重的是新经济政策在忠实的党员中，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某种士气低落和思想危机"。③

在某种意义上说，幻想破灭的结果是使布尔什维克不再对理论的无限威力表示天真的忠诚了。甚至布哈林现在也喜欢引用这

---

①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64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2、45页。

② 见布哈林在《进攻》第128页上的评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16页。

③ 布哈林所举的例子。见《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9—40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9页；《俄国共青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第113页。

句话："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的永恒之树却是常青的。"① 尽管如此，党的领导人强烈地感到需要重建布尔什维主义，再次说明它是前后一致的。布哈林在1924年警告说，"有识的群众越来越多地提出了思想领域方面的种种要求……和问题"，如果党不去提供答案，别人会作出回答。② 从党内辩论的角度来看，作出回答是尤其重要的。在辩论中，敌对的派别都极力争取广大党员和党的全部工人支持者。不论是官方领导或是反对派，都进行思想宣传，每方都宣称只有自己的纲领是受到"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或布哈林隐诲地所讲的"历史布尔什维主义"的启发的，是同它一致的。左派满足于把它的建议裹在现存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的思想旗帜下，他们主要求助于过去的价值和理解。他们看不到有进行广泛的理论革新的必要，相反，他们把多数派"对大胆的经济倡议所采取的可憎的怀疑态度"斥之为实践上的机会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③

另一方面，"思想危机"要求布哈林表现出特别的责任感。作为一个官方理论家和新经济政策的维护者，他负有双重的责任去重建布尔什维思想，至少在涉及到广为争论的一些问题上。在1923年之后，他很少参加那些同党内争论无关的学术讨论，而把他的注意力用于对新的政策和他的纲领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在这过程中试图证明这些东西是符合"历史布尔什维主义"的。这里他又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左派可以有效地乞灵于已经确立的(即使已经失去光泽)那些思想，而布哈林须得化精力去揭示这些思想中有许多已是陈旧的幻想。譬如说，他摒弃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布尔什维克的热忱，指出经济实践中的战时共产主义不过是"社

① 《列宁的政治遗嘱》第10页。

②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26页。另见《进攻》第128—170页。

③ 列昂·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纽约，1945年版)第29页。

会主义的一幅讽刺画”。[1]他经常对取自“老的本本”上的思想表示鄙视，这意味着他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思想。如果说党的重大认识确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话，那末就需要有新的理论。虽然布哈林也可以有效地引用列宁的著作，特别是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仅仅诵吟师长之言是不够的。[2]

发表政治家式的箴言也不能解决问题。布哈林遵循他的新的实用主义，现在经常对“狂热的”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主张采用“既不右，又不左，而是……正确的”方针。这种中间道路准则和诸如“我重复两万遍，我们绝不应该离开新经济政策的原则”[3]之类的声明，所遇到的困难是，它们有点保守主义的味道，因此容易引起怀疑：多数派的政策是不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必须驳斥某些非布尔什维克人士所作的肯定的预言——“革命的天使正在悄悄地飞离这个国家”，因为这也是反对派的看法。[4]布哈林本人曾于1922年思考过：“历史充满着革命党转为秩序党的例子。有时候唯一能使人回忆起革命党的东西就是它镌刻在公共建筑物上的口号。”[5]反对派把这种情况称做“热月党的反动”。*

总之，不仅需要新的理论，而且需要乐观主义的理论。布哈林懂得，新经济政策引起了悲观主义，部分地是因为它从外表上看并不是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6]混合经济外表上的粗俗不雅，使布哈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8页。

② 《报告》第21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2版。另见《世界革命道路》第2卷第116页；《几个问题》第47页。

③ 《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版)第364页；《报告》第10—11页，34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31页。

④ 布哈林在《捍卫》一书第148页上所引的乌斯特里阿洛夫的话。布哈林所指的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左派。见《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版)第1603页。

⑤ 法勃曼在《退却中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第304页上的引话。

* 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发动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建立热月党反动统治。——译者注

⑥ 《俄国共青团第五次全俄代表大会》第113—114页。

林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如说他的思想是“对新经济政策的理想化”，说他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而是象反动派给他起的一个绰号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新经济政策的普希金”。[1] 新的政策是作为一种让步而提出来的，在许多人看来，它只不过是让步而已。所以有必要去说服党员们，使他们相信，新的政策事实上代表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而不是“倒退运动”。所有那些“隐藏的怀疑派”都“认为谈论我们的前进运动，那是强词夺理”，对他们必须加以驳斥。[2] 在1923年建党二十五周年时，布哈林曾写道：“我们走上了哥伦布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航程”。[3] 现在他需要说明，航程还在继续，他的被公认的改良主义、他的“新经济学”，是引向社会主义的。

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细节之前，仍然需要确定，在一个孤立的农业国家是否可以搞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理论显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主要期待从成熟的工业主义的矛盾中产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左派是维护老的立场的（并不是前后一贯地或愉快地），虽然它的发言人也小心翼翼地承认，在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可能的。可是，他们激烈地反对在一个孤立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中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立场是正统的、现实的和始终是国际主义的。[4] 但是，1917年以后的事态发展逻辑——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取得的全国性

---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01、103页上季诺维也夫的话；《列宁格勒组织》第110页上布哈林的话。

② 《三篇讲演》第34页；《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8页。

③ 《我们靠什么取胜》，载于《俄共(布)建党二十五周年：1893—1923》(莫斯科，1923年版)第137页。

④ 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8期第78页上引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话以及布哈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136页上对他们的观点的叙述。

胜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广为传播的“向社会主义跃进”的思想，在1923至1924年对列宁倡议的新经济政策的令人鼓舞的赞许——却指向另一个结论。① 这就是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得出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

在反对“不断革命论者”的运动中，斯大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原理的，但是把它变成理论并在二十年代阐述“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官方看法的则是布哈林。②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在1922年11月以后已接近于这一概念，也就是含蓄地提出了“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只是在1925年4月，在斯大林发表讲话之后三个月，布哈林才开始公开和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③ 他有时否认这个原理是对他过去的一些看法的修正，虽然他的否认是半心半意的，因为从1917至1921年，他象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公开认为在俄国一国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④ 尽管“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可从列宁1922至1923年的文章中找到合法的渊源，但是正式地阐述这个原理，这确实是官方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转变。布哈林曾明确承认：“情况表明，问题并不象原先看来那么简单，那时候我们对它还考虑不多。”⑤

他经过思考以后，现在为回答在欧洲不爆发革命的情况下苏

---

① 见布哈林在《报告》第36页上的评论。

② 瓦连廷诺夫：《学说》第52—53、60页；多伊彻：《斯大林》第299页。这一思想的正式来源对参加辩论的人来说并不总是清楚的，反对派有时说这一思想来自斯大林，有时说来自布哈林，有时又说来自他们两人。例如，可见卡尔在《社会主义》第2卷第43页上注③中所引的反对派的话，和罗伯特·丹尼尔斯主编的《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二卷集，纽约，1962年版）第2卷第13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9页。

④ 正如托洛茨基用文件材料充分证明的。见他的《俄国革命》第3卷第398—399页；《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57年版）第37—39页。

⑤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9页。

维埃俄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包括两个部分的公式。这个公式的第一部分是有关这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它的资源和阶级状况的。这里布哈林的结论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他反对"我们一定会由于技术落后而灭亡"的假设，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论断："我们甚至在这糟糕的技术基础上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用蜗牛的速度爬着前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建成它。"①他争辩说，这就是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持的立场，列宁在"遗嘱"中指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和足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末就意味着"根本谈不上这种建设能变得不可能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障碍是存在着的，布哈林在他的公式的第二部分中就讲到了这个障碍：只有当革命变成国际革命的时候，苏联才能免于外国资本家的干涉和战争。因此，从保证免除外部威胁的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的事实上的最后胜利，没有其他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②

布哈林在乐观地回答我们向那里去这一当务之急的问题时提出这个公式，这是他重申他的国际主义的一种方法。他把内部潜力和外部威胁区别开来，实际上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现代化的前景上，放在怎样合理地看待这个问题上。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辞藻底下，摆着的没有明说的本质问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象布哈林所做的那样，提出"我们可以坚持自力更生"，"我们要每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5—136页。关于他在1925—1926年间讲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他主要言论，见《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4—6、9—12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100—10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16—24页；《建设社会主义》第49—63页；《世界革命道路》第2卷第110—117页。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22页；《建设社会主义》第50—52、62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2卷第111页。

天、每月、每年克服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1] 这些论点，是不需要对社会主义另作特别的描述的。换句话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能不能不靠外国援助实现工业化的辩论，不管这种援助来自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来自一个富有的保护国。

虽然布哈林在这场争论中始终维护他的公式，但是，这个公式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民族主义气味，显然使他感到不安。他显然认为，他已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他自己对国际革命的信誓旦旦的忠诚（“不是柏拉图式的……而是真实的”）调和起来。[2] 但是，他也知道，左派对“狭隘的民族意识”提出的指责，所指的是一种真实的、而且正在增长的危险。虽然他本人是没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一般的党员都这样。他们中间许多人在这一理论中所看到的首先是对俄国民族前途的希望。有鉴于此，布哈林试图通过三条途径去阻止民族主义的倾向。首先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至少几十年”以后的事。第二是反复说明，即使到那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还将是“落后的社会主义”。最后是痛斥那种把苏联的事业看作“民族任务”的观点，并对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所含有的这种危险提出警告：

“如果我们夸大我们的可能性，那就可能产生一种‘蔑视’世界革命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助长它自己的特殊意识形态，即一种独特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同许多更加有害的思想相差只有几小步。”[3]

---

① 《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378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24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5—6页。

③ 《报告》第16—17、46页；《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版）第1423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5—6页。另见《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9、82、103—104页。

不管这一学说是否有使人困惑的地方，它扫清了一条道路，使人可以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如何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布哈林经常坚持认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我们革命的性质”，也就是有关参加这幕革命戏剧的那些阶级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的辩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味着布哈林的理论必须从分析苏维埃俄国的阶级开始。官方说，在地主和大资本家作为阶级力量在内战时期被消灭以后，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中存在着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新资产阶级”。① 城市居民并未引起什么理论问题或严重分歧，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工业无产阶级是进步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促进者。在划分城市反动派和耐普曼分子方面，也没有什么困难。他们破坏官方的规定，为了取得“反社会的收入”进行贸易和投机。他们同农村中的富农一起属于“新资产阶级”。可是，一超出城市的范围，就不存在一致的看法了。

分歧集中在如何区分农民问题上，如何把贫农、中农和富农这种老的三分法应用于已在1917至1920年的革命事件中大大改变和拉平了的农村上。不仅范畴含糊不清（例如富农已更多地成为一个具有轻蔑意义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精确的社会范畴），统计材料也是不可靠的，互相矛盾的，而且经常是受政治摆布的。1925年官方估算，贫农农户占全部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中农占百分之五十一，富农占百分之四。在二十年代，每种数字都受到怀疑并被大大修改，特别是富农的数字。关于富农的百分比，在估算上可以低到零（有的人认为革命前那种类型的农村剥削者已不再存在），高到十四。因为这涉及到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农户，所以即使是估算上不大的变动（当时估计富农约占农村居民百分之三至五）也会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5页；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3章。

对政治和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1]

左派习惯地把富农的数字估计得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论战。少数期望对富农进行一次剥夺的极端分子，以及那些认为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一个相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分化的新过程的主流反对派，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预言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之间日益分化，有剥削的富农正在农村中作为主导力量出现，资本主义关系正在发展，它将不仅危害农村中的革命成果，而且将危及城市。这就是左派不断重复的论点的核心，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它在1924和1925年的延长，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2]

布哈林并没有对左派的全部论点都立即加以驳斥。他同意1923和1924年之后分化又在农村中发生。但是他坚决认为土地的国有化在结构上限制了分化的过程，这方面的制约，加上国家掌握的经济命脉，会保证使这个过程不致于达到严重的程度。[3] 他也象左派一样，在理论上接受这个关键性的教条，即被看作农村无产阶级的贫苦和无地农民是党在农村中的天然“支持者”，而富农则是“我们的敌人”，[4] 虽然他有某些保留，但是他对待富农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待中农的态度（在左派关于分化的分析中，中农这个范畴不见了）表明，他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及其含义的理解是很

---

① 关于如何算农民阶层和对农民的政策问题，见M·莱文所著《谁是苏联的富农?》，载于《苏联研究》1966年10月号第189—212页；莱文：《俄国的农民》第2—3章；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3章。关于老富农已经消失的观点，见V·鲍古谢夫斯基：《论农村富农或名词中的传统的作用》，载于《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63—64页。百分之十四这个数字是加米涅夫的，见波波夫所著《历史大纲》第2卷第244页。

② 麦斯林（V·斯米尔诺夫）在《布尔什维克》1926年第18期第108—111页上的话；《左翼反对派的纲领（1927年）》（伦敦，1963年版）第25—34页。

③ 《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卷第254—255页；《论工农通讯员》第61—62、66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48—50页。

④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53页。

不同的。

“富农”这个词反映了布哈林试图把现行的布尔什维克理论适用于一个改良主义纲领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特质。意识形态的词汇——例如“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战争”——是富有战斗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口号是在动荡和内乱中产生的，是不容易适应于和平时期的政策的。大多数激进的词汇来自本源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法国革命史上来的；有一部分，例如富农这个词，则来自俄国的传统。1918年党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开展农村阶级斗争时，列宁曾宣布对富农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把富农描绘成“人民的吸血鬼、敲榨勒索者、强盗”。可是，在他1922到1923年的“遗嘱”中，他甚至没有提到富农，大概认为内战已使农村居民变成很少有差别的贫苦农民。[①] 但富农这个词的极其可憎的涵义仍然存在，左派把它召唤来暗指布哈林是建议同“吸血鬼”和“人民的强盗”搞背叛性的经济合作。[②]

布哈林是了解这个问题的。从1924年起，他在做政策声明之前总要板着脸先讲党内潜在的“富农危险”，表明他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危险的人，第一个提醒大家不要把新政策变成“在富农身上打赌”，宣称他对富农看得“十分清楚”。[③] 但是，除了这些指责以外，他是在试图使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他好象曾闪现过这样的考虑，想说明苏联的富农不同于“老式”的富农。但他没有这样做，而选择了更保险一些的论点，说富农和生活较好的农民只占农民

---

① 这是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2页上指出的。关于列宁在1918年的言论，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3卷第207—208页。

②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1页。

③ 见《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5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3页；《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第5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07页；《三篇讲演》第3、23页。

总数的"大约百分之三，不超过百分之三、四"，与此同时，他把贪得无厌的"富裕的小旅店老板、农村高利贷者、富农"同"雇用几个农业工人的殷实的土地所有者……"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反映出他不愿意把每一个有事业心的农民都称为富农。①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仅仅富农并不代表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威胁这一主张。农村资本家可以暂时昌盛起来，但他们只有同增长中的国营成分一起才能得到发展，国营成分掌握的"经济命脉"制约着和指引着他们的经济发展。布哈林认为，由于这个原因，鼓励富农生产的有利政策本身并不危险。而"最终，富农的孙子也许会感谢我们用这种方法对待他的祖父"。② 政治上的威胁，如果不予正确理解的话，是更为严重的，因为它涉及到富农能否对农民群众，特别是中农，施加影响和进行领导的问题。布哈林解释说，这种危险是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是否满意成比例的。当农村干部的渎职行为引起广泛不满的时候，"中农就会把富农看作族长，如果用家族制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个别的富农得以在地方苏维埃和合作社选举中取胜，就是由于中农的这种不满。这种不满，如果成为普遍现象的话，就会使富农取得对"绝大多数居民"的领导权。③

布哈林争论说，党首先要关心的不应该是所谓的富农危险，而是中农的游移不定的同情心，以后在整个二十年代他都是这样主张的。他说，布尔什维克的旧的战斗格言"谁战胜谁？"已不再适

---

①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13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4页；菲舍尔在《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43—544页引的布哈林的话。关于他没有发展的论点，见《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55—56页。

②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13—14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9—50页。

③ 《几个问题》第11页；《三篇讲演》第20—21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48—49页；《报告》第29—30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11页。

用；现在的格言是“谁联合谁？”[1] 自从1918年以后，党就曾强调对那些既不富又不穷的农民进行团结的战略需要。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使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迫切性。列宁宣布中农已成为“我们农业中的中心人物”，就是一个证明。这种社会学的透视就是布哈林的全部思想。他有一次曾说，他的农业纲领部分地是“把宝押在中农身上的”。反对派反驳说，布哈林主义就是“中农布尔什维主义”，[2] 这并不是无的放矢。

布哈林把中农描写为“最重要的阶层”和“基本群众”，他这样做是要向党传播三点互相关联的思想。第一点是社会学的：在“我们的农村大革命”时期摧毁了地主和富农，重新分配了土地，结果就使“农村中农化”——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大多数。第二点是经济学的：中农经济是苏维埃农业的骨干。最后一点是政治的：中农对政府的忠诚是农村中取得领导权的关键因素。布哈林认为，这些以经验为根据的观察指明了一个不可辩驳的结论：“我们的基本政策方针就在于把这个阶层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3] 在他的思想中，农民政策意味着对中农的政策。正是在这个等式上，他建立了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农民的理论。

布哈林看到中农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发言人认为中农的经营是资本主义，布哈林激烈反对这种看法。他解释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农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他从事贸易，但他

---

①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27页。

②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8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4页。关于反对派的指责，见《列宁格勒组织》第111页；布哈林：《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47页。

③ 见《论工农通讯员》第61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7—48页；《三篇讲演》第3、25—2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48—149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47—48页。

并不剥削工资劳动"。因此，他不是资本家，从阶级上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经济倾向于长入资本主义经济，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变成小资本家，或者，不成功的话，变成无产阶级。但是，在苏维埃社会中，中农未来的演变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存在着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①] 这个前所未有的选择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正象布哈林所说的，农民具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同社会主义的愿望一致的"劳动灵魂"，一个是"对大私有者有某种崇敬心理"的小私有者身上所有的"非劳动灵魂"。哪个灵魂将占上风，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②]

很清楚，在布哈林看来，中农不仅成了"最重要的阶层"，而且是已成为农民阶级的象征。中农灵魂中的双重倾向反映着整个农民，"甚至是劳动农民"的特征。[③] 这一非正统的想法反映在布哈林往往不用"中农"的字眼而只用"农民"一词的习惯中。例如，他对世界性的"争取农民灵魂的斗争"作详细阐述时就是这样用的。同样地，不论是他拿"地主一资本家集团"作的类比，还是他认为苏维埃工农联盟起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合"的论点，都是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传统看法不相容的。

但是，能够最清楚地证明他倾向于从没有分化的农村居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则是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基本上是两个阶级的社会"这个概念。"两个阶级的社会"是指以"两个劳动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一理论，尽管在形式上也提到三个阶级，反映了布哈林对过渡时期及其主要问题的根本看法，这些问题就是"城乡问题、工业和农业问题、大生产和小生产问题、合理的

---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 43—45 页；《列宁格勒组织》第 112 页；《报告》第 18—23 页；《党和反对派集团》第 42、60页；《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6—7 日第 3 版。

②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99 页；《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6—7 日，第 3 版。

③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70、99 页。

计划和无政府的市场问题，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①]他的论敌很快就指出，这些二元论都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对“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对富农的认识。但是，对布哈林来说，把中农至少同“农民群众”等同起来，在理论上是必需的。这说明了，他为什么反对那些主张“中立”中农，而不是“坚决联合”中农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同布尔什维主义要“保证使每一个小农能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相反的。[②]

阶级理论的背面是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阶级是作为在不同历史社会中占优势的经济活动方式的代表而发展和活动的。集中体现在工业工厂中的集体劳动是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而私有制和个体劳动则被认为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因此，对布哈林的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应该是不会提出理论或组织上的问题的，因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但是在1925年，季诺维也夫分子认为多数派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了，他们决定要加以抵制，他们突然作出推论说，苏维埃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③]

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一自招失败的策略，这是个谜。正如布哈林所指出的，早先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它牵涉到的是大量私人资本在苏维埃经济中的存在，而不是国有化工业的性质。列宁曾说国有化工业“一直属于社会主义类型”。反对派显然未能看到他们自己提出的批评产生的结果，因为，正如布哈林所问的，假如国营工业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那末“我

① 《进攻》第279页；《为了列宁主义》第290、312页；《真理报》1926年7月7日第3版。另见《几个问题》第4、46—51页。布哈林在那里说，列宁勾划了这一理论的轮廓。

② 《报告》第14—15页。关于后来对两个阶级理论的攻击，见I·索尔茨：《论“两个阶级的社会的理论”和工农联盟》，载于《真理报》1929年11月28日第3版。

③ 见《新反对派》第144—193页。

们的希望在那里呢?"这将等于说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一种"剥削"制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用戏剧性的言辞补充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将退出党,去建立一个新的党,去发动一场反对现在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革命……。"[①] 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布哈林的论点是无瑕可击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对党的领导和对反对派都很重要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在这儿,但它'正在到来',在形成中(im Werden),而且它已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②] 布哈林轻易地赢得了这次交锋。

农民的农业是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时相信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生产在理论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经济上是优越的。但是,1917 年的革命取得了相反的结果,它破坏了大的农庄,造成了成百万新的小农户。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搞了一段短时间的和不成功的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集体农庄的运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试图在大范围内立即搞集体农庄的想法也被作为幻想而放弃了,虽然在口头上仍然说(主要是在左派布尔什维克中)将来要搞农业的集体化。1921 年之后,由于官方没有兴趣,加上农民的反对,使集体耕作的土地在 1925 年减少到约占百分之二。可是同年,由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和企图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的"命脉"以制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增长,集体农庄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讨论,并在党内得到了一小批热情支持者。[③]

集体农庄的支持者蒙受了一次惨重的(虽然是暂时的)失败,

---

① 见《三篇讲演》第 28—32 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32—42 页。

② 《捍卫》第 129 页。

③ 卡尔:《社会主义》第 1 卷第 216—222 页;布哈林的评论,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 181—189 页。

布哈林对击败这些支持者和在党内形成“反对集体农庄的情绪”①作出的贡献比谁都大。不是他的所有意见都是否定性的。例如，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合理”，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是如此。他承认“集体农庄是一个有力的事物”，他看到这样的前景：有些贫农和无地农民，由于他们的贫困，会自发地“倾向”集体耕作。但是他补充说，即使是那些最低的阶层，农民的传统私有心理（从祖辈和父辈继承下来的老习惯），是反对接受集体耕作的。因此，“很难认为集体农庄运动会赢得全部广大的贫农群众”。②

要使这个运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苏维埃俄国的“基本农民群众”（中农）中取得什么成功，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布哈林说来，这是“一个算术的真理”。集体化的农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前景，它的结局取决于自愿的、机械化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农庄在公开的市场上同个体农民的竞争中能否证明自己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他警告说，人为地建立集体农庄是错误的；它们会成为“寄生的共产主义机构”，靠国家的资助为生，只会使农民更加相信“个体经济是很好的东西”。③布哈林提出了反对集体耕作的明显理由，进而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固有的一种认识，他认为“集体经济不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康庄大道、首要途径”。为了强调这个论点的重要性，他在1925年3月和4月间，在四个官方主持的会议上，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说明了他的论点。④

---

① 《真理报》1929年8月28日第4版。

② 《执行委员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319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7页。

③ 《真理报》1925年3月6日第3版。

④ 《马克思主义和农业集体化》（莫斯科，1928年）第222页。另见《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12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8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9页。

由于国营农场对农民更加没有吸引力，布哈林的这个声明意味着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从生产的角度开始……”。[①] 马克思主义是重视生产方式对社会关系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的，所以这个论断确是新鲜事。可是，农民将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呢？布哈林回答说：通过“平常的合作社——销售、收购和信贷合作社”。这里他是极大地依靠列宁关于“‘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理论”的理论遗产的，依靠“列宁作为指示和道路留给我们的计划”。[②] 因为在1921年以后，虽然官方设法为合作社恢复名誉，但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些合作社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机构。然而，对布哈林来说，合作社却是把农民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是在农村中“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如他从1924年开始经常指出的，他的纲领是“把宝压在合作社身上的”。[③]

新经济政策的常识告诉人们，必须迎合农民的财产利益。按照布哈林的说法，在这点上合作社具有很大的好处，它们把农民作为“小所有者”对待，并给他们以“即时的利益”：

“如果那是一个信贷合作社，农民可得到低利的贷款；如果那是一个销售合作社，农民可更有利地出售他的产品，从而感到有利可图。如果他要买什么东西，他将通过他的合作社去买，……他将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农民在追求他的个人利益时，将发现“组织在合作社里比留在合作社外，是更为有利的”，……这样他将会接受其他的合作倡议，

---

① 《马克思主义和农业合作化》第220—221页。另见《为了列宁主义》第294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13页。

② 《三篇讲演》第33页。关于他对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评论，也可见《为了列宁主义》第287、293、371页和《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9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6页；《真理报》1925年6月19日第5版。要了解他对合作社的全部观点，可见《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6—9章。

包括集体耕作。①

但是，在布哈林的计划中农业合作社还起着一个更高的作用。它们有"无数条通向个体农民的线"，可充当一座"有组织的桥梁……把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联结起来"。换句话说：

"合作社是无产阶级城市和劳动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正好处在城市和农村的交接点上，首先体现着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盟……"

依靠它们同国营经济机关的紧密联系，合作社通过市场提供了把集中的国营工业同千百万分散的农民经济"联结起来"，并使后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布哈林使用另一个比喻解释说："我们的无产阶级轮船，也就是我们的国营工业，将首先在自己后面拖着合作社；合作社是比这艘轮船更重的驳船，它将用几百万条绳子在后面拖着整个农民这条巨大和沉重的驳船。"②

认为销售和信贷合作社（不是集体农庄）能够成功地吸引农民的意见，严重地伤害了少数布尔什维克的情感。他们在革命以前曾经大规模地办过合作社。布哈林指出原先的这些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机构将"长入社会主义"，它们的成长"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细胞连续不断的成长"。③ 他继续对"平常的合作社"将有朝一日把农民引向集体耕作表示乐观，他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将通过流通的过程，而不是直接经过生产的过程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将经过合作社到达那里"。正如一个斯大林主义批评家后来说的，这就是"布哈林的全部合作社计划"。④ 这种论点是会引起争论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12页；《三篇讲演》第27页；另见《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1—33页。

② 《报告》第23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8页；《三篇讲演》第27页。

③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7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8页。

④ 《为了列宁主义》第294、299页；I·维尔孟尼契夫：《论布哈林同志的合作社计划》；《真理报》1929年10月12日第2版。

的，不仅因为从外表上看它忽视了生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占的崇高地位，而且因为长期以来合作社是同俄国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

布哈林力图把合作社的可疑的过去转为对他有利，他争辩说：用所谓"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农业设想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可怜的改良主义乌托邦"的鼓吹者，因为他们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合作社取得社会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同资本主义银行、工业和资产阶级国家一起存在并依靠它们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它们"逐渐被熔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最后它们自己将"转变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总之，"它们长入资本主义"。然而，苏维埃的合作社，通过同样的过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活动，依靠社会主义工业和银行并同它们相联系，必将"成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机体中的一部分"。它们一定会"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地"长入社会主义"："合作社将长入我们的机构体系，正如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入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一样"。这样，农业合作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变成现实"。①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类似的推理为基础的。他把合作社作为过渡的工具，这样他可以争辩说，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过程相似，"小私有者将不可避免地长入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② 这个长入理论显然取自他十年前的关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老概念。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国营成分会通过集中化

① 见《为了列宁主义》第293—296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8—13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7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0—35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34—38页。

② 《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引文，第265页。

的银行和金融资本的混合体把较小的、原先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吞并过来，使之隶属于自己。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决定其上层建筑的论点所作的明显的修正，现在在讨论苏联这个社会时确实看得很清楚。他论证说，无产阶级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层建筑"，而且由于它包括了"经济命脉"，也是"苏维埃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基础'的一部分"。因此，苏维埃社会中"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就是：'第二位的'（上层建筑）调节'第一位的'（基础）……"① 这种逻辑就是布哈林提出的国营社会主义成分将通过自然进化把"闹哄哄的无组织的经济置于社会主义影响之下"的论点的基础。只要有了"社会主义的命脉"这个条件，苏联的小资产阶级和合作社经济就将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更具体地说，这使他的下述主张也变得合理了：在农业中不需要单独的"命脉"（例如，集体农庄），"农村的命脉……就是城市"。②

"长入"过程中的主要机制就是苏联的银行和信贷制度。一条一条金融和信贷依附关系的"线"保证了国营成分的经济领导权，把非社会主义机构"织入"社会主义成分中，并在合作社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信贷机关"之间建立起一个"利益共同体"。③ 对国家银行的信贷"命脉"的巨大经济能力的信心，使布哈林得出了他最引起争论的结论："甚至富农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也将长入我们的制度"。他预期这个思想会引起各种反对，他第一次是在1925年春试探性地提出这个思想的。可是，几星期之后，在总结他的合作化

---

① 《真理报》1926年7月1日第3版；《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4—35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8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2—183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3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7页；《报告》第22—23页；《捍卫》第124页。

③ 《真理报》1925年3月6日第3版。

理论时，他就更加肯定地写道：

"我们的合作化农民组织的基本网络将不是由富农的合作社，而是由'劳动'型的合作社组成，这些合作社将长入我们总的国家机关制度中，从而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链条上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也将不折不扣地采取同样的道路，通过银行等，长入同一制度；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将是一种异己的组织……将来这类富农合作社会变成什么呢？……如果它要发展，它必不可免地需要……同国家经济机关挂钩；它……将把它的剩余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取得固定的利息。即使他们将建立他们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也必然要同掌握着国家的基本信贷资源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的信贷机构挂起钩来。不管怎么说，富农和富农合作社将无处可走，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早已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定下来了。……"①

四年以后，这段话就被当作布哈林的异端邪说的最高证据加以引用。

布哈林还得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到他的通向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进化道路的理论中去。这本来是一个把非社会主义经济都认为具有剥削性质的笼统概念，1917 至 1920 年的事件把它变成一个表达国内战争的委婉语。它是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的最带索莱尔*风格的形象说法，它把社会描绘成相互战斗和无法调和的阶级的战场，描绘成充满冲突和分裂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可能出现一个胜利者。在二十年代苏联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一个潜在的爆炸性的固定思想（idée

---

①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49 页。他关于这问题的更早的论述，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 187 页；《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 35 页。

* 乔治·索莱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工团主义热烈倡导者，信仰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著有《暴力论》。——译者注

fixe)，是国内和平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左派，特别是它的反富农的一翼，自然经常强调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要激化。而在另一方面，布哈林则努力对这一教条的理解作出两点修正，以图使它变得无害。

第一，他认为苏维埃社会的出现使对抗阶级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成为可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包容某种表达社会整体的一致性的'阶级合作'……"[1] 这个主张把布哈林的两个基本思想结合起来了。苏维埃社会（及其经济）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对立物的统一体"。他认为这个真理，左派是并不懂得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到了国家经济的矛盾，但看不到统一，他看到了斗争，但看不到合作……"社会"统一"包含一定程度的阶级和谐和合作。在布哈林看来，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合作，新资产阶级则可"有限度地"参加这种合作，以发挥一种"对社会有用的作用"。[2] 这样，经济上的阶级合作的好处就胜过了，或者至少缓和了阶级斗争的破坏方面。

布哈林在他的第二点修正中解释说，合作并不意味阶级斗争已在苏维埃俄国结束。无宁说，它意味着过去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机械地'敲掉牙齿'"——不再适用了，现在阶级斗争表现为社会主义（国营和合作社）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一种经济竞赛"。在这个"没有先例的、极其独特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在许多方面：通过市场竞争取代私人贸易；向农民提供比农村高利贷者的贷款利息更低的贷款；总的赢取农民的"心"。从各方面看，新的阶级斗争同老的阶级斗争的区别在于它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进行这种阶级斗争是"没有金属武器的铿锵声

---

① 《几个问题》第47页。

② 《真理报》1926年7月7日；《几个问题》第40—51页。

的”。布哈林举同私商的斗争为例说，反对私商，这“不是要对他凶暴，关闭它的铺子，而是……要比他生产和出售更价廉物美的东西。”价廉物美的商品，息低量大的贷款就是“我们在同农村中的剥削分子进行斗争时应该使用的武器”。①

这两点修正意见的提出，都是为了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阶级冲突的深化（特别是在农村中）为先决条件的思想的。布哈林虽然承认在不久的将来阶级斗争在个别地方有可能加强，但他坚持认为，进步意味着“阶级斗争将开始减退”，开始“平息”。剧烈对抗事件不会增多，而会“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将会不留痕迹地消失”。② 首先，他驳斥了那种认为党必须“加剧阶级斗争”，而不应去“缓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在1925年的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宣告：“能不能说我们的总路线、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在于有意识地去加强阶级斗争呢？我并不认为是这样……”他也到处说：“我根本不赞成去加剧农村中的阶级战争。”③ 在他的思想中，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包含着缓和阶级冲突的意思。

把阶级斗争看作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竞赛，这是布哈林的进化理论的标志，而且解决了它本身似乎存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预期着一种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但是，布哈林的纲领要求“*在市场关系基础上发展经济*”。④ 为了使这两个主张一致起来，他又一次拿资本主义社会来作比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市场竞争，“*大生产最终排挤小生产，中等资本*

---

① 《几个问题》第48—49页；《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2期第5—6页和1925年第8期第9—14页；《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6—268页；《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6—188页；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一书各处。

② 《报告》第11—12页；《几个问题》第48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4页。

③ 《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7页；卡尔在《社会主义》第1卷第261页上引的布哈林的话。

④ 见列昂节夫《经济学原理》中的引文，该书第68页。

在大资本面前退却……竞争者的人数减少下去"，于是"市场使市场本身消失，自由竞争变成垄断……"这种过程将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重复出现。当更大的和更有效的社会主义单位把私人资本家从他们在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堡垒中挤掉的时候"我们将发展到不需要市场"，而接近计划经济："通过市场上的斗争……通过竞争，国营和合作社企业将排挤它们的竞争对手，即私人资本。最后，市场关系在发展中将消灭它本身……市场本身迟早将消亡……"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情况说明，我们恰恰将通过市场关系到达社会主义……"①

不管怎么说，布哈林的理论是富有乐观主义的。它在一个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社会的使人泄气的经济多元性中，发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机的进化道路"。"路轨"一经铺好，就不需要大的折腾，不需要最终解决，不需要"第三次革命"；即使对富农的命运也已愉快地预先加以确定了。产生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本理论依据就是"一般"的农民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细胞"。布哈林把供销合作社确定为社会主义部门，这就使他得以引用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的年度增长比重超过私人贸易的情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前进："尽管私人资本的绝对数有增长……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相对说来一直在更有力地增长。"② 同样的推理使人可以指望，随着社会主义部门将"不断增强它的力量并逐渐把落后的经济单位吸收掉……"，就会自然地出现经济的计划化。总起来说，这些假设意味着"在我们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就是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③

---

①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64—65页，70页；《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1025页。

② 《党和反对派》第49—51页；《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990页。

③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第9页；《为了列宁主义》第308—309页。

他的理论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也是新的，因为这种理论虽然包含着革命的理想，却摈弃了当时十分流行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而坦率地选择了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布哈林说，采用这些办法，而不是过去的办法，“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克服这里仍然存在着的一切弊病”。这就要求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来一个根本的转变。正如他在1925年说的，“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路不是通向，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完全通向我们早先寻找的那个地方。”① 需要的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新的理论，而且是新的政治。

布哈林要求党在经济政策方面走一条进化道路的时候，也要求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作出影响深远的改变。建立在社会和谐、阶级合作、自愿原则和改良措施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同1921年以前的“呆板的镇压”和“流血”政策在定义上是不相容的。他宣布布尔什维克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党，而是国内和平的党”，② 以此来概括他希望在国内政治方面出现的改变，按照布哈林从1924到1926年间提出的政治纲领，它的主要点和既定口号就是国内和平。但是，他并不主张对1921年形成的苏维埃政治制度作根本的结构性改变。总之，他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的一党制提出什么疑问。即使是出现第二个亲苏维埃的党也是不能容许的。他说过一句有名的妙语，两党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必然是统治党，另一个必然受禁锢”。③ 对这个政权已经宣告的阶级性质作出改变，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苏维埃政权是“受到农民支持的，但它是无产阶

---

① 《应该做怎样的青年?》，见《青年近卫军》1926年第2期第83—84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1—52页。

② 《报告》第8页。关于他的国内和平论，另见《几个问题》第47—48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1—52页。

③ 《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

级政权”。联盟，也就是“社会上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分享政权的合作”。总之，布哈林的政治纲领是以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的：“首先，要建立工农之间的必要的联盟……第二，这个联盟的领导作用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第三，工人阶级内部的领导作用……必须属于共产党。”①

同其他布尔什维克和他们后来的大多数追随者一样，布哈林并不是合乎公认的西方标准的民主派。的确，尽管他希望逐渐扩大公民权，并且（如果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可以相信的话）主张通过某种保护苏维埃公民免遭国家滥用权力之害的权利法案，但是，他是接受存在于 1922 年苏联宪法中的那些预防性条款的。这些条款不但把“资产阶级”这部分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宠爱居于少数的城市无产阶级，而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② 同其他的二十世纪现代革新派的看法一样，对他来说，民主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民主化意味着“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最广泛的民主”③ 这一布尔什维克教条，他从未公开提出过异议。

可是，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布哈林建议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作出影响深远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国家将不再主要是“一个镇压工具”。相反，它要促进实现“合作”和“社会团结”所必需的和平条件，使许多不是自愿的，但又是温和的革命同路人、对革命“半友半敌的人”得以休养生息和感到自由自在。仅仅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维护旧秩序的死顽固（看来布哈林是看到少数死顽固的），才要用

---

① 《红色处女地》1925 年第 4 期第 267 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18、70—71 页；《扩大的执委会全会》（1925 年），第 371 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 38 页；威廉·雷斯威克：《我梦想革命》（芝加哥，1952 年）第 77、96 页。

③ 见布哈林的文章《论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俄国革命和社会民主》，见《国际报刊通讯》第 7 卷（1927 年）第 1528 页。

国家的铁拳来对付。对其他的人，国家应完全致力于"和平的组织工作"。至于说到恐怖，那末"恐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①。

对国家的新"职能"的这种提法，部分地是以布哈林对1924年后苏联政治形势的估计为依据的。他的分析同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分析有明显的不同，同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正式提出的那种分析也大有径庭，在那时代认为阶级斗争和阴谋活动越来越残酷和激烈。布哈林坚信党已经冲破了1921到1922年间所处的危险的孤立处境，已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他在1925年谦逊地断定，"总的说居民的多数是不反对我们的"，又更为肯定地说："农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友好……"。然而，他的根本政治论据是，革命的内部敌人已经消失或者已被解除武装："一切都是'和平的'；国内没有暴乱，没有反革命行动，没有反叛活动"。② 他还认为，有时发生反对苏维埃官员的暴力行动，并不是由于刻骨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而是由于苏维埃官员本身的缺点。例如，有些农民暴动事件就是由象沙皇地方总督那样滥用权力的"国家下层官员"——"谢德林的小英雄们"——所挑起来的。③

在整个二十年代，布哈林从未动摇过他的下述信念，即主要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死亡。他实际上是说，实行永久的国内和平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国家应该相应调整自己的活动。他把这种调整叫做"苏维埃制度的强制'正常化'"。④

---

① 《几个问题》第48页；《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68页；《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921页。

② 《报刊和革命》1925年第3期第8页；《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923页；苏联工会第7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7年）第21页。他所说的最后一点看来是真实的。见梅尔·法因索德所著《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坎布里奇，1958年）第177页。

③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3—54页；《论工农通讯员》第65—66页。

④ 《几个问题》第12页。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不能再用"革命法制"这个词来为"行政上的专横"和官员的"无法无天"开脱。这些经久不衰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必须让位于"严格的法制"：地方上的党和共青团机关应停止发布指令，只有苏维埃才有立法权；共产党员将失去他们在事实上享有的不受追究的"豁免权"，需要遵守法律，而不是置身于"法外"。革命法制意味着"在早先动乱的地方建立革命秩序"。"革命的法制应该取代行政上独断专行的一切残余，即使这种独断专行是革命的"。① 起作用的将是法制这个名词，而不是革命的这个形容词。布哈林首先考虑的是农村："一定要使农民看到苏维埃秩序、苏维埃权利、苏维埃法律，而不是用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的"意见处理处"加以掩饰的苏维埃的专横"。②

除了要求从一种以统制、胁迫和官员的任性为特征的"军事无产阶级专政"，向建立在法律和秩序基础上的"正常化"的一党制发展外，布哈林还要求"坚决、完全和无条件地转而采取说服的方法"。党必须放弃把暴力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从今以后对待群众必须"采取而且只能采取说服的方法"。③ 没有一个主题能更好地反映布哈林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改良主义了。除了实现工业化以外，社会主义革命还包含对人民的教育和改造，包含实现需要新的政治领导的各种事业。在布哈林看来，这种领导是着重于教育的。在给党特别是给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后者在农村中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他们的老同志）作讲演时，他解释说，"政治领导的任务，从这

---

① 《真理报》1924年10月24日第5版和1925年2月4日第4版；《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79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

② 《几个问题》第12页。

③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80—81页；《论工农通讯员》第69页。强调采取说服的方法，这是他经常讲的一个主题。他对党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论述，见《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78页。

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教育的任务”。① 如果说新的经济是进化的，那末新的政治就是教育的——慈父般仁慈和温和的。

事实上，这反映了布哈林对整个苏维埃宪法秩序的理解。他把遍布全国的金字塔形的苏维埃看作基层教育“实验室”；上层由“自上而下”地保证“可靠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党员支配；下层（主要是村苏维埃）则越来越多地由“非党群众”参加，因为地方苏维埃就是“我们在其中改造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同我们协调一致，教育和领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实验室”。②

但是，说实在的，在 1918 到 1921 年的党的军事统治时期，地方苏维埃已经“死亡”（布哈林对此感到痛惜），所以必须把地方苏维埃恢复起来，使之重新成为由群众选举的职能机构——“辛勤地进行工作的小‘国会’”，在那里觉醒的农民可以找到政治上的满足和指导。③ 所以，布哈林热情地宣传 1924 至 1926 年党通过新的更自由的选举“使苏维埃获得新生”的运动。他并不对当选的党员少这一点感到忧虑。他认为这种选举结果恰好证明了“思想说服”较之“行政压服”所具有的长处，他说一个确实由大家选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会得到真正的支持，而十个“虚假地当选的人……却不会在群众中有威望”。④

布哈林对政治思想说服工作的信念，是同他在经济领域中对

---

① 《真理报》1925 年 2 月 4 日第 5 版。另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820—821 页。

② 《党和反对派》第 71—72 页。

③ 《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 78 页；《几个问题》第 13 页；《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 年），第 370 页。

④ 《党和反对派》第 75 页。关于“新生”运动，见卡尔：《社会主义》第 2 卷第 12 章。

竞争的强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点都表明，他深信，在多元化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中，通过和平的、非行政的“不流血斗争”方法，能最好地向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目标前进。确实，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竞争原则是一种有价值的“分子运动过程”，它可保证使布尔什维克的成就不致于成为垄断主义的计谋和虚假的胜利。从布哈林 1924 到 1925 年间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争论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中可以看到他信奉竞争原则之深和广，这个问题同对付私人资本和赢取地方选举是远不相关的。

党已有七年避免就文艺问题作出决定了。但是，随着 1921 年后出现的多样化的、群众性的“非革命”文学的繁荣景象，主张无产阶级文艺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要求以他们的作家协会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作为“工具”，实行“文艺领域中党的专政”。他们要求党的官员支持他们向文艺界的同路人开战。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他们的要求被党的领导拒绝。1925 年 7 月 1 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布哈林写的，体现着他的主张。它反对党对文艺进行系统的干预，赞成文艺多样化的原则，保证对非党作家的保护和鼓励。[①] 布哈林这一立场所以令人感到兴趣，是因为他长期来一直是赞成需要有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的，他在政治局中是唯一支持这一思想的人。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本人对文化的嗜好和兴趣是很广泛的，但是他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却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象欢迎“第一只燕子”一样渴望“无产阶

---

① 见卡尔：《社会主义》第 2 卷第 14 章；爱德华·布朗：《1928—1932 年俄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插曲》（纽约，1953 年）第 3 章，关于决议，可见该书第 235—240 页。在波伦斯基所著《文学运动论文集》第 8 章中也谈到布哈林的作用。决议所用的语言和推理同布哈林在论战中所用的十分相似。见《关于俄共（布）党的文艺政策问题》（莫斯科，1924 年）第 35—36 页；以及《红色处女地》1925 年第 4 期第 263—272 页。

级"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出现。①

尽管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寄予理论上的同情，但是布哈林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可以依靠"机械的强制办法"和官方的偏袒来造就新文学的主张。"假如我们……主张文学必须由国家控制……那末……我们将毁灭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作家应该依靠同其他运动开展"自由的、无政府的竞争的原则"，"为自己赢取创作上的声誉"。党在提供指导的时候，它的作用不是去限制竞争，而是去鼓励"最大限度的竞争"；去培育"各色各样的流派，而且是越多越好"。布哈林宣布："可以有一千个组织，二千个组织，在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之外，你愿意有多少小组和组织都可以"。②

虽然文学问题上的争论，同党内的政治分歧，并不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布哈林看到这里涉及的同样的原则。他说，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标榜者主张"垄断原则"，因此他们"在文艺政策中所取的立场，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策中所取的立场一样的"。经济中的"超垄断"原则会导致工业和农业的崩溃，垄断主义也是"毁灭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好办法"。尽管布哈林提倡"在思想和科学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甚至在数学中"都要有明确的党的方针，但是他不赞成"炮轰"或"扼杀"对立的倾向。一个党如"把每个

---

① 布哈林：《第一只燕子》，《真理报》1923年1月12日第1版；《梅欧霍尔达剧院中的"中国在怒吼！"》，《真理报》1926年2月2日第3版；布哈林在《关于政策问题》第36页上的评论；《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3—265页。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是更不能容忍的，他在为无产阶级文化辩护时，叫嚷说："旧剧院必须砸烂。谁不了解这一点，他就是什么也不懂"，《真理报》1929年12月16日第1版。可是，在二十年代，他引用过这句话：口味不是争论的问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见他为伊利亚·爱伦堡的十分非无产阶级化的小说《胡利奥·胡伦尼托的不平凡的经历》所写的序言(第3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第5页。我们将看到，他也是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和鲍里斯·帕斯特纳克这样的失宠作家和诗人的保护人。

② 《关于政策问题》第36—38页；《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3—265页。

人都死死攥在一个拳头里"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为竞争打开方便之门"才能有所作为。象对待执拗的农民一样，布尔什维克也要同非无产阶级作家搞好关系，不是"用大棒把他们打晕"，或者"用钳子把他们钳住"。[①] 在这方面，正如在国内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他主张通过多样化、说服和和平竞争的办法去求得进步，而反对靠政治压制去取得虚假的成就。

对国内和平、法制、官方的克制和容忍、说服工作（布哈林把所有这些限制词都归于"正常化"这个主题下）的强调，反映了布哈林的明显的转变，他在1920年对"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强制"还表示赞颂。很清楚，他的新的政治思想是受到他的经济纲领的强烈影响的。建立在市场关系和把农民转变为市场的有效生产者和消费者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同政府的随心所欲是不相容的。布哈林反复争辩说，政府的这种做法"同经济发展和发展农民经济的需要是完全矛盾的"。要农民合理地进行耕作，对他们就不能再采用过去那些老的做法，"那时我们今天收一种税，明天又收一种税，今天发一个指示，明天又发一个指示"。"只有在行政工作中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才有可能发展商品交换"。布哈林坚持说，布尔什维克必须懂得，"对经济生活进行任意的……干预，会对经济生活产生极其可悲的结果"。[②]

但是，他的新的政治思想后面还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中潜在的专制因素的担忧。他多次提醒注意官员的"独断专行"（произвол），这提供了了解他的思想的钥匙。独断专行是蓄意对农民肆虐的沙皇官僚制的象征，曾经是十九世纪

---

① 《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63、269、272页；《关于政策问题》第36—38页。

② 《列宁格勒组织》第101—10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瓦连廷诺夫在《学说》一书第23页上引用的布哈林的话；《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79页。

俄国激进思潮不断评论的题材。在布哈林看来，它既是一种前车之鉴，又是一种预兆。[①] 他把"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同独断专行相提并论，这些残余表现在党的官员做起事来好象有"某种绝对的不可侵犯权"，带着"我想怎么干就可怎么干"的心理，有些布尔什维克"说自己是社会的中坚"，流露出"共产党员的自大狂"，以为党的统治就是要"对共产党或共青团以外的每个群众表现粗暴厉害"。[②] 布哈林在信奉党的专政的限度内，察觉到政治垄断所固有的危险，担心会出现一种使独断专行制度化的新的专制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担忧是同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伦理上的理解，也同他在邪恶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必不可少的官僚制之间划分的界线是有联系的。在他看来，独断专行或官员的肆虐就是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加以谴责的那种官僚制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官场作风。而在二十年代他所担忧的，就是出现一个靠"虚假的委托"进行统治的"新官僚的国家"的危险。那就是一个"新阶级"的幽灵。当左派讲到布尔什维主义可能的蜕化时，他们所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或党的生活的等级化。布哈林也对后一点感到担心，但是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官员的独断专行却是真正能够预示运动蜕化的不祥征兆。

"对我们整个党和整个国家来说，来自任何一批共产党员的独断专行的残余，是导致真正蜕化的最大可能之一。如果有一批共产党员可以不守任何法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弄虚作

---

① 布哈林经常抨击苏维埃官员的独断专行。可见《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78—81页；《几个问题》第12—13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1页。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界对此题材的关注，可见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来自彼岸》对官员的无法无天的评论，和《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一书（纽约，1956年）第181—183页；G·A·江希也夫：《伟大改革的时代》（彼得堡，1907年）第28页。

② 《全苏列宁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256—267页；《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4期第270页。另见《真理报》1925年2月4日第5版。

假’，如果他犯了罪没有人能逮捕他或对他进行追究，如果他依然有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逃避革命法制，这就是可能使我们蜕化的最大的基础。”①

布哈林知道，对滥用权力提出警告是不够的。他认为可有一条防护措施，那就是促使独立的“自愿组织”去填补一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真空”。从合作社和文学团体到象棋俱乐部和禁酒协会，这些“辅助组织”应该共同提供“直接联系群众的纽带”，培养“下层群众的主动性”，开辟使群众可以影响政府的“渠道”，在需要的时候可通过这些渠道把全体居民动员起来，团结在政府的周围。②布哈林显然希望成千成百个“人民组织”除了防止新的官僚专制外，将能克服1917—1921年间出现的“社会机体的蜕化”，把分裂的国家团结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将扩大和加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群众基础。③

由于他把“自愿组织”看作苏维埃民主的“小部件”，所以他特别关心(同样也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使合作社成为真正自愿的、由群众选举的组织，而不是同国家机构一模一样的东西。④他个人特别喜爱的是新生的工农通讯员组织和向地方和中央报纸提供反映他们工作所在地的情况的通讯报道的业余新闻记者，在1925年这些通讯员的人数超过189,000人。这个运动是在《真理报》的赞助下进行活动的，它受到布哈林特别的关怀和影响。他进行了五年

---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4页。

② 见《共产主义大学札记》第2集第256—257页；《论工农通讯员》第8、9、12、16—24、34—40、68、75—77页；《真理报》1926年5月29日第3版。

③ 或者象他所说的："发展我有条件地所讲的那种苏维埃社会性，"这个概念可译作苏维埃的社会结构、共同体或简译为苏维埃主义。《共产主义大学札记》第2集第256—259页。另见《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7—8期第22—24页。

④ 《论工农通讯员》第47—48页。另见《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8页。《真理报》1925年6月19日第5版；《青年近卫军》1926年第2期第89页。

的艰苦斗争，反对把工人通讯员变成一个“官僚阶层”。他认为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反映下情的留声机和镜子”，他坚持说，使他们“官僚化”，将破坏他们作为向政府传达群众情绪和群众不满的“触角”的“基本任务”，将破坏他们批评官僚作风的基本自由。[①] 斯大林主义的敌手后来责难说，这是布哈林向群众的“落后和不满”屈服的“机会主义”哲学的特征。对这种责难，对那时已开始的苏维埃社会的官僚化，布哈林再次用这个口号进行回答：“可能建立的一切工人组织，要用一切办法避免官僚化”。[②]

在很多方面，布哈林的政治思想是新经济政策社会的现实的反映。他信奉一党制度，希望在经济、文化和思想生活中实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但他也容许，甚至赞成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中成为这些领域中的特征的多元主义。他对出现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征兆是有警觉的，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过火行为感到后怕，他反对让专政的“基本组织”变成无所不在和具有无上权力，并把所有其他社会机构都变成“有组织的拳头”。[③] 他不再是“国家化”的支持者，而是一个最不“极权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他相信进行协商和说服教育的领导方法而反对搞行政命令，他相信“同志般的劝说”而反对强迫，他相信社会和谐。这反映了一个已对国内动乱感到厌倦，又充斥着文盲的社会的需要。他的较有同情心的对手有时认为，布哈林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建议对严峻的工业化和现

① 见《论工农通讯员》，特别是第8—9、18—25、34—40、51—57、61—63页；《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和1926年5月24日第3版。关于工农通讯员问题，也可见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195—198页。

② 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报纸的教导》(莫斯科，1932年)第81—85、108—110页；《反对工农通讯员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真理报》1929年12月11日第4版。关于布哈林的回答，见《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5页，以及他在1928年12月2日《真理报》第3—4版上对官僚化的愤怒斥责。

③ 《论工农通讯员》第15—16、56页。

代化问题采取温和的解决办法。在1928至1929年间，当他成为右翼反对派的领袖的时候，这种责难重又提出来了。重复一下马太福音的预言，毕竟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将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到1926年年中，布哈林提出了他的经过修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学说。正如一个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做到的那样，这个学说是包含很多内容的。他提出了一个经济纲领和一个政治纲领，并在理论上把两者都同在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宽广的、总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① 布哈林认为，党需要和平的、渐进的发展。他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可观的。最主要的，是他在理论上把1917年的两次革命调和起来了。他把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看作"我们革命"的一个部分，把1917年的双重变动看作胜利的"工农联盟"的意外起源，他在思想上排除了对第三次革命的忧惧，无论是农民革命或是"无产阶级复仇之神"② 的革命。他认为反农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上都是同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是"一支取自完全不同的歌剧中的歌曲"。③ 如果撇开其他的不说，他的这个论点就给布尔什维克指出了一条把他们没有预期的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协调起来的道路。

然而，要把他的新理论奉为党的正统，这方面的努力势必会遇到阻力，甚至在非反对派中间也会遇到阻力。革命英雄主义传统仍在起作用，其同情者远比人数不多的左派要多得多。许多农村干部都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精神中教育出来的，有些人对新的农业政策一直是敌视的，对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背离光荣的

---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37页。

② 这一表达法是属于第米安·彼特尼的，见卡尔的《社会主义》第2卷第79页上的引文。

③ 《为了列宁主义》第294、296、317页。

革命传统”这一点是有怀疑的。[1] 加之，他的许多推理（从他对待市场合作社的态度到他的有机的进化概念）令人想起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邪说，而他关于工农联盟、关于工人和农民是同志般的“劳动者”的说法，使有些人觉得这是陷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布哈林对民粹主义思想一直持批判态度，他从不附和民粹派把农村生活理想化的做法，但他要把适用于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农村的现实中去，这样他的调子听起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点象马克思主义前的言论，尽管他是理解农民作为二十世纪的革命破坏力量的作用的，但这一点并未消除人们对他的思想的怀疑，也未消除人们说他支持“共产主义民粹主义”[2] 的责难。

然而，归根到底，布哈林的学说能否站得住，不是看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否能被接受，而是看它在经济上是否实际可行。他的纲领要求扩大和加强工业和农民的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主张通过这个办法来实现工业化。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的稳定增长，能保证取得余粮并刺激工业不断增长。但是，在他提出的这个“经济联盟”的两端，人们对他的主张却是可以提出严肃的问题的。

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的左派，很快就针对他的工业纲领中的本质弱点，指责他有虚妄的“复辟思想”。[3] 左派争论说，一个鼓励消费者的需要以刺激工业生产的纲领，也许能满足从 1921 年开始并于 1926 年接近结束的工业恢复时期的需要，但对下一个时期就完全不适用了。这时现有的工厂将开足马力进行生产，扩大固定资本和技术改装将成为中心问题。用于恢复的相对低廉的成

① 见布哈林在 1925 年第 9—10 期《布尔什维克》第 5 页上的评论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824 页。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 303 页。

③ 这个辞是伊凡·斯密尔格用的。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 17 卷（1926 年）第 199 页。

本已被耗尽，已经无法再次避开增加新投资的艰巨问题。布哈林把重点放在需求上，所以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追求一种十分有害的幻想。1914至1921年间固定资本的消耗和折旧，加上革命给农民解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使他们能对苏联工业提出更大的需求这一事实，说明真正的毛病是在工业的结构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不在于国内市场的疲软。在工业得到重建之前，保证供求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的。相反，将有一个长期的工业“商品荒”。①

左派的批评在一些重要方面显然是有效的。布哈林是根据短期的工业成就提出了一个长期的纲领。1923至1926年间，工业生产有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下一年又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布哈林被这种“急剧的经济增长”弄得眼花缭乱，他期望出现一个“发展工业的宏伟前景”。他的战略着意于再次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而不在于建立新的设备，这一点是明显的，他说“经济政策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象‘闲置资本’那样隐藏着的生产因素都动员起来”。②虽然到1925年工业“闲置资本”的百分之七十五都被动员起来了，但直到1926年3月布哈林才开始对“补充资本”公开表示关心。他对1925年的轻微的商品荒实际上保持沉默，到1926年2月，他把它看作“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痉挛”③而不予考虑。他不倾向于设想工业的急剧和迅速的发展，这一点在第二位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布尔什维克都了解，正在发展的城市失业的根源是农

---

① 关于左派的批评的叙述所依据的是厄尔里希的《苏维埃工业化》一书第30—59页。

② 《报告》第3页；《三篇讲演》第17页；《几个问题》第7页。有关工业数字，可见波波夫的《历史概要》第2卷第261页。

③ 《全苏列宁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255页；《列宁格勒组织》第114页。在1925年12月，他看到工业生产的“商品数量不够”，但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三篇讲演》第19页。

村的人口过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解决办法是靠新的工业去吸收进入城市的移民；布哈林的解决办法则是在农村中创造新的农业就业机会。①

布哈林的农业思想也是易受攻击的。他设想刺激农民的消费胃口并使农民经济商业化，将能得到足以养活城市和支持工业化的粮食。这种看法使他对俄国农业的固有的落后性和低下的生产率认识不足。在1917到1918年间，由于大的生产剩余产品的庄园和富农农场在革命中受到破坏，所以俄国农业的原始和分散性质更加剧了。可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允许私人巩固对土地的占有，并形成一个能有高度生产率的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对布哈林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来说，这种"富农的解决办法"在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② 他是想抑止富农这个妖怪的，他对富农农业的容忍并不包含容许巩固私人土地占有和出现一个农村资产阶级的意思。他向农民说"使自己发财吧"的时候，他是希望出现一个普遍繁荣的中农乡村。这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主张。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大型生产合作社或国营农场。但是同他在1924至1926年所持的否定态度相一致，布哈林拥有最大影响的那个时期表明，当时官方是忽视和拒绝各种形式的集体耕作的③。

即使苏联农业恢复了它革命前的生产率的话，依然存在着市场商品问题。农村贫富的拉平，加强了农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农民欠款的废除，使他们得到更大的自由去决定生产多少和生产什么，

---

① 厄尔里希：《苏维埃工业化》第38页。布哈林的言论，见《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369—370页；《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4页。

② 布尔什维克们在论战中没有忘记斯托雷平实行的沙皇的农业改革，斯托雷平把这些改革描绘为"把赌注不是放在醉汉和弱者身上，而是放在清醒的人和强者身上。——放在坚强的个体经营者身上"。见理查德·麦奎斯：《帝俄的曙光》(伦敦，1965年)第177—178页。布哈林经常否认他的政策是把"赌注放在富农身上"，出典在此。

③ 这是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题目。见他的《俄国农民》。

销售多少和销售什么。[1] 布哈林希望有利的价格和丰富的廉价工业品将促使可销售的剩余产品稳定增长，但商品荒的威胁却经常阻碍这个前景的出现。如果说他的工业纲领的缺点危害了它的农业纲领的话，那末反过来也是如此。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925年，那年虽有一个好年成，收购的粮食却大大低于官方的预料，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的进出口计划。[2]

所有这些都说明，布哈林在1924—1926年的经济思想对国家干预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必要性是估计不足的。[3] 他极力主张的不是有计划的投资，而是更低的工业成本和价格；他不是指望最终建立补充的集体粮食部门，而完全依靠小农的"合作"。在每种情况下，他都极为轻视国家"经济命脉"的干预能力，而依赖于市场的自发作用。从1924到1926年那几年中，他所提出的主要是市场目标，如取代私商和加速商品交流。这些目标常常是得到实现的，但并未触及国家的生产能力。

这个方针构成了伴随着布哈林的政策而产生的其他困难的基础。他关于工业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思想也是恢复时期的反映，那时生产发展很快，而且轻工业被用来刺激重工业。但是，布哈林一方面讲走向社会主义的"蜗牛"运动，并曾认为"低速度"并不必然

---

① 见莱文在《苏联研究》(1965年10月)上对这问题的讨论，和厄尔里希的《苏维埃工业化》第34—36页。学者中对二十年代出售余粮的水平有争论。有的倾向于支持斯大林所用的官方数字，认为1926至1927年出售的余粮为当年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三，而1913年为百分之二十六。有的认为这个数字是不确切的，1913年和1926—1927年间的差额要小得多。见杰西·卡尔茨：《关于粮食问题的思想》(《苏联研究》1967年9月号，第399—434页)和R·W·戴维斯：《关于粮食统计的札记》(《苏联研究》1970年1月号第314—329页)。即使以更有利的数字为假定，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② 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90—297页。

③ 见莱文关于这问题的讨论，《苏联研究》1965年10月号第162—197页。

是“致命的危险”，①同时他象左派一样也强烈地希望“很快的速度”，那种不会使重工业“拉在后面”的速度。最后，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他的政策似乎会使党失去工业化的主动权，而把它置于农民或国外市场的可疑的手中。由于这个缘故，一种同经济上的反对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感到政治上无能为力的痛苦心情促进人们去反对他的纲领。

为什么布哈林留恋于那些重要的错觉，而对左派的分析顽固地置若罔闻呢？自然，他是受到了政府在经济恢复时期取得的巨大胜利的迷惑。另外，由于他肯定左派的政策意味着政治上的灾难，他自己又忙于进行痛苦的党内斗争，所以他不去注意正确的批评，而象他的对手一样，愈益认为他的政策，只有他的政策才是明智的。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任务”的伦理上的理解，看来更是起作用的东西。它使他得出了群众的消费是苏联工业化的推动力的主张。这种看法有时对他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使他警惕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所固有的危险。但它也把他引入错路。他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疯狂的乌托邦”(靠剥削农民来喂养工业)所激怒，当需要冷静的分析推理的时候他却沉迷于提出道义上的口号。左派主张更高的工业价格，对此他反驳说：“我们的工业给农村经济提供的产品应该比资本家提供的价格更便宜。”②不管在道义上使人感到多么满意，这并没有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问题。更其糟糕的是，这种伦理上的理解促使布哈林去设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匮乏或可怕的重负的工业化——一条没有痛苦的现代化道路。

不管原因是什么，他原先的经济纲领到1926年就遇到了困

---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11页。

②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58页。

难。那是工业恢复时期结束的一年。在几个月之后，他将开始重新思考和修正他的政策，[①] 尽管他经过修正后的思想仍然是忠实于他在1924到1926年间提出的总的政治、经济和伦理观点的。到那时候，正如在过去一样，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将会对他提出的建议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布哈林和他的思想这时正处在政治风浪的中心。

---

① 厄尔里希：《苏维埃工业化》第4章。

第 七 章

两驾马车：作为共同领袖的布哈林

同志们，我现在看到斯大林同志已完全成为这条政治路线的俘虏，这条路线的创始人和真正的代表就是布哈林同志。

——列夫·加米涅夫，1925

我们现在赞成，我们将来也赞成布哈林。

——约瑟夫·斯大林，1925

在1925年上半年，在他三十三岁那一年，布哈林逐渐地同斯大林一起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新领导，进入了他对苏联政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他们的联合起始于反对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解体之时。三驾马车在1924年末开始分裂，在1925年崩溃。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对斯大林管理党的机关的情况，对布哈林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上的一些提法，提出了挑战。①

① 关于三驾马车的终结，见丹尼尔斯：《良心》第253—257页；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13章。关于在1924年末和1925年初逐渐形成斯大林—布哈林联盟的证明，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36、397—398页、459—460、502页；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43—45页。虽然当时没有正式的领导职位，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5—1927年间作为共同领导人的地位在各方面都是公认的。见1927年12月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照片中他们坐的位子。《火花》报，1928年1月1日。

新的两驾马车的逻辑是算术逻辑。1925年政治局共有七名正式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已升为正式委员。七人中头三人是反对官方政策的，尽管他们在1926年春天以前还没有结合在一起。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总的是同意那些以布哈林为主要发言人的政策的。斯大林同布哈林联合起来，在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四人多数派（托洛茨基暂时采取闷闷不乐的弃权态度）以反对他过去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过来，布哈林也为他对之坚信不移的那些政策取得了一个正式的多数。他再次宣称这里不存在什么个人的对抗，他曾间接地就两驾马车的起因和性质评论说："人们如果要保证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得到贯彻，就必须为争取一个多数而斗争"。①

正如这句话所表明的，联合这个词（或者用二十年代的术语来说"集团"这个词）是对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最好的描绘。它是不同"集团"之间为适应一时的需要而建立的有条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完全志同道合的寡头集团。②正如以前的三驾马车和以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左倾反对派一样，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更多地是由于对共同敌人的恐惧而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有共同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联合，尽管存在着内部关系紧张的迹象，但经受住了发生于1925年的最初的争夺，以及1926至1927年的尖锐的派别矛盾，这种矛盾最后几乎在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存在着。于是，在1927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左派以后，这种联合也就瓦解了。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4页。

② "集团"这个词是布哈林的用语。另见拉谢维奇的评论，他说政治局实际上不是一个领导人的真正的集体，而是他们的一些"组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1页。

斯大林带给这个联合的东西就是组织力量。自从他于1922年成了党的书记处的头头或总书记以后，他就擅长于精心培植党的中央机关的广泛的权力。他尚未控制整个党。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党很象一个由贵族领主们统治的各个“领地”的联盟。① 但斯大林通过他所掌握的书记处的任免权力，已经打下了被一个接着一个地击败的反对派称为“书记处专政”的基础。② 党的中央机关使他取得了任何一个进行争夺的寡头所能取得的最大权力；通过它，他在下级党组织中，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并且最终在政治局本身，建立了他能加以操纵的忠实的表决力量。

斯大林的机关的力量之大，1925年12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表现出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起来反对两驾马车的政策和领导。他们两人的力量是以季诺维也夫认为是他的“坚不可摧”的列宁格勒“堡垒”为根据地的。但是他们被击败了，大会表决的结果是559票对65票。胜利的领导集团在一星期之内就派他们的代表涌向列宁格勒，撤掉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建立起列宁格勒党组织对中央的“忠心”。③ 斯大林制住了对布哈林的政策的第一次重大挑战。他在这个过程中扩展了书记处对另一个“领地”的影响。这为以后的三年立下了一个样板。

---

① 关于斯大林的不断增强的组织力量，见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196—214页；丹尼尔斯：《良心》第165—171，193—198页。“领地”这个词在二十年代是经常在批判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可见布哈林：《报告》第53页；《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9年4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第749页。

② 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研究》（纽约，1939年）第476页。布哈林在1929年把它叫做“书记处体制”，引用于监辛斯基的《反倾向斗争》第196页。

③ 谢尔盖：《回忆录》第211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524页；V·M·伊万诺夫：《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史》（列宁格勒，1965年）第155—200页。

布哈林在这个联合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复杂，但它是同样重要的，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最主要的是他发展了和明确表达了1925年至1927年间领导集团的总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谁都知道他在作出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曾公开地讲到过这个决定和他在思想上提出的倡议。他不仅提出了多数派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思想基础，而且亲自起草了有争论的1925年农业政策决议的“主要部分”。① 他在当时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上（如农民阶层和农村的社会发展，国营工业的性质及其同农业的适当的关系，市场合作社，作为过渡性制度的新经济政策和其他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构成了两驾马车的，从而也是党的公认的意识形态。1925至1927年官方的布尔什维主义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所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他的影响不限于苏联的党和国内事务。他还经常把他的理论观点写进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去，例如在192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六十三个新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③ 在192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对外部世界，对国际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官方看法几乎都是由他独自提出的。

总的说，在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分工，布哈林管

---

①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49页；《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第5页；《三篇讲演》第3—4页。另见马列茨基：《布哈林》第278页；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269页；瓦连廷诺夫：《右倾共产主义学说》一书各处。

② 的确，这是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感到委屈不平的地方。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101—109页。

③ 《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528—544页。它们最早以布哈林的名义刊登于《真理报》1925年4月1日，实际上包含了他关于怎样在一个农民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创新的理论观点。后来，当斯大林分子否认布哈林主义曾经是官方政策时，这些论点就成为有争论的问题了。见E·雅罗斯拉夫斯基：《谈一句伪造的引语》，载于《真理报》1929年11月17日第2版。布哈林对世界革命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最新观点将在第八章中加以讨论。

政策和理论，斯大林管组织工作。[1] 当然，斯大林对政策或理论问题既非一无所知，也不是漠不关心。他是一个有心的政治家，他常常使他自己对他的盟友偶尔发表的不慎言论保持距离，尤其是对他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他对布哈林的某些理论的政治弱点很敏感，他特别注意不去附和布哈林在列宁没有明确指示的一些问题上所作的解释。[2] 虽然斯大林有时候比布哈林更多地颂扬工业主义（特别是重工业）和苏联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好处，但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工业或农业纲领。从布哈林在1924至1926年开始拟定他的纲领时起，到1926和1927年对这个纲领进行修改的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上是一个布哈林主义者。[3] 当这些政策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遭受猛烈攻击的时候，他宣告说："我们现在赞成，我们将来也赞成布哈林"。反对派对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加米涅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曾说："同志们，我现在看到斯大林同志已完全成为这条政治路线的俘虏，这条路线的创始人和真正的代表就是布哈林同志。"[4]

布哈林对两驾马车的实际政治财富所作的贡献也更多。最重要的是他对党的中央报刊的控制。他除了担任《真理报》主编外，

---

① 罗伯特·V·丹尼尔斯曾这样写到斯大林同布哈林分子的联盟："在政策和学说问题上，他们的路线是他的指南；在组织问题上，他的权力是对他们的支持"。见《斯大林上升到独裁地位，1922—1929》，载于《苏联的政治：七个事例》，亚历山大·达林和艾伦·F·威斯廷编（纽约，1966年）第27页。

②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94、503—504页。

③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亚历山大·厄尔里希：《斯大林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看法》，载于《俄国和苏联思想中的连续性和变化》，欧内斯特·J·西蒙斯编（坎布里奇，麻省，1955年）第81—99页；瓦连廷诺夫：《右倾共产主义学说》第81—85页。关于不同的观点，见鲁道夫·施莱辛格：《关于早期苏联计划工作的发展情况的笔记》，载于《苏联研究》（1964年7月）第22—44页。

④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54、494页。关于类似的反对派的言论，见斯米尔加和拉狄克的评论，《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7期（1926年）第199、247页；加米涅夫的评论，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55—256、269—270页。

1924年4月又加了一个中央的新双周刊《布尔什维克》的主编职务。这个刊物的宗旨是“维护和加强历史布尔什维主义，反对歪曲和破坏它的基础的任何企图。”[①] 由于掌握了中央委员会的两个主要舆论机关，布哈林就取得了派别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季诺维也夫1925年曾想方设法在列宁格勒创办对立的出版物，但没有成功；斯大林在 1928 年曾作出极大的努力从布哈林手中夺走两个报刊，这些都证明了舆论机关的重要性。[②] 布哈林通过《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统治着一个影响很大的报刊和宣传王国。在这两个报刊的赞助下还出版了各种发行很广的期刊、报纸和小册子，而布哈林也还参加了许多其他的杂志、百科全书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在政治上最为重要的是，地方上的党报在编辑业务上都接受《真理报》的领导，并经常转载《真理报》的文章。[③] 在二十年代，中央机关报刊所起的作用不止是为有权威的党充当联系渠道。它们还负有解释党的决议的责任，这就必然使它们在最后形成政策和贯彻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米涅夫曾抱怨说，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也就是报刊的干部）享有“对党的政治出版物的事实上的垄断权”和对“全部政治教育工作的垄断权”，[④] 他这样说，是没有多大夸张的。

布哈林的其他职务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政治财富。他和季诺维也夫从1923年以来共同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政策和学说问题。虽然季诺维也夫直到1926年10月在形式上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主席，

---

① 《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第3页。

② 见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55页；《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1971年第2期第26页。

③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党和苏维埃的报纸》第一部分（莫斯科，1961年）第76页；《红色报纸》1926年第4期第7页。另见《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1968年第2期第26页。

④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54页。另见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同上第113—117页。

但是他在1925年12月遭受失败后不久布哈林就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充当了实际负责人。在季诺维也夫被正式撤职后，布哈林成了执委会的总书记，从而也就成为法律上的头头（主席职务被取消了）。① 这个职位并没有为两驾马车增加在苏联党内的组织力量；但是由于多数派和反对派都很珍视外国共产党所表示的同情，所以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其有利的地方。它提高了布哈林的个人声望，也提高了两驾马车的声望和权威。它也扩大了布哈林的势力范围，使他有可能把他的苏联追随者派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书记处中去，并争取更多的外国同情者。② 在党内进行争论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当争论转向1926—1927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共产国际为布哈林提供了另一个官方的讲坛 。

这些领域，即中央机关报和共产国际，就是布哈林的"领地"。它们同他在多数派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所起的总的作用是相符的；斯大林指挥一场组织上的战争，而布哈林则从事意识形态上的战争，他的思想主张和反面的论证构成了领导集团的进攻和防御的实质。作为一个思想战士，他在两驾马车执政的初期阶段是不可缺少的。不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追随者，都不是反对派的那些知名人物的对手，他们中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和拉狄克这样一些聪颖的理

---

① 《共产国际：历史简纲》第261—262页；《苏维埃政权十年：1917—1927》（列宁格勒，1927年）第37页。

② 苏联党内所有知名的青年布哈林分子，如亚历山大·斯列普柯夫、瓦连廷·阿斯特罗夫、亚历山大·爱恒瓦里德和E·哥登别尔格和其他一些人，1925年后有时曾在共产国际中工作过。布哈林曾把斯列普柯夫带到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推荐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尤勒斯·洪贝特—德罗茨《从列宁到斯大林，1921—1931》（纳沙特尔，1971年）第285页。两个不太有名的苏联布哈林分子格罗尔曼和伊德尔生看来是在执委会中管苏联党支部的。见《真理报》1929年11月22日第3页和1929年12月16日第3页。洪贝特—德罗茨是瑞士代表和共产国际机关中的一个领导人，他特别接近布哈林。对于他和其他一些人将在第9章中予以研究。

论家、有才智的经济家和善辩的政论家。他们都是有思想和才智的人，都有应付自如地进行公开辩论和思想斗争的才华。

每当辩论在相当高的思想理论水平上进行的时候，在多数派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布哈林才是他们的对手（虽然李可夫在具体经济学上是强的）。他的众所公认的理论上的敏锐性和学识的广博，他的“口才”，他象一个“无情的辩论家”① 那样有时过多地使用的辩论技巧，使多数派得到了一个能与反对派相匹敌的杰出发言人。正是布哈林回答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问题；正是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挫败了季诺维也夫想取得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的资格的企图，并粉碎了这个殒落的人物可能取得的任何思想理论权威；正是他在1929年2月出差到无产阶级的列宁格勒去维护领导集团的农民政策。② 在一定意义上说，二十年代在纲领问题上的论战是一场持久的政治运动：人们在论战的讲坛上都赢得了，也都输掉了一些重要的，尽管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布哈林并不总是赢得这些斗争的；但是如果多数派能够说他们取得了可贵的思想理论上的胜利的话，那么这些成就主要是属于布哈林的。

意识形态的战争，正如任何其他战争一样，需要军团，也需要军团司令。这些军团，这些被称为“布哈林学派”的青年党员知识分子，就是布哈林的最独特和最引起人们争论的政治工具。这个学派1925年在连珠炮似的反对声中，一下子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个学派同布哈林一起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被说成是正在发展的“小资产阶级腐朽性”的化身，是“富农倾向”，是“民粹派

① 见波克罗夫斯基的评论，《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1期（1925年）第320页；沃尔夫申的评论，《文学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9年）第634页。另见伊斯门：《爱情和革命》第353—354页；《纽约时报》1926年11月4日第12版。

② 关于他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36—151页；关于他在列宁格勒的讲演，见《列宁格勒组织和报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布哈林描写为他的“最有学识的”和“主要的对手”，《新经济学》第8、295页。

精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了反对派指责的主要对象。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抱怨布哈林学派的代表们控制了“整个报刊”，力图“对任何一个指出他们歪曲和破坏……列宁主义的人进行恐吓”，他们指责说：“现在在布哈林周围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派’，这个学派企图掩盖现实并从阶级观点后退。”加米涅夫得出结论说，的确“这个学派是建立在背叛列宁的基础之上的。”克鲁普斯卡娅暂时还是前两届三驾马车的支持者，她看到了一个长期的危险：“聚集在布哈林同志周围的红色教授是正在培育中的一批接班人，他们正在训练一批将决定我们路线的理论家。”② 从此以后，左派在谈到官方的出卖时，很少不对“布哈林庇护下的这个理论学派”提出这类指责。斯大林在1925至 1929 年又将重复这些指责并为之添枝加叶。③

引起这种不安的原因是一小群青年党员理论家，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把布哈林当作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良师，而把自己看作布哈林的学生。虽然他们只是在1925年才在政治上引起人们的争论，但是人们早在1922年就注意到了布哈林的“新信教者”的存在了。④ 在一个政治局委员周围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大多数重要的领导人，例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曾录用少数青年

---

① 这些攻击是在1925年年初在列宁格勒开始的，在十二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见《新反对派》第11、64—65、176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另见萨法罗夫的话，引用于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第225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280页。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09、165、254、274页。

③ 见托洛茨基：《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13期第18页；I·斯米尔加：《联共(布)党右倾集团的纲领》(T2825)第3页。关于斯大林的攻击，见《真理报》1929年9月18日第3页和1929年10月20日第3页。

④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2年第3期第85页。正如布哈林后来指出的，它们实际在1919—20年间就开始形成。《反苏集团案》第385页。

党员作他们的私人秘书并充当他们的助手。（在所有政治制度中都有类似的安排。）这些秘书，经常是从领导人负责的专门工作领域中物色来的。布哈林自己的办公室由爱费姆·策伊特林为主任，策伊特林曾经是共青团的创建者和全国领导人。① 但是布哈林学派的人不同于普通的助手班子的（除了人数以外），是他们在更高的党的机构所受的教育，是他们的受人欢迎的智识和写作才能，是他们的思想一致性和他们将要发挥的政治作用。这种作用是从以下事实中产生的，即他们有时虽然充当布哈林的个人助手，但他们主要地而且更多地是在官方的职位上完成他们的任务的。②

为什么有那么多有才干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聚集在布哈林的周围，看来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无与伦比的声誉；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理论上的大力神”，是一尊偶像。③ 第二，也是与第一点密切有关的，是布哈林在青年党员中，特别是在被挑选出来培养为未来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青年党员中，所享有的“巨大权威”。在几年时间中，他是同共青团工作联系最密切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他曾在1923年开玩笑似地说：“我要求你们不要以为这已成了我的专业或职业。”④ 此外，“成千上万的人”都学习过他的著作，如《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受到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反苏集团案》第387页。关于蔡特林在共青团内的生涯，见他的回忆录，《俄国的青年运动》，A·基洛夫和V·达林编（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235—236页；《共青团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议集：1918—1928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7页。

② 开始是季诺维也夫，后来是斯大林，他们力图把最优秀的青年布哈林分子招募到他们自己办公处去。见《真理报》1927年7月24日第5版；《布尔什维克》1927年第11—12期第38—39页；阿斯特罗夫：《峭壁》第318页。关于斯大林，见《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回忆录》（将由纽约帕恩芬德出版社出版）。

③ 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24页。见马列茨基：《布哈林》。

④ 《共产主义大学学报》第2卷第259页。

特别的爱慕，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党的领导人在党的教育机构中影响特别大。①

在红色教授学院（苏联二十年代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心之一），情况更是如此。这个学院在经济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给学员讲授三年时间的课程，它是在1921年建立的，目的是培养"红色教授"，以便最终取代仍统治着苏联大学的非党学者。在一个把大学、政治沙龙和修道院的一些特点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党内最优秀的老思想家在讨论会上和课堂上同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学生相聚。事实上，这个学院相当多的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党的政治理论工作的。② 这些人中许多人进入了布哈林的圈子；布哈林学派的大多数主要人物就是这所学院1921—1924年第一届毕业班的学员。

最后，要充分了解布哈林学派，而不去研究这个学派的鼓舞者的个人特点，那是不可能的。那些年中曾见到过布哈林的人都证实说，和善的、开朗的、很有幽默感的布哈林，经常穿着传统的俄罗斯裤子、皮夹克和高腰靴子，体现着取得了政权的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味道，他是布尔什维克头中最受喜爱的人。（托洛茨基曾评论说："布哈林在本质上一直象个老学生。"）在他身上没有托洛茨基的吓人的傲慢劲，没有季诺维也夫的矫揉造作的浮夸，也没有斯大林周围所有的那种阴谋和不信任气氛。他是"在同志关系上很温柔的"，是"受人爱戴的"。他散发着"不受干扰的亲切感"，他

---

① 《争取哲学战线上的转折：论文集》第1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1年）第101页。另见本书第5章第220页注①。

② 关于这个学院，见卡茨：《苏维埃俄国的党的政治教育》；A·阿里莫夫：《红色教授学院十年》，《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1年第12期第13—18页；《历史档案》1958年第6期第73—90页；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3、4、10章；A·I·古科夫斯基：《我是怎样成为历史学家的》，《苏联历史》1965年第6期第76—99页。

能给非正式的集会带来有感染力的愉快情绪，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他能给政治带来诱人的魅力。① 列宁曾指出，布哈林是个“乐天派，……他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也是最不会破坏他们的进攻的愉快气氛的。”布尔什维克的敌手，似乎为了从礼节上尊重列宁在垂危之际把布哈林称为“全党所喜爱的人”的说法，在对布哈林进行攻击之前都用“布哈契克”的爱称称呼他。② 甚至是布哈林在1929年的恶狠的敌人斯大林也认为有必要重复布鲁特斯的话：“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党和共产国际。”③

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布哈林是那样受人喜爱，以致于可以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好样的布尔什维克。一个老党员（他既不是一个门徒，也不是一个圣徒传的作者）曾评价布哈林是“最受爱戴的俄国革命人物之一”，他解释说布哈林也是一个充满热情和各种活力的人：“他象水银一样生动活泼；他渴望了解生活的一切表现，从新的深刻的抽象思维到市镇上的娱乐，他都感兴趣。”④ 一个外国共产党的赞赏者说，他具有“吸引和迷住青年人的想象力的一切特征”，青年布尔什维克自然都倾向于他。乐于热情地接近年轻的和下面的同志，这是他的魅力的一个方面。这些同志都觉得他好说话和平易近人。布哈林带领有希望的“新手”在那里工作，例如在《真理报》编辑部，那里就充满了“一种和谐、同

---

① 见梅谢里亚柯夫：《布哈林》，《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9年）第914页；谢尔盖：《回忆录》第163页；福特雷尔：《北方的地下》第142页；勒维在《世界史》一书中引用的回忆录。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见《列昂·托洛茨基的著作（1937—1938年）》（纽约，1970年）第16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65页。见《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93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23、46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页。

*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系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他也是一个有影响的杂志编辑、传记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④ 梅谢里亚柯夫的话，见《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9年）第914页。

志般合作、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气氛”。[1] 他在年龄上只比他们大一点，他不摆任何架子，总是平等地同“我的青年同志们”相见并鼓励他们。反过来，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又使他们同他连结在一起，把他看作他们的“亲爱的老师”而且是“带着爱戴的心情”。[2] 当布哈林在1928到1929年间肯定要垮台的时候，只有阿历克赛·斯捷茨基一个人投向斯大林。

布哈林学派在它声名最盛时大概有十五名容易辨认的成员。其中最有名的有：亚历山大·斯列普柯夫、瓦连廷·阿斯特洛夫、斯捷茨基、德米特里·马列茨基、彼得·彼特罗夫斯基、瓦连廷·阿斯特洛夫、亚历山大·爱恒瓦里德、D·P·罗齐特、E·哥登别尔格、察特林和亚历山大·杜伊策夫。除了斯捷茨基和彼特罗夫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为人所知以外，人们很少知道这些人的传记，他们的生涯由于布哈林的失败而夭折，他们的生命由于斯大林的清洗而终结，只有阿斯特洛夫似乎活了下来。[3] 他们都处于二十四、五和靠近三十的盛年；大多数人是在1917年或以后入党的，在1921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以前都担任较低的职务。象除了少数几个以外的所有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一样，他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背景是各不相同的。彼特罗夫斯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和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格利戈里·彼特罗夫斯基的儿子。根据反对派的私下传说，斯列普柯夫到1918年下半年还是一个立宪保皇党人。[4] 爱恒瓦里德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立宪民主党人尤里·

---

① 伯恩哈德·赖兴巴赫：《1921年的莫斯科》，《评论》第53期（1964年）第17页；马格里特·麦卡锡：《反叛的一代》（伦敦，1953年）第112页。关于《真理报》，见《乌里杨诺娃——〈真理报〉的秘书》（莫斯科，1965年）第186页上的回忆。

② 见V·阿斯特洛夫和A·斯列普柯夫对布哈林的称颂，《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

③ 见跋注（2）。

④ 《社会主义通讯》1927年7月18日第14页。关于彼特罗夫斯基，见本书第544页

爱恒瓦里德的儿子。他曾到柏林看望过他的父亲，希望劝说"我的顽固不化的父亲"接受布尔什维克制度。只有哥登别尔格好象过去有过一段参加反对派的历史，在1923年的一个短时间里曾同情过托洛茨基。⑤ 有几个人于二十年代中期在成为政治人物之前曾有一些学术上的声誉，斯列普柯夫和阿斯特洛夫是历史学家，马列茨基是经济史家，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是经济学家。⑥

他们是作为拥护布哈林主义的不知疲倦的和到处活动的宣传评论家才出了名的。他们写了几百种专著、小册子、文章和讲演，在报刊上、学校里、党的会议和其他的公众集会上发表，竭力宣传和维护（有时是发展）布哈林的思想和政策。⑦ 他们为他的著作写

注③。关于斯捷茨基，见《十月的英雄》第2卷（列宁格勒，1967年）第444—445页；《第六次代表大会》第466页。阿斯特洛夫后来写了两部关于他自己和青年布哈林分子的没有多少伪装的小说。见他的《火光在前》（莫斯科，1967年）和《峭壁》。

⑤ 见《舵》1929年11月7日第3版；《真理报》1929年11月8日第3版。关于哥登别尔格，见《真理报》1929年7月21日第4版。

⑥ 斯列普柯夫：《第一杜马中的阶级矛盾》（莫斯科，1923年）；阿斯特洛夫：《作为孟什维克先驱的"经济学家"：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的经济主义和工人运动》（莫斯科，1923年）；马列茨基对奥地利边际学派的研究，载于《红色教授学院著作》，M·N·波克罗夫斯基编（莫斯科，1923年）第247—275页。阿斯特洛夫和斯列普柯夫在二十年代继续作为历史学家发表作品。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经常为经济杂志撰稿。前者的主要著作为《苏联经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

⑦ 季诺维也夫曾抱怨，青年布哈林分子"撰写的文章充满了我们的中央报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17页。他们的著作的书目可列数页之多。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1925—1927年间出版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很少有一期是没有他们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文章的。例如，可见以下一些篇名：《新反对派》；《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论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同反对派斗争的党：论文和文献集》，L·罗宾斯基和A·斯列普柯夫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关于他们的布哈林主义的专著，可见以下一些：斯列普柯夫：《关于在工人党校中宣传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25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第2版，哈尔科夫，1926年）；D·马列茨基：《所谓的"热月"》（莫斯科，1927年）；A·札伊策夫：《论乌斯特里亚洛夫，"新新经济政策"和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牺牲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关于他们在公共场合出面的例子，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1期（1925年）第322—327、332—334页和第17期（1926年）第236—241、246—247、249—254、261—265页。

评论，编写他的传记，对他表示赞扬。[1]有一个评论家讥讽说，他们到处“唱的……是尼·伊·布哈林的调”。另一个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好象是布哈林的个人“宣传鼓动队”。[2]尤其是，他们为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向反对派打思想仗，当然不是以布哈林主义的名义，而是以“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布哈林当然拒绝“对‘新学派’找岔子的尖声叫喊”，他的斯大林主义的盟友，从新学派的活动中得益非浅，也拒绝这些叫喊。有一个斯大林的人曾为之辩护说：

“布哈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学派；布哈林学派就是列宁主义学派。布哈林所做的工作是，他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精神教育了大批在我们党内做宣传、鼓动和文艺工作的年轻同志。”[3]

反对派对第一个论断激烈地表示不同意，而对后一个论断所反映的事实则痛苦地表示惋惜。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些年轻的布哈林分子升任重要的党和国家的职务后，他们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一个巨头的小智囊团的作用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党的中央出版物的“垄断”。阿斯特洛夫和斯列普柯夫在1924年9月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同布哈林一起领导这个有权威的中央刊物直到1928年年中。他们所有人都在《布尔什维克》和《真理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因为他们同布哈林一起也控制着《真理报》，开始是非正式地，后来是正式地。1928年年初，阿斯特洛夫、马列茨基、蔡特林和札伊策夫也成了《真

① 见札伊策夫的言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4年第6—7期第280—291页；马列茨基的言论，《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5—6期第106—110页；马列茨基：《布哈林》。

② 《真理报》1929年9月18日第3版和1929年10月20日第3版。

③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话，《真理报》1927年7月24日第5版。关于布哈林的否认，见《三篇讲演》第3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23页。

理报》的编辑。[①] 这些是这个学派的堡垒。此外，他们写的文章和社论还几乎在所有大的党报和团报上，特别是在首都出版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当《共青团真理报》（实际上是一家新的中央机关报）于1925年5月创刊时，斯捷茨基就是它的第一任主编。尽管由于他和斯列普柯夫写了一系列政治上不慎重的文章，反对派迫使他在几星期之后离开了这个岗位，还有一个布哈林分子，即马列茨基的兄弟仍留在编委会中。[②] 他们的政治作用甚至扩展到了列宁格勒。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于1926年1月被从《列宁格勒真理报》挤走后，阿斯特洛夫、彼特罗夫斯基和哥登别尔格曾在不同时间代表布哈林充当它的编辑。[③]

他们的活动也并不限于报刊。除了布哈林掌握的两个专门的领域——共产国际和工农通讯员运动[④] 以外，他们在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大学和教育机构网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有一个青年布哈林分子是大学校长；另有一些人主管课程，讲课，编写广为使用的教科书；还有一些人领导着象莫斯科工业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共产主义教育学院这样一些重要学院的党支部。[⑤] 他们也活跃在负责计划工作和工业发展的国家计划机关中。例如，

---

① 瓦甘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的倾向及其崩溃（1928—1930）》（莫斯科，1970年）第143页。

②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504页；《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6期第58页；《1927年的整个莫斯科》（三卷集，莫斯科，1927年）第2卷第358页。

③ 见V·杜勃罗文：《一个热情公共活动家的故事（S·M·基洛夫和报纸）》（列宁格勒，1969年）第201、204页；阿斯特洛夫：《峭壁》第392—393、399、419、473页。

④ 见本书第315页注②。斯列普柯夫在通讯员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见《真理报》1926年5月15日第3版。

⑤ 见《真理报》1929年11月13日第3版和1929年11月18日第3版；阿勃拉莫夫：《关于右倾反对派》第252—253页；瓦甘诺夫：《右的倾向》第4—5章。爱恒瓦里德所著的《苏联经济》是1927年出版的一本布哈林主义的教科书，到1929年共出过五版，有俄文和乌克兰文版本，共发行十万册。见《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18期第131—136页；《社会主义通讯》1929年3月8日第13页。

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在国家计委中担任高级职务，后者晋升为俄罗斯共和国计委付主任。[①] 只是在斯大林的党中央机关中，他们的作用要较比小些。斯捷茨基和罗齐特两人在纪律机关中央检查委员会任职。此外，斯捷茨基曾是列宁格勒党的宣传鼓动局负责人，他于1927年成为正式中央委员。斯列普柯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负责指导员"。这是有权的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斯特*的温和的称号，他们经常出差到各地去监督下级党组织和地方报刊是否忠诚。[②]

布哈林学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到1925年已成为苏联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是，它的鼓舞者既容易遭到政治上的非议，也容易取得政治上的好处。譬如说，他的信徒的正直的进攻精神常常刺痛老一些的党内知识分子；据说在某些圈子里红色教授是"骂人的话"。[③] 引起更大政治后果的是他们有时把布哈林思想讲得超越了政治上审慎的地步（虽然布哈林本人曾开过这种先例），这样就容易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目标。这些反对派用他们的过火行为来证明多数派的异端邪说。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斯捷茨基和斯列普柯夫在官方报纸上阐述布哈林 1925 年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时所引起的争论。还有另一个问题。反对派把任何一个触犯他们的青年评论家都同布哈林学派连在一起。例如 1925 年发生的著名的鲍古谢夫斯基事件就是这样。鲍古谢夫斯基在此以前还是一个不出名的记者，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

---

① 《真理报》1929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 特涅伊战争时希腊的贤明老将。——译者注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1003 页；《苏共列宁格勒组织历史纲要》第 2 卷（列宁格勒，1968 年）第 316—321 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838 页；《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 年 12 月：速记记录》（2卷集，莫斯科，1961—1962 年）第 2 卷第 1534 页。

③ 《真理报》1929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不同意说富农是“可憎的东西”。[1] 在以后的二年里，左派常引用他的失误之言来证明两驾马车的“富农倾向”。其实，鲍古谢夫斯基同布哈林显然是没有关系的，他的文章是由于编辑工作上的疏忽未经审查而刊登出来的。[2]

不管怎么说，这个学派给布哈林提供了一个在一段时间里对他很有用处的不寻常的政治基地。任何别的巨头都没有他自己个人的“宣传鼓动队”，更不用说是这样的规模和质量的一个“宣传鼓动队”了。有了这个人才济济的队伍，他就可以把具有献身精神的追随者放到那些制定政策、思想和培育未来的干部的机构中去，可以很有效地宣传和维护他自己的政策。他同他的用十二倍的火力反击反对派发动的每一次论战的信徒们，在为多数派赢得思想胜利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这个学派帮助布哈林上升到了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圣师的地位，把他拥立在那里，并把布哈林主义定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

布哈林是带着所有这些政治财产在1925年同斯大林结合的。另外，他还贡献出了某种不那么有形的，但同样重要的东西，即他的个人威望的份量。只有把它放在列宁逝世后发生的“继承斗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这一贡献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用继承这个词并不妥当。因为尽管1923—1929年的党内斗争构成了企图重建列宁过去曾行使的权力和拥有的威望的持久的努力，但认为可

---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59—64页。

② 见布哈林的评论，《列宁格勒组织》第89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7、204、408、417页上的讨论；《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7—8期第104—105页。虽然有过这件丑事，鲍古谢夫斯基本人后来却非常走运，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干部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史的编者和作者。见V·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载于《第十八个年头：文集之八》，M·高尔基编（莫斯科，1935年）第461—537页。不清楚谁是他的支持者，也许是瓦列里安·古比雪夫。见G·V·古比雪娃：《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传记》（莫斯科，1966年）第313页。

以有一个继承人——一个"今天的列宁"——的思想，那是不能允许的。列宁在领导集团中和在全党享有的威望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种威望来自他是党的缔造者和鼓舞力量这一事实，来自他的政治判断如此经常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是同那么多的反对派针锋相对的，来自他能团结和说服他的倔强的同事的品格的力量。这种威望完全不是由他的职位产生的。正如索柯里尼柯夫指出的："列宁既不是政治局的主席，也不是总书记；然而，列宁同志……在党内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正如近来有人讨论的，那是一种超凡的权威，是同列宁作为一个人不可分的，是不依赖于章程或体制秩序的。①

列宁的有些后继者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的，曾用各种方式对此有所评论。布哈林在1924年曾说，"列宁是一个最好意义上的独裁者。"五年以后，他又把列宁描写为唯一的"领袖、组织者、船长和严厉的铁的权威"，试图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他就是伊里奇，一个亲密的、可爱的人，一个极好的同志和朋友，大家对他的亲切感是消失不了的。他不仅是'列宁同志'，而且有某种无法衡量的比同志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关系……这绝不是简单的'指挥'、'行政命令'等等。"②

这种亲密的感情和对列宁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的真正的领会交织在一起，在领导集团内外，使人很自然地都不愿去想"接班"这个字。在1925年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代表表

---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335页。另见米高扬：《回忆列宁》，载于《青春》1970年第4期第46页。罗伯特·塔克在《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对历史和品格的研究》（纽约，1973年）有说服力地认为最好把列宁理解为一个超凡的领袖。

② 布哈林的《同志》一文，收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论文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924年）第15页；《真理报》1929年2月27日第3页。虽然他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他象上面所引的索柯里尼柯夫的话一样，是把列宁的权威同总书记的作对比。

示他不同意说“个别代表人物……正开始接过列宁的衣钵。这种衣钵对任何人都是不适合的……”。另一位代表补充说：“我想我们应该放弃接班和接班人的想法。”不管内心的愿望是什么，也不管是否实际可行，当时大家都认为列宁之后的领导应该真正是由几个领导人承担的，或是正如布哈林在1925年所坚持的，应该是集体的。他说，“因为我们失去了列宁，已没有单一的权威。我们现在只能有集体的权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没有错误的，我能百分之百正确地解释列宁的教导。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是谁如果认为他能百分之百地做到，他就把他个人的作用估计得太大了。”①

因此，将有一批继承者来代替去世的首领。开始时集体领导是个排他性的概念，不一定包括所有居于重要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甚或不包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相反，它指的是“列宁主义者的基本核心”，②是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讲到的六个人中的五个，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虽然很少公开讲，但是普遍认为这些人每个人都代表着列宁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在一起体现了党的合法的权威，因此他们应该全体或几个人在一起进行集体统治。举两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职位很高的人物，但他们在这方面就有不足之处了。他们两个人身上都缺乏布尔什维克的风度或党的权威。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与众不同(primi inter pares)，这一点是可意会而不是言传的。正如观察家们有时说的，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奥林匹斯山”。③斯大林具有这种原始的但又确实的超群感，他在1928年用一个类似的

① 引用于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226页；布哈林《三篇讲演》第40页。

② 季诺维也夫的话，《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60页。

③ 见《社会主义通讯》1928年11月14日第14页。

比喻说到了这一点。他向布哈林谈到已不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内的九人政治局时说，“你和我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都是不足道的。”①

可是，在1925年有五座“喜马拉雅山”，或者说有五位可以称为“有权威的”列宁继承人。② 每个人所以具有这种资格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四点合法资历的某种组合：（一）在1917年前后是列宁的内圈的人；（二）有一段英勇的革命斗争史，而1917年是主要的试金石；（三）做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资格；（四）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必须是个理论家。没有一个巨头的条件是完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被看作是连接的整体）在第一点上最强而在第二点上最弱，因为他们曾反对过1917年的起义；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第二和第三点上没有人可与之相比，在第四点上仅次于布哈林，但在第一点上最弱，因为他入党晚。布哈林在四点上都是比较强的：他在理论上超过其他人；在1917年革命问题上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不能象季诺维也夫那样夸耀自己在1917年以前就是列宁的同伴，也不能夸耀他在以后的忠诚。斯大林的资历给人的印象是最不深的；他在第三和第四点上没有什么地位，在第二点上不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这些考虑虽然越来越失去实际意义（因为给人印象最浅的现在却握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人们还是予以认真对待的。这可从以下事实中看出来：二十年代的政治往往是围绕着一些人的政治历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由于策略上的原因，斯大林在1925年的讲法是不同的，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506页。

② “有权威的领导人”或“有权威的党的代表”这些词在二十年代经常使用。见梅谢里亚柯夫的布哈林传（莫斯科，1929年）第913页；《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7期（1926年）第247页。

史、党的历史和各个巨头为美化他们资历而作的努力转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力图使人们忘掉他们1917年的耻辱；他们的对手则不允许忘掉。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竭力想作为一个理论家出现，但被布哈林所击败。托洛茨基企图弥补他过去那段孟什维克历史；他的敌手则利用这段历史来反对他，而且还对他1917年以前的思想的正统性提出非难。斯大林靠排挤他的对手逐渐在共产国际中取得某种承认；但是他完全缺乏一个理论家的名声。他是痛苦地知道这一点的，布哈林在1918年曾发现“他朝思暮想要成为一个被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这是他所缺乏的唯一东西。”①

从这个背景上看，布哈林在两驾马车中的重要作用是明显的。原先三驾马车结合在一起，是希望靠他们集体的地位挫败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巨大威望。他们在使托洛茨基显得象一个虚伪、高傲的僭越者这点上是成功的。可是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抛弃了斯大林，要同托洛茨基进行短暂的联合。对他们的集体权威的幻想促使加米涅夫向托洛茨基保证说：“只要你和季诺维也夫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党就将找到它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记得他如何“嘲笑这种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②但加米涅夫的期望无疑是斯大林所害怕的事情。他是最少才华的，他现在受到五个继承人中三个人的反对和谴责。呈现为一个篡权者这样的严重威胁悬在他的头上，这个前景由于列宁那个尚未公布，但已广为人知的“遗嘱”而变得更为不妙。

布哈林充当了共同领袖，就帮助斯大林避开了这个危险。他至少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列宁主义权威的外表，从而使多数派的“集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另见多伊彻：《斯大林》第290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第521页。

体权威”的存在成为可能。尽管他年龄较小，尽管有人对他的长处是思想而不是实际政治抱有怀疑（也许这两个方面都使他适于当政治领袖），但他在两驾马车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他同斯大林不同，他在国外和国内问题上，包括从在革命的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否可行到国内的资本投资和文艺政策等各种问题上，都有权威性的发言权。[①] 与此同时，他在实际上给予了总书记不少东西，把他自己的名望分给了总书记那样一个因个人不引人喜爱和政策上的分歧而受到反对的人，还为他（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说）“在共产国际中创造了一种信任气氛”。[②]

过去同列宁的关系问题在1925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斯大林在三年前曾对克鲁普斯卡娅发过“一次不寻常的粗暴的脾气”和进行“令人作呕的痛骂”。克鲁普斯卡娅现在公开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她站在他们一边象征着他们同她已故丈夫的长期亲密关系，使知情的布尔什维克想起列宁“遗嘱”中的生气的附言，这段附言谴责斯大林“太粗鲁”并建议把他从书记处撤职。[③] 在这方面，布哈林也提供了一个可起抵销作用的象征。那就是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杨诺娃。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好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乌里杨诺娃是布哈林的亲近的老朋友，从1917年起担任《真理报》的责任秘书。布哈林在1929年的垮台导致了她的政治生涯的终结，她于1937年在布哈林被捕之后几个月在半屈辱中去世。但是在1925年，乌里杨诺娃用她的身份支持了布哈林，从而也支持

---

① 譬如说，1924到1925年间在讨论文学问题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问问斯大林的看法。关于外交领域，见列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安阿伯，密芝根，1967年）第169页。

② 伊普西隆：《世界革命模式》第102页。

③ 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时代的罪行》（纽约，1956年）第10—11页。另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45—546页和《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3—314页。

了斯大林。显示她同布哈林在《真理报》并肩工作的图片广为流传。①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在克鲁普斯卡娅对布哈林关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的解释公开提出挑战后，乌里杨诺娃起来作了简要的反驳：同志们，我要求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并因而声称比我们党的所有其他党员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列宁主义。我想列宁亲属的这种垄断权……是并不存在的，也是不能存在的。②

然而，归根到底，布哈林的权威是建立在他作为布尔什维主义最卓越的活着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作为"现在被公认为是共产国际的最杰出的理论家"（1926年官方曾这样说过）的地位之上的。③ 他获得了他那个时候最令人怀疑的一种称号"经典作家"。他的著作被收入官方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文艺评论等集子中去。当一个苏联作者要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理论成就的"国际声望"时，他会说："只要指出尼·伊·布哈林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杰作就够了……。"④ 作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及其主席团的创始成员，他是在1928至1929年由党委派去苏联科学院的领导干部，是在科学院当选的唯一政治领导人，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的声望表示尊敬的证明。⑤

---

① 关于乌里杨诺娃，见《玛·伊·乌里杨诺娃——《真理报》的秘书》。她与布哈林看来是在1910年以前在莫斯科成为朋友的。乌里杨诺娃在《论列宁》一书（莫斯科，1964年）第86页上讲到他们在1918年是很接近的。1919年她同布哈林一起被斯大林挤出了《真理报》。见《玛·伊·乌里杨诺娃——《真理报》的秘书》第259页。关于整个问题，另见《托洛茨基流亡日记：1935年》（纽约，1963年）第33页。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8—166、299页。

③ 《共产国际》1926年第4期第14页。

④ I·P·拉祖莫夫斯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第2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511—512页。

⑤ 洛伦·讷·格雷厄姆：《苏联科学院和共产党》（普林斯顿，1967年）第92、95、114页。

布哈林的政治权威就是建立在对他的这种赞扬（不管是怎样吹吹拍拍的）以及他作为继承人的其他条件之上的；从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是布哈林的威望的共同受益者。这种威望在二十年代是具有很大政治份量的，这一点迟至1928年当总书记开始偷偷摸摸地发动反对布哈林的运动，攻击他作为党的理论家的声誉的时候还能看出来。不象以后斯大林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失去意义而把每一条都正式归于他个人名下（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个人迷信”)时那样，当时党的理论是很起作用的。争当布尔什维克正统的各方都把党的理论看作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最可靠的指南，看作革命正确性的最真实的指示器。他们认为政治和理论是一码事。或者正如斯大林分子卡冈诺维奇在1929年所说的：“政治上的背叛经常是从理论上的修正开始的。”①

这就是斯大林—布哈林两驾马车的形象。作为列宁继承者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党的多数派的首要领导人，但不是它的唯一重要代表人。另有两个政治局委员作为多数派的布哈林主义政策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左派的夙敌，现在取得了特别的重要性。一个就是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他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总理)，1926年取代加米涅夫当了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身兼两个最重要和有权的政府职务。另一个是米哈伊·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生下来叫叶甫列莫夫)，他除了在1921—1922年有很短一段时间不受到列宁喜爱外，从1918年以来一直是苏联工会领导人。② 这两个革命的重要(和被忽视的)人物都是老布尔什维

---

① 《斯大林：诞辰五十周年论文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48页。

② 关于李可夫的正式传记，见《活动家》第2集，第223—230页；Iu·威列夏金：《人民委员会主席》(第3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鲍里斯·弗拉德金：《十二篇传记》(莫斯科，1924年)第34—39页。关于托姆斯基，见《活动家》第3集，第146—150页；B·科泽洛夫：《米哈伊·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莫斯科，1927年)。

克，1922年以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实现工业化的合适结构。他们同布哈林一起将在1928至1929年形成反对斯大林的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

李可夫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和派的最杰出的代表。1924年，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当了总理。他过去是不断地同党的右翼一致的，开始是在1917年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十月的时候他主张成立一个社会党联合政府。他是一个有天赋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领导最高经济委员会，1923年在一小段时间里再次领导这个委员会，从1921到1924年是副总理——他主要搞国家和经济组织的工作。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忠实地和灵巧地贯彻了党的政策，但是(他有一次吐露)他从未放弃过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政治精神。① 他在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中间不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是一个以反对沙皇制度为真正的政治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与其说只同无产阶级有关，不如说是同“劳苦者”有关。他本人是农民出身，李可夫以他“对农民的需要采取热情和关心的态度”著称。②

新经济政策的到来和扩大受到了他的充分赞同，他是这种政策的自然和坚定的主张者。他一直反对搞大型经济项目和以目的论为指导的计划方案，他同意布哈林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规律”指责为“令人反感至极的理论”。这种理论如果加以实行的话会“使社会主义遭到致命的损害”。除了在纲领上同左派相对立以外，他似乎特别不喜欢托洛茨基及其周围的人。③ 没有一个重要

---

① 同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李可夫的姻兄弟的私人通信。关于这段时期，见阿·伊·李可夫：《文章和讲演》(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1928年)。

② 威列夏金：《主席》第22—23页。

③ 引用于瓦连廷诺夫：《右派共产主义学说》第21页。李可夫是瓦连廷诺夫(伏尔斯基)的回忆录《新经济政策》中的中心人物；留斯维克：《我梦想革命》。关于他对托洛茨基的反感，另见他为《为了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导言。

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布哈林，在身上象李可夫那样毫不含糊地体现了新经济政策和工农结合的政治和经济哲学了。到1925年，他在工业和农业上的政策主张，虽然较少理论上的概括，但实际上同布哈林的思想没有什么区别；而在1924—1925年随着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他就成为布哈林的最坚强的维护者之一。①

托姆斯基从1905年起就是一个激进的工会工作者，他是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政治局委员。他代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同的组成部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信奉是不太容易说明的。党由于把城市劳动力看作它的主要支持者，本能地认为工会是党的社会基础的"骨干"。因此，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工会领导人已不再期望他们在革命初期希望得到的管理权力，但他们仍然是一个有影响的集团。他们出身相同，观点一致，他们是党的上层中最划一的成分，是一个自我意识到的"党中之党"。②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是他们的官方领袖和最高的政治发言人。在他周围聚集着苏联工会运动的整个上层集团（它后来在1928至1929年被斯大林全部排挤掉）：G·N·梅尔尼昌斯基，A·I·多加多夫，雅科夫·雅格洛姆，V·M·米哈伊洛夫，鲍里斯·科泽列夫，费多尔·乌加洛夫和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米特。劳动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是由工会工作者控制和担任的。托姆斯基后来曾说过，这些人是"多年来习惯于把我看作他们的领袖的同志。"的确，他们把他当作某种较小的崇拜的对象，称颂他既是工会工作者，又是老布尔什维克，把他作为"体现工会运动中党的领导"的人推举为他们

---

① 关于他的观点，见《俄共(布)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24年）第6—20页；他所著的《农村、新经济政策和合作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43—144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08—417页。

② 杰伊·伯特伦·索伦森：《苏联工会在工业改造的第一阶段的困境》（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第90页。同样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69页；《左倾反对派的纲领》第65页。

在政治局中的使者。①

托姆斯基的观点反映了他们的抱负的高涨、低落和顺随。过去，他曾强烈反对工会的“国家化”，他也坚决维护工会在工业管理中的作用。② 头一个目标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而达到了；第二个目标则于1920年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充分发展，托姆斯基适应了工会的新的双重作用，它是党——国家联系工人阶级的“纽带”，同时又是混合经济中的工人利益的保卫者。他一方面忠于党的政策，同时热情地看待第二个、更有传统的职能。他在1925年写的文章中清楚地表示，工会在双重结构的范围内，应认真地重新考虑工会会员的福利：

“在工会面前经常摆着……一个根本任务。这个决定工会的根本作用和意义的任务就是为提高和改善工会会员的物质和精神水平进行全面的服务和坚持不懈的工作。在整个工会运动的历史中，这个任务过去摆在，将来还将摆在工会的面前。”③

这种理解决定了托姆斯基对布哈林—李可夫的经济政策的支持。他显然预见到了左派的强行工业化和优先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拨款的纲领对工会及其会员将意味着什么。不管他对官方的政策有什么保留，他更喜欢同意逐渐提高消费和实际工资，保留工会尚存的自治权。从1923年以后，他同布哈林和李可夫采取同样的立场；部分地是由于对托洛茨基1920年想使工会军事化和“整刷”工会领导的企图记忆犹新，他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左派的坚强

---

① 《国际报刊通讯》第10卷（1930年）第687页上对托姆斯基的评论；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09—210页。关于二十年代的工会和托姆斯基的领导，见杰伊·索伦森：《苏联工会主义的生和死》（纽约，1969年）；伊萨克·多伊彻：《苏联工会》（伦敦，1950年）；《整个莫斯科》第2卷第201—202页。

②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190—191、121—123页；科泽列夫：《托姆斯基》第81—84页。

③ 引用于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02页。

堡垒。①

第二个考虑也对托姆斯基的忠诚有影响。在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党的团结问题上，工会干部是党内最有世界头脑的一批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17年赞成建立一个社会党的联合政权；同样地他们现在想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周围②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实行和解。他们努力争取达到这一点的高潮是在1925年，其结果是同阿姆斯特丹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并导致了第一次重要的组织上的联合，建立了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唤起了布尔什维克工会干部，特别是托姆斯基的全部热情。他经常去参加欧洲的工会会议，在这个委员会存在的短暂时间中他显露为一个国际人物，他在苏联党内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维护者。③ 这些活动不过是为了同欧洲社会民主党合作而进行的各种探索中最为显著的活动，它们是(我们将看到)同布哈林在国际政策上的新观点是相符的。但这些活动对托洛茨基（在较小的程度也对季诺维也夫)却是根本不相容的，他认为它们进一步证明了多数派的改良主义。这样，对内和对外方针结合在一起，就把托姆斯基完全置身于多数派的阵营里。他在1925年曾专门表示他反对那些对党的经济发言人布哈林"进行诋毁"的人，不久之

---

① 见多伊彻：《苏联工会》第76—79页；科泽列夫的评论：《劳动通讯》1925年第11期第35页。托姆斯基的观点将在第九章进一步加以讨论。

② 鲍·尼古拉也夫斯基：《四十年以前》，载于《社会主义通讯》(1961年2、3月)第27页；他的《中国、日本的革命和斯大林》，载于《新杂志》第6期(1943年)第241—244页。

③ 见卡尔：《社会主义》第3卷第36章；米·托姆斯基：《文章和讲演》第6卷(莫斯科，1928年)；B·弗列特林：《为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的苏联》(莫斯科，1925年)；大卫·E·兰萨姆：《新经济政策俄国的压力集团的政治：工会的例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第4章。

后他又说他“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的外交政策思想。[①]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把他们自己看作政治局多数派内部的单独的集团，这一点无法确定。[②] 但是当时的形势不久就使人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个三人小组。第一，所有三人都是由于坚决拥护特定的政策(正如1928年将表明的)而联合起来的分管不同问题的领导人。第二，在1926年1月选举的九人政治局(在这次选举中加米涅夫降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不受重视的加里宁被提为正式委员)中，他们是多数派中仅有的几个不通过某种方式靠斯大林取得高位的重要领导人。(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早已表明他们是同总书记一致的。)意味深长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每个都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或紧接着在会后公开谴责由一个政治局委员统制一切的原则(“单一的权威”)。这种非难只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已被他的支持者吹捧为与众不同(primus inter pares)。[③]第三，由于个人的、政策上的和习惯上的原因，如果有必要在二人执政之间作选择的话，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有理由选择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为行政管理人员和实际政治家似乎可以成为天然的盟友。实际恰恰相反。有风度和得人心的李可夫在个人品格上完全不象斯大林；他显然不喜欢总书记，而总书记也看不起他。[④] 更重要的是他们领导着相互匹敌的

①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77—279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94页。官方的工会杂志《劳动通讯》也突然开始专门宣传布哈林。见该杂志对布哈林的一本书的评论，载于1925年第11期第216—218页和他的文章，载于1925年第12期第5—8页。

② 雷斯维克的《我梦想革命》一书认为他们早在1924—1925年已是一个集团。

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289、418页。他们的评论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因为加米涅夫向代表大会提出了警告，说斯大林的上升意味着“一个‘领袖’的理论……意味着造成一个领袖。”同书，第274—275页。关于斯大林的支持者，见伏罗希洛夫和古比雪夫的讲话，同书第397、628页。

④ 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116—120、150页。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斯大林嘲笑了“李可夫的……市侩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0—41页。

机构——政府和党，因此常陷入固有的对立局面。托姆斯基和斯大林也不易相处，他们互不喜欢，这大概从1921年就开始，到1928年变得明显起来。① 另外，托姆斯基希望加强工会的独立性，而斯大林则力图增加工会对党的从属性，并把书记处的任命权扩展到了托姆斯基的组织"领地"。最后，托姆斯基越来越小地参与对外活动，使他同红色工会国际（工会国际）的头头梭罗门·洛佐夫斯基发生冲击，因为洛佐夫斯基对苏联工会在国外进行的单方面活动感到不满。② 毫不奇怪，不论是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对斯大林不表示任何公开的热情，而且经常传说他们同他不一致。③ 另一方面，布哈林强烈赞成恢复和保持政府和党在职能上的区分；从1926年开始，他总是热情地赞扬工会在国内外的活动。④

是形势而不是预谋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至少到1926年成为一个不完全明确的但是可以辨认的政治上的三人团。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他们叫做政治局的右派，意思就是说他们（用皮达可夫的讥讽语言，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新经济政策分子"）信奉同左派的政策对立的政策，而斯大林在维护那些政策的时候采取了中间立场，信守他自己的意见，保护他政治上的两翼。⑤ 三个人作为政治领导人是互为补充的。李可夫对经济问题采取的细致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0页；霍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09—210页。

② 卡尔：《社会主义》第3卷，第500、585—588页、592—593页；《社会主义通讯》1925年1月16日，第8—10、15页。

③ 《社会主义通讯》1927年1月15日第15页和1927年7月8日第14页。

④ 见《职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9—23页；《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版。

⑤ 各个方面自然都宣称自己代表真正的"左派"，把"右"这个称号看作是骂人的话。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含义上，"左"、"右"和"中"这些词不具有它们习惯的意义，而用来指明左翼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相应的意见和政见的范围。关于斯大林培植一个中间派问题，见多伊彻：《斯大林》第295—297页。皮达可夫的话，引用于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第164页。

以事实为依据的态度，对于布哈林对哲学经济学的强烈爱好是宝贵的补充，而托姆斯基的支持则有助于消除他们的政策的“亲农民”味道。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有不同倾向的人。托姆斯基当然更欣赏对工会和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直接利益的政策，而显然更少关心农民。不论是他还是李可夫在对外政策上都没有布哈林的革命激情（总理讲话的调子必然不同于共产国际的头头）。正如领导集团内部的所有各“派”一样，促使他们形成政治上的一致性的不是他们的完全一致，而是把他们同别人区别开来的东西。正如托姆斯基后来说明的：“我在国际问题上要比布哈林右三十公里，但是我……要比斯大林左一百公里。”①

政治局的右派还有其他三个突出的特征。左派主要是犹太人，斯大林集团中外高加索的气质越来越多，而右派的主要和第二流的领导人则全是俄罗斯人。虽然人们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但是它的实际政治意义却并不清楚。可以想象，这一事实会对农民的俄国接受各派的程度产生影响。但是事情并不经常同想象的可能性一样。譬如说当政治局的右派处于上升的时候，非俄罗斯民族在苏维埃的统治下享受到了他们最大的自由。② 第二个特征拿来同斯大林相比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以大众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著称。显然是以官僚主义的敏捷处事能力处理工会工作的托姆斯基可能由于他是政治局中的唯一的非党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而得到好处。但是，正如布哈林一样，李可夫也确实受到“群众的支持”。这三个人（写回忆录的人回忆说）常不带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中的引话。（T1897）

② 沃尔特·科拉兹：《俄国和它的殖民地》（纽约，1955年）第9—10、18页。另一方面，有些人曾担心，右派的胜利会带来“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71页。根据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的说法，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被称做“伊万诺维奇”（表明他们是俄罗斯人的称呼），虽然托姆斯基的父名是叫巴甫洛维奇。

警卫到人群中去。① 他们个人的盛孚众望，他们面向农民的和解政策以及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的加里宁（名义上的苏维埃首脑，因而是苏联的主席）代表了主要的非党组织这一事实，加在一起使右派具有受到群众支持，或者渴望群众支持的外貌。有一个观察家曾评论说："他们力图以人民的领导人的面目出现。"②

不管这个印象多么淡薄，它点出了政治局右派的第三个政治特征：他们的领导地位在人民委员会（特别是农业、财政、劳动和贸易）和负责拟定和管理经济政策的其他政府机关（最高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委）中所得到的巨大支持。这些机构在性质上是倾向于回到正统的经济措施上去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又恢复了它们的重要性。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大多是从前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非党专家。③ 尤其是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中工作的一些前孟什维克，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前社会革命党人强烈地喜欢布哈林和李可夫当党的领袖，而不喜欢斯大林或左派。他们的喜恶是建立在两个互有联系的假定上的：右派的经济政策是最可取的；斯大林或托洛茨基如各以他自己的方式取胜，将意味着结束国内和平和恢复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战时共产主义的不容忍态度。他们同情地看待布哈林，但是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人物则是李可夫。他不论作为总理还是作为个人，都以非党专家的保护人著称。④ 他们在苏维埃政府所做的大

---

① 见瓦连廷诺夫的文章，载于《新杂志》第75期（1964年）第174页；米歇尔·吉塔也夫：《共产党官员》（纽约，1954年）第49页；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84—96页。

② 吉塔也夫：《共产党官员》第49页。

③ 见本书第400页注①。

④ 关于那些孟什维克，见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诺姆·贾斯奈：《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纽约，1972年）。两个作者都研究了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被布哈林的农业政策所吸引，而孟什维克们则被他对计划工作的观点所吸引。关于李可夫，另见利伯曼：《建设列宁的俄国》第64—68页。

量工作和所起的巨大影响将会随着李可夫的失去权力而结束。

在这方面，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右翼工业战略中心在1924至1926年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国营经济成分的名义上的经理，它的主要职责是管重工业以及它的发展和计划。李可夫于1924年2月被任命为总理后，秘密警察的头头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成为委员会的主席。他消除了专家们的害怕，成了他们可靠的朋友，而最重要的是他成了布哈林的经济政策的热情宣传者。他衷心相信工农联盟，相信把重工业的增长放在农民市场的基础上和通过降低成本和价格，扩大贸易的办法在国营成分内部积累资金的有效性，他甚至比布哈林还更一心一意地相信这一点。他同意布哈林主义的主要文章，他说："如果我们怕讲农村的繁荣，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①

捷尔任斯基是委员会的有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仍兼警察的头头，他为右派提供了右派的许多其他代表所缺乏的坚强的组织能力。在某些方面，他是多数派在同左派的工业化主义者进行的辩论中最激愤和最有效的发言人，他于1926年7月20日在同反对派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之后数小时去世。捷尔任斯基如果活到1928年的话会不会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站在一起，这只能加以猜测。但是他的去世很快就使右派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堡垒。他的接班人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他热忱地相信大量的投资计划和高速的工业化。在几个星期之内，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哲学和人员就开始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②

---

① 费·埃·捷尔任斯基：《选集》(2卷集，莫斯科，1957年)第2卷第349页；另见第83—84页。他在最高经济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情况是瓦连廷诺夫写的回忆录《新经济政策》一书中的主要内容。

② 见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的回忆录，《新杂志》第74期(1963年)第197、202页和第25期(1964年)第170—171页；A·F·哈文，《掌握着工业的舵》(莫斯科，1968年)第48—49页。

必须看到，右派是在党的机器之外受到很大支持的。除了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大的党组织是明确地同右派的政策和领导人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个例外却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莫斯科，它是党的最大的一个组织。这个时期，莫斯科委员会的政治历史有些不大清楚。虽然它的领导在1923至1924年是忠于三驾马车的，但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是在下级组织中吸引了许多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1917年莫斯科左派的残余势力中。可能由于首都这种令人难堪的领导不力的情况，莫斯科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1924年9月被列宁格勒党书记尼古拉·乌格拉诺夫所取代。[①]

乌格拉诺夫很快上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以及组织局的正式成员，他在以后的三年中使莫斯科成了多数派（和两驾马车）的吵吵嚷嚷的支持者。在1928年，他、他的副书记瓦西里·科托夫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大部分领导成员——E·F·库里科夫、米哈伊·柳京、尼古拉·曼德尔什塔姆、尼古拉·潘可夫、G·S·莫罗兹、V·A·雅柯夫列夫和V·M·米哈伊洛夫——坚强不屈地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领导的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站在一起，并同它一起垮台。[②] 历史学家们曾经认为，乌格拉诺夫原先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代理人，他后来采取反对立场表明他变了心。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说明到1925年莫斯科党的领导就已同政治局右派的政策，特别是同布哈林保持一致。

表明布哈林的经济纲领在首都找到了能异乎寻常地予以接受

---

① 见他的自传，收于《活动家》第3卷第165—176页；他的传记，见《消息报》1928年11月30日第3版；伏罗希洛夫的发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394页。

② 关于莫斯科的领导人，见《真理报》1925年12月15日第7版；《整个莫斯科》第2卷第196—198页。1928年情况稍有不同。柳京、潘科夫、库里科夫和雅柯夫列夫是区的书记，莫罗兹是莫斯科检查委员会的书记，曼德尔什塔姆是市委宣传鼓动部负责人。所有人都是以乌格拉诺夫和科托夫为首的常委会的成员。第九章中将进一步讨论他们所起的作用。

的群众的最初迹象在两驾马车形成之时就出现了。到1925年年中，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的斗争使莫斯科在对列宁格勒的较量中取得了优势，当时反对派暗示说，"亲农民主义"在"乡土气"的莫斯科的抬头决非偶然，他们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路线是同"无产阶级土地的精萃——列宁格勒"的革命传统相一致的。两个城市之间的敌对情绪，一部分是俄国两个首都1917年以前的沙文主义的重演；一部分是由季诺维也夫煽动起来，他在1918年曾经反对把首都迁到莫斯科去，现在他发现他自己同党和国家的中央机构的联系被割断了。①

但是，这也有它的社会学的基础。在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坐落着全苏联五分之一以上的工业；但这一地区的总产量中轻工业占到百分之八十四(1926年)，其中包括差不多占全国一半的纺织产品。莫斯科的工业从1921年以来相应地急剧振兴起来了，它的工资是全国最高的。这种情况同列宁格勒是鲜明的对比，那里的主导工业是钢铁，四年来对消费品生产的强调对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虽然莫斯科人口头上讲要"把印花布的莫斯科变成钢铁的莫斯科"，但很清楚，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工业纲领对他们的城市是有利的。② 乌格拉诺夫反对第聂泊水电站工程，反对最终把巨额投资转向重工业，这并非偶然。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常用的责难是说他们"把'印花布的莫斯科'理想化了"。③

莫斯科委员会在工业上的倾向是以一种间接的但是明显的形式，完全符合于托姆斯基及其工会的主张的，这表明了政治局右派

---

① 伊万诺夫：《党的斗争史》第36、75页；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154页和第2卷第52—59页。

② 《莫斯科组织历史纲要》第395、429—430、439页；卡尔：《社会主义》第1卷第344—345、376页。

③ E·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历史》第2卷(莫斯科，1933年)第296页。

和莫斯科之间的一个次要的关系。乌格拉诺夫是在1921年以后作为书记同党的机关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他原先也同样是（如果不是更显著的话）搞工会工作的。① 他过去同托姆斯基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人们说他们的友谊在1928年是起作用的一个因素，据说他曾宣告说，托姆斯基只要活着，一生都可领导工会。② 还有，虽然托姆斯基的几个副手（象托姆斯基本人和乌格拉诺夫一样）是在列宁格勒开始他们的早期生涯的，但是许多工会领导人却是莫斯科人。一个人是米哈伊洛夫，他是重要的莫斯科省工会主席，也是乌格拉诺夫的莫斯科市委常委会的正式委员。另一个是梅尔尼昌斯基，他是纺织工会主席。莫斯科党的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人党员都是这个工会的会员。③ 这种个人的和组织上的联系网究竟是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或者只是偶然的，这并不清楚，但是到1925年在莫斯科已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看法（敌人称之为"印花布"观点），这是清楚的。

但是，在互相忌妒地争夺权威和各个"领地"彼此抗衡的政治中，要紧的是同列宁的后继者的关系。布哈林同他出生的城市（他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生涯并在以后上升到有权力的地位）继续保持互相特别尊重的关系，这一点通过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得到了反映。这表现在布哈林常提到这一个或那一个"莫斯科可引为骄傲的功绩"；表现在用他的名字来重新命名莫斯科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一条街道、一个电车库、一个公园和几家工厂；表现在布哈林充当莫斯科苏维埃的"荣誉代表"的个人名望。④ 这里反映的远不

---

① 《活动家》第3卷第165—176页。

② 瓦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09页。

③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837页；《真理报》1925年12月15日第7版；《活动家》第2卷第27—32页；卡尔：《社会主义》第2卷第56—67页。

④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320页。关于用布哈林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是偶然的感情。从1924年12月到1927年11月，布哈林在莫斯科的正式集会上至少作了十四次讲演，其中十二次是向莫斯科党和共青团的重要会议讲的，而且讲的都是党派性的和有争论的政策问题。

由一个在莫斯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位的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这样一个城市里（这个市的领导可邀请居住在那里的许多政治局委员去作讲演），作这么多重要讲演，这是不寻常的。（在同一时期内，斯大林只在四次莫斯科的会议上作过讲演，而且有一次显然是没有正式邀请的。）⑤ 一个表明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布哈林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政治关系的例子，是1925年12月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几天召开的莫斯科省党代表大会。布哈林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完全以个人名义作的讲演，他重申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和这一政策造成的某些社会主义的进化，同时对几个向他的思想权威提出挑战的列宁格勒人进行了指责。⑥ 莫斯科的会议后来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和一封致列宁格勒组织的公开信。这些文件放在一起等于是为布哈林和布哈林主义作前所未有的、范围很广的、逐点的辩护和肯定。有一段话甚至采用了他的理论商标："列宁……清楚地着重指出了由合作社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布哈林的农业理论的关键，这是在中央的决议中未曾出现过一个有争议的提法。莫斯科党的领导对它毫不含糊地表示认可，标志着那个组织的公开思想开始具有明显的布哈林主义的

见《整个莫斯科》第2卷第116、278、308、488页和第3卷第611页。关于莫斯科苏维埃，见《真理报》1923年5月13日和1929年3月17日第3版。

⑤ 这一计算是根据《斯大林全集》收集的讲演作出的；另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9—140页。

⑥ 《三篇讲演》第15—40页

倾向。①

莫斯科没有重新成为布哈林的管辖区或“领地”。看来，这个城市的领导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党内的半自治力量，而不是某个个别领导人的仆从（在他们面前摆着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统治的例子）。乌格拉诺夫依靠他自己的资格成为一个有力的重要人物，他有几个副手参加了中央委员会。象那时候党的许多书记一样，他们不是斯大林的工具，而是独立思考的人，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掌握他们自己的方向。② 但是尽管莫斯科有半自治权（也许可同工会的自治权相比），他们倾向于布哈林和右派，这看来是清楚的。他们的一致主要是由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而不是由政治上的庇护关系（这是斯大林集团的特点）决定的。他们当斯大林在党内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也避免颂扬总书记，而只称他为“党的工作人员之一、领导人之一。”③ 当政治局右派和斯大林之间的决裂终于到来的时候，乌格拉诺夫将属于甩下手套，进行挑战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如果不说他是第一个人的话。

在1925年和1928年之间，由于有一批盟友聚集在布哈林的政

---

① 这些文献出现在《新反对派》第36—40、44—50页上。它也用许多其他的方式附和布哈林。青年布哈林分子大概在莫斯科党的宣传部门中特别活跃，他们或者通过《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或者通过同莫斯科党密切合作的红色教授学院进行活动。关于后面这种关系，见V·策伊马尔和P·波斯彼洛夫：《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红色教授学院》，《真理报》1931年12月1日第3版；阿斯特罗夫：《峭壁》第77、194、220页，鲁道夫·施莱辛格在《苏联研究》(1960年4月）第406页上也指出了布哈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② 见乌格拉诺夫的讲话，《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93页。除了他本人以外，科托夫、库里科夫、米哈伊洛夫和K·V·乌哈诺夫是1925年12月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到1927年12月，柳京和另一个莫斯科人V·I·波朗斯基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③ 乌格拉诺夫的讲话，《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3页。另见柳京对布哈林的赞扬，《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4—156页。

策的周围，由于同斯大林的权宜的结合，由于因其他三个列宁后继人的变节（然后是被开除）而造成的真空，所以布哈林就上升到很高的领导地位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三年中，他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作为一个统治者的特色，而在其他方面则要逊色得多。尽管他最终是让他的威信助长了那些卑鄙的和使他自己遭受失败的行动，但他既不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蓄意滥用权力的人。只要问题涉及到广大群众，他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现代化作用和与之伴随的"伟大责任"的概念就引导他去提倡一种仁慈的党的统治形式。他要求党员"用这种负责的精神"反复教育自己，要懂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的血肉——劳动人民所处的艰难状况……"他知道，热爱人民并不总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党的思想状态："我们不管地位高低，都必须在我们身上培养为群众的感情……经常地、永不间断地关心群众的感情……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培养我们的责任感。"①

从社会生活的另一个标准来看，布哈林担任统治者的时期是同苏联党内外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巨大高涨恰巧是相合的。他并不是这一思想文艺高潮的唯一保护人，但是他的高级领导地位保证官方在二十年代对它采取容忍态度。他是文艺和科研成就的有见识的庇护者，是同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米哈伊·波克罗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伊万·巴甫洛夫等不同类型的人保持良好关系的罕见的党的领导人。党的知识分子把他看作自己人，他是一个对多样化和创新不抱怀疑态度的政治巨头。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他相信真正的学习，他嘲笑那些"死背《资本论》第一卷……但如被问及瑞典在何处时会很容易把它同北非相混"的人，

① 《青年近卫军》1926年第2期第86页。《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200页；《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真理报》1928年1月27日第5版。

说这是"丑恶的……'犹太教法典研究者'的偏向。"① 布哈林的一条功劳是，他警告（虽然后来情况表明这是徒劳的）人们不要让政治斗争的尖锐和枯燥乏味的形容词渗入和损伤党的文化思想生活。②

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专家或诗人也没有理由对他感到害怕。除了他曾保护过他们中间一些人特别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以外，他对他们的追求和探索采取容忍态度，如果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作为个人他是欣赏他们的成绩的。③ 他很不喜欢谢尔盖·叶赛宁在诗歌中把"俄罗斯农村的最消极的面貌"加以理想化。然而他懂得这位诗人是受群众喜爱的——"在共青团员的《一个共产党的同伴》这本书下面放着一小本叶赛宁诗集这种情况极为经常"——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提供的是惊人地单调的思想食粮……这种食粮会使不习惯的人很快就感到头疼。"他指出，党的作家"没有象叶赛宁那样扣住青年的心弦。……"他坚持不懈地反对对文化实行严格管制，而探求人道主义的共产党艺术，"对这种艺术来说人道并不是异己的东西。"他说"我们不需要会走路的偶像，即使是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也罢，这种偶像认为必须去吻机器或者建立可怕的'都市主义'……"④

正如他的敌手所以遭致失败一样，布哈林最后就失败于他不愿意或不能够把同样的认识和容忍态度扩展到他在党内的对手身上去，失败于他在思想上强调苏联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性

①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26页。

② 可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11期(1925年)第292页。他为了反对这些倾向，曾在1927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可以并需要进行讨论，但不是用那些实质上很少符合现实和政治上显然有害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引用于《真理报》1930年8月24日第5版。

③ 关于他不断起的保护人或"说情者"的作用，见本书第546页注①。

④ 《辛辣的札记》，收于他的《探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32年)第204、207—208页。这篇文章最早刊登在《真理报》1927年1月12日。

应由党内的某种有效的不一致性相伴随。从两驾马车开始之时起，布哈林就对党内斗争中的惩人的做法和它们的方向感到担忧。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于1925年12月举行的一次会上，布哈林表示赞成斯大林对列宁格勒人采取组织上的报复措施，加米涅夫在会上愤怒地评论说，布哈林在1923至1924年是反对对托洛茨基采取类似措施的。托洛茨基从他的座位上说："他已开始乐于这样做。"布哈林几天之后在一封信中答复说："你认为我已'开始乐于这样做'，但是这种'乐于'使我从头到脚打颤。"① 他尽管有保留，但当时还是支持了报复措施，这或许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为一连六个月，季诺维也夫分子把他专门作为粗暴攻击的对象；他毫不夸张地抱怨说，他们根本不顾"起码的公正"，"空前地折磨我"。他感到"十分厌倦"、沮丧和愤怒。他知道，过去曾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季诺维也夫如果获胜，他是不会更仁慈的。②

但是对布哈林仍然持有的克制态度的真正检验是他同托洛茨基的关系(因为季诺维也夫会使每个人都感到无法克制)。他勉强地参加了1923至1924年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他对他并无个人的敌意，没有仿效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恶毒和低级"的攻击；他曾在私下要求让托洛茨基仍留在领导集团里，一再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把他从政治局开除出去或更坏的主张。③ 从那时以来，他们之间没有多少来往，因为托洛茨基是在旁边观察1925年的争论的。现在在1926年初的两次发言中，可能是为了劝说托洛茨基不要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搞在一起，布哈林提醒他过去他自

---

① 引用于1926年1月6日托洛茨基写给布哈林的一封信(T2976)。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49—150页；《第六次全苏列宁共青团代表大会》第243页；托洛茨基的信中所引布哈林的话(T2976)。

③ 关于他私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忆，见阿斯特罗夫《峭壁》第294—295、310—312、317页。

已所持的克制态度，告诉他“我总是反对……说托洛茨基是一个孟什维克。当然，托洛茨基不是孟什维克……党对他是很感激的……”① 与此同时，这两个人之间有一段私人通信。这段通信是由布哈林在1926年1月开始的，他写过几封坦率的信和几张条子，但只持续了三个月，到托洛茨基同过去极力贬低他的那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时为止。那时这场派别斗争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了。

这段通讯是暴露真情和委婉动人的，说明两个老同志彼此仍能保持热忱的友情，但是已不能取得最细小的真正的政治上的一致。这些信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倒霉的经历的一个缩影。布哈林要求托洛茨基重新考虑 1925 年中争论的革命的“重大社会问题”。可是，托洛茨基只想讨论党的官僚化问题。他坚持说：“你想一想吧，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竟同时并一致地（想一想，是一致地！）……通过了两个互相针对对方的决议。”他认为这说明他提出的关于“机器恐怖制度”的警告已被完全证实。另一方面，布哈林却要托洛茨基考虑那个决议在其涉及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是正确的。②

谁也不能转过来考虑对方认为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当托洛茨基要求布哈林对掺入到官方的反左派运动中去的反犹太人的诽谤进行调查时，这段通信就终止了。布哈林是否回了信（他是公开批评苏联的反犹主义的），没有任何记录。③ 他们之间重新恢复起来的友情，继续保持了几个月的微弱的影响，各方都没有采取中伤对

---

① 《列宁格勒组织》第 108 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第 4—5 页。

② 这段叙述所根据的有关这段通信的唯一记录是托洛茨基档案中所保存的托洛茨基于 1926 年 1 月 8 日、3 月 4 日和 3 月 19 日写给布哈林的三封信的副本。

③ 托洛茨基后来推测“斯大林绝对禁止他这样做”，这同一些证据是完全不符的。关于布哈林对苏联的反犹主义的种种指责，可见《真理报》1927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和 1927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1928 年 3 月 5—16 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28 年）第 24 页。

方的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尖锐的派别斗争把他们两人全都吞没了；到1927年他们的关系降低到只是交换几句"说谎……诽谤……热月"之类的叫喊。托洛茨基现在从党的官僚机器的背叛的角度去看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眼中，布哈林成了最大的背叛者，他认为"小小的布哈林膨胀成了一幅巨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画。"至于布哈林，他最后提出了究竟托洛茨基曾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问题，并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①。

布哈林在考虑1925年以后的反对派问题时，他的思想是屈从于一党制哲学的内在逻辑的。他在1926年劝告左派说："可以坚持你们的原则，维护你们的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可以争论，但是不要组成派别。可以争论，但是一旦作出了决定，就应服从！"因为"如果我们让这样一个派别在我们党内合法化，我们也就是让另一个党合法化……我们在实际上……就脱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是使人无法接受的规劝，因为他的对手也希望"为……他们的政策而斗争"，为他们一伙人斗争；布哈林自己曾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会为处于少数而高兴的。"②

这样就出现了划危险的等号的现象，就是认为坚持不同意见就等于搞派别、搞第二党和最终搞反革命，这造成了1925年以后使老布尔什维克们遭殃的许多政治丑闻和肮脏事。这促使布哈林在一阵激烈地想把反对派开除的感情冲动中，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违背他自己的一贯思想，要求反对派认罪："到党面

---

①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69页；布哈林：《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联席会议的总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23页。关于他们在1927年底进行对话的例子，见《第十四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前夕的党和反对派：讨论材料选集》第1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第67—69页。

② 《党和反对派集团》第79、89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42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第63页。

前来低下头说：请宽恕我们，因为我们犯了反对列宁主义的精神，反对列宁主义的文章和反对列宁主义的实质的罪。"他已忘记他对他们的原则作过的让步。"说吧，老老实实地说吧：托洛茨基是错的……为什么你们没有普通的勇气出来说那是错误的呢？"甚至斯大林对此也有深刻印象，他说，"做得好，布哈林，做得好。他不是在讲话，他是在揍人。"虽然这不是典型的，但这可能是布哈林一生中最糟的时刻。①

当然，他同反对派关系恶化的另一面就是他同斯大林的合作。虽然已有一些预示他们未来分歧的隆隆声（包括斯大林越来越强调经济上自给自足和军事上安全的头等重要性，对布哈林争取重新把欧洲和亚洲的革命的群众支援活动联合起来的努力表示不感兴趣），虽然布哈林迟至1927年还不愿意相信斯大林对反对派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但是两驾马车还都能相互容忍。② 在政治历史上，有时需要参加看来最不可能参加的同盟，把一些在性格、价值、天赋和抱负上几乎完全不同的领袖联合在一起。

希望档案材料将有一天会说明全部历史，当然这是一段复杂和痛苦的历史。（有一些零碎和无法作出结论的证据，表明在1925或1926年曾有一个计划，想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而让捷尔任斯基取代他，这个计划大概牵涉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③

---

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599、601页。在十一月以前他曾说："我从未要求季诺维也夫公开谴责他的错误"，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0页。多伊彻把这描写为"布哈林的奇怪的、几乎是可怕的做法"，《没有武装的先知》第305页。

② 见布哈林的评论，《真理报》1927年1月15日第3版。有一些证据表明斯大林在1927年夏天或秋天想把左派开除出党，但未成功，遭到了政治局右派的反对。见夏皮罗：《共产党》第304页；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355—356页。另外，斯大林1926年10月8日写的一封奇怪的信，批评斯列普柯夫在最近的论战中对托洛茨基太宽容。《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85—186页。

③ 关于这样一个计划的情况，是由已故的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于1965年向我提供的。他是从一个曾在二十年代居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员那里得到的。更近一

但是在1925年年中，当斯大林表示不同意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时，两驾马车的关系开始摇晃了一下和两个青年布哈林分子发表了有关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④，两驾马车对外表现出每方都维护对方的团结姿态。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是反对派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到1925年12月，斯大林促使布哈林放弃了认为富农的危险“不值得注意”的轻率说法，他接受了布哈林的主要提法，即认为更为严重的偏向是过高估计富农的危险，而不是过低估计这种危险。这使季诺维也夫分子相信，他已成为布哈林的“政治路线”的“不折不扣的俘虏”，从此以后，他们就把两驾马车当作一丘之貉对待。斯大林当然没有阻止对方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他说，“你们要布哈林的血吗？我们不会把布哈林的血给你们……”⑤ 事实上，反对派究竟要谁的血，这从来就是不清楚的。

即使不去考虑曾讨论过把斯大林排挤掉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布哈林不是无条件地或者不是没有忧虑地同他站在一起的，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继续公开批评弥漫在党的生活中的专权主义和党的负责干部的行为。他不断谴责“共产党的特权集团”的“独断专行”和“无法无天”，这些指责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斯大林管理党的机关的情况。正如他在1926年3月提出的指责中所说的，他认为党的权威正在“沿着军事统制和军事纪律的路线”形成自己的模式，他反对“把我们的党变成这种统治集团制

些时间中，出现了一些同样简略的和难于肯定的证明，见阿斯特罗夫：《峭壁》第217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50页。阿斯特罗夫是一个重要的布哈林分子，他有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证据为以下事实所削弱，即他的证据出现在一本小说，而小说写到真实的事实时，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靠的。麦德维杰夫是可信的，但他的书中只是摘引了“某些报告”。在这方面，两者都没有提到布哈林；但是如果确有这样的活动的话，他无疑会是一个主要参加者。

④ 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503—504页；《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8—130页。

⑤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7—48、504—505页。

的趋向。"[1]此外，布哈林早在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斯大林个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大林除非得到别人所有的东西是不能罢休的。他是从来不会放弃这一条的。"他"对比他知识更多，工作做得更好的任何一个人都极为忌妒。"当总书记的其他政敌一直把他错看为"不过是一个小城镇的政治家"和"党内杰出的平庸之辈"的时候，布哈林显然意识到助长斯大林的个人野心的内在因素。[2] 这一点应该使他警觉到他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卓越的理论家"的危险。但是他究竟是否警觉到这一点，或者他在1928年以前是否知道他的盟友是"一个把一切都服从于保持他的权力的需要的无原则的阴谋家"，至今还是不清楚的。[3]

但是布哈林要坚持这个联盟，看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他仍然不承认任何"个人的憎恶"，坚持在每一轮党内争论中"有时用秘密的形式，有时用公开的形式"。他认为处于危险中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他相信——而且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服从于这一点——他和左派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纲领分歧"，他认为革命的命运处于成败未定之际。[4]

反对派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论战中，他们把党的干部推行的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政策都紧紧地同布哈林的名字连在一起。这样就需要布哈林同斯大林的联盟以保证多数派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并消除"我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中是一匹白马的

---

① 《第七次全苏列宁共青团代表大会》第 257 页。

② 引用于托洛茨基的《我的一生》第 433、450 页。关于其他的意见，见同书第512页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第 393 页。斯大林在私下早已暗示他认为他自己是"站在国家顶上的一个人"。这句话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 325 页。

③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987)。

④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 3 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133、134 页；《捍卫》第 241 页。

印象。”[1] 从1926年以后，种种责难和分歧，不管是在中央的还是边远地区的，更扩散了，争论越来越在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的气氛”中进行（有人说，斯大林有意制造这种气氛，以便防止右派和左派之间之接近）。[2] 和解的余地和愿望越来越小了。因此，当布哈林在1926—1927年修改他的经济纲领，从而看来缩小了他同左派的距离的时候，后者早已把他们的反对意见和忿懑情绪移到对外政策上，而在这方面取得共同认识的机会就更小，感情上的冲动甚至更大。

①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第181页。

② 《社会主义通讯》（1962年7—8月）第119页。另见苏瓦林：《斯大林》第426页。

第 八 章

温和政策的危机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13:11)》

从 1924 到 1926 年，布哈林曾经用一种非常笼统、常常是抽象的语言来谈论经济政策问题。他热衷于研究理论问题，而且以阐述理论问题为乐趣。然而，他之所以喜欢抽象的风格，主要是因为他决心在经济、政治和伦理（前面已经论证过的）方面为苏联工业化和执政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立下总的原则。他倾向于从哲学角度谈论经济问题，因为他不愿意把经济问题同工农结合这一范围更大的哲学问题分隔开来。在谈论政策问题时，他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过这种态度，他往往把叙述细节和统计数字这类事宁可留给李可夫去做。但是从 1926 年开始，布哈林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显然比过去更为实际、具体并且注重于解决问题了。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反映了一种实质性的变化，是同他重新思考并且大大修改自己的政策相一致的。这种变化开始出现于 1926 年春天并贯穿于整个 1927 年。在 1926 年春天，布哈林开始

意识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论断是有缺陷的，有些正在变得陈旧。过时；而到1927年，他就把自己的新的主张阐述得更加充分了。布哈林的这种变化在1927年1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点。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体现了他和他的伙伴的经过修改了的纲领，反映了他们对苏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认识。

布哈林强调这些变化并不表示他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己在1924至1926年间阐述的那些原则，事实的确如此。实际上，他比过去加倍地强调工农结合问题的全部"历史真理性"和他对左派的经济政策的各种反对意见。他的修正了的思想，仍然完全停留在新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仍然同从前一样，要求保持一个比重大的私有经济成分，允许农民个体耕作，允许私人积累财富，并普遍保持市场关系。然而，修改后的纲领同他原来的纲领相比，还是有重要改动的。它不再强调充分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而是主张通过有计划的投资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国家干预，加强对私人资本的管理和改造农业的生产基础等。

当时苏联的工业状况是促使布哈林第一次公开表示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的原因。到1926年5、6月间，布哈林和其他官方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国营经济所面临的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第一，现有工厂的生产能力几乎已经达到顶点，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动员"未加利用的资本"，而是要获得"新的资本"。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要"通过我们的经济机体……加快血液循环"，而主要是要扩大"机体"本身。[①] 第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经说过，苏联的经济痼疾是工业品匮乏而不是消费者需求不足，布哈林逐渐认识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个话是对的。起初，布哈林把商品

---

① 见布哈林的评论，《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版；《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258—267页。

荒看作是一阵暂时性的"发作"，是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紧急抛出国内商品和进口的制成品加以克服的。但是不久，他就开始意识到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性问题来对待。不过，布哈林并不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认为商品荒是无法解决的，或会灾难性地破坏平衡的。他认为这个问题会逐年缓和下来，他说，它实际上好象是人身上的一点小毛病，反映出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在扩大，这同供过于求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既然需求和消费是工业化的推动力，那么，过份的需求即使令人烦恼，也应该是一个积极的症候。①

虽然布哈林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认识是同他对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所作的乐观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懂得，这两个问题威胁着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尤其威胁着他提出的在国家工业和个体农业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的纲领。到 1926 年秋天，他针对"恢复时期"结束阶段的提法，干脆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的概念，并且说这个新时期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和各种复杂的情况。后来他又反复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期"的这种转变，意味着新的工业建设再也不能拖延了，现在需要"扩大生产基础……建设……新的企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建设。"他一反过去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提醒人们说，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他提醒党说，那种仅仅使停产的工厂恢复生气的轻松年头已经过去，以后要提高工业产量就得比过去付出更大的代价，费更大的劲，而且速度不会象过去那样快。②

总之，布哈林现在同意需要有一项工业投资计划，这个计划在

---

① 见《列宁格勒组织》第 114 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12、19—20 页。他在 1928 年又重申了这个反对斯大林的论点。见《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3 页。

② 《建设社会主义》第 2—4 页；《国际报刊通讯》第 7 卷（1927 年）第 195 页。从此以后，他经常强调前面的困难。

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二十年代初期的投资计划。首先，必须大大增加开支。其次，资金的分配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主要地由市场来决定而让重工业落在后面。布哈林和其他领导人现在认识到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扩大和改造现有的工厂，他们担忧冶金工业的呆滞状况会阻碍上述任务的完成，并且从1927年年初开始越来越担心会爆发战争。这些情况使他们同左派的立场大为接近，左派的立场是：重工业迫切需要巨额投资。然而，布哈林是谨慎小心的，他坚决认为这个雄心更大的投资计划必须经过周密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平衡：

"我们认为，那个要求对重工业作最大限度的投资的方案不是很正确的，或者说，是很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必须着重强调发展重工业，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把这种发展同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结合起来，因为轻工业周转快，盈利快，赚回本钱也快。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必须争取把发展重工业同发展轻工业最合理地结合起来。"

必须用这两条指导方针——按比例地发展轻工业和严格避免把过多的资金冻结在那些花钱多，耗时长的项目上——来控制对新建项目的投资和对现有企业的投资。① 布哈林希望，国营企业生产的消费品的稳步增长，加上私有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将能缓和建设时期的商品荒。他指出，左派提出的那种"只顾一头的方案"只会使商品荒加剧。②

诚然，布哈林重新安排了发展工业的先后次序，但他在自己的纲领中仍然要求注意工业的渐进的和平衡的发展。③ 同从前一样，

---

① 《捍卫》第225页；另见第223—224页。关于他反对把资金冻结起来的警告，见《真理报》1927年11月24日第4版；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80—83页。

② 关于小手工业生产，见布哈林的话，引用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370页；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84—85页。

③ 见《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阶段》，载于《真理报》1927年1月21日第2页。

这个纲领在速度问题上是模棱两可的，而速度问题到1926年11月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那时苏联领导集团决心要“在相对来说最短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布哈林也说：“这是可能做到的。”① 反对派认为布哈林的这句话否定了他自己在1925年讲过的要用“蜗牛般的速度”前进的那些话，虽然布哈林始终主张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应当超过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确，布哈林之所以会在1926至1927年间调整自己的想法，一半是因为他已经相信：“我们前进得太慢了。”② 但是，苏联领导集团提出的这个新的口号，后来使整个经济部门陷于极度的“紧张状态”。这个口号所造成的气氛和产生的心理作用是不利于进行谨慎和均衡的投资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害怕帝国主义会在1927年对苏联发动战争——这种忧惧在多数派和反对派在1927年1月以后发表的言论中屡有反映。布哈林自己对“战争危险”的担忧在那年夏天和秋天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告诫人们说，苏维埃政权的喘息时间有可能骤然终止。③ 由于他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来重新分配资金，而这样又势必会对他所期待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在他（或者其他任何人）看来，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究竟多快才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点是从来不清楚的。

然而，总的来说，他现在坚决主张看得远点和采取会使经济增长率逐年“曲线上升”的政策。④ 他并没有设想突然急剧地扩大工业部门，这从他对待城市失业问题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到

---

① 《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471、585、775页。

② 《建设社会主义》第63—64页。

③ 见《真理报》1927年1月15日第3版，1927年6月18日第3版，1927年7月5日第3版；《关于全会联席会议的总结》第4—5页。

④ 《建设社会主义》第62页。

1927年，苏联的失业问题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成为有利于"主张超工业化的人"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但是布哈林告诫他们不要采取"片面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再次提出，在适当地发展工业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中包括使农业逐步实现工业化和提倡密集使用劳动力的耕作方法。对那些主张把工业扩大到足以吸收城市全部剩余劳动力的人，他回答说，"这样的扩大势必达到那样大的规模，那是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可能要求的"。① 因此，直到1929年他被剥夺了发言权为止，他对他的对手提出的发展工业的主张所持的反对意见，并不集中在有没有必要大大增加新的建设项目上，而集中在他认为是"疯子"提出的过高指标上，不管这些"疯子"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是斯大林分子。②

布哈林既然接受了大量开支是不可缺少的思想，就不得不重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怎样才能筹集到充足的资金来实现工业化……？"③ 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原先的纲领并没有作任何重大的修改。他争辩说，三个国内资金来源都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他看来，首要的来源仍然是国营工业和其他国有化企业的剩余利润，因为他认为，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的主要经济方针……就是要(通过降低零售价格)加快商品的流转。"如果说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的话，那末这些思想的产生是同苏联政府在1926年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国营企业的成本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的产量而掀起的"节约"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布哈林对这场运动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

① 《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421页；《捍卫》第224—225页。

② 这是他在1928年对斯大林的政策的称呼。《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页。

③ 《真理报》1927年11月24日第3页。另见《建设社会主义》第2页。他在那里把这问题叫做"一个难啃的硬果"。

可在建设时期帮助积累足够的资金。他一再强调，这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减少生产、管理和行政费用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技术，使“经济合理化”。① 他指出，与此同时，还要采取措施使“（商品）流转合理化”，以便消除国营和合作社销售部门中的非生产性耗费，缩小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之间的“剪刀差”。②

其他两种资金来源虽然从政治上考虑受着更多的限制，但是布哈林还是相信，这两种来源也可提供更多的资金。1926年，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征税，比过去更高，计算得更加苛刻。同时，国家还准备采取有力措施来提高人们对国家和合作社银行以及对卢布的信心，以便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私人储蓄。③ 最后，为了筹集到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布哈林对争取外援的可能性也讲得比过去更多了，但是由于苏联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关系的恶化，这种前景很快就化为泡影。④ 结果是，布哈林不得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国内资源上。他在192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讲话中，预言苏联将面临一个勒紧裤带的时期，但是他同时也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如果现有的资源能够得到谨慎的安排和合理的使用，那么，即使没有外国贷款，即使不向人民群众勒取苛刻的贡款，苏联也有可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他说：“我们声明而且我

① 见《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4页，1927年2月2日第3页，1927年11月24日第3页；《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反对派》第62—63页；《捍卫》第224，226—228页。

② 见《真理报》1927年1月15日第3版，1927年2月2日第3—4版。

③ 关于第一个来源，见他写的《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载于《真理报》1927年11月7日第2版；《捍卫》第210—211，215，229页；《真理报》1927年11月23日第4版。关于第二个来源，见《全苏列宁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255页；《捍卫》第224页；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86页。

④ 见《真理报》1926年5月28日第3—4版；《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第1421页。

们相信，只要做到……合理化、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和把城乡日益增加的储蓄汇拢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①

布哈林对他的工业纲领所作的每一次修改，都指出了制定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只有制定经济计划，才能保证实现人们所希望的经济发展的格局和速度，才能最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但是布哈林从来没有停止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因为这从意识形态上讲也是有吸引力的。布哈林过去对制定经济计划所持的反对态度，主要是对有人过份强调战时共产主义原则和对左派要求制定单独的工业发展计划的一种反应。现在他转而对制定比较全面的经济计划的好处抱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1927年，他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酝酿着为整个经济制定一个五年计划的想法。在该年 12 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方针”，而不是实际控制数字被提出来了，并且得到了批准。大会决议中没有规定实际数字，这一点在 1928 到 1929 年间成了一个大问题，那时，布哈林分子同斯大林分子之间对代表大会究竟通过了什么样的目标发生了争论。布哈林早就意识到有些布尔什维克“以为计划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②所以他在那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就曾试图勾划出什么是“真正的”计划的含义。

布哈林对“真正的”的计划的理解，包括三个互有联系的基本主张。第一，指标数字应在科学的统计基础上加以计算，它们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仅仅根据理想……把一些设想出来的数字拼凑在一起”。第二，在制定和执行计划指标时，“心里一定要记

---

① 《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24 日第 3 页。

② 这是他在 1928 年对斯大林主义的计划工作者的特点的评价。见《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3 页。

着我们的五年计划只是一个大概的计划”。应该把计划指标看作灵活的指导方针，而不是由上面硬性规定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需执行的强制性指令。计划指标应该在每个年度的农作物产量和粮食收购量等方面允许有个伸缩的幅度，应该允许“实际生活可能提出的各种修正”。第三，计划所依据的根本发展思想应该是严格保持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即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以及计划产量与预期的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需求之间的必要的比例。为了保证使经济发展“多少能够免于发生危机”，不致造成比例失调和生产流程阻塞的恶性循环，每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数字都必须预先考虑到留有余地并以形成财力和物力上的后备为目标。①

布哈林心目中的计划是以经济均衡发展和“非静止的经济平衡”为基础的。可是他只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1928至1929年间，同各种不同的“疯子”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才充分阐明了他的经济计划思想，并试图教育全党接受这一思想。这可以说是他的终身憾事。然而当1926年他开始对计划工作重新发生兴趣的时候，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另一个问题展开的争论中，他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主要想法。我们还记得，当时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他们都同意，价值规律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至于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里究竟什么规律（如果有的话）将在经济中取代价值规律，对这问题他们是没有作出回答的。后来，普列奥布拉

---

① 《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369，1421页；《捍卫》第219—225页；《真理报》1927年11月24日第3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多少能够免于发生危机的发展”的目标，布哈林在1928年维护了这个目标。见《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他在那里也发挥了“基本经济比例”的意思。

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他坚决认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已经在苏联的国营经济部门中起着调节作用，并且正在同私营经济部门中占优势的价值规律进行着激烈的竞争。[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规律给许多人造成的印象是，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调节者"，而容易导致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因此他很容易遭到人们的指责。早些时候人们对布哈林写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也进行过同样的指责。

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至少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调节者，而布哈林这位布尔什维克经济理论的老前辈在1920年却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926年7月，布哈林试图弥补过去的疏漏，他驳斥了自己过去的合作者。他含含糊糊地吸取了马克思的思想争辩说，实际上一切经济制度都是受同一个调节者支配的。他称这个调节者为"按比例支出劳动的规律"，并且解释说这是"保持经济平衡的总的普遍规律"。他以他自己从历史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这个论断又作了解释。他说，他讲的这个规律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它给自己披上了价值规律这个拜物教式的外衣"。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随着计划原则的发展，它才"摆脱了拜物教的外衣"而使自己合理化了。因此，布哈林的结论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有两个互相对抗的调节者在起作用，而实际上，在苏联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是"价值规律转变成劳动支出规律的过程，即社会的基本调节者摆脱拜物教外衣的过程。"[②]

---

① 见他的《新经济学》。

② 《真理报》1926年7月3日第2—3版。关于布哈林的这一思想的发展，见《新经济学》第4章和《为了列宁主义》第310页。它来源于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页(英文版)。这个问题对布哈林主义的重要性，可从爱恒瓦尔德在他所著的《苏联经济》一书的第22章的论述中看到。

这里处于严重关头的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布哈林强调指出，客观的经济条件还继续存在，他坚决认为，那些把制定计划想象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人所持有的“经济未来主义”是既危险又愚蠢的。他详尽地阐述了“劳动支出规律”，把它作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上的反驳；但是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他所理解的这个规律的基本原理，尤其是1928年当斯大林底下的计划工作者建议用剥夺农业的办法来增加工业积累的时候，他更是如此。他说：

“价值规律可以演变成……任何东西，但就是不能演变成积累规律。积累规律本身需要有另一个规律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在那个规律的基础上‘起作用’。那个规律究竟是什么——是劳动支出规律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对我们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如果老是不能收回生产成本和相应于一部分剩余劳动的，并适于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的一定的增值额，那么它就会不是出现呆滞就是出现倒退。”①

布哈林在别的地方也说过：“任何生产部门如果得不到滋养……就会衰退。”② 这句名言确定了他那个经过修改的按计划发展工业的纲领的性质和界限。

布哈林的农业纲领是否也需要修改，这就不那么清楚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急于决定作修改和提出修改意见。部分原因是，当时他提出的政策看来正在收到效果。1925年、1926年两年和1927年的头三个季度，农产品的产量、市场销售量和国家收购量都达到或超过了预期指标。此外，正如布哈林曾经预言过的，当时

①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

② 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发言（T 1901）。

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机构正在把私商从粮食市场上"排挤"出去。从1926年开始，一直到1927年11月开始慢慢显露出农产品收购量急剧下降的最初迹象时为止，布哈林在粮食问题上的言论是有些自我庆幸的。他说，收购运动有时遇到的困难是由错误的价格政策和与此有关的负责机构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象反对派在1926年所怀疑的那样）由于富农的"粮食罢工"。他兴奋地认为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即"社会主义化的部门"）实际上已经赢得了"对粮食的垄断"，这种兴奋心情显然阻碍他对下述重要问题作出及时的反应，① 那就是农业产量的年增长率严重地落后于工业，在开始实现扩大工业生产计划的前夕已出现了工农业之间失去平衡的不祥之兆。

1927年10月，布哈林宣布了自1925年以来实行的官方农业政策的一项重大改变。他宣告，由于在过去的两年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得到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盟已经有了保障，富农在社会上已经"受到孤立"，现在已有可能开始"对富农展开一场不得不进行的进攻"和开始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② 但是他讲的道理并没有说服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说："今天说'发财吧！'明天又喊'富农滚开！'这对布哈林是很容易的。他只要大笔一挥就行。反正他不会有什么损失。"③

然而，布哈林讲的却是别的意思。他极其谨慎地强调说明，

---

① 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04页；《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97—200、1420页；《捍卫》第213页。

② 他在10月12日的一篇讲演中提出了这口号。《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422页。他在二个星期之后作了阐述，见《捍卫》第202—211、215、228—231页。虽然这显然代表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决定，布哈林的提法看来是他自己的，而且这种提法曾使某些领导人感到惊惊。见加里宁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229—1231页。

③ 列昂·托洛茨基：《俄国实况》（纽约，1928年）第11页。

他并不是要采取一种“歇斯底里”做法——“不是要从手枪里打出……一颗子弹”——而是要采取与新经济政策原则相符合的审慎行动。除了在政治上采取的一项制裁措施(剥夺富农在农村的选举权)以外，所谓的“进攻”只是对富农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而已，包括加重赋税，严禁秘密买卖土地，对雇佣农村劳动力和出租土地的期限规定更严格的限制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不会影响到贫农和中农的耕作，相反，对之需要加倍加以鼓励。①

布哈林宣布的这些内容等于是部分地废除了1925年的农业改革，并且实际上关上了(如果事实上真的曾经敞开过的话)“用富农方式解决”苏维埃俄国的农业问题的大门。“我们不妨碍富农进行积累”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布哈林的政策仍然建立在个体耕作和私人积累的基础上，仍然建立在“使农业商业化”和“通过市场……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同千百万农民的产业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② 但是，“发财吧”这句口号已经不再无条件地适用于上层农民了。鉴于他对发展工业的新的抱负，他竟会劝阻最有生产力的农民去扩大生产，这看来是很不寻常的。他希望通过另外两项政策来补偿失去的农产品产量并获得更多的剩余，这两项政策的目的都是要扩大苏联农业的生产能力。

第一项政策要求国家提供巨额援助，以帮助个体农民摆脱“极端野蛮而原始的耕作方法”。改进耕作工具，施用肥料、进行灌溉，发展多种多样的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农作物，进行基本的农艺学教育——所有这些在过去都被忽视的事情，现在布哈林都加以提倡，以便用比较小的代价使个体农业“合理化”和得到发展。他说：“即使在这个预算开支的限度内，也应该可以获取大得多的生产

① 见上页注②中所引的布哈林的解释。

② 同上书。另见《真理报》1927年11月6—7日第3版；布哈林：《粮食收购、沙赫特事件的教训和党的任务》(列宁格勒，1928年)第84页。这里的引语取自该书。

率”。① 第二项政策是一项更长期、意义更深远和耗费更大的政策，它反映了布哈林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变化。这项政策要求逐步建立一个集体化的农业部门，主要是一些大型的、机械化的生产合作社。在举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无论是布哈林还是苏联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阐述过向适当的农业集体化方向前进的决心。但是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清楚的。他认为下这个决心不是要反对个体耕作或供销合作社，而是试图通过提供更多的投资和劝导农民自愿联合的办法，建立一个起补充作用的粮食生产部门，作为在即将来临的工业化阶段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途径。他坚持认为，在“几十年”内，个体耕作仍将是苏联农业的骨干。②

这些就是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对自己的经济纲领所作的主要改变。他的修改了的政策是雄心勃勃的，但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和谨慎的。③ 曾被左派嘲笑为“复辟思想意识”的自鸣得意情绪已经不见了。现在他的头脑已经变得更清醒了。他现在更强调要把“文化革命”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强调克服生产和管理中的“奥勃洛摩夫主义”* 这一旧的落后传统的长期艰巨任务，更强调要教育新的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总的说来更强调科学和技术进步。④ 这些思想特征都说明他

① 《捍卫》第224—225页；《真理报》1928年1月27日第5版。另见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84页。

② 见《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423页；《捍卫》第201、229页；《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第4—5版，1927年11月6—7日第3版，1927年11月23日第3版。

③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评价，见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87—89页。

*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所作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现常被比喻为昏庸懒惰的人。——译者注

④ 见《捍卫》第226—228页；他的《论旧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建设》，载于《革命和文化》1927年第1期第17—22页；他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载于《真理报》1928年1月27日第5—6页。

的头脑已更清醒。

除此之外，虽然为时已晚，但是布哈林还是认识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缺陷以及这些缺陷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后果。他自认为，他已经根据这些情况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他那经过修改了的发展战略，在相当大程度上更加依赖于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更严格地管理私人资本、制定长期计划和重新建立新经济政策社会的生产基础。但是，在他的战略中，仍然存在着前后矛盾和捉摸不定的地方，这反映在以下一些矛盾中，例如，提高直接税和增加私人储蓄之间的矛盾、限制富农和增加农业总产量之间的矛盾以及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看来这是布哈林所期望的）之间的矛盾。"合理化"能否很快产生投资所需的数量可观的盈余，与此同时能否把商品荒缓和到足以使农产品销售保持持续增长的程度，这些都是不明确的。

但是，虽然布哈林提出那些经过修改的解决办法已经为时过晚并且也许不完全符合他的分析，他已不再对面前的问题视而不见。相反，面对着这些问题，他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混合经济及其各种各样的形式，即：既要最大限度地用更省的办法发挥现有生产设施的作用，也要建设新的生产设施；既要扩大"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也要在私有经济部门中继续雇佣"半友半敌的人以及公开的敌人"；既要制定计划和进行调节，也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各种合理化措施，等等。人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准备朝新的方向前进，却拒绝采取非此即彼的解决办法，而宁愿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①] 由于布哈林的纲领采取的是渐进的方法，提出的是适度的指标，用的是长期的解决办法，因此它的实现有赖于取得一段很长的不发生严重国内外危机的时间。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国外

① 这是亚历山大·厄尔里希教授的看法。

都酝酿着危机。国内危机的严重性在1927年11、12月间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危机部分地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反应迟钝而造成的。国外危机(对战争的恐慌是这种危机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控制的。

布哈林在1926年的一次共产党员的集会上，向他的听众再次保证说："我们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产物。"① 虽然苏联长期所处的孤立状态也许已经使某些人相信，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诞生本来就是不成熟的，或者它很可能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但是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公开地对布哈林的这句话提出异议。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它曾强烈地影响党的思想和行动达六年之久。虽然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继续被奉为神圣的真理，但是到1923年，党不得不暂时地停止了对国外革命预兆的密切关注。当时，欧洲的革命前景暗淡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了国内的紧迫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党内宗派的形成和1924至1926年间的争论中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它只是在1927年当反对派抓住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在英国和中国问题上的失策大做文章的时候才迟缓地和模糊地起了一些作用。

因此，同他原先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相比，布哈林在1924至1926年下半年的这段时间内对通常的世界革命问题是很少关心的。在这方面，他的主要精力花在琢磨对革命进程的理解和传播这种理解上，这种理解驳斥了那种认为欧洲没有爆发革命，共产党在东欧和中欧遭到挫折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趋于"稳定"等等，标志着世界革命已经"完蛋"的观点。他解释说，这种"天真的"错误认识，根子在于"通常那种书生气和学究式的"想法，以为革命会在"所有的地方同时"爆发，在于看不到革命的进程是"一个需

① 《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7页。

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漫长过程"。虽然人们期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开展起来，但是人们也必须记住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不同的时间（甚至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地方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①

首先，应该把革命进程理解为全球性的而不只是指欧洲一个地方的变动而已。这里，布哈林只是进一步阐述了他最早在1923年打过的比喻，那时他把欧洲和美洲的"工业宗主国"比喻为"世界城市"，而把"农业殖民地"比喻为"世界农村"。当"宗主国"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同东方的"农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殖民地运动"终于在全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体系就会最终地被摧毁。"宗主国"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和东方的"殖民地运动"是一场单一的、正在进行的世界革命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殖民地的民族起义有可能使帝国主义国家丧失其市场和原料，因此它是1914至1918年的战争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有力因素。欧洲的稳定仅仅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是"有起有落"的，而不表明革命的进程已经完蛋。相反，革命的进程在当前是以苏维埃俄国为中心的，同时也越来越向资本主义的东方"殖民地外围地带"发展。在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的阵线已被冲破，一个堪与帝国主义相匹敌的文明社会正在建立；而在东方的"殖民地外围地带"则"正在燃烧着熊熊的革命烈火，这股烈火已在伦敦和巴黎银行的窗户上有了反映。"②

上述这些言论，就其本身而言，是对不断发展中的国际革命运

① 见《进攻》第185—195页；《为了列宁主义》第368页；《真理报》1925年6月19日第5版；《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194、1348—1350页。

② 关于他对这一观点的主要说明，见《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3—4期第3—17页；《执委会全会扩大会议》（1925年）第304—328、528—544页。另见《真理报》1924年10月24日第5版，《国际报刊通讯》第5卷（1925年）第863页，最后一句引话来源于此。

动的一种令人感到快慰的描述，它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共产党人由于看到西方国家内部安定的局面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这些言论除了反映布哈林那种独特的讲话风格(这种风格产生于他对俄国革命的理解)以及他对“世界农民”的异乎寻常的强调(他强调“世界农民”是一股“伟大的解放力量”)以外，主要是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在1920至1923年间所制订的东方政策。布哈林在1925年把这些言论写进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时，显然没有遇到任何引人注目的反对意见。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些言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思想概念方面提出了一些总的框框而已。它们并没有真正涉及到在1926年已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当时正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那种令人困窘的经济高涨问题。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暂定于1927年年初举行(实际是在1928年夏天举行的)，会上要最后通过共产国际的纲领。因此，布尔什维克已不能再拖延就欧洲的稳定局势的性质及其长远影响发表一项措词明确的声明。这项任务落到了官方理论家布哈林的头上，他已经在1922年和1924年分别起草过两个纲领草案(现在都已过时)，现在负责起草第三个。[①] 从1926年年底一直到1928年夏天，他除了重新评价苏联的国内政策以外，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研究“资本主义稳定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了。[②]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有理论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最缺乏创新精神的。为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稳定现象，他重新搬出了他在十一年前就提出的、曾引起争论的“国家资本主

---

① 关于他的更早的草案，见《进攻》第285—303页；《共产国际纲领》(伯特伦·沃尔夫版本，纽约公共图书馆)。

② 见他的几个长报告，《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30—112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23—693、819—842页。

义"（或者用人们所忌讳的字眼来说，就是"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概念。起初，他看来有点犹豫不决，不敢起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这也许是出于下面三个原因：第一，这个名词容易使人们对欧洲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第二，这个名词容易同希法亭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淆起来；第三，他自己过去同列宁进行争论时曾经用过这个名词。但是，他虽然到 1927 年 12 月才开始明确地谈论"国家资本主义"（此时也只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个提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从 1926 年开始，他已经根据"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考察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了。①

布哈林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说，"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这就是说，当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象有些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内部结构变化"的结果。他用统计数字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垄断现象已经加强，资本通过更精细的、规模更大的联合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方法空前地集中起来了，而且资产阶级国家已经作为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强有力的调节、组织和计划力量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布哈林再次承认，民族资本主义正在摆脱它本身的"无政府性质"，而且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基础上迅速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面貌，进一步"用合理的组织取代那些不合理的成份"。没有必要在此重复他的全部论点，因为这些论点同他在1915至1916 年间提出的那些论点别无二致。②

---

① 他的第一次明确的论述出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 1 卷第626—633、823—830 页。关于他的更早的含蓄的思想，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16—17、93页。

② 这些引语取自布哈林在 1929 年夏发表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概括了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些文章重印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 168—199 页。他在 1926—1928 年同样提出了这些论点，虽然并不这样明确。

布哈林重新拣起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补。原先，他曾经强调那场欧洲战争是使经济生活"国家化"的原动力。现在，他认为，"第二阶段"正作为一种"'和平的'经济制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发展着，这个基础在两个根本方面同过去的基础是不同的。第一，同战争期间自上而下地进行的那种广泛而直接的国家控制不同，目前"最大的集中化企业、康采恩、托拉斯等等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熔合过程"主要是"自 下 而上"地进行的。国家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那些规模大、力量大的康采恩或这些康采恩的联合体"，布哈林称这种发展为"*国家权力本身的'托拉斯化'*"。究竟是自上而下的熔合为主还是自下而上的熔合 为 主，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德国、日本、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法国就是一些主要的例子），但是熔合的方向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政权控制并发展着资本主义。"①

正在出现的这种制度同它的前身还有一点不同：新的制度建立在更高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组织中的"真正了不起的"革新感到惊奇不已。他解释说，资本主义"正在重新显示出技术进步的惊人奇迹，它正在把科学知识……转变成技术革命的有力杠杆。"资本主义"使自己机体的 每 一个毛孔都充满 '科学管理企业'的精神的能力，正在使经济生活出现空前未有的"合理化"。布哈林认为这种和平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先进的因而也是更可怕的现象，布哈林的这种观点可以从他所作的一个惊人的比拟中看出来。他说："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同 1914 至1918 年间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犹 如目

---

①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 183—184 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 1 卷 第630—632、823—828 页；《国际报刊通讯》第 8 卷（1928 年）第 727、730 页。

前正在苏联发展着的、在关键环节上都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象‘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发展。”①

他的上述分析的意义，如同他在1915至1916年所作的分析一样，就在于它对未来革命的影响。由于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根除了自由竞争和其他国内经济矛盾，主要由国内危机而酿成“直接革命形势”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了。布哈林强调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着各种内在的问题，并且小心翼翼地声明自己同希法亭最近发表的言论毫无关系（希法亭最近断言把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过程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但是他明确无误地表示，他认为“希法亭在‘战前’发表的观点”现在加倍有效。② 布哈林在十年中第二次得出了结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那些致命的、产生危机的矛盾，与其说还在国内起作用，就不如说还在国外起作用。布哈林写道：

“资本主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悄悄地移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了。市场、价格、竞争和危机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问题，因为在“国”内，这些问题正为组织问题所取代。资本主义最疼痛、流血最多的伤口，它最明显的矛盾，正是在世界“战场”上暴露出来的。甚至问题中的问题，即所谓“社会问题”或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同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有关的……问题。”③

不管布哈林的结论正确与否，正是他这种知识分子的正直感

---

①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68、183页。

② 《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1035页。

③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85页。

使他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尴尬的境地。他说，希法亭和其他宣扬和平的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观点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不懂得“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竞争的消失”恰好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的最大激化”，不懂得正是这一点使战争和革命成为不可避免。① 布哈林又一次争辩说，外部的巨大力量将在推翻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暗示着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但是他表面上却否定这种观点，不愿意把他自己同它连在一起。这种观点在1915至1916年间还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可是现在它却给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它对欧洲和平的需要，同它公开表示希望别的国家爆发革命的愿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8年，布哈林的敌人就抓住他上面所暗示的那种观点指责他。在压力底下，他不得不指出，自巴黎公社以来革命总是紧接着战争发生的，然而他又很快补充说，他并不排除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他说：“我愿意用这样的提法：直接的革命形势，比如说在欧洲，*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可能出现的，或许还是很可能出现的……但是一旦爆发了战争，革命形势的出现就是绝对地不可避免的了。”② 鉴于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这种回答是站不住脚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果可以置他的论敌的政治动机于不顾的话，布哈林是并不相信“宗主国”里正

---

①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76—177、195—196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32—633页。

② 引语见列昂节夫：《右倾经济理论》第125页。另见布哈林的论述，《列宁的政治遗嘱》第12页。

在发展着“直接革命形势”的。①

不难理解，布哈林为什么如此重视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外围地带”发生的农民战争。因为在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农民战争正在给予“宗主国”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很有希望抵销它们在国内复苏了的有生气的组织力量。② 此外，布哈林在寻找东方国家中那些能够给西方资本主义敲丧钟的力量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他看到，一个“反帝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而且在这些正在觉醒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在二十年代，中国是个主要的例子），革命阶级的联盟，同基于欧洲历史或者甚至俄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法是大不相同的。由于民族革命把反对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斗争同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结合了起来，因此人数众多的农民、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以及本国的资产阶级统统都被卷入到“单一的民族革命洪流”中去了。布哈林预料资产阶级最终会退出这股洪流，但他从不怀疑，一心想搞土地革命的“殖民地农民”已作为一支“伟大的解放力量”永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坚信这个“人类的大多数”将最终“决定……整个斗争的胜败”。③

当然，布哈林继续相信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最终一定会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随着东方国家的社会动荡的发展和西方国家的趋向稳定，他也象在他之前的列宁那样，开始就民族革命本身来看民族革命，期望从“东方的亚洲人民”及其“人民革命”中找到

---

① 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832、834页；《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728、865、874页。

② 《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9页；《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48页。

③ 见布哈林关于中国事件的论述，《中国革命问题》（伦敦，1927年）；《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48—49、83—91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3—29页；《国际报刊通讯》第7卷（1927年）第874—876、897—899页；《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36—53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59—674页。

苏维埃俄国的盟友，而对这种革命的阶级内容并不很关心。① 于是，在 1926 至 1927 年间当中国的国民党节节胜利时，他便梦想组成“一个从阿尔汉格尔到上海的、拥有八亿人口的巨大的革命阵线”。同列宁所做的一样，他也开始把世界划分成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个部分，而苏维埃俄国由于其“横跨辽阔欧亚大陆的独一无二的位置”则是团结被压迫民族的中心。②

最后，在 1925 至 1927 年间当中国的“人民革命”先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时，布哈林重新提出了列宁曾简要地阐述过的关于殖民地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对布哈林来说，关于其他农民社会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的论点，是同他对苏联农民及其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的想法有密切联系的。虽然这对于殖民地国家来说仍然是个含意不清的概念，但是它却预示了处于革命潮流中的世界的一个新的发展前景。布哈林在“世界农村”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殖民地群众”身上看到了击败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世界城市”和赢得“最后胜利的保证”。③

布哈林以他的非凡的洞察力，比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更清楚地看到了对二十世纪的形势产生很大影响的两种发展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尽管经历了大萧条(这一点他没有预见到)，却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过来并坚持下来了；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只是在大战以后才在欧洲出现，而且不完全是经过本国的革命动荡而产生的。另一方

---

① 《世界革命道路》第 1 卷第 30 页；《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 46 页；《列宁的政治遗嘱》第 12 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曾指出，在布哈林看来民族革命不仅是摧毁帝国主义的撞杆，而且“有它本身的含义”。《新杂志》第 3 卷(1942 年)第 190 页。

② 《中国革命问题》第 6 页；《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 39—46 页；《国际报刊通讯》第 7 卷(1927 年)第 1370 页。

③ 《国际报刊通讯》第 8 卷(1928 年)第 1269 页。

面，人民大众的革命继续在“世界农村”不屈不挠地发展着，农民的“破坏性力量”荡涤着旧的秩序并使新的革命运动迅猛地取得了权力，这一切都同布哈林的预见十分相近。他所缺少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前途的分析，他没有料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失去殖民地以后仍然生存了下来，没有料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能够从其他来源和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超额利润”。布尔什维克们认为这种“超额利润”是可以阻挡本国爆发革命的。但是到1928年，即使是这种可悲的可能性也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①后来的许多发展会使他感到失望，有一些会使他感到困惑。

然而，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俄国，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来说，洞察长远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很大的政治价值。当时争论的问题只限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外国共产党当时应该采取的策略。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东方的革命还是西方的革命，布哈林都抱着一个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应该避免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政治姿态，因为那样做会使自己同社会抗议的主流疏远起来，重新回到二十年代初期的那种孤立状态。②正如布尔什维克党人现在在苏联社会中努力争取人们对党的国内纲领的广泛支持一样，各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努力团结最大数量的同盟者。在中国，这意味着参加和维护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帝阵营”，这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泛基础的运动。各国共产党必须高瞻远瞩，进行一场耐心的、有见识的“争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农民的斗争。”③

---

① 见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超额利润”的论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6卷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9年)第2卷第41页和第3卷第139—143页。

② 见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论述。

③ 《真理报》1925年3月26日第3页。

在西方，这意味着进行持久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参加工会这个工人阶级"最重要、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去赢得工人阶级的忠诚之心。英国在1925至1926年间发生的罢工（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使布哈林认识到，"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堡垒"其实是任何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柱，是共产党人的救生索，是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捷径。在工会里工作，注意做一些"小的事情"，常常使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好的机会来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使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党员变得激进起来，使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此外，布哈林似乎认为强大而稳固的工会是劳动者可能用来反对新出现的强有力敌人——"托拉斯化的资本"的唯一堡垒。）在1925至1926年间，布哈林对工会革命潜力的热情成了他为西方国家制定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础。① 他相信这些政策是赢得群众支持的关键。此外，这也反映他希望看到欧洲各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能够真正扎根于劳工运动之中，希望看到"工人阶级的悲剧，即它自己内部的分裂现象"能够得到克服。他成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是）工人阶级团结政策的积极宣传者。例如，在1928年，当那些政策处于被抛弃的边缘时，他大声疾呼："团结的旗帜决不只是一种手段……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降低从下面建立起来的团结的旗帜，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保持团结的旗帜。"② 但是他的呼吁没有奏

---

① 见他对英国工会的评论，《国际报刊通讯》第6卷（1926年）第830—834、850—852页；他的《论国际形势》（列宁格勒，1926年）第15—18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扩大会议（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第203、206、208页；《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37—39、89—93页。另见他关于欧洲工会的评论，《共产国际》1926年第3期第92—93页；《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102—103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53—658、676、679页。

② 《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1275页。关于"杰克·伦敦……充分了解"的这个"工人阶级的悲剧"，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发言和决议选辑》（莫斯科和彼得堡，1923年）第181—182页。同样，见《真理报》1927年4月28日第3页；《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3卷第142页。

效。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推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他把上述总的看法付诸行动的结果，这项政策自1921年起就以不同的形式开始实行。按照正式的说法，统一战线政策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共产党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合作。英俄工会委员会、英国与法国的竞选联盟即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蔑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而专做他们下面的、主要是普通党员的工作。1925至1926年间，至少在某些地方，例如在英国，布哈林和共产国际是倾向于采取第一种统一战线政策的。然而到1927年年中，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带头采取了有节制地“向左转”的做法（他所提出的国内政策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他开始倾向于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了。布哈林的变化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遭受的挫折，对某些（主要是法国和英国）共产党内正在增长的右翼情绪感到的惊慌，来自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压力，可能还有他自己对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等等。他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要求英国和法国的共产党在竞选时不再继续支持社会党。①

统一战线政策表达了布哈林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只有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必须把“各种族和各大陆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作为不可缺少的追随者。1925至1927年，他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正在震撼着全世界，因为在当时那个短暂的时期内，从英国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看来都在上升。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类的大多数，这支军队现在已开

---

① 西奥多·德雷珀对这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见《共产国际的一件怪事》，见《评论》（1972年夏季）第91—137页。

始行动。"①

然而，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合作政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各国共产党能否坚持实行，而且也取决于它们的非共产党盟友的战略。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政策既可能取得显著的成功，也可能遭到明显的、令人尴尬的失败。例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突然失败、英国工联主义者的向右大转弯以及他们随后于1927年9月退出英俄委员会，这些挫折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是严重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灾难性的巨大变化。对中国这个社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在内都知道得很少。从1923年开始，布哈林就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他认为，这种合作是"反帝阵营"（这个"阵营"正在推动前进中的中国革命）在组织上的体现。中国革命在1925至1927年间取得的胜利，进一步使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幻想"广州这个革命中国的首都会成为正在觉醒中的亚洲殖民地群众的'红色莫斯科'"。他直到为时已晚以前都一直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同蒋介石的力量分道扬镳，走独立的路。② 他相信国民党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革命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特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他并不担心资产阶级会"抛弃"革命。③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对他的共产党盟友进行大屠杀，布哈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就在这次政变的前夕，他们还指示中国共产党把武器埋藏起来。到这时，他和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他们命令中国共产党支持在武汉（汉口）闹独立的左翼国民党政府。可

① 《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1269页；《真理报》1927年6月12日第1版。

② 《资本主义的危机》第29页；《世界革命道路》第1卷第48页；《论国际形势》第47—48页。

③ 《真理报》1927年2月2日第3版。

是，同年7月，这个政府也反对起共产党来了。最后，到同年秋天，在试图争取持不同政见的国民党分子支持共产党的激进行动遭到失败后，布哈林为时已晚地得出了结论："国民党及其一切派别已不再是革命的力量。"①

中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布哈林在政治上所经历的最不幸的事件之一。反对派指责他（还有斯大林）使中国的一场真正的革命遭到流产。他发现自己当时制订的策略由于形势的发展而立刻变得过时了。他责怪中国共产党人"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总是找些讨厌的借口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这些政策不管原来是多么英明，都已遭受失败。

不过，他那些事后的辩解也并不都是诡辩而已。他的中国政策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他说，除了犯有"局部错误"以外（所谓"局部错误"大概是指导致中国大批干部人头落地的那种致命的毫无思想准备的状态），他仍然"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他这样讲也许是真诚的。他说，尽管中国的资产阶级做了背信弃义的事，但它"在唤起民众方面还是出过力的，它帮助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的政治舞台，正是这一点证明了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不能否认这一历史性成就，它为将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他虽然同意，不能把在中国运用的策略"机械地"照搬到其他殖民地革命中去，但他并不认为"反帝阵营"和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已经站不住脚了。他说："如果魔鬼自己出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瘟神，那我们就

---

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70页。关于他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发表的言论，见《中国革命问题》第45—50页；《真理报》1927年6月18日第3—5页；《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7年）第874—876、897—899、927—930页；《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36—53页。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见本杰明·什瓦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纽约，1967年）；康德拉·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纽约，1966年）。

应该感谢魔鬼！”①

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的失败比起在西方遭受的挫折（例如在英国以及较小的程度上在波兰——波兰的挫折是由于毕尔苏茨基在1926年发动政变造成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对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后者的教训特别大。不过，尽管如此，布哈林仍然不愿意果断地抛弃在西方国家实行的那些（甚至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政策。他认为，同英国那些“机会主义的”工联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虽然垮台了，但是这个联盟在促进英国工人激进化和扩大弱小的英国共产党的影响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②即使在1927年他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政策向左转至“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他也没有完全排除实行前一种政策的可能性，他仍然认为同社会党和欧洲的工会组成新的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③因此，不难预料，当1928年斯大林分子开始对任何形式的，甚至是（或者尤其是）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关上大门时，布哈林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他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一点可以使人确信：尽管他个人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抱有敌意，他不会作出把社会民主主义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或者把社会民主党当作头号敌人的蠢事。

布哈林认为不应该把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败看作整个统一战线原则破产的征兆。他提出这个论点虽有对付左派反对派的目的，但这个论点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从含义上看，统一战线政策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必须经过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能实现。但这并不能减弱国外的失败对苏联国内事态所造成的

---

① 《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47、51页。

② 《国际报刊通讯》第6卷（1926年）第831—834页；《论国际形势》第15—19页；和他的《伟大的斗争》一文，载于《真理报》1927年5月1日第1版。

③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56，658页。

深远影响。反对派领导人自己在英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他们都因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遭到屠杀而感到愤怒。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败促使他们把共产国际的问题也作为他们对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进行谴责的内容。

在中国的悲剧发生之前，左派在公开场合对于对外政策实际上是保持沉默的，现在他们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指责两驾马车（指斯大林和布哈林——译注）背叛了国际革命，也背叛了俄国革命。[1] 从此以后，领导集团同左派反对派之间的进一步分裂大概已经无可挽回。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失败，加上苏联外交上的挫折和新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1927 年 5 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同年 6 月苏联驻波兰大使被暗杀是明显的例子——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对战争的恐惧感并使他们明显地感到苏联的孤立处境。从 1927 年夏天以后，党内就笼罩了一种危机不断加深的气氛。这种情况使领导集团推行的温和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了问题，使党内的派别斗争加剧起来，并为开除左派出党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开始导致斯大林—布哈林这个多数派本身的分裂。

对布哈林和政治局的右翼来说，1927 年这一年是以对形势作出乐观的重新估计开始，却以一系列互相有关的危机结束。这些危机破坏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命运。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的种种不幸都同对战争的恐惧有关。这种战争恐惧感对经济政策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拚命强调需要大大扩大生产资料的工业，尤其是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工业；并

---

① 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 161—177 页；《左倾反对派的纲领》第 77—96 页。

把党的"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口号变成一道冒风险的紧迫命令。总之，原来设想的那种工业化的格局和速度是否合适，人们对此提出了问题，而这又在一些新的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1927年以前，作好短期的战争准备的想法在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中不曾占据什么位置；尽管他也大谈"战争与革命的新纪元"，但他却估计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喘息"机会。① 虽然他和他的伙伴们现在已经根据可能爆发战争这一情况重新拟定了他们关于经济建设的建议，但是那时存在的危机气氛只能对布哈林分子的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这种危机气氛所延续的时间则要比1927年出现的暂时的国际紧张局势更长。

对战争的恐慌在经济上造成的第二个后果直到1927年年底才充分地显露出来。这时它又加剧了一场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危机。那年夏天和初秋，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在内，发表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全国出现了广泛的囤积物资的现象。城市里到处出现购买食品的长队，商品荒大大加剧了。当时，领导集团认为正在加剧的商品荒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为将延续到10月份结束的粮食收购运动当时正在令人满意地进行着，它将会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但是到11月和12月份，领导集团过去所制订的农业政策的缺陷突然受到了报复。农民由于买不到便宜的商品，又面临着对他们不利的价格结构，因而大大减少了投入市场的农产品。结果，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只相当于上一年度在11月和12月份得到的收购量的一半。②

---

① 可比较他在《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41页和《全会联席会议总结》第5—6页上的论述。

② 《粮食收购的教训》第24—25页；米高扬的发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094页。另见莱文：《俄国的农民》第178—186页。

在12月份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怎么提到这条不祥的消息(但不久之后就宣布出现了“粮食危机”),不过当时在政治局内部已经在秘密地讨论如何对付这种局面了。领导人当时对此“毫无准备”①,手中没有任何储备,既不能向农村提供足够的商品以便把农民的库存吸引到市场上去,甚至也不能保证在不久的将来增加市场供应,同时又不愿意为了充分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改变工业投资计划。于是,到1928年1月,他们就只好求助于“非常措施”了。在“粮食战线”上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引起了许多事情,包括政治局右派和斯大林之间出现公开分裂和决定开始1929至1933年的集体农庄革命。

战争恐慌感对党内政治的深远影响并不亚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世界上的政府在对付真正的危机或者想象中的危机的时候,惯常总是要么把反对派统一到单一的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标准上来,要么就把反对派镇压下去。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选择的是第二种方针,他们对反对派是否忠于党提出了疑问并且试图把反对派对党在国外遭到的失败的批评压制下去。从1927年夏天开始,左派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制和报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开除出党的威胁,而且第一次遭到警察有组织的骚扰。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对这场镇压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作出愿意团结在两驾马车周围的任何表示。虽然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已大大缩小了,但是左派对两驾马车的指控现在却变成全面的了,他们空前激烈地谴责多数派在过去和现在推行的所有内外政策,说这些政策是热月党人式的出卖。左派对两驾马车在战争期间是否有能力担任领导公开表示怀疑,因此实际上就是要求撤换领导人(托洛茨基以赞许的口吻提到克列孟梭在战争中的行动,从而更

---

① 李可夫的话,引用于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282页。

明确地突出了这一要求)。

反对派分子由于被剥夺了通过党内途径提出抗议的权利，只好转而采取(多少有点留恋过去的革命造反精神)[1]公开的游行示威和秘密地散发小册子等非法手段。这种情况导致了一连串悲喜剧事件：一方面是秘密警察的挑衅，另一方面则是左派徒劳无益地表现出英雄行为，最后多数派给左派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宣布撤回自己的主张并解散自己的帮派，要么就面临更坏的结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蔑视这个最后通牒，结果于11月15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以后的第八天被开除出党。在1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左派被彻底击溃，那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决定并把其余的反对派领导人也都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分子被击溃后，最后投降了。几星期后，托洛茨基及其不肯改悔的追随者们被赶出首都，放逐到其他地方去了。[2]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明显，从1927年4至12月间这些事件中得到好处的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如果象传说的那样，政治局右派曾对斯大林原先想要开除反对派的企图进行过抵制的话，那么对战争的恐慌感倒是帮了他的忙，因为它有助于制造“集体迫害的气氛”，使他得以推出“尚未染血的断头台”。[3]左派由于如此激烈地攻击共产国际对中国和对英国的政策，从而丧失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这两名最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党的政治局领导人对他们的最后同情。在那年秋天，布哈林已不再倾向于克制，也加入了对反对派的“非法”越轨行动的严厉声讨。他虽然知道反对派分子常常是

① 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的铁面无情的年代》(波士顿，1934年)第355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丹尼尔斯：《良心》第7章；苏瓦林：《斯大林》第440—472页。

③ 这种表达法是属于左倾机会主义者佐林的。见他给布哈林的信，《社会主义公报》1928年1月12日第14页。关于这类报道，见丹尼尔斯：《良心》第7章注(131)。

被惹得“说了些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做了些他们本来并不愿意做的事”，并且“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们能向领导集团发出的最后通牒屈服，但是他还是下结论说：“我们党内是容不得持这些观点的人立足的。”①

政治局右派很快就会为自己默许彻底摧毁左派而懊悔的。在右派的帮助下，斯大林消灭了把他同他昔日的盟友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敌人。右派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力量充满信心。从表面上看，这个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托洛茨基当时曾预言，右派不久就会“追捕斯大林”。）② 革命权威的主要象征是掌握在他们手中：总理职务、党的理论刊物和意识形态机关、共产国际和工会等等。然而，任何一个研究苏联问题的评论家都会懂得，这些只是表面的、“荣誉性的”权力来源，而斯大林所把持的党的机器却掌握着越来越大的、“实际起作用”的真正权力。

这种真正的权威同表面上的权威相分离的现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政治的特征，但在二十年代有所发展，因为那时书记处的权力由于派别斗争的结果而不断扩大。在1926年10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分离的现象明显地显示出来了。首先按顺序作报告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然后在第十次会议上，斯大林才做关于党的报告，而这在传统上是个定调的报告。这个不寻常的日程表似乎表明右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就在那同一个月，斯大林的另外两个伙伴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成了九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虽然右派仍然把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看作是信服地支持他们政策的人，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在政治局里获得了不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影响的潜在的

① 《捍卫》第260页；《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反对派》第259页。

② 引语见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428页。

多数。

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是唯一导致斯大林同政治局右派之间发生对抗的事态发展。1927 年在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麻烦，使人们对布哈林派的政策(即使他们已作了修改，使之变得比较现实主义)是否继续可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眼前出现的困难，大概动摇了斯大林对他那些“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伙伴在经济问题上的远见所抱的信心，使他进一步倾向于听取别的意见和确定自己的方针。到 1927 年，以古比雪夫为首的未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专家，已经占据了关键性的经济领导职务，最明显的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中的职务，并且已经开始制订他们自己的工业化政策。此外，布哈林和李可夫由于对政策作出修改，转向制订计划、增加基本投资和实行农业集体化，引起人们对这些计划中的改变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在国家计划机关里，已经出现了对五年计划的一些极为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左派被开除出党以前，一位拥护斯大林的计划工作者S・G・斯特鲁米林已经喊出了指导斯大林式的工业革命的哲学口号：“我们不受任何法则的束缚。没有任何堡垒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不能攻克的。”①

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经济政策开始把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分成两派的。虽然在 1928 年 1 月底或 2 月份以前，在政治局右派和那些后来组成斯大林的新多数派的人之间看来尚未出现严重而全面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在农业集体化、投资政策和工业发展速度等问题上，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夕，甚至在粮食危机的消息传来之前就已出现相反的立场。大会

---

① 引语见P・J・D・怀尔斯：《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坎布里奇，1962 年)第47页。另见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2 卷集，纽约，1969—1971 年)第 1卷第 865—874 页。

关于集体化问题或许还有其他问题上的决议，显然是领导集团内部没有对外公开的妥协的结果。① 不管这些早期分歧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它们都没有大到足以毁坏政治局的团结，这种团结使政治局能把左派开除出党并主持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济问题上的决议，不管是不是妥协的结果，反映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两个人的经过修改了的观点。这些决议提出了新的指标，但在措辞上着意于防止过火行为，强调谨慎小心、保持平衡的发展和新经济政策的不可侵犯性。（然而，这些政策都过于笼统，以致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②

进一步说明政治局内部意见不完全一致的迹象，还可以从领导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中看出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谈到富农问题时，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比加里宁和作主要经济报告的李可夫都要严厉的语言。③ 此外，斯大林在讲到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时，他的调子比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大会前所发表的讲话要强硬得多，他强调只有集体耕作才能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他下结论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他还对欧洲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跟布哈林的提法也有明显的不同。他预言欧洲的稳定局面即将结束，"殖民地和宗主国中新的革命高潮"就要来到。④ 但是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微差别，还不能证明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斯大林分子只是刚开始摸索自己的立场。）的确，这些差别之所以显得突出，仅仅是因为所有的领导人，

---

① 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12期第75—76页；《苏共历史》第4卷第524—525页。另见波波夫：《历史大纲》第2卷第354页；伏洛希罗夫的发言，《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二卷集，莫斯科，1935年）第1卷第516页。

②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441—1463页。

③ 见莱文：《俄国农民》第8章。

④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1、63页。

包括斯大林在内，在大会发言时都使用了布哈林主义那种谨慎、温和和赞扬新经济政策的口吻。大家强调点的不同也不是始终如一的。毕竟布哈林是第一个提出要“对富农进行有力进攻”的人，而且他和李可夫两人现在也都在认真地——虽然是有限度地——致力于集体化运动。①

大会上出现的更为不祥的、不和谐的迹象，所涉及的不是政策，而是人。与斯大林同伙的一些发言人，第一次公开地、虽然是谨慎地批评了布哈林。在讨论布哈林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情况的报告的时候，两名被认为同总书记有密切关系的年轻干部拉札尔·沙茨金和贝索·洛米纳泽，以及工会国际的头头罗索夫斯基激烈地反对布哈林把西方资本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更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指责他忽视了正“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的右的危险。”② 虽然斯大林竭力装出一副他自己同这些批评无关的样子，但这些批评却是一种凶兆。它不仅牵涉到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而且还转弯抹角地对他作为党的理论家的资格提出了疑问。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他的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中最薄弱的一环，后来成了斯大林在反布哈林运动中最爱打的一个靶子。最后，这些二级代理人的攻击还说明，斯大林已经开始巧妙地利用工会国际和共青团组织来暗中破坏右派的威信和削弱他们的权力。③

所以，就在 1927 年 12 月，正当政治局右派取得显而易见的胜

---

① 布哈林在代表大会未就国内问题发言。见李可夫在会上的发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 2 卷第 870—871、1423 页。

② 同上，第 1 卷第 693—705、722—731 页。

③ 当时斯大林采取的反对右派，特别是李可夫的暗中活动可能已在进行。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第 20—21 页。与此同时，政治局中的右派显然也在代表大会试图实施他们自己的策略。李可夫动议把列宁的最后一些反斯大林的著作附入代表大会的记录。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 1 卷第 623 页。这个动议被通过，但那些著作后来只在每周公报上刊登。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 29 页。

利的时候，在他们刚刚使自己的经过修改了的纲领合法化，并且把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开除出党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政策已经危机四伏，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对他们面临的这种险恶局面，布哈林要负相当大一部分责任。他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去注意左派对经济政策所提出的那些有效的批评，后来又没有及时地在很重要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充分地阐述自己那些经过修改的政策，这不能不说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帮助斯大林对左派处以“公民死刑”则是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失策。[①] 这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而且是丧失了他过去曾显示过的谨慎作风和起码的礼仪。他虽然参加了跳这场最后的复仇之舞，但是毫无疑问，他仍然并不“欣赏它”，而且“从头到脚直打哆嗦”。他并没有料到“斗争的逻辑会如此迅速地而且以如此激烈的形式使这件事情出现在眼前”，因此，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举手投降的时候，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对“反对派领导人的这场悲剧”，[②] 布哈林不是没有任何同情心的。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自己的威望促进了他们的毁灭。

布哈林并不是突然参与这些毁灭行动的。1921 年以后，布尔什维克政治中的一个从不间断的主题就是对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不能容忍，党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过去就曾经开除过一些次要的反对派分子。[③] 布哈林本人也并不是第一次支持动用“尚未染血的断头台”。早在 1924 年，他就曾经主持过把他战时的

---

① 布哈林用这一表达法来描写 1928—1929 年对他的处理。引语见《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93 页。

② 见他的评论，《国际报刊通讯》第 8 卷（1928 年）第 218 页；《捍卫》第 3 页；布哈林的话，引用于谢尔格：《回忆录》第 232 页。

③ 布哈林在 1926 年 1 月说，“究竟那里写着，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嘴巴是永远不能沉默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总结》第 62 页。

朋友策特·霍格伦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开除出共产国际。现在，当他的两个最老的朋友符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他在一起流亡过的最亲近的同志米哈伊·菲谢列夫、他在1918年曾经领导过的几名前左派共产党人以及用他的话来说他曾经与之一齐“战斗过”的其他几十名布尔什维克被开除、被监禁、被流放时，他又宽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对滥用权力十分反感和禀性远不是卑劣的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应该能够清楚地懂得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权力并没使他的全部批判官能都变得迟钝起来。他看到并谴责共产党在国内所拥有的特权以及它所犯的反犹太主义、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滥用职权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但是他还是剥夺了他从前的一些朋友在党内的合法地位，宣布这些人是“敌人”，说他们“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①

他之所以又一次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仍然相信左派的观点和纲领同他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托洛茨基在1926年曾经提醒过他，说：“组织上的恐怖制度不可能仅仅限于对付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不管这些异端邪说是真的还是臆造的。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透到(党)组织的整个生活和全部活动中去。”② 布哈林没有对此作出反应。不论是他曾公开表示痛惜的党的“军事化”，还是斯大林的日益增长的权力和野心，都没有象他同左派的“根本性的纲领分歧”那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陷入这种片面的愚蠢想法的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不只是他一人。当布哈林于1928年终于发现“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比我们过去同你的全部分歧要严重许多倍”的时候，托洛茨基却坚信无疑地认为布哈林是热月党人的化身，因此

---

① 《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反对派》第239页。

② 写给布哈林的信的日期为1926年1月8日(T2976)。

他竟然会宣布："同斯大林一起反对布哈林吗？——可以。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吗？——决不！"[①]

托洛茨基由于处于被追逐、被诽谤和被流放的境地，由于满以为他自己特别注意倾听"历史的步伐"，他的盲目性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布哈林却不能有这么多的借口，因为他多次地被提醒过。例如在 1927 年 11 月，他曾收到他以前的一位同志的来信，谴责他是"关押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监狱看守"，竟然同意让雅科夫·阿格拉诺夫这样的秘密警察来审判十月革命的英雄。信的结尾是一段十分有预见性的挖苦讽刺的话：

"小心啊，布哈林同志。你常常在我们党内进行争辩。也许你将来还得这么做。到时候你今天的同志会让阿格拉诺夫同志来充当审判你的法官。榜样是会传染的。"[②]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托洛茨基的话，引用于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 315 页。布哈林的主动表示是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的，但他的意思很明显也把托洛茨基包括在内，当时就是这样理解的。

② 佐林的信，公布于《社会主义公报》1928 年 1 月 12 日第 14 页。

第九章

布哈林的垮台和斯大林革命的来临

你必须征服和统治别人，
否则就会丢失一切和被别人奴役，
是受苦还是胜利，
就看你是铁砧还是铁锤。

——歌德

1928至1929年间，即在布尔什维克进行统治的第十一个年头，俄国再次处于革命的前夜——刚刚过了十年，这已是第二次了。虽然谁也没有盼望过这次革命，但是到1929年冬天，这个国家和它的一亿五千万居民还是陷入了斯大林掀起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狂风暴雨之中，其后果之大堪与历史上那些“自下而上的”大动乱，包括1917年的那次动乱相比拟。[①] 象其他的社会大革命一样，斯大林掀起的这场革命也将粉碎和荡涤旧秩序，并建立起一个同过去根本不同的新社会。然而，这次革命还有新的发展：这次革命所要摧毁的秩序正是新经济政策的社会，这个社会本身就是

---

① 正如斯大林主义的官方历史所指出的，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纽约，1939年版)第305页。

一场大革命的最新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发生于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之前的那些事件时，不妨对"旧秩序"，即对摧毁前夕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作一次最后的回顾。

同随后出现的斯大林主义的秩序相比较，新经济政策——亦即二十年代的苏联——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下存在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多元化社会。因为，虽然官方竭力维护党对政权的垄断，但它对其他领域内的多元主义和多样化却是容忍的，甚至是鼓励的。这方面最主要的例子当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当时，二千五百万户农民的土地实际上生产了苏联的全部农产品；几百万小手工业者提供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八的制成品和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基本消费品；无数的小商小贩仍然在商品流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的商品广告有许多是登在共产党的官方报刊上的）。[①] 尽管国营经济部门的力量在日益增强，但到二十年代末，私人企业继续决定着苏联经济生活的进程。大多数公民，尤其是仍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其生活和工作同党或国家的控制并没有什么关系。

党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没有全部垄断。真的，甚至在政治方面，非党人士也受到鼓励，让他们非常广泛地参加较低级别的行政管理，并且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在负责提出建议、帮助制订官方政策和执行官方政策的中央一级国家机关中，那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也都是非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中有许多人过去还反对过革命。1929 年，在国家机关的全部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十二。虽然各人民委员部和重要机构的正式的第一把手通常都是党员，但在这些单位的其他高级干部中

---

① 手工业生产的数字系指 1928—1929 年俄罗斯共和国的数字。见《苏共历史问题》1971 年第 7 期第 83—84 页；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 1 卷第 390 页。

共产党员只占很小一个比例。[1]

之所以要广泛地雇用"资产阶级专家"(即非党知识分子)，部分地是由于缺乏合格的党员干部，这种情况使官方感到不安。党渴望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党员，尤其是在教育这样的领域里，因为在全国教师队伍中党员只占百分之三。[2] 但是广泛地雇用"资产阶级专家"(即非党知识分子)也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的调和精神，它是苏维埃政权的合作经济政策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调和精神，可以从非党人士担任公职的人数之多和所负责任之重要以及他们愿意参加这些工作的态度中看出来。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对这些领域，如果党愿意的话，它本来是可以加以垄断的。例如，1925 年在官方新闻机构中服务的全部工作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3] 而在地方上的选举产生的职务中，由于 1924 至 1925 年间上面决定同意搞相对自由的选举，结果党员和共青团员只占地方苏维埃全体干部的百分之十三和地方苏维埃主席的百分之二十四。[4]

但是，最真实地反映出新经济政策社会的多元性的，也许是它

---

①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 458 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农业人民委员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前社会革命党人，而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则是前孟什维克。国家计委 1924 年有 527 名职员，其中只有 49 名是党员。1924 年中央合作社机关工作人员中的百分之八十八和大多数部门领导人都是非党员。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 年第 3 期第 55 页和1970 年第 10 期第 81—82 页。到新经济政策的年代结束时，在其他大的政府部门中也有类似情况。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 446—447 页。

② 塞缪尔·诺思拉普·哈珀：《苏维埃俄国的公民训练》（芝加哥，1929 年版）第 263 页。同样，1928 年在国营工业中工作的所有工程师中只有 139 名是党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列宁格勒工人》(列宁格勒，1965 年版)第 49 页。

③ 例如，1926 年列宁格勒党报的 152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28 名是党员。《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1971 年第 2 期第 31 页。

④ 这些数字系 1926—1927 年俄罗斯共和国的数字。见伯恩施坦：《领导和动员》第 213 页。到 1928—1929 年，全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主席的百分比上升至 37.7。见D·J·梅尔：《集体化前的俄国农民组织：对 1925—1930 年的公社和村社的研究》（纽约，1971 年版）第 128 页。

的文化生活和思想生活，这两种生活始终是反映真正的多样化和国家的容忍程度的寒暑表。二十年代是丰富多彩和成绩辉煌的难忘的十年。党本身的思想精神生活，党的学术研究机构、社团和学术出版物，从教育学、科学到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中的激烈争论——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二十年代并不是那种强加于人的枯燥无味的正统观念的时期，而是允许出现相反的理论和相对立的学派的时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黄金时代”。①

在党外，尽管由于革命的缘故而出现了大规模文化外流的现象，但是二十年代的苏联几乎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带来了引人注目的艺术高涨、创作生活的欣欣向荣。在一个为革命所鼓舞并且不受任何官方艺术教条束缚的气氛中，在国家、合作社和私人的支持下，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以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各异的美学作品、理论作品和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倾向于党的艺术家和“同路人”互相竞争的时代，是全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一起繁荣的时代，是大本大本的杂志和文艺沙龙复活的时代，是文化社团和各种宣言数量激增的时代。迁移到西方首都去和从西方首都归来的苏联艺术家们都把自己看作是国际文化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这是一个试验时期，在政治先锋派的宽容统治下，文化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虽然是短暂的发展。②

---

① 夏皮罗：《共产党》第343页。关于二十年代党的思想的一些方面，可见朱拉夫斯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鲍尔：《苏联心理学中的新人》；菲茨帕特里克：《教育人民委员会》。《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是最有意思的党刊。

② 阿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是二十年代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民委员，他以他的自由主义态度和温和方针著称。见菲茨帕特里克：《教育人民委员》。爱伦堡的《回忆录》的头几章中就叙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文化的高涨和繁荣。举一个出版者之间的竞争的例子：1927年私人出版者出版了书籍总数的6%，书籍种类的25%。《苏联：事实、说明、统计》（华盛顿，1929年版）第196页。

提起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人们常常想到它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在二十年代，许多作家都写过大量重要的作品，他们中间有帕斯捷尔纳克、巴贝尔、奥列沙、卡塔耶夫、费丁、叶赛宁、阿赫马托娃、弗瑟沃洛德·伊凡诺夫、肖洛霍夫、扎米亚京、莱昂诺夫、波尔尼阿克、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左琴科和马雅科夫斯基。实际的名单比这还长得多，都是些苏联文学界的巨匠，其中许多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就在肉体上或艺术上消失了。

然而，文学只是这幅图画的一个部分。因为在那个时期，其他文化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再略举几例加以说明：埃森斯坦、维尔托夫、普多弗金和多弗任科就是在那些年里开创了俄国现代电影事业的，麦耶尔霍德和塔伊洛夫的试验性作品带来了当时戏剧的革命化，塔特林、罗辛科、马列维奇、利西兹基、金兹伯格、维斯宁和斯捷尔贝格兄弟、麦尔尼科夫、列昂尼多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则分别在创立俄国现代绘画、现代建筑学和现代设计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仅苏联的二十年代是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也同魏玛文化一样，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光辉灿烂地兴起，悲惨地终结，但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①

不过，下面这种情况也是事实，就是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和国家对新经济政策的宽容是相对的，而且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当时，有些艺术家遭到了公开的诽谤而且接近于被列入黑名单，非党专家

① 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可见罗伯特·A·马圭尔：《红色处女地：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普林斯顿，1968年版）；马克·斯洛宁：《从帝俄到苏联的俄国戏剧》（克利夫兰，1961年版）第8—9章；阿纳托尔·科普：《城镇和革命：苏联建筑学和城市设计（1917—1935）》（纽约，1970年版）；德怀特·麦克唐纳：《论电影》（纽约，1971年版）第4部分；约瑟夫·弗里曼等：《十月的声音》（纽约，1930年版）和《革命中的艺术：1917年以来苏联的艺术和设计》（伦敦，1971年版）。

常常受到骚扰，农民业主有时被地方干部凌辱，警察对发财致富而出风头的耐普曼进行突然袭击的事倒也屡见不鲜。[①] 但是，同以后的情况相比较和就新经济政策本身的含义来说，新经济政策时期仍是一个比较多元化和自由的时期。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它不久就被斯大林分子谴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就是调和和一视同仁。[②] 党和国家并没有不准它的许多“半友半敌的人”给自己戴上“苏维埃”的称号。同后来的情况不一样，在二十年代，这个称号主要是按领土范围而不是根据对党的框框的盲目忠诚来确定的。[③] 正是这种对社会多样性的容忍和官方对社会和谐和法制（而不是官员的目无法纪）的强调，三十年后，使那些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自由的共产主义秩序的样板，认为它提供了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但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党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就不是它对将来的号召力而是它当前的现实状况。在许多重要方面，新经济政策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它带来了国内的安宁、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而且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即它维护

---

① 官方报纸上有时报道和谴责这类事情。在二十年代曾有过困难的，虽然不是不可忍受的经历的一个作家就是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见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反对希望的希望》第35、138、173页。

②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政权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有时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把它说成是“一种不仅对机会主义思想，而且对直接的敌对思想所采取的调和和容忍态度”，是“放松或丧失了党的警惕性的结果”。波波夫：《历史大纲》第2卷第433—434页。另见《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自由主义代言人的位子》，载于《真理报》1929年11月21日第3版和《反对文艺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山口〉的讨论（1930年4月）》（莫斯科，1931年版）。

③ 我从马克斯·海瓦德对苏联文学的不同流派的讨论中借用了这个见解。帕特里夏·布莱克和马克斯·海瓦德主编的《苏联文学中的不一致声音》（纽约，1962年版）第42页。爱伦堡的《回忆录》第76页上的一段轶事肯定了这一点。

住了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治的垄断，而且从“反革命活动”在二十年代下降的情况来判断，它还加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

除此之外，在二十年代，在福利、教育、妇女权利、离婚和堕胎等方面，进步的社会立法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政策时期过后，这一切又基本上都恢复了原样）。[①] 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安宁，还使政府得以在清除各种社会弊病方面取得进展，这些社会弊病过去一直折磨着它的主要选民——穷人。到二十年代末，全国能读会写的人数显著增加，进小学和中学读书的人数超过了战前的一倍；死亡率降低百分之二十六，婴儿死亡率降低约百分之三十，患性病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②] 其中许多进展，例如在教育方面的进展，只是在这个仍然极端落后的社会里向前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而在其他方面，例如在社会福利方面所规定的许多条款，还仍然是诺言而不是现实。尽管如此，鉴于财力、物力的不足，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短短的几年里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应该说是很大的了。

的确，俄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他们发动了1917年的社会革命——现在生活得比在旧政权底下好，这几乎是没有问题的。从短期收获来说，农民是这次社会大变动的主要受益者。虽然普通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他们仍然用原始的工具耕作，几乎没有什么牲畜，但是革命赶走了地主，给了他们土地，废除了他们所负的沉重债务，使他们成了独立的生产者。而且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

---

① 可见鲁道夫·施莱辛格：《苏联的家庭》（伦敦，1949年版）第1和第2部分。

② 尼古拉斯·德威特：《苏联的教育和就业》（华盛顿，1961年版）第577页；《苏联》第197页；N·A·瑟马思科：《苏联的健康保护》（伦敦，1934年版）。九岁以上的人口中识字的在1897年占24%，在1926年占51.1%，增长中百分之几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努力而得到的，则无法弄清。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到了二十年代初期，当革命的烟雾消失以后，他们又重新回到自己过去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中去了。很少有党的干部进到村子里去，这些村子直到1928至1929年间还不是由地方苏维埃，而是由传统的公社(现在被谨慎地称作为“村社”)有效地管辖着。① 还由于它对农民所采取的福利措施，结果苏维埃政府这时即使还没有赢得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欢心，也至少已经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所接受，党在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心中的威信和影响不断提高。一位外国观察家在1927年曾说过：“旧的村庄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不管消失的速度是多么缓慢。”②

党是以产业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但产业工人阶级的收获却并不那么明显。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兑现最初答应的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交给工人的诺言，不过工人阶级总的状况比起革命前已有很大改善，革命前的工业状况简直是糟透了。到二十年代末，城市和无产阶级队伍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规模，平均工作日从十小时减到七个又半小时；实际工资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虽然还很低，但是比1913年还是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十一；工厂的工人和农民一样比革命前吃得好了。另外，广泛的(虽然常常是很不够的)社会保险、工会福利、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也都改善了工人的状况。然而另一方面，城市的失业大军在1927年达到了

① 梅尔：《俄国的农民组织》；尤佐鲁·塔纽齐：《二十年代中的俄国村社》(英国伯明翰，1968年版)。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生活，也可见莱文：《俄国的农民》第1章。在1927年，每一万名城市居民中有319名党员，而每一万名农民中则仅有25名党员。四分之三的农村中没有有组织的党的活动。《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共产国际》(伦敦，1928年版)第499、504页。

② 卡尔·博德斯：《苏维埃统治下的农村生活》(纽约，1929年版)第132—133、183、191页；梅尔：《俄国的农民组织》第129、209、212页；芬索德：《斯摩棱斯克》第138—141页。

一百五十万之多，比1924年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条件仍然很差，事故不断发生；食品和衣着出奇的昂贵；住房条件自革命以后严重地恶化了。①

要精确地计算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在革命成功十年后的得和失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已经有千百万人死于国内战争和饥荒，也要考虑到由于布尔什维克未能履行对幸存者所作的诺言而造成的使人情绪低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工人和农民（在较小的程度上）所得到的社会变动，以及他们在新社会中的“地位的变革”。布尔什维克从思想意识上提高了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对人们的心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虽然不好估量，却也不能小看。这种社会地位的提高，不管表现为官方宣传中对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歌颂，或者表现为委派他们作为“工人国家的代表”去完成一些次要的任务方面，或者仅仅表现在他们现在也能进入从前专为特权阶级设立和禁止普通老百姓进入的场所方面（如博物馆、剧院、宏伟的建筑等），这些大概都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他们的物质报酬仍然很低所造成的影响。② 不管衡量的具体结果如何，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那几年中，即在斯大林发动革命的前夕，要比1917年以前生活得好，也要比以后那些年生活得好。③

---

① 夏皮罗：《共产党》第332页；《苏联》第184—185页；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12和17章；索伦森：《苏联的工联主义》第9、11章。官方报纸上经常报道和悲叹恶劣的工厂条件。战争的破坏、人口的增长和落后的住房建设，使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从1913年的7平方米，降低到1928年的5.8平方米。阿维德·布罗德森：《苏联的工人》（纽约，1966年版）第113页。

② 我从达维德·舍恩鲍姆那里借用了“地位的变革”这个概念。见他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花园城，1967年版）第8—9章。

③ 苏联的叛逃者（也许是一批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人）后来回忆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发展中的一个黄金时代”。见雷蒙德·A·鲍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

然而，在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没有一个能够减轻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仍然面临着的那些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第一个是个体农业所处的原始、落后状态。当时的农业生产率仅仅勉强超过战前水平，而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的剩余农产品则仍然不祥地低于1913年前的水平。第二个问题也涉及到人口过剩和生产发展水平很低的农村，这就是，没有技术的、对生活不满的劳动力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中的失业队伍膨胀起来，并使城市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④ 这两个问题由于农村中在行政和思想上党的影响太小而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这两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在工业建设方面的雄心壮志受到挫折，并对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市场关系，即新经济政策的基础，造成了威胁。1927年1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制订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和增加工业投资，并在自愿基础上组织一部分合作社和由国家对个体农民提供帮助，企图通过这些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⑤ 这次党代表大会表达了布哈林主义的精神和通过了布哈林主义的决议，重申要采取"新经济政策的办法"。但是，正如1928年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表明的那样，当时有一种情绪正在一部分党员中增长，他们认为刚刚通过的这些政策太不够了，也制订得太晚了。

因此，就党的抱负而言，新经济政策所显示的是一幅混杂的图

拉克洪：《苏维埃制度是如何工作的》（纽约，1960年版）第138页。如果不说其他的，光是农村中每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在1928到1932年间就大大下降。见尤·阿·莫什柯夫：《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年代的粮食问题（1929—1932年）》（莫斯科，1966年版）第136页。

④ 例如，莫斯科的居民在两年中增加了204,000人，其中156,000人是从外地流入的。《国际报刊通讯》第9卷（1929年）第153页。

⑤ 李可夫希望采取这些措施后，农村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可在五年中得到解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874页。

画。二十年代的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充满了鲜明对比的国家：传统的和现代的东西、木制犁耙和机器、大片年久失修的房屋和巨大的建设项目、难以克服的文盲和灿烂的文化、失业和耀目的富足、免费初等教育和大约一百万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呻吟、社会主义的光明希望和到处可见的酗酒现象。① 正面的东西使人们对新政策和领导集团所执行的布哈林主义的政策产生信心；反面的东西则使人们产生怀疑和幻灭，就象那股仍然很强烈的革命战斗精神（尤其是在下级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尽管左派已被击败和丧失了信誉，但是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仍然存在着，人们仍然怀念着1917年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情景，同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各种阴暗面十分反感。② 随着经济和城市面貌的恢复，各种社会弊病也都复活了，出现了广泛的卖淫、赌博、贩毒、贪污腐化和投机倒把等现象。这些现象损害了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给新经济政策蒙上了一副"阴暗的相貌"，激起了党"强烈要求捍卫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同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半友半敌的人"进行斗争的决心。所谓"半友半敌的人"就是耐普曼（即那些靠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商人）、富裕农民、非党专家和艺术家等等。③

---

① 要得到关于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的生动印象，可看吉格·维尔托夫的有名纪录片：《带摄影机的人》（1929年）和他更早的新闻片：《电影〈真理报〉》。斯图尔特·蔡斯、罗伯特·邓恩、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等编的《第二个十年的苏维埃俄国》（纽约，1928年版）也是有用的。

② 见布哈林在1928年对这一仍然"很强的偏见"的评论。《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1页。这种精神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常有反映。在费奥多·格拉德科夫的《士敏土》（纽约，1929年版）第189、251页上，就可找到有名的例子。

③ 关于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见谢尔盖：《回忆录》第196—199页；爱伦堡：《回忆录》第66—70页；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53—54、56、231页；沃尔特·杜兰蒂：《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纽约，1935年版）第145—149页。小说家尤里·利伯亭斯基曾讲到党员作家中的"狂热分子"。这成了S·谢斯库洛夫的一本书的书名：《狂热分子——关于二十年代的文学斗争史》（莫斯科，1970年版）第3—4页。

然而，了解下面的这个情况是很重要的，即尽管新经济政策的身价不高，而且有许多缺陷和问题，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新经济政策还是达成了（虽然有时是勉强的）一个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适宜政策。布哈林和他的伙伴是这项政策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他们正象皮达可夫所说的那样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新经济政策分子"。但是，在二十年代，党内所有对立的领导人和派别都是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因而都是"新经济政策分子"。一般人以为左派是坚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其实这是错觉。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对领导集团制订的经济政策持最苛刻的批评态度，但他也是根据继续保留新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多元性、个体耕作和市场关系等设想来制订他自已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的。在许多人看来，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的狂热行为和偏执态度的化身，但同时他也是新经济政策所提倡的文化上的多样性的主要辩护人。① 说实在的，就连最后破坏了这项政策的斯大林也没有公开主张要废除它，这个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当时新经济政策已经成了全党的政策，成了共产党统治的样板。②

1928至1929这两年是苏联领导集团处理政治事务的行动和性质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段时间标志着从二十年代及其以前的那种基本上是公开的党内政治向三十年代及其以后的那种秘密政治的过渡。直到左派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为止，党内的政治冲突实际上都是公开的。虽然（象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家一样）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真心实意地为党内出现的明显的不团结行为感到遗憾，但那时对立的派别都是公开——在报刊上、在党员大会和党代

---

① 见列昂·托洛茨基：《论文学艺术》（纽约，1970年版）第63—82页。

② 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被废除之后两年，斯大林政权仍然正式宣布它的存在。说"新经济政策还未结束"。见《真理报》1931年3月21日第1版。

表大会上、甚至在大街上——进行争论和寻求支持的。就这点而论，苏联领导集团的公开政治，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更广泛的(虽然是有限的)开放性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和出版物所表达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到大众杂志刊登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不礼貌的漫画，都反映了这种政治生活的开放性。① 然而，1929 年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党的领导集团内部的政治冲突越来越秘密化，除了一些蛛丝马迹以外，公众什么也看不到了。

1928 至 1929 年间政治局内部以布哈林为一方，以斯大林为另一方的对抗是上述变化的一段过渡性插曲。因为，虽然双方都继续采取在党内寻找更广泛支持的做法，但他们做得却比过去要秘密得多。公开的冲突只限于在高级领导集团举行的由经过选择的人员参加的而且大多不作公开报道的会议上进行。公开的辩论，尽管又冗长又激烈，但用的却不是坦率的政治语言，而是进行隐晦的论战时所使用的那种谨慎的语言。在革命前的岁月里，党就曾用这种办法来逃避沙皇新闻检查官的检查，当时党内称这种语言为“伊索式的语言”。② 真的，在进行这场激烈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两派在公开场合都矢口否认这场斗争的存在，只是到了1929年年中当斗争的结果已成定局的时候，官方才披露了对抗者的姓名。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在范围更大的党员圈子里，人们对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内部出现的这场有关权力和政策的重

---

① 在《探照灯》和《火花》杂志上经常出现领导人的漫画。可见鲍里斯·叶菲莫夫：《漫画集》(莫斯科，1924年)第153页。斯大林在 1929 年取胜后，这类“友好的漫画”就不允许再画了。见《M·I·乌里扬诺娃——〈真理报〉的秘书》第 199—201 页。

② 关于明确地提到伊索式辩论的例子，见列昂节夫：《经济理论》第 52 页；《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和偏向》，载于《真理报》1929年8月 24 日第 1 版；《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 563 页。当然在二十年代的争论公开以前，领导人早先时候曾用“象征性语言”进行争论。见布哈林对这一点的承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133 页。

大斗争一无所知。实际上，有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分歧的消息很快地(虽然不是完整地)就一点一滴地传到下面干部的耳朵里来了，"每一个有文化的党员"都懂得这种伊索式的争论是怎么回事。[①]但是，自1917—1918年以来，党内发生的这场最激烈的斗争却是最不对外公开，最保密的。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在地下进行的，一些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包括右派反对派（布哈林及其伙伴们现在得到的称呼)的几个纲领性文件从来没有公布过。[②]结果，在当时，甚至到今天，人们对导致斯大林发动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些政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若明若暗的。

对党进行领导达三年之久的斯大林一布哈林合作体制，究竟是在什么时刻崩溃的，这也不是很清楚的。崩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1927年年底，随着领导集团在经济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向左转而产生的那些隐藏着的分歧，在那年1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变得明显起来。表现在会上发言的强调点不同，难于达成妥协而且出现了玩弄政治手腕的情况。这些分歧在1928年最初几个月里进一步激化，最后终于爆发了。如果说左派的最后失败使政治局右派同斯大林之间的联盟失去了政治理论基础的话，那么，1927年年底粮食收购量的急剧下降则使他们在国内政策上仍然存在着的一点一致意见也荡然无存了。

政治局在1928年1月初决定采取"非常"或"紧急"措施，这是一个关键性事件。这个决定虽然获得一致通过，但其后果几乎立即无可挽回地造成了政治局的分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支持这个决定，但认为作出这个决定是令人遗憾的而且只在短

---

① 就象伏罗希洛夫所指出的。见瓦甘诺夫：《右倾》第175页。关于普通党员如何知晓1928年年中的斗争的事例，可见《情报资料》1928年7月21日一期上的报道。

②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523页。

时期内有此必要。他们看来是主张开展一场有秩序和有限度的运动——仅仅对“富农中的投机倒把分子”采取经济上的制裁和主要是司法上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的也不过是按照刑法典第107条的规定有选择地没收囤积的粮食。① 但具体抓这项工作的是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他的实际做法同上面所说的情况大不一样。仅仅在几星期之内，一些主要的产粮区就遭到了一场有组织的“过火行动”的冲击，包括武装征粮队的征购活动、蛮不讲理和非法抢夺粮食和抓人，任意解散地方上的权力机构，关闭市场、个别地方甚至企图把农民赶到公社里去，等等。在农村老百姓看来，这场冲击很有点儿象战时共产主义的再现，加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从城里派来了三万名钦差大臣，人们的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农村出现一片恐慌，到处传说新经济政策已经取消。②

提出那些缺乏明确规定的所谓“非常措施”所造成的某些后果是可以预料到的，对此整个政治局都负有责任。但在决定运动的规模和采取过火的惩罚行动方面，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早在1月6日，这场运动的性质就由他的办公室下达给地方上党的干部的那些充满火药味的“特别”指示确定下来了。③ 他的最亲

① 第107条于1926年通过，但过去尚未应用过。G·柯纽霍夫：《同国内粮食困难斗争中的苏联共产党（1928—1929）》（莫斯科，1960年）第98—99页。李可夫和约瑟夫·瓦列基斯发表的声明表明，决定是一致通过的，也表明右派并没有预见到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果。见李可夫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讲话和瓦甘诺夫的《右倾》第149页。

② 莱文：《俄国农民》第10章；柯纽霍夫：《同国内粮食困难斗争中的苏联共产党》第119页；V·P·丹尼洛夫：《集体化前夕苏联农村中社会政治形势的特点》，载于《历史札记》第79期（1966年）第42页。斯大林在这个运动所起的特殊作用，后来被颂扬为“斯大林所拟定的伟大战略计划”的开始。见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第463页。

③ 关于斯大林给地方官员直接下指示的例子，可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10、15页。另见莱文：《俄国农民》第217页；《粮食采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党的任务》，载于《真理报》1928年2月15日第1版，这篇文章讨论了1月6日的指示。

近的伙伴，其中包括米高扬、拉托·卡冈诺维奇、安德烈·日丹诺夫、尼古拉伊·斯维尔尼克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负责抓各地区的运动。[①] 最出人意外的是，斯大林本来是很少到各地去走走的，1月15日他竟然亲自动身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去作为期三周的巡视，那两个地方尽管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收购水平却很低。他的旅行活动象一次军事远征。每到一地都要把当地的负责干部召集拢来，粗暴地驳斥他们对当地情况和法律程序问题所作的解释。斯大林斥责他们无能，骂他们是胆小鬼，有时还指责他们是富农的代理人。他给那些经过改组和清洗的党组织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务必收集到大量粮食，否则就要受到更严厉的惩办。[②]

2月6日，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投入了政治局内的一场激烈冲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显然重申了他们对原先的决定的支持，但指责斯大林在贯彻这个决定时采取“过火行动”，尤其批评他牺牲中农利益、采取高压手段和破坏地方市场。很可能对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进行了争论。双方都认为，富农为了抬高粮价，把粮食藏在家里不肯拿到市场上去卖，但斯大林把这种“囤积”的规模和背叛性质说得严重得多。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曾突然提出个体农业是行不通的，他下结论说：“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现在同意有必要提出一项有限度地进行集体化的纲领，但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种可怕的提法是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造

① 柯组霍夫：《同国内粮食困难斗争中的苏联共产党》第119页；卡冈诺维奇：《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的目的和任务》（莫斯科，1933年）第13页。显然参加这场运动的唯一的右派是乌格拉诺夫，他参加的时间很短。V·莫洛托夫：《在两条战线上》，载于《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2期（1月31日）第21页。

② 斯大林在西伯利亚的讲话片段，二十年后发表在他的《全集》第11卷第3—10页上，关于他的旅行路线，可见第317—318页。另见N·I·涅马科夫：《共产党——群众性的集体化运动的组织者（1929—1932年）》（莫斯科，1966年）第25页。

成这场粮食危机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个体农业结构，而是国家在制订价格政策和估计市场形势方面所犯的错误。①

不管在这方面讨论了些什么问题，结果是斯大林退却了，并且作了对右派极为有利的让步。领导集团发出了指示，虽然这些指示继续对富农使用原决定中使用的那种强硬语言，但同时也严厉地谴责了"过火行动"，并且强调指出那些"非常措施"决不是十五大所通过的总路线的一部分，也决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取消。斯大林在粮食运动中的主要执行者米高扬，不得不公开表示这些违法行动是"有害的、不合法的和不能允许的"。②在"粮食战线"（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字眼了）的其他方面，让步也是明显的。与此同时，在2月份，俄罗斯共和国的农业人民委员、右派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被撤消了职务，但是代替他的是另一个温和派，并且斯米尔诺夫本人也在党的书记处中安排了工作，想必是为了更好地约束斯大林。③

这场粮食运动除分裂了政治局以外，还造成了其他不可预言的、影响深远的后果。自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家第一次对农民自由处置自己的剩余农产品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这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它动摇了农民以为政府会公正地对待他们的信心，这样就使恢复正常的市场关系和布哈林所指望的粮食自由流通变得更加困难。第二，由于上面所说的措施取得了暂时的成功（1928春

① 关于政治局的会议，见丹尼尔斯《良心》第325页。早在1月31日，乌格拉诺夫就曾暗示了斯大林同这些过火行动的关系。见《真理报》1928年2月4日第2版。可把李可夫的《苏联的经济状况》（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和布哈林的《粮食采购的教训》第5—41页，同斯大林在他的《全集》第11卷第3—10，42—43页上的言论作一比较。

② 莱文：《俄国农民》第231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8页。即使是《真理报》上那篇响当当地反对富农的社论（1928年2月15日第1版）也谴责"过火行动"。

③ 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58页。取代斯米尔诺夫的N·A·库比亚克不久就在私人耕作的前途问题上同斯大林发生争论。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0页。

天重新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使该年年中的粮食收购量达到了1926至1927年间的水平），它们就促使人们考虑采取非市场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同样不祥的是，尽管官方表示不赞成采取“非常措施”，但“非常措施”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粮食危机的继续和加深，那些措施终于“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购粮制度，使农村的紧张形势大大加剧，导致了1929年年底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全面摊牌。① 最后，在1月份通过的那个决议本身同随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之间的矛盾之处，表明斯大林同他的对手相比拥有极大的有利条件：政策是由政治局制订的，但由斯大林通过书记处去贯彻，因此他能够改变政策。②

关于粮食问题的争论虽然很重要，但它只是1928年初暴露出来的党内更大的分歧的一部分。收购粮食遇到困难的消息表明，早在1月份领导集团内部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调子。古比雪夫（斯大林同意他的超工业化观点），劝党不要考虑市场上遭到的挫折，而是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逆流而上”。乌格拉诺夫——他所把持的莫斯科党组织给右派提供了组织上的主要支持——则敦促党在农村中进行安抚，在工业方面则谨慎从事。他在莫斯科党委会上说，1927年搞的那些大型工程项目应该削减，而对保持同农民的市场关系至为重要的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则应增加。③“谨慎”也是布哈林和他那“学派”的人的格言，他们利用列宁逝世

---

① 丹尼洛夫：《集体化前夕苏联农村中社会政治形势的特点》第42页；《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387页。

② 政治局一般每星期在星期四开一次会，时间为五小时。伊凡诺夫和什梅列夫：《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崩溃》第362页。一个共产党员说，“其他六天”斯大林“通过机关控制着党”。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58页。

③ 古比雪夫的话被引用于V·I·库兹明的《苏联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69年）第40页。关于乌格拉诺夫，见《莫斯科组织历史提纲》第445页。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也讲过类似的话。见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187—188页。

四周年的机会，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回忆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小农的重要性和列宁关于把"文化革命"放在首位的教导。[①]

就在这时，斯大林开始试探性地和偷偷摸摸地向右派的一些政治堡垒伸出了触角。在2月份，他企图插手莫斯科党委会的工作，但是受到了冷遇，结果乌格拉诺夫加强了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不久以后，红色教授学院里的斯大林的少数派想把该学院里由布哈林分子控制的党委赶跑，但暂时也没有获得成功。在2月份，布哈林本人则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同斯大林的门徒，包括洛米纳泽在内再次发生了冲突。3月份，托姆斯基和他的伙伴们发现他们关于欧洲工会的调和政策受到了斯大林分子罗索夫斯基的挑战。[②] 然而，在政治局里，领导集团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虽然关系紧张，还是设法保持了一致。李可夫在3月初提出的关于限制对重工业和集体农庄拨款的建议受到了批驳，但最后还是达成了妥协。虽然外边已开始谣传政治局发生冲突的说法，但是领导人却没有在公开场合显示出任何不和的迹象。[③] 真的，在1928年上半年发生的唯一一次涉及到布哈林的公开争论，是由于报上刊登了

---

① 布哈林：《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载于《真理报》1928年1月27日第5—6版；V·阿斯特罗夫：《列宁——正统的维护者》，载于《真理报》1928年1月21日第3版；A·斯列普柯夫：《列宁和文化革命问题》，载于《真理报》1928年1月21日第2版。

② 关于莫斯科事件，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4页；《莫斯科组织历史纲要》第445页。关于红色教授学院的这段插曲的一个歪曲的报道，出现在V·策伊马尔和P·波斯彼洛夫的《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学院党支部》一文，载于《真理报》1931年12月1日第3版。在二月里，布哈林尖锐地批评1927年12月流产的广州暴动为盲动主义。这次暴动是洛米纳泽和海因茨·纽曼鼓动搞的（有些人认为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319—324页。3月17日开幕的第四次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对托姆斯基的西方政策提出了挑战。见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1928年6月；《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781—787，1167页。

③ 关于李可夫的建议，见瓦甘诺夫：《右倾》第113—114页；《苏共历史》第4卷第1册（莫斯科，1970年）第551页。这时谣传说，李可夫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斗争。《社会主义公报》1928年3月21日第14页。

一张他在吸烟的旧照片而引起的。少共组织——少先队——要求知道他是否违背了他在一个月前作出的关于停止吸烟的“少先队誓言”。①

现在，除了这种或闪或现的分歧和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以外，又出现了另一个爆炸性问题。3月10日，保安警察宣布，在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上发现了一起同技术专家和外国有关的反革命阴谋案件。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其中许多人作了供认。斯大林把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捏造的事件搞成一桩全国性的政治丑闻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他想通过这件事把主张合作政策和强调国内和平的布哈林，把管理国家机关（大多数非布尔什维克专家都在那里工作）的李可夫和领导工会（工会在名义上负责监督非布尔什维克专家的工作）的托姆斯基等人都搞臭。沙赫特事件，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几乎同粮食危机一样重要。它为斯大林提供了运用他的杀人理论的最初机会，按照斯大林的这个理论，随着苏联社会向社会主义迈进，其内部敌人会加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抵抗，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和加强国家对他们的镇压。②到1929年，在农村中加强了强制行动，同时非党知识分子也遭到了一场日益加重的政治迫害，大批人被撤职和逮捕。

起初，沙赫特事件并没有直接挑起派别冲突。斯大林的某些支持者对他宣传“专家怠工”的猖狂现象感到吃惊，总书记本人在这方面是早就有名的。③但是右派受到的震惊最大。3月份听到这

① 《火花》1928年5月6日；《真理报》1928年5月13日第7页。

② 关于斯大林如何利用沙赫特事件，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5—53页和第12卷第11—19页；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28—30页；《社会主义公报》1928年5月18日第12页；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246页。

③ 古比雪夫就是一个。见古比雪娃：《V·V·古比雪夫》第290—291页；卡尔[illegible]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585—586页。关于斯大林的名声，见弗雷克慈曼：《格列勃·马克西米梁诺维奇·克尔日让诺维奇》（莫斯科，1964年）第171—172页。

个消息以后，他们立即要求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为非党专家在实现国家现代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辩护。大家都同意需要加速培养党员专家（斯大林现在激烈地支持这件事），但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认为，这既不是个阶级问题，也不能成为虐待非党人士的理由。[①] 他们并没有对沙赫特事件的事实本身提出疑问。但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们公开地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认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专家是忠诚的和不可缺少的，说沙赫特事件以及干部中存在的其他贪污腐化现象也有斯大林所领导的地方党组织书记们的一份责任。[②]

虽然斯大林对沙赫特事件的严重性的解释在领导集团里还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③] 但这种解释对他的政治野心所具有的价值却很快就清楚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隐晦地暗示高级领导机关里存在着政治上渎职的现象和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同时他利用党的"自我批评"这一旧口号设计了一种强大的武器。在"自我批评"的旗号下，他在干部中，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和工会中，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官僚主义"和"保守倾向"的运动。[④]"自我批评"成了斯大林的代理人手中一把锐利的斧子。斯大林的代理人在右派的各个堡垒中虽然居少数，但他们现在取得了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向地位稳固的右派领导人发起进攻和动员人们支持他们这样做。由于"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口号，布哈林分子不得不表示赞同这场运动并且落到只能提防这句口号不要被

---

① 瓦甘诺夫：《右倾》第102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68页。

② 见布哈林：《粮食采购的教训》第42—53页；李可夫：《苏联的经济状况》第40—51页；E·F·葉特林：《在白色的泥潭里》，载于《真理报》1928年3月27日第3版。

③ 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第499—500页。

④ 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第507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34、84—86、111—121页；《苏共决议集》（第8版）第4卷（莫斯科，1970年）第94—98页。

人"滥用"的地步。①

4月6日，当中央委员会自斯大林—布哈林合作体制开始破裂以来第一次召集中央全会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个别的领导人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看来是各唱各的调，但政治局却竭力显示出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作出了双方妥协的决议。代表们（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自外省的干部）的情绪当时仍然倾向于右派，全会通过的决议也对右派有利。大会虽然维护在粮食问题上采取的紧急措施，说这些措施已取得成功，并已接近结束，但是对这方面出现的"过火行动"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而且所有未来的政策，包括"向富农展开进攻"的政策，都是以新经济政策的调子，而且主要是根据布哈林主义的精神加以制订的。② 在一个问题上，斯大林遭到了明显的失败。他建议——大概是同沙赫特事件联系在一起谈的，并且事先没有打过招呼——把培养新专家的工作，从以自由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为首和在李可夫管辖之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转移到古比雪夫的最高经济委员会那里去。这个建议据说被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了。③ 最后，当中央委员会休会的时候，那场粮食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右派的观点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他们的政治力量似乎进一步加强了。然而，这些统统都是幻觉！

领导集团表面上保持的一点虚假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它内部

① 见阿斯特罗夫、斯列普柯夫和乌格拉诺夫，在《真理报》1928年4月20日第3版、1928年4月26日第2版、1928年6月17日第3版上的评论和《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4月19日第2版刊登的文章《A·斯列普柯夫同志论自我批评的提纲》。

② 《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492—510页；案文：《俄国农民》第296—297页。关于全会上发言调子明显不同的例子，见瓦甘诺夫：《右倾》第125、139—140页。

③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1928年6月。托洛茨基的报告似可由瓦甘诺夫的《右倾》第102页、《布尔什维克》1930年（11月15日）第21期第35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3、14页予以证实。

的倾轧，这一点在那次中央全会开过之后便立即显示出来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政治局这两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同一天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表了演说，然而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全国的形势却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斯大林恢复了他原先在"粮食战线"上所表现的那种好斗姿态，宣布沙赫特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揭开了"自我批评"运动的帷幕，他的讲话毫不妥协。他说："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他的打击对象是那些没有指名的，但谁都可以辨认出来的领导人，这些人"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他们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斯大林说，这种政策"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样的领导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① 与此同时，布哈林在讲到这些问题时，调子迥然不同。他第一次公开地对"某些人"的"倾向"表示担忧，他说那些人把"非常措施"看作"几乎是正常的"东西，他们"否定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而且总是夸大行政手段的作用。"②

正在这个时候，粮食危机再度爆发。由于农村的储备消耗殆尽、农民不再到市场上去出售粮食，又遇上严寒的冬季，使粮食的收购量突然再次骤跌。4月下旬，再次实行紧急措施，而且比以前更激烈，范围更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个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但即使他们给予了支持，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一定是忧虑重重的。富农的剩余农产品在第一次运动中就已经被拿光了，现在这些措施将会不折不扣地落到中农(即农民中的多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54页。就在同时，斯大林力图修改土地法，以打击个体耕作，但他没有得逞。夏皮罗：《共产党》第363页。

② 《粮食采购的教训》第32—33页。布哈林所指的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这一点后来由阿斯特罗夫证实，见《真理报》1929年7月3日第3版。

数）身上，所有剩下的粮食都在他们那里了。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由于粮食收购措施的加强和随之而出现的“过火行动”，农村中出现了广泛的不满和零星的暴动。农村骚动的消息和食品的短缺引起了城市中工人的不安。① 政治局内脆弱的一致实在经不起这个严峻的考验。在5、6月间，布哈林分子同斯大林分子终于彻底分裂。

直到1928年春天以前，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看来一直认为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还是可以商量的，因而一直试图在政治局内部加以解决。然而现在，他们（尤其是布哈林）被斯大林那伙人采取的越来越激进和不妥协的态度弄得惊恐不安了。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争论的焦点是对苏维埃政权当前面临的问题的相反的分析，例如对粮食短缺和沙赫特事件的分析。布哈林分子坚决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一些次要因素造成的，如：国家缺乏准备、计划不周、价格政策不灵活和地方干部玩忽职守等。② 另一方面，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则说这些困难是由结构上或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本身的性质和缺陷所造成的。斯大林分子强调，粮食危机加上富农囤积粮食一事表明，个体农业是没有出路的，粮食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都不是“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的暂时副产品，而是阶级战争不可避免地加强的明证。他们说一定要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③

布哈林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温和的补救办法，包括向个体农民提供帮助、制订灵活的价格政策和提高官方机构的工作效率等。而

---

① 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63—66页。另见柯纽霍夫：《同困内粮食困难斗争中的苏联共产党》第129页。

② 这是布哈林在四月全会所作的报告的主题（《粮食采购的教训》），也是他在这一年中反复讲的主题。见《一个经济家的札记》；瓦甘诺夫《右倾》第139—140页。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1—83、87—100页；关于斯大林后来对他同布哈林的早期分歧的叙述，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25页。

斯大林的分析则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解决办法。他还提不出一个比布哈林的政策高明的全面的替代办法，但他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即向着坚持“国家意志”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向，包括在所有战线上采取强制性的“非常措施”。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开始毁谤个体耕作制，而预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个“出路”。① 虽然这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农业问题，但它对工业政策和当时正在准备的五年计划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古比雪夫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中的那个经过改组的班子，已经在向国家计委里的那些小心谨慎的计划工作者提出挑战，国家计委的这些人关于按比例发展和使市场关系保持平衡的观点同布哈林的观点是相似的。到5月份，在政治局里已经能够听到计划工作方面的争吵声。② 因此，问题涉及到党的整个经济纲领，并再次涉及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未来的道路。

总起来说，斯大林在政策上搞的这些名堂，威胁着当时尚占上风的对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主义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实现国内和平和在城乡间建立互惠的市场关系的制度。右派认为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和基础上”加以解决，③ 但是斯大林的政策却同右派的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布哈林抱怨说，这些政策直接歪曲了四个月前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刚批准的党的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体现了右派的经过修改的纲领，但表明了党要向左转的意图，就是说要“向富农展开进攻”，建立一个不完全的、自愿参加的集体化农业生产部门，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1—83、87—100页；关于斯大林后来对他同布哈林的早期分歧的叙述，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25页；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第479页。

② 鲍古谢夫斯基：《五年计划的前夜》第476—482；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876—879页。

③ 托姆斯基在第十七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34年）第249页。

有计划地发展工业，进一步把重点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但是，每一个目标都是用温和的、布哈林主义的方式加以陈述的，显然排除了那些极端的政策。然而，斯大林现在却想方设法重新解释那些决议，使他自己的新的好斗政策合法化，例如，他把采取“非常措施”说成是执行大会通过的反对富农的决议的“正常”结果。①

布哈林确信，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已经“使党在思想上迷失了方向”并且正在形成“一条不同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新的政治路线”，于是他在5、6月间就不得不出来战斗了。他提醒政治局注意，粮食运动正在迫使全体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势不仅破坏了党的工业化纲领，而且也威胁了党的政治生命。他指出，以为“集体农庄可以拯救一切”，这是危险的胡说八道。他敦促党停止实行紧急措施，给农民以实际有效的援助并且使市场情况恢复正常。②

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们还用伊索式的语言对斯大林的思想展开了公开的进攻。5月6日，布哈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抨击了乱提“阶级斗争”和农业中的“某种突然跃进”等等口号的现象。三个星期后，在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他痛斥了那些主张“荒谬的”工业主义的人，说就其对农村的影响来讲，这种工业主义是“寄生性的”。③ 一些年轻的布哈林分子，例如马列茨基和阿斯特罗夫则不那么小心谨慎，他们点名批评那些级别较低的斯大林主义的干部，说他们热衷于“挑动党”同农民摊牌，说他们不要

---

① 见布哈林：《粮食采购的教训》第29—31页；V. 阿斯特罗夫：《关于目前的形势》，载于《真理报》1928年7月1日第2版；《真理报》1928年7月7日第2版上编者对克里茨曼的文章所加的按语。

② 根据布哈林在1928年5、6月间写给政治局的材料和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瓦甘诺夫在《右倾》第112、140页上引用这些材料。

③ 《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3—14、21—26、30页；《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第2版。

个体农业而要那种建立在“彻底毁灭农民”的基础之上的集体化，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一种“政策体系”，一条“经过(刑法)第107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于是，布哈林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们在公开场合一起出现时虽然在表面上还佯装一致，但实际上他们的对抗是越来越无法掩饰了。② 5月28日，他们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那天斯大林闯进了布哈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势力范围——红色教授学院，发表了《在粮食战线上》的讲话。他厉声批评他未点名的那些对手所提出的论据是“自由派的空话”和“离开了列宁主义”，并就个体农民经济问题作了迄今最极端的公开发言。听众们十分明白他所攻击的对象是谁，都对他的讲话感到惊讶。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布哈林开始在私下里把斯大林说成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代表。③

与此同时，布哈林试图对政治局施加影响。在5月下旬发给(6月份又发了一次)政治局委员的、经过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同意的材料中，他批评了斯大林的方针并详细阐述了他自己的建议。他指出，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政治局不再有“一条路线或者一个总的考虑”，政治局的政策都是临时拟定的。因此，在

---

① D·马列茨基：《虚伪的调子》，载于1928年6月30日《真理报》第2版；《真理报》1928年7月1日第2版和7月3日第3版上阿斯特罗夫的文章。

② 可比较他们在第八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3—16、18—41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6—66页。

③ 关于斯大林谈话的部分记录出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1—83页。第一手的材料，见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章。另见丹尼尔斯：《良心》第328页。这篇谈话的纲领性意义在于斯大林完全抛弃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正式提法。他没有象习惯的那样把改进个体耕作制置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前，相反，他把它放在末位。在政治压力下，他后来又回到了习用的提法，但是，1929年4月在他战胜布哈林后，他又颠倒了这个秩序。最后于1929年12月27日，他把这个双重性的提法统统抛开，宣布集体化是唯一“出路”。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0—181、225页和第12卷第53、129—130页。

预定于7月4日召开的下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斯大林一面接受了布哈林在政策方面提出的"十分之九"的建议，一面进行顽抗，他坚持，领导集团必须再次提出一致同意的决议，最后也就是这样做的。布哈林埋怨说，斯大林在政治局里玩弄的策略，是躲避问题的实质和进行欺骗，把空洞的让步和虚情假意结合在一起，想方设法"使我们显得象是分裂者"。①

到6月下旬，尽管对外还保持着门面，政治局内部已经没有人再假装、也没有基础再保持一致了。6月15日，财政副人民委员、右派分子莫伊塞·弗鲁姆金送交政治局一封使人焦虑不安的信，信中对农村形势的评价比布哈林的说法更加悲观。他汇报说，他的观点是得到"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的。政治局经过表决，决定把这封信连同一封集体的复信交给中央委员们传阅。但是斯大林立即破坏了这个决定，他通过书记处发出了他自己的一封复信。布哈林极为愤慨，指责斯大林把政治局当作"总书记底下的一个咨询机构"。斯大林则试图安抚布哈林，说："你和我是喜马拉雅山，而其他人则不过是无名之辈。"布哈林在一次"狂怒的"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了这句话，斯大林则大喊大叫地加以否认。原先的两巨头之间已不再有什么友好关系了，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终于彻底破裂。现在，布哈林拒绝给政治局委员们散发他的书面建议，而是直接向他们宣读。他对他们说："连一片纸都不能托付给他。"他以"极端憎恶"的口吻谈论斯大林，说："他是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把维护自己的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的理论是变来变去的，取决于他当时想搞掉谁。"②

---

① 瓦甘诺夫：《右倾》第112、140—141、144—145页；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5—276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瓦甘诺夫：《右倾》第141—142、144—145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01—110页；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

围绕政策问题的争论再次变成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内部的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召开七月中央全会的前夕，政治局的两派都动员了他们在外面的支持者——即斯大林所谓的"外围"——① 并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十年前，布哈林曾领导过以莫斯科为基地的左派共产党人。现在，目标变了，盟友也变了，但是布哈林派活动的中心却仍然是莫斯科的党组织。乌格拉诺夫和他在莫斯科党委会中的副手们利用他们在首都的方便，为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提供了组织上的基地，他们都坚决地和无保留地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们同在政府和党内的自己人举行秘密会议，在未参加两派的人中进行游说，用自己的组织手段同斯大林的党机关干部相对抗。②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在其他地方，在国家部门、工会、党中央各部门和教育单位等设法加强控制，网罗支持者和减弱"自我批评"运动的声势。他们的一个盟友悲叹地说，斯大林需要这场"自我批评"运动，就象"沙皇需要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③ 这场秘密斗争还伴随着一场唇枪舌战，忠于对立的两派的报纸加强了伊索式的论战，而且双方都在传看着各自的秘密文件。

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得中央委员会七十一名正式

---

① 克森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勃特·M·斯劳瑟主编的《1928—1934年苏联对外政策：文献和材料》（2卷集，深克和伦敦大学，1966—1967年）第1卷第175页。

② 乌格拉诺夫等看来早在1928年就已开始他们的亲右派的活动。见潘可夫的证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44—646页；《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1919—1929年》（莫斯科，1969年）第244—258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53—156页；托洛茨基：《亲爱的同志》1928年9月。

③ 工会干部科泽列夫的话。G·K·奥尔忠尼启泽在《文章和讲演》第2卷（莫斯科，1957年）第245页上曾引用。另见《V·科赛列夫的声明》，载于《真理报》1930年7月6日第4版；《共青真理报》1929年4月19日第2版；《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134—1135页；《真理报》1931年12月1日第3版；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1928年6月。

委员中的多数的支持。随着七月中央全会的临近，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在莫斯科的伙伴们看来承担了右派的大多数游说工作，他们频繁地会见来自各省的代表。① 但是布哈林也派出自己的特派员。这样，在6月份，斯列普柯夫来到了列宁格勒这个关键性党组织的所在地。他的两个同伴——布哈林分子斯捷茨基和彼特罗夫斯基——分别在那里担任着列宁格勒市宣传鼓动部负责人和《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的工作，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②

布哈林分子对中央委员们的呼吁，集中在这样两点上：第一，立即毫不含糊地停止“非常措施”的必要性；第二，斯大林在贯彻这些“非常措施”的过程中所起的腐蚀作用。他们指出，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经济上的损失越来越大而且使农村的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强调，斯大林在征粮运动中的错误做法和其他一些做法违背了十五大及其以后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因此对目前的不幸局面负有主要的责任。他们强烈地提出他在政治上为所欲为和推行“亚细亚式的政策”的问题，大有要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之势。（托姆斯基显然渴望获得这个职务，但竭力主张撤消斯大林职务的乌格拉诺夫也是合乎逻辑的候选人。）③ 虽然未参加两派的代表们在听到“话题转向取代斯大林的可能性”时都“十分害怕分裂”和表现得十分惊慌，但他们在政策问题上的反应却一开始就

---

① 从《反苏集团案》第118、128页上收录的稀奇古怪的证词中可看出，布哈林也对地方上的代表作了游说工作。

② 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1928年6月。关于斯捷茨基和彼特罗夫斯基，见《列宁格勒组织历史纲要》第2卷第316页。

③ 布哈林一加米涅夫备忘录；科泽列夫的文章，见《真理报》1930年7月6日第4版；乌格拉诺夫在十四大上的发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299页；兹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198页。乌格拉诺夫说：“斯大林骑在党的脖子上，我们需要撤掉他”。见丹尼尔斯在《良心》第333页上的引语。

使布哈林分子受到鼓舞，他们那么容易接受布哈林分子的主张无疑是由于受到了新的农民骚动的消息的影响。①

真的，在1928年春天和夏初，右派的政治力量看起来是令人生畏的，它动摇了人们以为斯大林近年来早已是至高无上的总书记的看法。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他们在职务上享有的声望和权威以外，在党的执行委员会里还拥有巨大的表决力量。在九人政治局里，他们依靠右派分子加里宁的支持和利用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的中立或摇摆，可以期望获得能起作用的多数来对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② 人数众多的莫斯科代表和工会代表还使他们在组织局里拥有多数并在书记处里拥有强大的少数——两票对斯大林的三票。③ 如果在中央委员会里摊牌，情况就不那么清楚了。布哈林也许期望在开始的时候同斯大林平分七十一票中的大约三十票，而把其余的人看作是哪派也不参加的人。④

在党的领导机关之外，右派的力量就显得更加壮观了。托姆斯基那个自称是为一千一百万工人说话的工会"领地"，为右派提供了另一个组织基地，并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舆论集团在发挥作用。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

② 右派指望着亲农民的加里宁，是可以理解的。军事首领伏罗希洛夫长期来是斯大林的亲信，但据说他担心斯大林的农村政策对主要是农民的红军可能产生的影响。至于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从布哈林提到的政治局"九人执政"的话来看，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这时候或者弃权，或者不经常参加投票。关于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另见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57页；《社会主义公报》1929年10月10日第14页；《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903页。

③ 布哈林在七月说："组织局是我们的"——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瓦甘诺夫在《右倾》第144页上肯定了这一点。当时书记处的正式成员为斯大林、莫洛托夫、柯西奥、乌格拉诺夫和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最后两人是支持右派的。

④ 布哈林开始时依靠的大约有15人的一个坚强集团，包括了莫斯科的和工会的代表、政治局中三个人，再加斯捷茨基、奥辛斯基和索柯尔尼科夫。这个人数中不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他们不久之后就转向斯大林那边去了，也不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和库比亚克，他们最终是支持右派的。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情况是不公布的。

在李可夫的人民委员会领导之下的中央一级的一些国家部门（尤其是农业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党依靠它们来制定和贯彻其社会政策——，布哈林的观点仍然占着优势。[1]右派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现在被称为奥格普（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简称——译注）的保安警察部门。斯大林早已开始在那个部门培植后来为他服务的个人关系了。（1928年布哈林曾抱怨说有人窃听他的电话并对他进行跟踪。）保安警察部门的头头分成两派：第一把手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支持总书记，他的两个副手根里赫·雅格达和米哈伊尔·特里利萨尔则倾向于右派。[2]最后，布哈林分子仍然控制着党的舆论机关，在这个阶段这一点还是相当重要的。除了大专院校和中央委员会的两种官方报刊《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以外，布哈林及其伙伴还控制着在首都出版的几乎所有主要报纸和第二大城市的主要日报《列宁格勒真理报》。只有一家重要的莫斯科报纸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那就是共青团的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3]

事情的发展很快就会证明，右派的政治地位并不象他们掌握的一长串职务和同盟者所显示的那样强大，实际上要脆弱得多。除了其他事情以外，斯大林在六年之久的时间中操纵党的书记处所获得的好处，很快就在下面这些关键的地方表现出来了：在右派的

---

① 瓦甘诺夫：《右倾》第144页。

②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此外，布哈林曾在7月全会上透露，雅格达向他提供了有关农民骚乱的材料，这些材料他通过正常途径是得不到的。另见明仁斯基在全会上的讲话和布哈林和雅格达在《反苏集团案》第385—386、568、692页上的证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们，其任务是处理公民的骚扰，据说对正在发展的农民骚动的浪潮表示不安。同右派的个人关系可能也起了作用。见西蒙·伏林和罗勃特·M·斯罗瑟：《苏联的秘密警察》（纽约，1957年）第43—46页。当特里利萨尔1929年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被撤职的时候，雅格达充当了斯大林的警察首脑，后来在1938年同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起受审并被处决。

③ 瓦甘诺夫：《右倾》第144页；《社会主义公报》(1952年7—8月)第19页。

每一个"领地"内都存在着一个斯大林分子组成的强大的少数派；几乎所有在开始时不参加那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后来都倒向了他；在下一级领导人中，尤其是那些在当时作为高级领导机关包括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员的党的书记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是跟他走的。[①] 如果说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形式上在这个由党领导的国家的高级机关里占着上风，垄断着其权力的象征的话，那么斯大林则控制着一个强有力的影子政府，一个"党中之党"。[②] 当在最高层，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斯大林的时候，他在各处的力量便开始排挤和取代盘踞在那里的那些忠于或同情右派的领导人了，这个过程由于推行了十年之久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和服从上级命令的习惯而加快起来。

不过，无论在当事者还是在旁观者看来，7 月 4 日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右派，这个事实有助于说明当时斯大林为什么不愿意冒公开对抗的风险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再作出让步。[③] 这也说明了布哈林为什么会对中央全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慨，全会公开发表的决议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会议进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关系。从表面上看，布哈林分子是胜利者。主要的决议虽然是妥协的产物，都(最后一次地)反映了右派的呼声。这个决议保证个体农民可以获得安全并在新经济政策下发挥重要作用，保证最终地结束那场紧急运动，并决定（虽然斯大林加以反对）提高粮食价格。这个决议是如此的调和，以致

---

① 在八个没有表决权的政治局成员中，只有乌格拉诺夫支持右派。

② 见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 48、54 页；潘科夫提到的"两个莫斯科委员会"——乌格拉诺夫的官方委员会和另一个忠于斯大林的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 1 卷第 646 页。另见勒温：《俄国农民》第 278 页。

③ 对雅格达来说，"很清楚，右派正在攫取权力"。《反苏集团案》第 692 页。这也是托洛茨基在 1928 年夏初的印象。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 412、428 页。

处在流放中的左派反对派都为右派的胜利而悲叹。托洛茨基预言，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久就会“把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抓住，就象斯大林曾把季诺维也夫抓住那样。”①

实际上，正象布哈林所理解的那样，那次中央全会是右派的一次大挫折。现在，政治局的不和已经部分地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暴露出来了。② 虽然政治局的领导人继续在煞费苦心地玩弄外交手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间接地批评对方，但他们的支持者们却彼此进行着激烈而直接了当的攻击。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为斯大林说话，斯捷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则站在右派一边（奥新斯基多年来同左派站在一起，由于青年时代在莫斯科同布哈林结下的政治友谊，后来又重新与布哈林为伍）。当围绕农民政策进行的激烈争论展开的时候，右派争取多数的希望落空了。布哈林曾指望得到重要的乌克兰代表团和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但这两个代表团都没有介入争论，列宁格勒来的那些人还公开宣称他们同斯捷茨基——他们自己代表团中的一名成员——没有关系。③ 许多代表由衷地为日益高涨的农民骚动浪潮感到担忧，因此发言时带着一种矛盾心理。但他们既不愿意指责斯大林，也不愿意赞同无限制地对农民作出让步而牺牲工业化运动的利益。他们的调子并不是斯大林分子的调子，但是也已经脱离了右派的轨道。布哈林推断说，从最好的方面考虑，他们“仍然不理解分歧的深度”。更糟糕的是，右派还同样明显地失去了它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正如他们的行动所表明和布哈林所吐

---

①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428页。关于决议，见《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11—524页。

② 关于会议进行的情况的部分速记记录存在于托洛茨基档案中，编号为T1832—1836、1900—1901。在托洛茨基的《亲爱的同志》（1928年9月）（T 2442）中还有补充材料。只有斯大林的发言曾被发表。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5—170页。

③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露的，“在最后一刻背叛了我们。……斯大林对他们有某种特殊的控制。”①

斯大林一伙察觉到了代表们的情绪，因此变得更加大胆了。莫洛托夫公开批评《真理报》就粮食收购运动发表的一些社论，这样也就影射批评了布哈林本人；卡冈诺维奇则猖狂地为“非常措施”辩护，以致把这些措施说成“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② 在全会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站起来作了主要发言。感到沮丧的布哈林试图使中央委员会觉醒过来。他强调指出，没有繁荣的农业，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工业化，而由于征粮的结果，目前农业正在衰退。此外，面临着“群众普遍的不满情绪”和“矛头对着我们的农村统一战线”，苏维埃政权正濒于同农民彻底决裂的境地。他说：“大钟已经敲过两下，第三下很快就要敲响。”③ 斯大林分子则以蔑视的口吻进行反驳，说他是个“制造恐慌的人”总书记本人也同样无动于衷。他根本不考虑右派的告诫，说那些话是“悲观哲学”和“投降主义”；相反，他大谈特谈阶级斗争和集体化，并且突然为一种新的过去从未专门提及过的农民政策作了理论说明。他说：由于苏维埃俄国没有殖民地，所以农民必须交纳“某种‘贡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布哈林被弄得晕头转向了。他从前的这位盟友不但采用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证方法，而且还运用了他那种严谨的辩论术。④

---

① 即使是那些最终支持斯大林的人也对农村的形势感到担忧。见安德烈耶夫和乌克兰人柯秀尔和久巴的评论(T1835,T2442)。伏罗希洛夫打断了布哈林的讲话并对之提出诘问，从而表明了他的忠诚。

② 根据李可夫的发言(T1835)。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布哈林分子的报刊对紧急措施的攻击(T1833)。1929年7月7日《真理报》第2版上对克里茨曼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③ 布哈林的讲话(T1901)。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8—170页；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从形式上看，这次中央全会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布哈林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直接被击败，全会通过的决议主要也是反映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大多数代表与其说具有僵硬的派性，不如说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布哈林还是感觉到了右派的危险处境。右派在政治局内是少数，而且不能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残忍而手段高明的、决心要"割断我们喉咙"的对手，这个对手的政策正在"导致内战。他一定会把农民的暴动淹没在血泊之中。"① 布哈林为事态的这种变化感到惊恐，他迈出了绝望的一步，这一步当被人发觉的时候，它产生了对他不利的影响。他破坏了"党的纪律"，同名声扫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进行了个人接触。7月11日，即中央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他秘密地拜访了加米涅夫。

我们从托洛茨基分子获得的并在六个月后秘密出版的加米涅夫的简短笔记中得知了他们谈话的内容。② 布哈林听信了斯大林授意散布的一个谣言，说总书记自己很快就要同左派言和了，因此来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作，要使他们改变看法，或者说是劝他们不要同斯大林接近。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致认为："现在如果在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会好得多。……我们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比我们同你们的分歧要严重许多倍。"在"惊恐万状"的布哈林叙述他同斯大林之间的不和的由来时，他给予加米涅夫的是"一个自知注定要完蛋的人给人的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② 同上。索柯里尼柯夫陪同布哈林，把会见安排在7月9日，就是斯大林在全会上作"歌颂式"讲演的那个日子。布哈林和他的秘书斯腾(他本人同左派阵营有非正式的接触)后来坚持说，加米涅夫的笔记给人错误印象，而且是片面的。但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些笔记的基本真实性。《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889、893—894、897—898页。

那种印象”。布哈林满脑子想的都是斯大林的邪恶，说斯大林是“成吉思汗”，其“路线会毁掉整个革命”。他的心情就象哈姆雷特的心情那样，他想把这场斗争公开，却又不能这么做，因为胆小怕事的中央委员会会反对任何一个制造公开分裂的人。“如果我们说，就是这个人，他使国家陷入饥馑和毁灭的境地；他就会说，他们是在为富农和耐普曼辩护。”布哈林只能希望，他的谨慎的努力或者外面发生的事情会使中央委员会相信斯大林所起的“致命的作用”。说了这些，他就离开了，嘱咐加米涅夫保密，并提醒说他们是受到监视的。那一年，他们后来又见了两次面，气氛还是同这次一样令人抑郁，谈话的内容也同样不得要领。①

七月全会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虽然它既没有使斯大林在政治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没有授权斯大林起草纲领，但是它却使斯大林壮了胆，并使右派在领导集团中降到少数派地位。由于斯大林还在摸索替代的政策，他还不能肯定自己的政治力量到底有多大，右派也默许掩盖分裂，因此政治局继续保持着团结的假相。但是现在，形势是对斯大林有利了。他首先在一个不同的舞台上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7 月 17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世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大会开了六周，在此期间，布哈林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为了争取控制这个国际组织和指导国外共产党的政策而展开了一场拚死的战斗。

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国际在过去七年中所执行的政策，尤其是自 1925 和 1926 年以来布哈林在其中执行的统一战线战略，在 1928 年夏天，这些问题变得明朗化以后，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同国内政策问题上的争论是同时进行的。1927

---

① 关于他们后来的会见，见《在中间偏右集团内部》，载于《反对派通讯》1929 年第 1—2 期，第 15—17 页。

年在中国和西方的革命遭到挫折之后，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也开始进行修改。在这方面，当时布哈林也没有把这种向左转看成是要从根本上同原来的路线决裂，而只是把它看成对原来路线的一种温和的修正，目的是使共产党能更独立地开展活动并减少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层人士的合作。1927年年底，出现了要求加强共产国际的战斗性的呼声；但只是到1928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而后又在他的积极插手下，才对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威和推行的政策提出了直接的挑战。1928年2、3月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和第四次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暗中发生了一些初步的交锋。[①] 到7月份，大概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公开地批评了布哈林当时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草案（这是自1922年以来布哈林起草的第三个也是最有抱负的一个草案），这个草案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斯大林在许多地方诋毁我的纲领。"[②]

国际政策上的斗争，是围绕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近期出现革命形势的可能性的两种互相冲突的估计而展开的。因此，这场斗争成了有关"第三阶段"的性质的一场争论。1927年，官方曾正式宣布"第三阶段"已经开始，但对这个阶段却有不同的解释。简而言之，斯大林分子现在断言，从德国到美国的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正处在深刻的内部危机和革命大动荡的前夜。基于这种估计，他们在策略上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外国的共产党应当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办法是制订完全独立的行动方针，拒

① 执委会全会宣布了一种"阶级对阶级"的政策，并命令英国和法国的党向左转，但提醒不要走极端。见布哈林的讲话："苏共和共产国际中的反对派"，《国际报刊通讯》第8卷（1928年）第213—218页。关于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互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决议，见《第四次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决议集》（莫斯科，1928年）。

②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绝同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所有地方建立起与现在的工会相对立的工会组织。第二，他们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向社会民主党发起进攻，肃清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影响。按照斯大林分子的说法，社会民主党已经从装门面的改良主义发展成了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社会法西斯主义”。第三，所有的共产党都应当准备进行革命的战斗，把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右倾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在新的环境下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内部的主要危险。①

这些要求等于是要使布哈林提出的共产国际政策名声扫地。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布哈林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他曾在1926至1927年间，后来又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重新修订过）渊源于他在战前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并没有出现内部崩溃的现象，相反，却在更高的技术和组织水平上变得进一步稳定。革命的大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西方，这将是“外部矛盾”的结果，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而不是由孤立的内部危机引起的。因此，在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那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处在革命性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是“根本不对的，在策略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同真正的关系失去联系”。②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应该团结一致，而不应该采取唐吉诃德式的宗派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那样做只会使共产党“孤

①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1927年12月第一次勾划出了他们的新路线的轮廓。他们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和之间发展了这条路线的。见斯大林后来的叙述，《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25页；O·V·库西宁：《新时期和共产国际政策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转折》，载于《共产国际》1930年（1月24日）第2期，第3—19页。

② E·戈尔登贝格：《德国问题》，载于《布尔什维克》1928年（3月15日）第5期第35页。作者是有名的布哈林分子。编者按语指出，他的文章所涉及的是一些有争论的问题。

立”，并给工人阶级造成“悲剧”。①

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是季诺维也夫在二十年代初期提出来的，后来由斯大林把它变成了政策。这种离奇的说法后来造成了特别悲惨的结果。在1928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法西斯主义还只是一种非常模糊、没怎么研究过的反动现象，提起它，主要就会联想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至于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当时还是非常遥远的事。跟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提出的大多数创议不同，他认为社会党人近似于法西斯分子，甚至比法西斯分子更坏的思想，似乎早就受到了斯大林的欢迎。他在1924年曾这样说过：“社会民主主义在客观上是温和的法西斯主义。……它们不是对立物，而是孪生兄弟。”② 后来每当人们讲起共产国际在1929至1933年间所遭到的灾难，就会引用这几句话。

尽管1928年这场从未公布过的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布哈林反对把上述概念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看来却是清楚的。③ 自1914年起，他在煽动布尔什维克仇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而且他现在的思想可能仍然认为他们是叛徒，是资本主义秩序的辩护士。然而，他的确不认为代表了欧洲绝大多数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是“社会法西斯”和工人运动的头号敌人。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

---

① 在这方面，布哈林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尽管他作出了妥协，但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些观点。关于他的主要发言，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6—64、587—615页；第3卷第7—32、122—15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4—245页。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历史，见西奥多·德雷珀：《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载于《评论》(1969年2月)第29—42页。按照德雷普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放弃了这一思想。斯大林后来就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

③ 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作的发言表明，一场热烈的辩论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3卷，第30—31、137—138、143—145页和第5卷，第130页。

他在政治上作了妥协。显然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得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但他很快又补充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是愚蠢的。"此外，他预料到有人会暗示共产党人可以同法西斯分子结成联盟来反对社会党人。他反对这种想法。他说："我们的策略并不排除向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向某些下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求援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向法西斯组织求援。"①

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所有这些政策问题上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会议上激烈地进行的。实际上，当时存在着两个代表大会。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和挂名的头头，支持正式的、公开的代表大会。他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作了三个主要的报告，接受了拥抱，受到了热烈的鼓掌。从表面上看，这是他参加国际运动的生涯中的高潮。然而，在幕后，一个矛头针对他的权威和政策的"走廊大会"正在进行，关于这个大会的情况在那些内容迥然不同的公开发言中很少得到反映。这个"走廊大会"是在俄国代表团中斯大林的多数派撤回了布哈林的主要提纲并对之进行修改的时候开始的，并很快就扩展到一些主要的外国代表团中去，它们（由于原则、野心、和效仿俄国党的习惯等原因）也分成了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两派。大会上传播着斯大林的代理人悄悄地放出来的谣言，说布哈林"右倾"，患了"政治上的梅毒症"，该发配到托洛茨基的流放地阿拉木图去等等。两星期后，由于"走廊大

---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3卷，第144—145页。同样，在1927年12月，他坚持说，向左转"并不排除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并在个别情况下当反动的候选人在可能取胜的时候，去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656页。1928年由两个主要的年轻布哈林分子发表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研究著作也是同样重要的。这本书虽然在政治上对社会民主党是敌视的，但丝毫也没有包含类似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概念。见阿斯特罗夫和斯列普柯夫：《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

会"喧闹得太厉害了，苏联政治局不得不集体发表一项声明，否认自己的队伍已经分裂。但是看来没有谁相信这种否认，而且"反布哈林的秘密会议"不减势头地还在继续进行着。①

那个正式的代表大会的结果常常被人们曲解了。大会并没有批准一个新的极左方针，那种方针是一年以后在斯大林的一手操纵下通过的。1928年夏天，在一些主要的外国党的领导集团中，仍然存在着同布哈林结成联盟或者对斯大林的过激主张不表同情的强大的或占多数的派别。其中有团结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阿图尔·埃韦特周围的德国共产党人，有以杰伊·洛夫斯通为首的美共的正式的领导班子，以及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即埃尔科利)的意共领导班子。② 因此，代表大会上就有争论的问题(和共产国际纲领)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激烈的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且，尽管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地还是反映了布哈林分子的观点。③ 后来布哈林分子抗议说，共产国际在 1929 致 1933 年间执行的极端方针歪曲了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这是不无道理的。④

---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20—21 页。德雷帕：《美国共产主义和苏联》，第 14 章；《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 900 页；《革命的年代》1929 年 11 月 1 日，第 15 页；《苏共决议集》第 2 卷，第 558—559 页。

② 德雷帕：《美国共产主义和苏联》第 11—14 章；保罗·斯普利安诺：《意大利共产党历史》第 2 卷（都灵，1969 年），第 175 页。虽然德国共产党的官方领袖台尔曼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很大的多数派"是更接近布哈林的立场的。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 2 卷，第 779 页。另一个例子，可见L·J·麦克法兰：《英国共产党》（伦敦，1966 年），第 9—10 章。

③ 关于主要决议和纲领，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 2 卷，第 7—161、192—193 页，特别是关于"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策略和"右的倾向"等部分。关于幕后讨价还价的材料，见《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 495 页；间接地，可见波波夫：《历史纲要》第 2 卷，第 316 页。

④ 见伯特伦·D·伏尔夫在《革命的年代》1929 年 11 月 15 日第 3—4 页上的评论；《美国共产党的危机：关于党的多数派的原则的声明》（纽约，1930 年）。

然而，对斯大林来说，这次代表大会是他的另一次重大胜利。在这次大会上他有三个收获。第一，大会决议中模棱两可的措辞严重地危及了布哈林的国际政策并给斯大林的已经在酝酿中的极端主义路线提供了合法的外衣。第二，"走廊大会"使他争取到了许多外国共产党人，在主要的党中组成了强大的拥护他的派别，并且实际上结束了布哈林对共产国际的控制。代表大会在9月1日闭幕以后，设在莫斯科的常设机关中仍然效忠于布哈林的重要人物只有三个：瑞士人尤勒斯·洪贝特—德罗茨、德国人克拉拉·蔡特金和意大利人安杰罗·塔斯卡（即塞拉）。① 然而，第三个也是最有破坏性的收获是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要让步。布哈林反常地赞同了斯大林的下述论点：在共产国际中，"右倾现在代表了主要的危险"。布哈林竭力把这种让步减小到最低程度，他把右倾主义解释成为不是某个人的倾向，说应该从思想上而不是用组织手段来与之作斗争。他还利用了一封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写给他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信中说："假如你把所有的不是那么特别顺从但却是聪明的人都赶跑而只留下那些顺从的傻瓜的话，那你就肯定无疑地会毁灭掉党。"但是布哈林作的这些限制性解释已完全无济于事。对斯大林来说，剩下要做的只是把那个该诅咒的"右的偏向"问题搬到俄国党里来并把布哈林本人作为牺牲品而已。②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布哈林分子和斯大林分子在国际政策问题上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并且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的争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尚未在争论中涉及到，这

---

① 洪贝特—德罗茨：《从列宁到斯大林》第348—349页。按照洪贝特—德罗茨的说法（第340页），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以后再也没有到过共产国际的办公室。

② 丹尼尔斯：《良心》第336—337页。关于布哈林的评论和有关的决议，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8—60、610—614页和第2卷第80页。

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和格局问题。这个问题在9月19日提出来了，那一天，代表斯大林派讲话的古比雪夫发表了一个新的工业化宣言。布哈林那个经过修改的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既是雄心勃勃的，也是克制的。这个纲领强调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以及消费品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之间的平衡，它明确地否定了"那个要求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进行投资的公式"。① 古比雪夫则衷心地信奉这个至今一直是左派的号角声的公式。他说，国内外出现的危机和危险情况要求不顾一切代价地急剧加速和集中对重工业进行投资，即使造成经济不平衡和人民群众中出现"不满情绪和强烈的抵制行动"也在所不惜。② 几星期之后，斯大林吐露了他自己的想法，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这种新的工业化哲学。他解释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的必要性是由俄国传统的落后状况决定的。他叫他的党内听众们研究一下彼得大帝，他是另一位从上面进行革命的人，他为了打破这种落后状况，曾"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③

布哈林在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著名文章中，对此作出了回答。④ 当时，古比雪夫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怂恿下，正在提高它所建议的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这使右派感到震惊。《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就是在政策问题上提出明确回答。在这篇文章中，布哈林重申了右派的观点，认为在经济上必须取得按比例的、"多少免于危机的发展"，应该制订一种能在工业与农业之间以及在工业内部确定和保持"能动的经济平衡条件"的计划。

---

① 见本书第360页注①。

② 丹尼尔斯：《文献历史》第1卷，第309—31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2—222页。

④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写在新的经济年度开始之时)》，载于《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布哈林在文章中为当时的投资水平辩护，反对再增加投资，他详尽地批判了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的"冒险主义"。

当时有两个情况尤其使他生气。在他看来，当农业还没有得到必要的改善，而且实际上还处于危机中的时候，就增加基本建设开支，这等于是无视工业的根本基础，因而肯定会招致整个经济的全面"崩溃"。其次，当时除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短缺以外，工业也已经落后于它本身的已经扩大了的需求，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原料短缺和广泛出现了各种短线。进一步扩大基本建设的开支，只能打乱已在进行的建设，给整个工业部门带来不利影响，"归根结底会减慢发展的速度"。因此，必须对工业的发展规定一个"上限"，必须把那些开支有效地用在"真正的"建设上。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因为"不可能用'将来的砖头'去建设'今天的'工厂"。针对那些支持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的人的虚张声势，他补充说道："你们可以拍着胸脯发誓自己是效忠于工业化的，也可以咒骂一切敌人和变节者，但这一切丝毫无助于情况的改善。"

1928 年 9 月 30 日《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真理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文章是不指名的，只以"托洛茨基式的'超工业主义者'"为批评对象，但所用的措辞激烈的长篇论战语言明显地是对斯大林那伙人的进攻。布哈林已经接近于把这场斗争公诸于众了。他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地传看并推荐这篇文章，说它"指明了应走的道路"，而斯大林分子则偷偷地试图禁止这篇文章的流传并掀起一场宣传运动为他们自己的工业路线进行辩解。10 月 8 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的多数，不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反对，谴责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未经批准的"。① 有关政策问题的争论现在全面展开了，而且看来是无可妥

① 瓦甘诺夫：《右倾》第 161—163、174—175 页。

协了。等待着它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摊牌。

1928年夏末和秋天，在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下，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右派的政治基地发动了进攻。李可夫在国家委员会中的权威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莫斯科和各共和国政府中一些亲右派的干部被撤销了职务。托姆斯基被斯大林私下骂成是“一个恶毒的而且并不一贯诚实的人”——无疑，这是对伪善的一种典型说法——托姆斯基对工会的领导也受到了支持斯大林的那些报刊的批评，说他犯了各种罪孽，其中包括阻碍生产率的提高。① 8、9月间，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在那里，乌格拉诺夫和他底下的各个区的书记们受到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自我批评”运动的围攻。② 与此同时，那个支持布哈林的红色教授学院的党委会也终于被斯大林分子搞垮了。在共产国际，忠于布哈林的那帮人的队伍越来越小，他们为了控制执行委员会机关而陷入了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战斗，而布哈林则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阻止不了那场反对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主要是指重要的德国党中的那些人）的运动。③

同样重要的是，斯大林还夺取了党的主要的宣传机构。彼得罗夫斯基在批评了总书记的“贡税”讲话之后，立即被调离《列宁格

---

① 见哈温：《在工业的方向盘旁》第65页；《土库曼共产党历史纲要》（第2版，阿什哈巴德，1965年）第361—363；《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3页；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554页。说斯大林要把托姆斯基挤走的谣传显然早已在传播。见科泽列夫的评论，载于《真理》1930年7月6日第4版。

② 从瓦甘诺夫的单方面的叙述中可看出来。见《右倾》第153—173页；《斗争中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第258—298页。

③ 托洛茨基：《亲爱的同志》1928年9月（T2442）；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4—6章。关于共产国际的事件，见《真理报》1929年11月22日第3版；尤勒斯·洪贝特—德罗茨：《莫斯科的看法》（巴黎，1964年）第256—259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97—198页。

勒真理报》主编的职位，转到一个小省的报社去工作。[1]差不多与此同时，大概是在8、9月间，《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斯列普柯夫、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扎伊策夫和蔡特林等拥护布哈林的青年人被撤销了职务并为斯大林分子所取代。虽然布哈林仍然是《真理报》主编，阿斯特罗夫仍然留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七人编委会里，但布哈林已经不再能决定这些报刊的编辑方针及其内容了。[2]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态发展。直到秋天以前，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权威性的出版物还是以布哈林主义的精神来解释有争论的政策的，从而调和了党的领导集团的官方声音和党的领导集团同下级干部的关系。[3] 现在，虽然布哈林分子的不合拍的文章和讲话偶尔还继续在报刊上出现，但是党的官方声音已是斯大林一派的声音了。这个转变是同9月中旬报刊上开始对尚未指名的党内"右的危险"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进攻同时发生的。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是掩饰不了这场暗中进行的反右运动的。到10月份，斯大林分子已经在偷偷地把布哈林"定为""恐慌制造者"和"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敌人"了。[4]

尽管事态的这种发展具有破坏性，但它还没有直接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尚未定局的力量对比。在中央委员会内，这场斗争尚有待于最后分晓。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莫斯科党组织，它继续泰然

---

① 《费尔特林涅里年鉴》第898页。

② 瓦甘诺夫：《右倾》第143—144页；托洛茨基：《亲爱的同志》1928年9月(T 2442)。《布尔什维克》的新编辑是在1928年8月15日一期上宣布的。虽然迟至9月23日，据说布哈林还能够影响或撰写一篇《真理报》社论(见切丘谢夫，第10页)，现在真正的编辑已是雅罗斯拉夫斯基、马克西米连·萨维列夫和格拉尔德·克罗明。

③ 见关于七月全会的几篇社论，载于《真理报》1928年7月13、14日第1版。布哈林是这些社论的撰写者。

④ 公开的反右运动是随着《真理报》上发表几篇社论而开始的，见《真理报》1928年9月15日和18日第1版。关于对布哈林的影射，可见他的评论，载于《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899、901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75页。

地反对斯大林，其他地方党的书记们无疑把这一事实仔细看在眼里。从七月全会以来，莫斯科的这些人一直在固执地捍卫布哈林的政策，包括他们自己在轻工业方面的特殊利益。一点不假，乌格拉诺夫，这位不屈不挠和意志坚定的对手，正在进行反击。他和他的伙伴们加强了他们自己的宣传攻势，鼓励反斯大林分子不要害怕"偏向"这个词。他们痛斥谈什么右的危险，说那是"阴谋者"的"造谣诽谤"。他们转弯抹角地指出斯大林是个玩忽职守的总书记。[①] 他们这种大胆的做法甚至使布哈林都感到担忧，他提醒乌格拉诺夫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斯大林以插手莫斯科的借口。[②]

鉴于乌格拉诺夫那伙人过去的工作效率，斯大林推翻莫斯科党的领导班子这件事是干得十分干脆利落的。在10月的头两个星期中，乌格拉诺夫发现自己处于拒绝服从他的领导的下级干部的包围之中，他已经不能在自己的组织中调动干部，而且被迫撤销了他的两名最心直口快的区委书记柳京和潘科夫的职务。在10月18日至19日举行的莫斯科党委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可看出他这种绝望处境。会上起来造反的人，在斯大林的中央机关的鼓动和支持下，对乌格拉诺夫对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和容忍"脱离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的偏向"的态度提出了指责。10月19日，斯大林用胜利者的口吻，亲自在会上讲了话。他的"祝词"实际上是催促人们对"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对那些"对右的偏向采取调和态度"的共产党员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他虽然承认这种背叛行径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趋势"，并且没有点犯错误者的姓

① 见曼德尔什塔姆的文章，载于《真理报》1928年8月11日第5版；乌格拉诺夫的文章，载于《真理报》1928年9月21日第3—4版；柳京在《联共(布)党的领导干部》一文中对斯大林的转弯抹角的批评，载于《布尔什维克》1928年(8月15日)，第15期，第18—29页。

② 《反对派通讯》1925年第1—2期，第15页。

名，但同时却大讲它的危险。他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①

乌格拉诺夫和他的几名助手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受屈辱，他们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错误，但是毫无用处。10月19日，又有一些莫斯科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被撤销职务，从而结束了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乌格拉诺夫和他的副手科托夫在自己的岗位上拖了一些日子，直到11月27日正式被莫洛托夫和卡尔·鲍乌曼取代为止。接着便对布哈林在莫斯科的上上下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开始了一场全面大清洗。② 莫斯科旧的领导班子被推翻得如此完全和彻底，下面这一事实是具有象征性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校长、莫斯科党委会中一名德高望重的委员、从党成立之日起就是党员并且是莫斯科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尔丁·里亚多夫也都蒙受了耻辱。③

斯大林搞垮莫斯科党组织之举是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一次沉重打击，而且很可能是这场权力争斗中的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它除了使他们丧失了最重要的组织基地之外，还对其他地方的那些保持中立或摇摆不定的中央委员起了警告作用。它发生在十一月全会之前一个月，它向人们表明，连在一名政

---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丹尼尔斯：《良心》第337—344页；《斗争中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第279—298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60—173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2—205页。

② 《真理报》1928年11月28日第3版；L·科兹洛娃：《为争取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而斗争的莫斯科共产党员》（莫斯科，1960年）第46—47页。乌格拉诺夫失掉了他在常委会掌握的多数和对莫斯科检查委员会和宣传鼓动部的控制，而莫洛兹和曼德尔什塔姆则于10月19日被撤职。《真理报》1928年10月20日第4版。

③ S·克里洛夫和A·齐科夫：《论右的危险》（第2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53—54、159—161页；E·列维主编：《1905年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16—17页。

治局候补委员和七名正式中央委员领导之下、同政治局中三名有威信的领导人结成联盟的全国最大的党组织都无法顶住斯大林所控制的中央机关的压力。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接到了指示，要它们学习莫斯科党委会议的文件。[①] 从此，没有一个党组织，不管它对斯大林的政策还有多大保留，准备再冒同莫斯科党组织一样的风险了。

所有这一切，布哈林都在远处冷眼看着。他按惯例进行的夏季休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而推迟了，所以到10月初才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基斯洛沃茨克去了。他的表现同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表现十分相似，当他的伙伴和朋友在莫斯科被击溃的时候，他仍留在那儿，既没有公开表示抵抗，甚至（从记录看）也没有做过任何象征性的姿态来为他们打气。他这种象奥林匹斯山神那样的高傲的超然态度终于在11月的头一个星期中止了，当时他听说李可夫正在政治局关于1928至1929年工业计划的辩论中向后退却。他立即动身赶回莫斯科，由于斯大林的代理人宣称对他的健康表示担忧，使他乘坐的飞机在路上停留了两次。大约在11月7日他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战斗精神又恢复了。[②]

接着，政治局开了一星期争论激烈的会议，为定于11月1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准备。布哈林和斯大林在会上进行了又一轮怒气冲冲的争吵。布哈林要求对政策作根本性的修改，包括削减斯大林所建议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减轻对富裕农民征收的过份的惩罚性税收。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政治上的“最后通牒”，要

---

① Iu·V·沃兹克列先斯基：《站在政治和劳动高潮前列的共产党员（1926—1929年）》（图拉，1958年）第26页；在《土库曼共产党历史纲要》第362页上也有例子。

② 《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5—16页。《真理报》1928年11月10日第3版上刊登的一篇发言和《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542页上指出了他回莫斯科的大概日期。

求坚决停止农村中的运动以及对他和他的支持者采取的组织上的报复行动。当斯大林拒绝就这些要求展开正式讨论时，布哈林骂他是一个“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大步退出了会场。几分钟以后，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交了事先就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在接受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他还没有准备好去冒让布哈林派公开反对他那些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政策的风险，于是他同意和解。①

事实再次证明，斯大林的让步和布哈林的所得都是空的——这也是必然的。为了换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在中央全会上对政治局决议的名义上的支持和李可夫在形式上作有关工业问题的报告，斯大林表面上表示同意略为削减基本建设开支和停止对布哈林分子的迫害行动。他的第一个让步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以致它实际上等于是右派的一次大挫折；至于第二个让步，他根本没有付诸行动。② 双方达成的协议显然还包括任命乌格拉诺夫为劳动人民委员。布哈林在这一点上是否有所得也是可疑的，因为乌格拉诺夫所取代的是布哈林的另一位伙伴、托姆斯基的同事施米特。无论如何，乌格拉诺夫的这个职务是无权的，他的任期也是短暂的。③

---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5—16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15、176—178页；《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66页；《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542页。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布哈林还要求撤掉两个斯大林分子的职务，从《真理报》撤掉克罗明，从德国共产党撤掉诺伊曼。另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24页。

② 通过的基本建设投资数字为16亿5千万卢布，而1927—1928年为13亿3千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重工业。瓦甘诺夫：《右倾》第178页。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大概要求确定接近于1927—1928年的数字。

③ 乌格拉诺夫的任命日期是在1928年11月29日，也就是在撤掉他的莫斯科党组织书记的职务之后二天。《消息报》1928年11月30日，第3版。看来这是在最后一分钟作出的决定，因为只在12天以前还曾公开庆贺施米特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十周年。《消息报》1928年11月17日第2版。施米特在八月间曾被任命为李可夫的副总理之一，显然他暂时还保留着这一职务。《消息报》1928年8月14日，第2版。

和解使政治局的两派得以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继续保持虚假的一致；但是所作的姿态都是假心假意的，会议的进程对右派来说是一次明显的失败。李可夫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措辞谨慎的报告遭到了那些坚决支持总书记的人的直截了当的非难。① 然后，斯大林就“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否则就会灭亡）这个题目和“右倾”的危险发表了迄今措辞最强烈的讲话。更重要的是，全会通过的决议虽然反映了布哈林在农业问题上的影响（或者说反映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定），但就其内容而言，却第一次主要地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这些决议批准了斯大林对发展工业的意见，宣布“右的偏向和调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并且决定进行自1921年以来的第一次党内大清洗——这次是要不流血地清除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后面这个决议表面上是针对“异己分子”的，但谁也不会误解它所没有言明的目标是指谁。② 布哈林没有力量改变会议的程序，但又不愿意通过他自己的出席表示支持这种开法，于是就对全会进行了抵制。③

翌月，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最后一块“领地”，从而——如果还需要提供进一步证据的话——充分说明了同斯大林和解是徒劳无益的。斯大林难得在共产国际露面，但在12月1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他却亲自出马，发出了夺取这个国际组织的信号。斯大林所要解决的是德国党领导集团中反斯大林分子所持的一贯的反对立场。他在斥责了布哈林在执行委员会中的支持者洪贝特—德罗茨和塔斯卡的

① 瓦甘诺夫：《右倾》第180—18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2—249页；《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25—548页。

③ 瓦甘诺夫：《右倾》第184页。据说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经常出席会议。

"怯懦的机会主义"之后，宣布要把德国的右派和"调和分子"从党内开除出去。他说："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人留在共产国际中了。"①尽管布哈林在政治局中提出了抗议，接着还是刮起了一场开除之风，包括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开除出党。当时，在其他党的内部也在酝酿着同样的报复行动，并在1929年导致了把大批同布哈林结盟或同情布哈林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开除出党。②斯大林夺取共产国际中央机构的象征是莫洛托夫，此人紧接着就控制了这个机构，但此人在国际上的声誉如同斯大林本人一样低得可怜。

托姆斯基的垮台发生在12月10日至24日举行的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在此之前，在他的组织中也发生了与莫斯科党组织中的事件相类似的颠覆事件。到11月初，由于斯大林掀起了诋毁他作为工会领导人的运动，工会的干部纷纷抱怨说，工会内部存在着"一种使人根本无法工作的气氛"。③等到代表大会开幕时，托姆斯基和同他站在一起的工会其他领导人发现自己在掌管议程的党的核心小组里已经处于少数地位了，他们在两个关键问题上遭到失败。一个涉及到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十一月决议的拥护问题，这样也就等于工会正式承认了党的工业政策，而对这些政策，工会的领导原先是激烈反对的。④ 这场斗争虽然是在核心小组内解决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3—267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简·德格拉斯编，第3卷（伦敦，1965年），第27页；德雷帕：《美国共产主义和苏联》第17章。关于布哈林的抗议，见瓦甘诺夫：《右的倾向的崩溃》第75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24页；洪贝特—德罗次：《从列宁到斯大林》第340页。

③ 雅格洛姆的话，引用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1194页。关于由共青团的报纸从外面发动的进攻，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783页。关于托姆斯基的垮台，见丹尼尔斯：《良心》第344—348页。

④ 蓝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10页；大卫·E·兰萨姆：《新经济政策俄国的政治压力集团：工会的事例》（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

的，但也反映到公开的代表大会上去，成为一场含沙射影的辩论。以古比雪夫为首的斯大林分子竭力颂扬全面的重工业化，而托姆斯基和他的伙伴们则反对搞一场牺牲工人阶级利益和把工会转变成"拘留所"的工业运动。这是托姆斯基的领导班子进行的最后斗争，他们力图捍卫工会在新经济政策中所起的传统作用："工会是为工人阶级服务而存在的。"现在这个观点遭到了驳斥，被说成是脱离政治的，是"狭隘的工团主义"。斯大林分子提出了一句新的口号："工会要面向生产！"这宣告了工会中一套新制度的到来。①

托姆斯基在另一个问题上的失败结束了他对工会组织长达十年的控制。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工会核心小组就增选五名斯大林指定的人进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问题进行了表决。托姆斯基企图阻拦其中一个人，即不得人心的卡冈诺维奇获得提名，提出的理由是那样做会造成"两个中心"，把一名"政治委员"强加在工会头上。未成，于是托姆斯基于 12 月 23 日再次提出辞职。辞呈虽被拒绝，但他以后只是在名义上继续当工会第一把手，实际上拒绝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② 1929 年 6 月，他和实际上所有的工会领导人（其中大多数人同他一样是布尔什维工会运动的先驱者）都被正式解除了职务。这场颠覆活动干得如此彻底和如此专横，以致卡冈诺维奇不得不出来作一番解释："可以说这是破坏了无产阶级民主的；但是，同志们，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民主决不是我们崇

---

① 《苏联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1928 年 12 月 10—24 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29 年）除了托姆斯基的发言（第 3—6、24—25、186—207 页）外，见李可夫、施米特、乌加洛夫、科泽列夫和雅格洛姆的讲话。另见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 203 页；L·聂达庆：《不能容忍工会工作中的非政治倾向》第 71 页；《真理报》1930 年 7 月 6 日第 4 版；瓦甘诺夫：《右倾》第 193 页。

② 丹尼尔斯：《良心》第 347—348 页；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 175—176 页；瓦甘诺夫：《右的倾向的崩溃》第 71 页；《真理报》1930 年 7 月 6 日第 4 版；瓦甘诺夫：《右倾》第 193 页。

拜的偶像，这是早就清楚的。"①

到11月和12月份，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已不再是一个通过妥协作出决定的分裂的领导班子中的领导成员，而是斯大林所控制的政治局中的少数反对派了。他们手无大权，对政策的影响逐渐消失。除李可夫以外，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布哈林在形式上还是《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他同托姆斯基一样，为了表示抗议，在12月份离开了自己的职位，并且再也没有回去过。②

他们是在斯大林所擅长的秘密的组织方面的政治斗争中经过了较量并且失败之后才落到这个地步的。除了在7月份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以外，布哈林一直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出反对意见。他对加米涅夫解释说："必须谨慎小心才能深谋远虑。"③ 现在，在只能完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1928年年底和1929年1月，他三次公开表态，反对斯大林的"总路线"。这三次抗议的内容都登载在《真理报》上，都是着眼于启发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感和良知的。虽然布哈林避免明确地批评斯大林，他那愤怒的言辞却是表明他的激烈反对态度的明白无误的标志。

第一次是11月28日他对工农通讯员发表的一篇讲话。工农通讯员组织是布哈林所提倡的，目的是用它来抵销官方的一些错误做法。④ 他在讲话开始时，用比《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那篇文章更加明确和更直截了当的语言谴责了"疯子的(工业) 政策"，说这些疯子只贪图建立胃口大的大型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在若干年中

---

①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22页。

② 波波夫：《历史纲要》第2卷，第377页；《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7－558页。

③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④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报纸的任务》，载于《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4版。

只会“拿走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对农业不关心，对需要用消费品来换取农民的粮食，对“某些地区（农民）正在拿起武器”这种情况也满不在乎，他们只会一味地空喊：“‘给我们金属，不要担心粮食！’”他们的愚蠢招来了灾难。布哈林说：“如果某种疯子建议立刻把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东西扩大一倍，这种政策肯定就是疯子的政策，因为到那时我们工业品的商品荒就会加剧好多倍……并且意味着粮荒。”

布哈林继续说，这种“愚蠢的”政策还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弊病，就是“党的干部正在变成官吏。”就象旧政权底下的地方官员那样，他们摆出了一副“官僚相”，“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篡夺权力，在需要发挥“更多的地方、集体、和个人积极性”的时候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他们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而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最糟糕的是，党的官僚们忘记了“数百万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和一段木头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官僚分子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在上级的眼里看起来廉洁奉公就行了。”由于认为“一片纸就是百分之百的理由”，党的官僚们随时都准备接受各种反映出“共产党员的自大狂”的计划，接受任何“骗人的、官僚主义的‘发明创造’”，包括“疯子的政策”在内。布哈林的讲话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调子，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自己长期以来的担忧，他怕党的工作人员会变成滥用职权的特权分子。他的讲话也是对斯大林统治下党的干部队伍的蜕化所作的一次严厉谴责。

“共产党员的自大狂”是他第二次公开进攻的主题，这次进攻就是刊登在1929年1月20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①] 这篇文

① 《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载于《真理报》1929年1月20日第2—3版。

章一方面分析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另一方面含蓄地指责斯大林的领导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负责任，不能胜任工作，不是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符合实际情况的客观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在“官僚主义的便条”、“主观主义的愿望”和“共产党员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去设想工业化运动。布哈林预言，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因为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生产资料、运输工具和财政等等都空前地集中在国家的手中……因此任何失算和错误都会造成相应的社会后果。”他说，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真理”，就是“我们要么依靠科学的经济领导去取得胜利，要么一无所获。”

然而，布哈林的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是他在第二天发表的一篇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于1月24日刊登在各主要报纸上，它用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1] 使读者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说它“耸人听闻”，是因为，布哈林虽然讲的是列宁在临终前写的有关党的政策的几篇文章，但他使用的题目却使人回想起这位已故领袖的另一个“遗嘱”，那个“遗嘱”虽未发表，但人们对它并不是一无所知。列宁在那个“遗嘱”后面还很生气地附了几句话，要求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从1929年的背景来看，布哈林用的这个主题也带有挑衅性质。他想向人们表明，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纲领性“遗嘱”。他的策略是直接阐述那著名的五篇文章。这些文章自1923至1924年以来对他的纲领和官方的政策一直是有影响的。他说，这些文章留下的遗产是“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提出了一个宏大和长远的计划……为我们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完整地阐述伊里奇的整个

---

[1] 它在1929年1月24日刊登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所有出处都取自小册子《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版，莫斯科，1929年)。

计划——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

布哈林说他“绝对没有加进我自己的东西”，而是逐点逐条地重申了列宁的“最后指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同农民结成牢固的合作联盟；党的政策现在必须集中在“和平的、组织的和‘文化的’工作”上，集中在安抚农民的利益上，而不是集中在“第三次革命”上；资金的积累和工业化必须在扩大市场关系的“健康基础”上进行，让发家的个体农民加入为市场服务的合作社（这不是集体农庄），同时还要把合理地利用资源同毫不留情地削减非生产性开支和行政费用结合起来。列宁“遗嘱”里的格言是：谨慎、调和、国内和平、教育和效率。“遗嘱”里最重要的指示是防止同农民“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毁灭”。

《列宁的政治遗嘱》这篇文章署的是布哈林的名字，用的主要是列宁的话。它是一篇强有力的反斯大林的宣言，它为新经济政策的哲学和正被总书记抛弃的那些政策进行了辩护。这篇文章假如在一年以前发表，一定会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官方说教。然而，发表在1929年1月，它却成了反对派的宣言，斯大林的多数派攻击它“修正并歪曲了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企图把列宁说成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哲学家”。① 这篇文章也是在苏联发表的明确地陈述布哈林的思想和政策的最后一篇文章。布哈林由于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察觉，因此求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老传统，恳求党的干部“决不要轻信别人的话……决不要说昧心话。”他悲哀地补充说：“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并没有从政治中取消。”②

① 瓦甘诺夫引用的波斯蒂舍夫的话，《右倾》第198页；列昂节夫：《右倾经济理论》，第85页。关于后来进行攻击的例子，见I·吉尔尼亚克：《布哈林同志描述的列宁政治遗嘱》（莫斯科，1930年）。

② 《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7页。

布哈林的这种呐喊反映了领导集团和整个国家的形势正在恶化。政治局中的两派现在甚至在如何对待过去曾经同自己联合过的敌人的命运方面也出现了分歧。1月中旬，尽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坚决表示抗议，斯大林控制的多数还是通过表决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托洛茨基是2月11日被驱逐的。那一天，这位伟大的维护民主权利的政治家被押上了一艘开往君士坦丁堡的轮船，永远地被流放了。① 与此同时，随着斯大林急剧地提高工业建设指标，农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到1929年年初，粮食收购量再次开始骤跌；农民暴动事件不断增多。斯大林的领导集团对此拿不出什么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加紧开展一场运动，鼓动农村干部向富农和“富农代理人”斗争。不顾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对，在一些主要的产粮区又变相地采取了“非常措施”，尽管官方曾明令禁止这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农民已经没有什么储存的粮食可供没收的了。市场关系和整个粮食交售制度正在迅速走向完全崩溃。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采取行动，准备在领导集团内摊牌。他的借口就是1月30日出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一本地下小册子，里面有加米涅夫关于他七月份同布哈林的谈话的叙述。斯大林故意掩饰自己的愤怒，召开了一次有政治局委员和以他的支持者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党的纪律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名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布哈林的“派别活动”进行指责。这次审讯（布哈林语）是从1月30日开始的，由斯大林和他的一些亲密同事充当起诉人。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团”——但主要是布哈

①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469—471页；《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648页。

② 《关于苏维埃的改选》，载于《真理报》1929年1月1日第1版；瓦甘诺夫：《右倾》第127—128页；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100—105页。

林本人——反对党的路线，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企图“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等等，他在列举他的对手的“罪状”时，口气越来越带有威胁性。①

然而，布哈林并没有被吓倒，他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为自己同加米涅夫的会见进行了辩护，说这是被党内的“不正常情况”逼出来的，他还提出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反起诉书，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动和政策。他的对抗性发言显然使斯大林大吃一惊；这时政治局会议只好休会，而由一个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多数派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来研究这些指控。2月7日，这个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和解方案”：作为放弃对布哈林提出指控动议的交换条件，布哈林必须承认他同加米涅夫的会见是犯了“政治错误”，收回他在1月30日提出的反指控，并且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布哈林不同意谴责自己，拒绝了这个和解方案。然后，他起草了另一份内容详细的攻击斯大林的发言稿，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在上面签了名，并由李可夫在2月9日举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② 这个“三人宣言”的内容看来同布哈林1月30日的发言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两份材料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文件。这是布哈林的最重要的反对宣言，是政治局里出现的对斯大林和刚开始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的最强烈的谴责。这个文件从来没有发表过，人们只能从一些片断的叙述中了解它的内容，因此只能部分地加以复述。

---

① 塔斯卡可能是从布哈林的秘书蔡特林那里得到的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的一些片断，载于《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889—905页。后来只发表了斯大林的讲话，那是在二十年以后摘要发表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4—279页。另见《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6—565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7页；《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897—898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99—202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78—580页。根据瓦甘诺夫的说法，委员会的成员有布哈林、基洛夫、科洛特柯娃、鲁祖塔克、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最后四人差不多全是可靠的斯大林分子。

这个文件在政治方面提出的主题思想是，斯大林和他的小圈子虽然提出了一大堆口号，鼓吹由大家共同参预领导，可是背后却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和树立个人的统治地位。官方的路线要求实行自我批评、民主和选举。“但是实际上，我们哪里看到过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省委书记呢？实际上，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官僚化的成分。”的确，“党并没有参预决定问题，一切都是由上面决定的。”在党中央的委员会里，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正在篡夺那里的权力。文件说：“我们反对那种由一个人决定党的领导问题的做法。我们反对那种用一个人——不管他的威望有多高——的控制来取代集体的控制的做法。”①

然后，布哈林详细地诉说了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情况，其中包括粗暴地破坏党的准则，如偷偷摸摸地开展反对布哈林分子的运动，这些人正遭到斯大林的亲信——象卡冈诺维奇那样一类“政治委员”和“完全典型的行政官员”——的“政治上的杀戮”和“组织上的围攻”。在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下，要讨论当前的紧迫问题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指出存在着粮食短缺的现象，谁就会受到“一大群肥头胖耳的、吃腻了胃口的干部”的“调查”并被他们扣上“各种难听的罪名”。同时，斯大林还专横拔扈地无视党的正式决议。例如，尽管政治局一致地并反复地作出过要支援个体农民的决定，但实际贯彻的政策却有很大不同，党的决定“仅仅成了一纸空文”。类似的情况在共产国际中也发生了，那里，政策被不顾事实地加以篡改，斯大林采取的“大搞宗派”的策略正在导致这个国际组织的“瓦解”。②

---

① 根据《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60页；《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7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57、363、578页上的引语。

② 根据《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899、901页；《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62—563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15、198页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布哈林指责斯大林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放弃了真正的领导职责。他说：

“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整个国家深深地被粮食和供应问题所困扰；但是，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会议却对此保持沉默。整个国家都感到农民的情况不妙；但是，无产阶级的党，也就是我们的党的会议，却对此保持沉默。整个国家都看到并感觉到国际形势变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党的会议却对此保持沉默。相反，却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偏向问题的决议（措辞都是千篇一律的）。出现了关于右派分子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人的无数谣言和流言蜚语。这是渺小的政治，而不是在困难的时刻把形势的真相告诉工人阶级，相信群众，了解并感觉到群众的需要的政治……。”①

布哈林继续说道，斯大林一伙所实际提倡的那些经济措施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他们自己“站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去了”。要在国家“贫困化”、农业衰退和滥用储备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有破产的危险。”但是，布哈林的最尖锐的话是在讲到农民政策问题时讲的。斯大林分子已经一笔勾销个体耕作，他们只谈集体化；但是，“在今后几年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可能成为粮食的基本来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来源将仍然是个体农民经济。”② 然后，布哈林在人们永远忘不了的一段“诽谤”中，指出了在农村中“收重税”和征集粮食的行动背后存在的黑暗动机。他指责说，自从 1928 年 7 月全会以来，斯大林所提倡的是那种建立在“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基

---

①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 1 卷第 577—578 页上的引语。

② 根据《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 363 页；瓦甘诺夫的《右倾》第 105、118、200、202—203 页上的引语。

础上的工业化。他问：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随后的政策的呢？……是斯大林同志关于贡税的讲话。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是完全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殖民地和剥削农民的意见的。但是在七月全会上，他却提出了贡税的口号，也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①

布哈林的不妥协态度和对斯大林的反击，使双方在1月30日至2月9日的激烈对抗发展到了高潮，导致了领导集团的彻底分裂。布哈林通过拒绝2月7日的“和解方案”的行动，表明他不愿再继续保持政治局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他为此第一次受到了斯大林的多数派的正式谴责。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但不理睬他要求恢复调和政策以安抚农民和缓和供应危机的呼吁，反而在2月9日通过的一个秘密决议中强烈地谴责了他的“派别活动”和他“对中央委员会、它的内外政策和它的公认的领导的不可容忍的诬蔑。”（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也受到了谴责，但措辞要温和一些。）这个文件采用标准的等同方式，把布哈林反对斯大林集团说成是反对“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②

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斯大林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中间看来也遇到了抵制，从摊牌中得到的收获比他原来所希望的要小。有证据表明，他想把他的对手，首先是布哈林，从政治局中开除出去。③然而，那个谴责布哈林等人的决议（在语言和细节上调

---

① 引文见莫洛托夫所著《在两条战线上》一文，载于《布尔什维克》1930年（1月31日）第2期第14页。另见《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8—559页。

② 《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6—557页。

③ 传播的消息说，斯大林这时决定在下一次将召开的四月全会上把他们开除。见《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5页；《社会主义公报》1929年5月4日，第3页。

子都明显地比他自己的发言要低)，不仅没有采取这种过激的报复措施，而且还要求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由于这个决议是模棱两可的，所以没有把它公开发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透露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们……对布哈林分子过于自由主义和宽容了，……""还不到结束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吗?"①

看来，至少有两点担忧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大约22名高级领导人中的斯大林的一些支持者，也许是大多数支持者受到了约束。第一，他们一方面赞成斯大林的领导和他提出的工业指标，另一方面一定也为他那变化无常的农业政策和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局面感到担心。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同意布哈林所表示的不安。第二，那些虽然是总书记的支持者但并非象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这样一类他个人的忠实信徒，仍然不愿意让他独自享有撵走布哈林(仍然留在政治局中的唯一的另一座"喜马拉雅山")后就会使他得到的突出地位。传统和谨慎使他们宁愿倾向于在最高一级采取集体掌权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已只剩一些痕迹——也不愿意树立起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或者象加里宁所吐露的那样："昨天，斯大林清洗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今天，他想清洗布哈林和李可夫。明天，就该轮到我了。"②

然而，布哈林和他在政治局中的同伴还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9页。

② 《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903页。流产的2月7日和解方案背后可能存在着这类担忧。见奥尔忠尼启泽一年后所作的一个辩解性的保证："我们尽了一切所能想把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同志留在党内的领导岗位上"。这是对一些未指名的党员的回答。这些党员担心"他们赐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现在他们又计划把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踢出去"。《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代表团的发言》(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91页。

他们已经处于一种自相矛盾和岌岌可危的地位。由于这场斗争和对他们的指责没有向外公开，他们的官场荣誉还没有受到影响。布哈林继续被选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受人尊敬的主席团里，继续接受那种必不可少的"喧闹的欢呼和鼓掌"，而且还当选为科学院的一名新的院士，他是被科学院选中的唯一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① 然而，在秘密会议上和党的会议厅的走廊里，用布哈林的话来说，他们却成为"公民死刑"的牺牲品，因为斯大林分子越来越起劲地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背叛了党。与此同时，报刊上加强了对"右的危险"的不指名批判，这场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正式（虽然是秘密地）受到谴责，私下遭到诽谤，失去了组织上的力量，并且（想来）还被剥夺了不受检查地在报刊上发表言论的权利，他们变成了"政治局的俘虏"。② 这种严峻的考验开始产生它的影响。尽管他们在2月9日表现出团结的精神，李可夫还是再次动摇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变得更加坚强不屈，但是李可夫却收回了他的辞职声明，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他继续抵制斯大林的政策。三月初，一位著名的布哈林分子斯捷茨基向斯大林投诚，这进一步证明当时的确存在着压力和斯大林分子所掀起的海啸。③

事情如何发展就要看下一次中央全会了。它预定在4月16日至23日，即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举行，届时，在整个

---

① 《火花》1929年2月24日；《真理报》1929年3月8日第7版和1929年3月17日第4版；格拉汉：《苏联科学院》第92、95、103页。

② 这是莱文的用语，见《俄国农民》第325页。布哈林抱怨说："他们被拉出来受审"并遭受"非暴力的处决"。关于这一点，可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3页。

③ 关于李可夫，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278页和伏罗希洛夫的发言，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16页。他的退却在2月9日的决议中有反映，决议中批评他的语言远比批评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要温和得多。关于斯捷茨基，见《真理报》1929年3月8日第7版和他的文章，载于《真理报》1929年3月17日第1版。

中央委员会的面前将第一次出现一场大吵大闹的对抗。在召开全会前的这段时间里，布哈林的三人团还力图在政治局内以一个忠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他们只进行“消极的抵制”，他们的公开抗议变得比过去更加隐晦，因而也就更加无力。[1] 在3月和4月的前半个月，他们的反对意见集中在斯大林提出的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上，这个计划将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上通过。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由于否决了最低方案而采取了大大加码的理想方案，因此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指标现在规定要把对国营部门的投资增加两至三倍，其中百分之七十八的投资将用于发展重工业，而且五年内，生产资料的生产至少要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2]

布哈林和李可夫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试图抑制斯大林在工业方面的这种雄心。李可夫提出了一个旨在“消除农业发展和国家需要之间的脱节现象”的两年计划作为补充。这个计划体现了布哈林的工业依靠农业的原则，要求通过税收、价格和农艺学方面的一系列补救措施“最迅速地对农业部门进行整顿”。李可夫的这个计划被说成是破坏五年计划威信的一种策略手段而遭到了粗暴拒绝。布哈林当时提出的类似的批评和反建议也遇到了同样的下场。由于连装门面的妥协也不可能有了，因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政治局于4月15日就工业数字进行正式表决时，都投了弃权票。[3]

---

① 《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5页。布哈林在二、三月间发表过四次反对斯大林和他的政策的讲话，但每次都讲得更加转弯抹角。见《真理报》1929年2月27日第3版，1929年3月12日第3版，1929年3月17日第4版，1929年3月23日第2—3版。

② 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37章。

③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8—9、13、794页；《苏共历史》第4卷第1册，第563页；瓦甘诺夫：《右倾》第209—210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4—75页。

与此同时，布哈林正在暗中采取一种右派反对派迄今为止一直不敢贸然采取的策略。为了为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作准备，他正在搜集能够证明斯大林不适合于当总书记的材料，因为总书记的职务现在已等同于党的领袖的职务。看来，他的意图是要重新端出并重申列宁在1923年的“遗嘱”中所表达的意见：

“斯大林太粗暴……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①

布哈林曾参与隐瞒列宁的这个“遗嘱”达六年之久，现在则正在收集那些受到斯大林的“粗暴”之害的人的证言。受害者之一是洪贝特—德罗茨，此人曾在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发生过冲突。布哈林在1929年2月10日给他写信说：“请写信告诉我，在主席团的一次讨论德国问题的会议上，斯大林同志是否真的对你叫喊过‘见鬼去吧’这样的话。”洪贝特—德罗茨证实了这件事。②

在1929年的情况下提醒全党去回想列宁的最后愿望，那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已经太晚了，当时已经不可能用这件斯大林所说的“小事”来顶住强大的政治潮流。③ 当中央全会于4月16日开始举行时，布哈林分子已经陷于一心想当众嘲弄并压垮反对派的斯大林分子所操纵的与会者的包围之中。为了使布哈林分子显得更加孤立，中央委员会是同整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开会的，从而使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

② 洪贝特—德罗茨：《从列宁到斯大林》第356页和卷首影印件。两星期之后，布哈林提醒党说，列宁在党内所以能够处于领导地位，是因为他受到爱戴和尊敬，而不是靠“简单的‘命令’或‘行政手段’。”见《真理报》1929年2月27日第3版。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页。

出席会议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人以上。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的人数大约只有十三人。[①]

于是，党的这个最高机构第一次充分和明确地得知了这场已经历时一年之久的斗争并被鼓动去谴责这个目前仍然是它的最杰出的成员。在斯大林分子提出了谴责布哈林的政治局决议要大会通过和布哈林分子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之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右的偏向”和“背叛行径”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调子远远超过了2月9日决议的内容。他说，从共产国际事务到国内政策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布哈林鼓吹的路线完全同中央委员会唱反调，贯彻布哈林的那条路线就意味着“背叛工人阶级和背叛革命”。斯大林断言布哈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在《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这一节里，他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布哈林在1917年前同列宁就国家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以图向人们表明，作为党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他的名声是“还需要补习一下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紧接着，斯大林又采取了更加不祥的一着：他暗示在1918年就和约问题进行争论时，布哈林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密谋策划“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斯大林在1929年4月提出这种恶毒的指责，企图使人们相信他的下述说法，即这个（与会者一定会记得）曾被列宁形容为“全党所喜爱的人”的布哈林，现在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的首领。[②]

---

① 据说通过制裁布哈林分子的决议时，有10人反对，3人弃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9页。除了政治局的3个人以外，13个有不同意见的人中包括乌格拉诺夫、科托夫、库里科夫、施米特、列宁格勒的工会领导人乌格罗夫和中央检查委员会中的一个布哈林分子罗西特。克鲁普斯卡娅可能是另四个人中的一个。在一月间，她曾维护布哈林的下述立场，即列宁关于农民合作社的有名文章所设想的是供销合作社，而不是集体农庄。《伊里奇论集体农庄的建设》，载于《真理报》1929年1月20日第4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96页。

九年以后，这一指责变成了指控布哈林阴谋杀害列宁的刑事罪状。

在这种进行集体迫害的气氛下，布哈林分子能够有坚强的意志拒绝一再让他们放弃自己主张的要求，这是令人惊讶的。更了不起的是，他们（尤其是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还不顾一切地进行了回击（李可夫在重申自己的反对意见时用的显然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调子）。① 只有斯大林的讲话曾公开发表。但是，从后来人们所引用的片言只字来判断，布哈林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是他的分量最重的讲话之一。看来，他的讲话是从斯大林个人的渎职和"粗暴"讲起的，同时还怒气冲冲地否认他和他的伙伴反对"总路线。"② 他说，正是斯大林自己，由于推行那些同新经济政策原则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违背了已为全党所批准的路线。布哈林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同他1月30日和2月9日在政治局发表的声明的内容是相似的。但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把重点放在有关政策问题的斗争，即关系到新经济政策命运的关键问题上。

他大声地说，在斯大林的路线中有"一些腐朽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使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正当粮食交售量在下降，农村暴动事件在增多，在苏联边疆地区爆发公开叛乱的时候，斯大林却鼓吹加强阶级斗争和采取更多的"非常措施"，仍然强调"贡税"的必要性并要求采取国家和农民之间"新的"和直接的结合形式。这反映斯大林"明显地夸大了不要市场关系而去影响基本农民群众

---

① 从李可夫的发言中引用的一些话表明他的调子要温和得多。另见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28—129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页。关于乌格拉诺夫，见《布尔什维克》1930年（1月31日）第2期第19页。

② 见斯大林提到的"个人因素"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页。

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使国家和农民之间出现一种“荒谬的片面关系”。“从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呢？这是在思想上彻底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布哈林指出，他们对迅速实现工业化是支持的；但是斯大林的计划却象一架没有发动机的飞机那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斯大林的计划建立在农业衰退和新经济政策遭到破坏的基础之上。他说：“非常措施和新经济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东西。非常措施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托姆斯基也同样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新的结合形式是什么呢？……这完全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就是非常措施和口粮定量供应本。”①

但是，这次中央全会的结果是无庸置疑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布哈林的观点同党的总路线是不相容的，因此同意对布哈林进行谴责并且批准了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解除了他们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工会中的正式职务，并且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坚持搞“宗派主义”，他们将会遭到进一步处分。② 就这点而言，四月全会可以说是结束了斯大林同布哈林分子之间为争夺对党的领导权而展开的权力之争。双方都把中央委员会看作是最高上诉法院，但中央委员会却以压倒多数确认了斯大林的胜利。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全会的结果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尽管中央委员会严厉地谴责了布哈林分子，斯大林这一次却仍然没有能够从政治上将他们彻底摧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仍然留在政治局里，仍然是这个领导集团的正式（虽然是不起作用

① 布哈林的这些言论是根据以下材料复述和引用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1—72、87—88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327页；《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803页，注215，第806页，注236；瓦甘诺夫：《右倾》第217页；《布尔什维克》1930年（1月31日）第2期，第18页。关于托姆斯基的言论，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803页，注215。

② 《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49—567页。

的）成员。李可夫继续担任总理。① 此外，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职务和政治局通过的谴责布哈林的声明都没有公布，而且那个声明提出的指责，调子再次比斯大林本人的指责要低。如果说这个情况表明中央委员会仍然不愿意贬黜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并把他们从领导集团中驱逐出去，那么，它在经济方面作出的决定也同样反映了它在政策问题上所持的克制态度，这些决定是在全会闭幕那天开始举行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得到批准的。全会通过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这是同党几年来执行的布哈林的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重要行动，这个计划追溯到1928年10月的情况。但是，这个计划也搀进了四月计划中所提出的农业指标，而这些指标同布哈林提出的指标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计划中，集体化仍然被看作是一项作用有限的补充措施：在五年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拥有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七点五（1928至1929年间是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因此个体农业将仍然是农业的支柱。② 整个计划——不管其含义如何——是在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考虑下制订的。

总之，同不久之后采取的极端做法和欺诈性说法相反，斯大林

① 此外，乌格拉诺夫在党的代表会议之后被撤掉了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一个月之后，谢尔盖·西尔佐夫取代了李可夫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的职务，这是李可夫担任全联盟总理时兼任的一个职务。但是公告中并无贬黜之意，只说同时兼任两个职务对一个人来说负担太重。《消息报》1929年5月19日第2版。必须指出，全会撤掉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职务，并不比正式确认他们提出的、难以处理的辞职重多少。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的调子和提出的指责暗示着更强烈的制裁。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他的讲话全文是在二十年后发表的。它记录了斯大林同"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这些同志要求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开除出政治局。这些"同志"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个人的支持者，又同他有不同意见，他奇怪地在演说的末尾才提到他们。显然，这代表了他对抗拒采取"这种极端办法"的人的外交上的让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莱文：《俄国的农民》第325页。

② 《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69—589页；莱文：《俄国的农民》第350—358页。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由1927年的2%，增加到1932—1933年的21.9%。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253页。

在1929年4月对布哈林的胜利既没能使他实现个人专政，也没有带来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既没有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批判，也没有从政治上摧毁这个政策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它达成了一种艰难的妥协。当时，自愿交售粮食这一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崩溃；斯大林那些对个体耕作加以诋毁和使"非常措施"合法化的言论，加上工业指标的加码，使新经济政策所主张的那些温和的解决办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① 除此以外，斯大林所获得的有限权力同他的政治野心肯定是不相称的。因此，全会开过之后，他那些私人随从便立即开始威胁布哈林分子，说要把他们开除出党并开始悄悄地煽起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八个月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就正式盛行起来："我们的党……终于找到了一位真正的、意志坚强的、勇敢的领袖。这位领袖就是斯大林同志！……列宁的唯一继承人……。"②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布哈林的不祥之兆。他这种前途未卜的地位在4月份举行的党代表会议上，即"大转变"开始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上，变得清楚了。他没有一点向斯大林的意志低头屈服的表示，就好象没有参加那次会一样。然而，他、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李可夫屈从地，但是无精打采地作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都受人尊敬地被选进了大会的光荣的主席团。在大会开到一半时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莫洛托夫向代表们通报了中央委员会对布哈林分子的制裁，但是没有公开提到他们的失败情况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争论，③ 对不久就将降临到布哈林头上的那一大堆罪名，也只是作了一下暗示而已。在会上发言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地要求"无情地挫败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农业危机和布哈林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8—82页。

② 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33—136页。

③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3、5—24、666页。

的命运问题上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却一直笼照着会议的整个进程。达维德·梁赞诺夫——他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坚定不移地抨击肮脏政治的人——看来在发言中间接地讲到了布哈林的困难处境。他评论说："政治局现在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后来有些人认为，他这句话就是为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所写的一首悲歌。

布哈林的失败跟左派反对派的失败不同，它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到来的前奏曲。斯大林为什么能取胜，他的政治胜利有什么意义，自然便成了重大的历史问题。其答案可以部分地从布哈林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之间就政策问题展开的争论的性质中找到。一直到1929年年中，他们经常发生的争论似乎主要涉及到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问题。双方都渴望朝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金属国家"，在一个抱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安全。从长远来看，很明显，他们向党和国家所提供的不仅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纲领之间的选择，而且是两种不同命运之间的极其重要的选择。

1928年以前，斯大林在经济哲学上基本上是一个布哈林主义者。在1928至1929年间，当他朝着那些实际上是反布哈林主义的政策摸索前进的时候，他便开始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然而，尽管他对当时的经济危机作出了悲观的判断，那时他还没有批判作为布哈林主义的基础的新经济政策。的确，一直到1929年为止，他自己提出的药方是极少的，而且是很不具体的。如果不算那些玩弄辞藻的空话的话，他只开过两个药方：一个是最大限度地给重工业拨款；另一个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除了他提出过

---

①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440页。

“贡税”的观念和他仍然认为集体化应该遵循渐进主义以外，他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实际来源、经济计划的性质和使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进程等方面，基本上没有说过什么话，或者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这种情况促使布哈林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根本没有一个长远的经济政策。① 使得斯大林刚开始形成的纲领变得如此激进的东西，与其说是他提出的那些具体建议，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倡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精神上是好斗的，它们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内战争的思想。

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或隐或现地包含着一种好斗的气质。列宁的《怎么办?》这篇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就充满了军事方面的比拟。但是，同后来通过长期的游击战争而掌握了政权的那些共产党不同，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1918年以前从精神气质上来说一直具有一种明显的文职色彩。这种情况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化成了党的生活准则，而这是有深远影响的。然后，新经济政策又带来了相反的东西，开始了一个非军事化或复员的过程。不过，这种军事化的习惯，虽然在二十年代被新经济政策的那些改良主义的和渐进主义的原则冲淡了，却没有完全消失。布哈林和其他领导人不时地批评“行政管理上的独断专行”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迹”，证明这种习惯是很顽固的。更难于解决的是，这种军事化的习惯还由于人们对1917年的回忆而继续存在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之中。托洛茨基分子有时在言论上宣扬这种军事化的习惯，但是在1928至1929年的危机气氛中使战争传统得到复活、赋予它新的含义并开始用这种精神来重新塑造党和国家的则是斯大林。

---

① 《费尔特林涅里学会年鉴》第900页。同样，可见乌格拉诺夫的话，《布尔什维克》1929年(1月31日)第2期第19页上曾引用。

从开始粮食危机和他那次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突击式的巡视以后,斯大林的公开讲话就很少不用国内战争来作比喻、类推和进行有效的鼓动的。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在1928至1929年间的重大纲领性主题。他对粮食收购量下降的反应是发出动员令:“把我们党的优秀力量从上到下都投入到收购战线上去!”结果,根据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定的调子,党的正式的观点和方法也都一步一步地军事化了。政策领域变成了“战线”,所谓“粮食战线”、“计划战线”、“哲学战线”、“文学战线”等等,到三十年代甚至还包括了“春化(指使植物加速开花结果——译者注)战线”这样一些稀里古怪的战线。指标和问题成了需要发动进攻加以攻克的堡垒。斯大林在1928年4月就这么说过:“没有一个堡垒是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①] 如果说战争是特殊手段的政治的话,那么原先提出的临时性的“非常措施”,便在斯大林的新的视野里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合法地位。虽然斯大林自己很少提到1917年,但是只要提起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就会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而两者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这个思想在1929年后半年这段时间里便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思想的一部分。[②]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后来就把全盘集体化描绘为“攻占旧农村”和“农村的十月革命”。[③]

从某些方面来说,复活国内战争的思想本来是对党在1928至1929年间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斯大林——这种思想的主要鼓吹者——却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含义。在国内战

① 关于斯大林的国内战争基调,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0、57—59、65、187—188、194页;第12卷第35、189—190页。关于“春化战线”,见若列斯·A·麦德维杰夫引用的李森科的话,《T·D·李森科的上升和殒落》(纽约,1969年)第17页。

② 伏罗希洛夫的发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513页。

③ A·柯萨列夫:《建设时期的共青团》(莫斯科,1931年)第58页;《共产主义革命》1929年(12月)第22—23期,第66页。

争年代里，他曾妒忌地在托洛茨基身影下担任前线的政治委员，看来这些年的经历对他一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他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是符合人们所说的他那“好斗的个性”的。① 不管有何心理上的原因，反正是斯大林为1928至1929年间的“动员”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赋予它新奇的特征，也就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越接近，其内部敌人的反抗就会越激烈，因此阶级斗争也就会越激烈。布哈林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向社会主义前进，要求逐渐减少阶级冲突和缓和国内的紧张关系，并必须以此为前提。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对苏维埃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②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激化论，与其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不如说是一种军事思想。这个理论也许是他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唯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成了他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统治中必不可少的武器。在1928年，这个理论被应用于富农、“沙赫特分子”和不指名的“反革命分子”，从而使他的关于内部有强大的敌人的观点和他那“非常的”、国内战争的政治变得合法化。到三十年代，他又把这个理论改换成反对“人民公敌”的阴谋理论和实行大恐怖的思想。③ 1928年7月布哈林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时，心理就明白这是意味着杀人，他说：“这是愚蠢的无知……其结果将会

---

① 见罗伯特·C·塔克：《苏联政治思想》(重版本，纽约，1971年)第40—41页和他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历史和人物研究》(纽约，1973年)。

② 斯大林是在1928年的七月全会上提出他的理论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1929年4月这一理论被正式通过。《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552页。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第9—10、20—23页上最充分地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李可夫也同意他的观点。《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209页。正如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的，这场争论的“根子”是阶级斗争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13、26—36页。

③ 见图克为罗伯特·C·塔克和斯蒂芬·F·科恩合著的《大清洗的审讯》(纽约，1965年)所写的导言。见该书第15—16页。

出现一个警察国家。”①

正在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的这些战斗主题，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斗争的中心内容。它同布哈林的基本主张——阶级合作、国内和平和渐进的发展是根本对立的；有组织地实行的“非常措施”，是同调和的、和平的政策，即布哈林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方法”相对立的。斯大林提出的一些建议本来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他的战斗的主题赋予了这些建议一种任性的、极端的性质。现在，制订经济计划的复杂细致工作被当作“庸俗的现实主义”加以抛弃，而简化为对各种“堡垒”的冲击。而布哈林早在1928年7月就曾警告说，甚至是一项考虑周到的集体化计划也有可能蜕化成“用武力把农民赶进公社去”的一种疯狂的企图。② 布哈林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国内战争和国内和平之间的对抗。布哈林指责斯大林推行的是“导致国内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封建”政策。③ 斯大林分子则吹嘘说，他们已把布哈林的和平发展的见解和“其他一些自由派货色”都“装进档案里去了”，指责布哈林把列宁说成是“国内和平的鼓吹者”，并且说他呼吁谨慎和“正常化”，等于是在战时犯了“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和“涣散情绪”的错误。④

布哈林虽然愤愤地抱怨说，他这位从前的盟友突然转向“超工

---

①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② 1928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T1901）。布哈林进而警告说，不要“人为地把共产主义移植到农村中去”。引语见Z·I·克留契娃：《在苏联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条件下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加强》（莫斯科，1970年）第256页。关于“庸俗现实主义”，见卡尔和戴维斯：《计划经济》第1卷第323页；有一种说法说布哈林在计划工作上提出的论点，从“数学上”看是正确的，但是文不对题的，正如红军的胜利所证明的一样。《国际报刊通讯》第9卷（1929年）第972页。

③ 关于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指责，见他的一篇不署名的社论，《真理报》1928年7月14日第1版。其他的上面都已引用。

④ 《真理报》1929年4月24日第1版；《消息报》1929年4月23日第1版；波斯

业化”思想和剥削农民的政策，这是“在思想上彻底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但是他懂得，在斯大林手中，这些观点和政策由于掺进了他的军事政治并失去了左派那种严密的分析特点，因而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更为严重的危险。[5] 为此，他采取的对策是重新阐述自二十年代初期以来他为了反对左派而提出过的那些关于苏联发展的政策和思想，并再次为之进行辩护。他的观点和对斯大林在1928至1929年间所推行的新方针的批判，再次以反对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的“任性的冲动”为主要内容，并且由于经过了1927年的修改而得到了加强。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当时的观点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同过去一样，布哈林在政治方面所强调的思想是，他相信无节制的农业政策肯定会毁掉1917年的遗产即城乡之间的结合，并会触发一场同农民进行的致命的内战。他的意思并不是象过去那样主张在经济上对新生的农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他是继续支持对富农展开进攻的，但他指的是他在1927年所说的那种进攻，即用非暴力的、“新经济政策的方法”来限制富农进行积累和扩大影响，这种方法不会以任何方式触犯富农以外的群众的利益。[6] 布哈林强调指出，斯大林掀起的那场反富农运动则是另一码事，不管它的提法有多么委婉，它是一场向全体农民开战的运动。另外，他指出，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激化论诡诈地使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合法化，那些措施使农村的形势变得极度紧张并造成了“一个反对我们的农

蒂舍夫的引语，见《历史档案》1962年第2期，第193页；《真理报》1929年10月4日，第2版。卡冈诺维奇指责布哈林企图“使党涣散”。中央全会，1928年7月(T1835)。

⑤ 正如他在1928年7月向加米涅夫指出的。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⑥ 见他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发言(T1901)；他的不署名社论，《真理报》1928年7月14日第1版和1928年9月30日第2版。确实，他曾争辩说，对那些采取消极态度反对政权的人，一般地说，应该采取非强制的方法。《真理报》1928年11月10日第3版。

村统一战线"。1928年年中，农民骚动浪潮的高涨使布哈林更加确信斯大林的政策是导致国内战争的政策。他似乎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在这位"成吉思汗"采取残忍的镇压手段的情况下，党是否能够真正经受得住一场摊牌。当他说斯大林"一定会把（农民的）起义投入血泊之中"的时候，他所暗示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突然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既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也没减少他的反对意见。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虽然1927年那种对战争的恐惧感已经消退了，但是外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仍然被斯大林分子利用来作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实现重工业化的根据之一。布哈林虽然也支持发展那些为防御服务的工业，但他认为，对苏联的安全来说，一个具有同样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是"农民的信心"。他认为，在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不要说是抱着严重敌对情绪的农村居民，就是心怀消极的不满情绪的农村居民也会对政府造成危害。① 这是一种清醒的担忧，到三十年代当战争的危险变得更加现实的时候人们对此又一次感到担忧，而且在1941年的悲剧中，即当西部边疆地区的农民最初把德国侵略者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的时候这种担忧得到了验证。

在反对斯大林那些正在形成的经济政策方面，布哈林的态度同样是非常坚决的。他的意见涉及好几个方面，既包括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的持久性，也包括对计划的性质的看法。斯大林断言，1928年的粮食短缺证明农民经济的结构存在着危机，从而以含蓄的方式对布哈林提出的、在当时占上风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长期可

---

① 《列宁的政治遗嘱》第12—16页；另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3卷，第150—152页。他过去在反对左派时也提出了这个论点，见《关于全会联席会议的总结》第30—31页。

行的论断提出了挑战。斯大林对上述危机的分析是变来变去的。一方面，他强调富农已经发财，变得强大有力，并且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政府，说他们正在大量囤积粮食，因而已向新经济政策和苏维埃国家宣战。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民经济的生产率一贯很低，能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的剩余农产品始终很少。[①] 虽然斯大林对粮食产量的上述两种估计是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两种估计都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即个体耕作制已不再适应于党的工业化目标。

布哈林强烈反对斯大林的上述看法。他认为粮食短缺并不是由"铁的规律"或结构上的原因，而是由"暂时的比例失调"和过渡时期的情况造成的。他断然拒绝接受斯大林臆测的所谓"'极其巨大'的粮食储备。……没有人再相信这些童话了。"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而是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他说，造成这种情况有两个基本原因，这两个原因都很严重，但又都是可以消除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制订的"疯人院"的价格政策，不管愿意不愿意，这种政策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同种植其他作物或从事非农业的生产活动相比，种植粮食作物是无利可图的（当时副业生产的收入几乎占农村总收入的一半）。如果制订一项有利于粮食生产的相应的价格政策，那就会刺激粮食生产的发展。再加上采取累进税制和逐渐消除工业品短缺问题，农民出售的剩余粮食就会增加。布哈林承认，造成粮食生产落后的第二个原因的确是个体农业的原始状态。但他仍然相信，只要给小农提供比较小的财政上和农艺上的帮助，粮食产量就会有大幅度的增加。[②]

---

① 同斯大林的一些言论作比较。见《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10、71—83 页。

② 《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3 页；《真理报》1928 年 9 月 23 日第 1 版的不署名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被认为是布哈林；他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讲话（T1901）；《粮食收购的教训》第 12—16 页和《真理报》1928 年 1 月 27 日第 5—6 版。

个体耕作制仍然是布哈林的农业纲领的基础，但是跟 1924 至 1926年间的情况不同，它已不再是他的纲领中的唯一的特点。他现在相信，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体的农业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经过适当的宣传和支持将会逐渐得到发展，在五至十年内提供大约五分之一的剩余粮食，并且在经过“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以后最终地取代小农经济成分。一直到 1929 年年中，斯大林所正式鼓吹的目标与布哈林的上述设想还是相似的。但是，早在 1928 年 5 、6 月间，布哈林就从他那好斗的语调以及无视个体耕作和市场合作社的摩尼教徒式的态度中，看到了他想来一个“突然跃进”的灾难性迹象。布哈林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个体农户仍将是粮食生产的支柱，但是由于斯大林推行“非常措施”的结果，个体农业正在“倒退”，因为“基本的农民群众已经失去了对生产的任何刺激”。此外，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切实可行的集体化需要有熟练的人、“农业上的一定的积累”和机械化，而这三个先决条件当时在苏联的农村都是不存在的。他说：“一千把木犁也顶不了一台拖拉机。”他气愤地问道，难道斯大林要“在贫困和衰退的基础上”建议实行集体化吗？李可夫补充说，“这会败坏社会主义化的工作的名声，并把整个事情搞糟。”①

在布哈林看来，斯大林对农村的经济方针是愚蠢的，这恰恰是因为它破坏了新经济政策的多样化的潜力，从而“排除了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他自己提出的农业纲领则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并且力求找到“把集体农业与个体农业正确地结合

① 关于布哈林的言论，见《真理报》1928 年 9 月 30 日第 2—3 页；瓦甘诺夫：《右倾》第 112、115 页；《全苏列宁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第 29—32 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 2 卷第 1015 页；《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 3 卷第 27—29 页；《真理报》1929 年 3 月 17 日第 4 版。另见《真理报》1928 年 5 月 24 日第 1 版社论。李可夫的话，卡尔和戴维斯引用于：《计划经济》第 1 卷第 215— 216 页。

在一起"的途径。[①] 他强烈要求党采取多样化的方针，即："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尤其是那些生产粮食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富农经济；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此同时，采取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发展农民群众的合作社……。"[②] 他认为这样一来，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个体农业和市场关系——就能继续为苏联的工业化事业服务了。尽管直到1929年为止新经济政策还是党的官方政策，但到1929年年底它就被突然抛弃了，而布哈林讲的那番道理既未受到驳斥，也未拿到实践中去考验。

布哈林的农业纲领决定了他要对斯大林那种无限制的重工业化持反对态度，这种重工业化的资金是从农业中象贡款那样榨取的。布哈林这时似乎已经看到，在一个现代成吉思汗的手中，"实用杜冈主义"（一种几乎完全是为自己而进行生产的寄生性工业）是能够以自己的残酷的过渡的方式获得成功的。[③] 但是，他在1928至1929年间再次坚持这样的看法：只有在扩大消费市场和繁荣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持久的"重"工业化。布哈林提出的这个原则表明，他对当时发展重工业的状况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再感到满意了。他在1926至1927年间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是，他（还有李可夫）现在同意拨出相当大的基本建设开支，认为"暂时的、局部的比例失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识到"在一

---

① 见瓦甘诺夫：《右倾》第127—128页；马列茨基的文章，《真理报》1928年6月30日第2版。

②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3版。另见《粮食收购的教训》第29—31页；布哈林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发言（T1901）；《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版；《真理报》1929年3月12日第2版。

③ 见他在1928年夏提出的关于"奴隶"经济的警告。《共产国际》1928年第31—32期第35页。虽然他预言会"崩溃"，但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他也提出了"实用杜冈主义"可能取得成功的暗示。《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

段时间里我们将不得不作出牺牲。"① 然而，他认为，基本建设开支的数额应该受到对农业和为农民市场服务的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例和实际资金的限制。他希望，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牺牲"和"比例失调"能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些措施就是：鼓励小型私有工业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减轻消费品荒方面)；避免在花钱多和耗时长的项目上过多投资；把西方国家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普遍合理化而采用的"科学管理"方法与实行的技术革命应用于苏联的工业化事业，等等。②

经济方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也变成了一场对计划工作，尤其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冲突。斯大林一伙按照他们的斗争政治的精神，提出了所谓计划是为目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极端的理论，这种理论把主观意志置于客观条件之上；并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连续不断的主观命令和高指标。布哈林在1928至1929年间提出的关于计划的观点自然是极不相同的。他的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制订经济计划意味着合理使用资源，以便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计划必须建立在科学计划和客观统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或者"杂技般的致命一跃(Salto mortale)"的基础之上。第二，制订计划是为了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和危机(即不平衡)。因此，计划必须创造"动态经济平衡的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得到贯

---

① 李可夫的讲话，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870页。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4章。

②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最充分地阐述了布哈林的工业政策观点和他对斯大林的工业政策的反对意见。见《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页。另见《粮食收购的教训》第37—38页；他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发言(T1901)；《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4版和1929年1月20日第2—3页；关于技术科学和组织科学的好处，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68—199页。

彻，应该为整个经济规定“正确的比例”关系并坚持这种关系，应该考虑到并准备好储备，应该“以短线来确定高低的水准”。第三，计划工作，尤其在一个落后的农民社会里，必须是试验性的，必须考虑到有出现一些“很重要的估计不到的自发性因素（例如变幻莫测的农业收成和市场情况）的可能性。”因此，计划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精确的，也不可能（用另一个布哈林分子的话来说）成为“一本五年圣经”。[1] 最后，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务必在各个方面避免“过份集中化”和“过份官僚主义化”。在过份集中化和过份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下，一项错误决定所造成的恶果“可能并不亚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排除灵活性和扼杀下面的首创性，计划就会导致“经济上的动脉硬化症”，“成千上万的大小蠢事”和布哈林所说的“有组织的错误管理”。布哈林说：

“集中化有其局限性，因此必须给下属单位以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下属单位必须在规定的限度内既独立又负责。中央颁发的指示应该限制在规定总的任务上，制定具体细节则是下面单位的事，它们应根据实际生活的情况去行动。”[2]

同斯大林分子的说法相反，当时的斗争并不是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而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之间的斗争。争论常常集中在程度问题上，例如从农业“汲取”出多少基本建设开支为宜，应该规定多高的增长速度等等。然而，在布哈林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多少是无危机的发展”与“冒险主义”

---

① V·A·皮萨列夫的话，被引用于《真理报》1929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②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最充分地阐述了布哈林关于计划的观点，《真理报》1928年 9 月 30 日第 2—3 版。另见《粮食收购的教训》第 7—14 页；他在 1928 年 7 月全会上的发言（T1901）；《共产国际》1928 年（8 月 13 日）第 31—32 期第 32—40 页。关于“过度集中”和“承担过多”的问题，也可见《国际报刊通讯》第 8 卷（1928）第 1272 页；《真理报》1929 年 1 月 20 日第 2—3 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 183--199 页。

之间的分歧。他曾为1928年年初提出的那些雄心勃勃的投资指标进行辩护，那些指标要求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但是，这些指标被斯大林认为不合适而加以抛弃了。布哈林强调说，正确的方针是“保持这个速度（而不是把它提得更高！）”力争有真正的发展，而不是（象李可夫所说的那样）“迷信速度”。他担保说，只有这个方针而不是“疯子的政策”才能带来“持久的最高速度”。① 布哈林的经济思想虽然经过了修改，但仍然主张克制和平衡，仍然反对过多的投资、过份的紧张、过头的计划和过度的集中化。如果说，他关于经济和计划的主张似乎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那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广泛地（甚至在一些共产党国家中）接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却是，在他垮台以后，这些主张竟会如此彻底地被忽视并被官方摈斥为同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

然而，布哈林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斯大林的新方针，还不仅是出于政治观点和经济哲学方面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他对那种“极端片面的”农民政策在道义上所持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布哈林在二十年代中期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争论时，曾把自己这种观点主要表述为在苏联实行一种比较合乎道德的工业化。他在同斯大林作斗争时，也为这种观点进行了辩护，他说：“我国的工业化必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对农村的一个寄生过程。”这个观点反过来又影响到他的下述经济主张，即他反对“为生产而生产”的原则，而赞成“把发展群众

①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版。同样见《真理报》1928年11月10日第3版和1928年12月2日第3—4版。关于李可夫，见瓦甘诺夫《右倾》第98、215页。布哈林在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发表的声明中，警告说：“我们可以加快把最大数量的资金投进工业化，但是有一天我们将会惊奇地看到，必须在极其重要的地方削减、压缩、关闭，等等”。瓦甘诺夫引用了这段话，《右倾》第118页。

的消费量作为(苏联工业化的)基本经济原则”。①

但是，在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贡税政策”越来越感到担心的同时，他开始借助于多少与当时情况不同的俄国历史来表达自己道义上的抗议。1928年9月他愤怒地写道，沙皇俄国的耻辱在于它“无情地剥削农民”，而斯大林还“想把苏联推回到……旧俄国的这种历史轨道上去。”② 把这种历史性控告表达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他把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形容为“军事封建剥削”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了。对于一个俄国革命者来说，这种说法（或者其他类似的说法）具有特殊的含义。它在革命前的激进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文章中一再出现过。这是一句诅咒的话，专门用来说明沙皇俄国那种罕见的暴虐性质——这是蒙古征服者的遗产——及其对沦为农奴的农民所进行的掠夺。③ 在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们看来，斯大林“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和他所推行的那些“鞑靼可汗的政策”预示着沙皇俄国的老传统的复活。④ 布哈林在指责总书记“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时，他不仅是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名义，而且是以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反沙皇的知识分子的名义进行控告的。正因为如此，他这种“赤裸裸的诽谤”从来没有被官方忘记过，也从来没

---

①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3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84、197页。另见《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第2页。

② 《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页。布哈林用他的伊索式的语言，提出了他对“托洛茨基式的‘超工业主义者’”的指责。

③ 见P·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一部分(第5版，彼得堡，1904年)第141—143页；G·V·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第2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51—55页；A·L·西多罗夫：《列宁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载于《苏联历史》1961年(5、6月)第3期，第47—70页。

④ 这些话是属于青年布哈林分子的。《真理报》1929年11月21日第3版。另一句被引用的话说，“作为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结果，苏联也许会重新被称为黄金汗国”。这是暗指蒙古封建主在俄国的统治。A·阿勃拉莫夫：《论党内的右倾反对派》(莫斯科，1929年)第114—115页。

有被官方原谅过。①

实际上，布哈林对斯大林恢复老沙皇那套做法的抨击还不止于此。在布哈林以及俄国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激进分子看来，沙皇专制统治的政治实质，就是由官吏对不幸的人民进行无法无天、专断独行的暴虐统治的“官吏国家”。革命带来了打破这种老传统的希望和建立人民自己的并为人民服务的非官吏国家的可能性，这个国家就是列宁所说的“公社国家”，也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同向着“新极权主义国家”方向发展的当代历史趋势相对抗的大有希望的对立物。在整个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布哈林在抛弃了他自己曾一度抱有的对“国家化”的热情之后，就一直担忧在苏联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官吏国家”和新的“官吏们的无法无天现象”。他已经从左派的“垄断哲学”和“任性冲动”中看到了这种危险；但他却首先寄希望于党来防止出现这种天生的官吏习性和滥用国家权力的弊病，指望党会成为替人民说话的勇敢无畏的战士。②

然而，1928至1929年间发生的那些事件，使他这种长期以来的担忧变成了一种不加掩饰的惊慌，而且粉碎了他对党所抱有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他从斯大林长期推行的“非常措施”中看到了“专断强横的行政手段”和一种正在形成的无法无天的官僚制度的缩影。这种无法无天的形象就是，一个苏维埃干部把手枪往桌上一放，向被召集起来的农民勒取粮食。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斯大林所轻蔑地评论的那样——“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象

---

① 这一指责使人激怒不已。关于斯大林分子的立刻反应，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4—50页；P·鲍雅尔斯基：《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神话》，载于《共产党员的卫星》1929年(4月)第8期，第8—16页；卡冈诺维奇的文章，见《共青真理报》1929年11月28日第2版。现在在苏联的官方书刊中对布哈林仍持反对态度。

② 见他在《真理报》上提出的呼吁，见《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4版。

小鬼躲避阎王一样”。① 更糟糕的是，布哈林知道，那些听从上级命令的党的干部实际上是这种新的“专断强横”手段的直接代理人。他对那些已经变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官吏”和“忘记了百姓生灵”的党的干部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感，表明他的幻想已经破灭。他说，党的干部已经被权力腐蚀了，他们自己成了滥用权力的人；这些人象“旧政权底下的地方官吏”那样，在上级面前顺从得“卑躬屈节，奴态百出”，而在人民面前却表现得反复无常和“狂妄自大”。② “党和国家混成了一体——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党的机关同国家的机关已没有区别。”③ 他对这种现象究竟是斯大林的新方针的原因还是它的结果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对斯大林的新方针仿效“旧俄国”的做法和指引的方向表示失望。他重新提起列宁的“公社国家”（“可悲的是，我们距离这种公社国家还很远很远”）来突出他所看到的斯大林政策对历史的讽刺和对人民希望的违背：“一句话，（现在是）人民为官吏，而不是官吏为人民。”④

布哈林看到，斯大林的路线同布尔什维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会毁掉国家、毁掉党，因此，他对斯大林的愤恨甚至超过了他以前对左派的憎恶。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被击败的反对派所能留下的历史遗产，当然是些也许可以实现的思想和主张，这些东西是可以加以思索的，但无法对之进行真正的稽核；布哈林的经济政策所代表的另一种发展方针，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在他对新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有一部分批判却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早在1928

---

① 见布哈林写的不署名社论，《真理报》1928年7月14日第1版；阿斯特洛夫关于征购过程的叙述，《真理报》1928年7月3日第3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4页。

② 《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4页；《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页。

③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第3版。

④ 《列宁的政治遗嘱》第27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第191页；《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版。另见《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3版。

年年中，即在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前的一年半，布哈林就已经从斯大林那些好斗的政策中——不管这些政策在经济上如何行之有效——看到了出现“第三次革命”、农村内战、血腥镇压和“警察国家”的苗头。这些后果是其他人，包括总书记的支持者在内都是没有预料到的。光凭这点先见之明就使他能够在斯大林的俄国度过的余生中即使处于失败的境地也赢得了声望；这也使得斯大林对他抱有特殊的敌意。

那么，又如何解释斯大林在政治上赢得了对布哈林的一边倒的胜利呢？当时有些情况是对总书记有利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这场斗争是在一个狭小的舞台上秘密地进行的。这种局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对形成这种局面帮了忙）把冲突限制在党的领导集团的圈子内，而这里正是斯大林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这种情况使布哈林一伙人的力量不能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在党的高级领导集团的圈子外，而且实际上是在党外。

右派跟布尔什维克左派不同，左派直到最后始终是一些正在寻找社会基础的、持有不同政见的党的领导人的运动，而右派则是一个在国内拥有潜在的群众支持的反对派。右派的农村政策受到农民中大多数人的欢迎，这一点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布哈林分子、斯大林分子和不参加两派斗争的人都是很清楚的。① 此外，后来进行的清洗也表明了，布哈林的温和观点是得到非党干部，尤其同农村工作和其他共和国工作有关的非党干部的广泛赞同的。② 这些

---

① 斯大林分子象念经似地骂右派是党内的“富农代理人”。但是在比较清醒的时刻，他们说布哈林分子代表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见瓦列基斯的发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44—245页；《党的建设》1929年（12月）第2期，第3页。关于布哈林分子和不参加斗争的人的看法，见本书第490页注③和第489页注①。

② 见《共产主义革命》1929年（9月）第18期第27—39页；《党的建设》1929年（11月）第1期第39—51页；《布尔什维克》1930年（5月15日）第9期第18、22—23页；《真

清洗扫遍了从中央的人民委员部到地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各级行政机关，报刊上旷日持久地开展的反对"实践中的右倾主义"的宣传运动是这些清洗的反映。当然，布哈林主义不只是对农村具有吸引力。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是，甚至在托姆斯基的名声受到损害后，在基层工会工作者(而且可能是整个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中间仍然存在着持久不衰的右倾情绪，这种情绪主要表现在他们顽固地抵制斯大林的工业政策上。抵制的程度可以从1929至1930年间斯大林整批整批地改组工厂中的工会委员会这个事实中看出来。在这段时间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乌拉尔等主要的工业中心，工会委员被撤换的比例分别高达百分之七十八至百分之八十五之多。③

就是在党本身内部，暗中支持布哈林的人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个事实同样可以从遍及各级机构的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喧闹攻击中得到证实。党承认在首都的党员行政干部和党员知识分子中有布哈林的追随者。根据弗鲁姆金的说法，首都"成千上万的同志"都认为斯大林的路线是"毁灭性的"。此外，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中似乎也都存在着强烈的亲右派的情绪。④ 可以预料到的

理报》和《消息报》在1929年下半年经常有这方面的材料。关于对国家机关的清洗(没有这方面的完整数字)，见S·N·伊康尼科夫：《中央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联合机构在1923—1934年的建立和活动》(莫斯科，1971年)第284—293页。

③ S·P·特拉彼兹尼科夫：《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进攻时期的共产党：集体农庄制度在农村中的胜利(1929—1932年)》(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40—41页。关于工厂中长期存在右倾情绪的证明，见《党的建设》1929年(11月)第1期，第39—41页；《真理报》1929年12月11日第4版；《联共(布)党列宁格勒第三次代表会议公报》第9期(列宁格勒，1930年)第5—8页。取代托姆斯基当了工会主席的斯大林分子什维尔尼克于1928年11月抱怨说："工人们仍然没有充分地看到右的倾向的全部危险。"这是瓦甘诺夫引用的话，见《右倾》第187页。

④ 所引的弗鲁姆金的话，见兹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179页。斯大林分子自己也经常提供党内广泛存在右倾情绪的证明。见《党的建设》第1期(1929年11月)第39—

是，这种情况在农村干部中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也许还在经济上已经习惯于新经济政策的那些宽大做法了。在1929至1930年间进行的那场全党清洗运动中，被开除的党员有一万七千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百分之十一；与此同时，农村党员被开除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五，而且还有相同数量的农村党员受到了处分。[⑤]虽然这场清洗运动的受害者并不全是支持或者同情布哈林的人，但是当时党员中反对斯大林的方针的程度之大也不是清洗的结果所能充分反映出来的。这是因为有相当多但具体人数不清楚的党员干部早在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时，即在正式的清洗运动开始之前就被清洗掉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清洗的数字并没有反映出"秘密的右倾情绪"，斯大林分子一再抱怨说，这种情绪在党和共青团队伍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共产党员慑于激烈的反右运动，不得不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赞成新路线的样子，而内心深处却默默地同情布哈林反对派。[⑥]

51页；《布尔什维克》1929年(8月31日)第16期第39—62页；《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300—301页；在1929年的《真理报》上经常有这方面的例子。苏联历史学家不太愿意用材料来证明这种情绪的广泛程度，但是斯大林去世后出版的许多州的党史材料中对此是默认的。例如，可见K·V·涅克拉索夫：《共产党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和十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为党的队伍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沃洛格达，1959年)第35、41—42页；P·N·沙洛娃《中央黑土州的农业集体化：1928—1932年》(莫斯科，1963年)第80页；《土库曼共产党历史纲要》第361—363页；《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纲要》第2部分(第比利斯，1963年)第85—86页。另见芬索德：《斯摩棱斯克》第54—55、211—212页。

⑤ T·H·里格比：《1917—1967年苏联党员人数》(普林斯顿，1968年)第176—181页；托马斯·保尔·伯恩施坦：《中国和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中的领导和动员工作》(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第246—247页。斯大林分子经常抱怨说，"农村中相当多的党员"反对新的政策，他们是"有党证的准富农。"克里洛夫和齐科夫：《论右倾危险》第202页；萨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30页。

⑥ 关于对这种现象的评论，见科萨列夫：《建设时期的共青团》第17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07页，和布哈林的话，引用于阿勃拉莫夫所著《论右倾反对派》第132页。

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没有进行过选择性的选举，因此当然不可能对支持反对派的人数作出精确的估计。然而，一位外国观察家的判断（即使是有所夸张的）证实，其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他说："全国和全党持右的观点的人占着压倒多数，人们带着沉闷和害怕的心情接受了出乎他们意外的斯大林的方针。"一名托洛茨基分子——顾名思义，此人决非布哈林反对派的朋友——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在某些时候，它（按指布哈林反对派）包括了绝大多数干部而且得到全国的同情。"①

布哈林的悲剧和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不愿意求助于广大群众中存在的这种情绪。他不愿意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原因是不难加以解释的。这渊源于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教条，即认为把政治搬到党外去是非法的，这样做即便不是实际的反革命行为、至少也是潜在的反革命行为。这种观点由于多数派和反对派共同担心的一件事而得到了加强，他们担心党内各个派别如果都向群众发出呼吁，可能会导致"第三种势力"的崛起和党的垮台。② 由此又产生这样一种原则：党内的争论甚至不应该在非党群众面前进行讨论。正如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在解释左派的苦境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党内的爱国主义：它既挑动我们造反，也使我们反对我们自己"。③ 右派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右派还由于担心国内出现危机而进一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布哈林、李

---

① 尤金·莱昂斯：《乌托邦的任务》（纽约，1937年）第152页；谢尔格：《回忆录》第253页。另见西奥多·瑕伯特：《红色的俄国》（伦敦，1932年）第129、348页。

② 关于对"第三种势力"的担心，见布哈林追溯过去的讲话，《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4—125页，和托姆斯基的讲话，《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64页。反对在非党的集会上讨论党内分歧已成为一个"传统"，虽然这一"传统"常常被破坏。见布哈林于1927年11月9日对德国工人代表团的讲话（未发表过的速记记录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③ 谢尔格：《回忆录》第245页。

可夫和托姆斯基尽管十分肯定斯大林的方针是危险的、不得人心的、而且会在经济上造成灾难，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却保持沉默。广大群众给中央写了大量信件，抗议新的农村政策。但公众舆论只是在日常工作中当讨论到这些信件的意义时，才能间接地参与这场斗争。在布哈林分子看来，这些信件代表了“群众的呼声”，但在斯大林看来，它们是没有代表性的，只不过是“恐慌”的表现。①

但是，布哈林之所以采取克制态度还有另一个顾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那些被认为是最容易接受他的政策的社会集团（即农民和技术专家）是“小资产阶级”，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他们是些不体面的选民。所以，在1928至1929年间，当他们有时表达出布哈林派的情绪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布哈林派帮倒忙，斯大林分子是最爱抓住他们的话作为把柄的。例如，一个自称是为非党知识分子讲话的人曾经顺便讲过这样一句话：“当布哈林讲自己的心里话时，站在右边的非党同路人可以保持沉默。”② 实际上，正是布哈林分子在国内所指望的这些社会基础，促使斯大林把布哈林分子污蔑为“右派分子”，这个称号是所有左派，包括布哈林本人在内都感到厌恶的。布哈林由于拚命想洗刷掉这个罪名而在政治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且还干出了一系列十分荒谬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他决定亲自为1928年11月那次关键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起草一个谴责“右的偏向”的决议。他曾对感到惊愕的加米涅夫说：“我必须让全党知道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右派。”③ 这里，

---

① 见阿斯特罗夫的文章，《真理报》1928年7月1日第2版；他写的编者按，《真理报》1928年7月7日第2版；李可夫和布哈林在1928年7月全会上的讲话（T1835，1901）；布哈林的文章，《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第2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

② 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引用于列昂节夫：《右倾的经济理论》第5页。

③ 《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6页。早些时候，他曾支持共产国际反对“右的偏向”的决议。但是就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曾企图指出，问题不在于政策是左还

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假设再次使布哈林陷入困境，这些假设中有许多都是虚构的，而且有一部分就是他自己构想出来的。

布哈林不愿意把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捅到全党去也是受了类似思想的束缚。因为能否在领导圈子之外搞党的政治，这也已成了疑问，即便能搞，那也是极不健全的。从1924到1928年，党员人数从四十七万二千人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万零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因此，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化的革命先锋队，而是一个广泛组织，其参加者有等级、特权和权力的明显区分。在这个组织中，最下面的是刚刚吸收入党的普通党员，他们对上面的决定照例都表示同意而没有自己的意见，其中多数人是政治上的文盲，既不知道"倍倍尔和巴倍尔"以及"果戈理和黑格尔"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一种"偏向"和另一种"偏向"有什么不同。中间这一层是臃肿的行政官员，即被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左派和现在的右派）认为是象"泥潭"一般，对上顺从的、官僚主义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在他们上面的是高高在上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独揽党的制造舆论和作出决策的权力。④ 正如托洛茨基曾经警告过的和布哈林时而也感到担忧的那样，党的政治生活已经被取消，已经被一套等级命令制度所代替了，这套制度由于领导集团反对"派别主义"，即反对在它自己队

是右，"而在于政策是对的还是错的，它是否符合客观形势。"《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46页。

④ 关于官方对共青团员中的政治上的无知的抱怨（这种抱怨对党是同样适用的），见科萨列夫：《建设时期的共青团》第41页。一本官方历史书上讲到的一个故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有人向一个共青团员问党内的偏向问题。他答复说有三种偏向：右的、左的和中间的。他解释说，右的主张慢慢地发展工业；左的主张迅速发展；中间的主张中间道路。又问他，"谁有中间偏向？"回答说，"是我们党，是中央委员会"。阿勃拉莫夫：《论右倾反对派》第210—211页。布哈林在1928—1929年对党的官吏制度所作的分析同托洛茨基分子的分析很相似。连一个感到幻想破灭的斯大林分子也得出结论说，党的官吏是"市侩"的"政治泥坑"。见L·沙茨金：《打倒党内庸人！》，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6月18日第2版。

伍之外搞政治活动而得到了加强并且变得合法化了。

到1929年，布哈林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对党内制度所提出的大部分批评意见。然而，跟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布哈林由于曾经支持这些批评意见的发展，他自己却成了这些批评意见的俘虏。对他在1928至1929年间提出的异议以及他要求党容忍批评意见的建议，别人常常引用他自己的话，即他早些时候攻击左派"派别主义"的那些言论，予以驳回。他对斯大林的"书记政权"的批评也遭到了嘲弄："你这些话是从哪里抄来的？……从托洛茨基那儿！"① 不过，尽管他参与制定了这种剥夺公民权的准则，他还是很想向全党提出呼吁。他为自己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感到极度痛苦。他说："有时我在夜里扪心自问：难道我们有权利保持沉默吗？这难道不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吗？……难道我们的'激动'不等于是搞手淫吗？"② 最后，当他认识到他努力想争取过来的那个党的统治集团将"屠杀"任何一个胆敢把这场斗争扩大到其圈子之外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终于顺从于"党的统一和党的纪律"，顺从于他自己曾帮助建立起来的那种不容异说的狭隘政治了。他回避了公开的"派别主义"，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徒劳无益的"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例如拜访加米涅夫），这种做法是很容易被他的敌人加以利用的。③ 他的政

---

① 《反对派通讯》上的引话，1929年第1—2期，第17页。另见N·丘谢夫斯基：《党内制度和右倾》（列宁格勒，1929年）。其他的右派领袖处于同样的矛盾之中，即他们过去不容忍不同意见，而现在又主张给忠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自由。关于托姆斯基和莫斯科的领导人，见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197—198、209页；瓦甘诺夫：《右倾》第157—158页。

②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

③ 波波夫：《历史大纲》第2卷第369页。布哈林同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支持者的关系同样是受到约束的。见勒维：《世界史》第327、325页。到1929年，布哈林同他们的会见，同他和加米涅夫的会见一样，是"秘密的"和徒劳无益的。关于有一次会见的情况，见《费尔特利涅里学会年鉴》第653—659页。托姆斯基后来曾激动地谈到右派的这种尴尬处境和"党的一致和党的纪律"给予他们的限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250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60页。

治立场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愤怒地蔑视斯大林和他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始终只充当了一个有节制的、勉强的反对派分子。

因此，除了那些过分隐晦而收不到成效的公开呼吁以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一起共同把他们之间的这场致命的冲突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秘密圈子内，使这场冲突“在广大党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压制下去”。[①] 在解释斯大林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时，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以往的习惯的解释都把事情简单化了，说斯大林当了六年总书记积聚了他的官僚权力，又由于他对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这种权力得到了加强，变得至高无上和无可动摇，所以他不花吹灰之力就一举打垮了布哈林分子。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上述解释虽然强调了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却夸大了斯大林 1928 年在组织方面所拥有的力量，低估了右派在这方面的力量，并且忽视了在力量对比和在影响斗争的结局方面存在着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斯大林对党中央机构的控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这个机构所拥有的任命之权，他在全党提拔了一批忠于他的人，尤其是那些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省委书记。他象十四世纪的莫斯科大公那样，把党内的“侯国”和贵族纷纷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些人是 1928 至 1929 年间支持他的骨干力量。[②] 同样重要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它就象一个全国范围的影子政府那样为总书记效劳。一方面，依靠它同所有党组织的直接联系，斯大林可以解释党的政策、操纵党的舆论、大搞“集体迫害”和抵销布哈林分子的报纸宣

---

① 斯米尔加的话，引用于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第 541 页。

② 以下就是 1928—1929 年的一些主要的省委书记，他们过去都曾在斯大林的中央机关中工作过：鲍曼（莫斯科）、卡冈诺维奇（乌克兰）、约瑟夫·瓦列珂斯（中央黑土区）、谢尔盖·西卓夫（西伯利亚）、鲍里斯·谢鲍尔达也夫（下伏尔加）、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乌拉尔）、孟德尔·哈塔耶维奇（中伏尔加）、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乌克兰）。

传。另一方面，它的下属机构网——1928年11月间，由于到处都有这些机构的书记们（达一万三千三百人至一万九千四百人之多）[①]，所以他们竟能一路上阻挠布哈林从基斯洛沃茨克返回莫斯科——在那些由反对派及其同情者所把持的每一个单位里，实际上都起到了斯大林分子的核心小组的作用。这些核心小组虽然在斗争开始时在人数上居于少数，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如莫斯科党组织、工会、红色教授学院、甚至在一些外国共产党内，颠覆并取代了右派的领导。[②] 这些核心小组在1928至1929年间所拥有的集体优势，使党中央机关得以建立起对"侯国"的霸权，原先处在党中央控制之外的李可夫的政府机关就是这些"侯国"中的一个。

斯大林所采用的这种用提拔来诱惑和用报复相威胁的胡萝卜与大棒手段，也影响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中央委员们的选票。例如，在1928年7月全会的前夕，斯大林撤掉了卡冈诺维奇（也许是斯大林的最有才干但却最被人瞧不起的追随者）的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卡冈诺维奇在哈尔科夫的三年暴政严重地伤害了乌克兰代表们的感情，这些代表们现在由于把他撤职而感激不已。[③] 斯大林玩弄的另一个与此相类似的慷慨大度的手法，就是利用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新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各地党的领导人，包括布哈林所依靠的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在内，都想为自己的地区争取到一个大的份额。如果说这种情况使他们倾向于斯大林的"最大限度的投资"政策的话，那么，这也同样使他们看清了斯大

---

① 夏皮罗：《共产党》第444—445页。

② 正如斯大林1929年5月在威胁亲布哈林的美国党领导时所说的："目前你们仍拥有形式上的多数。但是明天就不会有多数了，你们将变得彻底孤立……"。尤丁和斯鲁瑟：《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77页。

③ 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另见《乌克兰共产党历史纲要》（第2版，基辅，1964年）第376—377页；G·马利亚金：《波斯蒂谢夫》（莫斯科，1965年）第79页。

林控制着投资分配权这个事实。梁赞诺夫注意到了他们对拨款的激烈争夺及其对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他在1929年4月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每一个发言都是以'给我们乌拉尔一个工厂，让右派见鬼去吧！给我们一个发电站，让右派见鬼去吧！'……这样的话来结束的。"① 总书记的大棒的效果也不亚于胡萝卜。从击溃莫斯科的那批领导人，从行使对各地党组织进行调查的权力，到利用书记处的人事档案来"透露情况，进行诽谤"，② 这些都显示了他的大棒的作用。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了"中央当局的重型大头短棒"。③ 它使斯大林处于远比布哈林（他曾把自己称为"俄国最坏的组织者"④）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仅仅是党机关的政治还不能说明斯大林取得胜利的全部原因。就中央委员会来说，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保证使中下级代表们对斯大林忠诚或者对他的主张表示默许。这些代表都是在斯大林的庇护下爬上来的。关于这些人，一个幻想破灭的斯大林分子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不是用论据而是用党证把布哈林击败的。"⑤ 然而这些下级干部

---

①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214页。关于乌克兰人和列宁格勒人，见哈温：《掌着工业的舵》第67—68页；V·德罗比谢夫和N·杜莫娃：《V·久巴》（莫斯科，1963年）第48—50页；斯捷茨基的文章，载于《真理报》1929年3月17日第1版。

② 后面这一点也许就是布哈林认为斯大林所以能对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拥有"特殊的控制力"的原因。见《列昂·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纽约，1970年）第167—168页；丹尼尔斯：《良心》第329页。关于斯大林的侦讯权力，见卡冈诺维奇的讲话，《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53页。

③ 一个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讲的话，被引用于S·V·哈尔曼达良：《列宁和外高加索联盟的建立，1921—1923》（埃里温，1969年）第218页。

④ 布哈林的话，引用于霍格隆：《往返莫斯科的路线》第208页。无疑这是一种夸张，但布哈林确实很不注意组织活动。见洪贝特—德罗兹对布哈林没有时间抓共产国际的工作的抱怨。《莫斯科的看法》（巴黎）第242页。

⑤ 拉札尔·沙茨金的话，引用于《革命年代》（纽约），1929年（11月1日）第1期第16页。从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上布哈林所讲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级中央委员们认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已发生分化的机构。

尽管是中央委员，在1928至1929年间的斗争中却仅仅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实际上，他们所批准的结果是高级中央委员这一较小的非正式集团早已决定了的。这个集团是一个由二、三十名有影响的人物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这些人物就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和那些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主要是代表莫斯科、列宁格勒、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乌拉尔和乌克兰的）代表团的头头。①

在这个其成员经过严格挑选的寡头政治集团里，斯大林的官僚力量的影响要小得多。其实际限度可从右派自己在高级领导层（甚至在书记处和组织局）中所拥有的力量和不参加派别的领导人的人数上看出来，这些领导人的摇摆不定使这场斗争的结果推迟了几个月方见分晓。斯大林的官僚力量还受到这些政治寡头们本身的限制。这些寡头的代表人物就是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乌克兰的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和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以及还有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头谢尔盖·基洛夫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国内战争期间上升到"军事一政治"高位的党的"实际政治家"，从那时以来一直主管着苏联一些最关键的省份和资源。② 作为行政

---

① 《服从党还是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前屈服》一文中曾指出这些都是关键性的党组织。见《真理报》1929年4月23日第3版。这是一篇斯大林分子写的文章，文中热烈赞扬这些党组织正式谴责右派。除了莫斯科人以外，布哈林也曾指望得到列宁格勒人和乌克兰人的支持。他也把北高加索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列为可能的盟友。见布哈林—加米涅夫备忘录（T1897）。西伯利亚（斯大林1928年1月曾在那里开始推行他的"非常措施"）党的书记西尔佐夫在1929年5月取代李可夫充当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理。这个非正式的政治寡头的唯一一次正式集会似乎是1929年1、2月间举行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反对派进行了指责。

② 见《党派来的人：回忆录》（莫斯科，1967年）第181页。书中把基洛夫评价为一个"军事—政治人才"；莫洛托夫的声明，说"我们中绝大多数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的政治家"，载于《布尔什维克》1931年（2月15日）第三期第20页。他们中很多人，象斯大林一样，是外高加索人，是一些粗野、结实、留小胡子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国内战争是一次特别严峻的经历。关于他们的政治品格和气质，见A·I·米高扬：《沿着斗争的道路》第1卷（莫斯科，1971年）。另有一些人，包括基洛夫在内，是在外高加索开始他们的生涯的，也有这样的特点。

官员和政治家，他们常常同总书记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却不是总书记的没有头脑的政治奴才，而是合格的、能够独立思考的重要领导人。[①] 他们具有坚韧的务实派的特点，主要关心国内事情，如何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对他们共同的观点起着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这种抱负由于1927年的战争危险而得到加强，后来又由于1928年的粮食危机而受到挫折。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争取他们支持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争论的问题和“论据”。

到1929年4月，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终于选择了斯大林，并在最高领导集团中组成了斯大林的必要的多数。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他们这样做，主要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官僚权力，而是由于他们更喜欢他的领导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作出的选择无疑表明了他们同作为强有力的“实际政治家”的总书记所具有的共同性，而同总书记相比，温文尔雅、重视理论的布哈林看起来也许“仅

---

① 由于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后来在三十年代遭到暗杀，所以基洛夫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早先是阿塞拜疆党的书记，同斯大林在外高加索的支持者关系密切，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失败后，他接管了列宁格勒的党。他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的忠实的地方总督，他的列宁格勒组织也被认为是在二十年后期坚定地忠于总书记的。但有迹象表明情况并不如此，如基洛夫拒绝了书记处1926年要委派人到列宁格勒的企图（见《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68年第8期第82—83页）；布哈林于1928年曾期待得到列宁格勒的支持，他在列宁格勒有一些有名的支持者，象斯捷茨基、彼得罗夫斯基和工会领导人费多尔·乌加洛夫；直到1929年4月在结局明确以前，基洛夫自己极少在反布哈林的斗争中发挥任何作用。（但我没有可能查阅列宁格勒的报纸。）相反，基洛夫在关键的几个月中似乎置身于冲突之外。尽管他在1928年的观点并不清楚，但他对斯大林的工业计划的最初反应是认为它是“不现实的”。《历史档案》1961年第5期第109页。斯大林在1928和1929年有两次对列宁格勒党（从而也含蓄地对基洛夫）进行了两次不寻常的攻击，这也许反映了他的不满，一次是对列宁格勒的党报，另一次是对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见古比雪夫的发言，《真理报》1929年9月25日第3版；S·V·克拉斯尼科夫：《S·M·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1966年）第49—56页；《真理报》1929年9月4日第3版。

仅是个孩子而已”。[①] 但是，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布哈林主义的政策能否继续有效是有怀疑的，并对右派的纲领在1928至1929年陷入困境作出了消极的反应。尽管布哈林表示支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些经过修改了的工业指标和农业指标，日益恶化的粮食危机却使他和他的同伙们处于一种尴尬而暧昧的境地。他们坚持认为，在农村局势“正常化”以前，要实行同代表大会提倡的“新经济政策的方法”相一致的经济纲领是不可能的，因而一再要求对农民作暂时的让步并对工业发展加以限制。然而，这些要求无论多么明智，却容易使人感到右派有退却和悲观失望的味道，并且加强了斯大林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的一个论点，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些胆怯的人，没有能力进行强有力的领导，死抱着过时的想法不放，兜售“不断让步论”，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还在准备破坏工业化的步伐。[②] 无论是布哈林分子所提出的雄心勃勃的长远规划，还是他们关于“必须分清乐观主义和愚蠢行为的界限”[③] 的主张，都未能消除人们获得的上述印象。这一点同样也是导致他们毁灭的原因。

---

① 阿斯特罗夫：《峭壁》第220页。斯大林分子不是没有理由地经常把布哈林说成是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和鼓舞者”。《真理报》1929年11月18日第1版。说右派“企图使布哈林同志当我们党的领袖”的论点是不太有说服力的。《联共(布)党列宁格勒第三次州代表会议公报》第3期（列宁格勒，1930年）第14页。布哈林虽然才能卓越，但他并不想表明他比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高超，他们自己都是“实干的政治家。正如他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出的主动表示所表明的，他所想的仍然是集体领导。

② 关于对他们的“不断的让步”提出的指责，见克里洛夫和齐科夫：《关于右的危险》第159—170页。布哈林和李可夫建议进口粮食以减轻危机。这个建议特别不受欢迎，并受到批评，被说成是“对我们的工业化速度的最大进攻”。瓦甘诺夫：《右倾》第106页；《苏共党史》第5期(1969年5月)第30页。

③ 布哈林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I卷第33页。或者，正如布哈林分子爱恒瓦尔德所讲的：“做一个有右的偏向的人比当一个毫无希望的白痴要好”。这句话被引用于《真理报》1929年11月3日第3版。到处都号召表现出“现实的乐观主义”，以反击布哈林。《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版。

1928至1929年间，党内舆论对右派提出的告诫性的呼吁越来越感到不耐烦，而越来越接受斯大林努力培养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英雄主义传统，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事实。这种情况在比较年轻的、正在步步高升的党的干部和共青团领导人中间最为明显。尽管布哈林同他们的组织有长期的联系，他们却几乎一致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并且为斯大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最重要的是，这种不耐烦的心情在党内有影响的人物中也占着优势。古比雪夫对他们的情绪和他们拒绝接受布哈林一伙人的说教的心情作了概括："历史不允许我们平静地……用胆怯的步子前进。"基洛夫也模仿他的话说："一句话，别着急。……一句话，右派要社会主义，但要的是一种没有特别的忙乱，没有斗争和没有困难的社会主义。"而奥尔忠尼启泽在承认布哈林的好心的同时，也说出了他们的担忧："这不是一个愿望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政策将会把我们拉向后退而不是拉向前进。"[②] 党的政治寡头们决心要迅速"赶上并超过"西方工业国家，并为当时的危机感到烦恼，终于选择了斯大林的"乐观主义"，而摒弃了右派的"没有希望的悲观主义"。[③]

---

① 在一批有时叫做"青年斯大林左派"的激进的反布哈林分子身上，体现了斯大林和年青的党和共青团领导人之间的联盟。谢尔格：《回忆录》第259页。这些人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就是斯大林的保护人，他们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为洛米纳泽、沙茨金和扬·斯滕四，他们中也包括象海因茨·纽曼那样的外国的共产国际盟友。有些人后来很快就对斯大林感到失望，而同他决裂。见《真理报》1931年12月1日第3版；马格丽特·布伯—纽曼：《世界革命战争的舞台》（斯图加特，1967年）第282—284页和其他各处。

② 古比雪夫语，被引用于《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10期第76页；谢·米·基洛夫：《文章和讲演选辑（1912—1934）》第2卷（莫斯科，1957年）第539页。格·康·奥尔忠尼启泽：《文章和讲演》第2卷（莫斯科，1957年）第174页。

③ 斯大林指责说右派传播悲观主义哲学，这也许是他的最有效的指责。这种指责也是对布哈林关于国际共运的观点而发的，布哈林认为如果不发生大战，欧洲大概不会起来革命。见《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11月17日第2版。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投票支持布哈林所说的“冒险家政策”，而仅仅是赞同斯大林针对右派而提出的那些大胆的，但仍然以新经济政策为依据的政策。1929年4月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些政策，虽然这些政策把迅速发展工业和制订计划放在优先于市场平衡的地位，但是它们并没有预期要发生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非富农化”和结束新经济政策。①

简而言之，斯大林在建立反布哈林的多数派和在领导集团内以同辈中居首位的姿态出现时，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鲁莽设计师的形象，而是一个自封的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形象。这个政治家发誓要在胆怯的右派和极端的左派之间奉行一项“冷静和平稳的”方针——也就是说，他是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真正捍卫者的面貌出现的。② 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好斗的言论，却由于自己在二十年代经常起的“不左不右”的作用而得到了好处。他给他的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务实和讲究效率，“调子沉着，语气平静”。③ 他们那里知道七个月以后，他就突然开始执行一条同过去截然不同的方针，他提出了人们想象不到的目标，采取了人们想象不到的做法。这就是所谓的“大转变”。对于许多布尔什维克，包括一些曾经支持他反对布哈林的人来说，这场“大转

① 对党的寡头来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工业增长速度和计划问题。集体化问题，他们（象布哈林一样）仍把它看作一项渐进的、自愿的事业，对它并不十分关心，而对共产国际中的争论则很少关心。官方曾就右派的失败发表过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着重表明了他们当时还没有抛弃新经济政策。社论中说，“新经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真理报》1929年4月28日第1版。确实，斯大林的一些支持者仍为斯大林的主张的某些方面，包括强化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喜好“非常措施”，感到担忧。见《消息报》一篇社论中流露的担忧，《消息报》1929年4月23日第1版；艾赫的发言，《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91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8、212、239—242页。

③ 见A·I·米高扬：《关于列宁的追思和回忆》（莫斯科，1970年）第145、196、233页；《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1970年）第27、50页。

变"既象耶稣显圣那样堂皇而至，又象半夜小偷那样突如其来。

1929年4月(这是布哈林被击败的时间)至12月这几个动荡的月份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三件相互有关的大事：第一，斯大林的政策急剧地激进化，与此同时，他开始独断专行地做出重大决定；第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第三，开始了一场矛头针对右派反对派和布哈林个人的激烈的官方运动，而且这场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对整个政治上的温和派的大批判。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在一起，导致了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集团(包括左派在内)从未提倡过的一些政策，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崩溃，导致了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斯大林由于在中央委员会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壮了胆，在1929年夏天和秋天就开始改变党的政策。他的第一个重大改变是在共产国际中作出的。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这次会议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年前制订的决议抛到一边，而采纳了斯大林分子自1928年以来一直主张的新的激进方针。会议对"第三阶段"重新作了解释，说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结束、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高涨和西方国家确定地存在着革命形势。社会党，实际上所有改良主义分子，都被认定是主要敌人——说他们已经完全"法西斯化"。在对共产国际中的温和派进行大清洗的同时，还指示外国共产党断绝同社会民主运动的联系，揭露它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建立与现存的工会相对立的工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分裂欧洲的劳工运动。① 这样，共产国际便开始踏上了通向极端主义的注定

---

① 关于全会的进行情况，见《国际报刊通讯》第9卷(1929年)第35、40—41、44—49、51、53、55、57、59号。新的路线是由莫洛托夫、库西宁和曼纽尔斯基提出来的。斯大林在全会上没有讲话，但是，他在五月发表的两篇讲演中发出了确定新方针的信号。斯大林：《论美国共产党中的右倾分子》(莫斯科，1930年)。

要遭致不幸的征途。五年以后，这条道路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它促成了一度十分强大的（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德国劳工运动的崩溃，从而帮助了希特勒的上台。

斯大林在国内采取的进一步向左转的做法，其极端的程度并不亚于他在共产国际的所做所为。在五年计划于4、5月间通过以后的几个月内，斯大林大幅度地调高了计划规定的工业指标和农业指标，从而改变了整个计划的性质。斯大林一伙受到夏季工业生产迅速上升的鼓舞，但又面临着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的局面，因而突然把最适宜的数字变成了最低限度的数字，使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并且把计划建设的新工厂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到了秋天，斯大林一伙先是强调在四年内五年计划必须完成，后来又强调必须超额完成。结果，原先计划中考虑到的条件性、平衡性和总的衔接性都不见了。[①] 计划已经不再成其为计划，而成了一堆千变万化的不断扩大的数字，它把以后三年的快得可怕的重工业化说成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农村的形势继续在恶化。夏天和秋天出现了一阵新的农民骚动的浪潮，这正好证实了右派的预言。仅在莫斯科州，从1月到9月，有记载的农村骚动即达二千一百九十八次之多，其中有许多是暴力行动。[②] 同样严重和可以预料到的是，农村的播种面积继续减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短缺越来越尖锐化，1929年年初重新开始实行（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第一次）的消费品配给制变得更加严格了。

---

① 关于这些发展，见索文：《俄国农民》第375、453页。

② 科兹洛娃：《莫斯科的共产党员》第43页。苏联公布的关于被称为“富农恐怖行动”的农村骚动的统计数字是简略而矛盾的。特别难于得到1928年和1929年的比较数字。据报道，单是乌克兰的“富农恐怖行动”，1929年就比1927年多三倍。《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2期第101页。

斯大林的工业目标受到了日益加深的供应危机的威胁，他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制性的和更加雄心勃勃的措施。到1929年秋天，“非常措施”(正如布哈林所担心的那样）已经成为国家征购粮食的经常制度。与此同时，斯大林关于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的想法变得更大胆了。他指示中央部门的计划工作者和农村干部不要(象原先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把集体化当作个体农民经济和市场合作社的一种补充，而要把它当作立即能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途径。由于国家代理人——他们的方法越来越带有强迫性——大批涌到农村去收购粮食，推动农民建立集体农庄和煽动他们反对富农，集体化农户的比例从6月份的百分之三点九猛增到10月初的百分之七点六。初期的集体农庄规模不大，经常不稳定，质量也很差，而且在全国二千五百万户农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上述比例数字的上升看来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要掀起一场全力以赴的运动。中央报刊开始满怀希望地谈论有选择地在某些地区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的可能性，虽然那时在报刊上还看不到12月份就要来临的那场大进攻的迹象。①

起初，这些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到已经被击败的反对派。托姆斯基及其追随者已经在6月份正式被解除了他们在工会中担任的职务，布哈林及其在外国党中的盟友们也在7月份被解除了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作。② 6月份，布哈林被任命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与技术部主任，主管几个工业研究所的工作。这个工作岗位虽然后来为他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有效的讲台，但是对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它是一个政治流放

① 研究1929年苏联的农村政策和农村中发生的事件的重要著作有莱文的《俄国农民》第14—18章。

② 《国际报刊通讯》第9卷(1929)第745页。

场所。[1] 然而，所有这些步子都还没有超过中央委员会在4月份作出的撤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的决定（实际上是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辞职要求），但在形式上仍给他们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因此，尽管在夏初反右运动已经加强，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仍然没有受到公开的攻击。

至于三人团自己，他们看来一直避免采取公开的行动，以免损害他们在领导集团内作为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那种已经岌岌可危的地位。对李可夫（他的总理职务一直保留到1930年12月）来说，这意味着签署他所反对的政令。对不那么顺应形势的托姆斯基来说，这意味着保持真正的沉默。另一方面，布哈林在一段时间里还继续发表意见，不过他讲话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也必然比过去更加克制。他6月份在一次无神论者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隐隐约约地对当时正在发展的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和要求不加鉴别地服从党的决定的气氛提出了抗议。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思想，而不是教条和死的公式。他引用了马克思喜欢的一句口号："怀疑一切"。[2] 他自己对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持的批判态度是在5月和6月分两部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转弯抹角地表达出来的，这是他在1929年得以发表的最后一篇措辞谨慎但却不合潮流的文章。[3]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篇批判西方关于建立大规模组织的理论文章，但实际上，文章重申了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继续处于稳定状态的论点。在国内问题上，文章重申了他对过分集中化和到处蔓延的官僚主义化的危险所提出的警告。

---

① 《苏联百科辞典》第1卷（莫斯科，1931年）第221页。这个职务过去是加米涅夫占有的。《政治词典》（列宁格勒，1929年）第660页。

② 《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第3页。

③ 《资产阶级理论家眼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几个问题》，见《真理报》1929年5月26日第2—3版；《"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见《真理报》1929年6月3日第3、5页。

但是，尽管他们采取了自我克制的态度并努力使自己在政治局中发表不同意见的资格“合法化”，① 到8月份事情就清楚了：斯大林决心摧毁作为政治领导人的三人团，尤其是布哈林本人。他的极端主义方针和农村中的骚动正在造成一种潜伏着爆炸性危险的形势。它一方面促使许多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投降和回来——用托洛茨基的鄙薄的话来说他们是被“半绞死、半原谅”② ——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效劳，另一方面它也在斯大林自己的支持者中间引起了惊慌和争论。③ 在这种情况下，虽已击败但尚未丢脸的布哈林仍然是个可怕的对手，他提出的警告和纲领正在获得新的效力，他的政治威望仍然是斯大林攫取最高领导权的障碍。

使布哈林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蒙受耻辱的决定——这显然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提议下采取的——是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布哈林的公开进攻是8月21日和24日两天开始的，当时，已经成为总书记的喉舌的《真理报》发表文章，劈头盖脸地谴责布哈林是“右倾分子的主要领导人和鼓动者”。④ 实际上所有官方报刊都立即跟着采取了行动。对布哈林的这种谴责在1929年的最后四个月中发展成为一场党的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有组织的政

---

① 据说这三人曾对他们的“不平等的地位”表示抱怨，并争取使他们的资格“合法化”。见《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662页。

② 《反对派通讯》1929年第1—2期第14页。

③ 在6月和7月，“青年斯大林左派”的两个领导人沙茨金和斯泰因几乎是用布哈林在6月早些时候用过的同样语言对不加鉴别地服从党的决定的要求表示抗议。见《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6月18日第2版和1929年7月26日第2版。他们的抱怨可能反映了斯大林的追随者中对他的社会政策的日益增长的不安。两人在压力下都认了错（见《真理报》1929年11月2日第4版和1929年11月12日第6版），但1930年又参加了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的更为严重的反叛。关于表明警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震惊的其他事例，见《社会主义公报》1929年6月14日和1929年10月10日第14页；莱文：《俄国农民》第460—461页。

④ 见本书第498页注①。

治诽谤运动(跟以前的反对派分子不同，布哈林不能进行回答，也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也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章、小册子、书籍和新发现的档案文件等发表出来(其中有许多是斯大林分子的"理论队伍"早在1928年年初就炮制好了的)，①给布哈林的整个政治生涯和理论生涯扣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非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党"、"小资产阶级"、"亲富农"等等。从布哈林在侨居国外期间同列宁的争论和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观点，到他反对斯大林的言论和行动，从他在战时发表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文章《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到《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列宁的政治遗嘱》，所有这些重要的事情和著作，没有一件(或一篇)是不遭诋毁的。②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使布哈林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威望、尤其是要使他享有的"全党所喜爱的人"和党的最大理论家的声誉无可挽回地一败涂地。然而，它的结果却要比这严重得多。跟托洛茨基不同，布哈林的思想在党的生活的许多领域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被当作官方的学说达十余年之久，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人"。③ 因此，这场"清除布哈林主义影响"的运动变成了

① 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6章。

② 即使列出一张几百篇反布哈林的文章的单子来也是没有意思的。从8月底以后，这些文章在《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共青团真理报》、《共产主义革命》、《宣传员》和其他报刊上经常可见。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和《无产阶级革命》上经常出现对布哈林的生涯和理论著作的更有份量的攻击。关于这方面的小册子和书籍，可举V·佐林的《论布哈林同列宁的分歧》(莫斯科，1930年)；列曼和波克罗夫斯基的《右倾的思想根源》；阿勃拉莫夫的《论右倾反对派》和布哈尔采夫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武器》。

③ 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抱怨的话。见《争取哲学战线上的转折：论文集》(莫斯科，1931年)第91、101页。有一个批评家在这本论文集中指出，同布哈林相比，托洛茨基在理论问题上是"微不足道的"。另见斯捷茨基的发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488页。

一场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党的思想体系和对一代人的教育的攻击。被贬低和被批判的不仅是布哈林主义的主要原则——阶级合作、国内和平、平衡和渐进的发展等——而且还有同他只有间接联系的哲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主义的崇尚斗争的主题和政策取代它们的地位，被奉为官方的思想。

到 11 月份，对布哈林本人以及对"右的偏向"和"调和主义"的嘲弄和攻击已经成了矛头指向整个温和政策的一场思想恐怖运动。这场思想恐怖运动是同清洗运动（所有已知的布哈林的同情者，甚至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现在都成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① 同时进行的，它在政治上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强迫一个很多成员还不太听话的党接受了狂热行为。除了其他后果以外，它把广泛存在的不满斯大林的农业政策的敌对情绪压了下去，并且驱使已经吓破了胆的党的干部采取疯狂的过火行动，从而造成了 1929 至 1930 年冬天的那场农村大灾难。②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对新经济政策所提倡的那些温和、容忍和调和的做法的一次正式的批判，把这些做法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有时也被指责为"布哈林主义的自由主

---

① 乌里扬诺娃被从《真理报》撤职。克鲁普斯卡娅虽然形式上保留了副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实际上被剥夺了职权。《M·I·乌里扬诺娃——〈真理报〉的秘书》第 259 页；《真理报》1964 年 2 月 26 日第 4 页。关于克鲁普斯卡娅在 1929 年对布哈林的支持，见本章注。

② 这是研究集体化的苏联历史学家现在强调指出的一点。见M· L· 鲍格登科：《1930年春夏的集体农庄建设》，《历史札记》第76期（1965年）第21页；丹尼洛夫：《集体化前夕苏联农村社会经济形势特征》第42页；涅马科夫：《共产党》第194 页。这场运动在主张保持工业平衡的人中间造成了同样的印象。见G· 索洛金的文章，《真理报》1963 年12月 1 日第 4 版。关于承认"反集体农庄的情绪"在党内仍很普遍的例子，见《真理报》1929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克里洛夫和齐可夫：《论右倾危险》第 142 页。

义”。[①] 这场运动同1929年年中以来苏联文化生活和思想生活中发生的大转变是相呼应的。在个体农民、小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非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的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也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斯大林一伙以其斗争政治中所包含的摩尼教精神，在各种学派之间开始采取推重一派以压制其他各派的手段：用辩证论哲学家压制机械论者（后者的理论由于碰巧同布哈林的哲学理论有相似之处而受到连累）；用“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压制同路人；用信奉目的论的计划工作者压制遗传论学者；用“红色”专家压制“资产阶级”专家。[②] 然而，这场运动的目标和最终结果却是要完全扼杀多样性而强制推行正在形成之中的垄断性的正统思想。这里，也同在经济生活中一样，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基础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1929年下半年发生的所有这些激进做法中，没有一件是根据党的正式决议采取的。这些做法远远超过了中央委员会（它预定于11月10日至17日重新举行会议）4月会议的精神，是斯大林和他的两名主要副手，即当时已控制了莫斯科的党的执行机构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所倡议的。[③] 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那些胆小的党的干部来说，斯大林的文章具有法令的效力），他在这篇文章中走得更远了。他宣布了农业上

---

① 见本书第403页注②；阿勃拉莫夫：《论右倾反对派》第249页。

② 见约拉夫斯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4部分；谢拉·菲茨帕特里克：《总艺术的出现：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莫斯科，1928—1929》，见《苏联研究》（1971年10月）第236—253页；布朗：《无产阶级的插曲》。

③ 有些苏联历史学家现在讲到大规模集体化时强调指出这一点。见N·A·伊甫尼茨基：《论对全盘集体化初期阶段历史材料的批判分析（1929年秋--1930年春）》，见《历史档案》1962年第2期第193—198页；鲍格旦科：《全盘集体化前夕的集体农庄运动（1927年—1929年上半年）》，见《历史札记》第80期（1967年）第78—79页。伊甫尼茨基讲到掌权的斯大林一伙人时，说他们是“一个狭小的圈子”（196页）。另见莱文：《俄国农民》第15—17章。

的“大转变”和他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神话般的主旨。同党的法规（以及同当时的实际形势）相反，他断言说，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群众正在自觉自愿地放弃自己私有的土地而“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了”。① 这篇文章是要求立即、全盘实行集体化的动员令。

三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在这次关键性的十一月中央全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外界至今不很清楚。尽管与会者，甚至包括斯大林的支持者在内都感到严重不安，② 但是大会已经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有效地拒绝总书记的要求了。他要求大会批准他讲到的既成事实，即从政治上摧毁布哈林和转向大规模的集体化。11月 12 日，斯大林一伙接二连三地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进行威胁，要他们公开认错否则就可能被开除出党，这之后，这三个人向全会宣读了一份措辞谨慎但却决不让步的声明。这份声明在承认斯大林取得某些“成就”的同时，批评了他对农村所用的办法和这些办法对城市生活水平所造成的影响。这份声明立即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痛斥；11月 17 日，布哈林终于被开除出了政治局。③

虽然公开的诋毁运动已使布哈林不可能继续留在领导集团里，但是看来中央委员会对默认把他撵出政治局一事并不是很热情的。④（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报刊上受到的攻击要缓和些，他们暂时还保留着自己的职位）中央委员会会议虽然对斯大林关于大规模集体化的号召表示赞同，但是怀着忧虑，和有某些保留的。斯

---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17—119 页。

② 莱文：《俄国农民》第 460—461 页。

③ 瓦甘诺夫：《右倾》第 246—249 页；《布尔什维克》1930 年第 2 期第 7—26 页；《苏共决议集》第 2 卷第 662—663 页。

④ 苏联历史学家通常从档案材料中广泛引用秘密会议上对布哈林的尖锐攻击。除了斯大林和他的圈内人物以外，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全会上发起这种攻击。

大林的发言人莫洛托夫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目标，他要求在1930年夏天以前在主要地区完全实现集体化，但中央全会在速度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它模棱两可地表示"不同的地区现在都面临着大规模集体化的任务"。它仍然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秩序和节制，因此还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为集体化制定具体的指导方针。①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在政治方面有一件事没有使斯大林称心如愿，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件事就是：虽然中央委员会里剩下的支持布哈林的莫斯科人，士气低落，情绪沮丧，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公开承认了错误，② 但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却"非常顽固"地继续拒绝公开认错。③ 不过一个星期以后，即在11月25日，他们终于软下来了，签署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承认政治上有错误。这个声明于翌日发表，其中表示让步的那段话是这样讲的：

"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声明，在这场争论中，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证明是对的。而我们的观点……已经证明是错的。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同离开党的总路线的一切偏向，首先是右的偏向进行一场果断而明确的斗争……。"④

虽然这个声明远没有象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写成一份凄惨的自我否定的材料，但它还是意味着布哈林反对派在政治上的投降和它作为一个派别的毁灭。

---

① 莱文：《俄国农民》第458—465页；《苏共决议集》第2卷第620—632页，642—656页。莱文认为全会决议完全反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的路线；但是，莱文优秀的研究著作中却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持有的相反观点。其他的证据，包括后来成立的集体化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表明全会散会时，它的领导成员并不把1930年看作是官方确定的期限。

② 见科托夫、米哈伊洛夫、乌格拉诺夫和库里科夫的发言，《联共(布)党11月中央全会总结》(列宁格勒，1929年)第187—192页。

③ 同上书，第193页。

④ 《联共(布)党11月中央全会总结》第196页。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最后一个支持者、列宁格勒的费多尔·乌加罗夫在同一天投降。

布哈林为什么要在那份声明上签字(据说,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相比，他是更不愿意这样做的)，尚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①]不过,从以后几个月中他所采取的挑战性行动中可以看出,这既不意味着他真正改变了立场、也不意味着他失去了勇气。他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其中有一个因素看来是考虑到他那些年轻的"布哈林学派"信徒,尤其是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策伊特林、彼得罗夫斯基、扎伊策夫和爱恒瓦尔德等人的处境。他们顶住了被流放的威胁和其他巨大的压力,效仿布哈林的反抗精神,拒绝同布哈林脱离关系或放弃自己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现在他们面临着对他们采取包括逮捕在内的更坏的报复行动的威胁。布哈林的让步显然使他们可以暂时松快一下，至少可使他们自由发表类似的声明。[②]"党的爱国主义"也许是他的另一个考虑。不管怎么样，苏联当时正接近于发生一场重要而冒险的大变动，这样的大变动是不会不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的。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认为，他对党(也意味着"党的纪律")的责任是表现出团结一致和做出忏悔的姿态。

不管其动机如何，布哈林——另一条"总路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的投降，使总书记完成了爬向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的过程。官方是以开始推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来庆祝这件事的。12月21日,即斯大林五十岁生日那一天，报纸上登满了对他的令人作呕的颂词,说他是"列宁事业的最杰出的继承者和列宁最正统的

---

① 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55--156页。

② 布哈林向鲍里斯·Ⅰ·尼古拉也夫斯基表达了他对他们的关心,《权力和苏联的特权阶层》第19页。在10月和11月份的《真理报》上经常出现对青年布哈林分子的威胁性的攻击。例如,在柏林的爱恒瓦尔德被不择地同流亡分子联系在一起,并被开除出党。《真理报》1929年11月18日第3版和1929年11月20日第5版。可是，他们继续坚持"布哈林同志不是右倾分子而是一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真理报》1929年11月10日第5版。在布哈林屈服以后，他们中多数人后来都签署了同样的忏悔书。见《真理报》1929年11月25日第3版;1929年11月28日第3版;1929年12月3日第3版;1929年12月6日第4版。

门徒，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采取的一切主要措施的鼓舞者……世界公认的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揭露布哈林的“富农和反无产阶级”思想被说成是他的功绩之一。[①] 几年以后，这种个人迷信就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颂扬活动，把曾经归功于党及其集体领袖们的所有品质和成就都归到了斯大林一人身上。由于同样原因，布哈林在四十一岁的时候，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名领导人和“列宁的继承人”的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虽然还有一段重要的余生，但那也不过是余生而已。

温德尔·菲利普斯曾经这样说过：“革命不是人为的，而是自己降临的。”然而，象1929年12月在苏联发生的那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却是人为的。当时，反映干部胡作非为和农村混乱情况的报告象雪片一样飞来，但是斯大林无视这种情况，却向农村干部发出了连珠炮似的毫不妥协的指令，要他们加快集体化的步伐。这些指令的基本思想是：“凡是不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集体化委员会从12月8日开会开到12月22日，它的八个小组委员会建议规定一系列程序和时间表，以调节向集体化的过渡。然而，这些程序和时间表都被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因为他要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集体化。12月27日，他再次不经过党的批准就擅自宣布了杀气腾腾的最后通令：“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匆匆忙忙地发明出来的“富农代理人”这一概念的帮助下，“非富农化”这个口号批准了对全国一亿二千五百万农民的强制集体化和对任何进行抵制的人开展全力以赴的斗争。[②] 它是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丧钟，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

① 《斯大林：诞辰50周年论文集》第22、52页。另见12月21日《真理报》；K·波波夫：《党和领袖的作用》，见《党的建设》(1930年1月)第5—9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莱文：《俄国农民》第465—519页；M·A·维尔斯坦、N·A·伊甫尼茨基、Iu·A·鲍利亚科夫：《苏联集体化历史的几个问题》，《历史问题》1965年第3期第3—25页。

第 十 章

最后一名布尔什维克

某种巨大的、令人感到威胁的东西，它的阴影此时就开始笼罩大地。

——杰克·伦敦：《铁蹄》

我们都必须
遵循永恒的、铁的、伟大的法则，
完成我们生命循环的
历程。

——布哈林1932年引自歌德

要了解布哈林一生中最后八年的情况，必须先了解斯大林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性质和它所造成的全部影响。整个这场“革命”从1929年的强制性集体化运动开始算起，到1939年斯大林那场血腥清洗运动结束时为止，整整延续了十年。无论用哪种社会变动的标准来衡量，它都堪称是一次真正的社会大变动，它所激烈地改变的不仅是苏维埃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且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今天的苏联，连同其巨大的军事、工业力量，正是在三十年代的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斯大林主义这种新的政治现象也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

从1929到1936年，即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的“大转变”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是残酷的强迫命令、难忘的英雄主义、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和蔚然壮观的成就的大杂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没有几项是按时完成的；但它的实际成就，由第二个五年计划加以巩固和扩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较现实、也比较谨慎，第二个五年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仍为一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奠定了基础。到1937年，重工业生产比1928年时增加了两至五倍（视所用的不同指数而异）；其中，钢产量增加三倍，煤和水泥产量增加两倍以上，石油产量增加一倍以上，发电量增加六倍，机床产量增加十九倍。在旧工厂扩建和重建的同时，新城市、新工业部门、新发电站、新钢铁联合企业和新技术纷纷出现，其中有许多建立在原来不发达的地区。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学生总数从一千二百万增加到三千一百万以上。到1939年，五十岁以下的公民中已经消除了文盲现象。①

跃进到现代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是非常惊人的。对于积极热情的少数人——主要是党员，但也有普通群众——来说，这真是一个热情洋溢、拚命大干和自愿牺牲的时期。②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几百万遭受被放逐、被送进强制劳改营和死亡的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被镇压和悲惨的时期。把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压制私人工商业、集体化期间农业实际上的崩溃、和由于管理不善、长期损坏、过度使用和滥用设备以及劳动力缺乏训练等原因而造成的普遍的浪费现象，对苏联的生活造成了持久的破坏性影响。在受破坏较少的城市里，住房面积急剧减少，1932年肉、猪

---

①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6卷（莫斯科，1965年）第25—34页；诺夫：《经济历史》第8—9章。

② 莱昂斯：《乌托邦的任务》第196页；尤里·朱可夫：《三十年代的人们》（莫斯科，1966年）。

油和家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量只有1928年时的三分之一。工厂的工人失去了无须官方批准而调换工作的权利，还会因旷工而受到严厉惩罚。与此同时，实际工资在三十年代初期大概下降了一半。① 定量配给和排队成了正常现象；消费品和服务事业几乎完全消失。

在推行集体化运动的那四年内乱期间，农村受到的打击远比城市为重。虽则说凡是大革命几乎总是要以某个社会阶级作为牺牲品，但是苏联的这次大革命，其牺牲品却是两千五百万户农民！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点点土地、农具和牲畜而成为集体农庄的庄员。他们是被这个党—国家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这个国家除了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财政措施和行政措施以外，还利用农村干部、城市工作队和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来一遍又一遍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大规模地将他们逮捕、放逐、甚至对他们进行军事袭击。农民进行了反击，经常发生一些零星的激战，偶而也有群众起义，但他们主要还是采取毁坏庄稼和弄死牲畜等农村中传统的反抗方式。②

这场斗争的性质在1930年1、2月间就确定下来了。各地当局在斯大林的威胁性指示和清洗“右派分子”运动的驱使下，对不顺从的富农、中农和贫农一概实行了恐怖统治。到三月份，全国有半数的农户——一千万户以上——都被集体化了。然而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大破坏迫使斯大林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发出暂时停止运动的呼吁。文章埋怨地方干部采取了“过火行动”，说他们“胜利冲昏了头脑”。这篇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大批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使参

① 莫什柯夫：《粮食问题》第136页；诺夫：《经济历史》第209、249—251、260页。

② 关于集体化的历史，见莱文：《俄国农民》第482—519页；诺夫：《经济历史》第7章；芬索德：《斯摩棱斯克》第12章。

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从三月份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六下降到六月份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1] 但是，这个退却来得太晚了，已经不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1934年发表的数字表明，全国3,300万匹马的一半以上、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以及14,600万只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掉了，其中大多数是在1930年1、2月间，即一本官方历史书现在蔑视地称之为“骑兵的进军”期间死掉的。[2] 一个农村社会所能蒙受的灾难，很少会比这更大的了。二十五年以后，苏联所拥有的牲畜的数量仍然少于1928年。

后来在1930年，国家又恢复了攻势，这回比较谨慎，但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并不比过去少。到1933年，一场“异常规模的”镇压运动仍然横扫着全国的农村。[3] 到1931年，再次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户被集体化了；到1934年，集体化的农户已达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农户不久也都参加集体农庄了。最后挫败农民的抵抗，使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终于结束的，是官方在1932至1933年间故意造成的一场饥荒，这是俄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饥荒之一。1932年农业遇到歉收，可是国家却不向农村提供粮食。根据当时在苏联农村做过实地调查的人所写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在苏联农村，整座整座的村庄荒芜了，房屋烧毁了，牛车仍然驮着被放逐的人向北驶去，成群结队行乞的饥饿农民在颠沛流离，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尸体无人收拾；总之是一幅遭受彻底荒废和摧残的农

---

① 莱文：《俄国农民》第17章；M·L·鲍格登科：《1930年春天和夏天的集体农庄建设》，载于《历史札记》第76期（1965年）第31页。

② 诺夫：《经济历史》第186页；涅马科夫：《共产党》第257—259页；《乌克兰共产党历史纲要》第401页。

③ 据一份官方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引用于芬索德的《斯摩棱斯克》第185—186页。

村景象。① 至少有一千万农民（也可能更多）是直接由于集体化的结果而死去的，其中有一半死于1932至1933年间那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饥荒。②

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2,500万个私有农业单位已被25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这些集体农庄由国家控制，它们被迫从自己生产的产量已大大减少了的农产品中把很大一部分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给国家。强制性集体化是斯大林的经济革命的关键，也是他唯一的创新。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过任何与1929至1933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哪怕有一点相联系的主张。所有的人过去都认为集体化将是在工业化后期发展起来的，具有很高生产率的机械化的农业组织形式；谁也没有想到过它会是一个收购农产品的途径和实现猛打猛冲的工业化的原始手段③（如果要找一个精神上的先例的话，它可以从沙皇的传统中找到，斯大林自己对彼得大帝的赞美有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几乎任何一个别的农业纲领都会有更大的生产率和少得多的破坏性。但斯大林却吹嘘他所获得的一项成就：他的农业纲领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有自发倾向的农民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且使一种事实上的“军事封建剥削”成为可能。1933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了事实真相：虽然该年的粮食产量比1928年减少五百万吨，但国家的粮食收购量却增加了一倍。④

---

① 见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的铁的年代》（纽约，1935年）第82—88、367—396页；阿瑟·凯斯特勒：《瑜珈信徒和政委》（纽约，1965年）第128页；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25章；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94—96页。

② 估计数字小的略低于1,000万人，多的则要多许多，斯大林后来曾向温斯顿·邱吉尔讲了1,000万这个数字。见《命运的枢纽》（纽约，1950年）第498页。

③ 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238页。

④ 诺夫：《经济历史》第180，186页。把1926至1929年和1930至1939年间的所有农产品的产量和国家收购量作一比较，可看到同样的情景。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90—92页。

工业化和集体化中发生的最坏的极端做法到1934年结束；接着出现了两年相对松弛和经济改善的局面。与此同时，三十年代初期还带来了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其方向使人想起克留切夫斯基*在谈到沙皇历史时所说的一句名言：“国家肥了，人民却瘦了。”①在社会暴力和军事化的背景下，集权化的官僚行政机构扩大了，以适应管理日益扩大的国家经济、监督日益增加的劳改营犯人、控制公民的活动与迁移（身份证制度此时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和指导理论生活与文化生活等需要。这个党一国家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政策也开始完全改变了。当这种改变在三十年代末完成的时候，1917至1929年那种革命的实验主义、进步的立法工作和在教育、法律、家庭生活、收入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平均主义都已受到过正式的批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传统的独裁主义的标准所取代，这些标准预示了同斯大林掀起的这场革命自相矛盾的结果，导致了一个极端保守和等级分明的社会的建立。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成熟的斯大林主义的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对党的历史的窜改，包括官方复活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为沙皇历史恢复名誉并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重要观点。②

但尽管有这些发展，却还没有发生能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革命相比拟的政治上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它的主要的机构和传统——仍然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它那些主要人物（有许多虽然降了级但仍然留在负责岗位上）和基本上在斯大林主义出现以前

---

* 克留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历史。著有《俄国历史教程》、《俄罗斯农奴制的起源》、《俄罗斯等级制》等书。——译者注

① 引用塔克：《苏联政治思想》第124页。

② 关于这些发展，见尼古拉斯·蒂马谢夫：《伟大的倒退》（纽约，1946年）；罗伯特·丹尼尔斯：《三十年代的苏联思想：概貌综说》，载于《印第安那斯拉夫研究》，米哈伊·金斯伯格和约瑟夫·托马斯·萧编，第1卷（布卢明顿，1956年），第97—135页。

形成的上层圈子和一般干部仍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就这一点而言，斯大林在1936至1939年间开展的血腥清洗运动构成了他进行的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亦即政治阶段。由斯大林及其亲信指挥并通过秘密警察即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规模逮捕和枪决的三年大恐怖，使苏联社会陷入了野蛮状态 至少有七、八百万人被逮捕，其中大约有三百万人被枪决和被迫害致死。到1939年下半年，关押在监狱和偏远的集中营里的人数已达九百万之多(1928年是三万人，1933至1935年间是五百万人 。平均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受害者。各个方面的上层人士——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理论的和文化的——都有十分之一的人遭到了迫害。①

受打击最大的是党。1934年共有二百八十万正式和候补党员，其中至少有一百万人(既有反斯大林主义者，也有斯大林主义者)遭到逮捕，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枪决。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下到上都被摧毁了：许多地方整个地方、专区和共和国的党委都消失了；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都被枪决了；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有110名被枪决或被迫自杀。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以后，列宁的最高领导班子里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还继续活着。② 官方为这场恐怖所作的解释是，它的受害者是“人民的敌人”，是一场大规模的进行破坏、背叛和暗杀的反苏阴谋活动的

---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纽约，1968年对这场恐怖有清楚的叙述。他的统计数字当然是近似的，但也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数字。

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第8、13章；他的另一本书：《被修正了的大恐怖》，载于《评论》第73期(1971年)第92 93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6章。

参加者。这些罪名在1936、1937和1938年对老布尔什维克的三次装样子的审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罗织——其中最后一次，即对布哈林的那次审讯最为重要——，然而所有这些罪名统统都是虚构捏造出来的。①

斯大林的这场血腥清洗运动作为一场革命，其“彻底程度可以同俄国过去的任何一次变动相比拟，但比它们带有更多的伪装。”②布尔什维克党被摧毁了，建立了一个在成员和精神气质上都同过去不同的新党。清洗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934年举行）的代表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举行）上重新露面。党在1939年所拥有的正式党员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在1929年以后，也就是在斯大林时期入党的，1917年以前的党员只占百分之三。③到三十年代末，苏联在政治制度方面已不再存在党的专政或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政府了。在制度延续性的外表和官方装出的假象的背后，实际上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独裁者，把党降为实现他个人独裁的工具之一。1939年以后，党的审议机构，即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最后甚至连政治局都很少开会了。实际上，直到1953年这个独裁者去世时为止，党的权力始终没有警察的权力大，党的官方声望也不如国家的声望高。④

如果说斯大林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深远影响是清楚的，

---

①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已承认这一点。关于对布哈林的指控，见《全苏会议》第298页。

②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251页。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471页；《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1册（莫斯科，1970年）第7页。

④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见塔克：《苏联政治思想》第1章。有些苏联历史学家默认在1939年至1953年间苏联已不存在党领导的政府。见《苏共党史课讲课材料：讲题1—13》，P·P·安德烈耶夫编（莫斯科，1964年），第43—44页。

它的内部的政治历史就远非如此了。鉴于1929至1933年间出现的社会动乱和危机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政治生活现在几乎完全对外保密了。分歧和冲突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不让公众知道，表面上表现出热诚的团结一致。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主要人物的暴卒和苏联至今仍然对历史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对苏联三十年代的政治历史的了解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不全面的。许多重要的事件和问题仍然是模糊的。然而，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一度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看法，即认为1929年布哈林被击败以后，林大林的统治实际上没有受到过挑战。证据表明，到1933年，就在政治局内部，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温和派的那些人同斯大林分子之间，围绕政策问题，曾出现过一场不声不响的重大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只是靠斯大林在1936至1639年间掀起的清洗运动来决定的。①

这个温和派或者（用斯大林的轻蔑的叫法）“自由派”的纲领性思想是在1933年形成的，②但它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193 0年年初的那场农村灾难。实际上，斯大林自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在布哈林被撵出领导集团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开始出现裂缝了。出现裂缝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曾经帮助过他赢得多数和击败布哈林的那个经济纲领，在于他那些突然对苏维

---

① 关于这场秘密斗争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证据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莫斯科审讯的线索》（纽约，1937年）。关于这封信的来源和作者，见本书第550页注④。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利用这封信和其他材料写了一些文章，对这场斗争作了历史的分析，有二篇文章被收入他的《权力和苏联的权贵》一书。1953年后出版的苏联材料大部分肯定了并且大大扩展了这封信所讲的内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第1—2章和其他地方引用了这方面的许多材料，这是迄今能够得到的最详细的材料。

② 加里宁虽然明显地不是这个温和派的经常成员，但他也反对1936—1939年的清洗。当他对逮捕党的干部表示反对的时候，斯大林回答说：“米哈伊·伊凡诺维奇，你经常是个自由派……”见A·托尔马契夫：《加里宁》（莫斯科，1963年）第226—227页。

埃政权造成了自国内战争以来最严重威胁的想法。正是政治局里一部分感到震惊的人说服了或者说迫使斯大林在3月2日发出了暂停集体化的要求。有些政治局委员当时还反对他把这场灾祸的一切责任都推给地方干部的那种保全面子的做法。[①] 他们知道，"胜利冲昏头脑"和对农民发动疯狂袭击的正是斯大林及其在莫斯科的那班亲密同事而不是地方干部。

斯大林自己的政治局内所出现的这些早期的关系紧张的事例，尽管是有限的，却反映了全国各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高级干部中所存在的一种更大的不安情绪，几个月后发生的西尔佐夫—洛米纳泽事件便是证明。谢尔盖·西尔佐夫是俄罗斯共和国总理并且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米纳泽是中央委员，当时是重要的外高加索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虽然曾经狂热地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却对斯大林的新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感到大为震惊。1930 年年中，他们在莫斯科秘密地就"灾难性的局势"进行了讨论，并开始分头散发备忘录和在官方机构中进行游说，要求改变政策，包括停止强制性集体化和削减对工业的投资。他们的建议和对斯大林的路线的批评同布哈林在1928至1929年间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尔佐夫批评斯大林的新方针造成了"异常集权化"和"官僚主义猖獗"的后果，说那些浮夸的工业计划是"吹牛"和"波将金村庄"；洛米纳泽则模仿布哈林的调子，谴责政府"对工农的需要

---

① 《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纲要》第二部分（第比里斯，1963年）第105页。乌克兰党的领导人科西奥就是一个提出过反对意见的人。《苏联简史》第二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第251—252页。加里宁和奥尔忠尼启泽曾批评斯大林的喉舌《真理报》煽动过火行为。《全苏会议》第299—300页。关于斯大林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和责备地方干部的文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7—174页。关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86—187页。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继续把全部责任推给地方干部。见K·伏罗希洛夫：《在历史性的转折点上》（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85页。

和利益采取了封建贵族般的态度”。① 这两个人轻而易举地就被斯大林镇压下去了，两人都被谴责为“向右倾机会主义投降”的“两面派”，并在12月被撤消了职务。但人们不能因此就看不到他们这场命运不佳的抗议所包含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抗议表明，在斯大林许多原先的(上面和下面的支持者中间，广泛存在着幻想破灭的情绪和信任危机。②

然而，清除了斯大林的主要政敌的政治局，是同斯大林站在一起的，因此防止了方针和领导权方面的任何变化。在以后整整三年的社会浩劫中，政治局的成员一直支持斯大林恢复强制性集体化和继续对持不同政见的和“消极的”党员进行(仍然是冷酷无情的)报复。他们所以这样做，除了因为他们曾参与使他爬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参与制订他那些政策以外，看来至少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一心要搞工业化运动；第二，他们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要从全面集体化退回来都已为时过晚；第三，当真正的国内战争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时，他们对在最高一级爆发公开冲突的后果感到害怕，更不要说改变领导班子了。③

因此，在公开场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赞扬斯大林，捍卫“总路线”，并且都投入了对已经被击败了的反对派分子，首先是布哈林的旷日持久的批判，这种批判已经成了斯大林政治中的一种固定

---

① 益辛斯基：《反右倾斗争》第272—288页；《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1期，第22—47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42页。

② 看来很清楚，洛米纳泽代表大多数外高加索的党书记讲话，西尔佐夫则代表在中央的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讲话，他们两人还受到一些共青团领导人的支持。见《真理报》1930年12月2日第6版。到1932年，“党的圈子里占优势的看法是认为斯大林把国家引向绝境”，《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12页。也很清楚，斯大林指责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阴谋“集团”，这是不真实的。

③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52—153页。关于对威胁政权生存问题的感觉，见本书第571页注②。

的观念。然而，在私下，有几名政治局委员却试图使他的政策变得温和些，并对他那日益独断专行的做法加以约束。例如，奥尔忠尼启泽就反对对老的有技术的知识分子采取恐怖手段（这种恐怖手段导致了1930至1931年间对非布尔什维克的"破坏分子"所进行的两次装样子的审讯），保护了那些他能够保护的人。作为重工业人民委员，他——还有其他领导人——开始强烈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采取更"现实主义"的和更有节制的态度，并且在1933年终于达到了目的。① 最重要的是，他以及其他两名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和古比雪夫已经开始保护各方面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使他们免遭斯大林的狂怒的惩罚行动之害。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秋天在斯大林自己的政治局内部，开始清楚地呈现出对斯大林接连不断地进行抵制的某些迹象。

早在1932年就被罢掉了莫斯科党组织书记职务的米哈伊尔·柳京曾伙同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和彼得罗夫斯基等几名比较年轻的布哈林分子，秘密起草并散发了一份长达二百页的反斯大林宣言。这份文件以布哈林分子的口吻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称斯大林是"俄国革命的恶魔，在复仇心和权力欲的驱使下把革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③ 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断言这是要谋杀他的一份号召书。他违反布尔什维克一贯反对在党内争论中求助于死刑的老传统，竟要求把柳京（可能还有柳京的一些同伙）处死。此案首先交给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该机构由于根据申诉恢复了许多自1930年以来被开除出党的人的党籍，已

---

①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38页；哈温，《掌握工业的方向盘》第101、112—115页；《新世界》1967年第1期第40、66页。

② 见《真理报》1964年11月17日第4版上所讲的阿马亚克·纳札雷祥的问题。

③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13页。

经得罪了斯大林。[1]它推掉了这个案子，把它转给十人政治局。斯大林又向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但由于政治局里多数人（包括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可能也包括科西奥和加里宁）的反对而没有得逞。结果，柳京及其一伙所受的处分只是被开除出党和被驱逐出莫斯科。[2]

"柳京事件"是苏联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斯大林的失败再次肯定了禁止枪毙党员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政治局中的温和派现在决心抵制斯大林在党内或者在党之上攫取更大的和更加专断的权力。到1933年，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基洛夫（他是一个有主见和受欢迎的人物）和奥尔忠尼启泽带头，并在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支持或同情下，他们还开始积极宣传与斯大林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忠实拥护者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所主张的政策不同的政策。与此同时，柳京事件也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摆脱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其上层领导人及其政治传统所代表的一切羁绊，这一点后来就清楚了。[3]

政治局中的这个温和派，尽管它是暗地存在的，但它的性质却是相当清楚的。这派人（其代表人物是基洛夫）在继承人问题的斗争中是追随斯大林的，他们也是有力地执行斯大林的"总路线"的。由于这批政治寡头的共同支持，斯大林得以在1929年击败布哈林

---

① 保尔·科克斯：《党进行控制的政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8年）第173—174、493—494、517—523页。

②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28—2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42—143页。他们也许还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支持，其中包括格利戈里·彼得罗夫斯基。他的儿子彼德尔同柳京事件有牵连。《真理报》1932年10月11日第5版。

③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在一份事实上宣告大清洗开始的秘密指示中，追溯到了柳京事件。他宣称秘密警察在"揭露敌人"方面"落后了四年"。见赫鲁晓夫：《斯大林时代的罪行》（纽约，1962年）第23页。

并渡过三十年代初期的危机。他们现在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们既不想撤消他的职务，也不想削弱他作为领袖的突出地位或减少对他的正式捧场（虽然有些同情他们的人是这么做的，那些人在 1934 年 1 月投票反对把他重新选进中央委员会）。①更正确地说，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第一，维护由政治局和在较小的程度上由中央委员会集体地（或者说由少数寡头）决定政策的列宁主义做法，取消斯大林在搞集体化的头几个月里用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所实行的独裁统治。第二，他们认为，工业跃进和大规模集体化的任务已经大部完成，而且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因此建议对政策作出总的改变，并且争取斯大林支持这种改变。他们要求采取一种新的方针，这种方针是以结束官方实行的恐怖和国内冲突、缓和各方面关系以及同人民群众和从前的党内反对派分子实行和解为基础的。他们的和解政策也同国际形势有关，特别是因为1933年 1 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所造成的新的危险局面，当时有必要把人民都团结在一起。②

如果说斯大林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复活了俄国的行政管辖的传统，那么，政治局中的温和派则复活了另一种传统，即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传统。温和派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后来发生的变化中看出来。到1933年年中，农村中"放肆逮捕"和放逐的做法停止了，国家开始对集体化的农民作出让步，包括在集体化的框框内

---

①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35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55—156页；L·肖梅因：《对一个人的迷信》，载于《苏联哲学研究》（1966年夏）第32页。根据麦德维杰夫的说法，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270名投票反对斯大林，只有3名投票反对基洛夫。不知道究竟谁投了反对斯大林的票，但乌克兰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大概就是一个。见F·贝加和V·亚历山德罗夫：《彼得罗夫斯基》（莫斯科，1963年）第303页；本书第528页注①。

②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69—97页。

承认小片自留地的合法性和在农产品的交售价格和数量方面减轻对农民的剥夺制度。1934年，随着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对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消费品生产给予了更多的重视，食品分配制度取消了。虐待非党知识分子和从前的党内反对派分子的事例减少了，后者中间的许多人——最有象征性的是布哈林——还被任命担任一些显要的(虽然仍然是次要的)职务。官方声明的调子和内容较比调和，不象过去那么好斗了。官方还允诺要制止警察的过火行动和进行规章制度的改革。到1934年，已有了很大改变的气氛使人感觉到一个“苏联之春”已经到来。①

在1934年1、2月间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可看出温和派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和受到的欢迎。虽然在形式上这次大会是庆祝斯大林的政策的胜利和他的英明领导的大会（这是所有发言者，包括批评斯大林的人在内的发言主题），但是会上却反映出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党内的新气氛。跟斯大林不同，温和派的发言带有明白无误的调和精神；而且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基洛夫受到了仅次于斯大林(有些人说是同斯大林相等)的“极其热烈的欢迎”。② 一些已经被斯大林击败了的政敌，主要是布哈林，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受到了有礼貌的接待，甚至受到了赞许。③ 此外，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例行会议上，基洛夫除了他已经担任的列宁格勒的职务和在政治局和组织局中担任的工作以外，还被选为书记处——它从前是斯大林的堡垒——的正式成员。中央委员会把他选进书记处，显然是为了阻止斯大林独断专

---

① 芬索德：《斯摩棱斯克》第185—186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90—91、95—96页；《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54页。

②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21—22页；《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8—36、251—259页。

③ 根据出版的速记记录，布哈林受到了“鼓掌”欢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9页。根据《真理报》，1934年1月31日第2版，他受到了“经久不息的鼓掌”欢迎。

行地利用这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机构及其分布很广的代理人网。①

斯大林对他自己的领导班子中正在出现的这个改革派所采取的对策，后来使布哈林气愤地把他称为"天才的(政治)药剂师"。②他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即同国内、现在甚至同自己党内的敌人进行的战斗——正在变得更加尖锐化，这个观点是很明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反对"温和派的政策，"只是对其实际后果加以限制"。③而与此同时，他却通过他个人的内阁(即书记处)、各种干部部门和警察机关，建立"一台处于官方政治机关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真正的专制统治机器"。为了操纵这台机器和补充他身边的那些忠实的老卫队，他正在提拔一代新的个人追随者，象尼科拉伊·叶若夫、亚历山大·波斯克列比谢夫、安德烈·维辛斯基、安德烈·日丹诺夫、M·F·什基里亚托夫、拉甫伦季·贝利亚、格里戈里·马林科夫、尼科拉伊·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一些人。④有些人始终是幕后的实干家；另一些人则终于成了他的政治继承人。

于是，正当政治局的温和派争取党内同意进行改革，竭力"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争取他的灵魂"的时候，⑤斯大林自己却在进行着另一种准备。在温和派的政策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

---

① 甚至有可能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失去了总书记的头衔。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92页。

② 《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35页。

③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21页。关于斯大林提到内部敌人的威胁的讲话，见他1933年1月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和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纽约，1933年)第54—56、76—78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9—311页。

④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38—4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56页。

⑤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35页。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他列宁格勒办公室的走廊里被刺客暗杀了。这次谋杀是斯大林通过警察机关的代理人策划的，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多大怀疑了。[①] 斯大林的这个做法一举两得：不仅除掉了他的主要政敌，而且还为进行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恐怖制造了借口。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官方为基洛夫举行的哀悼活动中，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并被指控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罪恶阴谋，被逮捕的人中有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一批原党内反对派分子。第一阵恐怖的风浪不久就过去了；但在以后几年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参与杀害基洛夫的阴谋活动的帮凶而遭枪杀。1937年那场大清洗的一名受害者因此说道："1937年这一年实际上是从1934年12月1日那天开始的。"[②]

在以后的两年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温和派继续想方设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且胆颤心惊地抵制那场日益逼近的恐怖。他们在1935至1936年间所获得的暂时成功，使人对优柔寡断、估计错误和依靠说服的改革派同一心想搞恐怖并且控制着恐怖手段的"天才药剂师"之间进行的那场力量悬殊的斗争容易产生错觉。而实际上，那些著名的温和派和他们的同情者一个一个地都从政治上消失了。阿贝尔·艾努基泽成了斯大林在1935年1月搞的一个阴谋的牺牲品；古比雪夫在同一个月内神秘地死去了；有影响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36年6月也许是被谋害而死的；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自杀或被谋杀了。[③] 当这场斗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它变成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一场最后对抗。[④] 1936年冬天，温和派试图挽救布哈林(双方都把布哈林看

---

①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2章；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5章。

② 叶甫根尼亚·金斯伯格：《卷入旋流》(伦敦，1967年)第11页。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2章；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5章。

④ 正如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所起的象征性作用及其在1935年5月被解散所表明的。

作是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象征和代表者）。这是他们为抵制那场恐怖而孤注一掷地采取的最后一着。随着温和派的失败和1937年2月布哈林的被捕，斯大林对党的进攻毫不含糊地开始了。

正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布哈林作为一个主要角色、一个象征性人物和受害者，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八年。如同这个阶段总的政治历史一样，布哈林在1930至1938年间的思想和行动的一些重要方面至今仍然是不清楚的，只有当苏联的档案对外开放时，这些情况才会昭然若揭。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对三十年代的布哈林是不能象对二十年代的布哈林那样详尽地和满有把握地加以描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纠正那种认为他在1929年以后只不过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仆从的印象。实际上，他在三十年代的生涯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内部那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斗争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在1930至1933年的社会动乱期间，布哈林继续是官方辱骂的对象，他被贬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岗位上，对国家事务已没有什么发言权。1934至1936年，即在那段松弛与和解的暂短时间里，他在官场中重新获得一个有名望的（但不是有权力的）职务，并且成为温和派政策的一个重要发言人和象征。在温和派遭到失败后，他成了1938年3月那次著名的莫斯科审讯中的主要被告人。

1930至1938年间，布哈林所起的每一种不同的作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情况，这就是，即使处于失败的情况下，他仍然是党内一位拥有"巨大权威"的重要人物。① 有时人们以为，对于布尔什

① 阿布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171页。G·A·托卡耶夫：《X同志》（伦敦，1956年）第62页。对外国共产党员来说，情况也是这样。H·M·维克斯：《对十月的月蚀》（芝加哥，1957年）第261页。

维克来说，托洛茨基是三十年代反斯大林分子的最主要的代表。但实际上，尽管托洛茨基在国外流亡期间对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进行了有力抨击并且在国外拥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但是他和他的思想在党内已不再有什么重要的政治影响。而布哈林和布哈林所代表的一切，由于好几个原因，则在党内是有重要的政治影响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跟托洛茨基（或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另一个政敌季诺维也夫）不同，布哈林在党内一直享有巨大的个人声望，他所受到的爱戴也许由于他的失败而有所减少，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① 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理论继续产生着影响。在那场反布哈林的运动开展了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分子仍然埋怨说："布哈林主义的理论还活着。在理论战线上，布哈林主义的新芽和表现形式忽儿在这里，忽而在那里显露出来……。"②

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充分证明了布哈林提出的关于内战、农业灾难和工业比例长期失调等警告是有道理的，因而使布哈林主义的政策重新获得了广泛的号召力。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右派反对派是最危险的——要更猛烈地向右派开火！"③ 这也说明了在1930年6、7月份举行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为什么会出现下面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大会的主要内容竟是齐声对党内重新出现的布哈林主义情绪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强烈谴责。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党内的每一种反对派潮流从经济观点

---

① 布哈林即使在1929—1933年间遭受诽谤时，攻击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过去的"功劳"和名望。可见《党的建设》1929年第2期，第9—10页；《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34卷（1929年），第20页；《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420、515页。

②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488、441页；《讲授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和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莫斯科，1930年）第71页。另见本书第506页注③。

③ 《真理报》1930年5月27日第1版；《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44—245页。

上来看都是布哈林主义的，包括匿名的小册子和零星的抗议、1930年的西尔佐夫—洛米纳泽事件、1932年的柳京集团和1932至1933年间以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小反对派等。①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一名斯大林主义的发言人忧心忡忡地引用了外省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说的话来说明各地党组织的思想情况。他引用的话是："斯大林的政策正在导致毁灭和苦难。……而布哈林、李可夫和乌格拉诺夫提出的建议则是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的建议；只有他们……能够把党领出死胡同……。"②甚至曾经是斯大林主义的堡垒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其大多数成员据说也转到"布哈林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使他们相信："布哈林是对的，而斯大林正在毁灭国家。"③

上述情况虽然没有使布哈林恢复权力，却使他获得了党内非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形象，这种形象甚至在1933年以后，即在危机已经过去、人们对斯大林的信心已经增加以后仍然保持着。④这个背景有助于解释：斯大林分子为什么会在三十年代初期如此猛烈地攻击布哈林，布哈林又何以会在温和派的"调和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斯大林为什么终于给布哈林扣上了一大堆罪名。它也有助于解释布哈林自

---

① 萱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177、247—249页。关于斯米尔诺夫那批人，见《苏共决议集》第3卷第199页。对1930年5、6月份《真理报》攻击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的内容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些攻击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指向各种形式的"右的错误"的。《反对派通讯》1930年第14期第5—6页。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即使是在经济方面的左派反对派，实质上已变成"右派"了。《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0页。

②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324页，第207、248页。关于对1930至1933年间广泛存在的右倾情绪的承认，见《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21期第46页；《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129页，这种情绪在莫斯科特别强烈。《真理报》1930年5月26、29和31日。另见《社会主义通讯》1930年6月14日第15页；《反对派通讯》1933年第34期第32页。

③ 《反对派通讯》1930年第19期第18页。

④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15页。

己为什么要采取含糊的做法，尤其是他为什么要决心作为一种变革的力量留在党内。

用通常的政治标准来衡量，1930年初期的集体化运动造成的灾难应当会使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倒台和使布哈林分子重新上台。① 然而，由于党内政治寡头们——无论是多么勉强地——同斯大林站在一边，对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诽谤和迫害竟然同危机局面的恶化成正比地加剧了。不过，布哈林还是设法利用两个场合把自己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的意见告诉了全党。1930年2月19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用含蓄的语言（这是他唯一的办法）隐晦地嘲笑了官方关于集体化的荒诞说法，似乎集体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新经济政策的继续，而且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他写道，实际上，集体化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强制结束，是"通过非常措施和迅速发展的粮食危机……来实现的。"他补充说，集体化的"高昂代价"是由于国家采用了"最苛刻的超经济压制手段"而造成的。②

1930年3月7日，即斯大林对地方干部进行突然指责（指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译者注）以后的第五天，布哈林指出了谁应对农村这场大破坏负真正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实际上是对斯大林进行了反驳。他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抨击文章中（这篇文章表面上针对不久前教皇发出的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通谕），巧妙地、但却明白无误地把罗耀拉耶稣会所提倡的"死尸般的"顺从、"思想上出卖自己和毫无原则的阿谀奉承"等原则同斯大林主义作类比并且证明这种类比是站得住脚的。文章接

---

① 这个看法是T·札穆耶里提出的，见《在苏共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间对反对派的消灭》，载于《苏联研究》(1966年1月)第321页。

② 《伟大的建设》，载于《真理报》1930年2月19日第2—4版。布哈林的评论立刻遭到了攻击。见《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7—8期，第153—157页。

着从一位“人文学者”写的一本抨击教皇统治的历史书中引用了一段话来谴责斯大林的集体化，他引用的那段话是：

“如果他们（按指教皇）屠杀生灵，他们有什么权利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呢？他们同耶稣基督的代表的称号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耶稣基督曾对彼得说：‘把我的羊群喂饱。’可是教皇是怎么做的呢？难道他们不是在驱使被教会掠夺得穷困不堪的教徒们去挨饿吗？难道他们不是在不停地剪羊身上的毛而且在剪的同时还割羊身上的肉吗？”①

换句话说，斯大林对农民的“掠夺”跟列宁的遗嘱或布尔什维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罪该万死的指责使布哈林失去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权利。只是在三年以后，他才重新获准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政治题材的文章。于是，他改变了抗议的形式，采取了被官方诋毁为“布哈林的沉默阴谋”的做法。由于集体化危机的结果，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在1929年11月签名的那份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的声明很快就被认为不能令人满意了。斯大林现在要求布哈林彻底放弃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彻底收回他所提出的一切指责，并同他在国内外的追随者们一刀两断。② 布哈林拒绝了，而且在1930年年初可能还曾以自杀的威胁与之相对抗。③被动员起来吵吵嚷嚷地要求布哈林公开承认错误的报刊同以蔑视

---

① 布哈林：《探讨》第341—345页。《教皇长袍下的金融资本》一文最早出现在《真理报》1930年3月7日第2—4版。布哈林所作的耶稣基督和斯大林的类比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也包括一个泄露真情的线索，即含糊地提到了斯大林的“衰弱的”手臂。《探讨》第338页。贝特拉姆·沃尔夫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的学者。《三个人进行了一场革命》第36—37页。

② 盖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253页。

③ 见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24页；《反对派通讯》1931年第19期第18页。

的态度保持沉默的布哈林进行着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这场斗争贯穿于1930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场斗争也构成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在那次大会上，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地强烈要求这位“伟大的沉默者”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那样在会上表示忏悔，而布哈林却对代表大会进行了抵制，尽管代表大会自相矛盾地又把他重新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一名斯大林分子生气地说，他保持了九个月的沉默，这对于赞同他的观点的其他人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①

1930年11月19日，经过长期“谈判”之后，布哈林终于在另一份措辞模棱两可的声明上签了字。② 他再次含含糊糊地承认了“我的错误”，否认有“对党的领导集团进行秘密斗争的任何企图”，并且号召大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他所作的主要让步是批判了一切“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但他并没有象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明确地声明放弃他自己的政策和他在1928至1929年间对斯大林提出的指责。实际上，他断然拒绝收回他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仍然蔑视斯大林提出的共产国际路线。他也没有屈从于对总书记歌功颂德的习俗，甚至连提都没提到他，他的讲话使人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话都是向“党中央委员会”讲的，而不是向斯大林讲的。发表这样一个被勉强地作为“最低限度”的和解声明而予接受的文件，对于改善布哈林同斯大林一伙的关系没有起什么作用。在翌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莫洛托夫提

---

①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246、367页和其他地方。传说在代表大会期间布哈林病了；但是正如斯大林分子所指出的，这并不会阻碍他发表书面声明。

② 《布哈林在联共(布)党中央的声明》，见《真理报》1930年11月20日第5版。这些谈判的性质可从莫洛托夫的评论(《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3期第17－22页)和卡冈诺维奇的文章(《真理报》1930年12月30日第4版)中加以推测；另见瓤辛斯基，《反倾向斗争》第302—306页。

出那份声明还没有把错误讲够时，布哈林轻蔑地回答说："你手里有权；你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①

但是在1930年那种政治背景下，布哈林所作的又一次哪怕是有名无实的悔过表示也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它会使他的支持者们士气低落，而对斯大林却十分有用。② 布哈林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表示，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表示，这个问题同样也只能从一些支离破碎的证据中进行推测。他仍然为他那些年轻的信徒的命运担心，但在当时，起最主要作用的看来还是其他的一些考虑。到11月份，西尔佐夫—洛米纳泽事件已经完全表明党内那些寡头们是不会抛弃斯大林的，因此，要在党内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反抗是毫无希望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③ 在布哈林无法公开地向全党和向全国发表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斯大林采取某种形式的默认，要么进行徒劳无益的抵抗（即"秘密斗争"）。这后一种选择意味着冒被开除出党和以后不能在党内发挥任何作用的风险④。

布哈林在他余下的几年里一再面临与上述情况密切相关但比上述情况更加棘手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他对斯大林那些野蛮政策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这是明确的：他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可怜"被围攻的农民，他认为那些花钱多、浪费大的工业项目是些"贪吃的巨兽，它们吞噬一切，夺走了广大群众的消费品……。"⑤ 但与

① 《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3期第18页。

② 例如柳京集团在这方面曾批评过布哈林。见《反对派通讯》1932年第31期第23页；《反苏集团案》第163页。

③ 政治局中未来的温和派在指责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时是很积极的。见基洛夫的发言，《真理报》1930年12月2日第6版。

④ 这时报纸威胁要开除布哈林。《真理报》1930年11月4日第3版。报纸上把布哈林的观点同1930年受审判的一些专家的观点联系起来，这同样是不祥之兆。见《真理报》1930年10月9日和10日第5版；《宣传员》1930年第3—4期，第1—9页。

⑤ 见布哈林的讲话，载于《反苏集团案》第381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8页。

此同时，他并没有失去对革命和对党的信念，因此他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同这个制度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此外，斯大林所追求的目标——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技术进步、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等——无论多么残酷、多么浪费，总还是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如果说上面这种情况使布哈林在自己的最后几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带有某些悲剧色彩的话，它同时还使这场斗争经常显得很不得力、极为可悲。正如布哈林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令人讨厌的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同布尔什维克追求的共同目标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两重性”。这种“双重心理”由于农村的形势而进一步加深了，因为在集体化的那几年，农村的形势不仅危及斯大林的政策，而且危及布尔什维克政府本身。如果说斯大林的领导已经证实了布哈林的最坏的担心的话，那么，他的领导所产生的后果还使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们实际上一下子就无法继续他们所主张的唤起农民的立场。因为，农民的抵制威胁着苏维埃制度，而且布哈林现在担心，农民已如此忿怒，甚至连布哈林的温和政策也不再能接受了。①

鉴于布哈林所处的这种特殊处境，他对党和对革命的忠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他显然感到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过了不久，他显然是联系自己的情况，引用了恩格斯论述歌德曾面临过的进退两难境地的那段话：“他必然蔑视自己所生存的那个环境，但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同它连结在一

---

① 《反苏集团案》第380、776页；《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4—125页；约瑟夫·帕格：《除了真理别无一切》（纽约，1971年）第99页。一个苏联历史家得出结论认为1929—1933年的斯大林政策造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存在的威胁”。见《集体化历史纲要》第45页。

起……。"[1]由于在1930年的那份和解声明上签了字，布哈林便在公开抵制和竭力颂扬斯大林的领导、卑躬屈节地公开认错(在当时这些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标准做法)之间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2]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继续保持这种姿态：在偶然发表公开讲话之前总要敷衍性地加上几句肯定"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样一类话；自己避免而且也劝告别人不要采取有组织的反对行动；提醒他以前曾经保护过的那些人(例如非党专家)说，他已经不能再保护他们了，并且说他们现在也必须在"两个阵营"之间进行选择。[3]

布哈林采取的这种政治姿态并没有使官方停止对他和他的政策的恶骂；反布哈林主义现在已经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意识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但是，布哈林的这种态度，的确使他得以在1930至1933年的整个动乱期间在他所担任的研究部主任这个次要岗位上有力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个研究部先是归最高经济委员会领导，1932年最高经济委员会取消之后又划归新建立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领导)。这个职务使他能够在科学院发挥领导作用，并使他有机会在1931年年中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他在大会上的露面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引起了企图利用他的露面来打击工党政府的保守党报纸的反感)。还使他能有机会发表了许多论述文化和科学问题的文

① 《探讨》第151页。

② 见布哈林在联共（布）党中央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上的回顾性讲话，《真理报》1933年1月14日第3版。

③ 关于布哈林的公开表现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拒绝参加那些过分颂扬斯大林，把他说成是领袖和国家成就的设计师的仪式。确实，他在1930—1931年很少提到斯大林，相反他却常提到"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当他要讲到斯大林的作用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有节制的提法："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见《探讨》第304页和《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32年)第76、80页。关于他向专家们提出的警告，见《探讨》第242、290页；关于对这篇讲话的不同解释，见格拉汉，《苏联科学院》第186—187页。

章，创办并且同别人共同主编了一份关于文化和科学问题的刊物。由于他所起的这些作用，他成了苏联科学界一位非官方的、然而却是著名的发言人，在并不总是欣赏他的官方和在外国访问者面前成了苏联科学界的代表。① 尽管他继续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他的上述活动同他过去的生涯相比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同失去了权力的其他在野人士一样，被迫过的赋闲生活，使他重新捡起了由于投身政治活动而牺牲了的个人爱好，即绘画和早在侨居国外期间就已开始了的对马克思对现代思想影响的研究。②

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布哈林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这本来是件平凡琐事，但这件事后来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二十年代初或二十年代中同他第一个妻子娜杰日达·鲁金娜离了婚，然后同艾斯菲尔·古尔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古尔维奇也是党员并且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她给布哈林生了一个女儿，叫斯维特拉娜。他同古尔维奇的关系到三十年代初就结束了。在1932或1933年，即在他四十五岁那一年，布哈林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

① 他是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所长。《全苏文化联络协会》第5卷(1933年)第18页。格拉汉的《苏联科学院》一书中讨论了布哈林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关于伦敦代表大会和布哈林的访问，见他的报告，载于《十字路口的科学》(伦敦，1931年）第1—23页；和他的文章《苏联的科学和政治》，刊登于《新政治家和国家》1931年7月11日第37—38页。另见J·G·克劳瑟在《从事科学五十年》(伦敦，1970年)第76—80页上的叙述；《十字路口的科学》(第2版，1971年)第11—29页；《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31年第8—9期，第93—100页；柯林·霍尔姆斯：《布哈林在英国》，载于《苏联研究》(1972年7月）第86—90页。关于他在苏联接待外国科学家的情况，见克劳瑟：《从事科学五十年》第86页；朱利安·赫克斯利：《在苏联人中的一个科学家》(纽约，1932年)第64页。关于布哈林写的一些论文，见《草稿》。他主编的杂志《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于1931年开始出版。后来这本杂志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真理报》1937年2月8日第3页。

② 他有两幅画曾于1931年展出。亚历山大·威斯伯格：《被指控的人》(纽约，1951年)第185页。他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的一个部分《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于1933年发表。

拉琳娜结了婚。拉琳娜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一个年轻、罕见的美貌姑娘”。他们在1934年生了一个儿子，叫尤里。据说布哈林极其疼爱他这个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他关心她们母子的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937至1938年间的行动。①

因此，从政治上来说，布哈林在1930至1933年间所起的作用是从十月革命以来最小的。然而，由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即使是他的一些不重要的活动也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例如，虽然他处在一个越来越丧失和蔑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中，但在他的论文化、哲学和科学以及论歌德、海涅、达尔文、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和布留索夫的文章中，他却保持着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② 他在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而写的论“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的长篇文章，也许是他在斯大林的俄国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除其他观点以外，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的论点—— “国家权力的基本职能是保证剥削的过程”。这个提示同三十年代官方主张的国家主义是不合拍的，因此立即遭到了指责。③

然而，布哈林写得最多的主题是科学及其在苏联的发展。三十年代初期，作为工业研究的一个领导人，他大大增加了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设备的数量，并撰写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的文章。从两个方面来说，这些文章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苏联在三十年代初期第一次象别的国家一样，在制订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

---

① 综合了以下材料：奥尔洛夫：《斯大林的罪行》第280页；勒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第279—280、388—389页；阿利卢也娃：《二十封信》第30页；《雅基尔回忆录》，载于《俄罗斯思想》1971年10月28日；《播种》(1969年6月)第59页。

② 见《探讨》和布哈林的《对苏联绘画的几点想法》，载于《消息报》1933年7月11日第3版。

③ 《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第79页；E·V·巴舒坎尼斯对之进行的攻击，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33年第5期第40—56页。

作了努力，其重要意义现在已为人们所承认。在这项开拓性的事业中，布哈林起了主要的作用。据一位西方的科学史工作者称，他的关于制订科学计划的方法与理论的著作和演讲，是真正重要的著作和演讲，"甚至现在，对于负责科学工作的行政官员，包括民主国家的负责科学工作的行政官员来说，读起来都是十分中肯的。"①

其次，布哈林通过发表这些关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文章，找到了一条从政治上来说比较安全的途径，以继续抗议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捍卫他自己那些现在已经被搞臭了的观点。他采取了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他在1929至1933年间一再坚持说，技术革命应该是真正的工业化的基础，因此"科学研究网必须发展得甚至比社会主义重工业的一些主导部门还要快"。② 这个主张立即触及到斯大林提出的把重工业放在首位的原则，抵制了他的一切都要"大"的思想，并且为未被引起重视的工业发展的"质量指标"进行了辩护。布哈林的另一个批判性的做法是为科学制订"切合实际的"计划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说明，这实际上就是把他关于制订经济计划的总的想法加以具体应用。比方说，科学研究计划应该把集中统一的指导方针同分权化的自治原则结合在一起，以避免"官僚主义的歪曲现象"的发生；它应该建立在"灵活性和顺应

① 格拉汉：《苏联的科学院》第45、56—67页；他的文章《布哈林和科学的计划工作》，见《俄国评论》(1964年4月)第135—148页。可特别见布哈林的一些报告，《探讨》第236—305页；《技术改装和目前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载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1933年第1期第5—35页。

② 《探讨》第276页。他经常论证必须进行一次"技术革命"。见《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第3版；《真理报》1930年2月19日第2—4版；《计划经济中的技术和经济》，载于《争取工业化》1930年3月20日第2—4页；《探讨》第9—34、64—107、211—305页；《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第76—80页；《世界危机，苏联和技术》，载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1933年第1期第5—35页；《改变管理工作和工业的科技服务问题》，载于《真理报》1933年8月4日第2—3页。

性"的基础之上，要估计到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对完成计划的时间要留有"余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布哈林的这些意见以及同这些意见一起提出的对"愚蠢的、官僚主义的和粗劣的计划工作方法"的批评表明，他是在继续反对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斯大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①

实际上，布哈林同领导集团内部正在出现的那个温和派的关系大概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政治局中有影响的温和派奥尔忠尼启泽（此人对被击败的反对派分子经常以朋友相待）于1930年从古比雪夫手中接过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职务，1932年在重要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建立时又成了这个部的头头。因此，在1930至1933年，他是布哈林的行政领导。大约就在奥尔忠尼启泽开始为制订比较平衡和比较现实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奔走并且取得成功的时候，布哈林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有时在奥尔忠尼启泽不在的情况下，甚至成了这个部的官方代表。②到1932年，他已经成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布哈林的计划工作思想和工业哲学已经被斯大林宣判为"异己货色"，所以对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③

几个月以后，布哈林采取了一个很快也改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的步骤。1933年1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放弃了他的"中间"姿态，更彻底地痛悔他在1928至1929年间的"罪行"和"完

---

① 《探讨》第291—298页。

② 《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1932年第9—10期第3页。布哈林在1932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曾作为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作了发言。《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第75—80页。

③ N·波波夫：《联共（布）党历史纲要》第2卷（第15版，莫斯科，1932年）第304页；《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第138页。

全错误的"立场。他当时的判断是"中间立场"已经站不住了，党内的一切派别都必须团结在现领导的周围。他在发言中间接地提到了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两条理由：一是农民的反抗和饥荒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二是德国当时的形势发展（两个星期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这两个情况构成了当时"极端危险"的局面。①

在布哈林的行动后面还有另一个没有言明的考虑。三个月前，在柳京事件中，政治局的温和派已经表明他们准备并且有能力抵制斯大林（在参与柳京的活动和由于温和派的干预而得救的人中有三名是布哈林个人的门徒）。② 现在，在1月份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温和派开始在更大的政策问题上表明自己的观点。③ 布哈林看得很清楚，党和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这也是有可能导致苏联内、外政策的改变的时期。为了参与和影响这些事件，他同样也必须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大林以往的领导，当时，正是需要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就苏联未来的道路问题开展一场不声不响的斗争。对布哈林来说，这首先就要求他象在1933年1月所做的那样进一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几个月后，他撰写的一些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文章开始在中央报刊上重新出现了，这是三年来的第一回。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表述得很谨慎，总的是说明："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斗争时期正在结束，"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开始。④

---

① 《真理报》1933年1月14日第3版。

② 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和彼特罗夫斯基。《真理报》1932年10月11日第5版。

③ 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74—75页。关于这次全会的公开材料只对会上发生的争论作了一些暗示。可把《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书中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的发言作一比较。

④ 《真理报》1933年8月4日第2—3版；布哈林的《胜利的年代》一文，载于《计划经济》1933年第7—8期第117—123页。说明他的新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在五一节发表的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手中的科学的旗帜》，载于《消息报》1933年5月1日第3版。

布哈林同斯大林的政治局中那些温和派的关系的基本特征——虽然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情况——是清楚的。在双方的关系中，无论基洛夫还是奥尔忠尼启泽在1928至1929年间都不是刻骨的反布哈林分子这一事实固然是可能起作用的，① 但基本的因素还在于他们在1934至1936年间的政治思想同布哈林二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有相似之处。尽管苏联当时的情况已跟过去有所不同，但温和派的"调和政策"和争取国内安宁的政策却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的概念如出一辙。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要使苏联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过火行动之后把社会秩序"正常化"。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们都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让"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而且他们都非常强调：由于战争的威胁（现在来自于纳粹德国），必须确保人民群众甘愿起来保卫苏维埃制度。当然，温和派并没有明确承认他们同被搞臭的布哈林主义的观点之间有这些相似之处，② 它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反映出来的。例如，其中的一件事涉及到年轻的布哈林分子、前《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彼得·彼特罗夫斯基。此人是个坚定不移的反斯大林分子，同柳京事件有牵连，1932年被暂时停止了党籍。两年后，他在基洛夫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中重新露面，当了宣传部部长并再次担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编辑。③

但是，在党看来，象征温和派的成功的是布哈林自己在政治上的卷土重来。这发生在1934年 1 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① 关于基洛夫，见本书第497页注①。

② 当然，这些相似之处也不是不引人注意的。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指出"有一部分党员"要求放松政策，他们的观点"同众所周知的右倾分子的观点完全相似。"《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0—311页。

③ 《真理报》1932年10月11日第5版；A·米尔恰柯夫：《第一个十年：一个老共青团员的笔记》（第2版，莫斯科，1965年）第227页；F·贝加和V·亚历山德罗夫：《彼特罗夫斯基》（莫斯科，1963年）第303页。

上，这是自1927年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发言的大会。他的讲话既不得不表示拥护斯大林的领导，也（我们下面就能看到）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批评。这个发言博得了聚集一堂的党的精华的经久不息的掌声。[①] 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政治局的温和派同斯大林分子之间进行了秘密的力量较量，布哈林在这场较量中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他虽然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却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鉴于这份报纸是解释官方政策的仅次于《真理报》的权威性喉舌，他的任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②] 它是温和派取得进展的显著证明，它不但使布哈林成了温和派的调和纲领的象征，而且使他成了这个纲领的杰出发言人。

后面接着发生的两件事进一步表明了布哈林在改良主义政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第一件事是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个大会是1934年8月在十分庄重的气氛中举行的，以庆祝把苏联所有的作家都包括在内的一个新的作家组织的成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在强迫作家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大大加强对文学领域的监督与控制的开始。然而，在当时，在经历了党所发动的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之后，作家和艺术家们都对这次代表大会表示欢迎，以为它是官方放松控制的开端，代表着“巨大的希望与美好的前景”。[③] 产生这种乐观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哈林作为三个官方发言人之一在会上的露面。布哈林以反对党在文学方面的行政命令的做法而著称，甚至在三十年代他仍然是个著名的为那些失宠的作家

---

① 见本书第543页注④。

②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37页。他的任命日期为2月21日，《消息报》1934年2月22日第2版上报道了这个消息。

③ 米哈伊·柯尔卓夫：《他过去是那样》（莫斯科，1965年）第97页。

讲话的"说情者",[1] 因此他在主席台上的出现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人们所期望的当局同文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

他在大会上作的历时三小时的引人注目的讲话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并使高尔基和斯大林在文化领域中的未来的执法人安德列·日丹诺夫所作的两个很有特色的讲话显得相形见绌。布哈林讲话的题目是论苏维埃的诗歌,但他所讲的真正的主题,却是指出1929年以来党在文学方面所作的那些"强制性指示",会导致"创作过程的官僚主义化和损害整个艺术发展"。他说,"重复报纸上的文章"和喊几句"押韵的口号"(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所喜欢的),"当然算不得什么艺术"。社会主义的文明需要"有强大感染力和丰富多采的艺术",这种艺术的鼓舞人心的精神是包含了"人类的全部感情——爱、幸福、害怕、苦恼、愤怒、等等等等——人类的全部期望和激情……"的"人道主义"。他仍然坚决认为,这样一种艺术只能从"多样化和质量"中产生,从"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的广泛的竞争自由"中产生。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官方提倡的"鼓动诗人"已经陈腐过时,而对那些不受宠爱的抒情诗人讲了很多赞赏的话,尤其对那个不讲政治和蔑视政治的鲍里斯·帕斯特纳克。[2]

布哈林这个惊人的坦率和自由主义的讲话虽然激怒了"鼓动"作家,却使热烈地为他的发言而欢呼的绝大多数听众感到欢欣鼓舞。据说,"许多作家简直互相拥抱起来,高兴得都喘不过气了,激

---

① 他帮助受到错误处理的作家的最有名的事例中包括倒霉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见曼德尔斯塔姆:《反对希望的希望》第22—23、112—118、136、145页。他也帮助过爱伦堡和潘特雷蒙·罗曼诺夫。爱伦堡:《回忆录》第235页;维亚契斯拉夫·札瓦里兴:《早期的苏联作家》(纽约,1958年)第281页。

② 《苏联作家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4年)第479—503、573-577、671页。

动地谈论着真正的艺术解放的前景。”①

然而，实际上，布哈林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那个讲话所象征的放松和文化的“春天”只不过是短命的。三年以后，政治局中的温和派被摧毁了，布哈林被关进了监狱，许多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本人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斯大林主义的报刊总是把布哈林的那个讲话作为攻击的靶子，说它恶毒地企图“把非党作家引到斜路上去，涣散他们的斗志”。②

把布哈林同来自上面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是1935年2月建立了一个负责起草苏联新宪法的委员会。这个由三十人组成的小组形式上由斯大林主持，成员中包括了布哈林。布哈林后来曾透露说，新宪法这个文件“从头到尾”除了拉狄克提供了少许帮助外，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起草的。③由于有法律界人士参加，加上这个文件在1936年12月被批准前曾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这些情况很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但是，新宪法的最后定稿大概是由布哈林起草或校订的。不管情况如何，布哈林在起草这个新宪章（官方称这个文件为“斯大林宪法”），尤其是在起草有关普选权、秘密投票、余额选举的可能性和公民所享受的明确的公民权等新条款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当时似乎是广为人知的。④虽

---

① 格列勃·格林卡：《在无尘的道路上》，《新杂志》第35期（1953年）第136页；古斯塔夫·雷格勒：《米涅尔瓦之鹰》（纽约，1960年）第208页；帕格：《除了真理别无一切》第106—107页。布哈林在他总结发言中回答了对他的讲话的“猛烈攻击”，后来又在大会上作的一个单独的声明中作了答复。《苏联作家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第573—577、671页。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和布哈林所起的作用，另见米哈伊·科里亚柯夫：《第一次代表大会》，载于《新俄罗斯言论报》1971年6月10、13和17日。

② 《真理报》1937年5月17日第4版。即使在大会开会那个时候，斯大林分子对大会的态度同布哈林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见《真理报》社论，1934年8月1日第1版。

③ 《消息报》1935年2月8日第1版；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22页。

④ 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22页；G·A·托卡耶夫：《一个理想的

然很少有人（包括斯大林在内）认真相信官方所说的这个宪法保证了真正的"民主化"这类话，但在党内外的许多人看来，它却提供了进一步的迹象，表明一个实行国内和平和法制的新时期已经开始，表明"人民将会有更多的发言权，他们已经不能再被推到一边去了。"⑤

但是，不管作家代表大会和新宪法多么惹人注目（最后又是徒劳无益），1934至1936年间真正使布哈林获得声望和对公众产生影响的却是他所担任的《消息报》的编辑工作。他那些有关紧迫的政治问题的署名文章和不署名的社论，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又经常出现在上层统治人物和苏联一般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加怀疑地阅读的这张报纸上。不到几个月功夫，他就在《消息报》编辑部造成了一种同他在《真理报》任职期间所具有的特点相同的同志般的、善于思考和研究问题的风气。他吸收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其中包括他童年时代的朋友爱伦堡和已经悔过自新的托洛茨基分子拉狄克，为《消息报》赢得了苏联所有报纸中最生动活泼、最具有批判性的报纸的声誉。⑥

为这一点，一般地说就是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的复活，布哈林自然要付出代价，他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表示的认错

出卖》（伦敦，1954年）第3页。布哈林自己曾强调这些条款的重要性。见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文，载于《消息报》1936年6月14日第2页和1936年6月15日第2—3页。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证明，表明布哈林正在考虑向某种两党选举或者至少是两个候选名单的选举制进化的问题。见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5—16页；托卡耶夫：《X同志》第43页。

⑤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9、57—58页；布哈林的话，引用于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权力和苏联权贵》第22页。

⑥ 关于布哈林担任编辑工作的第一手的叙述，见苏联地下刊物《政治日记》第55期（1969年4月）第40页a上发表的一篇匿名的回忆录；克劳瑟：《从事科学五十年》第143页。关于《消息报》的声誉，见帕格：《除了真理别无一切》第105页；《泰晤士报》（伦敦）1938年3月16日第16版。

仅仅是这种代价的一部分。一位幸存者曾经这样说过，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斗争“不仅消灭了正直的人，而且腐蚀了活着的人”。[①] 即使在1934至1936年比较自由的那段时间里，要参与政治活动，也得象遵守宗教仪式似地对斯大林进行个人崇拜，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反对派的声誉和观点并对集体化过程中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颠倒黑白地瞎说一通。

这些仪礼是著名而无权的政治家、现在担任政府报纸主编的布哈林所无法回避的。不过，他的做法是尽量限制自己屈从（即“堕落”）的程度，遵守某种“政治道德”标准。[②] 于是，象政治局里那些一面顺从斯大林“对这种奉承的癖好”，同时推行他们的不同政策的温和派一样，布哈林也同意“给斯大林烧香叩头和颂扬他个人”，但他的做法常常是模棱两可的，以致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其真实含义的怀疑。[③] 1935 年 2 月，为了歌颂“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斯大林组织了一次经过精心安排的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布哈林这个著名的反对强制性集体化的人同意在会上讲话，不过调子却大不相同。又如，当已故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一度曾被当作正统的历史学受到批判时，布哈林虽然写了一篇批判波克罗夫

---

① 《全苏会议》第270页。

② 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49—50页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③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55页。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称斯大林为“无产阶级力量的光荣的元帅”。二个月之后，他又夸奖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不是元帅兴登堡”。从布哈林对元帅这个词的用法中，可看出这个称呼是颇为古怪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9页；《加里尼奇》，载于《消息报》 1934年 3 月30日第2版。在有些重要的场合，他完全不提斯大林，这种疏忽也是不寻常的。见他的五一节文章《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胜利？》，载于《消息报》1934年5月1日第 3 页。他在很多地方使用当时专门用来颂扬斯大林的名词来描绘列宁。见他写的《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父亲》一文，载于《消息报》 1936年1月21日第2版。他较少保留地参加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后来的事，那是在他面临很大危险的时候。见他的文章《伟大事业的金字塔》，载于《消息报》1936年1月27日第 3—4 版。

斯基的文章，但文章主要只是对波克罗夫斯基抽象地对待俄国历史的做法表示痛惜而已。① 在其他方面，布哈林则干脆拒绝参预，他对推行新民族主义为沙皇专制统治恢复名誉和改写党史方面没有做过任何事情。② 最重要的是，他拒绝谴责那些由于挨斯大林的整而处于危险中的布尔什维克。1936年，当包括李可夫在内的从前的反对派分子要求法院"决不要怜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布哈林保持了沉默。③

布哈林是付出了代价的。但他一定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他以此换来了发表他的文章和在公共生活中露面的机会，从而可在和解派与恐怖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发挥重要和有影响的作用。布哈林相信，他所下的赌注是很大的，涉及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国家和整个世界未来的道路；他在1934至1936年间所写的文章和社论就是温和派试图使党内对国内和平和改革取得一致认识的努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④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意味着布哈林可

---

① 《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突击手代表大会，1935年2月11—17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35年）第145—153页；布哈林：《我们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载于《消息报》1936年1月27日第3—4版。

② 虽然他参加了1936年初建立的一个监督俄国和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改写工作的官方委员会。《历史科学战线》（莫斯科，1936年）第5、11页；《真理报》1936年3月4日，第1页。那年1月，他重申了布尔什维克对沙皇俄国的传统的否定看法，说那是"一个奥勃洛莫夫的国家"。这个看法受到了《真理报》的尖锐攻击，布哈林被迫收回这个看法。见《消息报》1936年1月21日第2页；和他的《对问题的答复》一文，《消息报》1936年2月14日第1页。他写的一篇不是颂扬沙皇的传统，而是颂扬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传统"的不署名社论同样忠实于老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伟大的传统》1936年2月5日第1页。布哈林在《消息报》1936年2月14日第1版上曾讲到他是这篇社论的作者。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11页。

④ 布哈林1936年在巴黎同尼古拉也夫斯基的谈话中，曾说明，除了他的文章以外，他还写了一系列有关当前政策问题上的斗争的不署名的《消息报》社论，这些社论的写法是容易辨认的。堵克和柯恩编：《大清洗的审讯》第37页。我对布哈林1934—1936年的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参阅这些社论，因为第一究竟是不是他写的是可讨论的；第二他的思想在他写的许多署名文章中已很清楚。

以畅所欲言地去写这些问题和最高领导层中的冲突。相反，他象参加这场秘密斗争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用谨慎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做法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政治中是不常见的，可是现在却成了公开争论和政治对话的主要形式。①

这种奥妙的交流思想的方式既没有什么奇怪，也不是苏联所特有的。遮遮掩掩的争论语言、象征性的比喻、隐喻般的提示、暗语、意味深长的强调和省略，以及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等，自古以来就是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之一，尤其在强制实行官方检查制度和迫害异端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情况更是如此。研究政治哲学、甚至研究圣经的学者们都惯于象阅读伊索寓言那样进行阅读，留心那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不能公开说出来的意思。在厉行检查制度的沙皇俄国成长起来的政治化了的苏联公民尤其善于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而在这方面最拿手的就数布尔什维克了，因为他们本身的革命思想过去就是以这种秘密方式进行传播的。在至今仍然是苏联党校中必读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性文件《怎么办?》一文中，列宁写道：

"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绪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残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现于受检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来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终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②

---

① 另一个例子，可见奇孟·阿勃兰斯基：《加米涅夫的最后一篇论文》，《新左派评论》1962年第13期第32—3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33页。关于对俄国使用伊索式语言的研究，见西德尼·胃洛斯编的《苏联的政治过程》(麻省，1971年)第73—77页。

象沙皇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布哈林在1934至1936年间以隐晦的方式为那些“感觉兴趣的人”——首先是为党员——写了一些关于在斯大林的俄国应该怎么办的文章。他所宣传的观点和政策是以他要使他的读者接受的他关于苏联形势的总的评价为基础的。由于他是公认的斯大林政策的反对者，所以他的评价具有特殊的份量。他强调，反对派分子过去的纲领和做法已经不再妥当也不再可行了。它们已经由于1929至1933年间的事件而变得过时了。不管“代价”和教训如何，斯大林进行的持续四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所带来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新经济政策的废除、集体化与重工业化的实现和“其他的战略”的失败——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苏联已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现在已经谈不上再返回到1929年以前的那种局面去了。因此，反斯大林分子应该停止为过去感到惋惜，而应开始“研究形势的实际发展趋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使苏联历史面临着“新的抉择”。现在已经是全体布尔什维克接受现领导以便对付摆在面前的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了。这两个问题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对斯大林实行的强制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苏维埃秩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①

法西斯主义既是纳粹德国造成的威胁，又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是布哈林在三十年代的思想中关注的中心问题。希特勒的上台使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政策陷入了混乱。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假如在1929至1933年进行了合作，是否就能阻止纳粹获得胜利，或者斯大林的反社会党的路线是否就是这种合作的唯一障碍，

---

① 除了见本书第543页注④和《真理报》1933年1月4日第3版以外，可见布哈林的文章《世界将会怎样》，载于《消息报》1934年11月7日第4—5页。另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4—129页；《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消息报》1934年5月12日第3版；《严峻的话》，《消息报》1934年12月22日第2版；《发展苏联经济的新阶段》，《消息报》1935年10月12日第3版。

这两个问题虽然还是可以争论的，但是许多苏联和外国的共产党人都相信这是事实。① 何况，斯大林只是在 1934 年、正式地是在 1935 年年中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号召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慢腾腾地、勉强地放弃了他的声名狼藉的政策的。这个为时已晚的转变，是苏联外交转向支持针对德国的欧洲集体安全这一范围更大的变化的一部分（后者的象征是苏联在1934年9月加入了国际联盟)。然而，在幕后，苏联领导集团中围绕对新的德国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却出现了深刻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甚至一直到1936年秋天苏联作出站在反法西斯主义一边干预西班牙内战的决定的过程中还继续有所反映。

正如莫洛托夫1936年在一次很少有的公开讲话中所透露和证实的那样，分歧发生在主张同法西斯主义、尤其是纳粹德国“彻底势不两立”的一批人和想“改善苏联与德国的关系”的斯大林一伙人之间。② 象欧洲的大多数政治家一样，苏联领导人对法西斯主义有各式各样的而且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认识。诚然，所有的人都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实现公开的（而不是伪装的议会式的）“资本专政”的产物。问题是从这种看法中却可以引出极为不同的结论。对斯大林来说，这种看法意味着纳粹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统治方式，因此，不必由于纳粹主义的出现而停止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在战后欧洲被

---

① 恩斯特·根利：《给作家爱伦堡的公开信》，《格拉尼》杂志第 63 期（1967 年）第198页；海因茨·布兰特：《寻求第三条道路》（纽约，1970年）第70—71、80页。关于共产党要求实行新政策的例子，见《共产国际史话》（莫斯科，1970年）第104—136页。

② 见罗勃特·斯劳瑟：《外交部的作用》，载于I·J·勒德雷尔编的《俄国外交政策》（纽黑文，1962年）第217—230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79—90页；乔治·凯南：《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和西方》（波士顿，1960年）第19—21章。

排斥的国家从1922年开始建立的特殊关系。他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曾向全党(实际上也就是向希特勒)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① 斯大林是否早在1934年就曾设想过他在1939年8月通过签定德苏条约所实现的那种勾结性联盟,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所清楚的是,即使在三十年代苏联站在倾向于西方的立场上时,斯大林也宁愿采取并通过秘密外交来实现苏联式的绥靖政策和同希特勒建立"最好的关系"。②

布哈林则支持相反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确信希特勒主义"向全世界投下了黑暗而血腥的阴影",③ 满腔热情地为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集体抵抗纳粹德国的主张而辩护。就在他恢复政治声望的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心照不宣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无关紧要的说法。他以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为例,强调指出,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认真对待。这本书所宣扬的"公开掠夺、赤裸裸的野兽哲学、血迹斑斑的暗害和光天化日下的残杀"已经在德国国内实行。希特勒公开宣布的反布尔什维主义、他要在俄国获得德国人生存空间的要求和"公开号召消灭我们国家"的叫嚣,使他的对外意图"暴露无遗"。布哈林以一种面临大难时的幽默口吻预言说,德国对苏联西部地区的觊觎和日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显然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在

---

①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3页。

② 见本书第584页注④;塔克为塔克和柯恩编的《大清洗的审讯》一书所写的导言,该书第33—40页;路易斯·费希尔:《俄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道路》(纽约,1969年)第22章。

③ 《马克思的教导及其历史意义》第99页;另见《消息报》1933年5月1日第3版。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高炉中找个地方作为我们全国一亿六千万人口的栖身之处”。他在讲话的结束部分对斯大林容忍纳粹政权的态度提出了异议，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的狰狞面孔！同志们，这就是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就是在历史托付给我们的所有那些历史性战斗中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人。”①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不管是在私下谈话和公开演讲中，还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布哈林都始终不渝地强调同德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强调必须同西方政府共同制订一项“安全政策”。对苏联领导集团中的绥靖派，他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性质同法西斯主义所宣扬的“兽道主义和种族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并指出希特勒的德国是安抚不住的，因为它已经把“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且把征服苏维埃俄国作为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他提醒布尔什维克们说，“同中世纪和法西斯主义相比较”，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好的’”。②对西方国家的绥靖派，布哈林则强调1914年的“历史教训”和纳粹对英国、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芬兰、以及甚至对美国的共同威胁。他在1935年警告说，万一苏联落入德国人之手，希特勒就会获得“一个强大的资源基地……使他得以用那把‘德国的剑’开始他的第二

①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7—129页。

② 见《两个世界的文化》（纽约，1934年）；《原则的进击》，《消息报》1934年6月28日第1版；《消息报》1934年11月7日第4—5版；《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第151—152页；《二月革命纪念日有感》，《消息报》1935年3月12日第2版；《和平问题》，《消息报》1935年3月30日第2版；《人类的再生》，《消息报》1935年5月1日第3版；《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消息报》1935年12月8日第2版和12月10日第3版；《谈地缘政治的航程》，《消息报》1936年2月15日第6版；《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巴黎，1936年）；《苏维埃民主的扩大》，《消息报》1936年5月1日第4版（参看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对比）；《历史的踏程：大声疾呼的思想》，《消息报》1936年7月6日第3—4版。另见《反苏集团案》一书第230、361、422—423页上关于他的私下谈话的一些断章取义的叙述。

轮行动，而这一次行动的地点将是在西方。"①

不需要对布哈林的预见作任何评论。看来完全可以把他同那些从一开始就懂得纳粹德国的特殊威胁而人们却没有及时予以注意的少数重要政治人物列在一起。但是，对布哈林来说，反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外政策的战略而已。在他关于苏联国内的发展的考虑中，反法西斯主义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他的思想上，这两者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当然是备战，即通过消除"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中的极大的……不满情绪"来为战争作好准备。② 他认为，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同苏维埃俄国内部的"改革"——尤其是在争取"富裕的生活"和"民主化"方面的"改革"——是一回事，因此他在1934至1936年间经常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③

然而，纳粹德国的出现还以更复杂的形式影响到布哈林对苏联内部趋势的想法。希特勒德国的党国专政同斯大林俄国的党国专政的相似之处，早已经成为外国讨论的题目，这一点也引起了布哈林的注意。当然，在形式上，布哈林不得不表示这种相似只是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之间表面上的相似，因而是不值一谈的。但是在他写的文章（和私下谈话）中，他却向那些"感觉兴趣的人"提供

---

① 《消息报》1935年3月30日第2版。另见《消息报》1934年6月28日第1版；《消息报》1936年2月15日第6版；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载于《外交事务》（1936年7月），重印于《苏联（1922--1962）：外交事业文选》，费利普·E·莫斯利编（纽约，1963年），第138—152页。

② 《反苏集团案》第230—231页。

③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7页；《整个国家》，《消息报》1934年6月20日第2版；《消息报》1934年12月22日第2版（布哈林在那里清楚地讲到"改革"问题）；《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第145—153页；《革命年份的几点总结和我们的敌人》，《消息报》1935年11月7日第5版；《被推倒了的准则（国内述评）》，《消息报》1936年1月1日第3版；《消息报》1936年5月1日第4版；《消息报》1936年7月6日第3—4版。在这方面，布哈林曾告诉尼古拉也夫斯基说，外国的共产党同社会党的联盟"……对苏联国内的关系有巨大的积极意义"。B·尼古拉也夫斯基：《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新俄罗斯言论报》1959年12月6日第2版。

了一种更加发人深思和令人吃惊的分析。跟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人实在太多了)不一样，布哈林承认纳粹的秩序是一种新东西。他认为他是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具体体现，是他在1915年曾预言过的现代社会中那种梦魇般的潜在危险——"杰克·伦敦在《铁蹄》一书中所说的那种国家"的体现。[1] 他在1934至1936年间说纳粹德国是"极权主义"秩序，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专制统治"。他对纳粹德国的这种描绘看来是在暗示，而他私下也曾吐露，他担心1929年以来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实际做法正在把苏联引向类似的发展道路。

跟某些思想家（包括流亡在国外的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也夫在内，布哈林曾批判了别尔嘉也夫所著的《两个极权主义国家》一书中论述"非人性化过程"的部分，但同时指出这部分内容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2] 不同，布哈林并没有把上述弊病同现代大规模组织的性质混为一谈。相反，他认为这种弊病在于"把暴力和压制作为对社会、个人和人格行使权力的永久性方法的思想，" 在于建立在"永久的压制"和 "一小撮居统治地位的剥削者同被剥削群众……之间的鸿沟"基础上的"恐怖主义专政"。这样一种政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措施、盲目的纪律、对耶稣会式的顺从的迷信、以及对思想和理论的压制，造成了非人性化了的群氓。"[3] 他是用这些特征来描绘德国的，但描绘的方式却暗示这同正在苏联出现的

---

① 《两个世界的文化》第4页；《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第8页；《消息报》1936年6月14日第2页；尼古拉也夫斯基在《权力和苏联权贵》一书第19页上引用的布哈林的话。

② 《消息报》1935年12月8日第2版和12月10日第3版；《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第23页。米哈伊·科里亚柯夫曾在1971年7月29日《新俄罗斯言论报》第3版上指出了布哈林评论别尔嘉也夫的《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一书的文章的重要性。

③ 布哈林的这句话引用于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6—17页。另见布哈林的一些文章，载于《消息报》1936年5月1日第4版，1936年7月6日第3—4版，1934年11月7日第4—5版，1935年5月1日第3版，1936年1月1日第3版。

对斯大林、俄罗斯国家和铁的纪律的迷信也是有关的。他说：

"法西斯主义……建立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极权国家'，这个国家使领导人和'最高领导人'以外的一切都丧失了人性。在这里，群众的非人性化同对'领袖'的颂扬美化是成正比的。……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被强加于一切生活领域的纪律所束缚的简单成员。……一切事物都要用三条道德标准来衡量：对'民族'或'国家'的忠诚、'对领袖的忠心'和'兵营精神'。"①

布尔什维克革命可能蜕化为一种新的剥削秩序的问题，过去曾经使布哈林感到忧虑。但现在，由斯大林主义所代表的一种苏维埃式的"永久性高压统治"的潜在可能性，看来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而使布哈林感到震惊。他在 1934 年开始呐喊时，显然相信在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在苏联还是可以避免的。这个希望是他热烈地支持温和派进行改革的基础，鼓舞他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人道主义的口号(主要是一群非党作家提出来的)，尽管在 1929 至 1930 年曾被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谴责为(同"腐朽的自由主义"一起)"那帮跟不上形势的迅速发展、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队伍中找不到自己立身之地的人……的一种动摇和惊慌失措的表现"，② 到 1934 年，布哈林还是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反法西斯主义一起，列为他所阐述的两大主题之一③。

---

① 《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第22页。关于对领导的迷信问题，可见布哈林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议会》，《消息报》1935年11月15日第4页。

② 引用于爱德华·布朗：《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纽约，1969 年) 第 208 页。另见《反对文学艺术中的自由主义》(莫斯科，1931年)，第 25--27 、102—103 页。

③ 显然他早在1929 年就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种思想。见他关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提到的异化问题的论述，《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第3版；他对集体化的伊索寓言式的攻击，《探讨》第335—353页；他在《新人》一文中对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的论述，《真理报》1932 年 10 月 17 日第 3 页。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同布哈林在二十年代从道义上反对反农民的政策的立场是一致的，它代表着一种坦率的伦理观。布哈林解释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意味着“关心全面的发展，关心多方面的(“富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意味着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机器只是用以促进丰富的、多样化的、美好和欢乐的兴旺生活的手段”；在那里，人们的“需要，他们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的宽广和丰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在那里，“衡量一切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①] 布哈林指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兽性是根本对立的”，他也希望以此说服不愿合作的西方批评家们同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主义”，[②] 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显然还是苏联社会本身，而且他的真正的听众是布尔什维克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那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并不引人注目的，不过是重新陈述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已。然而，在苏联三十年代中期的环境中，这种理论却等于是一篇激进的批判书和宣言，等于是要求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在二十年以后被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接过去了。在斯大林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背景下，当官方为布哈林称之为“军事秩序的特征”、等级制的官僚权力和“野蛮、愚昧的狭隘性”的东西大唱赞歌的时候，布哈林提醒党注意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建立新的文明、保存并超

① 《消息报》1935年12月10日第3版；《消息报》1936年1月1日第3版。另见《两个世界的文化》，第25—28页；《消息报》1934年5月12日第3版；《第一次苏联作家全苏代表大会》第499—501页；《消息报》1935年11月7日第5版；《消息报》1935年12月8日第2版；《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第12—25页。

② 《消息报》1935年11月7日第5版；尼古拉也夫斯基在《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6—17页上引用的布哈林的话。关于他把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对比，另见《两个世界的文化》；《消息报》1935年5月1日第3版；《消息报》1935年12月8日第2版和1935年12月10日第3版；《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

过当代最优秀的成就和价值。① 他好象是在说，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对这些价值构成了威胁，因为它们都依仗暴力并且蔑视人类的成就。在他看来，一个叫嚷"每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伸手去摸我的白朗宁"② 的纳粹诗人，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威胁。他提醒已在十七年的内战、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强制推行的工业化与集体化中改变了自己的眼光和观点的党说："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个创造性的、幸福的、有人性的社会就是目的本身……。"③

布哈林曾私下吐露，他最担心的是集体化造成使党变得残酷无情的影响——"大批地消灭手无寸铁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某些共产党员采取了超然态度，某些进行了反抗，还有一些包括斯大林自己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内，为了表示抗议而自杀了。然而，有许多人已经适应于并且顺从于暴力，认为它是一种正常的统治方式；象布哈林所担心的那样，这种人已经变成"某种可怕的机器……'铁蹄'中的轮齿了"。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显然是布哈林用以提醒和呼吁党反对这种反常状况的方式。他仍然满怀希望地认为，党员们表现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人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好。必须使他们相信，国家并不反对他们，只是需要改变政策。"④ 因此，他在1934至1936年间写的文章，强烈要求党员们把正在进行的尝试性的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第一次开花"和"在活生生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这些改革是：结束农村中的恐怖活动和食品配给制度；开始增加农业、消费品工业和福利事业方面的开支；促进作家代表大

---

① 见《两个世界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消息报》1935年12月10日第3版。

②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29页；《两个世界的文化》第10页。

③ 《消息报》1935年12月8日第2版。

④ 引用于尼古拉也夫斯基的《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5，18--19页。

会所许诺的文化之春的到来；实现新宪法所提出的法制和民主化。他似乎是在呼吁：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轴心”。①

很难判断布哈林对于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改革和抵制斯大林主义是否真正持乐观态度，也很难确切地知道，这种乐观态度是在什么时候转变为绝望的。他再次用铁蹄作比喻，说明他始终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悲观情绪，因为铁蹄向来代表现实生活中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主义。此外，即使是在改革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事业取得成就和博得人心的时候，也经常有表明斯大林怀有不良意图和滥用权力的证据。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刺使布哈林大吃一惊，也许他早已猜到了这件事情背后的真正主谋。②无论如何，他是知道斯大林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这次谋杀的情况的，而且很可能也知道斯大林发出的矛头指向隐藏在党内的“敌人”的秘密指示（有些指示还间接地把布哈林自己也牵连了进去）。接着在1935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第一轮审讯，取消“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协会”和从图书馆拿掉几名前反对派分子所写的著作等——清楚地预示出对温

① 《消息报》1936年1月1日第3版。同样可见《消息报》1934年5月12日第3版，1935年10月12日第3版，1935年11月7日第5版，1935年11月15日第4版。

② 爱伦堡：《回忆录》第289页。布哈林就基洛夫的被害发表了三篇文章，载于《消息报》1934年12月2、6和22日。最后一篇特别有意思。虽然他不得不说党的反对派同暗害罪行之间的联系，但是他的结论却显然是不同的调子。他写道，谋杀的目的是要阻挠“改革”，“破坏国内的方针”。他指出，问题是这究竟对“谁有利”？有可能布哈林从警察头目雅果达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雅果达是知道实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那时布哈林同他的交情还是很好的。见曼德尔什塔姆：《反对希望的希望》第22—23、82页。

和派的政策和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威胁。①

此外，尽管布哈林在政治上重又走远了，但是，在同斯大林的关系上，他的个人地位仍然是"最低"的。② 三十年代初期，他同领袖身边的人的唯一接触，看来就是同斯大林那位年轻的妻子的亲密友谊。③ 不过，她在集体化问题上所持的布哈林主义观点和她在1932年11月的自杀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布哈林显然并不真正抱有政治局中的温和派所抱有的那种乐观主义，他们以为"在斯大林面前烧香叩头"就会赢得他的信任。正如在1928年一样，他看到一种无法满足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强制欲正在起作用。他解释说，斯大林"变得卑劣，是因为他不能使任何人，甚至也不能使他自己相信他比任何人伟大。……他的卑劣驱使他向别人、向所有的人、特别是向那些在某些方面胜过他或者比他做得好的人进行报复……。"布哈林懂得，他自己由于在党内的形象，已经成为这种"卑劣"的首要进攻目标，而且随着以他为代表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他个人所受到的危险也日益增加。④ 斯大林的公开行动有时候还是友好的，例如在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他举杯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敬酒，他说："我们都了解他和热爱他，谁要是老记着过去——谁就从我的眼前滚开！"⑤ 然而，与此同时，他的警察代理人却已经在准备一份布哈林的"过去"情况的档案材料了。而且在1936年2月10日，斯大林主义的喉舌《真理报》几年

①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57—58、85—89页。

② 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14页。

③ 阿利卢耶娃：《二十封信》第115、140页；《仅仅一年》（纽约，1969年）第147、166页。

④ L.席恩：《布哈林论斯大林》，《新杂志》第75期（1964年）第181页。据说布哈林曾说过，他1934年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受到的热烈鼓掌，"等于在我的死亡证上签了字"。帕格：《除了真理别无一切》第107页。

⑤ 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333页。

来第一次不祥地对布哈林当前的观点进行了攻击。①

两星期以后，布哈林到巴黎去进行了他最后一次的出国旅行，当时他已经“料到他将毁灭我们。……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更适宜的时机。”② 他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参加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到巴黎去购买已经被摧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珍贵档案材料的。这些档案材料（其中有马克思的手稿）当时由流亡在巴黎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保存着，此人曾协助把这些材料偷运出纳粹德国。包括在布拉格和柏林的停留以及到哥本哈根的短途旅行在内，布哈林在国外一共呆了两个月。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是以“心里想着他的讣告”的心情来进行他猜想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的。③ 他不管同朋友还是同从前的政敌谈话，都惊人地坦率而且很少考虑党的在政治上保守秘密的传统。他对流亡的俄国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费多尔·唐恩进行了一次突然访问，他以不加掩饰的“恐惧和憎恨”的口吻谈论斯大林。他说：“这个恶毒的小人，不，他不是人，而是恶魔！”在奥德翁广场同安德烈·马尔罗一起散步时，“他心不在焉地向我吐露说：‘现在他准备杀我了。’……”④

不过，他选择了尼古拉也夫斯基，向他吐露准备留传给后代的重要历史事实和他自己的观点。尽管尼古拉也夫斯基信仰孟什维主义，布哈林还是信任他。这大概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档案工作

---

① 尤勒斯·洪贝特—德罗茨：《我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者”集体的关系》（A·G·勒维所有的一份1935年的未发表的文件）；《真理报》1936年2月10日第3版。

② 唐恩：《布哈林论斯大林》，《新杂志》第75期（1964年）第182页。

③ 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9页。

④ 唐恩：《布哈林论斯大林》，《新杂志》第75期（1964年）第182页；安德烈·马尔罗：《倒下的橡树：同戴高乐谈话》（伦敦，1972年）第103页。另见雷斯维克：《我梦想革命》第325页。

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李可夫的姻兄弟。开始，布哈林谨慎地谈到彼此的朋友、过去的事情和哲学等等。但是，当他们的私下交谈持续到三月和四月，并谈得越来越投机的时候，布哈林终于（虽然有时是吞吞吐吐和一带而过地）把柳京事件以来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一些重大斗争情况、他自己所起的作用和他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想法都讲出来了。六个月以后，在这些谈话（可能还有随后同布哈林的通信联系）的基础上，尼古拉也夫斯基匿名发表了著名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这是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献，它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苏联三十年代政治情况的知识。① 布哈林给尼古拉也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希望他留在国外并创办一份反斯大林主义的报纸的一位共产国际的老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对他自己和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已感到绝望。他们问，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他的回答表明他决

① 虽然这封信的可靠性已被证实，但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尚不清楚。它最早出现在流亡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讯》上（1936年12月22日第20－33页和1937年1月17日第17—24页），署名为"Y·Z·"。1959年，尼古拉也夫斯基证实了流传的说法，即说他根据1936年三月至四月同布哈林的谈话和来自其他渠道的补充情况写了这封信。他解释说，他开始是用对话的形式起草的，但是在编者的要求下又改写成叙述体。见《新俄罗斯言论报》1959年12月6日第2版；《社会主义通讯》（1959年12月）第246页。尼古拉也夫斯基后来在他的《权力和苏联权贵》一书的第3—25页上详细说明了这个解释。然而，正如罗勃特·M·斯劳瑟指出的，这个解释难于同这封信最初发表时编者所加的按语相一致，也难于同信本身提供的证据相一致，因为它谈到了苏联领导集团中迟至1936年9月发生的一些秘密事情。见斯劳瑟的商榷意见，《俄国外交政策》，I·J·勒德雷尔编，（纽黑文，1962年），第221—222页；《斯拉夫评论》（1966年9月）第530—531页。比如说，只有布哈林或李可夫大概知道，对他们的调查在1936年9月"未经对被指控者的查问"就放下了。该信第60页。有各种假设可以使这些不一致的地方衔接起来，其中之一（斯劳瑟主张的）是布哈林（或者也可以加李可夫）在1936年底才把这封信的原稿或补充材料偷寄给尼古拉也夫斯基。这封信（第40页）中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一些淘气的小朋友（布哈林的自传——《自传》，第53页——中也讲到这些小朋友），这可能是布哈林为了表明他是写信人而有意提到的，这一点使人觉得这封信是可信的。无论如何，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另一种形式，这封信来源于布哈林，这是没有疑问的。

心在党内演完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角色。他说:“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做一个流亡者?那不行,我不能象你们、象流亡者那样生活。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布哈林于1936年4月下旬回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于完成。这场恐怖活动是以审讯和处决已经在押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的,罪名是他们组成了一个暗杀基洛夫和策划谋害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主义中心”。布哈林在他回国后写的发表在《消息报》上的第一篇文章中向“感觉兴趣的人”提醒摆在面前的危急局面。表面上这是一篇讨论新宪法的文章(当时这种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他在引用了马基雅维利* 的话(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伊索式的做法)之后,便把文章的内容转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上,即所有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表面上都要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假象*并在思想意识方面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① 6月18日,高尔基——当时那场即将来临的恐怖活动的一位有影响的反对者——神秘地去世了。布哈林在他的悼词中,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歌颂理性的人”表示哀悼。②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侦讯”中被指控的人开始胡说八道,并供认假罪行。

7月6日,布哈林发表了他显然知道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历史的道路:大声疾呼的思想》的文章中,他再次提醒读者把它当作一种最后遗嘱而予以特别重视。③ 文章反复阐述的主

---

*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及政治哲学家。——译者注

① 《消息报》1936年5月1日第4版。

② 《理性的歌手》,载于《消息报》1936年6月20日第2版;《高尔基:最后的“宽恕”》,载于《消息报》1936年6月23日第2版。

③ 《消息报》1936年7月6日第3—4版。其他作者也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见塔克为塔克和科恩编的《大清洗的审讯》写的导言,第36—38页;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讯》,第94—96页。

题是国内外形势的"真正"发展方向。文章用一种作事后分析的形式开头。他写道，"人人都在谈论斯大林宪法"，但真正重要的事态发展，却是有人在背后"巩固"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并且很快就要采取措施来摧毁一切抵制这种做法的行动。他生怕有人会对他的分析产生误解，以为他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的恃强欺弱行径、压迫、暴力和战争"只适用于德国的情况，因此他再次指出："(在言行方面)时时、事事都要进行伪装、欺骗，这是一切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

然而，一篇政治遗嘱还必须谈及未来，而在这方面，在对当前表示绝望的同时，布哈林似乎是提供了一种最终会大有希望的"前景"。他从欧洲回来时更加相信纳粹德国的稳定性和它所构成的威胁，以及使苏联外交面对英国的必要性。[①] 他暗示斯大林现在还准备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些"冒险主义的幻想"不可能阻止同德国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不可能改变苏联最终将成为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堡垒的命运。在即将出现的这场"伟大的历史性的戏剧场面"中，每一个苏联公民都必须保持忠诚和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最终胜利怀有信心，而这一点——他显然仍然相信——也是斯大林主义所阻止不了的。

布哈林似乎在预言，由于"历史的嘲弄"，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政权的基础是"仇恨群众的思想意识。……在它看来，群众是'UNTERMENSCHEN'(德语"次等人"的意思——译者注)，是'次等人'、'下等人'。……然而，群众已经登上了舞台，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彻底地赶入地下了。"因此，这种政权必须"制造群众参与政权的假象。……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有组织

① 《反苏集团案》第 360—361、422—423 页。

的欺骗行径的历史局限性，那将是极端的近视。……这种欺骗行径早晚是一定要揭穿的。"苏维埃革命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且带来了"这个国家整个内部结构和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尽管建立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权，一般老百姓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开始成熟起来了，他们已经不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这是罗马帝国的奴隶的称呼）"，而是正在成为"有自觉个性的自觉的群众"。这一点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因为"活生生的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由千百万这种活生生的人创造的。……"布哈林在他自己被毁灭的前夕，继续对人民和历史抱有信念。或者象他对尼古拉也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人是靠信念而得救的，这种信念就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就象一条小河向出口流去一样。……这条小河要经过最难通过的地方，但它还是向前流去。……人民也是不断成长的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最终建立一个新社会。"①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十四名同案被告人的审讯是8月19日开始的，它很快就表明斯大林心里想着的牺牲品不只是正在受审的那几个人而已。在他的"审问者"的精心指导下，有几名被告人立即供出了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一些前托洛茨基分子都牵连进去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的证词。8月21日，维辛斯基（他是引导被告人按事先准备好的供词去说的斯大林主义的检察官）宣布开始对布哈林和其他被牵连的人进行调查。②第二天，托姆斯基在看到公开发表的这项声明后立即自杀了。托姆斯基是苏联工会运动的创始人，当时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想

---

① 《消息报》1936年7月6日第3—4版；尼古拉也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第25页。

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法庭审讯报告》（莫斯科，1936年）第55—56、68、73、115—116页；《真理报》1936年8月22日第4版。

躲开倾泻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头上的那种凌辱和贬责。正象他在国外的一位朋友所写的那样，他选择了“保持尊严的结局”。①

8月24日，季诺维也夫一案的十六名被告人全部被宣判为有罪，几天后，他们就被枪决了。与此同时，报纸上大登特登所谓“工人”提出的揭露布哈林同“这些已经被消灭的两面派、杀人凶手、间谍和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之间的联系的要求。②

政治局中反对搞恐怖活动的人——主要是奥尔忠尼启泽，可能还有乌克兰的柯秀尔、久巴和巴维尔·波斯蒂舍夫——开始进行最后的抵制。在此以前，他们显然曾经勉强地同意过对已经两次被判刑和关进监狱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审讯，因为斯大林曾经答应过不枪毙这两名被告人。他们被斯大林出卖后，开始采取行动营救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两个人是远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受群众爱戴和更为重要的政治人物。③在8月底和9月初举行的一系列高级（也许是中央委员会，但可能性更大的是政治局）会议上，他们使若干重要的决定获得了通过，其中有一项决定显然是批准苏联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预。另一项决定结束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二人的诉讼。9月10日，《真理报》宣布，维辛斯基的检查院由于“未能提出合法事实”，已经结束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调查。④

布哈林虽然还是自由的，甚至还能在国内进行旅行，却很难由于这种缓刑而感到安慰。他当然知道，在那些——如同诗人叶弗

---

① 《真理报》1936年8月23日第2版；维克托·谢尔格：《二十年以后》（纽约，1937年）第226页。

② 见《真理报》1936年8月22、23和26日。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51—153页。

④ 学者们对是否在九月份召开过完全的中央全会、一系列政治局会议或其他的会议有不同看法。见《大恐怖》一书第153页和《斯拉夫评论》（1967年12月）第665—677页上的讨论。关于就西班牙问题作的决定，见本书第553页注②中引的斯劳瑟一书。

图申科所写的那样——其“死刑判决书就象胡格诺派教徒家里门上的白色十字架一样在他们心中闪现”的人中，他是首当其冲的。① 虽然直到1937年1月16日为止，《消息报》编辑部的成员中还有他的名字，但在8月份他大概已失去对读报的控制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过。② 斯大林的阴谋诡计也没有止于刑事调查。9月底，他设法用叶若夫取代了警察头子雅果达。雅果达在1928年至1929年间同布哈林分子的关系，使他不那么赞同对这些人进行迫害；而叶若夫则是恐怖活动的狂热支持者，他后来负责指挥了1937至1938年间斯大林对党发动的大袭击。叶若夫的任命加速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第二次公审的准备工作，这次公审的对象是拉狄克和布哈林的两个朋友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科夫，公审的内容增加了对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指控。③

布哈林现在已经陷入那位“天才药剂师”所操纵的“无情的恐怖气氛”之中。④ 11月7日，当他和他的妻子站在普通看台上而不是站在列宁陵墓上达官贵人所站的观礼台上观看庆祝国庆的活动时，一名卫兵向他们走了过来。布哈林的妻子现在还记得，那时她心里想：“他准是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离开或者是来逮捕他的。但是那个卫兵敬了礼，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叫我来告诉您，说您站错了地方，他请您到陵墓上面去。’”⑤ 一个月以后，布哈林

---

① 安德烈·普拉顿诺夫的《残忍和美丽的世界》一书导言，纽约，1970年。另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60—62页。布哈林在八月间到塔什克作了一次旅行。《反苏集团案》第228页。

② 他的最后一篇署名文章出现于7月6日。八月中开始对季诺维也夫的审讯后，该报社论的调子有显著的改变，虽然斯劳瑟指出（见本书第553页注②），布哈林或他的同伙也许到9月底还能够撰写一、二篇针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措辞谨慎的社论。至少在名义上，布哈林迟至11月7日还有《消息报》的记者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1页。

③ 关于这些事件，见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54—156页。

④ 奥尔洛夫：《斯大林的罪行》第280页。

⑤ 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1页。

的名字就从宪法最后起草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报纸又开始暗示他同“人民的敌人”有牵连。①

对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和其他十四个人的审讯于1937年1月23日开始。被告人又一次立即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证词，这一次是给布哈林和李可夫加上了破坏、叛国和谋杀罪。经过七天虚假的指控和异乎寻常的招供之后，法庭裁决所有十七名被告有罪，而且除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和其他两人（暂时）幸免外，其余的人全部被判处死刑。② 在随后的两星期中，几名次要的布哈林分子在警察局的密室里被“加了工”，他们的“交代”材料被送交布哈林，作为对他的“一种精神折磨”。这时布哈林实际上大概已经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内被囚禁起来了，他开始绝食——这是一种凄惨和孤立无援的抗议，以图唤起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反对搞恐怖活动的人，这些人正聚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抵抗”。③

中央委员会自1917年以来所举行的最具有灾难性的会议于1937年2月23日召开了。恐怖活动反对者们知道，为了使恐怖活动停下来，他们必须阻止把布哈林开除出党和逮捕起来。当时这仍然是中央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假如布哈林可以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那就意味着没有谁是安全的了。而斯大林出于同样原因，却为摊牌作了仔细的准备。在这之前五天，奥尔忠尼启泽这位最强有力的恐怖活动反对者被暗杀或被迫自杀了。因此，这次中央全会开始时的形势是：已被削弱的温和派同壮了胆的斯

---

① 《真理报》1936年12月2日第2版；《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和15日。

② 《托派反苏中心案：法庭审讯报告》（莫斯科，1937年）；另见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64—185页。

③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4页。关于对布哈林的实际上的软禁，见曼德尔什塔姆：《反对希望的希望》第276页。“最后的抵抗”一辞是康奎斯特的。《大恐怖》第6章。

大林分子互相争夺中央委员会中胆颤心惊的多数人。按照预定的计划，会上要讨论好几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议事日程上只有一项，就是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①] 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两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斯大林和他的人在散发了警察揭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证明材料后，起来发言，要求将二人作为“替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受人雇用的凶手和破坏分子”加以逮捕。他们宣称，这些“隐藏在党证后面，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的被揭露，胜利地证明了，斯大林在九年前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越接近，阶级敌人就越加强抵抗的论点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布哈林坦白交代，这导致了布哈林同莫洛托夫之间一段离奇的对话。布哈林说：“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决不说谎。”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不交代，那就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狗。他们的报刊正在宣传说我们的审讯是挑衅。我们要把你抓起来，到那时你就会交代了！”[②] 布哈林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捕了，他开过会回到家里就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他要他的妻子把这封信背下来。

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台万恶的机器面前，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权力，炮制着有组织的诽谤，大胆而又自信地在采取行动……。”

他接着说，斯大林的警察机关是“由一批没有头脑的、腐败无能的、收入丰厚的官僚分子所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这些人利用契卡原来的威信去迎合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这些‘万能

①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85—192页。

②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4页；《关于改造党的政治工作：1937年联共(布)党中央全会的总结》(莫斯科，1937年)第55页。

的机构'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党员干掉，把他们说成是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

布哈林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写道，把他指控为革命的敌人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就等于是发现：最后一个沙皇“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争，献给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

他向未来的党的领导人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将包括这样一项义务，就是清除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象越来越浓密的阴云、象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使党窒息的滔天罪行。……在这些日子里，也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告我无罪。……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①

当中央委员会会议继续开会的时候，布哈林在会上代表他自己和李可夫宣读了一份怒气冲冲和感情冲动的声明。根据在莫斯科流传的一种说法（其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为其他渠道所证实），布哈林承认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正在实现中，但是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斯大林和叶若夫，他们要建立一种以警察权力为基础的“对党和国家”的个人专政。“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消灭我们。”他转过身来面对斯大林，指控说：“你们利用前所未闻的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恐怖主义和折磨手段，迫使许多老党员写了所谓的‘证明’材料。……你们掌握着一大群供你们使唤的领取薪金的告密者。……你们非要杀死布哈林和李可夫不可，以便进行一场策划已久的政变。……”

---

① 重印于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第182—184页。关于写这封信的情况，在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于1961或1962年写的一封信中有所叙述。彼得·雷德韦博士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基金会的档书中为我提供了拉林娜的信的抄件。

布哈林强调这不是他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因此恳求中央委员会“回到列宁的传统上来，并且不许那些隐藏在党的权力背后从事阴谋活动的警察们乱来。今天，管理国家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党。正在准备搞政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布哈林的追随者。”①

当他要求对警察的所作所为进行调查时，斯大林突然插话说：“好吧，我们就送你到那里去，你自己去看看好了。”②

当时界限很分明。波斯蒂舍夫，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站起来为清洗反对者讲了话。他说：“我个人不相信……一个走过了一条为党和为社会主义而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漫长道路的忠诚的党员现在会站在敌人的营垒里。我不相信这一点。……”讲到这里，据说斯大林以一种严厉的威胁口吻打断了他的话，粉碎了他的决心。于是，他和与他有同样想法的发言者开始退却，并且收回自己的怀疑，不过也有几个人显然并没有这么做。斯大林看到自己占了上风后，便开始采取他惯用的策略。他假装自己是中立的，而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进攻的任务留给他的恐怖活动代理人去完成，还指定了一个由同一帮忠臣所控制的委员会来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③

---

① 亚历山大·乌拉洛夫（阿布杜尔拉赫曼·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的统治》（伦敦，1953年）第45—46页。人们对乌拉洛夫的叙述提出了疑问，因为他显然把全会的日期搞错了，把它放到了1936年秋天。（见本书第568页注④）但是他的布哈林声明的版本由于有其他的材料因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更扎实。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4页；《列昂·托洛茨基的著作（1937-1938年）》（纽约，1970年）第128—129页；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95页。这个版本在思想和语气上同上面引用的布哈林的最后一封信也很相似。最后，布哈林在全会上提出的挑战，当时曾正式报道。见赫鲁晓夫的报告，《真理报》1937年3月17日第2版。

② 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4页。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93—195页，并见上注。

这个委员会向在2月27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报告了自己的决定——“逮捕、审讯、枪决。”这项决定得到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赞同，而这个中央委员会中百分之七十的成员在随后几个月中将被消灭。于是，布哈林和李可夫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被捕了并被送到关押政治犯的主要场所——卢比扬卡监狱。[①] 十三个月之后，他们作为莫斯科清洗审讯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主要被告再次露面。

历史有时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记着自己的重要角色。布哈林死后许多年，他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政治形象不是以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所起的作用，或者他在苏联历史上所代表的东西来确定的，而是几乎完全以他在1938年那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中的表现来确定的。一个被当作苏维埃共和国的“凶恶敌人”上了镣铐和处以死刑的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魅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魅力由于人们普遍的错觉而更富于吸引力。这种错觉就是：布哈林心甘情愿地承认了那些骇人听闻和十分荒唐的罪行，为的是批判他自己所代表的东西，真心诚意地为自己过去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忏悔，并因此而对党及其“一贯正确”的神话作出了“最后的贡献”。由于曲解他在审讯中的表现而产生的上述看法，随着阿瑟·凯斯特勒1940年写的著名小说《正午的黑暗》的问世而流行起来。小说中虚构的清洗运动的受害者鲁巴绍夫（一个主要根据布哈林的形象而塑造出来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审讯他的警察（和他自己）所说服，相信作出这种“最后的贡献”是必要而正确的。主要由于凯斯特勒笔下的巨大感染力，鲁巴绍夫（即布哈林）作为忏悔的布尔什维克和道德上破产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两

①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4页。关于他们被捕的日期，见拉林娜的信，注（165）；《反苏集团案》第185页。

代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主要地位。① 然而，事实上，正如有些人当时就理解和另一些人后来终于觉悟到的那样，布哈林根本就没有真正承认对他指控的那些罪行。②

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必须从那次审讯本身的政治含义以及在长达一年的监禁期间他所面临的不愉快的选择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出历时十一天的司法滑稽戏不过是前两场表演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再现而已。这次审讯于 1938 年 3 月 2 日开始，地点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那里曾经是贵族俱乐部的豪华舞厅。这是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由三名法官组成的法庭。斯大林恐怖的两名臭名昭著的判决者 B• B• 乌尔里赫和维辛斯基再次作为首席法官和首席检察官主持这次审讯。除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外，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其他十九名被告人，其中包括已被撤职的警察头目雅果达、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一度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和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五名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人民委员和高级经济管理人员以及三名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其余的人都是非政治性人物，他们是那些主要阴谋分子的所谓工具，包括一名农学家、一名前驻柏林的外贸官员、雅果达和已经去世的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私人秘书，还有三名上了年纪的克

---

① 这是 1947 年莫里斯•梅勒•庞蒂写作他的著名的哲学论文《人道主义和恐怖》的灵感，这种灵感再现于 1967 年让•卢克•哥达德摄制的电影《中国人》中。凯斯特勒曾说鲁巴绍夫是混合体，"他的思想方法是按尼古拉•布哈林塑造的，他的个性和外貌则是列昂•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结合。"——《看不见的作品》(波士顿，1955年)第394页。事实上，鲁巴绍夫的"思想方法"和"性格"是分不开的。

② 有些西方和苏联学者曾经争辩说，布哈林并没有认罪。例如，可见阿弗托尔汗诺夫：《斯大林》第 28 章；塔克为塔克和科恩编的《大清洗的审讯》所作的序言，第 40—48页；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讯》第二部份；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 176—178 页。属于当时就理解的人有英国的目击者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铤而走险》(波士顿，1950 年)第 67—75 页；从远处讨论这问题的有曼内斯•斯伯普，见《评论》(1969 年夏季)第 101 页。

里姆林宫医生。每个人的交代都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来的，都是为了迎合那种希奇古怪的控告。同从前一样，一切都是经过事先排练的，包括三百名左右的观众也是如此。这些观众除了少数外交官和记者外，大多数都是充当愤怒的群众的警察局雇员。[①]

然而，就其规模和政治意图来说，这次审讯同以前几次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起草的起诉书的说法，他当时在法庭的楼上通过一扇拉上了帘子的窗户观察审讯的进程[②]——这些被告人是一个庞大的刑事阴谋集团的一部分，它实际上包括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反对派和稍有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阴谋集团的头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右派分子和受流放在国外的托洛茨基操纵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分子。这个“全是布尔什维克大杂烩”的概念促使官方为这次审讯起了一个正式名称：“反苏维埃‘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案”。起诉书认为，这个集团不仅要为各种恐怖、破坏和间谍罪行（这些也是加在前两次审讯的被告人身上的罪行）负责，而且还犯有一大堆更加残忍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策划暗杀了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人和策划暗杀斯大林和他的“最杰出的战友”未遂；策划破坏苏联的安全，向德国和日本开放苏联的边界；策划把苏联的领土放手交给外国列强；以及破坏经济和复辟资本主义。

起诉书列举的各条罪状都是为各种各样目的服务的。有些罪状把人们本来疑为是斯大林的罪行（例如暗杀基洛夫）加到了他的政敌的身上。有些则显然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为1929年以来斯大林的领导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寻找借口和推托责任，例如指控布哈林等人在集体化期间组织“富农造反”，毒死牲畜，阴谋使城市居

---

① 见《反苏集团案》第675—676页。关于目睹记，见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61—83页；沃尔特·杜兰蒂：《克里姆林和人民》（纽约，1941年）第76—81页。

② 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82页；杜兰蒂：《克里姆林》第78页。

民得不到消费品供应，说他们采用的手段之一是指使他们的代理人把玻璃混在粮食里。①然而，整个说来，这些罪状和这次审讯所要达到的总目的，是要永远地搞臭和谴责一切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除斯大林（还多少有点勉强地包括列宁）以外的整个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把这个领导班子说成是“一堆臭气熏天的人类垃圾”，——实际上就是要给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加冕典礼。总书记在1937年布哈林被捕时所说的下面这段名言，通过他的发言人兼检察官维辛斯基之手变成了这次审讯所要控诉的主要政治内容：“这次审讯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已经向人们表明：……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等等……只不过是一群没有任何原则和思想的杀人凶手、间谍、异端分子和破坏分子而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就是说‘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并不是一个政党或者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帮凶恶的罪犯。他们并不是一帮简单的凶恶罪犯，而是一帮把自己出卖给敌人情报机关，甚至连一般的重罪犯人都视之为最卑鄙、最低级、最不足挂齿和堕落者中最堕落的罪犯。”②

斯大林的计划是要布哈林在这场加罪于老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中充当主角。布哈林是斯大林主义出现以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象征，而且是这次出庭受审的最主要的党的领导人（因为托洛茨基是缺席受审和判刑的），因此在党员和所有知情的公民们看来，他是这次审讯的中心人物。③他的罪行——这是长达八百页的起诉书中一大部分内容的主题——被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罪行的象

① 见《反苏集团案》第675—676页。关于在各级宣读审讯记录的问题，见纳桑·莱特斯和伊尔萨·伯瑞特：《消灭的仪式》（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54年）。

② 《反苏集团案》第626—631页。

③ 奥尔洛夫：《斯大林的罪行》第277页。

征。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布哈林"扮演了大恶魔的角色。……他是一切犯罪行为的幕后策划者，参与了每一个阴谋活动。在他对自己进行诽谤的同时，每一个囚犯也在小心翼翼地对他进行着诽谤。……潜藏在他们心中的对光荣历史的记忆已不复存在。"在屈从的被告人的帮助下，维辛斯基利用一切机会费尽心机地把这个曾经是党的"喜爱的人"的整个政治经历窜改成"无以复加的极端虚伪、大逆不道、阴险狡猾和残忍邪恶的一生。"维辛斯基甚至下结论说："此人的虚伪和背叛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大逆不道和最可恶的罪行。"① 最后，他把企图杀父这一最坏的罪名加到了布哈林一个人身上，说他在1918年就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进行争论时曾经图谋杀害列宁。

布哈林关在监狱的一年中，斯大林及其负责审讯的那些警察要求他在这场几乎不加掩饰和令人憎恶的伪装中给予充分合作，即坦白交代和出庭受审。在整个大清洗中，实际上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向数千名同样清白无辜的囚犯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招供，现在已经不再是个谜了。到1937年，苏联的政治监狱已经变成进行最残酷的肉体摧残、连续几星期搞消耗体力的审讯（即所谓"传送带"制度）和无数次即时枪毙的场所。野蛮的暴行不分男女老少降落在每一个囚犯身上。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这"大概是俄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页"。② 然而，许多囚犯还是坚持不屈，最后不作招供而被折磨致死或被枪毙。至于那些"坦白交代"的人，他们这么做，是最合乎人的情理的："他们由于肉体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这么做。少数人也许是出于鲁巴绍夫那样的动机而招供的，但据一位幸存者告诉

① 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68页；《反苏集团案》第656—657页。

②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8章。康奎斯特：《大恐怖》第5和9章。

我们说，对于绝大多数受折磨的人来说，《正午的黑暗》这本小说会成为人们嘻嘻哈哈的笑料”。[1]

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据说他没有受到严刑拷打）在由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指挥的连续不断的威胁和审问面前，“以令人钦佩的勇气”一直坚持了三个月。大概在1937年6月2日左右——“仅仅是在审问他的人威胁要杀害他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以后”[2]——他终于软下来了。这种威胁可不是空的。“人民敌人的妻子”连同她们的孩子，照例都要逮捕起来作为人质（尤其那些决定安排在装模作样的审讯中出庭受审的比较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更是如此），或者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者被枪毙。在布哈林被捕后的几个星期内，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同其他“政治犯”的亲属们一起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去了。[3]他为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她们后来在监牢里度过了二十年——不得不“坦白交代”和出庭受审。

与此同时，布哈林同意出庭受审还有（或很快就想到了）另一个原因。救自己的命并不是一个因素。他知道，不管他表现如何，对审问他的人听从得多还是听从得少，他都会在审讯以后或不经审讯就被枪毙掉，因为这是斯大林导演的这场戏的脚本所要求的。[4]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象他在法庭上转弯抹角地所表

---

① 亚历山大·瓦特：《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之死》，收于《文化论文》，利奥波德·蒂尔曼德编（纽约，1970年），第72页。

②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87页；奥尔洛夫：《斯大林的罪行》第280—282页；《反苏集团案》第648、777页。米高扬后来告诉一个美国记者说布哈林没有受刑。康奎斯特：《大恐怖》第391页。

③ 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42、330—332页；《亚基尔回忆录》，《俄罗斯思想》1971年10月28日。不象那些同自己的妻子在过去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因而可期望她们分担政治命运的囚徒，那些有年轻妻子的囚徒是特别不利的。而这些年轻的妻子当然还有幼小的孩子。

④ 布哈林的最后一封信和在审讯时作的证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反苏集团案》第474、768、777页。

达的那样："'假如你必须死，你是为了什么而死的呢？'——这种极度阴暗的空虚感突然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生动形象出现在你面前。"① 他明白，对于他自己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次审讯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赋予他的死以意义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决定同意扮演一个有代表性的布尔什维克这一象征性角色。他说"我要对这个集团负责"，也就是说，他要对布尔什维主义负责。② 但是，他决定通过在法庭上所能利用的一切巧妙手段和最后一次运用伊索式的表达方法，使他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同斯大林的意图是大相径庭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如同另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布哈林的计划是要把对他的审讯变成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反审讯（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俄国革命党人的做法），并把对他的起诉书变成对斯大林的起诉书，控告斯大林是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刽子手。③ 简而言之，他的策略是泛泛地承认他对一切事情都要"负政治上的责任"，以便既能挽救他的家属和突出他的象征性作用，同时又能断然否认或巧妙地反驳关于他参与过任何实际罪行的指控。这样，对那些"感觉兴趣的人"来说，对他提出的刑事指控的真正政治含义就清楚了。斯大林的法庭当然会判他有罪，但是布哈林出庭受审却是为了向另一个更高的法庭，即历史的和"未来一代"（他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这一代的）的法庭，提供证言，或者象他在庭庭上所说的那样："世界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审判庭，"而且只有这个审判庭才是算数的。④

在斯大林看来，没有布哈林出庭就不可能有设想中的审讯，这

---

① 《反苏集团案》，第777页。

② 《反苏集团案》第372、768页。

③ 塔克为塔克和科恩合编的《大清洗的审讯》写的序言，第44—48页。

④ 《反苏集团案》第778页。

个事实比允许布哈林有最后的公开讲话机会可能带来的风险更为重要。[①] 因此，使布哈林为审讯作好准备一事就成了费时而冷酷的谈判过程。布哈林在6月份同叶若夫和斯大林的密使伏罗希洛夫举行的一次谈判，曾就他最初的交代材料取得了协议，但在看到斯大林亲自对这个材料作的修改后就拒绝接受。于是，审问他的人就重新开始，"日日夜夜地"忙个不停。直到审讯前夕，最后的稿子还在进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的代理人竭力提防布哈林可能采取的任何主动行动。例如，为了防止他隐晦地揭露对他的指控的虚假性，他们让他看了莱昂·福伊希特万格的一本近作，该书叙述了作者所看到的1937年的审讯情况，他保证说那些指控和供词都是有根据的。然而，在整个审问和审讯中，斯大林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始终是布哈林的家属的命运。[②] 尽管如此，布哈林还是断然拒绝接受某些指控，尤其是对他进行间谍活动和图谋暗杀列宁的指控，因为这些指控同他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象征出庭受审的意图是不相容的。与此同时，为了在监狱里给自己作好准备，他"工作着，学习着，保持着清醒的头脑"。[③]

3月2日上午，审讯在耀眼的弧光灯下开始进行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维辛斯基想尽可能把布哈林同证人席隔开的时间拉长。他这样做当然是不无原因的。在三天时间里，他引导其他被告人提供证词，让他们谴责自己和布哈林。一位当时在场的旁观

---

① 塔克为塔克和科恩合编的《大清洗的审讯》写的序言，第55页。

② 奥尔洛夫：《斯大林的罪行》第282页；《反苏集团案》第129、767、778页；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讯》第125—126页，福伊希特万格为审讯写的辩白书——《1937年的莫斯科》——的苏联版本于1937年11月出现。在审讯中，维辛斯基曾暗示他的妻子曾参与了一次阴谋会议，企图以此办法吓唬布哈林。布哈林予以坚决否认。《反苏集团案》第350—352页。

③ 《反苏集团案》第777页。根据一种说法，布哈林在狱中曾撰写一本关于"人的性质"的书。帕格：《除了真理别无一切》第110页。不知道手稿是否幸存。

者回忆说，“在布哈林本人没有参加审讯程序的时候，”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当布哈林终于有机会讲话时，当他一再盘问原告和其他被告人和3月5日和7日他自己被维辛斯基审问的时候，还有3月12日他向法庭作最后陈述时，“事情就进行得不那么顺利了。”① 在这场大量使用反话、遁词、暗语、含蓄的提示、逻辑推理和坚决否认等等手段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答中，布哈林一次又一次地从越来越惊慌失措的维辛斯基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使真正的检察官斯大林提出的这个案子陷入一片混乱。

布哈林的策略在对他的审问刚开始进行时就一清二楚了。他说：“我承认这个反革命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不管我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直接参与过其中的任何行动。”为了使那些不明白他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使前半部分变成毫无意义的人懂得他的意思，布哈林后来用下面这句离题的话贬低了他整个“交代”的价值，他说：“被告人的承认是中世纪的法律原则。”② 随着审讯的进行，他——为了他的家属——小心翼翼地反复强调他要为“这个集团的(一切)罪行”负责这句过分的话，而同时，在具体问题上，却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否认一切。对于那些最稀奇古怪的指控，他干脆彻底否认，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些对话中看到：

维辛斯基：你是否同他（指同案被告人伊克拉莫夫）谈论过关于破坏活动的事？……

布哈林：没有，我没有……

维辛斯基：在后来的几年里你是否同伊克拉莫夫谈论过关于破坏活动和异端行为的事？

布哈林：没有，我没有谈过。

---

① 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68页。

② 《反苏集团案》第370、778页。

* * *

维辛斯基：我再说一遍，你要向法庭交代……你们那个阴谋集团同国外的白卫分子和德国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关系。

布哈林：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我不记得有什么关系。

* * *

维辛斯基：被告人布哈林，你承认不承认犯有间谍罪？

布哈林：我不承认。

维辛斯基：李可夫讲过之后，沙兰戈维奇讲过之后，你还不承认吗？

布哈林：我不承认有罪。

* * *

维辛斯基：根据在这里提出的揭露你的证词，我再问你：你是否愿意在苏维埃的法庭面前承认你参加了外国情报机关？你参加了哪个国家的情报机关——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

布哈林：一个也没参加。

* * *

维辛斯基：那么关于暗杀斯大林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和列宁同志的事呢？

布哈林：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 * *

维辛斯基：有一个暗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计划吧？

布哈林：我否认。

* * *

布哈林：我绝对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事件有任何关系。①

---

① 《反苏集团案》第348—349、378、413、424、504、771页。还可举出其他的例子。

对于某些指控和证据，布哈林不得不以更加巧妙的方式来加以驳斥。在盘问一名其证词把他说成犯有破坏罪的被告人时，他使这个被告人提出了同起诉书本身相矛盾的日期。至于对伊凡诺夫和沙兰戈维奇这两个发誓说他曾领导他们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同案被告人，布哈林评论说，他们是“两个内奸”。有一次，一个“奇怪的、死尸般的”证人，即老的社会民主党人弗拉基米尔·卡列林从警察局的地牢中被带出来就杀害列宁的阴谋问题作证。当维辛斯基问布哈林是否认识这个证人时，布哈林聪明地暗示了这个已经变得虚弱不堪的人所受到的折磨。他说：“哎呀！他的变化太大了，我不敢说他还是原来的那个卡列林。”另一次，他打击了对他的审讯所赖以成立的整个阴谋，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或听到过同他一起从事阴谋活动的五个人。他说：“为了结成一帮，这帮土匪中的成员必须互相认识才行。……”然后，把话题转向维辛斯基“所说的逻辑”，他又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说：“在基础哲学里，这就叫做同义反复，即把尚待证明的东西当作已经被证明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①

布哈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驳斥那份可耻的起诉书来保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遗产。但是他还想利用他的法庭证词就苏联所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同德国的战争和斯大林主义（通过恐怖手段）的出现——来发表一篇最后的政治声明。原告方面是欢迎他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评论的，因此这方面不存在问题。从他在监狱里得到的“有关真实生活的片断消息”，布哈林知道欧洲的危机正在加深，战争越来越临近了。因此，他象从前一样，在受审时也恳求心怀不满的苏联公民抛弃“失败主义态度”，保卫苏联——即使

---

① 《反苏集团案》第125—127、383、496—497、769、771页。关于卡列林和其他证人，见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66页。

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把这作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强大有力的因素"。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纳粹德国之间毕竟只能有一种选择。①

然而，在为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和对后代发表讲话时，布哈林相信，他对在审讯中被奉为神圣的官方神话（即认为斯大林政权和斯大林主义是十月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与顶点）提出挑战，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要采用原告所使用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术语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就行了。他有好几次明确地指出，"在我的术语里"，"反苏集团"、"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势力"的真实含义是指老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党，所谓"非法"、"反叛"和"阴谋"活动是指合法地反对斯大林的活动或者仅仅是举行一些非官方的会议而已。②依靠这种办法，他自始至终都毫无困难地宣传了这样的观点：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这次审讯仅仅是这场清洗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高潮）是摧毁布尔什维克党，这是"反革命势力从内部进行的破坏"。③

要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和纲领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乌尔里赫和维辛斯基不时地打断他宣讲"犯罪集团的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离题的话。④不过布哈林还是设法讲出了下面的话，他说："在经济方面，就是鼓吹国家资本主义，主张让个体农民富裕起来，削减集体农庄，向外国提供租让权和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其结果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他试图"解释一个公式，就是讲一讲复辟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维辛斯基不让他讲下去，很快

---

① 《反苏集团案》第767、776—779页。应该记得，在国外的许多反斯大林分子和反共分子是同意这一点的。

② 见《反苏集团案》第128—136、184、380页。另见塔克为《大清洗的审讯》写的序言，第31页；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讯》第128—130页。

③ 《反苏集团案》第778页。

④ 同上书，第369—370、381页。

就把他的话打断了。即使如此，他讲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意思还是清楚的。[①] 布哈林个人以及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曾相信某种新经济政策式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是正确的。因此，由上面强加的革命，“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或列宁主义的东西。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要说明那一个阅读每天的报刊报道或翻译成各种外文文本的原始审讯记录的人会不去注意布哈林这场斗争的戏剧性效果，那是很难的。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当然懂得布哈林有“一种方法和策略”，而且力图使审讯“具有一种特殊意义”。[②] 被布哈林这种“十分荒谬的马戏团杂技表演”弄得惊慌失措和老羞成怒的维辛斯基和乌尔里赫，用尽一切威吓手段来拯救那份起诉书原稿的内容，他们威胁：如果布哈林继续“使用明确的策略，……表面上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躲躲闪闪，对枝节问题进行诡辩，把话题扯到政治、哲学、理论等领域中去，……”他们就要彻底剥夺他的发言权。[③]

对这次审讯情况的第一手报道生动地证实：布哈林“是为他自己在全世界面前的名誉、为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斗争”。他四十九岁，面容苍老，胡子灰白，在外貌和举止上看起来“出奇地象列宁”。[④] 他公开蔑视维辛斯基，“对自己所起的战斗作用十分欣赏”。他“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念着他在整个审讯期间仔细地记下来的

---

① 《反苏集团案》第168、369—370、381页。

② 同上书，第243、667页；和397、400 435、650页。《消息报》1938年3月9日，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78页。

③ 《反苏集团案》第423、667页。

④ 《纽约时报》1938年3月8日第2、8版；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62—63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是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他在“把麦子从麦壳中——把真理从虚假中筛出来”以后报道说，指控和供认“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当战争开始时，戴维斯大使喜欢说，这次审讯“粉碎了希特勒在俄国的第五纵队”。约瑟夫·E·戴维斯：《到莫斯科的使命》(纽约，1941年)第269、272页。

笔记，”用“连珠炮似的逻辑推理和蔑视语言”回击着对他进行指责的人，“致使整个法庭上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在维辛斯基进行总结，把他描绘成“那个该死的狐狸和猪的杂种”以后，布哈林站起来在法庭面前作了最后陈述。他先是再次承认对他的指控，然后“开始（这次是没有被打断地）把这些指控驳得体无完肤。无法插嘴的维辛斯基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很尴尬，却又故意地打着呵欠。”① 布哈林讲完话之后，一位美国记者写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五十四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的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象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②

三十年以后，一位西方专家写下了这样的话：对布哈林的审讯，“虽然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卑劣的，却可以恰当地称作为他的最壮丽的时刻。”③ 布哈林希望这是历史的裁决，他知道法庭是不会

---

① 《纽约时报》1938 年 3 月 8 日第 8 版和 1938 年 3 月 13 日第 30 版；《反苏集团案》第 685 页；麦克莱恩：《铤而走险》第 74 页。

② 《纽约时报》1938年 3 月 13 日第 30 版，必须注意，虽然这无法加以解释，这同一个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在报道这些审讯时曾写道：“在广泛的意义上，它们不是伪造的。”《纽约时报》1938 年 3 月 14 日第 4 版。

③ 一个对卡特科夫的《对布哈林的审讯》一书的匿名评论者的话，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70 年 1 月 29 日。

作出这种裁决的。维辛斯基命令把他和其他被告人“象处死恶狗一样地予以枪毙”。《真理报》关于这次审讯所发的社论也鹦鹉学舌般地写道：“把这批间谍、内奸、破坏分子和异端分子毫不留情地消灭之后，苏维埃祖国将沿着斯大林的道路更加迅速地向前迈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将更加丰富多彩，苏联人民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欢乐。”① 因此，3 月 13 日清晨四点半，经过六小时装潢门面的“审议”之后，乌尔里赫重新开庭宣读判决书：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十七名被告人“予以枪决”。1938 年 3 月 15 日苏联政府宣布枪决业已执行。令人感到冷酷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布哈林之死的消息由于三天前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奥地利而被人们忽视了。②

关于布哈林被枪决的情况，无法得到任何可靠的资料。根据在莫斯科流传的一种说法，“布哈林和李可夫死的时候嘴里咒骂着斯大林。他们是挺着胸脯站着死的，而不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着要求怜悯。”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种说法对苏联国内外那些为布哈林之死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结束而哀痛的人是一种安慰。③

---

① 《反苏集团案》第 696 页；《真理报》1938 年 3 月 10 日第 1 版。

② 《反苏集团案》第 791、799 页；《纽约时报》1938 年 3 月 16 日第 4 版。托洛茨基从这次审讯同希特勒的进军的巧合中看到了“悲剧性的象征意义”。见《列昂·托洛茨基的著作（1937—1938年）》（纽约，1970 年）第146页。另见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讯》第 183 页。

③ 维克托·克拉夫钦科：《我选择自由》（纽约，1946年）第283 页；玛格丽特·麦卡锡：《抗议的一代》（伦敦，1953 年）第 112 页。

跋

布哈林和历史上的布哈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不能被看作是三个十年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斯大林灌入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是一些歪门斜道的东西。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现象，它是假共产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纯洁共产主义运动，洗刷掉一切斯大林主义的污秽的过程尚未结束。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罗伊·麦德维杰夫

对布哈林去世以后在苏联官方社会中的名誉可以作个简要的概括。他被枪决以后五个月，官方出版了一本新的关于党和革命的历史书。这本历史书在出版以后的二十年间，以它的副标题《简明教程》为数百万读者所熟知。该书把1917年以后苏联的发展过程描述成以斯大林为化身的美德战胜"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斗争过程。① 当时能够以亲身经历揭穿这种摩尼教式无稽之谈的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到1941年希特勒入侵时，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反对派的和不是反对派的）及其政治上的同伙和朋友都已经被枪毙或者很快就在斯大林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81页。

的劳改营中死去了(据人们所知,布哈林个人的追随者中只有一个人——瓦连廷·阿斯特洛夫——幸存了下来)。① 当然，许多年纪比较大的苏联公民还是知道事实真相的。② 但是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苏联是一个笼罩着恐怖气氛的沉默的社会，在那里，除了官方声音之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布哈林以及除少数人以外的所有原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始终是被强烈谴责的，只有同"一帮人民公敌"这样一种标准的诅咒语相连用时才会被公开提到。③

斯大林死后,恐怖气氛随之消失,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苏联社会的改革过程开始了。伴随而来的是官方对布哈林和其他殉难的布尔什维克缓慢的、而且仍然是没有结论的重新评价。在上台过程中,赫鲁晓夫掀起了旨在使党恢复1936年以前曾有过的那种显著地位的运动，这导致他干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揭露并谴责斯大林的反党"罪行"。他在1956年2月举行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秘密报告,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为1928至1929年间在政治上击败布哈林反对派一事进行辩护，同时谴责了

---

① 当德国开始入侵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匆忙地处决了数千名在三十年代被宣判为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集中营囚犯。约瑟夫·肖尔马:《伏尔库塔》(伦敦,1954年)第169页。二十年代布哈林的信徒瓦连廷·阿斯特洛夫在斯大林时期在集中营中度过大部分时间。见W·克拉久斯:《在一个苏联隔离地》,《圣安东尼资料:苏联问题》第1期(伦敦，1956年)第143—145页。阿斯特洛夫在五十年代回到莫斯科,发表了两部历史小说:《火光在前》(莫斯科，1958年)和《峭壁》(莫斯科，1966年)。后一本书是对二十年代党的政治生活的小说化的叙述,曾遭到现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因为阿斯特洛夫"诽谤了他从前的同志"布哈林分子。见《新俄罗斯言论报》1971年2月2日第3页。

② 需要指出，两个苏联诗人，即鲍里斯·帕斯捷纳克和巴维尔·瓦西里也夫，1937年英勇地拒绝在要求处决布哈林的请求书上签名。瓦西里也夫遭到逮捕，不久就被枪决。见瓦西里·格罗斯曼:《川流不息》(纽约，1972年)第33页;沃林和斯劳瑟,《苏联的秘密警察》第186页。这本书中把瓦西里也夫采取违抗行动的日期弄错了。

③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46页。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从而含蓄地为其受害者平了反。[1]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苏联持续不断地进行了重新评价党的历史和为数千名斯大林的受害者恢复政治名誉的活动。然而，在那些死后获得荣誉的人中间，大多数要么是过去支持过斯大林，后来在他那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运动中死去的人，要么是一些比较次要的党的反对派分子。这里面既不包括布哈林，也不包括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敌。

到1961年，赫鲁晓夫那场越来越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终于把党的历史上反斯大林主义的代表布哈林的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同年晚些时候，四名幸存的老布尔什维克向政治局请愿，要求完全恢复布哈林的名誉。请愿书上写道："一个列宁称之为全党所喜爱的人是不能留在叛徒和被开除出党的人的名单上的。"[2]虽然他们的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但是一年以后，布哈林的遗孀——她和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几乎二十年之后于五十年代获得了自由——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亲自接见。她要求正式撤销对布哈林犯罪的指控，允许她和她的儿子回到莫斯科定居，恢复她丈夫在党内的名誉。赫鲁晓夫应允了前两项要求并保证对第三项要求进行考虑。[3] 1962年12月，一名官方发言人用一句简短的话撤销了对布哈林的犯罪事实的指控，他说："当然，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4]

---

① 赫鲁晓夫：《斯大林时代的罪行》。

② 引用于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84—185页。

③ 鲍·尼古拉也夫斯基：《非斯大林化问题和布哈林的案件》，《社会主义通讯》第4集（1965年12月）第22—38页；米歇尔·塔图：《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的克里姆林宫中的权力》（纽约，1969年）第245页。即将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传说在1962年10月间曾广为流传。见《政治报》（贝尔格莱德）1962年10月16日第4版；《纽约时报》1962年10月19日。

④ 《全苏会议》第298页，发言人是彼得·波斯彼洛夫。他在1937年作为一个上升中的青年斯大林分子，曾激烈地攻击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的"特务、暗害分子和恐怖分子组织"。《真理报》1937年11月6日第3版。

然而，为布哈林恢复政治名誉的事情并没有接着发生。“布哈林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斯大林强制推行的集体化运动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前苏联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因此显然已经成为赫鲁晓夫和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对立面之间一个争论的根源。随着他在1964年被赶下台，和一个决心限制改革并要求对斯大林过去的问题至少部分地保持沉默的保守领导班子的上台，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关于他犯罪的指控已不再提及，他的名字偶而出现时也不带有贬意的评论。① 但是，布哈林在被处以极刑的大约三十五年以后，他的名字仍然被排除在苏联的大百科全书之外，他仍然是官方频繁地进行辱骂的对象，说他是“反列宁主义分子”，“假布尔什维克”，说他的政治主张和“右倾机会主义”损害了革命，给苏联带来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威胁。②

然而，苏联官方文献中对待布哈林的态度，并没有确切地反映出布哈林的思想在当代共产党世界中所占有的地位。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中，东欧的主要问题，一直是要改革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套秩序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创立的，后来强加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霸权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反斯大林主义的改良主义已经成为一股有效力量，不管是否还能加以控制，布哈林主义式的思想和政策已经复活。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改革派已经成为下列主张的提倡者：市场社会主义、平衡的经济计划与经济增长、渐进的发展、国内和平、混合的农业部门和在一党统治的国家的框框内容忍社会的和文化的多

① 见《苏共历史问题》1967年第8期第63页和1970年第10期第105页；《新世界》1969年第2期第192页。

② 瓦甘诺夫的《右倾》（1970年）反映了对待布哈林和布哈林主义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态度。见《共产党人》1970年第18期第115—119页上的赞美性的评论。

元性。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已经成了一句口号和一件美妙的东西。① 在某些东欧国家，官方对布哈林的评价已经大大提高。② 不过，要是以为当代改良主义主张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的名声和著作在起作用，那就错了。实际上这些主张的出现（以及对新经济政策和二十年代的苏联产生新的兴趣）是探索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秩序的自然结果，而且正因为如此，才使布哈林那些不朽的中肯意见受到了人们的称赞。③

苏联本身的情况也是如此。1959至1964年，当赫鲁晓夫的改良主义和放松审查制度的做法处于高潮时，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导致了可以称之为使用各种假名的布哈林主义的大爆发，即布哈林主义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的复兴，但是这些主张和方针政策不能，当时也并没有同布哈林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本身就在批判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改头换面地采用了布哈林关于社会应当和平地演化，应当“长入”共产主义的观点。④ 改良主义的计划工作者们和经济学家们开始重复布哈林关于科学地制订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利用市场和社会消费等著名告诫。⑤ 自由主

---

① 见伊姆雷·纳吉：《论共产主义——维护新方针》（纽约，1957年）；奥塔·希克：《社会主义下的计划和市场》（纽约，1967年）；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厄尔里希·弗罗姆编（纽约，花园城，1966年）。

② 见波兰和苏联对待以下著作的态度，即沃伦·勒纳：《共产主义历史学中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南大西洋季刊》（1966年秋），第444—446页；另见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萨格勒布，1961年）一书中对布哈林的论述。

③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纳吉的《论共产主义》，他在书中引用了新经济政策来为他自己的《新方针》辩护。

④ 《苏共党史课讲授材料，第11—13题》（莫斯科，1964年）第44页；丹尼尔·塔希斯：《超出国家以外：经典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未来政策》（斯德哥尔摩，1971年）第161、191页。

⑤ 见摩什·莱文将发表的研究著作《苏联经济讨论中的政治主张：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义文化的拥护者们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党的政策及其在1925年通过的、由布哈林起草的那个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当作样板。[1]与此同时，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神话和获得了阅读历史文献机会的苏联修正派历史学家们，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小农经济和斯大林提出的集体化政策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同布哈林当年的批判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对斯大林的工业化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对他提出的共产国际政策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么做的。[2] 三十年后的今天，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不管用什么名字——从精神上说还是布哈林主义的东西，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这一点虽然不应过分强调，但是看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并不为过。[3]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官方支持下进行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性讨论基本上结束了。尽管如此，由于明确无误地粉碎了"斯大林主义就等于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神话，官方禁止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修正的做法是不可能继续很久的。也许在目前这代苏联领导人——他们的观点是根据斯大林时期的经验形成的——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以后，历史评价方面的审查制度终将取消，苏联作家终将获得比我们现在所能得到或所能有的更多的证

---

① 见A.鲁缅采夫：《党和知识分子》，《真理报》1965年2月21日第2—3版。

② 关于斯大林之后论述集体化的一些著作，见M.A.鲍格登科和I.E.泽里宁：《现代苏联经济史著作中的农业集体化历史》，《苏联历史》1962年第4期第133—151页；《苏维埃农民和苏联集体农庄建设史》(莫斯科，1963年)；《苏维埃社会的历史编纂学纲要》第8章。秉文讨论了对斯大林的工业政策的批判。对斯大林的共产国际路线的批判仅开始形成。见V.M.莱布松和K.K.希林尼亚：《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转折》(莫斯科，1965年)第125、177页；《苏联历史科学历史纲要》第4卷(莫斯科，1966年)第692、712—715页。

③ 或者正如伯特伦·沃尔夫很早就写的，在非斯大林化的整个过程中，布哈林一直是"宴会上的幽灵"，这个幽灵"并不留在他的坟墓里，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桩子打入他的尸体"。《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幽灵》(纽约，1957年)第135、139页。

据和更深的洞察力，他们终将公开探索党在关键性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和抉择。象研究苏联经验的西方学者那样，他们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各抒己见，对下列问题进行争论：实际上是否有一种可行的布尔什维克的选择，可用以替代斯大林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布哈林的农业政策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想法和他的纲领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同党对政治的垄断是否一致；以及对苏联政治家来说的一个关键问题——苏联如果在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下，是否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有准备或准备得更差。另外，象他们的西方同行们一样，许多苏联分析家大概也将得出这样一些结论：某种形式的布哈林主义本来是既可行又更可取的，虽然斯大林的方针以惊人的代价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布哈林的方针（它既不会有惊人的成就，也不会付出惊人的代价）会更加成功（而且会更加受人欢迎），其成就不会那么壮观，却也不会带来那么多的痛苦。①

布哈林主义的观点也许有一天会在苏联史学界的舆论中占据支配地位，赫鲁晓夫时期修正派著作的倾向，现在用打字机打和手传的所谓地下出版物的日益增多，都说明了这种可能性。自六十

---

① 最近很大一部分研究集体化和有关问题的西方学者，虽然不是全部，倾向于支持布哈林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但提出了某些保留。关于这些学者的意见，可见1965至1971年在《苏联研究》上出现的对集体化问题的连续的讨论；赫伯特·J·艾里逊：《使农业集体化的决定》，《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1966年4月）第189—202页；阿列克·诺夫：《斯大林真是必要的吗?》，《遭遇》（1962年4月）第86—92页；E.H.卡尔：《十月革命》（纽约，1969年）第6和7章；厄尔里希：《苏联的工业化》第2部分；莱文：《俄国农民》；伊萨克·多伊彻：《没有结束的革命》（纽约，1967年）。苏联历史界的意见，正如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有分歧一样，在对一些主要革命人物和纲领（如布哈林派的、托洛茨基派的、新斯大林派的等等）的解释上，也许最终也将分裂成敌对的学派。这种分裂在苏联一些非官方出版的著作中和苏联历史学家之间的热烈争论中早已露出端倪。例如可见：《对苏共历史第三卷的讨论》，《格拉尼》第65期（1967年）第129—156页。

年代中期以来，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性讨论正是在这些非官方的“出版物”中继续进行的，这种讨论是苏联改革派寻找苏联历史上真正的非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努力的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是殉难的布哈林分子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已经长大了的子女）①也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复活了布哈林主义的传统的。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现在直截了当地强调，布哈林的农业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对照。”②其他一些人则干脆重复布哈林对斯大林那些“不切实际的和冒险主义的”政策所提出的批评，谴责“斯大林的军营共产主义”，并象布哈林那样得出结论说：“没有斯大林，我们无疑会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③

这些问题虽然从性质上说是历史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政治上说，布哈林的名誉和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代表的那些主张的前途，主要取决于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中改革派的命运。如果改革遭到失败，那末，布哈林主义大概会作为革命历史中一个孤立的插曲，作为在苏维埃俄国形成和现代化过程中替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失败的选

---

① 其中著名的有青年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彼得罗夫斯基。他是被清洗的布哈林分子彼得·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见本页注③。在1967年，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子女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抗议官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签名者中有布哈林的儿子和三个被处决的布哈林分子——彼得罗夫斯基、爱恒瓦里德和施米特的儿子。《播种》（1969年6月）第59页。关于布哈林的历史情况，包括他的最后一封信，曾在地下出版物上流传。索尔仁尼琴有趣地指出了布哈林在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中的地位：“斯大林总是小心提防象布哈林那样的献身于穷苦人的人。他不理解他们的动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纽约，1969年）第121页。

②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65页。麦德维杰夫说这是“某些历史学家”的意见，又补充说他个人“不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然而，他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的批判却明显是布哈林主义的。见该书第3章。

③ 引自列昂尼德·彼得罗夫斯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译载于《华盛顿邮报》1969年4月27日第c1、c5页。

择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如果改革派在建立一种更加自由的共产主义，即一种"以人性的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方面获得了成功，那么，布哈林的观点和他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式的秩序到头来就可能被证明是共产主义的未来的真正预兆——斯大林去世后用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选择。